

序一：信史，在民间不在府衙

启之

大学老五届和中学老三届，是乌托邦的祭祀，毛时代的牺牲。“青春无悔”固然可以换取安宁，但是这种“认知失调”不过是自我麻痹。“选择遗忘”固然可以免于失眠，但它逃避了痛苦，也逃避了责任。

回忆往昔，追索因果，付诸文字：苦痛而艰难。核实真伪，联系出版，编辑出书：繁琐且劳神。自掏腰包不说，还要顶风冒险。而在这期间，如果你有什么差池，往往怨声四起——一天下的事就是这样，啥也不干的，是好人。一旦干点事，指摘就来了：说你想出名，说你有派性，说你有支配欲，说你自己不消停，还不让人家安静……所以，编这种书的，不但要有勇有谋，还要有境界，有涵养，有胸襟，有担当。

在北京高校的老五届中，不乏这种自找苦吃的人——清华有孙怒涛、唐金鹤、胡鹏池……北大有胡宗式、王复兴、张从……地院有孟繁华、朱德瑜、蔡新平……人大有高宁、李豫生、陆伟国……北师大有刘明、赵惠中、蔡鸣乔、丛立新……北师大虽然姗姗来迟，但是他们的起点并不低。

这文集的作者，有的我见过，有的只是神交。这文集集中的文章，有的早就读过，有的第一次看到。无论认识与否，无论文字高下，这些人都值得敬重，因为他们有承担，有历史感。他们知道，与其歌颂母校之荣光，不如牢记师道之耻辱。“‘文革’不是‘国难’而是‘国耻’。‘国难’是外族强加于中华民族的，‘国耻’是中国自己折腾自己，自己作践自己。”^①其作践的，首先是自己的人民，而人民之中，首先是精英，是文化人，是知识分子。麻木者沉沦，知耻而后勇。反思“文革”，就要记住“国耻”，而记住“国耻”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当年的经历见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汇集成书，付之梨枣，传之网络。

近十年来，“文革”研究出现了三种趋势：一是从通史转向专史；二是从官方转向民间，三是从政治转向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专史是通史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专史包括地方史和单位史。单位史首先是高校史。校方编写的大事记，对十年浩劫，或遗漏，或曲解，甚至只字不提。《北京师范大学111年发展历史大事件概记》，从1959跳到1978，1960至1977只字不提。这18年间千万人的苦难，近百人的死伤，学校的混乱，学业的荒废，煌煌校史置若罔闻。^②官家编撰的高校史中的“文革”，既粗陋，又浮夸，以弄虚作假为能事：“1966年后，师大经历了10年动乱的浩劫，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北京师大广大师生员工忠于职守，坚持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卓越成绩。”^③这54个字来自北师大校史。师大红卫兵在曲阜的暴行，极左思潮对教育的破坏，斯文扫地，文化倒退，堂堂校史视而不见。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官府、高校、校史不断地提醒着人们，几十年来的主旋律无非就是掩盖“国耻”，充沛天地之间的“正能量”，无非就

是粉饰“国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造着新的国耻！

退休之士、草根之民，有大音声起——清华、北大、地院、人大，以及北师大的老五届，用自己的行动，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真正有学术价值、秉笔直书的高校史，在闺阁不在庙堂，在民间不在府衙。

高校史的基础是史料的整理和亲历者的回忆。而最重要的亲历者是当年群众组织的领导。北师大之所以落后于清华、北大和地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派头头的缺席——“井冈山战斗团”的头头谭厚兰病故，造反兵团的“一号勤务员”沉默。三年前，我曾与这位一把手见面，劝她写写当年。她说忙。她的先生告诉我，当年为了逃避“现反”的命运，他逃出母校，逃离北京，没有钱没有粮票，靠做木匠活儿，打黑工维生，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他的叙述，让我知道了，当年北师大造反兵团受到的迫害，兵团成员处境的危殆，票证时代生存的艰辛。把这些经历用一个“忙”字雪藏深埋，很符合“宜粗不宜细”的歪理邪说，但是一个时代的不公，一个群体的苦难，也随之消逝在历史的黑洞之中——最应该说话的没有说，是这本文集最大的遗憾。

编《记忆》的经历告诉我，高校史的编著者是“三多一少”。

三多：一是亲历者多。这些人多是当年的大学老五届。二是老者多。他们都是40后，年纪都在古稀以上。三是业余多。这些人所学专业绝大多数是理工科，出身文科的占少数，学历史的更是寥寥无几，以本书为例，刘明、赵惠中、蔡鸣乔全是物理系毕业，蒋世信学的是数学，他们的专业离史学远得不能再远，他们投入“文革”研究，不是教学的需要，不是领导的安排，而是出于兴趣和责任。他们不但挣不上钱，评不了职称，还要做出各种牺牲——从贴钱费力，到失去安全感。

我所说的“一少”，指的是中青少。80后，90后不必说，就是60、70后关心高校“文革”史的，也极为罕见。这“三多一少”意味着，民间学者任重而道远。

“师劫”二字，沉重而深邃。它以极简之笔，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毁灭文化的本质。人生是一个长征，此文集的作者们，用晚年的步武，丈量出人生的意义。用余生的光和热，温暖了后人，照亮了历史。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文集（二）的问世，而所有的雪藏深埋，都会付诸笔墨，留诸后世。

序二：平民子女的愚忠、求索与苦难

刘 明

北京师范大学老五届的第一部“文革”回忆录终于面世了！在我看来，它来得太晚了。“文化大革命”1976年10月结束至今已经过去42个年头，我们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古稀老人，一些重要的当事人过世了，许多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文革”经历的男女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清华、北大、北京地质学院老五届出版了大部头的集体回忆录，更有几十上百部的个人回忆录面世。北师大作为当年处于最前线的北京五大院校之一，为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冲锋陷阵，做出了毫不逊色的“突出贡献”，本应有同样分量的论著问世，但迄今仅有零星的回忆文章发表在《记忆》等电子刊物上，其回首反省之人寡势单与当年讨孔反逆的雷霆万钧如此不协调，委实令人遗憾，并不得不思索其中的究竟。

聚集在本回忆录中的作者少数来自于北师大的非老五届，个别来自于校外，大多来自于北师大老五届的各系各年级，工作生活于东西南北，相距数千里，是反思“文革”的共同意向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历经多年的联络、构思、发动、搜集、写作，方形成了这样一部回忆录。尽管我们已经极大努力，但集子仍然差强人意。其直接原因来自多个方面：校系档案馆（室）“谢绝入内”；以谭厚兰为代表的一些重要当事人已经离世；以林杰为代表的一些重要局内人病重无力参与；两派的若干知情人不愿提笔；更多的同学或者认为回首当年“痛苦不堪”，或者认为会搅动那滩终于归复平静的“死水”重新掀起汹涌波涛，或者认为历史一去不返理应目光向前……如此种种，回忆录的硬伤软肋在所难免，期待当事人、知情人、研究者补充指正。但愿她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来日后北师大“文革”回忆反思录的第二集、第三集……问世。

我们之所以要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推出这样一部回忆录，就在于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虽然中外知识界公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近现代中国和世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政治——社会破坏运动，学术界也有多部论著问世，但迄今在史实的揭示、背景的开掘、理论的探究等方面，还远远没有到位。相反，近年来倒有一阵阵反攻倒算的邪风扑面而来。先是有“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说法，导致内地几千上万家报刊杂志社电视台出版社中，居然没有一家能够继续发出响应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声音。惟愿我们的这部回忆录能和近年来通过种种其他的渠道面世的回忆录引成合力，多少弥补上述亏欠，并引发北师大人更广泛更深入的回忆与反思。

一、北师大造反运动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武兼备的和平时期的内战。如果将战争划分为红蓝两方，那么，

毛泽东就是“红军”的统帅，“5·16通知”“16条”是“红军”的行动纲领，林彪、周恩来等组成了司令部，“中央文革”则是其前线指挥部。“红军”由直属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队……有机分工构成。“蓝军”则是由毛泽东认为的阻碍他再造其乌托邦社会的所有现实+虚拟障碍组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各个文化领域的封资修反动思想……如是，我们可以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所代表的五所高校比喻为五支突击队，它们率先向“蓝军”特别是其司令部发起了冲击。体现在“文革”全过程，尤其在1966年6月—1968年7月的“文革”狂飙时期，每支突击队在介入中央机关和地方革命造反运动，以及应对校内反对派的挑战，其所选取的主攻方向、运用的出击技巧、产生的效用品味，均呈现出明显的反差。因对其内情知之不详，暂且不讨论作为“天派”“地派”名称来源的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仅就其余三校做些比较。

北师大、北大、清华等三支突击队，虽然都是在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战略部署，在下依靠在校的非黑五类青年学生等基本群众，代表红卫兵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各校运动均极其惨烈，尤其表现在都发生了数十起师生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北师大详情见本书丛立新的专稿《“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且都分裂出强弱不等成建制的反对派。但由于初创方式、领袖个性、核心圈成员结构、可利用政治资源等方面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中枢层面的重大差异。

北大的“文革”肇始于1966年5月25日的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大字报反映的是支持——批评陆平的两派在此前四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思想政治分歧；聂元梓本人是抗战期间奔赴延安的老干部，经过二十多年党内斗争的历练，政治经验丰富老道，其家族具有深厚的党政上层背景；聂元梓的核心圈是以孙蓬一为代表的中年干部和教师；以李讷为代表的若干离校或在校的高干子女向其传递高层的情报信息。

清华的造反派肇始于1966年6月蒯大富等青年学生批评叶林——王光美工作组而遭到严厉整肃，批评——被整肃反映了围绕如何开展“文革”的方式方法分歧；蒯大富本人是地方中层干部家庭出身，思维敏捷，能言善辩，不畏权势，妄自尊大，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蒯大富的核心圈亦以学生为主，辅以“红教联”为代表的干部教师；一大批高干子弟在不同阶段主导或者制约了清华运动的走向，影响深远。

而北师大的造反派渊源须追溯到1966年春，《红旗》杂志借调谭厚兰等几个政教系、历史系学生帮忙加强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谭厚兰自此搭上了林杰——关锋——陈伯达、康生这条“红线”；谭厚兰本人是贫农出身的调干生，老实听话，言辞木讷，能力平平，缺欠政治斗争经验；谭厚兰的核心圈由低年级学生和几个政教系教师组成；北师大几乎没有高干子弟，可借助的政治资源十分有限。

由于校情不同，上述三校所收受的指令系统也同中有异。“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这是同。通过李讷、江青等渠道，聂元梓可能较多地直接受命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亲临清华，听取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学汇报，并亲自给蒯大富等人平反，“中央文革小组”从来没有集体驾临过清华园；北师大则自1966年6月2日谭厚兰等人贴出第一张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直至1967年8月末，没有哪个北京高校造反派组织能比谭厚兰派接受更多更直接来自“中央文革”的指令，而且谭厚兰也没有其他的指令来源。“谭厚兰是有保姆的左派”，“林杰是谭厚兰的保姆”，为北师大校内外人所共知，这是异。（1966年7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全体驾临北师大时，康生说：“林杰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这是个好学生，你们的一个好同学！还有人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还有个后台老板是我呢！”）我们这部回忆录所记述的，就是谭厚兰率领的这支突

击队——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井冈山公社，兴衰成败的历史轨迹。

从1966年6月谭厚兰初次现身到1970年5月“清查5·16运动”中谭厚兰被隔离审查，整整四年时间。我们可以把她及她所代表的造反派——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与井冈山公社的兴衰划分为三个时期：1966年6月—1966年10月初掌权为初创时期，1966年10月中—1967年8月为鼎盛时期，1967年9月—1970年5月为衰败时期。在初创时期的反校党委，反工作组，利用李**大字报《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革命、假革命的分水岭》挑起通宵大辩论组织队伍；在鼎盛时期的造“工业学大庆”展览的反，教育部夺权与聂元梓“新北大”发生冲突……尤其是1966年11月发动“讨孔-捣毁孔家店”，1967年3月率先“炮轰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等震惊全国的活动中，均有“中央文革”在背后的策划、指挥，最少也是支持。1967年8月末林杰随同王力、关锋突然倒台，谭厚兰如丧考妣，成为“断线的风筝”，立即失去了势头急剧衰落，除去在1968年春逆造反兵团“倒谢”而“挺谢”而“围攻工五楼”之外，再也没有发动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正因为在其鼎盛时期，谭派无条件地效忠，“中央文革”也给予了她其余四大领袖所未曾享有的回报。一是在1967年5月5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470期，登载了一篇题为《在北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的报道，并附有毛泽东肯定性的批语。5月16日，正值《5·16通知》通过一周年，《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同时发表社论“军政训练好”，面向全国褒奖北师大左派；二是在1967年6月20日，谭厚兰以“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随姚文元出访“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尔巴尼亚；三是根据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指示，在北航宣布成立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同时，1967年8月18日，师大革委会发出公告成立军事委员会和井岗山民兵师，同时举行了授枪仪式。而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其他北京高校都未能享有如此信任和殊荣。

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谭厚兰和当年与她一起冲锋陷阵的战友们，自1967年8月林杰倒台之后一步步被夺权——批判——惩处：1967年9.7事件中谭厚兰和北师大革委会被中央保了下来，据康生说，北京市革委会的通告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他同时强调：事态“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可以说，谭厚兰们是沾了投鼠忌器的光；1968年10月，谭厚兰与一批“问题学生”一起，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1972年4月整个谭派在“批清5·16运动”中被彻底整肃，其骨干分子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允许保外就医，回到湘潭老家；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以王力、关锋、林杰倒台为界，谭厚兰及她的拥戴者的命运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冰火两重天”这个词组的含义，他们的关系委实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二、平民子女及其三无

今天，当人们回首历史之时，往往关注的是刘、林、江等上层人士在“文革”风云中潮起潮落、浮沉生死的命运。这些献身无产阶级革命的职业政治家在权力斗争中最终落败以致悲剧谢世，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斗争的原始性、野蛮性，他们的命运可悲可叹令人扼腕。但同时，也正是这些上层人士在其上升得势的阶段，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制造个人迷信，建构了

对党内外不同意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控制模式，他们创立并曾受益于这个体制，最终也是被同一体制所吞噬。即便在身后，因这一体制仍在有效运作，其在政商各界仍然资源深厚，自然有人去寻访遗骨遗物，修缮其故居，力争其历史地位，并以“总不会挖我们的祖坟”为名义，高规格安排其子女以官位，或为其经商谋职提供便利开辟方便之门。更不必说那些虽遭迫害，但终归熬过了这场劫难的更多上层人士及其子女，在“文革”结束后，官复原职，凯歌高奏，官禄德尽收囊中的喜剧了。

反观无辜或曾被冠以“罪错”的平民及其子女，如果他们在“文革”等劫难中离世、伤残、被抄家、被遣送回原籍……除去少数人在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得以落实政策聊补精神物质创伤之外，多数人只能默默承受曾经的苦难，以“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自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无数过世者早已被时间埋没，好像他们从来未曾在世间存在一样。

这一切，难道是公平正义的吗？

如是，再来观照以北师大老五届为样本的平民学生。这是一个京城三无群体（无知、无助、无奈）：无知：舆论一律的环境中，中共、苏共、国际共运的历史及中共当下的党内派系分歧，全是按领袖的意愿所构造。对于引领人类文明进程的西方尤其是英美系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以胡适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先进文化思想，或者是一片空白，或者正误完全颠倒；无助：想要了解外部信息没有渠道，想要获取帮助在权力人士-权力部门中没有关系。关爱我们的父母亲朋已经自顾不暇，对于子女的起落沉浮受苦受难爱莫能助，我们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自作自受；这和刘涛、贺鹏飞、陈小鲁、宋彬彬等一批高干子女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即便在落难时日，他们的内心备受煎熬，但厚重的关系网络仍能借助权力在明里暗里施以援手；无奈：十七年一贯的思想教育就是要求我们政治挂帅，又红又专，要求我们遵照刘少奇的《修养》：做“驯服工具”，做“齿轮”“螺丝钉”；遵照林副主席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求我们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到我们始终生活在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之下，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始终是“成绩不小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然而，我们毕竟还是人，还有人性，有对人性真善美-假恶丑的超政治判断；我们还识字读书，还具备常识，会运用以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为基要的形式逻辑。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奈的尴尬之中：人性-党性如何两全？常识逻辑——诡辩逻辑（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与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并行不悖；“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也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上令下行是典型的两例。赵惠中在本书中《关于“6.20事件”的补充与思考》亦有精彩的讨论）如何统一？

三、平民子女因求索而苦难

由于每个人的条件——父母给定的初始条件和生存环境规定的边界条件不同，以及性格和悟性的差异，每个人处理上述巨大尴尬时就有了不同的选择。一些人选择只“信”不“疑”，以“信”克“疑”；一些人选择“信”中有“疑”，“信”不忘“疑”。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下，以“信”为本突出表现为“愚忠”，保留“质疑”突出表现为“求索”。诡异的是，对立的两种选择都以苦难为结局。

应当承认，长期一贯的政治教育让我们几乎全部平民子女都成为“愚忠”（开放改革条件下，那些信誓旦旦表态“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个别人，则是一批伪忠者）的孩

子，但愚忠的程度有显著的高下之别。让笔者以数学上的幂次来将愚忠拟定量。借用市井百姓讥讽某人做事不灵光、脑子缺根弦的说法：“是个贰”，可以给愚忠赋值为“2”。完全克服了愚忠的圣洁者是极端少数，他们的愚忠是0次幂，他们身上闪现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他们以文明的是非为是非，林昭、顾准、张志新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愚忠是1次幂，我们真诚地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但认为其他人都可以批评怀疑，愚忠值即为2；在“文革”的狂飙时期，很多人的愚忠是2次幂，他们还真诚地忠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其愚忠值为4；同样是在这一时期，不少人的愚忠是3次幂，他们再进一步，还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其愚忠值为8；接下来，还有愚忠的4次幂、5次幂……幂次递增—人数递减。谭厚兰的愚忠大约在4次幂，其愚忠值为16。而大字报《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革命、假革命的分水岭》表现出来的愚忠则是畸高的N次幂，他们为了拉帮结派已经变态痴狂了。这些高幂次的愚忠者，自欺欺人的工具只能是诡辩逻辑。

但是，大多数平民子女并没有失去人性失去理智，于是引发了低幂次愚忠者针对谭派高幂次愚忠者的一轮又一轮辩论与抗争，它突出表现为造反兵团与谭派的分裂和此后的一次次文争武斗。所以说，北师大两派之争的本质就是同为革命派（1966年10月1日，《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发表之后，原来保工作组的保守派顷刻土崩瓦解，投向造反派，此后北京高校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理智尚存的低幂次愚忠者——造反兵团与丧失理智的高幂次愚忠者——谭厚兰井冈山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表面看来，谭派之强大与兵团派之弱小简直不成比例，故掌控全局的毛泽东在1968年7.28接见五大领袖时说：“谭厚兰，‘文化大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想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其实，造反兵团的弱小仅是表象，它在学校里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它要求独立于林杰，质疑谭厚兰的领导能力，脱离谭派井冈山重建组织，炮轰谢富治……均获拥众多，其中不少人身份是井冈山公社的，但内心却倾向兵团，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海派的出现为一例）。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很多很多人没有正式加入，或者加入了，没有积极参与活动，尤其是没有参加1968年春夏工五楼的两派武斗。造反兵团的理智尚存，还体现在它存在期间，除非自卫，从未发起和参与过激的造反活动，也不曾迫害校内外的无辜大众。所以在“清查5·16”“清理三种人”运动中，兵团人士均未涉及大案要案，这是值得肯定与称道的。在至今背景不明的1971年“4.26”抓捕行动中，兵团人士被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却又一无所获草草收场，突出反映了“文革”的法治荡然无存和“莫须有”畅行无阻。

我认为，这样一种低幂次愚忠与高幂次愚忠之间的斗争构成北师大两派之争的一个独有特色。而五大高校中的其余四校，无论是分裂为两大派的北大、清华，还是一片独大的北航、北地，各派组织都是低幂次愚忠革命派组织，两派之间的争斗也只是在低幂次愚忠的共识前提下，革命造反的方式方法政策策略之争。所以说，北师大造反兵团的独特性和对它兴衰过程及其因果探讨之缺乏是“文革”史研究的不足之一。

造反兵团对抗谭派仅仅是低幂次愚忠者表现其常识理性的方式之一。在当时极其专制封闭的条件下，北师大老五届中许多理智尚存勇气尚存的同学，在“文革”不同的阶段更采取过种种不同的形式，表达独立于发动者、鼓动者、指挥者及掌权执行者的观点，要求明辨理论是非，批评个人崇拜，质疑大人物的言行举止，探讨社会发展方向……总之，他们在力图维护自己作为读书人、思想者，作为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向往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一种

正常的社会生活。我把上述这一切统称为不甘盲从者的求索表现。以下略举几例：

①中文系四年级金宏达署名时汉人，1966年2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驳姚文元文章《对于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康生批示：此文“假科学、假公正、假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吴晗的立场上为吴晗辩护。时汉人就是吴晗的人。”之后，关锋、林杰等通过《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对时年21岁的金宏达展开一轮轮高调批判。“文革”高潮中金宏达再屡经磨难。②物理系三年级杨以鸿、刘中柱，1966年12月贴出一张大字报《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信》，要同“志壮坚信马列”的“林副主席”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讨论一下“顶峰论”问题，之后立即被隔离审查监禁批斗。导致杨罹患乙型肝炎。1980年杨以鸿考取首届CUSPEA，1984年以优异成绩在犹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后在非线性光学与红外激光等领域做出了令国际同行重视的工作。1986年回国。劳累过度且因早年肝炎转化成肝癌，1988年病逝，年仅41岁。③数学系二年级李世取（化名黑牛）先是贴出《必须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公开信——几点意见和建议》的大字报，就关于如何“更健康”地开展“文革”提出了自己个人的“几点建议”。之后又贴出大字报《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为林彪、向东彪和杨以鸿、刘中柱等辩白，他自知厄运难逃，甚至留下了遗书，准备直面死亡。从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释放后，李刻苦自学数学，1979年考取母校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后晋升教授，聘为博导。④物理系三年级学生李文博，1966年10月贴出大字报《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鼓吹大民主前提下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在校外影响极大，谭厚兰派则指责他鼓吹无政府主义。“12月黑风”中，他只是在同学给林彪贴的大字报上留言表示支持，便老账新账一起算，被打成“反动学生”剥夺自由，强制劳动。此外，还有敦进田（林锋）、张传亨（向东彪）书写“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蔡鸣乔对于康生所作所为的质疑……不胜枚举。

广义的求索行为在各系各年级都有，且表现为种种不同形式的质疑或抵制：对于以压顶之势鼓动全民学习毛著，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苏两党论战等公共事务，对于林彪、江康陈等文革小组成员等公众人物，对于家庭中发生的某种非常变故，相关人员的言行不符合那个非凡年代的“政治正确”标准，或者以生命抗争来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一切均为法治条件下的公民权利所允许，都应当视为对那条非人的极左路线的积极或者消极的反抗，都是在期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正常国家，在向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正常社会，都是合理合法的正常行为。但在当时，却遭到批判整肃，被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装袋子的学生，数不胜数，比例不会低于常常标定的5%。还有那些“黑五类”子女，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甚嚣尘上之时，曾被视为“狗崽子”；出于团结大多数的考虑，不得不否定这个血统论的口号。但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始终是一个负面的冠盖，其指称下的青少年在升学、就业、提干等各个方面均受歧视，备受压抑。遇罗克的《出身论》在全社会，包括北师大在内的各高校引起巨大反响，尽管潜流在民间底层，但它的正义诉求绝不可忽视。

愤怒出诗人，质疑出哲人。在个人迷信甚嚣尘上，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的文革条件下，思想者不是服从，而是坚持独立判断，提出另类的思想政治见解，批评亲密战友及其司令部成员言行不妥，要求与高层权力讨论是非，试图“扰乱军心”，“削弱斗志”，遭受打击迫害是题中应有之义，是“罪有应得”。那么，高幕次愚忠者的绝对效忠结局又是怎样呢？囿于文革中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造反派红卫兵头头及其核心、骨干们最终却落得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命运荒诞无比，容易引起多方面联想而具有高度敏感性，当局对此高度保

密，我们只是从门缝中窥见到极其有限的一鳞半爪。所以仅能列举谭厚兰及其核心、骨干在衰落失势之后遭遇的少数几个案例。

四、平民子女因愚忠而苦难

笔者在前面曾述及1967年8月末林杰随王力、关锋倒台之后，谭厚兰派江河日下迅速衰败的简况。谭厚兰本人在1978年4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病逝，终年45岁，一生未婚。笔者推断，谭厚兰之所以成为五大领袖中唯一的被“免于起诉”者，绝非因为其罪错逊于聂、蒯、韩、王，差别仅在于其身后的“保姆”更换成了完全不同甚至要清算前任的另外一批人，而她一如既往地“听话老实”，放弃自我辩护，按照需要的口径，无条件交代自己所知晓的上线内情，无条件自责悔罪，且因不堪的心理压力导致致命的绝症。她虽免受了此后的牢狱之苦，但却不惑而逝，相比其余四大领袖均能够超越古稀甚至白寿指日可待，谭的悲剧岂不更加令人悲叹：一个湘潭贫农最最平常不过的女儿，何以经历如此云谲波诡人生如此痛苦短暂，那个编辑部资料室令人羡慕的入口何以逆转为吃人深渊的洞口？

已知的井冈山核心骨干1970年后的情况如下：校文革常委、井冈山兵团作战部长、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周耀文被开除党籍，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井冈山兵团作战部副部长、数学系二年级学生王瑞龙，1965年社教入党，带领北师大与当地红卫兵疯狂地“讨孔”，在接受审查时试图跳楼自杀未遂，被宣布为“抗拒从严”，后被逮捕判刑8年；数学系二年级李竞权，因反大庆、迫害铁人王进喜、整余秋里和周总理黑材料，被隔离审查，赶到北医三院看病，从医院楼上跳下自杀死亡；中文系五年级王岚，在1966年7.27“中央文革小组”召集的大会上，侃侃而言，声名鹊起，成为谭厚兰的铁杆红卫兵，之后整理黑材料反总理，在1970年“清查5.16”时被判刑四年……

事实上，从1970年代“清查5.16”直至1980年代“清理三种人”，在近20年时间里，组织纪检部门对于文革期间全国尤其是北京的造反派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审查清理。不同时期，其内容对象有所差别。对于老五届的工作、生活，影响重大且深远的，无疑是1981—1987年全党上下的“清理三种人”。对于谭厚兰派及造反兵团的审查、清理、处分当然不例外，其过程和结果要比书记述的认真严肃得多，涉及面要大得多。之所以这样讲，一是源于双峰政治指导下的党中央极其重视；二是有关资料和当事人自述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所谓“三种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1980年代主持组织纪检工作的陈云多次强调，在抓紧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对“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陈云向秘书交代，他在大会发言中别的都不讲，就讲两句话，一句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另一句是“文革”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他说：三种人“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在成千上万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必须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必须防止把‘三种人’作为接班人选进领导班子。”在《通知》的最后一节着重指出，“文革”中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作为清查的重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以及

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

1984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对全市清理“三种人”进展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说明了北师大所属的北京高等院校（其中有40所中央与北京市“双管”的院校，包括北师大）的进展情况：“从1983年1月至今年年初，全市各高等院校认真贯彻执行了中组发【1983】6号文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影响较大，时间较长的校一级造反组织核心成员和有严重问题的人，进行了‘记录在案’的工作，现已基本结束。共记录在案的851人，占1966至1967年间在校学生总数87695人的0.97%，目前已经转递出了材料……”此处报告给出的数字只是1984年的阶段性进展，真正结案则是1986年之后。该《意见》结尾说：根据中央精神，“我们正在对‘文革’期间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清理。”意味着1986年“在案”的人数肯定要高出1984年。根据清华大学老五届的研究，清华向外发函涉及问题学生大约三四百人之多，占学生人数的3-4%，大多要求定为“严重错误”以上罪名。北师大和清华一样，同样属于“文革”重灾区，按此一比例计算，约6000人中被“记录在案”者当在150-200人以上。

知情人士指出，被“记录在案”的人员，依据错误严重的程度划分为三等“处理”：①定为三种人，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非党群众要给予较重的行政处分；②犯有严重错误，要给予党内处分或行政处分，控制使用；③犯有一般错误，基本不影响使用。但具体执行上因时因地而异。不论何种情况，哪怕没有什么问题，但只要是“记录在案”，那就是置于罪与非罪，错与无错之间，有一柄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头顶，随时可能掉下来，给予致命一击。清查结论为“未发现什么问题”，但被“记录在案”的清华414派二把手孙怒涛深感不公地写道：“我几十年来感觉被打入另册……因为好几次，每当到了有关我的前途事业的关键时刻，事情总会莫名其妙地朝着不利方向逆转。就像我在行进中被一堵透明的厚墙挡在前面……即使今天我知道了极有可能就是这个‘记录在案’在作祟，我也无处可问，无人可问，无理由可问。”

时至今日，北师大老五届学生中，到底有多少人、什么人被逮捕判刑，被“记录在案”；被“记录在案”者中，又有多少人，什么人分别被划为三种人、犯有严重错误、犯有一般错误，他（她）们后来的命运如何？官方从未公布相关信息，绝大多数当事人因为痛苦或者羞愧，或者不愿再揭旧伤疤而重提往事，不计其数的关注者、研究者无从知晓此一重大事项，只能深感遗憾。

五、摒弃旧怨，共同反思

回首近四十年前，作为因反对谭厚兰，质疑林彪“顶峰论”，同情兵团“倒谢”且归属“右派”子弟，在毕业鉴定过程中被谭派骨干“揪打戴装”、整肃、发配的无派系人士，我诚心拥护“清理三种人”运动，认为谭厚兰及其追随者紧跟“中央文革”，捣毁文物摧残文化，带头攻击老一辈革命家，迫害校内师生，镇压不同意见，并因此而有种种不当得利，理应受到惩罚，令其接受教训，吐出不当得利。后来从不同渠道得知一点“三种人”或“准三种人”受到刑罚或者处分的消息，也认为他们是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阅读了包括《纯粹理性批判》《通向奴役之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新阶级》……在内的大量古今中外学术名著，了解和接触包括李慎之、方励之、许良英、刘辽在内的先知先觉者，思想发生了转变，得以逐步抛弃成王败

寇的功利史观而转向人类自由解放的文明史观，抛弃独断的一元论而转向怀疑的多元论，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转向宽宏的普世价值。借助当代先进哲理反思七十年来所经历的包括“文革”在内的风风雨雨，得出了与此前大异其趣的认识。

关于谭厚兰及其核心骨干。他（她）们的的确确犯有大大小小的罪错，他（她）们理应受到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应当在法治轨道上进行。1980年代的“清理三种人”运动，则是一种政治惩罚，是由“文革”中失势，“文革”后重新掌权的政治领导人主导。其结果是，“文革”中大学、中学的一批高干子女红卫兵，在“联动”“西纠”“海纠”“文革”筹委会……的名义下，在那个恐怖的红八月，干出了多少无法无天草菅人命伤天害理的罪恶，却在决策者“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指令下轻轻放过，成为近年来的高官巨贾，直至左右着当下中国的发展方向；而平民子女造反派头头或积极分子，则要接受文件指导下的审判或审查，这其中有多少夸大、扭曲、张冠李戴、随意定性……除去当事人局部知情，我们这些局外人最多听说一鳞半爪。清华一学者2010年访谈蒯大富，蒯本人回忆，1980年代审判他时，他为自己遭受逮捕、拘押而鸣冤叫屈，一位法院领导人直面劝诫他：“不抓你，全国各地那一万个‘小蒯大富’，我们就无法处理（大意）。”由一滴水看见太阳，从这一件事、一句话，容易发现“清理三种人”与历次运动一样，是法律为政治所主宰的运动。这里，公开、公平、正义，难免缺席。

正是因为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和指挥，被某种机遇推上“文革”风口浪尖的风云人物，曾经颐指气使兴风作浪。仅仅两三年时间，被认为完成了推倒旧当权派的任务，又同时被认为偏离了朝令夕改神秘莫测的革命轨道，就从浪尖跌落谷底，作为过气的造反派头头和积极分子，接受批判、审查、清理，真真是“用之如玩偶，弃之如敝履”，后半生受到明里暗里的控制或歧视。我将他们与因持有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者，同样地视为“文革”的受害者、蒙难者，尽管公众对两类苦难的评价会有很多分歧。

进入2010年代以来，我有幸读到来自不同高校不同派别老五届反思“文革”的文字，他们当中有当年的造反组织著名领袖，活跃的积极分子，有高干子女、不同意见者、重度犯罪者，当然更有普通亲历者……他们的文字角度不同，观点有所差异甚至发生争论，但是在回忆、反思、忏悔中，均表现出坦诚、正直、不计旧怨，共同指向一个崇高的目标：总结惨痛历史教训，批判传统体制弊端，反省国民人性弱点，将真相留给历史留给后代，以利创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我期待有几倍十几倍的北师大老五届，乘不多的有生之年，加入这一方兴未艾的反思“文革”大军，为兑现我们曾经的献身民族、献身未来、献身光明的理想发出最后的余热。

值此“五四运动”百年将至之际，我想以谨记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的告诫暂停本文的讨论：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本文多处资料和引文摘自张比、孙耘、唐少杰：“对一份后“文革”年代资料的多重解读”。见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2月版，第1327-1355页。谨致谢意。）

2018年11月6日星期二初稿

2018年11月16日星期五二稿

山雨欲来风满楼

叶桂桐

“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

从1965年底到1966年6月1日前，与北京师范大学直接有关的影响到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有两件：

第一件，《红旗》杂志借调北师大学生做资料员。

1965年底，在北京，与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同时，“文化大革命”也开始动作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杂志社，从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历史系借调了谭厚兰等五六个高年级学生做专职的资料员，为有关人员撰写大批判文章准备资料。

第二件，1966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金宏达的文章《对于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署名时汉人，公开为吴晗辩护。

1966年春天，北京的报刊杂志的主题一是批判《海瑞罢官》，这是根据姚文元定的调子来进行的；二是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是活靶子，这也算是北京方面对姚文元批判文章的响应与批判范围的拓展。正是在这大批判的风浪中，时汉人发表了《对于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文章。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我们只要看看文章的几个小标题，就不难看出其中深藏的玄机：

①“动机和效果问题被弄得简单化了”；②“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③“对吴晗的批评拿不出充足证据”。

时汉人认为姚文元混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限，把思想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公开为吴晗辩护。这是在整个批判风浪中，反对姚文元的文章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传出风声说，彭真非常欣赏这篇文章，说等时汉人毕业后，要把他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前线》去工作。但后来康生在北师大东操场数万人大会上，公开说时汉人是“右派学生”。

从1965年底到1966年6月1日前，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直接有关的、影响到全校“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有两件：

第一件，西北楼画展风波。

1966年4月27日，为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有一位中文系三年级的同学，在男生宿舍西北楼一进大门一侧的白墙上，粘贴了一张铅笔画。画面的主体是一位年轻的母亲站在画的中央，她的肩膀上坐着一位小女孩，小女孩的手里握着一束深紫色的玫瑰花，那手臂是伸向天空的。人物身后的背景是天安门，天安门的上空是一群飞翔着的和平鸽，彩色的气球飘荡在空中。天安门的一侧是华表。最为惹人注目的：第一，是那年轻的妈妈的头发是烫过的，是卷曲的长发，正在随风飘荡着；第二，是那女子穿着短袖的衬衣，那衬衣领子的开口比较大，露出了半个胸，那露出的地方戴着丝绳项链，项链上有一个心字形玉石坠；第三，更为惹眼的是那母亲的乳房是那样的突出。

那画是上午上课前贴出来的。

到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就有人在画的旁边，贴了一张用废报纸写的大字报，批评这张画，说这张画表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审美观念和情调。很快就有人响应。

第二天，又有人贴了好几张大字报，其中有的大字报说这幅画是大毒草。

第三天依然如此。

想不到，到第四天，突然有人说这幅画的立意还是很好的嘛，我们不应该随便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把人一棍子打死。

这自然迎来了更为强烈的批评。批评的矛头，开始不指向画的作者，而是指向了这位为画辩护的人。很快，楼道里便贴满了大字报。墙壁不够用，就在楼道里拉起了绳子，把大字报挂在绳子上。

这消息传得很快，不久，引来了别的宿舍楼的同学也来看大字报。大字报风波轰动了全校。

.....

又过了些天，一天早晨，所有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

第二件，中文系的“反动学生”。

1965年11月，当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时，秋叶他们正在密云水库参加引水工程建设。他们在那里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他们马上被通知回校参加政治学习，参加批判运动。这真正是闻风而动。

行动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系的总支书记是从北京市委调过来的，是北京市委的耳目；第二，当时在北京的高等院校中，一共有四所院校有中文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分文学与语言专业，语言专业当时以文献为主，文学专业以纯文学为主，人数也不多，搞批判并不特别内行。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和北京师范学院是地区招生，学生的入学成绩都不算太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则大不一样，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入学成绩很高，素质较好，又不分专业，人数又比较多，搞大批判最有战斗力，是北京不可小视的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把他们调回来，即使不能按市委的要求搞大批判，但至少便于控制，不至于成为敌对势力。

所以秋叶他们从密云回来之后，一是按北京市委定的调子，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二是严格纪律，正常上课，不准外出串联，在校按北京市委的规定和定的调子写大批判文章。

四月初，中文系64（2）班一些同学私下议论，现在虽然说得挺好，批判、读书两不误，

但实际上是两头互相牵制，两头空忙，应该停课参加大批判，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参加实际的大批判运动中增长才干，提高战斗力。

有一位头脑不太冷静的男生，就把这些议论整理成文字材料，递交给中文系总支书记，希望得到领导的支持。原本是一片好意，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严重了。总支书记马上把材料递交给北京市委，市委马上命令中文系对这些学生严加注意，认为这些学生中有反动学生，并有一个具体的名单，让中文系团总支分别派专人加以严格监督。秋叶的思想活跃，自然也在反动学生名单之中。但是他们当时什么都不知道，连他们已经被盯梢了都不知道。

中文系的这些未来的“反动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影响颇大的战斗队“燎原”的骨干。“燎原”的《宣言》是蒲寿章起草的，但后来大部分大字报出于杨树森和叶桂桐的手笔。

叶桂桐，教授。男，1945年9月生，汉族，山东省莱州市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198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作国内访问学者，师从钟敬文、张紫晨先生学习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蒋和森先生学习研治明清小说，获文学博士学位。原为鲁东大学教授，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现为山东外事翻译学院特聘教授，学科带头人。

叶桂桐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诗歌与中国古代小说。叶桂桐教授是海内外公认的《金瓶梅》研究专家。代表性专著包括：《论金瓶梅》《中国诗律学》《中国古代小说概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诗歌的互动》《唐前歌舞》《〈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著作和论文获得诸多学术奖励。

“时汉人事件” 始末

金宏达

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展览中，有关“文革”别的未多提，重点提到“时汉人事件”，“时汉人”是一篇文章上用的作者署名，何以竟成为一个事件呢？这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才有的。

一

1970年代末，我在武汉一所大学读中文系的研究生，那时，按规定有一段游学的时间，费用可以公出，我们便到北京去，会一会名人。“文革”刚刚过去，名人受够了压抑，有来访者一般也不拒绝，何况我要去见的这位作家，也是刚刚走红起来，听了电话里的自我介绍，很爽快地约定了时间。

当时这位作家的住房自然也还是很狭仄，我赶到的时候，房间里已经坐着三个客人了，想来是上一拨逾时未走的，主人就向他们介绍我，说我就是“文革”初期写为吴晗辩护文章的那个“时汉人”。

话音才落，只见这几位客人忽地都站了起来，动作中透出一点点吃惊。

“原来你就是时汉人！”其中一位说。

“我们前两天还在议论说，时汉人又出来了。”另一位语气中也掩不住有点兴奋。

那个特殊时期，一大批被“四人帮”打倒的老干部和各界名人正陆续获得“解放”和恢复名誉，“谁谁”又“出来”了，是人们经常议论的时事话题。他们所指“又出来了”，是我又接连在《光明日报》上用“时汉人”的笔名发了几篇文学评论。通常，“又出来了”的，都是一些当年的大人物，我想，或者他们在微微的吃惊中，未尝没有一点那样的意思：这个“又出来了”的“时汉人”，竟然是面前这样一个小角色。

确实，正当毛泽东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布局捣毁“三家村”，彭真力图以“学术批判”对抗之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时汉人”的文章，公然从政治上为吴晗辩护，一时影响很大，这篇文章是我写的，而我当时只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

二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一发表，就已经引起全国震动，其势汹汹，令人感到有一种不测之威。

当时我们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四年级，刚从河北衡水农村搞完“四清”运动回来没多久，原想可以转入正规课程学习了，却又停下课来，搞“学术批判”。

我们哪里能知道多少背景，即如这个“学术批判”，后来也被指为“假批判”，是要保吴晗过关、掩护“主帅”遁走的烟幕。总之，一切皆是按上级布置行事，大家就讨论“清官”好不好啊，“退田”对不对啊，基调都是批判吴晗的：既然他歌颂“清官”，阶级立场肯定就错了。那时对吴晗还称同志——吴晗同志为什么会犯错误呢？那是因为世界观没改造好，民主革命过来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了，教训是深刻的云云。

记得有一段时间，天天都在宿舍开小组会讨论，这种讨论是冗长而乏味的，报上不断有许多此类的讨论或批判文章出来，凡属正面意见都看得出来——无论是言谈中的口气，还是版面上的位置，《海瑞罢官》属于“毒草”，必得批判无疑，虽然是青年学生，大家也都有些“世故”，即使有想不通的，也不说，发言同仇敌忾，口径相当一致。

其实，我也无意于唱什么反调，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记不清是因为谁的什么话引动自己的反感了，我争辩说，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但也不能绝对化，不能说有什么效果，就一定有什么动机，比如说，有人无意间失火烧了房子，并不能就此说他是有意纵火。医生没能挽救病人生命，但不能说他主观上就是要杀人。吴晗写历史剧《海瑞罢官》，社会效果不好，但不能说他动机一定不好，如果说他的写作动机是反党，他不就是反革命分子了吗？显然不

能如此做结论。

当我说“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这话时，我是知道毛泽东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实是如此这般说的，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些中文系学生，《讲话》早已念得滚瓜烂熟了。所以，话一说出口，心里也有点不踏实。我的争论对手们当然更是口含天宪，他们坚决反击我的这种错误言论，也不记得他们是怎样不顾逻辑上的巨大障碍的了，总而言之，越是争论，越使我不服，争论也分不出高低。

校一级的“上面”很快知道了这个争论。他们秉承当时北京市委指示，执行“放”的方针，应该说彭真他们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用意，奈何许多有不同意见的人，有过“反右”斗争的惨痛教训，硬是将自己当作聪明的“蛇”，决不出洞。据说校方召开过座谈会，敦请各位知名教授敞开思想畅谈对姚文元文章的看法，不承想与会者已有前车之鉴，异口同声都说该文章实在“好得很”“坚决拥护”，会议主持者几乎近于绝望。现在忽然跳出这个在动机与效果问题上钻牛角尖的年轻学生，全然是意外的收获。

我被通知去参加党委宣传部开的一个座谈会，会议参加者不多，气氛相当轻松，也看不出有专为我安排这会议的意思。主持者特别强调，是大家随意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另还特别点出，是不是讲自己真实意见，也是对党组织的态度问题。那个时候，一提对党组织的态度，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已经到大学四年级了，我们班级只有几个人没有被“发展”入团，我即是其中之一。我的主要问题是走“白专”道路，而且有过一些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言论，例如，在1962年刚刚入学不久，一次政治课讨论会上，竟然“鹦鹉学舌”式地说“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后来整我的材料，这些都记录在案。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之前，已有政治辅导员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敞开思想，忠诚老实，接受组织考验，争取尽快加入共青团。既然说不说实话是这么重要的立场和态度问题，那我就照直说吧。我便在会上又照实重复自己的那些意见，只是更系统一点，更严密一点，也或者，更“诡辩”一点。何况，“开弓没有回头箭”，自己的意见只能靠自己来维护，在频频陈述和交锋中，话语更不断衍生。

三

1966年元月的京城，寒风呼号，天凝地闭。

北京师范大学的北饭厅里，一场全校的《海瑞罢官》讨论会在举行，或许是已到临放假时的缘故，来开会的人并未满场。但因为会上有各系选送的不同意见者发言，唇枪舌剑，也还吸引了不少人。

我是发言者中的一个。我的发言观点已经很明确，学术批判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不能据效果而定动机，要定吴晗的动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须看他的其他表现，看他的全部社会实践，而从当时掌握的情况看，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简单化、绝对化的，不能同意他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宣判。

实在说，我的意见并不具有多少学术性，只是在谈到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不可绝对化时，我引述了文艺理论课上学的“客观意义大于主观动机”的命题，似乎有一点学理上的根据。然而，“文以气为主”，年轻而气盛，气盛则话也听得过去，这大约也就是后来关锋、林杰在他们长篇文章中点名批判“时汉人”时说的“其声甚高，其言甚辩”罢，当时也赢得了在场一些人的掌声。

散了会，便有一位做辅导员的女教师跟过来，说“你今天的发言不错，你能不能整理一个稿子，拿去给领导看看？”我手头确有一个发言的文字稿，若要整理，怕是来不及了，当天晚上，就要登车南下回在武汉的家。她说那就留下这个稿子吧，要用也就是在内部刊物上用。听说要在内部刊物上用，我觉得拿出去的这个发言稿实在不成熟，又叮嘱一句，如果用，就和我联系一下。女教师说，那没有问题，这样，你要不想用真名，也可以留个笔名。用什么笔名好呢？过几天我就是武汉的人了，那么就叫“时汉人”吧。后来，据说康生作批示曰：“时汉人就是吴晗的人。”如此谐音解读，也似有那么一点意思，而当时，我哪能想得那样周至而重大，呜呼！

在武汉度寒假的时光，有一天，天色有些放晴，路上经过一个报栏，凑上去看看，却撞见了“时汉人”三个字，再一看，竟然在《人民日报》上——我的那篇发言稿登出来了，用的标题是：《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见附录1），在版面的下方，占了小半版，标题下有编者很经心拟的“内容提要”：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这种由编者加署“提要”，也是当时媒体一种很高妙的手法，它既能似乎很贴近原文的观点，又能让人一读即知其属“反面”而颇近荒谬，显出编者的态度和立场。虽然离开京城未多久，形势却是在发展，报纸上、广播里，斗争的火药味愈来愈浓，如果说我的意见早些时候放在校园里说说，不合时宜，只限一定范围，也就罢了，现在拿到“第一大报”上来，不就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靶子吗？于是，我立即有一种不祥之感。

四

果然，“时汉人”文章一出，就有了强烈反响。

在当时正进行的关于《海瑞罢官》讨论中，不是没有所谓的“反面意见”，也不是没有为吴晗辩护的文章，既然是讨论，就一定有交锋的双方，讨论的组织者在刻意设计、安排对立面时，尤其煞费心思。随意打开当时的报刊看一看吧，各种质疑姚文元文章也不断“破门而出”，然而，像署名“时汉人”的文章如此公然理直气壮地从政治上为吴晗辩护的似乎还是仅见，何况还发表在堂堂的“第一大报”上，占了近半版的篇幅！

《人民日报》既然“放”了这株“大毒草”出笼，它就不能不随即表明自己正面的立场和态度，所以，没过几天，一篇署名“薛舒”的《不能用折衷主义混淆是非》的文章，便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

“薛舒”者，谐音“学术”也，据说即是当时该报主持“学术”版面的编辑们的集体笔名。将“时汉人文章”与折衷主义联系起来也是于此首见。现在人们之间有了争执，只要想把问题解决，都力图寻求一个“折衷”方案，以达致“双赢”的结果。而在当年的“阶级斗争”中，人们被告以不能搞“折衷”，搞“折衷”便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便是不革命或反革命。吴晗被控写《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矛头指向伟大领袖，这可是天大的罪名，一个人被逼无奈或不得不违心地承认一些较轻的罪名，可谁会违背事实地去承认自投死地的罪名呢？当此之时，你只能跟着一起吆喝，逼当事者承认，断不能以第三者身份出来说几句公道话，说了就是你错。

这篇文章写道：

像时汉人同志这样挥舞折衷主义破烂武器的人，是不是真的“折中”不偏不倚呢？是不是真能站在所谓“第三者”的立场说话呢？时汉人同志虽然说了许多貌似公正的话，但是，除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以外，整篇文章几乎都在责难批评者，而对于吴晗同志的错误却曲为回护。例如：对于批评吴晗同志的许多文章，时汉人同志说，“理由充足的部分，我们也同意，理由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异议”。实际上，大家对吴晗同志的批评，他一句也没有同意，反而给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轻率”“武断”呀，什么“简单化”“绝对化”呀，什么“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呀，什么“压服”“拿不出充足的证据来”呀，总而言之，一无是处。

不难看出，时汉人同志并不是什么第三者，而是完完全全站在吴晗同志一边，为吴晗同志的错误打掩护。

此文虽是第一篇，但给“时汉人文章”一下就定位了。为什么如此之准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康生当时作了批示：此文“假科学、假公正、假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吴晗的立场上为吴晗辩护，时汉人就是吴晗的人。”“薛舒”的批判文章所发挥的就是这批示的意思。

后来，从大字报揭发批判材料中获知的还不止这个批示，据说“时汉人文章”发出来后，彭真也很重视，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指示立即转载。又有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要来学校调阅作者档案，意图不明。

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份内部简报称：“时汉人的文章出来后，京沪两地的老右派齐声叫好。”其根据何在，不得而知，但的确有人讲过，从这篇文章的文风和口气看，很像是吴晗的一位老朋友，忍不住站出来说话了。

五

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吴晗做什么“自我批评”也已经不能满足批判者的胃口，他们的火力所向，从吴晗又扩至“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而指向他们所谓“舍车保帅”的那个“帅”。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学校的处境尴尬而艰难，本来终于发现并培植了一个大大的“反面意见”标本，是立功的事情，而今却变得像是欠了账。学校里的一切正常的教学都收摊了，除了天天开会批判吴晗、“三家村”和《燕山夜话》之类外，也有的课程还就地取材，以“时汉人文章”为“反面教材”，上起了一二百人的大课，例如“公共政治课”就系统地讲授革命导师对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批判，“文艺理论课”自然也特别重温“讲话”，要把被“时汉人”歪曲的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再纠正过来。

报刊上反击“时汉人文章”当然不以“薛舒”的文章为止，仅在《人民日报》上就有不下六七篇，同学们都开始有意避开我，他们结集成小组在撰写批判文章。有一次，我去中文系所在楼层的一个房间找人，出来了一位女生，她用身子挡住门，示我以“禁入”的意思。多少年后重逢，她对我说当时他们是正在讨论批判我的文章。

那是一个极其难忘的“风雷滚滚”的春天，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主要是接二连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那些一篇篇“重头文章”，文章或点名或不点名，挟枪带剑，咄咄逼人，经由广播员特有的语气、调门播出，真有一股“风雷”般的气势，将人们笼罩在一派震惊、肃杀的氛围中。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三月的一天，中央台早晨的新闻联播竟然全文播送的是林杰发表在

《光明日报》上批判“时汉人”文章的长文，文章的题目是《学术批判必须突出政治》（见附录3）。这个时候，林杰的名字对于我们已经不再陌生，他虽然还比不上姚文元、戚本禹，但已经与关锋共同署名发表批判文章（见附录2），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威权地位。这篇文章是对“时汉人”文章全面、系统也是最严厉的讨伐和批判，它声称在当时的学术批判中存在一股以折衷主义反对突出政治的思潮，而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时汉人”。在层层剖析“时汉人”文章的论点论据之后，反复质问“时汉人”究竟反对什么，且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回答：“时汉人”反对的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六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

六月二日，政教系学生谭厚兰贴出了炮轰北师大校党委的大字报。

在经历了很短暂的“革”与“保”的交锋之后，许多人都陆续加入了炮轰校党委的阵营，大字报贴满了宿舍楼和饭厅的墙壁。校党委的负责人被指为与“黑帮”有联系，其主要罪状即忠实地执行了当时北京市委的旨意，把这一场斗争别有用心地引入“纯学术讨论”，而“流毒全国”的“时汉人”大毒草的出土，便是他们犯下的头条“罪行”。“时汉人”文章正式升级为一个严重事件，因为即使是北大、清华，似乎也没有出现配合北京市委领导人部署的如此显著“业绩”。许多大字报称“时汉人”是“吴晗的积极辩护士”“折衷主义和诡辩论大师”“右派学生”，更多的径直称“时汉人”为“臭名昭著的大毒草”。相关的揭发材料说，市委主要负责人曾经询问作者的情况，有意于将“时汉人”提前毕业调入市委，以充实写作班底，因此，“时汉人”又被称为“彭真的大红人”。

所幸斗争的高潮如骤风暴雨，人们忙于揪斗“黑帮分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不管是“因私”还是“因公（？）”，“泄愤”成为更切迫的需要，对“时汉人”这样的“右派学生”的处置还来不及考虑，我侥幸逃过了一场随时降临头上的“生死劫”，倘若在外地，绝对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在“文革”往后的进程中，我被打入“另册”。同学们和我拉开距离，我不能参加什么“红卫兵”组织，如果写大字报表述对学校形势的某种看法，也不能署上我的真名，以免持对立意见的一方揪住你的“尾巴”，大喊你是别有用心心的“坏人”。我原应该一直就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游离其外，不幸的是，在一年多之后，还是按捺不住表露反对师大“女皇”谭厚兰的倾向。

我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校园里，早已有人宣告“拥护或反对谭厚兰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仅仅反对她即已是“反革命”，何况你还身负更应严惩的“罪行”！一九六八年的三月间，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这些人一向被认为是谭厚兰的“后台”——倒台之后，京城的局势忽然发生了一个戏剧性变化，原本传言中要倒台的人没有倒，谭厚兰居然在剧烈的“地震”中又站稳了脚跟，遂毫不迟疑地以铁血手段展开“反攻”，在校内到处抓捕和暴打反对派。不出所料，高音喇叭中传出了“把反革命小爬虫时汉人揪出来示众”的口号，一场“触及皮肉”的“革命行动”迫在眉睫，我只得仓皇出逃。

然而，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我的全部生活供给都被切断了——没有粮票，没有伙食费，短暂的避难不得不结束，我又怏怏然回到学校接受“最后的审判”。放下行装半小时之后，我便被戴上事先早已准备好的牌子，上书打了大红叉的“反革命小爬虫时汉人”——这是当时一种已通行的称呼，用以表示对位置甚低的一类反革命分子的蔑视和憎恶。自居为

革命派的同学将我押到宿舍楼前一块空地上，大声宣布我的“罪状”，并高呼“打倒反革命小爬虫时汉人”以及“誓死保卫红色政权”“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一类口号，随后就开始游街示众。当时的况味自是终生难忘，双臂被两位同学反拧着，另有一人时时按下要抬起的头颅，牌子上穿过细细的铁丝，在脖子上竟越勒越紧，以致令我顿时有窒息之感。

七

结局当然是我并未能轻易“就义”，尔后还有接二连三的批斗，高潮是在初夏的一天。那时候已接到指示，滞留在学校的四年级学生，要和三年级学生一起分配，“方案”正在讨论中，班上“文革”领导小组决定对我再发力斗争一次，算作临行前的重要政治交待。

我必须承认，当时他们的确掌握了我非常要命的材料，这已不是路人皆知的那篇文章所能范围的了。事实是我在头一年的仲夏，和一位平日要好的同学接待了他的女友的一位女友，一次饭后散步闲谈中，我讲到师大斗争彭德怀时自己的见闻，受一种有充分信任感的氛围激发，我未加掩饰对“彭大将军”的赞美和钦敬。对于听者而言，一些言辞显然印象过于强烈，那位远来的女友回去追记在她的日记本上，另外还有一些对“中央文革”要员的“不敬之词”，以及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真是难以想象情节会如此推演：不久后，她因为家庭问题被抄家，日记本落入了“革命派”手中，无意中倒抓获了我的“罪证”——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把我打成罪不容诛的“反革命”。

材料迅速转到了北师大，它们确凿不移地证实了写“时汉人”文章的这个人骨子里就是反动透顶，必须批倒批臭。我自知承认是死罪，唯一出路只有矢口否认，在批斗会上不肯低头，为此，头颅首先大吃其亏，身上其他部位也尝了不少拳脚。末了，批斗者叫我“滚蛋”，离去时，我依然做“茅坑里的石头”状，大约又冒出一句“詈语”，于是又有几位勇士追将过来，最终是将我按在干涸的水沟里，行一顿暴打。

同班同学终于要走了，一位平日过从尚多的同学，悄悄向我出示了“班文革领导小组”整理的厚厚一沓材料，给我的定性是“右派学生”。不久之后，被遣送去营房在河北怀来县的部队劳动，在军人的管理下，我们从事种水稻和采小铁矿的劳动，度过了两年时间。一起来接受再教育的人成分相当杂，有的是当时响当当的左派学生，有的是一般革命群众，也有一部分是右派学生和犯有各种错误的，后者又分可以拿基本工资的和只拿生活费的。生活费是人民币20元，仅够吃饭，这种人问题性质严重，前景绝对不妙。我是属于拿生活费的。

一年多以后，学校来了人“落实政策”。主持校政的早已换成了“工、军宣队”（全称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谭厚兰自己也先是被送到我所在的这个部队的另一个团来“锻炼”，尔后则又被押回去“审查”和“交待问题”，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机即隐含在这种时势的变动之中。学校来人给我看一份“结论”，大意谓我由于世界观未改造好，于运动初写了一篇错误文章云云。

由“时汉人”文章而引起的事态暂告一段落。尽管我被告知与我本人“见面”的上述结论不会记入档案，事实上当然不是。在后来若干年的生涯中，直接或间接接触过档案材料的人都知道我的“严重问题”。一直等到“四人帮”垮台，吴晗的冤案平反，这个档案袋方得到彻底清理，不过，大的社会历史已经“拨乱反正”，这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原载金宏达著《金顶恒久远》，花城出版社，2011年5月，此处作者有小的改动。）

金宏达，江苏南京人，回族。1944年6月24日生。196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现代文学资深学者。

北师大“文革”见闻录

黄大地

一、“文革”被抄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也可以说是反右的继续。1966年春夏，红色风暴一浪高过一浪，先是拿批三家村的《燕山夜话》作引子，接着又揪彭、罗、陆、杨，后又发表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接着开始向各高校派工作组，后不久又批判工作组，形势像过山车一样变化着，初中生的我们却是懵懵懂懂一头雾水，但政治经验丰富的父亲黄药眠已开始坐不住了，别看他整天埋头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一两个星期也会出去一次，而且很晚才回来，看来他也是由他自己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的。有一天回来得不算太晚，见我还没睡就把我叫了过去，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形势可能会越来越坏，你要把身体弄好，以应对将来的政治变局，你妈不是说你有鞘膜积液吗？（当时我母亲是代夫受过在山西搞四清）如需做手术赶紧去做……于是7月初一放假，我就住到北医三院做手术了。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在医院里也能听到周围高校大喇叭一天到晚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的瞎叫唤。当时我还不明白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但现在我懂了，他们就是害怕群众在外旁观者清，慢慢看出他们的骗人伎俩，所以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裹挟进来，利用群众的嫉妒心、权欲心和攀比心，让他们互揪互斗，然后乘乱夺权，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北师大在7.27之前，虽然也已处在了风雨飘摇的喊杀声之中了，但是对于一般教师群众来说，还是只见雷声闪电不见雨点的暴风雨的前夜，家父整天躲在家里收拾整理他的文稿，面色阴沉。他的《王子与镜子》（参见《中国作家》纪实版2009年6期）、《寒娥的歌唱》等童话大概就是在这时销毁掉的。

7月27日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要员到师大来煽风点火应该算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前，批斗的对象还主要是走资派、反工作组的师生和后来的工作组，还未波及广大教职员及家属社会人员，而且批斗的方式还只限于喊喊口号，挂挂牌子而已。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来师大煽风点火后形势急转之下，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就是要把“文革”之火烧向广大教师、教授，就是要挑起群众斗群众。其中康生就明确宣称：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一定要紧追猛打不放松……但同时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也不

能放过，也要把像黄药眠、陶大镛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倒批臭……

江青、康生的7.27讲话在北师大掀起了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狂潮。过了没两天，7月底，北师大就召开了揪斗“牛鬼蛇神”的誓师大会。把各个系的教授，无论是右派教授、摘帽右派教授，还是普通教授（但党员教授除外），统统从家里揪到了大操场，有的甚至还把他们的夫人也揪了出去，算下来得有一百多人。在大操场上，锣鼓喧天，喊杀声响成一片。“打倒死不悔改的大右派朱启贤！”“打倒臭名昭著的大右派胡明！”“打倒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黄药眠！”“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声此起彼伏。他们充分发挥了“群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的给教授剃阴阳头，有的给戴高高的尖帽，前面则挂着大牌子，名字上划着鲜红的大叉子。

誓师完之后，一个一个的黑帮、教授被一队队的红卫兵压着先绕操场一周，然后游街示众，从教学区一直游斗到家属区并实施抄家。眼见着一队队的红卫兵，押着这些老头老太太，三四个人押着一个，将其两手往背后一掳，头往下一按，架成“喷气式”飞机样子，推搡着哒哒哒一溜奔跑，一队一队地从我们工四楼（当时的教授主要住在工一楼、工四楼和小红楼）前经过。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白皙精致的老太太被架成“喷气式”样子，像是拎小鸡似的押着，脚不及地就被架着一溜小跑地推押过去了。另一个是一个五六十多岁的老教授，头发灰白，身体微胖，也被架成“喷气式”的样子，被飞跑的红卫兵推押着，喘着粗气，表情挣扎扭曲，看样子随时都可能突发心脏病倒下。这时我的心里砰砰地跳，我老爹血压高、心脏病，能经受得了这种暴力摧残吗？这时押解黄药眠的中文系的队伍开过来了，锣鼓喊杀声大作，“打倒死不悔改的大右派黄药眠……”一眼望去，好家伙！一个一两丈多高的大幡子竖在家父的背后，上书好几个反动头衔，“打倒大右派、大叛徒、学术骗子、反动政客黄药眠！”名字歪七扭八，上面打着红叉，父亲的脸上好像也被涂上了些青色灰泥，总之是青面白发，格外难看。但还好，喊杀声大，动作还不算太粗暴，队伍行进得比较缓慢，也没让他坐“喷气式”，而只是把他双手反背到后面，押着他低头慢慢前行。

当时我们家是住工四楼16栋201号，（即现在的乐育7楼3门（201号）。队伍将家父押回家后，就迅速扑向他的书房。我当时听到要抄家的消息后，就先把《三国演义》《说唐》《西游记》《醒世恒言》等一些小孩子爱看的东西藏到一个沙发的坐垫下面了。抄家时我就躲在家门外的楼梯上偷听，听到里面翻箱倒柜的声音，不时传来大声训斥的声音，领头的是一个叫隋延堂的学生，声调异常严厉粗暴，回答稍不如他意，上去就“啪”的给家父一个耳光……抄家大约进行了四个多小时，也拉走了不少东西，大约有两小推车，但比我想象的要少得多。他们走后我回家一看，家里一片狼藉，但好在我喜欢的那些小说都还完好无损地躺在沙发下面。据家父讲，他们对书籍没什么兴趣，主要就是查抄日记、书信和相片，可能要从这些材料里看出他和什么人来往联系，和他真实的内心思想。家父说，当查到衣柜时，他曾拿出一个三千块钱的存折，问他们要吗？他们看了看，摇了摇头。家里还有一个八管（电子管）四个喇叭的当时较高级的收音机问他们，也说不要。就是我们家唯一的一辆自行车被他们骑走了，当然后来也还回来了。而随后的审查，外调也就随着他们对这些查抄物品的审查清理展开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楼上三楼的物理系教授吕烈扬，他虽然是搞物理的，但却是个酷爱文艺的收藏家，家里有精美的红木家具，有崭新的小人书，像《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都是成套成套的；还有精致的折扇、屏风、花瓶等。这些物件都被红卫兵抄家拉走了，整整拉了一整天，拉了二三十车才拉完。我们这些小孩当时就在栋门口啧啧称奇地观看，我当时就很纳闷，他们把这些东西拉去干嘛呢？同样是抄家，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我们家抄走的这些日记、书信、相片“文革”后与吕教授家的那些东西后来都还回来了。后

来才知道，对吕教授家抄得这么“狠”，是要把他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美国特务”来整治的。吕教授出生在牧师家庭，英语很好。先是任教于著名的辅仁大学，能用英语上课。1952年院系调整时才来到北师大。他上课时有一个特点，讲到关键的地方总爱用英语单词表达，而不是用俄语单词表达，这本是为了加强学生的印象和对词义概念理解的惯常做法，但这也引起了水平不高的极左分子的极大嫉恨，凭空地给他按上了“特嫌”的帽子。这以后，平时穿戴整齐，西洋派头的吕教授就被他们整得头发蓬松，灰头土脸的了。

回想起来，“文革”中对这些教授的揪斗，也都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相比北师大其他右派教授而言，家父原本是在党内党外混了大半辈子的经验丰富的政治活动家，是个老江湖了，对中共那套独裁专制的本性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虽然当年也响应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号召参加整风，但他对毛泽东讲的那一套忽悠人的东西并不看好，而是比较倾向于加强党外民主监督的制度建设，主张走正规的多党民主宪政的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他当时是民盟中央为应对中共整风临阵换上来的宣传部长，兼民盟“高校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的组长，所以他委托陶大镛等学者在各高校召开高校领导体制改革座谈会，主张在高校要以学术委员会或校务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同时主张要在人民代表大会设民盟组团，并在六教授会议上发言强调，党内滋长的资产阶级思想，正在从内部腐蚀着党，这个危险是从内部产生的，正如资本主义矛盾是从内部产生的一样，所以需要加强民主，加强民主党派独立、平等的监督。也就是说，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多党民主宪政。正因为此，反右时，他也就不多说什么了，虽然心里不服，但也就不打算较真了。叫他认错，他也就认错，他是政治上认错，学术上不认错，政治上认错也只说思想没改造好，不承认反党夺权有野心；因为也确实没有什么野心，如能够推进民主，知识分子当然义不容辞，当仁不让；但要是当局搞阴谋耍手腕出尔反尔也就算了，再争辩也没什么意义了，只能等历史来做出公正的评价。而他的这种顺变通达的态度，加上他的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可能就是他九死一生能够活过“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二、关于“文革”时师大教师自杀的情况

随着大规模的灭绝人性的批斗开始和劳改队的成立，红色恐怖愈演愈烈。士可杀不可辱，既然肆无忌惮对知识分子进行这样的人格侮辱，师大一些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就以自杀来捍卫自己的尊严。石磐先生是北师大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知识分子尊严的第一人。他在师大主楼的第一跳开启了北师大的一个以生命反抗专制暴力捍卫知识分子尊严的悲壮浪潮。

说起来石磐先生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原在中宣部作过陆定一的秘书，1950年曾去苏联考察访问，发现苏联的情况与他所学的马列主义大相径庭，于是回国后他就对斯大林模式提出了质疑，回国后于1952年被退党，并被调出了中宣部，到师大政教系任教授。1956年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报告后，他提出要求平反，说早已看出了斯大林的问题，并要求重新回到党内，但未能如愿。当局说虽然现在看来他批斯大林是对的，但在当时他反斯大林还是错的。而且不久形势左转，开始反右，他就又被打为右派，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1961年底开始纠左，才给他解除“劳教”，回校工作，被分配在国外问题研究所，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内。但他一直不服气，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这场官司一直打到1962年程今吾到师大任党委书记后，才最后由程今吾亲自拍板搞了个折中，也不恢复原职，也不算右派，一个月领一百块钱薪金，相当于拿一个中级讲师的工资。但此公还是不服，党内的人打压排挤他，党外的右派他还看不上。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保他的程今吾成为了师大头号

走资派，于是他又成了程今吾的走狗，又重新把他踢回到右派的队伍中来了。8月初师大成立劳改队后，他被与右派集中在一起，这对他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仍不屑与右派为伍，并公开与劳改队里的右派说，“我跟你们不是一派”，遭到了右派们的讥讽，这可能也是促使他跳楼的一个原因。8月17日下午，红卫兵令其自制黑牌，他不堪凌辱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下午三点多，生物系大右派徐光华在主楼四层还看见他，他们那时都在主楼打扫卫生，并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但一转身不知他怎的钻到了七楼，并从上面一纵身跳了下来。

当时的师大子弟都很紧张，都怕自己的家长自杀寻短见。一听说有人跳楼了，大家蜂拥向主楼奔去。我当时也不例外，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激灵一下，迅速跟着大家往主楼跑，跑到那儿一看不是自己的家长，这才松了口气，但心里还是感到十分恐怖和震撼。石磐是从主楼西侧北边跳下来的，地上的血并不很多，硕大的脑袋呈暗紫色，可能是跌落强烈撞击内出血造成的。

接着就出现了工一楼的三连跳。这几个人也堪称师大的传奇性的人物，头一个是天文系的刘世楷教授。他曾经创制了“天球坐标概算仪”和“太阳概算仪”，是一位极为勤奋且爱国的科学工作者，是中国天文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参与过北师大天文系的筹建。刘教授是1897年生人，原本并非右派。由于历史原因他有两位夫人，这在中共建政前本也是很正常的事，糟糠之妻不下堂是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娶了新的媳妇，总不能让老妻去喝西北风吧。所以在建政后，刘教授仍然延续了以往的家庭结构，和两位夫人一起生活。这就引起了红卫兵和极左分子的眼红嫉妒，趁“文革”打击迫害，把他打成反动教授，对其百般侮辱。8月23日对其抄家，25日把他送进劳改集训队，26日还给他剃了阴阳头，如此凌辱促使他决意离开这个红魔恶世。

26日将近中午时，住在三栋四层的刘世楷教授带着他的两位夫人来到了工一楼的楼顶平台上。师大子弟吴秉坚，当时出来溜弯，看见楼顶上有三个人，一男两女，在楼顶上逡巡徘徊，就是刘教授一家三口。起初刘教授是一手拉着一位夫人想三个人一起跳，但临到最后大老婆退缩了没跳，于是刘教授就带着小老婆跳了下来。据工一楼的老住户杨志宇讲，因为是夏天。家家都开着窗户，他们就听见两声沉闷的巨响，砰！砰！就像两个大箱子掉下来似的。刘教授是屁股先着的地，给土地上砸出一个坑，他夫人是脚先着的地，给地上砸出了一双较深的脚印。等人们跑出来查看时，他们已浑身青紫，奄奄一息了。校医院的郭建成大夫赶来检查时，都已断气了。

接着跳下来的，是大右派原俄语系主任二级教授胡明先生。此人精通马列，早年还是中共党员，后来虽然脱党了，但他也是一个有个性、有独立思想的左翼新派学者。1952年院系调整时就被从人大调到师大来了。此人在1949年就已出版了五卷本的《世界经济地理讲座》和《社会科学简明教程》等著作了。所以初到师大来时，是让他作师大政治经济教研组的负责人，后来党委领导丁浩川找他谈话，说俄语系是个烂摊子，教育部让他接任俄语系主任。在中共建政初期，胡明很受中共的信任重视，在“三反”“五反”时，他是师大的人民审判员，在肃反时他还是俄语系的大组长。胡明先生对自己的工作也总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把俄语系的工作理顺了，但这时作为系秘书的党员开始掣肘干政了。所以1957年整风时他称自己有职，有责，但无权，因为决定权在党委。他说，系主任最难办的就是“无信”，遇到问题系主任跟人家谈了意见，但经过研究后又把系主任的意见推翻了，所以单位党组织是造成他“无信”、造成他威信扫地的根源。

胡先生当时给整风定位很高，而且有自己一套系统的看法。他也是像朱启贤一样是要从

建立一套社会主义民主的角度来看待整风，所以他并不赞成把整风只看作是党的“家事”，而是看作是“事关六亿中国人民幸福和前途的国家大事”。他认为，既然党自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称党在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应该是与人民的利益是统一的，党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私心杂念搞特权，所以他认为党为了保持自己的使命和纯洁性，就不能姑息个别党员，甚至个别基层组织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及其他腐败特权问题。

他批评党员有优越感，党组织偏听偏信。他说，并不是群众自卑，而是因为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夸大自己的作用、功劳……对党的活动，一般群众不能过问，有意见也不敢提，更严重的是，个别党员以粗暴的命令方式来维持“威信”，在群众中影响极坏，而且他还批评了党组织偏听偏信的做法，要求党组织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来评价人和事。他认为学校三大主义都非常严重，并非是“不自觉的”，而是封建意识残余的反映。并认为这是党脱离群众，不信任群众的根源。并痛斥了系秘书专政的现象，指出了它的十大弊端……对于高校领导体制改革，他也提出了一整套建设性的方案，他主张通过成立校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完善群众监督机制，改善党的领导实行民主办校。

总之，在整风期间，耿直的胡明教授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对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并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但也正因为此，他引起了党内极左分子的仇视忌恨。反右后，他遭到了严重的迫害打压，但他一直不服，这样就使他遭受了更大的打击，直接取消了他的教授资格，让他长期在校内劳动改造。1963年给他摘帽后，只安排他在资料室当资料员。“文革”开始后，学校中的极左分子就又借机对他进行了粗暴批斗和人格侮辱，这实际上是对他高傲不屈性格的恶意报复，但没想到胡明先生不吃这套，士可杀不可辱，所以他就大义凛然地用自杀的方式来向专制独裁的极左分子们表示了自己最后的抗议。

胡明先生是住在工一楼的一栋四层，他是在刘世楷教授自杀后没几天的9月5日自杀的。那段时间他已被编入了强制劳动的劳改队，每天都要经受夏日的暴晒和弯腰蹲地拔草劳动，稍有松懈就会遭到红卫兵和围观群众的拳打脚踢和人格侮辱。每天下来，他都是筋疲力尽地拖着疲倦的双脚回家。8月26日那天走到家门口，正好看到刘世楷夫妇的尸体还未被拉走。这时一个红卫兵走过来恶狠狠地对他说，“你再不老老实实，下场就是这样。”胡先生当时眼睛一亮，但没吭声，就默默地回家了。他心里可能是受了刘教授英勇行为的激励启发，并决心以死抗争，一死了之。但他并不像刘教授那样公开高调地宣示，不像刘教授那样不仅自己死还要带上自己的老婆，而是采取了比较低调的方式。他是于9月5日凌晨三四点钟天还朦胧未亮，人们还在熟睡，四周一片寂静时自己一个人悄悄地从楼上跳了下来。胡先生可能并不是从楼顶平台跳下来的，因为他落地的距离与栋门口非常近，而且三层及二层楼栋窗户都被砸坏了，所以他可能是从四层的楼栋窗户跳下去的。在跳下去之前，胡明教授的内心肯定百感交集，凄楚悱恻，最后愤然纵身离世。胡明的夫人有文化但没工作，胡明走后，据说有一段她还帮人带孩子过活，后来就搬出了师大。他有一个儿子，有时也会来，后来就都不知去向了。

师大工一楼第三个跳的是住在四栋四层的教育系教授邵鹤亭。邵教授是中国资深的教育家，1902年生人，1924年曾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育系学习，毕业后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等校任教。1928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获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后，曾先后任常洲中学、苏州中学的校长，1945年2月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教授等职。是民国政府的教育专员，国立编译馆编纂兼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主任。中共建政后，曾在华北大政治研究所和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从1950年起任教育部参事和北师大教授。

邵教授也并不是只懂教育的书呆子，而是懂好几国文字，有自己的思想理论，政治性很

强的学者，著述有《尤莱士思想与革命理论之研究》《训导原理》《社会思想与教育》和《中国古代教育史》等。也就是说，邵教授不仅在民国时期受国民党政府的重视，中共建政后对他同样十分重视，所以送他到华北大学（即现在的人民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帮助他转变思路。邵教授在1957年整风时也曾参加过陶大镛教授主办的高校领导体制改革座谈会，并作了精彩发言。他认为中国大学办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人数多且有包食宿，行政事务太繁杂造成的，认为这是行政强势并压制学术的基本原因，但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学校自身没有很好地理清行政领导和学术的关系。所以他主张：应尽量采取教授治校的精神，因为在旧中国的大学中，办理得比较好的大学，多少都有教授治校的传统，关于聘请教授，教授评级等重要事项，大都由教授自己决定。其中有的学校里这些决定权属于各学院或各系。现在大学的一切主要事项，完全由党委与学校少数行政人员决定，这意味着教学人员没有自己解决有关教学上的重要问题的权力，而让非教学人员甚至让不懂教学的人员来支配，这自然是不应该的，不能办好学校的。所以他主张扩充现在的校委会组织，教授代表至少不能少于全体委员的二分之一，这样才能使百家争鸣和学术自由的精神在大学的行政组织中体现出来。

1957年5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有7位教授参加，是在朱启贤教授家召开的；而5月20日第二次座谈会参加的教授更多达14人，但邵教授不知何故却没有参加。反右开始后，邵教授侥幸没被划为右派，但实际上也已成了中共不信任的眼中钉了。

“文革”开始后，特别是8月初的大规模揪斗开始时，邵教授本还不是首当其冲的揪斗对象。但随着运动的发展，红卫兵变得越来越疯狂，越来越没有人性，揪斗的范围也日益扩大。9月7日，教育系教授邱椿被强令头戴高帽，手执招魂幡在校园里游斗，邵鹤亭原本只是个陪斗，并不是主角，但邱椿在途中经不起折磨突发心脏病身亡，于是邵鹤亭被临时作为邱椿的“孝子”强令其戴上邱椿的高帽，手执邱椿拿过的招魂幡接受游斗，接受红卫兵和围观群众的羞辱。这种移花接木、桃僵李代的做法，既荒唐又流氓无耻，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一个正直自尊从事一辈子教育事业的老知识分子是无法接受的，于是次日，邵鹤亭夫妇从四楼顶层愤然跳楼以示抗议。

邵鹤亭夫妇自杀的场面是比较惨烈的。邵鹤亭家住在工一楼四栋四层，9月8日上午九点钟，邵鹤亭携夫人来到了顶层的平台。他们还带了一瓶酒和一些熟食菜蔬，边吃边喝，而且身边还有一把刀。到十点多，他们双双跳了下来，可能他们是在跳楼之前先给了自己一刀，所以他们着地的场面十分惨烈，血流得特别多。邵夫人趴在地上，满脸满身全是血；邵教授的头可能是砸在井盖上了，脑门太阳穴处有个大窟窿，流着血和脑浆。很快警察就来了，检查完后，就叫了辆卡车把他们拉走了。

除了工一楼的三连跳，师大还有工三楼物理系赵亮坚副教授和物理系办公室主任王蓉夫妇的触电自杀，也是对专制暴政的抗议。赵老师英俊倜傥，不仅专业好，篮球还打得好，王蓉也是年轻漂亮多才多艺，他们俩应该是师大最受人羡慕的一对了。但这也引起了某些人的眼红嫉妒，利用“文革”对其审查迫害，人格侮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终使其忍痛抛下三个孩子，愤然含冤而去。

因为赵老师的三个孩子都是师大实验小学的，跟院里的家属子弟都很熟，大家一听建初、芳红的父母双双自杀走了，脑袋都嗡了一下，纷纷跑到他们家去看。他们家住在工三楼一栋一层，人多挤不进去，过了很久学校叫了辆卡车，把赵老师夫妇用被子裹着抬上了车。最为凄惨的是，孩子都太小，没有家属出来操办后事，但好心的邻居还是有的，赵老师一家平时跟邻居教育系张厚粲老师（张之洞孙女）关系甚好，关键时刻，张厚粲先生自己不便出面，就叫自己的长子王遵俦出面帮忙料理一切，那时他也才是十五六岁初二的学生。我们看到王

遵俦默默地爬上了卡车，坐在赵老师夫妇身旁把他们送走了。

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赵老师家这几个孩子无论是插队、工作、退休，每年过年张厚璨老师都把他们召集到自己的家中过年，而他们也都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这已在北师大传为佳话美谈了。

经过了第一阶段的揪斗，到1967年“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时，师大又出现了一波自杀潮。较典型的是家父的老朋友政教系教授马特先生。马特先生原来在香港达德学院跟我爸是同事，搞逻辑学的，私交甚好，也算是一个党外的新派学者。中共建政后，达德学院一批左翼教授都来到了北师大，除了家父黄药眠，还有像钟敬文、陶大镛、朱智贤、马特等，他们给师大带来了一股新的学风，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但来到师大后，家父比较尊崇章伯钧，觉得他有担当，敢做敢为，是个干事的人，所以热衷于参加民盟的活动，而马特在其“形式逻辑”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称赞后，就逐渐左转向党靠拢了，并终于在一九五六年入了党。但他在入党时心里还是犹犹豫豫地充满着矛盾，他还盘算着是否可以不参加或少参加组织生活，他不懂得，要入党就得把自己的肉体连同灵魂一起全都出卖给这个组织。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他又跟这些右派划清界限，批判了他的这些老朋友。所以后来家父他们就跟他断了来往。“文革”开始之初，他作为党员教授还能躲过一劫，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到了第二阶段“清队”时，他就又变成了重要的靶子。一个长期在国统区生活工作的人，社会关系必定是比较复杂的，即使自己觉得很干净，很多问题也是根本说不清楚的。据说马特自杀前曾来了一批外调的人，要他交代当年在香港及国统区的历史问题和一些熟人的问题，且态度十分凶狠粗暴。马特当年在国统区当过国民党的文化教官，但这在入党时已交代过了，现在又把此事扯出来审查，他很恼火，也很痛苦。据家父对他的了解，马特先生虽然自己思想左转，但要他出卖朋友，他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且也确实没什么可出卖的。当年大家在香港都是君子之交，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无所不谈，但如把这些也作为问题揭发出来不是很可耻么？所以马特先生被逼无奈，走投无路，只好寻了短见。马特教授确实是一介书生气，政治上不够成熟老练。“清队”时家父因认识的人多也被一天到晚逼着写材料，而且写完了没过多久又让重写，还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据家父讲，这不光是揪住不放的问题，这还是一种整人的工作方式，就是要通过你的几次描述看出是否有前后矛盾之处，然后从中找到蛛丝马迹……当然这在整体上还是奉行了列宁的一个组织原则，就是党组织有权对党员保持严密的监督和不信任。据家父讲，这套东西，老毛可能都不见得了解，很可能是康生从苏联带过来的。马特自杀前已有先兆，据钟敬文的女儿钟小宜说，前一两天曾看见他干干净净的洗完澡穿着一身西装回家，大家都很惊异，因为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对造反派的一种极大挑衅。而且据说马特先生走的那天曾对外调人员发了火，有些冲动，说：“这点事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啊！”过后不久他就借口上厕所溜了出来从主楼东头五层跳了下去。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他最终要去见的可能还是他的具有科学精神的逻辑学老祖宗亚里士多德，而不是什么崇尚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了。

另一个“清队”时自杀的重量级人物是朱启贤。此公是山东单县的才子（1911—1968），学贯中西。早年曾支持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活动，1927年加入国民党。1929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期间与同乡何兹全创办《教育短波》，订阅量达五万多份。抗战爆发后，积极抗日，并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一起组办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任副会长兼总干事，宣传知行统一的教育观及实践论，后曾去延安，出席“战时教育座谈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听过毛的讲话。1940年任成都华西大学教授，主编《中国教育》月刊，并发表了许多文章。

出版了《科学哲学与玄学》《前进的教育与反动的教育》《教育界的统一组织》等专著。他为抗日民主教育奔走呼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战时教育改造计划》《战时教育共同认识纲领》等重要文章。因为左倾，受到国民党的通缉，于是1943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1949年，他的毕业论文《孙中山哲学思想的发展》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授。在美他受民盟总部的指派成立了民盟美国支部。中共建政后，他在美组织了一个庆功会，后被美驱逐出境，绕道英国返回祖国，回国后任北师大教授，先后担任哲学、逻辑学、教育与哲学基础等课程的教学与指导，出版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等著作。

朱教授刚回国时很受中共重视。再次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人民日报也报道了他的回国消息，到师大后，先是给他安排到了教育系，但哲学系、政教系的课他也都能讲。但刚过了没两年，风向就完全变了。由于朱先生的耿直，不经意间就得罪了许多人。有一次，有几位青年在他家吃饭，无意间他问起当时的党委书记何锡麟是哪里人，不料不久即有人汇报，说他对学校最高领导竟直呼其名。又一次他讲逻辑学引了艾思奇的一个偷换概念的错误，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说他破坏党内领导同志的威信，告到何副校长和系主任那里，甚至考虑他是否还能讲课。但实际上这个错误是毛泽东最先指出来的，而且马特的文章也引用过艾的这个错误，但马特因文章受到过毛的表扬，他讲就没有问题。所以朱先生感到师大的气氛很不对头，感到整个师大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都非常严重，不像一个学校，而像一个行政机关。

在朱先生看来，师大教条主义也很严重。依靠苏联专家不动脑子，系领导一来就把苏联的讲稿往桌子上一扔，让人们都按这个讲，但朱却说，这叫什么搞学术？干脆不要讲课，灌个唱片放留声机算了。他是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好好讨论并结合着苏联的讲稿来讲，认为做学问不是搞行政，不能教条硬来……对于当时人们学马列的僵化态度他也提出了批评质疑，称：“现在科学研究多是把马恩列斯的话加以解释，这是汉学，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一步不好吗？”这样就又成了一大罪状，认为他怀疑经典，自高自大。而且朱先生还认为，系领导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上也有偏差，他认为他的老师杜威是承认客观存在的，把他完全说成是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尽管朱先生在美留学时，经常与自己的老师杜威先生激烈辩论……

由于朱先生的这种实事求是“桀骜不驯”的态度，没两年他就被从教育系踢到政教系去了，到1952年肃反时朱先生就成了中共的批判打压对象。整他时净是些荒诞的借口，朱先生讲逻辑学讲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分析批判了康德的一个案例，于是在批判他时，他的一个助教就说他讲康德，是唯心主义；他介绍学生看金岳霖“逻辑学”中的两页，丛书编委会名单上印有胡适的名字，于是就说他宣传反动思想。据教育家董渭川向他透露，中共当时整他有一套“战略”，即搞臭、搞垮、搞服，是要尽其所能在学生中给他制造坏影响，但朱先生是从容坦荡，批而不服，批而不臭，并称：“在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之下，决不能服……”称“……虽然我知道不服要吃亏，但我想，人活着是要有原则的，这样服了不成，应当为真理而活着。”称：“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决不能服！”肃反期间，斗了他五次，又一再说这是人民内部的事，但当朱先生问：“宪法哪里去了？”他们说：“你想死！”朱说：“我只有一个头，拿去好了！”

尽管中共当局想尽一切办法要搞臭朱先生，但因其铮铮的铁骨和精湛的学问，还是赢得了广大学生的喜爱推崇，尽管他因课业太多曾力辞大二的课程，但学生们不答应，还是坚持要他继续开课。所以到五七年整风时期，朱教授的政治热情再度高涨，并开始把建政后党出现的这些问题归纳总结了出来。他认为，就年长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很多人现在是没有主人翁感，但责任并不在他们，而是在于领导；存在决定意识，做客思想有它的客观基础的，

事实上是客人就只能有作客思想，事实上是主人就有主人翁思想。如说对知识分子要照顾，这就是把知识分子当客人，如果大家都是主人，就没有什么谁照顾谁了，而是大家照顾大家。真正当家作主才能有主人公感，不要使任何人感到党是当家的，别人是听话的，党群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要推倒墙首先要废除特权，要人人在宪法面前平等，教授要对学校大事参与决定，不是别人替他们决定，自然大家就有主人公感了。他并不否定党的领导，但他认为党的领导是应在群众之中，而不是在群众之上，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承认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这样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就会融洽，不再是主客关系了。

另一方面，年轻人都成了不敢说真话的乖孩子，这也是所处地位造成的，留助教，升级，谁说了算，每个人都很清楚，听话有好处，不听话不是调走就是扣上落后的帽子，这一扣，一个人的政治、生活全完了。而积极与落后的标准就是“听话”，要你把鹿说成马，说了就是听话，两千年前的事今天还有……旧社会拍马屁认为是可耻，新社会拍马屁被认为是靠拢党组织。连升三级，可以当上教务长，这是封建残余。害了中国的教育，害了中国的下一代……

5月31日在哲学教研组党支部座谈会的讲话，他更是把当这些年来来的腐败现象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认为学校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都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表现。他强调，三害的基础是封建性的。资本主义用了二百年的时间来消除它，我们在五四已做了一次工作，现在我们已经走到社会主义，要对历史发展补课，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就是补课，如果不补课社会主义就不能发展，谁不改谁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碾死。

朱先生还是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积极分子，多次参加陶大镛先生主办的民主办校座谈会，并发表精彩的言论。他主张成立教授会，教授应在教学科研问题上居领导地位，行政事务由校委会领导，党是总领导。认为党在人民之中，不在人民之上发号施令，新局面才可能打开。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谈到了整风的意义和困难。他认为，这次运动在党就是消除三害，就我们个人在全国来说就是争做主人。过去虽为公民，但并非为主人，因为不当家，很多地方还要感圣恩，靠别人恩惠，就只能当客人或仆人甚至奴隶，现在校领导讲话时常带一种“天下是我们的，我们当家”的口吻，他们把天下分为几等人，这就是天下为私的表现。这是只知民主为社会主义的前身，而不知为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

但他也充分看到了这个运动的困难之处，指出这个运动是有矛盾的，因为批判别人容易，批判自己很难，都会感到很痛，所以变天下为私为天下为公是很难的，现在校领导的所作所为就是处处在为自己辩护。不过他相信有党中央毛泽东的支持，认为应该有信心把运动进行到底。

朱先生的书生热诚和爱国的赤子之心的确是光可照人。他还要从揪责任的角度来警示后人，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下，把事情办坏了，如果揪责任，只能由党员来负责，甚至基层党组织来负责，上级布置可推一部分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这样毛也应负责任，因未早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却早已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对马列主义的很大发展。

他对这次整风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毛还抱有殷切的期望。称：党的威信现已比1950年时大为降低了，所以现在搞这个运动很有必要，总的来说，运动会巩固提高党的威信，当然个别党员的威信会有所降低，这样的整风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还是第一次，只有毛才提了出来。

总之，朱先生是想借整风用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为纲为社会主义民主开创一个新局面。但反右的残酷现实，彻底击碎了他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政治理想，毛泽东的光环

也在他心中彻底破灭了。所以他在反右中拒不认错，而是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而他的这种坚持使他遭受了更大的打击，直接取消了他的教授资格，让他长期在校内劳动改造，不给摘帽，不许给学生上课。老婆也与其离了婚，带着他可爱的孩子朱光凄然离去。

“文革”开始后不久，朱先生就被集中到了劳改队，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遭受抄家、批斗、劳动改造，但他并不服气，据生物系大右派徐光华讲，当时对这些“牛鬼蛇神”改造的重要内容中有一项就是责令每个人当众讲述自己的“罪行”。每到朱启贤宣讲时，他总是自豪地把自己的“罪行”说成功绩，如什么观点是他提出来的，他如何拥护毛泽东的发扬人民民主，批判官僚主义，批判腐败特权，批判走资派的，气得主管的红卫兵鼻子都歪了，赶紧呵斥。但他说的都是事实，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到了1967年春，全国形势一片混乱，毛不得已斩了自己的几个“中央文革”的爱将，将王、关、戚、林等拿下以谢天下。次年江青又无中生有地以“为二月逆流翻案”为名，揪出杨、余、傅作为平衡，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显示造反派的力量，各地造反派加强了对“黑帮”、“牛鬼蛇神”的批斗。1968年4月8日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兵团又搞了一次全校大示威，押着走资派、黑帮、教授游街示众，又是像1966年那次游斗那样，连打带骂，连推带搡。这时戴上尖尖的高帽，挂个大牌子已不算什么了，有时还有人上去扇这些人的耳光，给他们脸上泼墨水。在这些人中，朱启贤是被折磨得最惨的。

由于朱启贤的高傲倔强的性格和他的拒不认错，所以把他看作是试图翻案的典型。而且这时运动的重心已开始向“清理阶级队伍”转移了，这下极左分子们终于找到了置朱先生于死地的借口。这时朱的罪名就不再只是死不悔改的大右派了，而是变成了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了，连他原来的副手何兹全先生都被冠以国民党陈立夫的CC系特务了，作为主帅的朱启贤更是要罪加一等，成了罪大恶极的拿陈立夫钱的CC系特务头子了。

在4月8日这个号称“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游斗中，师大所有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人都被拉出来斗了，其中朱启贤的胳膊被撅得最高，头被压得最低，“喷气式”的姿势是最到位的，让他戴着高高的尖帽，压着他哒哒哒地飞跑，他则脸色通红痛苦地喘着大气。正如何兹全晚年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几个人驾着一个，压低着头，两臂往后背高高掀起，敲锣打鼓在校园内游斗，这种残酷形式已不能走路，还要押着飞走，我的左臂被折变形，肿了好久，至今不能伸直。游斗散后，路旁坐着好几位被斗的老人，面无人色，在那儿喘息。当天下午还要去劳动……”这是脾气温和的何先生的描述和感受，而性格倔强的朱先生的待遇就更可想而知了。

游斗完第二天或第三天，紧接着又在北饭厅开全校的批斗大会，批判朱启贤、何兹全和图书馆馆长王曦。从何先生的描述中可看到当时批斗的情况，把他们两臂往后撅，头被压得很低，屁股撅高，站不住，跪不下，头昏心慌，朱启贤被撅的痛得高声大叫，后来被拉到后台，大概打了一通，又拉回来，王曦则低声哭泣，这样斗了几个小时，回去时都已经半死了。这是陪斗何兹全的描述和感受。

但这还并不算完。散会时红卫兵又告诉朱启贤，明天11号还要继续批斗，看来他们确实是想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批斗折磨来逼死倔强不屈的朱启贤。士可杀不可辱，也就是在11日凌晨，耿直倔强的朱启贤先生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来表示对专制独裁政权的最后抗议，这个世道已不是讲理的地方了，所以他把他平时积攒下来的安眠药拿了出来，一口吞服了下去，愤然离开了这个红魔恶世。

本来还有一些人物可写，如师大中文系穆木天教授、李长治教授、王古鲁教授、刘盼遂

教授，还有教育系的董渭川教授，但因时间来不及了，就只能等到以后再说了。

2018-11-13

参考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编：北京师范大学右派言论集（内部资料）。1957.9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张静如：暮年忆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丛立新：“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记忆》154期

启之、赵惠中、丛立新：北师大“文革”大事记

王明泽：工一楼的记忆

黄大地，独立学者。1953年生人，1966年“文革”时是北师大后面123中初一学生，“文革”时学校停课，没事就在师大院里瞎转悠。1969年初到陕北插队，边劳动边自学文史哲，1976年病退回京。1980年到师大图书馆工作。长期从事政治、历史及文学、文艺理论的研究，2013年退休，现仍研究、笔耕不辍。

历史，岂能忘却？

——记谭厚兰的滔天罪行之一“曲阜讨孔”

蒋世信

一、“文革”“首长”面授机宜，纪念碑前讨孔誓言

1966年10月，红卫兵师与校筹委会宣布解散，“井冈山红卫兵”接管和控制了北师大的一切权力，谭厚兰春风得意、踌躇满志。10月下旬的某一天，谭厚兰在红旗杂志社受到了戚本禹、林杰的接见。林杰问谭厚兰：“最近师大运动的形势如何呀？遇到什么困难了吗？”谭回答：“形势大好，就是接待外地红卫兵的人手不够，有些忙不过来。”“这没问题，发动全校师生搞接待嘛。”接着林杰话入主题：“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1]戚本禹说：“讨孔任务是无尚光荣的，尤其师大讨孔更有时代意义，这是要功彪史册的；你看康老（注：康生的代称）还特意让我给你带来一张图，是他想了三天三夜，画出的孔府孔庙孔林的印象图。他明确交代，‘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2]”林杰又谆谆告诫：“你们应当率先在‘文革大革命’中起来造这个反。”[3]讨孔的任务交给北师大，让谭厚兰受宠若惊，她激动地说：“我

们去，我们一定去！（同[1]）但我有个要求，为了更好的鼓舞士气，请林杰同志给我们做一次战前动员。”林爽快地说：“这没问题，时间由你确定。”

11月2日，红旗杂志的笔杆子林杰来到北师大的新二教室，面对近二百名的“井冈山红卫兵”骨干做了“曲阜讨孔”的动员报告，大意有如下几点：

（1）“五四”运动第一次喊出“砸烂孔家店”，但不彻底。今天我们要亲临战场，彻底砸烂孔家店。

（2）儒家的要害是“中庸”，就是调和就是投降，孔孟之道是束缚中国人民的精神枷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让我们革命小将将“孔孟之道”砸它个稀巴烂。

（3）你们去山东讨孔，可能会遇到阻力。你们要坚信：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中央文革”支持你们，毛主席支持你们。

（4）到了曲阜，不要孤军作战，要注意发动和联合当地的红卫兵造反派，谁敢阻挡讨孔就造他的反。

（5）国务院是最大的保皇派，什么“重点文物保护”的石碑都可砸掉，等等。

“战前动员”之后，谭厚兰们制订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等文稿，同时派出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11月7日在戚本禹、林杰的直接支持下，谭厚兰（总指挥）、董连猛（副总指挥）、王瑞龙（作战部副部长）等人率领着北师大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230余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合、亮相并宣誓：

万恶的孔家店，统治和奴役了中国人民两千多年。它吸尽了无数劳动人民的鲜血，吞食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孔家店是一座吃人的“阎王殿”！

孔老二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制造一套反动的“礼教”理论，要人们服服帖帖，甘受奴役。

孔老二大讲“中庸之道”，企图掩人耳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千方百计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他是折中主义的头号鼻祖，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最大辩护士！

孔老二似乎以教育为“专长”，但他主张“学而优则仕”“焉用稼”，使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剥削阶级培养忠实奴才和走狗。其实孔老二自己正是一切剥削阶级丧家的乏走狗！

孔老二的理论是反动的理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儒家的学说是反动的学说，是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孔家店就是反动势力的老巢！

阳光灿烂，红旗飘飘，人民英雄纪念碑高高耸立在广场中央，即将走向征途的战士聚集在这里向党中央宣誓、向毛主席宣誓：我们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高举革命的大旗、造反的大旗，向反动势力的老巢孔家店进军，彻底造孔家店的反；我们坚决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孔家店”彻底捣毁、砸它个稀巴烂，不获全胜绝不收兵！[4]

二、扎根串联建立联络站 大造舆论炮对孔家店

11月9日，谭厚兰、董连猛、王瑞龙等率领着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230余名乘火车到达曲阜。因事先电话联系，车站上早有曲阜师范学院、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大、中学校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头头和代表们，列队站台高呼口号热烈欢迎。在曲阜师范学院，谭厚兰马上召开各校红卫兵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密谋和策划讨孔行动日程。12日下午宣告成立“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

称“讨孔联络站”），谭成为联络站的当然第一领导人，并且为造舆论还创办出版了《讨孔战报》。（注：从1966年11月10日创刊，到后来有曲阜师院师生参加采写、编辑、印刷、发行等具体工作，直到1967年8月停刊，共出版了23期，《讨孔战报》为疯狂讨孔、大肆毁坏文物、炮轰国务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宣传和争取群众，连续几天，谭厚兰指派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文艺宣传队，在城区、在农村的街头，到处演唱“讨孔”战歌：

孔家店阎王殿，
血债累累罪恶滔天。
文化革命战鼓响，
孔家店的末日在今天！
捣毁孔家店、砸烂孔家店！

孔老二大坏蛋，
反动透顶阴魂不散。
毛泽东思想红旗飘，
孔老二的末日在眼前！
打倒孔老二，火烧孔老二！
向“四旧”势力齐开战，齐开战！[5]

（曲阜“讨孔”游行队伍）

在闹市区上演丑化孔子的活报剧，散发五颜六色的印有讨孔檄文的传单和漫画，墙上到处涂着“打倒孔老二”“火烧孔老二”“砸烂孔家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揭发孔家店的罪行，举办孔氏罪恶展。谭厚兰们不失时机地到处制造“讨孔”舆论，为下一步捣毁孔府孔庙孔林不遗余力地做着精神与物质上的准备。

三、砸碑掘坟伤天害理 捣毁文物罪恶滔天

11月15日上午，在孔府门前聚集着北师大和曲阜大中学校的部分红卫兵，以及来曲阜串联的全国各地的一些红卫兵，还有当地的一些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民众两千多人。在这里，“讨孔联络站”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谭厚兰和其他红卫兵头头分别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告全国革命人民书》等文告[6]，公然污蔑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在曲阜“三孔”等处所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是保护孔府、保护孔庙、保护“孔家店”、保护“四旧”，一句话就是“一切牛鬼蛇神的保护伞”。

谭厚兰宣读《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

他们郑重宣告，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不管遇到多大阻力，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会后，董连猛、王瑞龙等头头们带着红卫兵造反派挥动大铁锤，将国务院立在孔府大门西侧的石碑

砸毁。砸碑，对谭厚兰们来说，意味着搬掉“讨孔”的绊脚石。随后，他们一鼓作气又将国务院立在孔庙、孔林和鲁国故城等处的标有“文物保护”的石碑也统统砸毁，并且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等处拉下匾额、捣毁塑像。[7]

拉倒和砸毁石碑

11月20日，谭厚兰们又发表了洋洋三千字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中等学校、文教宣传机关、红卫兵战士、工农兵同志、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切革命同志们的《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十点建议》：

孔家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基础；

孔孟之道是中国人民的大敌；

彻底打倒“孔家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痛打落水狗；

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正确革命路线；

打一场人民战争；

深入工农兵，进行革命大串联；

举行彻底打倒“孔家店”，大破四旧的游行示威大会；

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

建立全国讨孔联络委员会。[8]

11月28、29日，在曲阜师院的操场上，“讨孔联络站”继续召开了规模更大的“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曲阜师院及其附中、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大、中学校红卫兵之外，还有曲阜各县各人民公社调集来的大批农民和从工厂抽调的工人共约10万（同[7]）。

首先谭厚兰讲话，诬蔑儒家思想反动，“孔家店”罪不容赦，谴责曲阜县委和山东省委的某些领导人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尊孔复古，保护“孔家店”，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应该公开检讨，向人民请罪，向毛主席请罪。接着讨孔指挥部副总指挥董连猛再次宣读《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十点建议》，然后董连猛宣布：把牛鬼蛇神押上卡车，游行开始！等候在操场大门的红卫兵们，早就把孔庙大成殿的孔子塑像的头放到解放牌大卡车车厢正前面的司机驾驶室的上，高大的头像上带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上面用毛笔写着“头号大坏蛋孔老二”，“孔老二”三个字还被红颜色重重地打了个大叉子。当年，孔子出行周游列国，坐的是牛拉的车。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步入冥界2445年之后，其泥巴塑像竟能乘着国产的大汽车，四处去“风光”，而且，这次陪着他的头像游街串巷的，也不再是颜回、子贡、子路等众弟子，而是20世纪研究其思想的专家学者。他们是余修（山东省副省长）、周予同（复旦大学教授）、严北溟（复旦大学教授）、高赞非（曲阜师范学院首任院长）等。他们都是1962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的出席者。现在，他们被红卫兵揪来，脖子上挂着姓名上画有红“×”的大牌子，作为孔子的“孝子贤孙”，同车陪着孔子头像游街示众。

汽车驶出曲阜师院南大门，折而向东，在曲阜城内的古老街道上缓缓行进，开道的宣传

车高音喇叭不断反复播放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用喷气式状押着“牛鬼蛇神”的车上，红卫兵用手提式喇叭一一介绍陪斗的“反动学术权威”“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姓名、身份与反动言行；车后还有大批的红卫兵列队随进，他们挥动着红宝书，也是不断地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孔老二、油炸孔老二”“彻底砸烂孔家店”之类的口号。街道两旁，站立着许多怀有不同心态的观看者，多是当地百姓。

砸毁“大成殿”匾额

游行完毕，向孔林进军，汽车开到孔林墙外的西南角，在小桥下面的小河沟里已经燃起熊熊大火，正焚烧着从孔庙、孔府等处拉来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斯义在兹”“生民未有”等各种历代的巨型木制匾额，同时烧掉的还有从孔府搜出来的价值连城的字画、古典书籍如装帧考究古香古色的明版《礼记》、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保存千百年的文物。[9]大火熊熊，红卫兵高呼着口号，游行卡车上的孔子头像也被掀到火海里一起焚烧。此时，从北京赶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跑前跑后记录着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的“壮举”。

在小河沟焚烧牌匾

其实，“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早在11号就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10]，谭厚兰们的所为是很有“底气”的。现在时机成熟了，他们一鼓作气、立即组织师大井冈山红卫兵向孔林的孔坟进军，扒坟掘墓戮尸扬灰，干着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坏事。墓前的那通高大的墓碑涂满了口号，红卫兵用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等待着号令。高音喇叭响了：“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只见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为了更快掘开墓穴，造反派还动用了雷管与炸药。

他们挖了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和近两代孔祥珂、孔令贻的坟墓。因年代久远，孔子祖孙三代的墓冢，虽下挖深深的坑穴，既未见骸骨，也没出土任何文物之类的东西。倒是在后两代衍圣公墓穴和棺槨中，挖出黄金630克、碎银250克、银元宝1000克、玛瑙玉器等84件[11]。孔祥珂、孔令贻是孔子的第75、76代嫡孙，也是在孔林掩埋的最后两位‘衍圣公’（这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自宋代起就世袭爵位）。几个红卫兵从墓穴里扒出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还保存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像撒了气的皮球瘪下去，在冬日的空气中迅速氧化变黑。师大的红卫兵们往树上系了绳子，将尸体一个个吊起来，然后对孔祥珂、孔令贻等进行曝尸批判。挖出的几具尸体挂在树上被裸露着曝晒了五六天，每天围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因光着身子太不雅观，后来被人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烧掉了。

孔令贻的儿子第77代衍圣公孔德成，1949年随蒋介石到了台湾。孔德成曾任台湾考试院院长，于2008年10月离世，享年88岁。改革开放后，尽管中共和其他党派一再邀请他来曲阜，都遭到拒绝。他那冷却了的心并没被“捂热”，寒透心的孔德成至死也未踏回故土，甚至连在北京任“终身制全国政协委员”的姐姐孔德懋也不愿意相见。

四、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恶有恶报遗臭万年

谭厚兰们的“讨孔”丑剧终于落下帷幕，孔府孔庙孔林却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流传了数千年的宝贵文物遭到空前浩劫，此次大破坏名震中外令人瞠目；谭厚兰们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国家和民族的损失是巨大而难以弥补的，令人痛心。

1966年11月9日—12月7日，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在山东曲阜大造“孔家店”的反，29天中，他们毁坏文物6618件，烧毁古书古籍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甚至绝版书籍1700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1000余座，捣毁孔府孔庙孔坟。据后来的曲阜市统计：在占地3000亩的孔林里10万余座坟墓被挖了2000余座；42000多株树木，被伐了万余株；4000多通墓碑，被拉倒砸毁近千块。实际上，扒坟不限于孔林。曲阜境内的孟母林（亚圣孟子的母亲仉氏与孟氏族人墓地）、梁公林（孔子父亲叔梁纥与孔母颜徵在的墓地）、少昊陵（黄帝之子、三皇五帝之一少昊的墓地）、东西颜林都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曲阜城东的东颜林墓区是孔子弟子复圣颜回及其家族的一处大型墓葬区，林中有柏、松等古树1770余株，碑刻300余通，“文革”期间，平坟毁林使整个墓区荡然无存[12]。

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的掘墓辱尸运动在全国发酵，刮起一场史无前例丧心病狂的“掘坟风暴”，历代忠良、名臣、学者、文人、志士如霍去病、诸葛亮、王羲之、魏征、包拯、岳飞、海瑞、于成龙、于谦、张居正、蒲松龄、史可法、袁崇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汝昌、康有为、秋瑾、武训、黎元洪、章太炎、赵登禹，等等等等，他们的坟墓无一幸免，均被挖掘荡平。可以说，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名的人，几乎都在1966年被掘了坟。

1980年5月，曾任山东副省长的李予昂去曲阜，见到文物古迹惨遭破坏的景象，愤慨万分遂吟诗一首，并刻在残碑上：

万恶“四人帮”，十年逞逆狂。
少昊像颇碎，鲁故城拆光。
三孔大破毁，周庙受灾殃。
贼罪臭万年，历史诛巨奸。
首凶陈伯达，作伥谭厚兰。
留此残碑在，铁证代代传。

残碑刻诗、铁证相传

1978年李先念副主席视察曲阜时说，“对破坏文物的首要分子要严惩”，“谭厚兰破坏‘三孔’文物该杀”。

1968年10月，谭厚兰作为北师大政教系1966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地处怀来沙城）劳动；1970年6月，谭厚兰被勒令回到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里，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发、交待，证实“文革”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1981年谭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允许回乡治病。1982年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2年11月谭厚兰病逝于老家湘潭。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恶有恶报，谭厚兰们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参考资料：

- [1] 刘亚伟查阅谭厚兰的交代材料的记述
- [2] 《台前与幕后》，赵惠中
- [3] 刘亚伟查阅谭厚兰的交代材料的记述
- [4] 《讨孔战报》第一期：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
- [5] 《讨孔战报》第二期：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
- [6] 《谭厚兰曲阜“讨孔”纪实》，张顺清
- [7] 《讨孔战报》第三期：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
- [8] 《孔府大劫难》，刘亚伟（亚子）、王良（良子），天地图书
- [9] 《孔子墓蒙难记》，刘炎迅
- [10] 《讨孔战报》第三期：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
- [11] 搜狐网《红卫兵女头领“文革”中疯狂砸孔庙》
- [12] 《孔府大劫难》，亚子、良子，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文中图片下载于“百度图片”。

蒋世信，1946年出生，1969年毕业于北师大数学系（5年制）。高级教师，曾任北师大燕化附中教学副校长。长期从事高中数学教学与研究，从1982年起，先后在各类中学数学教学杂志发表文章60余篇（其中《数学通报》10篇），多篇获奖；参编或主编高中数学教学参考资料16册；出版专著《高中数学教学与解题艺术》。2001年聘为《中国基础教育》（原《北京师范大学附校学报》）特约编辑，2002年聘为西部教育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2004年聘为北师大附校第一届“海威杯”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研讨会数学评委及北师大海威教育集团高中数学专家组成员；2000年被北师大教育学院聘为北京教委初中建设工程专家督导。

北师大的“12月黑风”与“修建科劳改队”

赵惠中

所谓“12月黑风”，指的是1966年12月发生在北京以给林彪提意见为主要内容的事件。但从现在看到的资料中显示，此事件可以1966年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伊林（刘握忠）、淦西（张立才）的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附录10）作为起点，到1966年12月中下旬这批年仅二十岁左右的热血青年全体被抓进牢房为终点，时间跨11月与12月两个月份，长度达一个多月之久。但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仍沿用原来的称呼“12月黑风”。从内容

来看，事件所及不仅限于林彪一个人，还包括了“中央文革”几名大人物，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等新思潮，所谓“黑风”其实不黑。

一、背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代表最高司令部向全国各界发出的动员令。

6月1日晚8点的例行全国新闻联播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文革”发动者后来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领衔署名的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当日，《人民日报》还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些接二连三的举动，吹响了将“文革”推向全国的进军号。几天之内，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停课搞“文革”，在北京几乎所有的高校党委都被打成黑帮，无一幸免。昔日的校领导都成了走资派，教授都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较优秀的老师有的也被打倒，大多数是诚惶诚恐，普通教师也是人人自危。开批斗会搞“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罚跪认罪等悉数尽有。此时的刘少奇立即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试图让工作组控制局面，将运动纳入有序的轨道。但工作组的做法明显与最高当局掌控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宣传口径不一致。如北师大工作组提出“层层剥笋”“抓游鱼”的口号等，模糊了运动的重点，敏感的学生就贴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把这部分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镇压。刘少奇搞的这一套实际上是1957年反右的延伸，这一招立即被毛泽东揪住不放，说刘少奇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群众运动。由此导致了刘少奇先受贬后倒台终丧命。1966年8月5日，我校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8月17日，政教系石磐教授在主楼七楼跳楼自杀身亡。社会上大搞破“四旧”，打、砸、抢、抄家成风，“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倍受打压，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取代了刘少奇，从原来的第六位跃升到了第二位，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从此以后，林彪成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全中国各种场合都必须在“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再加上一句：“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组织机构方面，以“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与部分政府机构，彻底打乱了原来正常运转的权力机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接受了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献的红卫兵袖章，还对宋彬彬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发了全国第一轮武斗和抄家狂潮，史称“红八月”。这场有组织的暴行，得到了高层及公安部门的支持和纵容，很多地方的派出所向红卫兵提供了管段内“牛鬼蛇神”的名单和地址。谢富治在“红八月”中的一次公安干部会议上，对武斗作了诠释：“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据不完全统计，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我校中文系刘盼遂教授及其夫人梁秋色等多人就是在此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这股狂潮从北京迅速蔓延至全国。

9月18日，林彪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

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不久，在接见到首都串联的全国军事院校学员时，叶帅在讲话中还说：经医生检测和科学论证，表明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以上，敬爱的林副统帅也可以活到120岁以上，他们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社会。

这一讲话内容被红卫兵们以“北京来电”的方式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以林彪讲话为标志，在众多党政头面人物的实际行动带领下，国人将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推到了狂热的极点。

在众人狂热的浪潮中，还是有不少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们并不盲从，他们在思索：这种现状正常吗？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打破这“一边倒”狂热的是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两位高三学生刘握忠（伊林）和张立才（涤西）。他们于1966年11月15日上午七点左右，在清华大学贴出了一份《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

在这大字报中，伊林、涤西对上述林彪讲话中的四条进行批驳。对于第四条“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原来有一段进行批驳的评论文字，后来被涤西删掉了。他认为这条太尖锐，因为直接触犯到毛泽东了，而且又不好驳。那文章里面已经涉及毛的权威了，包括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贡献等，都给推翻了，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再往下去论毛泽东个人的事，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去碰。这是涤西最担心的。但是，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留下题目没内容，这叫立而不论。就留给他老人家自己去猜，去论吧。

这封公开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就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还扬言“要批倒、批臭”，等。后来又贴到北京大学。大字报被撕掉后，涤西感到事态严重了。他就一不做二不休，组织人印传单。并且还写了《公开信》后边的那段文字，还加了两个后缀。现在一般看到的是传单上的文章，这最后部分的文字是原来的大字报上没有的。后来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也是这张传单。一张蜡纸一般也就能印八百份到一千份，他亲自推油碾子，不让别人动，推得非常仔细、小心，生怕这蜡纸破了。他那派的红卫兵是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团队。传单用的是十六开的纸，共四页，其他人负责叠页子，装订。涤西拼命地印，印了一千二百份，直到那张蜡纸已经不能再印了为止。

传单印好后，大家轰地跑出去，分别到各大专院校、各军队和机关大院的门口，一路走一路贴，满北京散发传单。传单的影响实际上比大字报大多了，贴出去后，立即引起社会震动。“中央文革”、江青要去看的是传单。他们在大字报上落款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也直接签上了刘握忠、张立才的大名。而传单的落款只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因此知道他们真名的人并不多。

11月30日，北京林学院李洪山又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贴出一条“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

12月1日上午9时，在北京串联的福建师范学院、浙江绍兴一中、黑龙江双城县杏山中学、黑龙江省佳木斯手工（业）中等学校的学生和林院林业系捍批队的师生、林院部分工人与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进行了一次辩论会。

学生们问李洪山为什么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这一口号。

李洪山说他的理由有三：

根据十六条中的第九条，“中央文革小组”只能是起桥梁作用的。不管是哪一级的“文革”小组都是经过群众全面选举的，像巴黎公社那样。十六条中，并没有讲“中央文革小组”可以不经过群众选举。“中央文革小组”没经选举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因此，必须踢开。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2.“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面，不调查，都是蹲在北京，不到外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夸夸其谈，乱发议论。副统帅林彪同志讲，要好好听听最高统帅的话。中国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任何事物都要怀疑，怀疑一切。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的讲话都要用最高指示去分析。什么东西都要怀疑。现在北大聂元梓搞得四分五裂，有“新北大”红卫兵、北大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队，等等。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是谁我就不说了。总之，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智谋。

3.“中央文革”制造分裂。10月6日三司会议上，江青说：“要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这是分裂的开始。陈伯达讲话要冲垮修正主义红卫兵，传单满天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哪有那么多的修正主义红卫兵？“现在是大民主，所以我才写这幅革命的标语。有什么不合法的？！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说不准拉横幅大标语，我们有自由言论的权力。要在前三年，我写了就不在这里呆了。我写的都是革命的大字报、革命的标语。即使是右派，也要放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呢。”

伊林、涤西的大字报与李洪山的巨幅标语虽然遭到了迎头痛击，但也获得了许多学校少部分同学的支持，给林彪与“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大字报纷纷出现，北师大便是其中之一。

二、北师大大的“12月黑风”

12月9日，中一（2）班的敦进田（林锋）、张传亭（向东彪）贴了一份题目是《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

中文系学生彭加瑾、王永敬在12月10日与12月12日，分别贴出了《我们也贴“中央文革小组”一张大字报》和《把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推向新阶段》两份大字报。

12月11日，物三（3）的刘中柱、杨以鸿贴了《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物三（4）的李文博立即在此大字报上用钢笔签上了表示支持的评语。

12月13日，物三（3）的刘琢、李鸿杰、金宝英贴出了《“中央文革”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

12月15日，数二（1）班李世取（黑牛）张贴了《必须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大字报。后来他又接着贴了《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公开信——几点意见和建议》和《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的大字报。

因为不知道彭加瑾、王永敬、刘琢、李鸿杰、金宝英现在何处，也不清楚后来为什么对他们几个人没有被重点打压，所以我写此文时没与他们五人联系。下面重点就谈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张传亭、李文博、李世取六人。

刘中柱和杨以鸿一开始就怀疑“文化大革命”。他们都不迷信权威，都希望生活在民主和科学的氛围中。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那时他们班正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劳动实习。当读到这篇文章时，他们顿生疑窦，这样的文章

是科学的吗？恰好他们班孙光启同学的舅舅李大可是中国戏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孙光启和他们一样怀疑这篇文章。由孙光启联系，他们三人拜访了李大可先生。可能由于戏剧研究院已经决定了方针政策，李大可先生表示理解和支持姚文元文章。刘中柱和杨以鸿与李先生辩论了近三个小时，互相说服不了对方。1966年2月10日，中文系四年级学生金宏达（时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的文章。

1966年12月，为躲开学校的嘈杂，刘中柱、杨以鸿、孙光启和李观韶四人到北京教学仪器厂，边劳动边休息。当时刘中柱和杨以鸿对“文化大革命”已持否定态度，但没有表达的机会。伊林和涤西的《公开信》给了他们机会。当时杨以鸿的观点认为，毛主席作为绝对权威已是不可接受的，现在又加一个不能动的权威——林副统帅，更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接受毛主席作为绝对权威是迫不得已的，决不能再来一个绝对权威。刘中柱的看法较为实际。中国一定要有民主，民主就有不同意见，不同的意见不等于反对。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和科学，将不可能得到发展。“文化大革命”将不同意见视作反对，进而视作反革命，这是不可接受的。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较量一下。本质上他们的大字报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目标是事件——“文化大革命”，至于大字报的对象具体是哪个人，并不重要。那时候对林彪个人，并无特别恶感，只不过认为，他的一些讲话，不像话，不像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领袖而已。

刘中柱、杨以鸿、孙光启和李观韶四人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工人宿舍讨论。他们在大字报中强调：无论是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事物总是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也是要不断发展的。把毛泽东思想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岂不是要窒息毛泽东思想，使其不再有所发展？大字报由刘中柱起草、杨以鸿誊写、李观韶检查。当时已考虑到风险，所以只有刘中柱和杨以鸿署名。李观韶不署名，万一出事后李观韶留在外面可作些照应的工作。大字报底稿由李观韶保存。此大字报是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写好后，由刘中柱、杨以鸿、李观韶三人一起带回学校贴出的，贴了后又返回工厂。

12月17日凌晨三时，谭厚兰就派手下人把他们两人从工厂揪回学校的小红楼看管起来，同时被看管的还有张传亭和敦进田。当晚就在北饭厅召开了批斗刘中柱、杨以鸿、张传亭、敦进田四人的全校大会。12月18日，外语系的董连猛又把他们四人在外语系批斗了一次，随后就把他们四人押送专政机构了。李观韶后来参加了井冈山造反兵团。

敦进田、张传亭写的公开信是一份油印小字报，贴在大字报栏里。内容可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以较大的篇幅为林彪歌功颂德，很怕落下反林罪名；后半部分以较小篇幅说明：即便伊林、涤西的观点有错，也不应该把这两位农大附中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对他们的大字报暂不评论，仅从他们的笔名来看，“林锋”就是从林杰、关锋的姓名中各取一个字组成，“向东彪”即向着毛泽东与林彪，其意义不言自明。但是，马上就有人在他们的笔名上大做文章，说“林锋”“向东彪”的含意就是像树（林）的（锋）芒指（向）毛泽（东）和林（彪），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李世取，重庆市人，平民“红五类”家庭出身，父亲是工人。当时为数学系二（1）班学生，平时用功于专业学习，时间抓得非常紧，业余喜好看些小说，间或也看点历史、政论之类的闲书。

1966年10月底，他与其班上十多名同学响应“中央文革”等关于学生串联可用“步行”方式，以更好地接触工农大众的号召，组织“长征队”，计划由北京步行到延安，途经“平型关”“大寨”，沿途接受革命传统教育。11月中旬，“长征队”抵达太原小住之际，正逢中央下达要求学生们返校“复课闹革命”的紧急通知，他与陈木法就迫不及待地脱离大队，

乘拥挤不堪的火车连夜返回了北京，其他同学则不顾中央的通知，照原定计划继续步行串联，最终抵达革命圣地延安，1967年元旦后方返回北京。

返回北京后，他与陈木法往西单、王府井等旧书店买回了不少数学专业书籍，为“复课”做了些扎实的准备。但当时像他们那样响应中央号召及时返校的学生并不多，整个校园还是冷冷清清的，课肯定一时半会也复不起来。于是，他俩自我规定：半天自学专业知识，半天关心“文化大革命”。

从李世取后来的“交待”材料中看到：回校的半个多月，他回顾了“文革”开展近半年来的历程及“长征”途中的所见所闻，感到“文革”存在许多问题，如“打击面”过大，各地“乱批乱斗”现象严重，“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不能落实，被批判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人格遭受严重践踏，更为严重的是工农业生产全面受损，对刚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而1964年、1965年才真正复苏、好转的国民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且因在河北易县（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击日寇之地）和山西沿途（包括平型关地区）都见到老百姓的生活仍很困苦（连基本口粮都非常少），教育都还非常落后，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是连基础都没有的；觉得国家本应该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经济、教育，更担忧照当时“文革”的趋势发展，搞不好很可能让全国百姓再经历一次“困难时期”。

于是，回北京“半天关心文革”的十多天里，经过反复考虑，他首先给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顾问”“康（生）老”写了一封信（通过邮局寄出），信的署名是真名。据说他当时并不想出风头，只是希望“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们多了解一些社会实际情况，以做出正确的决策。信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步行串联中沿途的观感，表述了自己的忧虑，就关于如何“更健康”地开展“文革”提出了自己个人的“几点建议”，核心内容是希望在“文革”中“中央文革”能够引导群众“历史地、全面地评价干部”，要“加强领导”，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落实”“对乱斗人、乱打人的”无政府、无法纪现象一定要制止，对工农业生产一定不能放松，而学校、学生长期停课带来的长远损失也许是无法弥补的，也应重视。

12月初，北师大已有学生张贴出给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提意见和建议的大字报后，他首先张贴了一张谈自己对“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认识的大字报——《必须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署名“黑牛”。大字报强调：既然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那么，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对国家领导人的善意意见和提醒都是合法的，都是值得肯定的，因而不能打击、迫害给林副统帅提意见的人。依据大字报内容来看，这些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建议的人更是完全出自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对他们更不能打击、迫害。

接着，黑牛将其给“康老”所写信的内容转抄成两张大字报公开张贴，题目是《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公开信——几点意见和建议》，署名也是“黑牛”。

黑牛的大字报张贴出来后，一直没有受到批判，反倒有若干人在大字报的空白处写下支持的意见。

12月17日清晨，林锋、向东彪和杨以鸿、刘中柱被谭厚兰抓起来的消息在北师大校园内传开，在他们张贴的大字报旁新张贴出一些标语和大字报，其中多为口号“打倒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林锋、向东彪、杨以鸿、刘中柱！”“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统帅罪该万死！”“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同时还新贴有大字报和标语，称“坚决支持、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正告：“反对‘中央文革’者绝无好下场！”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校园内的空气一时格外凝重。

这一天，原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张贴过大字报的学生中有立即表态转变立场的，也有“反戈一击”，立即揭发杨以鸿还有其他“反动言论”，等等。而唯独不见黑牛有新动静！在同学们都以为黑牛会就此收手并立即做出“检查”的时候，他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

18日下午，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沉默寡言了一天多的黑牛反倒张贴出一张题为《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的大字报。大字报首先为林锋、向东彪和杨以鸿、刘中柱等辩白，（大意）称这些同学都是“文革”初期的热心参与者（其中的林锋、向东彪曾为“红卫兵”），他们大字报的内容并无对林副统帅的恶意攻击，而对林副统帅讲话中的“顶峰论”“天才论”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他们公开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表现的是勇于探索真理的赤子之心，不能说有罪。又说，“文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对已经开展的“文革”做总结，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是真正关心“文革”的人应尽的责任，等等。记得该大字报的结尾大意是：我自知张贴出这张大字报的后果，我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真理和真相也在召唤我……别了，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别了，这段时间与我在一起踢球的小朋友们！别了，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

大字报贴出不久即引来围观！

据说，黑牛在张贴完大字报后即往理发店先理发，再往澡堂洗澡，吃了晚饭后回到宿舍收拾好换洗的衣物和《毛选》等书籍，不到九点即安然入睡。

后来听说，黑牛吃过晚饭回到宿舍时，一位素不相识的教育系同学曾急匆匆地敲开他的房门，劝告他说：黑牛，我佩服你的勇气，但是我希望你马上去将自己的大字报撤下来，并立即做出检讨。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你的努力是没有用的……但黑牛没有听取这位同学的劝告。

黑牛被拘捕那天的凌晨，在同班同学的带领下，学校治保会的工作人员来到黑牛的宿舍，门开灯亮，黑牛醒来，睁开双眼看清来人后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是来带我走的吧？”得到肯定答复后，黑牛从容穿好衣服，抱起放在床头的衣物、背上书包，在治保会人员和同学的“护送”下来到治保会，那里有公安局的同志正等着他……

据说，他在书写完最后一张大字报后还给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写了信，信中感谢了父母的养育之恩，请父母原谅他的不孝，并请哥哥代自己尽孝。

李世取当时的表现有些让人觉得不可理喻！

后来批判他时，多次问他：其“黑牛”的化名是不是“黑帮、牛鬼蛇神”的缩写，你是不是要代表“黑帮牛鬼蛇神”出来说话？他的回答是：自己的乳名就是黑牛，且他长在南方的农村，从小知道南方的水牛（皮毛都是黑色的——黑牛）是很能吃苦耐劳而又是有大脾气的，这点很像自己，因而写大字报都用黑牛为笔名。

林锋、向东彪、刘中柱、杨以鸿四人在写大字报之前都将自己的观点做过宣传，与人讨论过，因而他们“东窗事发”后连带一些同学也要做“深刻检查”，搞得十分紧张。唯有这位黑牛独往独来，写出那几张大字报之前，不与同班的任何一位在校同学商量、交流，特别回避与陈木法接触，后来“交代”说都是自己一个人躲在阴冷无人的大教室里写的，所以也没有哪一位同学因他的大字报受牵连。特别该强调的是，陈木法没有受到黑牛的任何牵连，后来思想上远离“文革”运动，坚持偷偷自学，且借用黑牛买回的旧书，提前自学了研究生的有关基础课程，1978年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并提前毕业，后被送美国深造，学成归国报效祖国，2000年后成为我国的科学院院士。

李文博是物理系三（4）班的学生，虽然他在“12月黑风”中没有直接贴林彪与“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只是在贴林彪的大字报上留言表示支持，但他是被抓进拘留所六人中的重

犯。他是12月19日被押送进拘留所的，因其罪行“重”，关押的“号子”都与另五人不同。李文博的罪“重”在何处呢？早在1966年10月17日李文博贴出了《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大字报（详见附录5），此大字报当时在北师大反响不是最大，只是说他鼓吹无政府主义。但因他在大字报中鼓吹一种大民主、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在校外影响极大。伊林、涤西他们把他与北京大学的乔兼武（在1966年8月26日写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大字报）并列称为“新思潮”的“祖师爷”，说他们起草那封《公开信》，关键的是受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博和北京大学的乔兼武的影响。由此可见，北师大还是此“黑风”的源头之一。

对他们六位当事人，面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对北师大富有正义感的群众来说，也是一片白色恐怖。王福亮，1966年底是学校播音员，是敦进田、张传亭的同班同学。他播音时，心里想着敦进田、张传亭怎么会成反革命了？一走神，本是要喊“打倒林彪、向东彪！”的，结果却喊成了“打倒林彪！”幸好他出身好，才躲过一劫。物二（3）的杨怀志看到了伊林、涤西和刘中柱、杨以鸿的大字报，就在大字报边上参与了对这些大字报的议论，与不少在校同学一样，也认为“林可批评”。后来就有人揭发他炮打林彪。好在没写大字报，最后不了了之。

综合观察“12月黑风”，可以看到：

1. 从伊林、涤西大字报到北师大刘中柱等人的大字报，语言极其温和，内容都是摆事实、讲道理，向林彪和“中央文革”提意见、谈建议。体现的是忧国忧民，是赤子之心。但是却因言获罪，被打成“反革命”，饱尝了牢狱之灾。宪法上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等等。法律被粗暴践踏。公理何在？

2. 这些大字报在当时已经涉及反对“个人崇拜”，要民主、要言论自由，提出了民众可以罢免官吏，等等，这些问题在50年后的今天仍是禁区，可见他们的政治眼光远大。

3. 他们贴大字报的时间是1966年年底，对像是林彪、“中央文革”。风险之大人人皆知。但他们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令人敬佩！

4. 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是有担当，即使身陷囹圄仍然尽可能保护他人，所以像李观韶、孙光启、陈木法等都没受牵连，真是难能可贵。

三、拘留所

约在1966年12月中旬，江青接见首都红卫兵时说：现在有一股黑风（即十二月黑风），有一小撮反动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林副统帅。指出要揪出这股黑风的黑后台。12月18日，谭厚兰的手下先将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张传亭四人押送到公安部（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东），旋即再押送到半步桥（陶然亭西自新路）的北京市看守所。很快，李文博与李世取也被抓进北京市看守所。12月22日是李世取的生日，他的21周岁的生日是在拘留所内度过的。

据刘中柱回忆：

12月18日夜，我们四个人被送到北京市看守所。当时我正发烧，晕乎乎地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大概分别登记了姓名，将兜里的所有东西拿出来，由警察登记保管。然后给一床被子，两个盆子一双筷子，送到一间拘留室。第一夜室内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太累了，我裹着被子就睡着了。也不知道杨以鸿他们被送到什么地方。第二天早上，看守敲门叫醒，各室依次洗漱，从门上小窗，才看到杨以鸿、敦进田和张传亭关在同一

巷子不同室。敦进田在邻室，杨以鸿和张传亭在对面。早饭后，两个警察依次进各室，向我们宣布，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谢富治的命令，拘留我们，并要我们在拘留证上签字。我拒绝签字。大概这是他们意料中的态度，二话没说，他们收起拘留证转身就离开拘留室，并“咔嚓”锁上门。拘留的生活正式开始了。

拘留室的号子，面积约为3×3平方米。门向走廊。门上一窗户，一尺见方，从外面挂一白布。看守掀开白布，可观测室内的被拘留人员。门对面墙下由约一寸厚的木板拼接，从左墙到右墙成一整张床，类似于日本人喜欢的榻榻米，离地约20厘米。被拘留人员坐、睡均在床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犯人，床板已被磨得光可鉴人。床上一小炕桌，供犯人写材料。门对面墙上有一宽一米，高60厘米的窗户，窗子朝外开，窗户上有铁棍的栅栏。我站在床上可以看到外面的一部分地方。屋顶中央有一盏电灯，灯泡为铁丝网包围，防止犯人卸下来。大概拘留所也是头一回遇到关进来如此多的学生，也搞不明白按什么规则来管理这些学生，只好采用“大概差不多”的办法。按拘留所规矩，被拘留人员在室内平时应端坐在床上反省。我们则不管那一套，想躺就躺，想坐就坐，看守们也不管。我们常常掀开门上窗户的布帘子，伸头到走廊，和其他室的难友聊天。多的时候，每个号子的门上伸出一个脑袋，整个走廊上像开会一样。有时候看守觉得太过分，吆喝一声，大家缩回头去。不一会，头又陆续伸了出来。一直到1967年一月风暴，政法公社夺了权，管理才逐渐紧起来。拘留所将布帘撤去，换成缩拉门。门外面有一小拉手，看守可以从外面拉开小门以观察室内。但室内人员仍然从里面拨开门，将头伸出去。管理人员最后只好在门上钉上钉子，让缩拉门只能打开三四厘米宽的一条缝，这才杜绝各室间伸出头的聊天。

拘留所内的伙食标准刚开始为月11.5元，粮食日九两。早上一个窝头、一碗玉米面粥，一点咸菜，中午两个窝头，一碗煮白菜，里面几个豆渣兼豆腐丸子，晚餐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一个星期有两次在中餐的菜中有几片肥肉。知识分子讲面子，头一两天都还装作无所谓，在走廊聊天的时候都不提伙食。几天后到底熬不住，叫嚷下一顿饭快来。在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公布后，伙食标准下降，改三餐为两餐，每天“八两窝窝头”。这个低标准的伙食让李世取得了慢性胃炎，后来此病一直折磨着他，2015年3月27日还发生了胃穿孔，不得已做了胃部手术。

宣布被拘留以后，好几天都没人理。只见不断有学生被送入。开始是我们贴林彪的大字报的学生，包括北师大学生，北京农大附中的伊林、淦西，北航学生，北大的学生。然后是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的学生，贴“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的学生。后来是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的中学生，工人纠察队的工人。后来进来了赫赫有名的谭力夫。实在搞不清为什么要将他也抓进来，大概根据“政治就是平衡的艺术”吧。以后将李井泉的两个儿子李黎风与李明清抓进来了，他们都住在贺龙家。他们自己就公开说，抓他们是为了榨取对贺龙不利的材料。老大李黎风是清华的，老二李明清是北航的。以后回学校，老二被北航“红旗”打死了。其实将这些人放到一起，可能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这些人都不会真正地承认错误。纵然这些人可能在政治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对于将他们抓捕这样的处置极为反感。将他们集合以后，产生心理上相互支持的效应，从而制造了一个大大的对立面。几天后，开始第一次审问。我被带到一个审讯室，室内两个警察，主持审问的那位，约五十岁。大概觉得对付我是游刃有余，在这个过程始终保持着微笑。这一次主要询问我们写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情况，问得非常仔细，特别关注是否有后台支持。询问结束以后，让我看了笔录。当我表示无误后，在笔录上按上手印。然后要求我回号子，将整个过程详细写出来。为此，给了我一些纸和笔。以后这些纸都派上了其他用场，如写菜谱，作象棋围棋，扑克牌，等等。又过七八天，又提

审一次。这一次简单问了几个细节后，就聊起天来。显然，所有的情节非常简单，对于这些审案的老手，实在是索然无味，让他们打不起精神。所以像混日子一样，连笔录都没有，一会儿就打发我回号子了。一月风暴后，又提审过一次。这次换人了，有一个愣头青，大概是政法公社的吧。当时，《公安六条》已经颁布，他们尚方宝剑在手，又是革命派，于是指责我们攻击敬爱的林副主席，如何反动。无论说得如何热闹，但始终不说究竟要把我们怎么样，就放我回号子了。后来一想，他们无非是过把瘾，想表现一下他们的存在。从此，就没有人再过问我们。到1967年4月中旬某日，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的头头们从预审室回来，告诉大家，已经决定放他们回去，只需写一个二百字的检查即可。同时，他们说，预审员告诉他们，这大概是毛主席接见一些（被打垮了的）干部子弟时作出的决定。我们估计离我们出去的时候不远了。当时的基本想法，先出去再说。约两个月后，我们被分别带到预审室，通知我们写二百字的检查。两天后，又被叫到预审室，对我们说：你们被学校送来的（他们忘了曾让我们在拘留证上签名），学校现在接你们回去（将抓我们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我问，我们算什么？回答，以后不要再出事了（不明不白，让你自己想去）。于是，便结束了拘留所的生活，被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接回学校。这里面一些微妙的环节，革委会的人好像都不太理会，当时他们正在兴头上，根本没有看出这里面的眼高眉低，没看出公安局已经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们头上。可能革委会有个别人已体会到这里还有一点奥妙，但仍然不管不顾地折腾我们。不过当他们覆灭的时候，这些都是小罪恶了

据李世取介绍，李文博因“罪”重，与伊林、涤西等关在另一号子里。他和敦进田、张传亭、刘中柱、杨以鸿被拘留审查时是关在同一个大号子里的。起初关他的那间在杨以鸿、刘中柱的斜对门。李世取说：我的隔壁先住过谭力夫（他的对联我是反对的，曾与同学一道往北京工业大学找过他，本想与他辩一辩的，可惜他带队下乡支农去了，没想到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了邻居）。见到的谭力夫实为一白面书生，待人彬彬有礼，其人全无读其“对联”和讲话稿让人感觉到的那股“杀气”。他被移走后，住进去的是李井泉之长子李黎风，不久他也被移走。后来，我被转到1号房与敦进田、张传亭在一室，这间屋上午能见到阳光，较原来那间暖和许多。这里每天接近中午时都能听到有脚镣在地上拖行发出的异响，过一阵又能听到回来的声音。一次我好奇地爬到窗上往外看，看见的是一个带脚镣的人被两个人拖着往外走，被拖的人个子不矮，但很瘦很瘦，闭着眼。这令我很是震惊。不久，听说这人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也是被拘留的，因为绝食，但监管者绝不能让其饿死，就每天拖着他到一个医务室那边用管子插到胃里，强行给他进食玉米面粥。真是残酷！

此间负责审查他们的人员对他们还是很讲政策的，没有出现“逼供信”之类的事情。在他们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认识”错误，并重点查清了他们“身后”并无“黑手”操纵、支持（没有刘、邓线上“组织”的“黑手”）。查清“有无幕后黑手”，这应该是“拘留审查”他们的主要目的。但是查了几个月，发现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很多还是“红五类”子女，写大字报都是自发行为，与“刘邓司令部”毫无牵连，跟“联动”绝对是两码事，于是在1967年5月29日上午被解除拘留。

四、修建科劳改队

1967年5月29日上午，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敦进田、张传亭和李世取从半步桥看守所回校。回校后立即被各自班上专政小组的人带回本系或本班接受批斗，李文博还挨揍了，李世取被“坐喷气式”。

几天后，杨以鸿、李文博、敦进田、张传亭和李世取再加一个陈宝殿被送到修建科劳动，刘中柱被送到生物科苗圃劳动。修建科劳改队形成了。先后入修建科劳改队的共有16个学生，两位干部共18人。管理劳改队的开始是较年轻的付师傅和王师傅，不久换为年老的冯师傅，冯师傅一直管理到“劳改队”解散。

这16个学生与两位干部分别是：

第一批都是学生，共7人：

1. 陈宝殿：河北人，谭厚兰班党支部书记。由于和谭厚兰们的矛盾，被送到修建科劳动。调干生，入大学前当过小学校长。他认为他是真正的革命派，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因此觉得和他们劳动，太冤了，丢了他的面子。整天闷闷不乐，并不断将修建科里这些人的反革命活动向上面不知道什么人汇报。但修建科的冯师傅等一直护着这些小反革命们，使他们得不到他认为应得到的惩罚，因此更加闷闷不乐。1967年底，到沙城农场，然后分配，以后一直不知其消息。

2. 杨以鸿：物理系三（3）班学生，江西南昌人。

3. 刘中柱：物理系三（3）班学生。湖南长沙人。

4. 敦进田，中文系一（2）班学生，河北人，大字报署名“林峰”。

5. 张传亭：中文系一（2）班学生，安徽阜阳人，大字报署名“向东彪”。从署名看，这二位表示他们至少是尊敬毛泽东和林彪的。

6. 李文博，物理系三（4）班学生，黑龙江佳木斯人。

7. 李世取，数学系二（1）班学生，四川重庆人，典型的四川娃儿。不苟言笑。除非他自己想笑，他人休想逗得他笑。

以后陆续送到修建科劳动的有两位干部和九名学生。

两位干部是：

1. 于陆琳：教育系党总支书记，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的夫人。北京地下党员，被认为是彭真、刘仁黑帮集团成员。也不知怎么就被送到修建科劳动了。修建科给这些反革命腾出一两开间的房子休息。于陆琳的主要工作是打扫这间房子。由于经历过多次党内运动，她对这些小反革命的前途并不持太悲观的态度，视他们为一群小顽童，和他们有说有笑，并不时泄露出一点点她们上层妇女间的一些流言蜚语，引得大家瞠目结舌。不多久，她被叫回系里。

2. 浦安修：彭德怀元帅夫人，曾任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文革”前是北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

于陆琳和浦安修两位前辈年龄也不算小了（于陆琳小一些），又是女的，只能安排在修建科内给一两个师傅打下手。当时于陆琳的丈夫钟赤兵将军还没有被打倒，所以于的日子相对好过一些，浦安修因为彭德怀元帅的问题，她的心理压力较于陆琳大许多。其境遇更令人唏嘘

一次，她们两人都挨了斗，原因是修建科一位与她们一起劳动的工人师傅家里生活困难，接受了她们的些许粮票和很少量钱物资助，被人揭发，说她们用“糖衣炮弹”拉拢、腐蚀工人阶级，逃避改造。

后来，师大开大会斗争彭德怀，将浦安修拉去陪斗，使其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和摧残。

九位学生分别是：

1. 王文×、2. 孟繁树：中文系五年级学生，贴出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五年级的学生见多识广，不知道采用了什么办法，一直没有被送到修建科来。他们只是在后来才被送到修建科来，但呆了不长的时间，就到沙城农场。孟繁树后来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

部，博士研究生。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副编审、编审，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王文×不知去向。

3. 方义奎：外语系俄四学生，湖北新洲人。在平常的言语中偶然出现对毛主席不敬，兼与井冈山公社成员矛盾公开化，被送到修建科劳动。虽然专业为俄语，但具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唐诗联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刘中柱就是从那里听到并记得的。需要具有高格调的人，才能从《唐诗三百首》中，找到这首诗，并体会到这首诗的美。他虽然不是伟丈夫，但却是一位情圣，一直记得某人。他脾气平和，但毕竟是九头鸟一个，在极端情况中会露出男儿本色，特别是遇到川娃子的时候。某次，他与李世取一言不合，便要动手。好在当时有其他人在旁（没有其他人时是否会发生这一幕，则不知），被劝开。但以后他们却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到沙城农场，然后分配到湖北大冶程潮高中，“文革”后也考取了研究生。

4. 杜哲森：中文系一（3）班学生，天津市北郊（现北辰区）人。因对“文革”持抵触情绪，写有大量所谓的“反动诗篇”和“反动日记”及题为《师大反革命何其多也》的大字报。1967年3月被检举揭发，在班、系、校召开了批斗会后，按北京市公安局意见接受“群众专政”。因不堪忍受被囚禁宿舍的孤寂生活，在知道“修建科劳改队”后，就主动加入了这个学生劳改队。此公酷爱绘画。平日劳动毕，即回修建科，在从各处搜集的纸上作画。利用周日到北京图书馆借阅图书（学校已经吊销了他的借书证）。做了不少有关美学、绘画史论的笔记。

5. 张国钧：数学系三年级学生，湖北武汉人，老家河南，因此一口标准的河南话。是一个快活人。自感钢笔字和毛笔字均上不了台面，于是突然决心练习毛笔字。虽有宏大志向，但实行起来太不专业，只在报纸上练习写字。不巧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照片，被井冈山公社成员发现，于是成为趋近于反革命。如果对于一个平素老实的人，可能就放在群众中监督就行了（其实那样更难受些）。但他素喜社会活动，与造反兵团头头铁崇光同班，并过从太密，被疑为其军师，便由趋近于反革命，一下子被视作真正的反革命，送到修建科劳动了。能够在修建科当反革命，他日子反而更快活了。

6. 张梅英：政教系三年级学生，山东聊城人，中共预备党员。因为在思想汇报时说毛主席肚子挺出来，像孕妇，被视作破坏领袖形象，被送到修建科劳动。在修建科，负责打扫卫生和生炉子。后成为杨以鸿夫人。1968年分配到陕西陇县工作。

7. 许永康：物理系二（3）班学生，新加坡华侨。解放初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肄业参军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又以调干生身份于196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因学习吃力，留级到物二（3）班。他是被一系列的“疑似”送到修建科的，此足以证明谭厚兰们管理之没谱。他被疑似为五七年的漏划右派，疑似为五九年的漏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串联中的照片中的背景有桥梁，又被疑似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等。其实，谭厚兰们要惩治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造反兵团的活跃分子。这么个“老家伙”还要造反，很令人生气，于是索性让他当反革命去。“文化大革命”中学校无重大建筑任务，修建科的日常工作为小的修修补补。通常出工时，是开工一袋烟，工作一个小时又一袋烟，再工作一个小时就收摊回家。因此，抽烟是获得额外的休息的必要条件。当时，其他学生赖父母供养，只能买些碎烟叶来卷大炮筒以解馋。老许有工资，可以抽二角几的纸烟。每到工地，他差不多给每人发一根纸烟。抽烟过后，大家干活去了，他便在一旁继续抽烟，一直到收工时候。这些人脑子活络，总能找到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作。老许年龄大，大家嫌他碍手碍脚，也乐得抽他一棵烟，让他在一边呆着。这么安逸的日子，老许却受不了，便以一种传奇性的动作离开修

建科。在张国钧和李文博的掩护下，他偷跑离开了学校。他的这一动作惊动了一些正苦于没事干的人，物二（3）班邵先亮们便进入修建科追查，并带走张国钧和李文博。张国钧和李文博回修建科时，已脸青鼻肿。大约在追查的过程中，发现老许在修建科里的日太好过了，所以当他被抓回来以后，就不准他再回修建科。他不被当反革命后，热衷于焊半导体收音机。看到他可以将收音机焊得那么小巧精致，大家直感叹，还是术业有专攻呀。

8. 赵鸿尚：教育系二年级学生，山东聊城人。当过三年解放军。他的主要军事技能是烧饭，因为当的是炊事兵。也是由于对毛主席不敬的言语并同时对抗井冈山公社而被送至修建科。他有一句名言：“抓紧时间偷懒！”这句话在表面的玩世不恭之下蕴藏着丰富的哲理，让人终生受用。他也是一个快活人，除了睡觉和喝醉了，总是笑嘻嘻的。他的到来给修建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大家打他会做饭的主意。几经交涉，他终于答应主持做饭。大家将干活时收集的废纸卖了几块钱，买了三斤多肉和一瓶白酒。我在伙食科劳动过，便去“拿”一些大葱和白菜。从工人师傅处借来厨具，便由赵鸿尚张罗做将起来。十来个人为这三斤肉忙得热火朝天，令不远处劳动的干部和教师们好不羡慕。数学系老师郝炳昕评价说：“当人有信念的时候真是毫不畏惧的！”赵鸿尚后来分配回老家，在聊城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

9. 顾孝悌：不久就被抓。

另外，当时学校还有一个“干部、教工劳改队”，像数学系的王树仁书记、中文系的启功教授和黄药眠教授、李长之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孙煜等都在其中，他们有时也会到修建科“劳改”。他们干的主要是一些轻活。

“劳改队”的这些学生们，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后即到队部报到，“天天读”一个小时之后，就在师傅的带领下从事各种体力劳动（有时冯师傅会与他们一同劳作，有时只负责分派劳动任务，并非时时刻刻“监督”他们，所以，一天里他们最为愉快的就是劳动的时候），夜里则回到各自的学生宿舍报到、睡觉。

除此而外，他们中有的人还曾被“勒令”每天清晨清扫楼道和厕所的卫生。

专政小组要求他们每周至少写一次思想汇报和检查，负责任的专政小组组长会不时对他们训话。

“劳改”的过程中他们遇到过老者避人耳目的温馨问候和祝福，偶尔也遭遇过不明事理的“红小兵”的追打。

总的说，他们感觉自己已经沦为“贱民”。

虽说带队的冯师傅很是关照，但这些被“劳改”的学生们干的还是常有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如三九天气温零下十多摄氏度的整个夜晚抢修冻爆的水管；最冷的日子衣着单薄站在敞篷卡车上郊外拉木料，以致下车时人已迈不开步子；用大马驾辕的平板车人力拉很重的木料、砖块和水泥板等。平时，修缮队所有的“小工活”和泥瓦工、架子工、水工、钳工、锅炉工之类各种零七碎八的杂活他们都干过。可以说他们的足迹遍及北师大的每一个角落，化学系所在的老校区及附近的生活区、西单那里的教工住宅区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由于没有经验、缺乏具体指导，他们遭受工伤的事也时有发生，扭伤腰腿是常事，有的手指骨折也不止一次（后来，杨以鸿在房山“石化总厂”的基建工程中接受“再教育”时被巨石压断两根手指；李世取在石景山高井火力发电站接受“再教育”时手指再次负伤）。

下面是发生在“学生劳改队”的二三事：

1. 杨以鸿、刘中柱等惨遭“大游斗”

1968年的暑期，师大掌权的“井冈山”红卫兵和与之对立的“井冈山造反兵团”的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之时，为了打击当时被困在“工五楼”内的“造反兵团”，将他们宣传为学

校“牛鬼蛇神”的总代表。“井冈山”的决策层祭出一招：先在“牛鬼蛇神”中寻找“兵团”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选出来后再集中在“工五楼”前搞一次大游斗。

先是“井冈山”派人到“学生劳改队”开会，让每人都对“井冈山”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斗争表态。当时“劳改队”中的这些学生“牛鬼蛇神”们早已远离了校内的运动，对“井冈山”与“造反兵团”之间的是是非非知之甚少，所以他们的表态多是模棱两可，总的还是希望两派团结合作。

接下，有的系还专派人到“劳改队”背靠背找有关学生个别讯问，问某某在平时是否和“造反兵团”有联系或是否有支持、同情“造反兵团”的言论。其实，平素的“劳改”中，大家都很是自觉地不谈时下的政治，即便闲谈，对校内的事更是很少涉及，这种背靠背的揭发想也不会有什么重大发现，但是，他们中仍有人在劫难逃。

后来，确定被抓到“工五楼”前大游斗的学生牛鬼蛇神是物理系的杨以鸿、刘中柱、李文博和数学系的张国钧……

为什么是他们？虽说李文博因一张《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而全校知名，但那是1966年底的事情了。可是因“井冈山”的大字报一直在批判“造反兵团”奉行的是无政府主义，说李文博的《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宣扬的正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无政府主义，说在思想根源上“兵团”与李文博本是一丘之貉。数学系的张国钧原本也是“造反兵团”的同路人，而刘中柱与杨以鸿的好友李观韶也是兵团的。据说那天在“工五楼”前被游斗的牛鬼蛇神很多，场面也很是惨烈。刘中柱和杨以鸿的脖子被用铅丝吊上大筐勒着，筐里装有砖头，分量不轻，遭拳打脚踢地游斗下来，他们的脖颈都被勒出了很深的血印。男儿有泪不轻弹，“出事”后从未流过泪的杨以鸿被释放回来，一入劳改队队部就禁不住泪如雨下；刘中柱本是这些学生“牛鬼蛇神”中身体最为强壮，也是平时最乐观的，六尺高的汉子回来也是泪水滂沱，黯然神伤……

这是修建科劳改队经历的最黑暗的一天。

2. 奇特的“白专道路”

杨以鸿与刘中柱本来就是班上的学习尖子。虽然在劳改队中异常艰苦，但仍坚持走“白专道路”。杨以鸿原来是学俄语的，但在劳改队中从A、B、C开始学起了英语。当时物理系的“摘帽右派”刘辽老师也在接受劳改，刘老师是专门搞相对论研究的，他们俩就偷偷地向刘辽老师学习相对论。负责监管他们的工人师傅在得知他们学习的情况后不但不阻止，反而暗中保护他们，后来还设法为他们安排了一间房子充当他们的学习场所。在他们的带动下，数学系的李世取也悄悄地复习起功课，并自学俄语版的“概率论”教材等。中文系的敦进田和张传亭拜启功为师，醉心求教书法习字。中文系的杜哲森则潜心学习素描绘画……

十年动乱结束，杨以鸿、刘中柱、李世取顺应时代感召，先后考取各自专业的研究生，得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施展能力。杜哲森以中文系学生之资历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绘画史”的研究生，后来自成为独具风格的田园昆虫画一派；张传亭和敦进田后来也都有自己的书法成就，当与他们在“劳改队”的这段经历有直接关联。

3. 逆境中的“爱情之花”

张梅英是“劳改队”中唯一的女性学生，是个中共预备党员。因为在思想汇报时说“毛主席肚子挺出来，像孕妇”，被视作破坏领袖形象，被送到修建科劳动。在修建科，负责打扫卫生和生炉子。张梅英通过与杨以鸿的几次偶然接触，发现这个已经沦为“阶下囚”的年轻人并没有悲观，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念。他仍然坚持学习专业知识，坚信凭着自己的双手总是可以挣饭吃，坚信只要自己在一门事业上能够成功，总会得到社会承认的。于是对他产

生了好感，最后演变成爱情。杨以鸿与张梅英都是1968届的，1968年12月份，1968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张梅英因为问题没“升级”，被如期分到陕西陇县工作，杨以鸿因仍是“反动学生”被延期分配。张梅英在告别时提醒杨以鸿：“我如果去了以后要永远当农民，你也要做好将来一辈子靠工分吃饭的思想准备。”得到了杨以鸿的肯定答复后，双方的恋爱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张梅英临走之时，杨以鸿去向尚不明，她到了陇县后写给杨以鸿的第一封情书、第二封情书都是先寄到李世取那里，再由李世取转传给杨以鸿的。1970年，这对患难之交的年轻人终于结婚成家。这也是“劳改队”中的一段佳话。

1968年八月至九月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校内主政，派别争斗而致乱纷纷的局面渐渐平息。随着各项“斗、批、改”工作慢慢步入正轨，也可能得益于运动初期“学生问题一律不整”的“文革十六条”吧，到1969年三月至四月间，“学生劳改队”终于解散了。

五、结 局

劳改队解散后，中文系的敦进田、张传亭、杜哲森和数学系的李世取都回到各自的班级继续接受教育；63级的杨以鸿、刘中柱、李文博、张国钧因“延期分配”分别到本系低一年级的班上继续接受教育。虽然班内的同学大多数都比较温和，但一有“好事”，例如要抽少数人到北京石景山区的高井热电厂、房山县“北京石化总厂”（当时称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的建筑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他们便是“首当其冲”的“合适人选”。杨以鸿就是在“东炼”劳动时被压断了两节手指头。因为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还在台上，那顶“反革命”的帽子始终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印证了刘中柱、杨以鸿“当五年反革命”的正确。按理来说，“12月黑风”的当事人个个都是英雄，但是为了说明伟大领袖一贯“洞察一切”“永远正确”，军宣队、工宣队的代表分别找杨以鸿、刘中柱、李文博、敦进田、张传亭、李世取谈过话，总的是要他们端正态度，要正确认识“九·一三事件”。大意是：林彪后来出事不说明你们早先就对了……关于你们给林彪贴大字报的事情组织上以后不会再提，“你自己也不要说当初你如何如何正确”，等等，大耍流氓腔。1972年4月，所有的64、65级学生被扫地出门，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也跟着一起被分配。当时他们提出：我们是1968届的，早就该分配了，我们现在刚被分配，用人单位一定要问个为什么，所以希望工宣队能把我们当时写的大字报放在我们档案中，用人单位看了我们的档案就一目了然了。对于这样一个很合理的要求，工宣队就是不答应。还说什么，1966年12月林彪是副主席，你们那时反对他还是错的。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两年后，北师大党委才正式给他们平了反，才肯定他们当时的行为是正确的，是值得肯定的，同时还补发了扣发的工资。

刘中柱后来考上了北师大物理系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在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引力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1990年以来，从事光纤使用孤立子进行通讯的理论研究，分析在改变光纤的参数时，光孤立子可能发生的改变以及对于通讯过程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参加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发表了有关的研究论文十篇，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同时，研究具易磁化面的自旋链的朗道—栗夫席兹方程，在国际上首次给出了这个方程的孤立子解的解析表达式。这个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同时还发表与此有关的论文四篇。后来又从事毫微米距离的引力—Casimir力的研究，发表论文两篇。还从事声致发光现象的理论研究，在《物理化学杂志》等杂志发表论文两篇，并从

事有关检验光子静止质量实验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在《物理评论》等杂志发表有关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如何被放大，以及交通堵塞问题等复杂系统性质的研究论文十篇，均为SCI收录。

杨以鸿1980年考取首届CUSPEA，1984年以优异成绩在犹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色心物理”方面曾一度处于世界上领先地位。但他谢绝了美方的高薪聘用，重回北师大任教。但因他在“文革”中长期遭受打压，经常借酒浇愁伤及肝脏，于1987年身患肝癌，经多方治疗无效，不幸于1988年2月3日午夜逝世，终年41岁，英年早逝。为了纪念杨以鸿，北师大1988年7月1日出版的《师大周报》用整整四个版面，以“专号”的形式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详细介绍了杨以鸿不平凡的一生。

李文博后来被分配回原籍佳木斯，任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后升级为佳木斯师院，现为佳木斯大学）教师。1980年代调入北京印刷学院，1997年转到北方交通大学（原北京铁道学院）任教。他是研究生导师，我班一位同学的女儿就是他带的研究生。我班有一同学在深夜跟他打电话，他还没有回家，仍在实验室做实验。1989年他参加了民主运动。遗憾的是，李文博已在2006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李世取1979年9月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研究生，1980年12月被选举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1年11月，分配至郑州原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工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多次获奖，其中突出的有1997年获总参某部技术工作突出贡献奖并获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2006年两次被评为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等。1983年以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专著《密码学中的逻辑函数》于2002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著作出版基金全额资助，2003年1月由北京中软电子出版社出版；专著《密码学中的有关概率模型》于2004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和电子信息科技专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2005年11月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编写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课教材《测度论——概率论基础》2006年由信息工程学院出版。

敦进田曾任河北省深泽县师范学校校长，后任辛集市一中高级教师，退休前在深泽教师进修学校工作。

张传亭曾任中学副校长，退休前任中共阜阳市颍东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书法家协会会员，阜阳市诗词学会副会长，阜阳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阜阳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014年，他撰写的回忆启功先生的十篇文章，曾连载于《中国文物报·鉴赏周刊》。

杜哲森于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并留校工作；任职于学报《美术研究》编辑部，兼史论系专业写作与画论教学，历任副主编、编审、史论系教授。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致力于美术史论研究、中国画创作及古体诗词写作。主要论著有《元代绘画史》《中国传统绘画史纲：画脉文心两征录》《四画僧的人生与艺术》《道家意识与文人书画》《七言论画》诗稿（未出版）及文人画专论和当代美术评论。绘画作品出版有《孩提梦》画集。

老华侨许永康已于2000年逝世。物二（3）班的同学十分怀念他，在2010年许永康逝世十周年时，特地制作了一个《怀念亡友许永康专辑》（PPT）。他们在专辑中写道：先生一生坎坷，尽管满腔热血爱国，却屡次无端挨整。“文革”中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住过“牛棚”。1989年参加民主运动，坚决反对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1991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几天后被驱逐出境，从此客居香港，2000年在香港去世，享年70岁。

邪恶压不服真理，金子一定会闪光。阶级斗争害煞人，唯民主自由是正道。

附：张传亭书法作品

2016. 04. 12于上海，原载《记忆》158期

作者说明：

1. 本文得到了文中主人公刘中柱、李世取、张传亭、敦进田大力支持。许多史实都经过他们核实，特在此向他们致谢！刘中柱2009年写的许多资料，是教育系64级学生郭文涛（电视连续剧《刘少奇过渭水》的编剧）精心保存下来的，谢谢郭文涛！

2. 陈闯创先生为我提供了1966年12月19日的北师大《井冈山》小报等历史资料，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样向他致谢！

3. 因为离当时快达50年了，有些时间等细节，当事人的回忆都不一致。后商定以1966年12月19日北师大《井冈山》报提供的时间为准。本人发在《记忆》150期上的《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中与此有冲突的以本文为准。

4. 因“文革”后停课了，无级可升。文中表述的年级、班级均为1966年6月份时的班级称呼。

5. 因时隔太久，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张传亭、李世取当年的大字报目前尚未找到。他们大字报的主要内容都经当事人认可。尤其可惜的是，保存刘中柱、杨以鸿大字报的李观韶已于今年1月15日不幸病逝，寻找此份大字报的重要途径就此中断。现在“文革”的亲历者很多已过世，在世者最小的都已过花甲之年，抢救“文革”资料是我们这些亲历者的责任，大家共同努力还原真实的历史吧！

赵惠中，1946年生于江苏宝山县（1958年划入上海），1964年考入北京师大物理系，1972年被分到江苏省昆山中学（当时改名为“东方红中学”），1982年调回上海宝山，先后在月浦中学、淞浦中学、宝钢三中任教。2006年退休。

谭厚兰是反击“二月逆流”的急先锋

赵惠中

大庆、大寨是毛泽东在工业与农业战线亲手树立的两面红旗，“文革”初期无人敢造大庆、大寨的反。但是仅仅四个多月，怪事发生了。谭厚兰及其干将们在1966年10月24日就造了“大庆展览”的反，说“大庆展览”内刘少奇的照片比毛主席的多且大，没有林彪的照片，尤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继续展览。强调是邓小平、薄一波、陶鲁笏、余秋里等一手炮制的大肆吹捧刘、邓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其锋芒直指余秋里。11月5日名为“学大庆”战斗队共27人奔赴大庆（其队长是数学系64级的李竞权），名为学习、取经实为整余秋里黑材料的行动正式起步了。[1]无独有偶，12月6日北师大井冈山派人进驻“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馆”，接着就宣布它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并于1967年1月10日与展览馆内部以及外省造反派联合成立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馆’革命造反联

络站”，矛头对准了谭震林。[2]吊诡的是，北师大与工业口、农林口根本不沾边，谭厚兰们为何嗅觉如此灵敏？而谭震林、余秋里恰好又是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的主攻对象。

196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再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所谓“二月逆流”就是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在这几次会议上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了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一伙。

在这几次正式会议上，“文革”派无力与老师及副总理们正面抗衡，但就在2月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在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18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

从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无限上纲，并将这次斗争定了“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被“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而代之。28日，毛泽东又在陈伯达送去的一个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3月1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周恩来也受到责难。

此后，江青一伙违反毛泽东“这件事只限制在中央内部小范围进行批判”的指示，公然煽动群众在全国掀起一股所谓“反击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的恶风，凡参与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均受到批斗和迫害。按正常途径，北师大与谭震林、余秋里无交集，但是诡异的是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与余秋里开刀，而发起冲锋的竟然是北师大“井冈山”。

现在，谭厚兰已为故人，谭厚兰的左膀右臂董连猛、周耀文们却集体失声，我们无法了解谭厚兰接到了“中央文革”什么旨意。但是我们能将当年的亲身感受、见到的许多“文革”回忆录以及从太平洋彼岸回来的北师大《井冈山》报等历史碎片拼接起来，还原出谭厚兰“英勇反击二月逆流”的本来面貌。

1967年3月7日，北师大“井冈山”（还有学部、石油学院北京公社、钢院919、新人大公社、民院东方红等都不是农口的单位）首先向“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最最紧急呼吁”，发誓“我们要揪出谭震林！因为他是镇压农口‘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目前农口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头号干将！”同日，校内贴出批判谭震林的大标语，发表炮轰谭震林的声明，启动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8日，北京街上出现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北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十几个组织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大会揭发、控诉了谭震林炮制“大毒草”——《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和镇压群众运动与掀起“二月逆流的滔天罪行”。当日下午，数百人到农业部和农展馆造反。“井冈山”在反谭震林的同时不忘对“造反兵团”猛踢一脚，说“造反兵团是‘二月逆流’的产物”，要“揪出造反兵团的黑后台！”（“井冈山造反兵团”是从“井冈山战斗团”分裂出来的。它成立于1967年1月26日，因受到军训团的打压，被迫于3月12日解散）。

3月10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与北师大分别召开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云大会”。下午，谢富治等详细地参观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听取了师大“井冈山”战士的汇报。表示一定把谭震林的罪行反映给总理和“中央文革”。

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师大“井冈山”和吴传启控制的“学部联队”，从3月12日起，把矛头指向了余秋里，成立了“揪余秋里联络站”，要打倒余秋里。他们甚至将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第二天师大等单位就开广播车到计委门前狂呼：“余秋里决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混蛋逻辑”。3月13日，民研所洪涛等人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根本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展开大辩论》。此后，许多大专院校发表声明，反对炮打李富春。下午，北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北石“北京公社”在北大召开揭发余秋里，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会。师大校内贴出许多“火烧余秋里”“炮轰余秋里”等大标语，此后，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等组织也纷纷“炮轰余秋里”。石油部大部分组织未表态，北石“大庆公社”贴出了“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大标语。

3月16日，在农大召开了有178个单位参加的声讨谭震林大会，会上农大“东方红”、中央气象台“红旗”，农业部“红旗”、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代表发言。

3月17日，“红代会批谭联络站”、全国农展馆等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有一百多个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

3月18日北师大出版的《井冈山》报发表长文：《舍得一身剐，敢把余秋里拉下马！》

3月20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农大“东方红”等多个单位代表在会上发言，声讨谭震林的“反革命复辟罪行”。

3月22日北师大的《井冈山》报，从头至尾的主题就是打倒谭震林及余秋里。师大井冈山公社作战部发表“最严正声明”，声明中说：“坚决打倒谭震林，坚决打倒余秋里，不倒誓不罢休！”“余秋里从来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文化革命运动中跳出来破坏文化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责难逃！”“现在是用鲜血生命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时刻，一切真正革命的同志都应站出来。”师大校园内刷满了大标语：“舍得一身剐，誓把余秋里拉下马”“师大井冈山誓与余秋里血战到底”。谭厚兰的嫡系“学大庆战斗队”贴出“从大庆道路看余秋里的野心”的大字报，否定大庆红旗。后来这个战斗队又贴了周总理的大字报。并在师大操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

这期《井冈山》报第8版发表了“本报记者”的长篇通讯报导，标题是《不揪出谭震林誓不罢休》副标题是“在农业部、水产部战斗的我公社战士斗志昂扬、初战告捷”。从报道中看到，谭厚兰派到农业部的人员达500多人，到水产部的人是3月13日去的，之后立即与水产部内部造反派配合，援助在“二月逆流”中被冲散的“水产红旗”。3月19日下午1时半，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到水产部接见了水产部“水产红旗”与“师大井冈山”，为他们打气助威。

4月7日下午，北师大在大操场召开批判大会，批判薄一波、余秋里、谷牧。

具体是哪一天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我清晰地记得在余秋里问题上，周总理亲自出面讲了三次话，大意是余秋里同志是个好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对他可以“一批、二保”。奇怪的是，每当总理保一次余秋里，戚本禹就会跳出来唱对台戏，不折不扣总共也是讲了三次，调子一次比一次高，每次都强调：余秋里是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要坚决打倒！戚本禹讲话后，谭厚兰的追随者就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有时还会游行，高呼“不打倒余秋里死不瞑目！”“谁包庇余秋里就打倒谁！”当时我对周总理很敬重，但也知戚本禹是“中央文

革”的人，我当时认为二人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为什么会在余秋里问题上明显不一致？他们二人到底谁说的对？我应该听谁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北师大“井冈山”明显是听戚本禹的，但我内心是觉得应该听总理的，但又不敢公开反对戚本禹，只能以提问的方式写了一份大字报，标题是《这是为什么？》，具体内容是按时间顺序写了周总理三次保余秋里的讲话与戚本禹三次反余秋里的讲话，最后一句话是：这是为什么？署名：红岩松。写完后拿着大字报要出门去贴大字报时，平时很少回班的李庆林突然闯进来了（西南楼305室），他说：“你们想出去干什么？”我答：“刚写了一份大字报，准备出去贴。”他抢过大字报看了一下，二话不说就把我的大字报撕了。我说：“你怎么撕了呢？”他说：“这样的大字报你也敢贴？你贴出去的话，马上说你‘炮打中央文革’！马上把你打成‘反革命’！”当我再要争辩时，他头也不回就走了。我的大字报也就这样流产了。这份流产的大字报对师大“文革”没产生丝毫影响，但对我个人却是刻骨铭心，它是我在“文革”中的重要转折点。冷静之后，觉得这政治风云莫测，高层的事不是我们普通学生能搞得清楚的。那些干了几十年的老革命，今天还是中央领导，明天可能就是“黑帮”了。像我们这种学生，如果要整你还不像用手掐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极了。“文革”中的理论说变就变，打倒党委、赶出工作组时强调反对个人、反对党的基层组织不能说成反党，但“12月黑风”中反林彪又是反党了，林彪、“中央文革”甚至林杰、谭厚兰都是新的权威了，军训团又是代表党中央了。这“辩证法”好似“诡辩术”，对、错只在谁的权高位重了。我无法辨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也怕再次被打成“反革命”，从此便逐渐脱离运动中心。到了工宣队进校后，我就干脆拜师大的围棋高手蒋锡久为师，成天沉湎于黑白斗争中了。

在对待谭震林和余秋里的问题上，“师大派”明显地抢占了先机，“北大派”滞后。在程度上“师大派”调门高，称为“打倒派”，“北大派”调子低，称为“炮轰派”。当时的学生特别注意听广播，尤其注重新闻报道，研究哪些领导露面了，哪些人好长时间不出面了，是否出事了？首长出面时的排序更是热门，谁位置提前了，谁位置拉后了，预示了什么？简直可谓“排序学”。在那段时间里，常会报出一长串中央领导人的名单，到了最后来一句是“还有余秋里同志”。听广播时“打倒派”开始很高兴，认为余秋里终于打倒了，当听到“还有余秋里同志”时就大失所望，口中嘀咕“怎么还没倒？”“炮轰派”一开始总是很紧张，特怕没有余秋里了，当听到“还有余秋里同志”时便喜上眉梢。这一奇景持续了好几个月。

3月24日，晨，苏东海等人贴出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师大各战斗队纷纷发表严正声明，坚决镇压反革命。同日上午，署名“誓死保卫毛主席”战斗队贴出“给周总理贴张大字报”，长达十几张，质问总理为什么一再保余，强烈要求总理出来澄清“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否真实，这张大字报出笼不久立即被井冈山盖掉。井冈山作战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给总理贴大字报》是一株大毒草，目的是把水搅浑，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混淆两个司令部，把谭震林、余秋里同总理混同，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3月25日，师大出现“苏东海等人炮打周总理罪责难逃”“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攻击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等大标语。

其实在当时的氛围下，出现苏东海与“誓死保卫毛主席”战斗队的大字报是必然的，师大“井冈山”对苏东海等人的反击只是做个姿态，表示我们是保卫周总理的。由有关资料显示苏东海是后来出现的“5·16兵团”总部的五常委之一。[3]可是，这么一位“名人”，大部分北师大“文革”亲历者都没听说过，不知道他当时是教师还是学生，更不知道他是什么系，哪个年级的，可见谭厚兰对苏东海是假批实保的。

在反对谭震林、余秋里的同时，北师大“井冈山”也反对另外几个副总理（除谢富治外）

与几个老师。1967年1月28日的《井冈山》报发表长篇文章《打倒反党篡军的大土匪——贺龙》，3月10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与北师大分别召开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云大会”。4月2日，师大井冈山作战部发表声明：重炮猛轰李先念。4月3日在中央财经学院召开“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有90多个单位3000多人出席。4月6日《井冈山》报发表几篇长文：《粉碎陈毅的猖狂反扑》，中二（2）“旌旗”的文章：《陈毅，你站出来回答！》，师大作战部的长文《李先念在财贸口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罪责难逃》。其他单位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等的活动，师大“井冈山”都派人参加，《井冈山》报都刊发详细报道。从这一系列的活动中不难看出，他们的矛头是对准周总理的。

然而，事态并不如谭厚兰所愿。到了8月下旬，全国局面越来越乱，无法收拾。毛泽东只能把王力、关锋、林杰当替罪羊抛了出来以求稳定大局。这晴天霹雳把谭厚兰彻底砸懵了，北师大瞬间大乱。“9.7事件”中谭厚兰被以樊、黄、李为首的“专政委员会”专了政，但令人意外的是当晚周总理、“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连下三道金牌把谭厚兰从困境中保了下来。《“中央文革”紧急通知》中明确表示：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从这些话中完全可以断定，谭厚兰是反击“二月逆流”的急先锋，“中央文革”就是她的后台。可是，“革委会”与“反击‘二月逆流’的功臣”二大招牌虽然在“9.7事件”中保护了谭厚兰，让她躲过了一劫。但是到了1970年6月，早已毕业离校的谭厚兰就被揪回北师大作为“五·一六分子”而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昔日的功臣成了阶下囚。说到底她也是被毛泽东当做替罪羊而抛了出来，最终因身患绝症而亡。

2018.04.08

参考资料：

[1]1967年3月18日北师大《井冈山》报

[2]1967年3月22日北师大《井冈山》报

[3]卜伟华：《北京的两大派》

1967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

岳瑞民

一、武斗开始了

1967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武斗”阶段，几乎每天都有各地红卫兵组织发出“告急”“惨案”“流血”“求救”的消息。特别是7月20日，武汉部分红卫兵组织绑架了中央代表团首长。更为严重的是武汉军区有部分军人也参与其中，而且还携带着真枪实弹。

这种“军变”加武斗的形势，威胁到毛主席的安全。

7月20日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革委会”，也就是红卫兵组织，上街游行，支持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武汉事件的指示，谴责武汉部分造反派的反革命罪行。北师大当然也参加了。当我们的游行队伍走到西单时，突然天降大雨。人人都淋得像落汤鸡。我们冒雨前进。

刚过了中华门，快要到天安门广场时，突然队伍前边传来领队的命令：全体男生跑步前进！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撒起丫子一路狂奔。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了北京火车站。广场上已经停放着很多大卡车。只听领队说：赶快上车！于是大家急忙爬上大卡车。一队长卡车载着满满的红卫兵，离开北京火车站，急速驶到了永定门火车站。卡车还未站稳，领队就喊：上火车！凡是军人一律抓捕！

我和同学们，不，是红卫兵战友们，急速登上火车。只见车厢里没有一个群众乘客，每个车厢里都坐着一些军人。他们一个个呆若木鸡，哭丧着脸，坐着不动。据说他们本来是携带武器的，在我们赶来之前，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已经缴了他们的枪。我们冲到他们跟前，第一个动作就是撕掉他们头上的解放军帽徽和衣服上的解放军领章，接着两人一组负责一个，将他们的胳膊拧到身后，扭送到大卡车上。有个别的军人不服，赖在座位上不下车，甚至还有有的要打架。这还了得？！红卫兵们几个人一起上，连拉带拽，硬是从窗口塞出去，按到卡车里。时间不长，战斗就结束了。

把这些军人拉回到学校的学生食堂，喝姜汤，吃晚饭。战斗了一天，还真饿了。我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大吃大喝。可是那些抓来的军人，一个个似残兵败将，有的愁眉苦脸，有的哭泣掉泪，也有的脸红脖子粗，气呼呼的不吃饭。驻校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首长见状，就问一个梗着脖子不吃饭的军人：“你是党员吗？你是干部吗？”答：“我是党员，排长。他们（指我们红卫兵）把我们当敌人似的抓起来。我想不通！”首长说：“你是党员干部，就要听党的话，带头吃饭，有问题以后再说！”这位干部只好端起碗来吃饭。

据说当天夜里，这些被我们抓来的“俘虏”就被北京卫戍区押到高碑店，办“学习班”去了。

实际上，这次抓捕解放军战士的战斗之前，我们已经有过一次“演习”了。好像是1967年的春天吧，北京还冷。有一天，学校革委会用汽车将我们部分红卫兵送到了人民大会堂，说是中央首长接见，召开会议。大会堂里外都有解放军把守。进了大会堂，到了会议厅，才知道不光来了我们学校，很多大学的红卫兵也来了。北京各大学的红卫兵一律坐在二楼。不一会儿，会议厅的一楼就坐满了人。仔细一看，原来是内蒙古的红卫兵。他们是对立的两派，都是来北京找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来状告对立派的。所不同的是，其中有一派是由当地的部队战士陪同而来的。为避免冲突，从内蒙古来的这两派红卫兵分开坐在两边，中间有通道隔离。

可是这些红卫兵还未坐稳，我就看见一派红卫兵的坐席上站起来一个军人，身穿四个兜的军服，可能是个军官吧，大喊一声：“我们走！”这派红卫兵呼啦一下子就往会场外涌。原来在他们座位上都放着一张纸，是中央关于内蒙古“文革”形势的通告，其中批评了有当地部队支持的红卫兵组织。

他们哪里能够出得了大会堂？！很快又返回会议厅。返回来后，也不坐下，而是齐声的大喊：“我们要见党中央！”看到这种情景，我们才知道叫我们来的用意了。于是，北京各大学的红卫兵也齐声喊起来：“请安静！等待中央首长接见！”

过了一阵子，主席台上的顶灯突然亮了。只见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江青等首长走出来。台下反而更乱了，喊得更起劲了：“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这样喊了一阵，好像周恩来总理也生气了，声调严厉地说：“我们就是代表毛主席来的！我们就是毛主席派来看望你们的！”大家一看总理生气了，于是安静下来，开会。

后来听说，从内蒙古陪同一派红卫兵来北京告状的这些军人，当晚就被北京卫戍区武装押送到北京以外的某地办“学习班”去了。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红卫兵造反的矛头便开始指向“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开始掀“军内一小撮”的运动了。

二、受命赴南京掀“军内一小撮”

1. 发《声明》支持“八二七”造反派，谴责南京军区“一小撮”挑动武斗

1967年7月末，物理系革委会派遣我去南京，任务是“调查南京‘文革’形势”。与我同去的还有三位同学，因为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就用他们的籍贯代替吧。一位是湖北同学，任组长，一位是江苏同学。我们三个都是65级同学，平时都认识。还有一位是高年级的，不太熟悉，但知道他是老资格造反派。

我们一行四人坐火车到达南京。因为南京已经发生多次武斗，公交车都停开了，所以从下关火车站只能一路步行。进入南京，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法国梧桐林荫大道。嚯，大路两旁各一行法国梧桐树，树干粗壮，树身高挺，枝繁叶茂，树冠被修整地向马路中间靠拢，遮天蔽日，马路上几乎不被阳光晒到，全是荫凉。

当天住进了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宿舍。因为一路劳顿，所以虽然似觉身体不适，以为是蚊子骚扰，也未在意。次日早晨醒来，浑身奇痒，一看，天哪，脸上、背部、胸前、腿上、胳膊上，到处都是红包，呈一串串状，原来昨晚我们做了饿极了的臭虫的美餐！

开始“调查”。所谓调查，其实就是到各个大专院校和一些知名的中学去，这里边不仅设有南京各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宣传站”，还有外地各派红卫兵组织的“宣传站”和“联络站”。他们都热情地接待我们，介绍自己组织的情况，南京的造反斗争的革命历史和自己组织的光荣发展史，还有武斗的情况，特别是南京军区对待各个红卫兵组织的态度。然后塞给我们大量的油印材料，铅印的也不少。

经过一整天的调查，晚饭后我们就在宿舍讨论分析南京的革命形势。基本上有两点共识：第一，南京的红卫兵组织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简称“红总”，另一派简称“八二七”。这两大派都自诩“革命造反派”，指责对方为“保皇派”，而且都控诉对方血腥镇压自己。第二，南京军区似乎支持“红总”派，排斥“八二七”派。两大派都拥有武器，据说是从军区抢来的。但是“八二七”派信誓旦旦地说“红总”的武器明里是他们“抢”的，实际是军区“送”给他们的。

既然我们四人的看法相同，于是就考虑向学校红卫兵总部回报。这时，老资格同学说：我们应该发一个“声明”，支持南京造反派，揭露军区走资派。组长湖北同学说：“我们是来调查的，能公开表态吗？”老资格同学说：“我负责与学校作战部联系，你写声明。”

晚上，老资格同学说，已经与学校红卫兵总部联系好了。湖北同学就拿出他起草的声明叫老资格同学看。老资格同学看后说：“这不行，太缺乏战斗力。我来写。”他连夜写好了《北

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驻南京联络站关于南京局势的声明》。内容大致是：1. “八二七”是革命造反派，“红总”是保皇派。2. 南京军区以许世友司令、杜平政委为首的一小撮军内走资派，支持“红总”，武力镇压“八二七”，是南京多起武斗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去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印刷厂印刷《声明》。这个印刷厂，是我们来南京后的当晚无意中路过，向他们了解情况，刚好他们就是“八二七”派的红卫兵成员。于是，《声明》很快就印刷完成。我们几个就上街，到各个大专院校去张贴、散发。据说一时轰动南京。

过了几天，我校物理系革委会某委员带领一伙红卫兵战友，从芜湖赶过来了。据说那里被保皇派控制，局势紧张，为躲避武斗危险，就转移到南京来了。这位领队携带有井冈山红卫兵联络站的公章。我们这四个人自然就归他领导指挥了。

2. 没有亲眼看见武斗

说实话，1967年从7月到9月，南京发生过多武斗，据说两派都有死人。但是我连一次武斗也没有亲眼看见。只是有一次看见武斗大军，倒是让人开眼。

大概是7月30日前后哪天的一个傍晚，我们正在街上溜达，突然许多卡车轰轰隆隆的开过来。卡车很多，一辆接一辆，排成一长串。每辆卡车上都站满了人。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几乎都一样：头戴工人生产时戴的柳条编织的安全帽，身穿一般工人常穿的那种蓝色劳动布制作的工作服，脚上穿的是翻毛皮鞋，左臂佩戴红卫兵袖章（没看清是哪一派），手里握着用铁管或者三角铁制作的长矛。嗨，一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凛凛，一脸视死如归的神情。

卡车队伍飞似的驶过。我们知道这是要去参加武斗了，于是赶紧追上去。可惜我们几条腿没有汽车轮子快，不一会儿就看不见车队的影子了。只好不无遗憾地回去睡觉。第二天，就听说昨晚在下关火车站发生了武斗，而且有人死亡。

下面几幅图片是我从网上下载的，不一定是发生在南京，不过跟我当年看到的情景很相似。

武斗前期，戴柳冠斗，持棍棒

武装示威游行

3. 中途返校汇报南京斗争形势

我的新任务是和化学系的一个女生共同搜集整理资料。这些资料主要就是各红卫兵组织印发的传单和大字报。这些资料大部分是以前的，很多重复，也有新近的。我们把最新的信息整理、摘录出来，汇编在一起。

8月份，我曾经返校一次，向学校革委会作战部汇报南京的斗争形势和联络站的工作。

我提着一大包资料上路了。因为武斗，路上没有公交车，只好步行去火车站。当我走到将近挹江门时，突然一声凄厉的警报声响起，“呜——”，非常惨人。我抬头一看，大街上本来就不多的行人都急慌慌的四散逃跑，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再看城楼上，似乎没有一个人，但是那恐怖的警报声分明是从城楼上发出的。我知道，坏了，赶上要发生武斗了！怎么办？返回联络站？说明自己是个胆小鬼，这太丢人。往前走？小命还要不？犹豫不决。我站在树荫下，仔细观察城门洞口的动静，发现还是有几个人急匆匆的进出。于是，我心一横，牙一咬，硬着头皮闯过去了！

火车上挤满了红卫兵，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多亏我有座位，否则从南京一直站到北京可

不是好玩的。火车开动后，我很快发现车上没有卖吃的。肚子饿了，忍着吧。大概到了晚上10点以后，饿得实在难忍。听有人说抽烟解饿，可是我不会抽烟，身上也不带烟不带火。没办法，觑着脸向别人借了一支香烟，硬是抽了一半，还真管用，好像不觉得太饿了。

过了午夜，肚子又开始抗议了。这可怎么办？还真好，这时火车停在了一个小站。火车还未停稳，就看见几只又黑又粗糙的手从车窗外伸进来。我探头向外看去，好几个人，多是妇女和老人，他们每人都提着一个网兜，网兜里放着苹果、梨、鸡蛋等食物。这些食物装在用细线编织的小网兜里，每个网兜里大概装两三个吧。无论哪种食品，一网兜卖两角钱。

（说明：这张照片是我从网上下载的，跟我当年看到的情景很相似）

于是我花了两角钱买了一网兜三个鸡蛋。几口就吃完了。还是饿，但是兜里没有钱，就只好将就吧。旁边的旅客说，这些人都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家里实在穷，拿这些农产品卖几个钱，就可以买点粮食或者生活日用品。白天有村干部拦截，碰上就会把东西没收了，他们不敢来，只好在夜里偷偷摸摸地来卖，即使这样也要提防干部在半道上偷袭。

午夜之后黎明之前是人最困的时候。我起来去厕所，怎么觉得屁股上有凉风吹过。走进厕所一看，天，原来裤子的屁股处破了一个大洞！家里穷，1965年我来北京上学时，穿的那条裤子，是我妈妈用她自己穿过的半新的女式裤子（开口在一侧）改做的。因为没换洗的裤子，所以这条裤子很快就磨得快露底了。来南京后，因为天气太热，反正裤子也烂的够呛了，于是我就把两条裤腿剪掉，改成裤衩了。没想到在车座上这么一磨，从裤腿几乎烂到了裤兜，形成一条大口子，所以裤裆里感到漏风。不过幸好我里面穿有小裤衩，要不从南京到北京，真丢死人了！

这次回到学校后，向“井冈山”作战部部长周耀文汇报了南京的情况，把在南京搜集的资料交给了作战部，为了说明南京的革命斗争形势，我还手绘了一份“军事形势图”。

后记：

10年以后，“文革”结束了。大概是1977年吧，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派了一个老师，找到我的工作单位，调查我们当年在南京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有关谭厚兰的罪行。我把能够记起的情况如实讲了，也说了我只是一个角色，始终没有和谭厚兰接触过，不知道她的事。来调查的老师拿出一张纸，叫我看，说：这是不是你写的？我一看，原来是当年我手绘的那张“南京革命形势图”。于是我哈哈大笑起来。调查老师说：“你笑什么？”我说：“当年很幼稚很荒唐，还绘制什么‘形势图’，俨然以为自己是一个‘军事家’呢！”

说明：本人主要目的是自责，不想牵连其他同学，故文中有意隐去了其他同学的姓名，请谅解！

2012年7月首发《人民网-强国博客》

2016年4月30日刊登《记忆 REMEMBRANCE》第154期

2016年11月发表《新浪博客》

岳瑞民，1945年7月11日生，山西省垣曲县人。196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山西省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从事教师工作，直到退休。

我参与了北师大的“九·七事件”

林贤光（清华大学）

1967年的9月，我正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第三动态组（分工负责北京动态，简称“三动”）中担任动态员，也就是每天出去到我联系的一些单位，将无论是大道消息还是小道消息统统搜集起来，带回动态组汇总分析，提供井冈山总部作为形势分析和制定战略的参考。同时，油印出版“动态报”发给基层战斗组，交换到校外。

那时，北京社会上已经明确地分成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公社”为中心的“天派”（北大反“地派”，但一般不大参加北航和清华的反“地派”活动）和以地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为核心的“地派”，在社会上互争地盘，互挖墙脚，斗得不可开交。

我在那时是负责文艺院校和一部分社会动态，正在关心当时社会上才出现的“5·16”反周总理现象，涉及学部以及学部和地派的关系。

8月份，在武汉“7·20”事件之后，一时得意非凡的王力，到了8月下旬与关锋一同被抛出来。随之，经手炮制反军社论的林杰也被揪了出来。这使得天地两派的明争暗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因为，天派这边认为林杰和学部的吴传启是地派的“黑后台”。由于林杰和谭厚兰是校友，而且在“文革”期间又有紧密的联系，加以林杰的特殊身份（《红旗》杂志社编辑），我们就认定林杰是谭厚兰的后台。1967年8月林杰一被揪出，天派中的许多头面人物就认为：这样一来，师大谭厚兰的“井冈山”必垮。9月初，谭厚兰又以个人名义在《红旗》杂志社贴出大字报为林杰翻案。更加加重了天派认为谭厚兰在和“中央文革”唱反调。

[注1]

9月初的几天，“三动”加强了对师大的动态收集。我也到师大去看大字报，不过也只是一般动态而已，一个苗头就是师大反谭厚兰的“井冈山造反兵团”似乎恢复了活动。

9月5日的晚上，“三动”开会时，就有人传来消息说：“师大革委会造反了。”第二天就有人把师大的大字报抄了回来，是师大的革委会成员樊立耀、黄家林贴出大字报造谭厚兰的反。

9月6日晚上，突然轻工“红鹰”的头头朱成和作战部长王启凤来到“三动”的乙所，问天派的头头会在哪里开？不久，机院的作战部部长轰雷和人大“三红”、体院“兵团”都来了，“三动”的负责人张树有也来了。一起去了“井冈山”团派的总部工字厅后厅，等了一下，无人知道。后来人大说，是否改到北航去开了。赶快打电话去问，果然会议改到北航了，说：赶快大家都到北航去。还说：清华再去几个人。于是，体院、人大等校都开了车去了。清华则由王其林、张树有和我骑了自行车赶到北航去。到北航之后，有人把我们带进了教学

区（北航的教学区是禁区，有军队保卫，不是北航的人不能进去），到了一个很大的教室，里面大约坐了有50到60人，围了一个大圆圈，中间是发言的人。蒯大富和韩爱晶都坐在中间。清华“井冈山”除了我们以外，还有管后勤的常燕群。

我们到的时候会议已经开了一半，记得我进去时是一个女的在讲话。我问了坐在我旁边的北航红旗的作战部长刘德威，才知道发言人是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王颂平，他们另一个头头叫铁崇光。另外，师大革委会中造反贴大字报的樊立耀、黄家林、李五全也在。我的印象是王颂平正在发言，内容好像是对樊立耀他们的造反表示不信任，认为他们和林杰本来就是一伙的。不相信他们是真造反，不愿意和他们合作。而蒯大富和韩爱晶都建议他们两家合作，至少在反对林杰这个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把明天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开好。让樊立耀回去把明天用的广播器材等设备准备好。随后樊立耀等三个人就先走了，这边接着开会。

似乎是一切都已经商量好了。第二天要在师大开“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蒯大富统一了口径，叫做“打倒 5·16 集团，打倒林杰，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口号要喊“谭厚兰悬崖勒马”，不要喊“打倒谭厚兰”。这样大会不会被人揪住辫子。又有人提出：“只怕地派来冲会场引起武斗”，于是决定，各校都多去人，纪律一定要好。体院刘长信说：他让运动系的人提前进场保卫主席台。后来不知谁又提出，最好天派集合起来一起进场，这样声势浩大，又可保持良好的纪律。最后，北航刘德威总结了几条：①各校尽量多发动人去，②遵守纪律，③明天早晨都到北航南操场集合一起去师大。而且决定了由清华的鲍长康代表天派发言，由清华拟发言稿，原因是鲍长康在清华 9月1日已经对林杰的问题发表过一次影响比较大的讲话，而且派性十足。韩爱晶说：“就让他再表演一次吧。”

记得蒯大富说他也想到师大去，韩爱晶说：“你别露面，留一步，我（指韩自己）认识的人少，在底下转转没什么，你不要去，找个离师大近的地方，设个前线指挥部，有人给你通风报信就行了。”当时。刘德威就提出，把老蒯坐镇的地方设在电影学院，那里离师大近，又是天派的“井冈山”掌权。蒯大富也同意了，在那里当不露面的指挥。

对师大“造反兵团”大会的具体工作也分了工，北航送一面“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大旗，清华为大会作一个横幅，装一辆广播车。参加大会的人数，蒯大富说：“我半小时就可以调动三千人。”韩爱晶说：“北航去两个系。”还说：今晚一定要通知那些没有参加今晚会的学校明天去参加师大的会。最后又一再问师大的王颂平还需要什么，韩嘱咐王要把明天的发言准备好，把人组织好。那时，北师大的“井冈山造反兵团”大约不到一百人。然后，各校分头回去组织力量，蒯大富派车送王颂平回师大去。散会之后，蒯大富把我们三个人留下，问“明天谁跟我去电影学院？”张树有就推荐我，说我去最合适，搞文艺口，和电影学院的“井冈山”也熟。蒯也同意了。进一步分工，张树有负责回去通知其他学校，王其林回去组织人连夜做横幅装广播车，找鲍长康准备发言。蒯大富告诉我，明天一早6点钟在静斋门前上车。这样我们三个大约半夜 1 点钟回到学校，我回宿舍睡觉了。

9月7日早晨6点钟，全校的高音喇叭就大声喊叫，组织兵团的人去师大。我则到了静斋和蒯大富坐车去电影学院（新街口豁口外小西天路西），常燕群开了一辆三轮摩托跟在后面。先到了北航的红旗院，时间尚早，蒯就让我 and 常燕群先到师大去看看。我坐了常的摩托就去了师大，从前门进后门出走了一趟。觉得情况很好，“造反兵团”在大门处摆了签到处，校内大字报很多，几乎都是揪林杰、揪谭厚兰和批判谭厚兰的大字报，还有不少从“井冈山”造反出来要求参加“造反兵团”的表态大字报，而且听到今天早上师大广播台造了反。我看了觉得形势简直好得不得了，赶紧回到北航向蒯和韩汇报。

于是，蒯大富和刘德威带了我与常燕群去到电影学院，我去把电影学院“井冈山”的头头居联贵找出来。居听到蒯和刘来了非常高兴，并说他们立刻装一辆广播车去参加师大的会。

7点多钟，有人从师大来，说：师大有人抓起了谭厚兰，要批斗她，但不知是谁抓的，反正不是“造反兵团”抓的。蒯大富和刘德威听了都急了，说“抓不得，斗不得”，赶快去看看。于是，刘德威拉上我就赶到师大去，在宿舍找到了“造反兵团”的王颂平。王说：“樊立耀今天早上突然搞了一个‘专政委员会’，把谭厚兰抓了起来，还说这个‘专政委员会’里面有‘造反兵团’参加，但是，我们不承认我们参加了。”我们问：“现在谭厚兰在哪里？”王说：“现在谭保护在我的宿舍里。”刘德威说：“赶快放了，否则他们会造谣说你们扣了谭厚兰。”于是，王颂平立刻派人去把谭厚兰放了。

在师大操场上正在布置会场，清华的王其林、王文鼎、李国柱都在忙，鲍长康也到了。但大队人马还未到，我又和体院的同学坐了车去看大队走到哪里了。沿途迎上去，在土城附近看到了庞大的队伍正在走过来，几个学校的天派队伍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后来说是有上万人参加。我还说，这一回是个“天派队伍大检阅”。

等到大队伍进了师大，到了操场，韩爱晶、朱成、刘长信等人都到了。韩爱晶派了北航的车到电影学院把蒯大富也接过来。大会开得很顺利，到中午就结束了。我印象在师大操场遇见地质学院的田春林和王大来，他们在找蒯大富。我带了他们去见了蒯和韩，他们一起又到电影学院去谈话了。我未参加，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当晚我在“三动”就听到了消息。当天下午，北京卫戍区的李钟奇司令员到师大去了，宣布：“开万人大会斗谭厚兰是错误的”，并宣布将樊立耀、黄家林、李五全等三人拘留审查。当天，“中央文革”批评了蒯大富和韩爱晶，不应当颠覆师大的革命委员会。

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北师大“九·七事件”。事后，谭厚兰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重新执掌师大的大权。而“造反兵团”和被关押的樊立耀等人后来的遭遇如何，由于断了联系我就不清楚了。

当时，我对李钟奇在师大宣布的决定有意见，我认为：在师大开万人大会是“造反兵团”恢复活动，这和斗谭厚兰是两回事，不应当扯到一起。

这一次，天派借着8月底“中央文革”中王力、关锋被揪出来，穆欣被逐回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社又揪出了林杰，谭厚兰十分被动之际，企图颠覆谭厚兰和师大革委会。派性的大发作是前所未有的，认为时机对天派有利，准备一举给地派一个重创。在“九·七事件”中，天派全力投入，但最后还是“中央文革”说了算，谭厚兰被保了下来。我们这一大批人瞎折腾了一阵，最后天派、地派谁也没赢。只有把我们这些人玩弄于手掌之中的幕后的如来佛一举定音，让我们双方都灰溜溜地。天派想翘尾巴也没翘起来，地派由于林杰被揪出，谭厚兰受到重创，尾巴也被割掉了一段。两败俱伤，没有胜利者。

我参与北师大“九七事件”，虽然只有三四天，但还是起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起了不好的影响。是我在“文革”十年所犯大小错误中对校外影响较大的一个，是我应当向北师大文革期间的广大师生深表忏悔、致歉的一件事。

应当说，我对师大还是充满了感情的。我从师大二附小毕业，又在辅仁男中上了六年学。北师大有我敬爱的恩师朱鼎勋、郭预衡、尹敬坊等，还有我的小学、中学的同班同学任教。我到了清华之后，1954年还到北师大旁听了朱鼎勋先生的“射影几何”课程。可是在我参与“九七事件”的那几天里完全没有想到这些，鬼迷心窍一样掉在派仗的漩涡中间，一心只想着“揪后台”“抓黑手”，挤垮对方。这个“鬼”是什么？就是那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它使你忘掉了一切，什么亲情、友谊、文化、历史全然不顾。这是我应当终生引以为诫的教训。在今天，“文革”似有死灰复燃之势，对于未经历那场“浩劫”的年轻朋友来说，实在要提高警惕吸取教训。我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有望于来者，不要再重蹈我们走过的弯路，所望也不过如此。而对于国家的命运来说，则希望那一场“浩劫”万万不要重演。

再次向北师大的老师和同学们致歉，并致以最深沉的忏悔之意。

[注1]本文参考了邱心伟的《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第261页；聂树人著《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

编者说明：此文是林贤光先生所著《我介入了北京的天地派之争》一文的第三节。首发于孙怒涛先生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下册，（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2月）。此次发表，作者在文字上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

2016年3月15日

原载《记忆》154期

林贤光，清华大学退休教授，在“文革”中曾因涉入“陈里宁事件”长期被整，“文革”后宣布无辜。退休后曾任建设部智能建筑专家工作委员会常务专家，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人才开发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海派”溯源和反思

张梦阳

1967年12月，中文系张梦阳、物理系张振国等人牵头，串联了全校13个系、部，63个井冈山公社内部同情与支持造反兵团的“战斗队”，以“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名义，发表了一份《关于北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是肯定“北师大革委会”“井冈山公社”“井冈山造反兵团”和广大干部师生都是“革命的”，否定以谭厚兰划线的“李春秋定理”，一切以伟大舵手的指示为唯一标准，停止派斗，解放干部，实现大联合。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篇《联合声明》，并没有脱离“文革”语境的窠臼，但在《声明》的最后喊出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井冈山公社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革命战友联合起来！”的口号，在当时全校许多厌恶派性斗争，主张联合的广大中间群众中确实产生了强烈共鸣。特别是得到党政干部的拥护。从此持这一观点的群众被称为“海派”。

今天很有必要对“海派”进行一下溯源和反思。

1967年7、8月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非常关键的时期。在当时所称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中央文革”领导下，通过“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支持“文

化大革命”的人逐步掌握了党政财文大权。但是“文革”始终受到军队的抵制，很难进行下去。7月20日在武汉爆发了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抓捕、批斗“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事件，引起全国轰动。中央解救王力、谢富治回京后在天安门举行了十万人大会，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全体成员都出席了。义愤填膺，群情激昂，提出解决军队抵制“文革”的问题。在中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如果不牢牢掌握军权，“文化大革命”派即使夺得党政财文大权，也迟早会被掌握军权的人推翻、清算。于是1967年8月1日建军节时，当时被认为是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红旗》杂志社发表了第十二期社论，正式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一时间，全国上下纷纷响应，师大校园贴满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并把武汉军区的军人抓到校内批斗。

但就在鼎沸时刻，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做出了“还我长城”的批示，“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落马。据说当时对立面还提出了威本禹，由于毛泽东保护，暂时留在台上。

同时，所谓“5·16兵团”的问题也摆到桌面上，人们怀疑受林杰直接指挥的谭厚兰属于“5·16”。于是，9月7日早晨，以樊立耀、黄家林、李五全为首的师大革命委员会中的异见人士带人把谭厚兰抓了起来，成立了所谓对“5·16”的专政委员会。但是到了晚上，形势又反转过来。上层怕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保了谭厚兰与师大革委会，并且卫戍区派人拘留樊、黄、李。

这时，“井冈山造反兵团”重新活动，与谭厚兰形成尖锐对立，出现了激烈的派斗。而处于中间状态的大多数师生如梦初醒，虽然对“文革”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跳出这一窠臼，但对翻来覆去的派斗已经厌倦至极，感到既为学生就应以学业为主，不可再这样下去了。正好党中央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张梦阳所在的中文系64届一班是全校最早也是唯一一个坚决响应中央指示复课的班级。张梦阳对自己盲目紧跟《红旗》社论的错误也进行了反省，所以在那时的班级领导莫元首授意和支持下，张梦阳1967年10月串联物理系张振国等师生，准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停止派斗，实现大联合，复课务学业。这就是“海派”出现的思想渊源，是应该深入追溯的。

主要工作是起草联合声明。由大家讨论，张梦阳执笔。在当时的主楼中文系所在的六楼一个办公室里，张梦阳根据大家意见打好草稿，在会上向大家念，与会者提出修改意见。张梦阳按照大家的意见修改、加工，又找大家讨论，先后一个多月，往复了六七次才定下来。由张梦阳复写若干份，张振国带到全校各系传阅，有13个系、部，63个井冈山公社内部同情与支持造反兵团的“战斗队”签名赞成。12月初，张梦阳找毛笔字写得好的师生认真抄好后，贴在大字报栏的显要处。一贴出，立即在校内引起轰动，看大字报的人挤得里三层外三层，许多人前往抄写，造反兵团拿出去铅印，广为流传，得到大多数师生的拥护，几乎成为学校的主音。人称拥护声明的人为“海派”。

12月12日晚，“海派”与“造反兵团”在大礼堂联合召开了大会。会上，“海派”召集人张梦阳和张振国等介绍了联合声明酝酿、起草的过程以及今后的想法，“造反兵团”前负责人李庆林、郑云云等也谈了兵团最初的情况。但他们的谈话却引起了时任“兵团”头头的不满。会后，全体集合冒着刺骨的寒风，在校园里游行，高喊呼吁大联合的口号。

12月28日倒台前夕的威本禹找谭厚兰派和兵团开会。会上双方互相攻击，因为张梦阳曾经写过读《红旗》十二期的体会在井冈山报上登过，谭派的极端分子就指责兵团说：主张“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夺权的张梦阳跟你们坐在一起。张梦阳曾经在革委会组织的写作班子，又名政策研究室里待过，由于写作能力突出暂任过负责人。但不到几天，没有来得及工作，“九·七事件”发生，写作班子就散掉了。“兵团”的蒲寿章因此翻脸说：“张梦阳是谭厚

兰的乏走狗。”公布会议争论记录时，革委会的董连猛为了给谭厚兰作掩盖，以张梦阳所在的“铁流”战斗队常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为由，把谭厚兰改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污蔑张梦阳是“穆欣的乏走狗”。这样校两派极端分子继续派斗，对主张停止派斗、实现大联合的“海派”召集人施行人身攻击，本不是一个组织、只是联合声明签名者的所谓“海派”也就消声了。

现在反思“海派”的经历，感到“海派”的动机是好的，人员也都老实、正派，没有劣迹，后来成为学校宣传队依靠的主要力量。但当时过于天真了，以为发个联合声明呼吁一下，就可以使学校步入正轨，不再陷在无谓的派斗中，荒废青春。哪知政治斗争是复杂的，两派的极端分子想的是夺取或者保持权力以达到个人目的，因而并不希望平息派斗。

张梦阳由师大“文化大革命”的亲身经历，得出如下反思：

1. 凡事一定要独立思考，绝对不能盲目相信任何说法，不管这些说法来自何种权威的领导或报刊，有着怎样铺天盖地的势头。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是为人文的根本。

2.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认识自己，明白自己擅长什么，又拙于什么，心里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万万不可懵懂、糊涂地做自己本不擅长、不应该做的事。经过这次挫折，张梦阳开始懂得自己是绝对不长于政治与经济的，也拙于人事活动，只能从书本中讨生活。所以摒弃一切闲事，埋头读书、思考、写作，终于使自己的人生有了转机。

3. 永远不要走极端，极端主义始终是人类的大敌。

4. 无论什么时候都须拒绝煽动和诱惑，毫不动摇地坚持做对人类有益的最基本的学问和事业，不走它路。

他一生无法消除的哀痛是：1968年7月初，师大中文系革委会某些极端分子，在董连猛等人指使下，趁他在家养病期间，深夜闯入家中把他抓到化学系，强迫他写文交待“海派”的“罪行”。他感到“海派”的事情全部是公开的，没有阴谋，就表面“认错”，实际上写的全部都是无可非议的明面活动。有小人公然说：这是表面骂自己，其实一点实质性内容也没有。要去施以暴力，但当时的中文系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还是保持了定力，予以制止，对张梦阳没有任何触犯，一周后送回家中。张梦阳至今认为当时自己采取的态度是合宜的，没有受到无意义的肉体伤害，也没有“供出”任何可以上纲上线的材料。唯一哀痛的是给慈爱的母亲以极大精神刺激，不久最高领导人发出“深挖洞”的指示，街道“小脚侦缉队”迫使六十高龄、身患疾病的母亲，在寒冷的严冬挖根本无用的防空洞，不久溘然长逝。这是张梦阳终生难以抚平的隐痛，也是他以后发愤著书的内在动因……

2017年10月6日写于北京香山“孤静斋”

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男，1945年3月13日生于甘肃天水，祖籍山东临清。1964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6年“文革”爆发，积极参加运动。1968年如梦方醒，闭门读书。1972年分配到河北农村教书，仍然坚持读书、写作。1979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工作三十年。主要学术成果有：《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获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鲁迅学通史》，获国家图书奖；长篇小说传记《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会稽耻》《野草梦》《怀霜夜》），获国家出版基金支持。共出版专著、文集十余种，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论文、散文、随笔百余篇。到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和日本、澳

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香港地区讲课数十次。作品被翻译成日、韩、英、阿拉伯等文。

学生连记

金宏达

进入21世纪后一个秋日的下午，河北涿鹿县城北的一片菜地间，一群鬓发花白的五六十岁男男女女，异常兴奋地踏看着、寻找着，且不时大声呼叫着：“对，这儿就是猪圈！”“这儿是伙房，没错！”“我们二排的房子在这儿。”“连部！连部！快来看！”

他们所说的这些，地面上并不见早先的存在物，唯有一点点遗迹，大致的方位，三十来年后，此来，已是执行一项类似于“考古”的任务了。

他们原属当年驻此的一支解放军部队的学生连，仅仅“学生连”这个称谓，于今天的人们，已有过于生僻之感，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化石般的留存……

一

1968年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京城的大专院校。其时，学校里已有原应于头一年夏季即该毕业分配的一届，与当年的一届学生等待分配，于是，遵照有关指示，该分走的均分走，留有一部分先送解放军中接受“再教育”。这一部分人中，既有已分配留京、留校的，也有已定下分配地点和单位暂不派遣的，此外，还有上一届已分配的学生中因种种原因滞留者，和有问题或严重问题（政治的、道德的各种问题）不予分配、留待处理者，用当时的说法，即“左、中、右”都有。我即是一个“右”的例子，原在的班级同学都已奔赴工作岗位，留下一摞材料，内定我为“右派学生”，留待后期处理。那时我所能设想的前途，只是在某个荒漠的农场中，被群众专政，度此一生。我浑浑噩噩，听由摆布，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内，带上自己的行李去规定的地方集合，而后被送上西去的列车。

我们所到之地是河北省的怀来县，又叫“沙城”。今天开发商们会把栽几棵花树的楼房叫什么“花园”，凿一条水沟的小区称什么“水乡”，殊不知我们的先人何等诚实和大气，此地常常漫天风沙，径直就叫“沙城”，毫无讳饰。

出了火车站，放眼望去，整个小城似乎都笼罩在蒙蒙的土黄色尘雾之中，迎面卷来一阵阵冷风，使人睁不开眼睛。向西走约摸一二里，便是部队的营房。到了营房门口，我们的队列却受到了出乎我意外的热烈欢迎：一队绿军装、红帽徽的士兵分列两旁，敲锣打鼓，并有节奏地喊口号：“向革命同学学习！向革命同学致敬！”

我已有许久不被置于革命人民之列了，此时，只觉得自己是不配被“学习”和“致敬”的，颇有混迹其中、自惭形秽之感，相信当时队列中与我具相同身份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觉。

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这一切都不是错的，都是政策的体现。

按照政策，所有送到解放军部队锻炼的大学生，无论何种情况，在政治上都一视同仁，一起学习，一起劳动，有问题的，乃至有严重问题的，均在内部掌握之中，最后再说。

对于我这样的人，这真不啻天大的福音。

二

我们的指导员姓陈，连长姓朱，都是在这支野战部队服役多年的中年军官，以他们为首的一个正规军人的班子，包括副指导员、副连长、各排排长、司务长，直至文书、通讯员、卫生员，统率这支新建的特殊的大学生连队。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肯定受过专门的培训，整个说来，在执行政策方面并无什么偏差，他们大都出身农村，都带有一种天然的纯朴厚道，对人相当和气。

其中尤其是陈指导员，更是有一种娴熟于政治思想工作的指挥若定的气派，以他时时严肃与亲切交替的言谈，很快就在这群大学生中树立了威信。他军装严整，操一口带湖北老家口音的普通话，说话时习惯地扬起一边眉毛，使一只眼睛显得额外发亮和有神采。除了在全连大会上作报告，几乎每天都要在全连集合时作队前讲评，讲话不拖泥带水，不冗长杂沓，透出一种职业军人的干练。

他的讲话内容主要依据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强调受过旧教育的学生要接受再教育，要一辈子而不是一阵子与工农兵相结合。他敏锐地抓住连队中大学生的种种思想表现，予以解剖和针砭，使得无论是心高气傲还是心狂气躁的人都一概逐渐收敛了心性。

前面说过，这类学生连队的成员是“一揽子”收进来的，组成很复杂。如我所在的学生连，既有似我这样留待后期处理的问题严重者，也有主要是来自北京地质学院的一批同学，他们已然落实了分配单位，纯是来接受一段再教育，而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都曾夸口“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如今怎么竟被几个级别如此之低的解放军降伏了呢？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又何况还和一些“反革命”“反动学生”掺和一起，搞什么“一视同仁”，此气也实难忍。所以，实在说，一开始思想问题也甚多。

人大约既是很容易被抬起来，不知所以，也很容易被驯服。毋需多久，我们就看到，这些大学生，无论贤愚不肖，都相当老实、听话。

冬天，军营中除了学习、学习，偶尔也安排一点劳动。劳动，主要就是积肥了。一到掏粪池的时候，大家便争先恐后，粪水溅到身上，也尽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一个多人高的粪坑，跳将下去，誓要刮干净不可；或者，天不亮起床，赶到炮兵连的马厩去抢拣马粪，马粪蒸腾着热气，也全不怕被熏；出去散步，见到遗落在地上的马粪，会脱下衣服抱回来。在学习会上，大家就交谈自己在此过程中洗刷“旧思想”的体会。

朱连长虽然是个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立过战功，却怎么看还是个穿上军装的庄稼汉。他很胖，嘴唇很厚，话不多，总是教大家怎么干活儿。他要谋划全年的生产和生活，虽然有伙食费，但远远不够，必须生产自救，第二年自己种菜、养猪，前一年需备足肥料。他的节俭是有名的，甚至要大家在路上将风吹落的树枝都捡起来，送到伙房。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他的号召下，都竞赛着做这样的极琐细的事。

三

军营中也有浪漫。那时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要召开了，大家都要向“九大”献厚礼，女

生排承担了绣一巨幅毛主席像的任务。像大约有一个双人床单那么大，下半部是朵朵葵花簇拥，不仅图像逼真，而且色彩分明。先做好了木制的像框，可供几个人同时刺绣，日夜轮换不停，终于赶在“九大”召开前绣制完成，连队参加县城里的庆祝游行，很是惹眼。

（图为欢庆九大召开，学生连参加怀来县的游行队伍。“女士优先”，女生排走在前面，挥舞花环。）

游行的事也是不断有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下来，大家就会集合，敲锣打鼓，上城里去游行，不管如何，且将激情大大宣泄一下。连队有位从中国人民大学来的“才子”，虽然是学新闻的，音乐上却颇有修养，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最新指示”完整地谱曲，并在队列前教唱：

“从旧学校出来的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大家从平铺直叙的散文语调中逐渐转向昂扬，唱上去，唱上去，也能感到一种难以平抑的兴奋。几遍之后，居然能脱开教唱，从头至尾唱下来了。“才子”因而很受指导员的器重，有时在别人劳动时，他坐在自己的床前，不停地搔着头，嘴里念念有词，是执行连里交给的作曲或其他创作任务。但是，有一天，我们竟然听见了他独自一人在宿舍嗷嗷大哭，惊动了连部的人都跑过来劝慰他。问了别人，这才知道，原来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要来和他离婚了。

我们记得，还是刚到部队来没多久，他的新婚妻子就来过一次。极偶然地一瞥之下，那时的他们，是多么幸福的一对啊，妻子年轻而且漂亮，小鸟依人地傍着他，“才子”不好意思地回应大家艳羡的目光，又须臾不离地望着自己的爱妻。

部队明确宣告不许谈恋爱，但是对已婚者的配偶来部队探望，仍是很人道地安排招待所，让夫妇短期同住。“才子”的漂亮妻子接连来过两次，仅是这一条，就让我辈羡慕得要死，谁又能想到，他们的姻缘会如此短促呢？

令人感伤的还不只是这一点，“才子”的身世更是叫人为之长叹。他十几岁就参了军，跟随部队进过西藏，后来，居然一举考进了（不是保送！）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这在五十年代真正是响当当的“名校名系”，不能不说他确有过人的才华。五七年“反右”，他因为写大字报乱“放”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几年后，帽子摘掉了，仍回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时赶上“文革”，分到工作单位，单位负责人一看他的档案：“摘帽右派”，不敢收留，又退回学校，既然是分不出去，便“寄存”到学生连来了。

滞留学校的一段时间，以他的身份不便去参与“运动”，闲时就到处逛逛看大字报。一次在北大附中，邂逅了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的这个女生，该女生对他一见倾心。爱情的力量端的是无可阻挡，无论家庭如何反对，她就是铁定了心，要嫁给这个年龄大她许多、前途未卜的“摘帽右派”。他来到“学生连”，她也立即接踵而至，曾经强烈要求留下，未获允准。然而，爱情的力量最终还是抗不住世俗社会的高压，她决定要和他分手，其时，她已怀上了他的孩子，或者正是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孩子未来将面对的命运，迫使她必须尽快做出这个选择。所有挽回的努力都失败了，包括指导员也出面做她的工作，预言这个才华出众的人一定会有不错的前途。然而，决裂是异常无情的，她起诉到当地的法院，他不得不接受现实，当他从法院走出来的时候，眼见有一个男人在门口等待着陪伴她……

他就像大病一场，消沉下去，再也难唤起那种富有感染力的激情。

四

在那里，我自己也曾遭遇过一场浪漫。

尽管我背负着相当严重的罪名，来到学生连总算暂时安顿下来，我的一位通过几次信却尚未谋面的女友，一意要趁春节来看我。她在北京买了一些吃的东西，把长途电话辗转打到团部，告诉我她到达的车次，这使我或者连部都推却不了。我们还没有正式明确恋爱关系，所以只能告诉连部她是我的表妹，连部则认定来者必是我的“对象”，甚至干脆按部队的称呼叫“家属”，使得双方的关系迅速脱离暧昧而定位。

临近除夕，列车上只走下很少几个旅客，我很顺利地接到女友并将她带回到连队。因为她也是一名大学生，不容置疑地立即被安排进和我们一起接受再教育的行列，一起去贫下中农家中吃大年夜的忆苦饭，也一起去看县城礼堂的文艺晚会，只是在熄灯之后，我和她才避开众人走到操场上去谈话。

记得那天夜晚的月色分外皎洁，周边的一切仿佛都披上了一层银霜，尽管我一再向她吐露自己对前途的担忧，提醒她一定要做切合实际的考虑，却还是渐渐地忘却了身置何处，以为自己就是这个美好的银色世界的主角，一径喁喁低语，交流彼此的爱意。

部队是禁止谈恋爱的，此举无疑触犯了天规，可是，直到现今，也想象不出究竟是谁在侦伺，四周似乎根本没有人影。不过，如果不是后面又发生的事，这也许还不会被大加责难。

第二天是个休息日，连队照例吃两顿饭，九点钟吃完早饭后可以自由活动。既然女友盛情带来一些好吃的东西，在这样一个食品短缺的时候和地方，为什么不拿出来和朋友一起共享？从北师大一起来的人中，原就有一些是相识和要好的，恰好有一位天文系的姜兄已婚，老婆从老家来了，连队安排他们住进招待所。房屋虽是出奇的窄小，却好歹是可以自己支配的空间，大家遂相约借那里一聚。

聚会前后不过延续了一个多小时，五六个人，说些无关严肃的或沉重的或敏感的话，主要是吃。我们似乎已从厄运的阴影中脱身出来，在这传统的年庆日子，居然还能享受到如此轻松和亲切的气氛，品尝从首都北京带来的糖果与果脯，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欣悦。

很快就到了回连队吃下午饭的时间，集合的时候，我感到气氛有些不太对劲，几位连队首长都神情严峻地站在队列前面，不像往日绽露笑容。随即是指导员讲话，他用了大约半分钟扫视大家，在我的脸上似乎还多停留了一下，然后说，今天，在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一小撮人“臭味相投”聚会在一起的严重事件，为什么这些人会聚在一起，很值得深思。大家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严密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警惕旧思想回潮。当然参加聚会的人也有不同情况，都要做深入检查。

我一听顿时就懵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不就是几个人聚在一起吃了点东西吗？千不该，万不该，是我们几个犯错误或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了，或者说，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实际“身份”，说是“一视同仁”，实际上，还是外松内紧，严密关注。（另外我也实在失于无自知之明，在这里，我们所能领到的人民币就是有明显区别的，大多数人拿的是大学生毕业工资42元5角，而我们少数所谓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则拿的是20元生活费。）

接下来是开展群众性的批判，我们几个被批判者立马拉开距离，自不必说，其他人也尽量避开我们，而我的女友则早已花容失色，她将这起祸事的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为此向我连连道歉，原定的行程也不得不改变，迅即离去了。对于这个年轻浪漫的女大学生，这是一帖最有效的清凉剂，她得以和我的现实生存真相直接接触，关于未来的一切虚幻的想象都被

彻底击碎，再经考虑，这一段短暂的恋情也就正式画上了句号。

五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连队要开拔到离沙城几十公里以外的涿鹿县，那里有部队的一个生产基地，主要是种水稻，在一个叫“下花园”的地方也经营着一个小铁矿。比起困在营房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政治学习来，大家似乎还是更乐意于到广阔天地间去参加劳动。在行军去目的地的途中，宣传队仿照正规部队，不停地演唱和打快板为大家加油。

在我们到来后不久，正规部队就接到紧急战备命令“上坝”了。按当时的形势，战事似乎一触即发，由我们接手这支战斗部队的后方生产支援工作，意义就特别重大。我们排有一位也是从人民大学来的哲学系的朋友，精神多少受过一些刺激，当时表现十分亢奋，一次竟然一口气吃了十多块大油饼，弄得他肠绞痛发作，赶紧送到师部的医院急诊，问他何以如此，他说“苏修”就要打过来了，他必须吃得饱饱的，和他们决一死战。

我们住进本团特务连的营房里，朝南一排低矮的土坯房是我们各排的住处，东西两边还有几间房分别是连部和伙房，四周都是水田，离附近的村庄有一段距离，任何一个走近这里的人，都会立即进入我们的视线。

实在说，在这长城以北的地方种稻田的活儿很苦，我们要育秧、挑秧、插秧和一遍遍薅秧，直至水稻成熟，割秧、脱谷、打场。大家整天泡在泥水里，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痛。碰上冷天，寒风吹过，沾满泥巴的腿上，会绽开一个个小口子，疼如刀刺，有人只好用胶布贴上，两条腿就像布满了白色的鳞片。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学生连的大学生们已经被证明能承受部队的生产任务了，他们年龄一般比正规部队战士稍大，又有了吃苦的精神，干起来似乎还更能胜任。风吹日晒，一个个脸黑了，身体似乎也壮了，学生连的人穿着破旧的军装，有的剃了光头，休息日里，三三两两走在街上，还成了当时涿鹿的一道景观。

（连队有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也是一张很难得的合影。）

这样的学生连战士怎不可爱？师部决定召开“大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意在表彰一批先进分子，当时我也被抽去写典型材料。听说邓小平的一个女儿在本师的另一团，师部想让她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发言，报上去却未获通过。也大约是这种直接接触和相处的关系，部队对这些学生的态度总体上是宽容、欣赏和亲切的。有一次，我们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号，号声显得很寻常，大家顾不得洗去腿上的稀泥，往连部跑过来。好家伙，却原来是傅先辉军长亲自来看我们了，这可是难得见到的大首长，忘记了当时他都讲了些什么，只记得这个胖乎乎、笑嘻嘻的首长很是和气，一再叫大学生们往前坐，这件事让大家兴奋了许久。

部队在当地设有生产股，具体管理现场生产活动，有一位副团长，一直亲自督导，对学生连也严格管理，一丝不苟。有一段时间因为调整营房，我们暂借附近村庄的老乡房子住，一天干活下来，疲累不堪，晚饭后，夜色已深，都收拾着准备就寝，集合号却响起来了，原来是通知到营部去看电影《地道战》。这《地道战》何止看了五六次，大家实在不愿意去，无奈“军令如山倒”，只好整队前去。偏偏一等再等，拷贝就是送不到，也不知是谁作了决定：今天不看了，等通知。刚回到住处要睡下，集合号又响了，说是片子到了，还是要去看，

有人便恨恨地说，“这不是折腾人吗，枪毙了我，我也不去。”这时天又不作美，淅淅沥沥下起了雨。于是，有人去找朱连长求情，朱连长实在有点心疼大家，同意不愿去的就不去了。次日一早，队伍到了地头，只见副团长先已到了，黑沉着脸，命令朱连长出列，问他为何晚上看电影学生连不到。朱连长知道辩解无用，嗫嚅着说不出什么，挨了好一通训。

六

我们不知道在这里的日子还要过多久。虽然看上去大家相当安定，实则内心里还是希望能快些出去，终究这里缺少自由。不断有消息传来快要分配走人了，每一次连队都会要抓“活思想”，要大家批判临时观点，树立牢固的“扎根一辈子”的思想。如果是上山下乡，“扎根一辈子”犹有可说，在部队怎么能“扎根一辈子”呢。何况，不久连陈指导员也调走了，去军部的医院去做协理员，朱连长好像是复员回家了。连里又来了一个新的指导员，很年轻，比较活跃，过年的时候，他的新婚妻子从老家来了，就住在连部。爱开玩笑的大学生在他的房门前贴上对联，道是：“近战夜战敢于刺刀见红，苦干实干生产成果累累。”这相当于现今的荤段子，大家看了哈哈大笑。

有一段时间，女生排留守在沙城营房种菜，我们也很想念她们。身边缺少异性，生活就毫无色彩，尽管有她们在一起，也是严格地“授受不亲”的。后来她们也终于来了，完全是生产任务需要，无意中也就解决了一种心理上的缺失和平衡的问题。

尽管部队命令严禁谈恋爱，违者甚至被提到“毁我长城”的高度，然而，青年男女的情爱仍然阻遏不住，不时会有一些“绯闻”传出：谁和谁好上了，他们在暗通款曲；谁和谁相恋被发现了，受到了批评和警告，但是不服，还在“地下活动”。

不过部队毕竟是部队，在这里，无论如何柔情蜜意，也绝对不会出现勾肩搭臂，出双入对的现象，真正从地下转到地上，是在即将分配离队的消息被证实之后。那时，一天之内就有一两起具有某种“爆炸性”的新闻，我们顺着新闻提供者的手指方向望过去，果然，就看见在不远处的田埂上，站立着一对男女主人公的身影。虽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大家也能马上判断出是谁和谁。

最具有“爆炸性”的，是地质学院的何君和北师大李君这一对恋爱关系的公开，没有亲眼看见之前许多人不相信。

何君是地质学院有名的美女，颀长的身材，鹅蛋脸，大眼睛，气质很好，据说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在当时虽说不是一个好出身，只要父母不是被打倒的对象，对于一些人来说，却也还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一种背景。她在校、系中有不少仰慕者，地质学院同到学生连的人中也有，但大都畏葸不前，或者就碰过钉子。而李君则完全属于另一类人。他是北师大的有名人物，做过校革委会的常委，因为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推翻谭厚兰，被逮捕入狱，自然也就成了“反革命”，出狱后也被送来此地待处理。李君高个宽肩，方方的脸庞常挂笑容，是个很谦逊、可爱的年轻人。对于这样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特别是一些与何君同校来的人，与其说是不敢相信，毋宁说是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一事实。师大来的人许多都有严重问题，虽说部队在教育上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事实上总是有区别的，是内控的，何君放着那么多出身和其他条件好的人不找，偏找一个这样前途未卜的人，难道不怕连累自己和家人吗？

大概任何时代，世上都会有一些立意和表现不俗的人，何君就是当时这样的一位。她不但毅然将她与李君的关系展现于连队所有人的视线之内，而且还采取了更加令人震撼的后续

行动。按规定，何君属于已经分配了工作单位的，首批就离队了，她没有马上奔赴工作单位报到，而是住在北京等李君的到来，却没想到李君未获分配，又被押回学校继续审查。这次审查采取了很高级别的监管措施，完全与外界隔绝，李君被关在一间屋子里，窗户被钉得严严实实，墙上贴着“李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大字标语，足见性质之严重（实则后来落实下来并无什么严重问题）。何君来探视，遭到拒绝，但她锲而不舍，执着地向主持其事的工军宣队要求，最后获得同意，二人就在李君被隔离的房子里成婚。

我们无法知道他二人成婚时可有过什么哪怕是最简单的仪式，或有无第三者在场，但是有这样一往无前的爱情到场，他们的成婚无疑是很有亮点的。那个时代无数辉煌的人和事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他们的婚恋，还闪耀在我和我的朋友的记忆深处。

七

从1968年秋到1970年秋。我们在学生连整整度过了两年时光。对于我们来说，部队的生活像是一个港湾，有多少惊涛恶浪都暂时被阻挡在港湾之外，学生连时而也会有一些波澜，但大抵都不会使我们有被倾覆的威胁。只是在快要离队之前的几个月，一场叫做“双清”的运动突然袭来，港湾里一时间也真的是云飞涛走，换了一幅气象。

所谓“双清”，一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个任务，其实，还是北京市有关方面和我们所在学校交付的，我们人虽然在部队，所属的关系并没有脱离学校。团里派来了工作组，由一位年轻英俊的赵副营长负责，他和指导员的年纪都不如我们中间许多人大，但是，他们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在我们面前很有威严。

刚开始还没觉出什么，闲散一点的时候，他们还随便和我们什么人说说笑笑，后来，我就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在有意回避我们中的某些人。班、排干部在频繁地开会，领受任务回来后，说话渐渐已有所指，大家吃喝拉撒全在一起，可是，你仍然能感到在受到布置妥当的严密监视。

我不幸又成了一个重点。在不指名地批判中，我被称作是少数有严重问题至今未交代的人中的一个，我甚至至今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掌握了什么问题，于是陷入了极大的恐慌，我猜想莫非又是哪位旧时同窗在外地出事，交代出我们一起有“攻击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若就是有，也犯不上此时来搞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我早有此类或更严重的纪录。很有可能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变化，一方面是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任务需要，另一面是对一些人问题的深浅不放心，还要保持高度警惕。在运动逐渐升温的时候，我们曾被命徒步走到在宣化的师部，参加了一个交代政策的大会，会上当场宣布抓捕了一个什么人，以体现“顽抗到底”的下场。

一切似乎都还处在斗争前奏的阶段，大批人的分配就开始了，人们的斗志一下便松懈下来，忙着告诉家人，整理行装，吃告别酒。这时还传来过一个噩耗，某地一个学生连多人乘的一个卡车，在高高兴兴去某处参加告别活动的路上失事了——一根斜倒下来的电线杆迎面砸死了许多人。大家的反应是必须从快离去。

学校派来了专人——两名军宣队员，将我和另几个人（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前校革委会的常委李君，一个是政教系的周君，还有一个是体育系患精神病而有“反动思想”的曹君）押回去继续审查。我们的起点是学校，终点还是学校，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尽管如此，两年部队的生活经历却并没有归于零，正像本文一开始所描述的，无论岁月的尘烟如何掩埋，在我们自身的生命成长中，总能找到它的历历遗迹。

（原载金宏达著《金顶恒久远》。追记于2007年，2017年再改。）

我所经历的北师大清队

安希孟

一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8年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1931年、1952年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先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代校歌旋律甜美温婉，歌词宏丽多彩。“礼陶乐淑教之基，依京国，重声施，英才天下期。党庠州序仰师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歌》1908），“往者文化世所崇，将来事业更无穷，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歌》1923），辅仁大学校歌尤为典雅“吾校之魂，圣、美、善、真。三知是求，明德日新。蔚起多士，文质彬彬”。但“文革”狂飙吹散了和谐气氛，响彻云霄的是红卫兵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上阵，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闯！闯！！闯！！！”

被冠以十年浩劫的那三千六百个日日夜夜，是国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总结、反思、内省，这不是羞辱，而是光彩。

二

清理阶级队伍时，学生张来芬、隗仁莲去青岛外调调查刘淑文（非教学人员，姊妹二人均未婚，被疑“特务”）的历史问题，项目组领导暗中嘱咐，顺便调查一下同在项目组办项目的老师。这事得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整人，人人害我，我害人人。

于传曾老师当过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将官还是校官，我忘记了。他也很紧张。还有“汉奸”孙晓康。有一次全系例行公事召开批判孙晓康大会，发言稿是我草拟，孔庆美同学上台宣读，代表我班发言。内容大概是日本烧杀掳掠，难道这就是你们大东亚共存共荣吗（孙晓康自供他上街刷过这样的标语）？驳得孙晓康哑口无言（他也不敢言）。其实他的历史问题早就有过结论，所以能够给我们当老师。

我们系还有一个白俄和另外一个俄国人，就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什么？免于恐惧？我那时没听说过。好像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应该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活该你整日价惴惴不安。

当时我班下班的老师是：邓蓉初、王昭碧、凤泉林、林永福、陈秋帆、陈培根、孙晓兰、

蒋亨俊、柳绿春、濮阳翔、耿志国、于传曾、章景琪（章头）。这是二班。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没有人头落地的危机意识，后来我班又和四班合并，加进来的老师有蔡文莹、都祖尧、陈正方。

工宣队进校学习六厂二校经验，先是清队隔离审查，然后又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断解放一些有问题的人。当然都是已经解除隔离，但还是要花架子召开全校大会公开宣布一下，造成气氛，这就是群众运动。每一次解放一批人，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都要表现出激动万状的样子，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有时还喜极而泣，眼泪似乎是真的眼泪。这是事先彩排过的演剧，大家情知有些儿言不由衷，但我们这些非牛鬼蛇神又何尝不曾经虚情假意呢。驾驭人的技术，马基雅维利的手法，打你一巴掌，再给个豆豆吃，你就感激涕零。当然各个击破，鼓励告密，互相检举，是最有效的。

三

“文革”我在北师大外语系认得了著名诗人郑敏老师。1960年，她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调到北师大。她回忆说，下放到山西农村，正是“大跃进”时期，当地领导天天带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看农民吃酒席。围着一个大圆桌，大家都大吃大喝，意在表明：“咱们农民也吃得上酒席啦！”实际上，这是大锅饭。当时农民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劳动强度极大，但吃的却越来越少，到后来，只能喝稀的了。

郑敏回忆，第二次正式插队到农村，跟当地农民住在一个炕上。劳动结束后，那家的主妇烧一大锅水，只下一点点面条。男劳动力可以吃上面条，但她就是一碗接着一碗地喝汤。郑敏老师说，她后来才知道，原来女劳动力只能喝面汤。那位主妇偷偷地给这位老师盛了一小碗面条，说，“你是毛主席派来的，要给你吃得好一点。”郑敏很感激地接过来了。可因为这面条没油没盐，一点味道都没有。她觉得难吃得狠，越吃越慢。那位主妇极羡慕地看着她，还问：“你怎么吃得一点都不香呀？”一听这话，她就更心酸了。在那位妇女看来，“能吃上一碗这样的面条就好了。”可郑敏说，这是她吃过的最难受的一碗面条。

当时，因为根本不可能洗澡，插队的老师们身上全长虱子。所谓的厕所，都有两个坑，一个小便，一个大便。小便完了，就得迅速地跳向另一个坑，否则就会把自己溅脏。她说，这种最奇怪的革命生活方式，真是不堪回首。那时的中国人口才六亿人，中国的农民多么伟大，多么能够忍辱负重！如果不去农村，她永远不知道中国农村是怎么回事，还以为都跟上海一样呢。

她说，“文革”中写诗成了罪状。在一阵阵口号喧嚣的白天过后，她独自坐在书房，借着夜幕，悄悄地将手头唯一度藏的一部《诗集：1942—1947》付之一炬。当时她认为，此生再也不可能写诗了，中国再也不需要诗歌了。全国将只有一个人的思想和诗词。“工宣队和军宣队来问她：‘你真的下决心不写诗了吗？’她认为如果牺牲自己的诗歌生命可以换得中国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也是可以的，所以就回答说可以不写。”（见《遮蔽与差异——答王伟明先生十二问》，《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一解诗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4页）。从1948年到1979年，她在党的阳光下沉默了近30年。她大哥王勉则因抗战时担任国民党远征军的美军翻译，入狱十多年。1979年恢复名誉，重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0年代末，昔日的还活着的九位诗友在京华相聚。曹辛之提议每人各选一组四十年代的诗作，出一本合集，书名就定作《九叶集》。此书于1980年代初出版，成为中国新诗觉醒的先声。

我后来执教现代外国哲学，知道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可是我忽然发现，我们的郑

敏先生早就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有研究。我不敢向她讨教，一是她年事已高，二是哲学与文学毕竟是两码事，谈不拢。

四

俄语教师耿志国，红小鬼，出身好，冀中平原人，较早参加革命。他家里有一个革命年代的糟糠，现在应该是离休革命老人了。他去苏联留学，娶了个洋妞，常到苏联大使馆，和一同娶了洋妞的中国姑爷们聚会Party。中苏友好，一朝翻脸成仇，苏联姑爷变“特嫌”。1968年“清队”，他们教研室下到我们班，我是班长，老师们以为我们学生个个都是吃人的小老虎，提心吊胆，见了我低头哈腰，以为我掌控生死大权。他们喊我不叫名字，而是喊“班长”，我出足了风头。耿志国的糟糠之妻和许多革命者进城之后喜新厌旧者的妻子的下场一样，和鲁迅的原配一样，离婚不离家。她是县委的机关干部，也做牺牲品。他那个苏联妻子中苏蜜月过后，就回到苏联，两人有书信往来。每次苏联来信（情书），都先落在工宣队手里。工宣队让我班董丽琴、王昭碧口译。那时候公民没有个人隐私，当然没有私民，只有“公民”，通信不受保护，应该懂得。信很肉麻下流黄色低级资产阶级腐朽没落——因为结尾竟然是：“吻你，kiss you”。解放军战士说，我班女同学听见“吻你”二字，脸颊绯红。那个时候呀。

要耿志国交代苏修特嫌问题，也没嘛证据，反正穷追猛问，宁肯错案，不可放过。耿志国说他是小羊，说狼要吃小羊总能找到借口，我们就说他诬蔑革命群众是狼。成天打嘴仗，斗嘴皮子，鸡蛋里面找根骨头。连我们都烦了，也止不住乐了。细想，他耿志国即使想出卖情报，也得有库存呀。有些人里通外国也不够格——你掌握什么机要呢？如果他们对外人谈谈自己的感情遭际，那也不是神马大不了的，不会国破家亡。

五

“文革”初衷是一斗二批三改。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改革规章制度。“清队”本不在此例。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都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清队”持续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这说明清队是战略部署。清队中，北师大纵身一跃跳楼自尽的是祁开智教授。那是一个寒冷冬晨，清晨望见西北楼墙角地上躺着一具蜷缩的尸体。没有怜悯，没有哀伤，没有惧怕，没有对生命的敬畏，和死去虫子一样。

濮阳翔（后来的教授）是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端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三青团和忠义救国军。很吓人吧？！原来他在东吴大学，临“解放”时，国民党方面拉人，国共争夺，三青团发展团员，大概最末一班岗发展团员名单上有他（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但此后隆隆炮声就打破了入团梦，连他也不知究竟，就算入了团，也没啦个甚。比如我，“文革”前刚被支部讨论举手通过入团，还没领证举行典礼，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应该没有历史问题。但濮阳公每天跟着我，把我看做救星。结果大家都笑我。

濮阳翔的第二大历史罪状是参加忠义救国军，在我，就以为这可不得了。他是胡传魁老

胡的部下，一定去过春来茶馆，和阿庆嫂智斗过。但他说他不认得阿庆嫂。原来他少年叛逆时期负气离家出走（安徽人），听说有一支抗日小股武装忠义救国军，但投奔未成，没挂单，没投宿。清理阶级队伍，他紧张了几个月，但我们到老儿也没为难他。因为我知道，那四个人和其他四个八个人无非是让我们彼此恶斗。其实在他们看来，咱们谁都不是好鸟。昨日红卫兵小将大方向始终正确，一会儿就接受再教育成阶下囚。

濮阳翔还有其他思想方面的问题，就是文化革命前意识形态文化学术大批判，他写过些文章，“批判”《三家巷》《早春二月》。我使劲地从中找寻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异化精神污染，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真扫兴。那时候，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良心孝顺共和宪政爱情都姓资。不过，人的认知良知隐衷情欲私心，虽然那时还说不上受保护，但也没有被斗私批修，没被抖搂出来。因为副主席还区分小节大节。

濮阳翔的问题抖搂出来，是邻居揭发，听他们两口子吵架时说“我一句检举，告你，你就是反革命”。什么年代，一句言论就罗织罪名？

濮阳翔后来可能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个被整的人会成为狱卒、差役，就是看押管理董连猛。他的工作是陪睡、陪吃、陪喝，但不陪聊、陪斗。夜间看押董连猛，白天替他打饭。董君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刘文珊、都祖尧、郑守钧、黎浩智，原是落后分子，后来得到工军宣器重。我们的毕业鉴定，按照旧规，是党员负责同志负责，这次是都先生起草。阎王簿掌控。

六

凤泉林老师后来成“5·16分子”。整他最凶者，是他的同事老师们。老师中政工出身的人，都有一口秀美口才，政治词汇随时上口，铿锵有力，斩钉截铁，有不容分辩的力量。斗争为纲岁月，人们善于在纲上线上游走。语言无风趣，无文采，但政治思路严谨符合套路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凤泉林在井冈山革委会作战部待过，肯定炮打过领导。时过境迁，多大罪状，全无印迹，只知他被关押时间最长。工作日由群众批斗，节假日由老师同学看管。几十年后的今天，才觉着一个青年女教师看押一个青壮年反革命分子，有多危殆。他有力必多，多年与妻分居，“寡夫”，万一他鼓起了色胆……他分解力必多的办法是转移视线：看报纸。但也看不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只有一份有火药味的人民日报，都是八股，颠来倒去就那几句官腔。凤泉林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横看竖看，倒过来折过来看，正着看反着看，从头至尾又从尾至头，报纸翻烂了，也不见新翻杨柳枝，味同嚼蜡，令人作呕。按说，这也蛮好，削弱了他的攻击欲。

蒋亨俊老师怒斥：“好好思考罪行，别老看报纸。”把报纸收走了。竹筒倒豆子，挤牙膏，别得滑且滑，就是那时候学来的词儿。他几年没回长春探视妻女，妻子久不见到丈夫音讯，便来京探视。在要不要让凤泉林见老婆这有关世界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工宣队和骨干力量争论很久。后来终于让他们夫妻见面，还同居了一个晚上。咱们的老师阶级立场始终坚定。

七

最近围绕杨绛的争论，成一舆论焦点。批评钱杨不过问天下苍生不关注社会，和为之辩护，虽然貌似对立，但均不否认知识分子应有社会担待、傲骨和凛然正气。他们的女儿钱瑗，

我们外语系的老师，“文革”中和我们一样，尽力隐藏自己，保护自己。这没有过错。钱瑗老师的不卷入，毫无疑问是正气，“正能量”。钱瑗老师是好人，“文革”的1968，河南淮河发洪水，我的同学——后来我的妻子——借过钱瑗的钱。她解过燃眉之急。我们感谢她。据说有一位高年级学生借过她的钱，毕业后就“失联”。传闻归传闻，但我更相信那位同学后来肯定还钱了。知识分子民胞物与，不必登高一呼，自投罗网，但也可以发声——牛“哞”地叫一声。钱老师绝不是害怕烧伤手指的人，更不是抡棍挥棒扣帽为虎作伥之人。

1960年春末夏初，北师大举办教改展览。筹办展览的人都是青年教师。搞美术的59届同学中有号称“妖魔鬼怪”的四员：历史系的王德一，人们把“一”念作“yao（妖）”，这便是“妖”；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魔”；生物系一位早有“小鬼”的外号，是“鬼”；外语系的钱瑗是四人中惟一女性，没有绰号，不过既然排行老四，那只好把“怪”字认下来。北师大的路旁和主楼高悬的毛泽东巨幅油画画像，据说出于王德一之手，另外一个画手隋玉梅，北京人，去大庆造过反，学大庆战斗队总负责。清查“5·16”，全校批斗，说她在大庆冒充怀孕，她大声说“造谣”。她后来分配到银川师范，教语文和美术。北师大清查反革命集团“五一六”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钱瑗于1959年毕业留校。1968年初，钱瑗与王德一结婚。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记载：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时，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钱瑗的小名）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王德一之死，历史系的广大教师心中都是非常惋惜的。在他去世之后一年多，他所‘炮打’（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的‘副统帅’即殒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当时大家都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现在倒成了英雄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历史系会多了一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德，得，通假字。天得一以清。德一死后得昭雪。我们历次的讨伐清理运动，有哪一次不是伤及无辜越搅越浊呢？我们能不能汲取应有的教训呢？

章廷桦老师回忆，1960年春节前后，钱瑗邀章廷桦等同学到家做客。钱钟书先生也出来帮女儿待客。钱老得知章廷桦是江阴人，高兴地说：“哎唷，巧啦，我是无锡人，我们是同乡嘛！解放前苏南人有个说法：江阴强盗无锡贼，盗与贼是一家子嘛！”接着他谈到北师大英语教授郑儒箴先生同他一起翻译《毛选》，说郑教授工作认真，笔译极好。1997年3月4日，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钱瑗教授病逝，终年59岁。她是钱钟书和杨绛的独女。

八

我们那位从未亲聆警咳的老校长陈垣，史学家，毛泽东称其为“国宝”。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只有陈垣与王国维才称得上“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傅斯年说过，“静庵先生（指王国维）驰誉海东于前，（陈垣）先生鹰扬河朔于后。”日本汉学权威桑原鹭藏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出版后，很快发表评论，称陈垣是现在中国历史学者中“犹为有价值之学者”。陈寅恪的学生戴家祥回忆：陈师和我在校散步时，自称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静庵（王国维）先生，其次是陈垣。1949年他在国共之间选择了后者，婉拒蒋介石和老友胡适的

赴台邀请，而是留在大陆当了多年的大学校长。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三次派飞机到围城中的北平，要接陈垣和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南下，陈垣拒绝了。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年近古稀的陈垣在学生的陪同下，从兴化寺街5号步行到西直门迎接解放军，迎接解放。

“文革”前他每年两次来师大和大家见面：开学典礼的和毕业典礼。他在“文革”岁月也心惊肉跳。但“文革”中谁也没有想到拿批斗他来显山露水。倒是他的下属历史系一位老师施建中受到牵连。有一张陈垣几代学人五世同堂的照片被公开，算是捎带涉及陈垣。（施建中，1940年3月生，江苏无锡人。1959考入北师大历史系，1962年北师大校庆60周年时被推选与陈垣校长、白寿彝主任、杨钊先生、杨子坤先生合影，即，五世同堂照片）但我后来知道，陈垣的亲炙弟子并未留校，其弟子散布在全国各地。好像北师大历史系不是某个姓氏的天下——现如今大学留校的是亲属和弟子，以建立学派。但陈垣没有自己的家丁兵团。。

“文革”正盛的1971年6月25日陈垣寿终，终年91岁。他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全部交公。剩下的不值钱的书籍遗留在北师大图书馆一楼大厅。1971年夏，我翻检淘金，有语文课本，内有古文，我爱读。有一位国民党旧军官解甲归田，写了一册幻想乌托邦的小书，我拿了。

“文革”中，陈垣家人写过两封信，一封给周恩来，一封给康生，说他整天惴惴不安、闷闷不乐，对形势的发展陌生、担忧，又不理解，只能保持沉默。

九

北师大在整肃名义下走投无路的还大有人在。整肃，斗争哲学，精于此道者大有人在。井冈山革委会在遭遇清剿之前就把同伙“造反兵团”打成小爬虫。我的朋友郑艳芬，同班同学讨伐的大字报题目是“拉开序幕看好戏，蛛丝马迹追顽敌”。井冈山革委会整人不遗余力，然后就轮到他们自己上耻辱的十字架。清查“5·16”，这是师大历时最长，也最催逼人的运动，最惨烈，最无情，但也最不可思议：基层教师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大积极撰文回忆这一段历史。

顺便说一说闹剧中的平静。1967年10月14日，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北师大是“文革”时期造反派活跃的中心之一，复课闹革命任务更加艰巨。11月3日起该校提出教改方案。要求废除现行考试制度，新的考试方法，必须突出政治，着重考察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校要面向工农兵开门办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招收又红又专的青少年进入高等学校。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就这么来的。我和雷天生、刘来牛等奉命去通县一个村子征求贫下中农意见，和农民朋友住一个炕上，好像什么收获也没有。1967年冬复课闹革命，刘宝英老师给我们讲授英语的两报一刊社论以及英语老三篇，就在北师大中北楼302女生宿舍。教材是钱瑗、严伯森老师编写，他们添加生词注释和短语解释。朗读者为大郭。北师大的老师，外国归来的，汉语说得不流畅。比如严伯森，不知道“浩浩荡荡”神马意思，说，“我们三个从天安门浩浩荡荡走回来”，大家哄笑。

安希孟，男，1945年生于山西翼城县，1965年入北师大外文系，1972年分配至银川十一中任教师。1982年南京大学哲学硕士毕业，专业宗教学。现为山西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

拿捏旧伤，回首冰霜路

——从被囚到平反

蔡鸣乔

一、北师大4·26事件

1. 我们被抓到了怀柔

1971年4月25日，星期天，半夜时分，师大校园内安谧肃静，人们都已经入睡。忽然，在校园南端的中南楼爆发出猛烈的打砸声，顿时人声鼎沸。我当时住在一楼东头的一间宿舍，被惊醒后开门出来只见楼道灯不亮，在黑暗中许多手电光到处乱晃。校宣传队的人带着数百名军警正从各个房间里往外拖人。楼道里一片混乱。到处是叫骂声、打砸声、手提电扬声器的指挥声。我刚问了一句：“怎么回事？”一名手中拿着一张纸的宣传队员用手电对我一照，大喝一声：“抓走！”顿时上来三名军警，一人揪住头发按头，两人一边一个拧着胳膊往楼道外拖。我本能地挣扎叫喊：“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回答我的是一顿拳打脚踢，当即右眼被打得青紫，腰被踢伤。

在拖到楼外的路上，我被压低着头，只见地下散落着一些衣物，不知谁的一条蓝色衬裤从眼前掠过。从楼里抓出的人被押到中南楼东侧的11楼前，一律低头弯腰喷气式。然后在统一指挥下，不走校门，被押着从11楼西侧、中南楼南侧的校园围墙豁口处拖到校外的学院南路上。学院南路上已经停了十几辆各种汽车，我被押上了一辆大客车，坐在最后一排，身边一边一个军警。与我同一辆车的有十几个同学，和我一样，都是两三个军警押一个。

车在路上走了大约三四个小时，等到地方时天已经亮了。车队开进一处兵营，下车以后集中在院子里等待。这时有一同抓来的北京籍学校工友，认出了周围的山势环境，说：“可能是怀柔。”

据说当时抓来的大约有110人左右，后来发现有一些人不在名单上，于是放了一些人回学校。放走一些以后，还有70几人。被抓的大部分是住在中南楼的各系男生，也有一些是从中北楼抓来的女生，还有从家中抓来的学校工友。大部分衣衫不整，有的是从被窝里拖出来的。后来听说还有一些人是4月26日以后抓来的，也有一些陆续放回去的，抓抓放放，在怀柔最后关着的人数大体维持70人左右。

这些人被押到七八个临时监房内，每个房间七八人、十几人不等。没有床，在地上放了一些木板。被抓的人情绪都很激动，纷纷质问为什么抓人，无人理睬，大家决定绝食抗议。这时有几位军人来动员大家进食，同时送来开水，但无人听从劝告吃饭。绝食持续了两三天。这时开始将我们一个个带离，一部分单独隔离，一部分两三个人关在一间屋里。

2. 对我宣布隔离审查

我被单独关在一间临时监房内，窗户关着，从外面糊上了报纸，天花板上有一盏小瓦数灯泡，被吊得很高，有一张木板床。门外有两个士兵站岗，要上厕所须敲门，来回由一名士兵押着。从抓到怀柔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没有看到师大宣传队的人出现。开始几天无人理睬，没有放风时间，也没有任何书和报纸可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看着从窗上报纸缝隙里射到墙上的阳光，看着那一丝阳光一点点地移动。

后来来了三个军队干部，两男一女，一位姓焦的副连长，一位年轻的姓张的男同志 and 另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也姓张。还有一位戴眼镜的50多岁的老头，也姓张，好像是个领导，有时候也来。开始带着我学习，动员平山头、批派性，态度还算和蔼，我也甚是配合。我问他们为什么抓人，他们说：“前两天（4月23日）‘五·一’大清查，你们阻挠破坏大清查。”

（那个年代里每到节假日之前，北京市都要到每家每户清查户口，以防阶级敌人破坏，听说4月23日晚清查时有个别宿舍的学生和工宣队的人发生了争吵）。我说：“4月23日晚，工宣队敲我们宿舍的门，我很快就开门了，工宣队师傅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怎么破坏清查了？”那位年龄大的老军人说：“现在态度顽固的就是你们这些似乎与4.23的事关系不大的人。”

大约到六月下旬，调子慢慢变了，说我有问题，要老实交代。直到7月26日，师大军宣队一个叫雷炳的出现了，才宣布对我“隔离审查”。我说：“不是早就隔离了吗？”雷炳极为凶狠地说：“你的问题很严重，是现行反革命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这时开始，他们给我换了一间囚室，除了门口有两个战士看守外，窗外还有一个流动哨，日夜监视，晚上不许熄灯。

此后，雷炳平均每星期能来一次，雷炳说：“你们口口声声把自己打扮成反对5·16的英雄，你们自己就是5·16！”我说：“5·16是矛头指向周总理[1][2]的阴谋集团，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卫周总理。我不是5·16，你不要搅浑水！”雷炳说：“江青[3]同志说了，5·16不仅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也指向‘中央文革’。只要有行动，没参加5·16组织也是5·16！”并且厉声地说：“你老实一点！不老实，把你拉回学校见群众，给你加加温！”他们要我交代所谓怀疑康生[4]的问题，后来又上纲要揪反革命小集团，要我供认有纲领、有计划、有黑线，说：“刘××都交代了。”我说：“他交代了是他的，我不知道！”七、八两个月一直逼得很凶，白天晚上不让好好睡觉。我对他们说：“我怀疑康生的问题，不是什么秘密。在1968年宣传队进校时我就把有关情况向工宣队师傅说了，许多同学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要我写交代材料。室内没有桌椅，只给一个马扎，写材料坐在马扎上趴在床沿写。我怀疑康生的问题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写着写着就没得可写了，雷炳就说：“态度不老实，挤牙膏！”我拿定主意，要我瞎编，我编不出来，没那个想象力。再说，别人瞎编，我也瞎编，也对不上茬呀，什么时候是个完？一天天熬着，时间长了，也许他们觉得我这管牙膏挤得差不多了，就不怎么来了。

3. 我在怀柔“学习班”的“幸福生活”

“文革”期间从1966届到70届的大学生，统称为“老五届”。1968年宣传队进校前后，1966、1967、1968届陆续分配离校。本来到1970年最后两届都应当离校，但1970年初却来了一个文件，北师大69、70两届学生暂缓分配，留校搞运动，工资按毕业生发放。听说，北京当时还有外语学院（现外国语大学）也照此办理，为什么单留着这两所院校的两届学生，不得而知。

我被抓到怀柔，心中放不下的是在南方的老母亲，在这之前每月都要按月给她老人家写信寄钱，忽然失去联系，怕她老人家担心。再一个放心不下的是我的恋人、同班同学苗致平，“4.26”那天晚上她回北京的家了，第二天回校后发现我被抓走了一定很着急。后来解放军说你可以写信，但要经过我们审查。我给苗致平写了一个条子，让她替我每月给母亲寄钱，同时代我给她老人家写信。从此经常收到她通过宣传队和“学习班”转来的信、钱和衣物，每当收到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像过节一样幸福！有时候，我也写一个条子让捎给她，因为既不能说案情，又不能说我的处境和心情，条子写得很短也很少，只能反复说我很好，让她不要担心。

从留存至今的来往书信看，五六月份她来信内容还比较正常。5月18日、6月14日、6月23日、7月14日她的来信都是告知：“你在那里好好学习，我这儿一切都好，你勿念！”“妈妈的钱已经寄去了，我给二嫂（当时我母亲在上海我二嫂处）写了信，家里很好，勿念！”“你需要什么东西，来信告诉我，你走的时候，线裤扔在那里是脏的，我给你洗了。”

7、8月份我给她写信很少，她急坏了。其中8月26日、8月28日、8月31日连续来了三封信，一个劲地问：“没接到你的来信，你还好吗？”“你箱子里的东西也不知道动没动过，我怕里面的衣物发霉了想拿出来晒一晒。工宣队师傅说我动你的东西必须经过你的允许。”（实际上我的箱子早就被撬了）。“你说要我不要挂念你，这是不可能的！”“国庆节我想给你买块手表，我妈说，钱和工业卷（那时买很多东西须凭工业卷，工业卷数量依据工资数按比例发放）不够先从家里拿。”“盼回信！”“请回信！速回信！”字里行间委婉地传达着她不离不弃的态度和对我的担忧。

天冷了，她给我送来了棉衣。每次送来衣物等，我本能地要里外翻翻，盼着能有什么没通过检查的消息，这一次自然也细细地翻检一通，仍然没有什么发现。直到第二年我从隔离室中放出来后，才知道她真的在那件棉衣的袖子里缝入了一块小布条（见图），布条上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道：“切记，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乱承认，不要乱上纲。对中央同志是坚信；是有的事不理解、议论过、怀疑过；是专门调查、还是在调查别的事时涉及到。一定要按当时的情况，严格地划清界限。头脑要清醒，不要摇摆，心里有鬼的才心虚。心要放宽，一定要想的远些。”这些书信和这块小布条，我珍藏至今。

9月底以前对我的看管比较紧，9月底，忽然感到比以前松多了。10月5日，负责我的两位姓张的军人找我谈话：“你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怀疑康生，主要是因为和谭厚兰[5]对立。认为康生是谭厚兰的后台嘛。”那些天，还可以每天由看守的战士跟着到外面散散步、放会儿风。时间长了，和小战士也混熟了，大概他们也看我不像个“反革命”，干部不在时，也和我聊聊天。有一位胖胖的、时常满头大汗的小战士与我关系甚好。有一天他偷偷地告诉我说：“林彪叛国，摔死在蒙古！”我听后很吃惊，联想到近来“学习班”的形势急转直下，又高兴起来，以为很快就要放了我们了。没想到，11月7日怀柔“学习班”撤销以后，大多数同学都回了班、系，我却被拉回师大继续单独隔离，直到1972年3月8日分配离校之前才获得自由，共计被关押319天。

二、4·26事件的背景

1. 宣传队进校初期的师大基本形势

1968年8月，宣传队进驻师大以后，在我的印象中，不管是哪一派的群众都基本回了班、系，接受宣传队的领导，参加所谓的“斗、批、改”。我本人从1968年秋到1970年初，近两

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班级活动。

这两年时间，宣传队在师大主抓的大事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给我记忆很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有一次，驻我班的工宣队Y师傅对学生说：“物理楼看门的老头我看就是特务！我悄悄地跟在他后面观察过，他那条瘸腿是装的，有人的时候就瘸，没人的时候就不瘸！”另一件事就是批斗马本堃教授。马教授被人举报把《毛主席论教育文选》改成“天主教文选”，这是“极其恶毒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还专门组织全系师生观看了反革命证据：在一本《毛主席论教育文选》封面上放了一块特殊的光学玻璃片，透过玻璃片可以模模糊糊看到封面上有用红蓝铅笔画的左一道、右一道。据马教授交代，是大人没注意，被不懂事的小孩子画的，他发现后，就用橡皮擦了，可能擦得不够干净，被人举报了，于是三天两头地批斗。有一次批斗时，马教授不肯承认是有意的反革命行为，Y师傅在我身后一声暴喝：“你他妈还讲不讲理！！”吓得我一激灵，只见前排几个同学冲上去，动手打了马教授，马教授蹲在地上抱头哀哀直叫！

1968年秋，因为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离校，有很多宿舍楼逐渐空置了，有一些同学不愿意在原来的宿舍挤着，陆陆续续自行跑到空置的楼里去住，也没有人强行干涉，其中中南楼就是这样的情况。到1971年的“4·26事件”发生时，中南楼所住的学生很杂，除了有原来“井冈山造反兵团”[6]的人（其中就有原“兵团”的几个头头如方××等），也有所谓的“逍遥派”，还有宣传队依靠的所谓“一支力量”。这些人，大多数白天回班系参加活动，晚上回到中南楼睡觉。例如我班的孙××同学就是这样，他自己一个人在二楼占了一间宿舍，天天晚上焊收音机玩到半夜。

我从未参加过“造反兵团”，对“兵团”的那几个头头，也是我知道他，他不认识我。所以在怀柔头一个多月他们要求平山头、批派性时，我说：“我没有山头，我只是一个对宣传队在‘批清’运动中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群众！”

2. 吊诡的“批清”运动

宣传队在师大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简称“批清”。

“5·16”本来是出现在1967年春夏之际的一个小小的组织，号称“5·16兵团”，他们的矛头所向非常明确，就是指向周恩来。当时在北师大、学部和一些其他地方，一夜之间贴了许多周的大字报、大标语。但很快就被群众镇压下去了，相关的人员，抓的抓、斗的斗、跑的跑。

周恩来在1967年9月18日对外交部讲话中说：“对5·16问题，第一不要把5·16问题扩大化，到处抓5·16，不要把5·16和很多组织都联系起来，与5·16有关的人是很少的，哪有那么多的5·16呀！”

1967年9月1日中央领导出席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江青说：“5·16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不仅把矛头指向总理，还指向康老、伯达[7]和我”。康生说：“5·16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推翻毛主席司令部。”

从上面的几段讲话，不难看出，周恩来认为“5·16”是很少的。而江、康等人的意图很明确，即“不仅反周是5·16，反对我们的也都是5·16”。

吊诡的是，自从1968年以后，已经不怎么提“5·16”了，却在1970年左右从上到下又掀起一股“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的运动。1970年1月24日林彪[8]、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

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要彻底清查“5·16”。黄永胜[9]也在会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5·16”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

3. 宣传队把部分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从一开始，师大宣传队就提出“抓5·16和其他反革命”的口号，后来干脆喊：“（师大是）黑手两边插，5·16两边抓！”所以，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蓄意要扩大化，把矛头指向群众，包括指向谭厚兰对立面的群众。

从根源上清查谭厚兰等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极左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能说清楚砸孔庙是对是错吗？敢批判谭厚兰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问题吗？众所周知，谭的这些所作所为都是在她后面的那条黑线操纵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谭也是被人利用的牺牲品。谭的身后有一条黑线，这在师大尽人皆知，直接操纵她的就是《红旗》杂志编委林杰。康生1966年7月27日在北师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当众宣布：“还有人讲林杰同志有后台，后台是谁呢？后台是关锋，这里边有一条线索说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是我！你们来审查审查，我们算不算黑帮？算不算黑线？”

1967年8月底关锋、林杰[10]倒台了，谭居然在9月1日召开大会，宣称要与革命左派林杰站在一起（附录14），甚至派革委会副主任董××率众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以示声援（上图照片即为某次“革命行动”之前集合队伍的情景）。正因为有后台，在1967年8月底以前，谭厚兰一直是顺风顺水。今天出一个《在北师大的军训团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经验，登在两报上，明天谢富治[11]又跑到师大开一个“大批判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北京的高校中，谭的对立面是最弱小的，这不是因为她正确，而是她始终受到那条黑线的百般呵护。

所以，在1970年前后开始的“批清”运动中，长期站在谭的对立面的、受那条黑线打压的群众总认为宣传队的“批清”是在“假批判，真包庇”，是在“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一厢情愿地期盼在批谭的过程中能彻底揪出她身后的那条黑线，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这种期盼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也是因为这种幼稚，这些人有时会做出许多不为旁人理解的“蠢事”！

宣传队也许不了解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人不听话，干扰他们执行上面制定的“大方向”。所以千方百计要把矛头指向这批人，要在这些人里面“抓坏人、抓反革命”，最后干脆硬要给这些人扣上“5·16”的帽子，因为江、康等中央领导说了嘛：“反对我们也是5·16！”这就不可避免地把这些持不同意见的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4·26”事件。

三、初入“校办监狱”

1. 我住进了师大革委会修建的“校办监狱”

1971年11月7日，我被押送回师大，关在11楼二层西头的一间房间里，看守换成了师大学生，都是物理系64级的同学。三个人（有时两个）白天晚上和我住在一间屋里，厕所在楼道里，上厕所由一个人跟着，吃饭他们上饭厅替我打来。从此不让出去，也没有放风时间。开始的一个多星期关在这里，也许是专案交接工作还没做完，这一个多星期里很少审问。这座楼“文革”前是留学生宿舍楼，“文革”开始以后，外国留学生陆续回国，这座楼就空了下来。谭厚兰成立师大革委会以后，把11楼的一部分改造成了“校办监狱”，专门关押他们抓捕、绑架的师生，楼道里用拇指粗的钢筋焊了铁栅栏，栅栏上有一个铁栅栏门，锁上以后人就出不去了。到我住进来时，楼内的人很少，一天到晚楼内静悄悄的，偶尔听到铁栅栏门的咣当声。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座“校办监狱”。有一年革委会突然宣布揪出了一个“尚文廉反党集团”，都是历史系学生，具体的情况不清楚。我在历史系64级有一个好朋友叫李万庆，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瞎扯。有一天中午，他正在饭厅吃饭，忽然冲进来一群打手，将一只人造革的空提包望他头上一套，扭着胳膊就把人抓走了。拉到一辆车上转了半天才到地方，用铁丝捆上他的手脚，扔到一个房间里才拿去头上的提包，李万庆仔细一看，这不是11楼吗！审问他与“尚文廉反党集团”的关系，万庆是个老实人，平时说话都磕磕巴巴，哪见过这个阵势？至于和“尚文廉反党集团”的关系，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交代不出来就打。那时候，谭厚兰手下有一批打手，大部分都是体育系的男生，一个个膀大腰粗，一身蛮力。最出名的是两个：一个外号叫“黑狗熊”，一个外号叫“白狗熊”，这两个家伙打人最狠、最多。这些打手手持胳膊粗的木楞、镐把没头没脑对万庆一顿暴打，打得他死去活来，浑身是血。打完了再用烟头烧，烧烂了他一片胸脯！

就这样天天拷打、烟头烧，万庆实在是受不了了。有一天，他对看守说，我身上都烂了，衣服上都是血，让我去水房洗洗衣服吧？看守同意了，万庆进了水房，趁看守没注意，跳到水池上，撞破了纱窗跳楼自杀！万幸的是，他跳下来的楼层不高（好像是二楼或三楼），正好窗下有一丛丁香花树，他掉在这棵丁香树上，只是腰部摔伤了，命保住了。

关了一段时间，实在查不出问题，后来就把他放了。万庆放出来后有一天中午到我们宿舍找我，向我诉说他在“校办监狱”遭的罪，脱下衣服让我看胸前被烟头烧的一片疤痕，那疤痕的面积足有一本书的大小。一个大男人，边说边哭，我又难过、又愤怒！宿舍里其他同学一声不吭，静静地听他一个人哭诉。

这件事使我更坚决地站到了反对谭厚兰的立场上，我绝不认同这个残暴的革委会！

还有一件事对我的刺激也很大。1967年夏季，革委会在大操场召开批斗彭德怀、罗瑞卿[12]大会。我因为好奇，挤到会场最前面紧靠主席台的位置看热闹。只见两个军人扭着彭德怀的胳膊，把他押到会场，彭剃了个大光头，没法揪头发，这两名军人一人一只拧他的耳朵，用力很大，把耳根都撕裂了，鲜血顺着彭老总的脸颊往下流。彭老总疼得大声吼叫：“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要这样！”

批斗罗瑞卿的时候，是几个军人用一只竹筐把他抬上来的。罗的一条腿打着石膏，据说是跳楼时摔断了，不能站立。有人就找来一只三脚圆凳，又不让他好好坐在凳子上，把凳子翻过来要他坐在凳子腿上。还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幻灯机，打出一束蓝光照在他的脸上。

我在台下看到这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钻出人群悄悄地离开了会场。

2. 我的反对康生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9.7事件[13]以后，快到年底的时候，中文系张××、物理系张××等人牵头，串联了全校13个系、部，63个井冈山公社内的“战斗队”，商量着要起草一份《关于北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附录16）。当时联络了十几个人，在主楼的一间屋子里开了若干次会，讨论起草声明内容，张××让我去参与了讨论。最后《声明》起草完了，有人说，咱们最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来发表这个《声明》才好，商量的结果说就叫“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吧。1967年12月，《联合声明》在“兵团”广播站播出，播音员是一个被一些人骂作“喇叭虫”的刘××，这只“喇叭虫”中气十足、字正腔圆，把这篇包含4个大问题、共计1万2千字的声明播得高屋建瓴、大气磅礴。

用今天的眼光看那篇《联合声明》，它并没有脱离“文革”语境的窠臼，但在《声明》的最后喊出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井冈山公社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革命战

友联合起来！”的口号，在当时全校许多厌恶派性斗争，主张联合的中间群众中确实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师大“海派”的由来。其实据我所知，所谓63个“战斗队”，有不少也就一两个人。“大海编辑部”后来还写过一个声明，但没有太大的影响。声明发完了也就散伙了，并不是一个群众组织，但“海派”的主张和思想却深入人心，后来凡是持主张联合、反对一派打压一派观点的群众，都把自己看成是“大海”一派的。

也就是在这个“大海编辑部”，我认识了中文系的几位教师，他们是一个叫“井冈怒骑”战斗队的成员。此后，我时常去这些老师家玩，他们当时正在调查原中文系的党总支负责人、校革委会常委李××，认为李××经历复杂、想查一查她有没有问题。这个调查组主要在黄××老师家活动。1月底，他们说李××是河南人，提供了很多线索，准备派人去河南外调，于是由黄××老师捐了90元钱，物理系62级的学生林××、杨××分别捐了40元和30元钱，于1968年1月26日派我和物理系62级的林××、袁××三个学生去李××的老家河南外调（其中袁××较早退出调查）。

1967年夏，据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有一个叫吴传启的人贴周恩来大字报，遭到群众反击后逃到了河南。我和林××在河南南阳汉剧团有一个调查线索，找一个叫张晓钟的人了解一些情况。这个张晓钟见人自来熟，特别能侃。说着说着就说起了吴传启，他说，吴是他的表弟，前些时还来他这儿住了一些日子。他问吴怎么来了，吴说，我贴了周总理的大字报，有人要抓我，曹大姐叫我出来躲一躲。他问吴：“曹大姐是谁？”吴答：“是康老的爱人。”

那天好像是他们单位管盖章的人没在，天也晚了，我们就说，明天我们先去别处，你把我们今天找你调查的情况写一下，让单位盖个章，过几天再来拿你写的材料吧。等过几天我们去取回材料后才发现，这家伙把关于吴传启的那一段话也写上了，这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南阳，160元钱三个人在外面跑1个多月经费十分紧张，也不能为这么个材料回去找他重写。

那一个多月，每天只能吃一两毛钱的饭，河南有一种发面的大饼，一顿饭只买一小牙充饥，后来没钱坐车就步行。我是3月10日回到北京的，这时候我的棉鞋底后跟都磨穿了，撕了一块旧毛巾垫着脚后跟回到学校。

这份涉及康生和曹轶欧的材料，拿回学校后谁也没有说什么。宣传队进校以后，1968年11月6日，连同其他的调查材料都交给了宣传队，12月26日黄老师让我给宣传队写一份报销申请（如图为申请底稿），宣传队还把黄老师、林、杨三人垫的调查经费报销了。

就是这样一件事，后来竟成了宣传队整我的“主要罪状”。说实在话，在师大那个环境里，谁听到张晓钟说的那件事，都会有些想法。但我至今后悔的是，回校后对同班的三两个人说了，因为大家观点相同，平时在一起无话不说。我说：“康生如果不支持人炮打周恩来，为什么要给吴传启通风报信？”

事情在1968年4月8日发生了激变，那一天物理系赵亮坚先生和他的夫人突然双双触电自杀。赵先生“文革”前给我们上《普通物理》课，对我们班的学生一直视如兄弟子侄，关系非常好，运动中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活动，所以观点上自然也差不多，接近“大海”的观点。谭厚兰的革委会为了整治这些人，就借清理阶级队伍为名，造舆论说赵先生是美国特务（赵是旧辅仁毕业，与王光美是前后届的校友），准备办他的“学习班”。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自尊心强，不肯承受这样的侮辱，在办“学习班”的头一天自杀了。这件事对我们班震动很大，有一位同学很紧张，认为我们一切都错了，这回让革委会抓到把柄了，于是跑到系革委会主任段××那里揭发了我“怀疑康生的问题”，以示与我们决裂。段××立即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当时的情况下，这可是了不得的“反革命罪”。去河南外调，无限上纲

说你是“专门去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也有口难辨。我当时又急又气，一股火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后来我借口养病跑回了南方老家，暂时躲开了这块是非之地。等我从南方回校后，宣传队已经进校。在抓到怀柔之前，从来没有人再对我提起这件事。

3. 一次不顾一切的冒险

如果有人问我，长时间单独隔离关押，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告诉他：孤独、惶恐、渴望向自己的亲人、朋友倾诉。

从4月26日关到11月中旬，已经半年了，身边没有一个真心善待你的人，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也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会落得个什么下场。真想向亲人倾诉自己的心情和处境，真想知道是否因为我的问题连累了他们。

在11楼里关押的那几天里，我注意观察了一番，发现虽然环境很压抑，但也许是正在交接过程，看守并不太严。夜里自己到楼道里去上厕所，看守我的同学睡自己的大觉，没人起来跟着。有一天半夜我在厕所里待了半个小时，回去没有反应。而且我还发现，走廊里通向外面的铁栅栏门有时会忘了上锁。

11月中旬，我听看守的同学之间交谈，好像要把我转移到西北楼学生宿舍继续隔离，担心到那儿以后人多眼杂，与外界联系更困难了。就在那几天偷偷地给苗致平写了一封长信，向她叙述了我的思念和担忧，介绍了半年来我的真实情况，贴了一张在怀柔时托小战士为我买的4分邮票，怕寄到师大被人截了，信封上写的是致平家里的地址，收信人写的是她母亲的名字。11月14日后半夜，趁看守都睡熟了，我外面套上大衣，下身只穿了一条单秋裤，不顾一切地跑到了楼下。不敢在校内邮箱投寄，从南校门跑到了校外，在经过门卫时，幸亏无人盘查。我跑步到小西天附近的一个邮筒投出了这封信，又跑步回到学校，回到11楼监室内，也不知道一共用了多长时间，看守们还在睡觉，没人发现我出去过。

这封信她母亲收到了，老人看后把信交给了她的女儿，不但没有责怪女儿，反而嘱咐女儿要善待我这个“反革命”，要等我出来。几个月后我出来了，去看她老人家，言谈之中我对同时被抓的另一位同学没有实事求是、乱招供的事略有怨言，这位睿智、慈祥的老人轻轻地说了一句：“嗨，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逼那孩子的呐！”

四、那一道道苦辣酸甜，怎一个“忘”字了得？

1. 打态度

11月16日，我被转移到西北楼三楼的325房间（南面从中间往西数第三间），继续单独隔离，还是两三位看守与我同住一屋。我不知道为什么继续关着我，我怀疑康生的事都说了，再说也是那些东西。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是军宣队一位姓杨的排长，杨排长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希望你起来革命，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划清界限，不要上坏人的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叫我揭发张××，据我所知，他也就是和我一起怀疑过康生，别的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事你叫我说什么？

见我一直不开窍，杨排长很生气。有一天上厕所小便，进去时他已经在里面，见我进去了，他尿完了不走，盯着我看。他这一盯着看我，我就紧张，半天尿不出来。这时杨排长愤怒了，从后面推我一下，说：“你尿哇，你怎么不尿了？”我的脸突然磕在墙上，压抑半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转过身和他大吵起来。我说：“你们想干什么？我有多大问题？你们这样对我！！”大概看我的样子太疯狂了，他的态度一下子缓和下来，说，“你先回屋，我们

再和你谈！”

第二天专案组十几位全体成员在三楼中间的大房间里开会，对我“打态度”，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全体专案人员。在一张大会议桌旁，我坐在一端，杨排长坐在另一端，其他的人围坐在桌子周围。我看到，这些专案组成员中，只有两位是我同班同学，其他基本都是64级的学生。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言，大意都是要我端正态度，交代问题。说实在的，别人说什么我都没往心里去，他们说什么都伤不着我，但我在意同班同学，毕竟一个班六七年了，总有一些同窗之情。让我感动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我班的一位女同学，她坐在一个角落里，垂着眼睑，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她当时的形象让我永远忘不掉，在我倒霉的时候她不肯对我落井下石，我感激她！

2. 好汉张道经

搬到学生宿舍关着，虽然只能在上厕所和洗漱时由看守跟着去，但在楼道里还是会遇到熟悉的同学，通常他们看见我都装着没看见。到西北楼的第二天去水房洗碗，刚一进去，就迎面遇到64级的武××，他也是曾被抓到怀柔的人之一，原来我们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一见他，情不自禁“哎”了一声想和他打招呼，只见他急速地轻轻地摇了摇头，把眼睛转向别处，迅速从我身边出了水房。

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11月底的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我刚在厕所里蹲下，只见急匆匆进来一条大汉，见到我一愣，回头看了一眼，看守我的同学没进来，迅速地凑近我悄悄地地说：“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我喜出望外，小声说：“明天还这个时间，我在这里等你！”从此，通过他我与外面有了一条联系的秘密通道，每过几天，他就替我传递一回书信。

他就是张道经，一位典型的山东好汉。说来也是缘分，道经是我入师大认识的第一位同学。1965年8月26日他和我同一天到北京，同一时刻到师大东门的新生接待站，都是物理系的新生。我背着一顶江西草帽，他背着一顶山东草帽，我俩一同从学校东门走到西南楼。他热情万分地对我叽叽呱呱说了一路，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山东话，他那口淄博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就这样，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虽然不同班，却比许多同班同学关系还要密切。这主要是因为道经是一个豪侠仗义、敢于担当的汉子，与他交朋友让人放心。

在“十二月黑风”中，他们班的C××因贴了“反革命大字报”，成了抓捕对象，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连夜买了车票将C××秘密送上火车逃回老家躲过一劫。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分配他负责检查收到的举报信。有一天，道经发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电子专业的×××老师做学生时在57年“反右”期间有所谓的“右派言论”，信中言之凿凿，有时间、地点、在场人名。他当时就愣住了，心想这封信只要进入宣传队的视野，必定会进入“清队”审查程序，那位老师就惨了。想到此，道经悄悄地把那封信藏了起来，晚上到那位被举报的老师家把那封信给他看了，那位老师脸都白了，然后道经当着那位老师的面把信扔到煤炉中烧了。事后道经说，这事过后他也后怕，之所以要给那位老师看看这封信，是怕万一那位举报人再次举报，好让被举报的老师有个思想准备。

我这一生结交了不少朋友，道经是我最难忘的一个，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勇敢地伸出手，帮我度过那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在撰写这篇回忆录时，我问他当时为我传递书信是否害怕过，他说：“没有害怕过，当时只是觉得兄弟有难理应相帮！”

3. 笼中书简

在怀柔时，可以通过“学习班”的解放军和师大宣传队与外面通信、寄钱，外面也可以向里面送信、送东西。回到师大后，与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被宣传队切断。有一次，我把在怀柔苗致平给我送衣物的包袱皮请他们还给她，都招来了一通审问：“为什么要把包袱皮给她？那以前是包什么用的？”疑神疑鬼、十分可笑，所以为了不给她找麻烦我也不再通过宣传队和她联系了。她求宣传队给我送过三封信和其他物品，除了一件棉衣全部被宣传队扣留，到最后也没人交代这些信和物品到哪里去了。

致平知道我关在西北楼以后，有时候故意跑到325室的对面串门，对面住着一位她认识的女同学刘××，进来出去大声说话，让我听见，但专案组不让我们见面，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那种思念更加强烈。12月18日，我让道经传了一封信给她，信中说：“我身边连你的照片都没能带上一张，‘4.26’那天晚上我上衣没穿，就被抓走了，你的照片在我上衣口袋的夹子里，前些天我向他们要那个夹子，他们没给我，他们是不会给我的。如果你同意，就让他（道经）带一张你的照片给我吧。”

第二天，道经给我带来了一张照片（见上图），照片夹在一张字条中。这张照片是我们俩在“4.26”前一周的1971年4月18日照的，地点颐和园后湖，上海牌120相机自拍。那是一个星期天，这里幽静安宁，背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我们俩坐在一颗横在水边的树干上，年轻的脸上笑容粲然有如周围的春光，完全感觉不到灾难的逼近。这张照片成了我们终身的纪念，它见证了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见证了我们不平凡的感情历程！此后，只要有机会去颐和园，我们一定要去当年拍照的地方，照一张和当年的角度相同的合影。

从保留下来的这个阶段的书信看，回师大后12月底以前一直还是逼我交代问题。我在给致平的信中通报了他们安在我头上的罪名，对怀疑康生问题非要我承认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收集黑材料。11月24日我的信中说：“今天下午找我，说我还有重要问题没有交代。我说，哪些问题没交代能否给我举个例子？他们说：‘李××调查组的问题，就没交代清。’还说：‘师大三大调查组，马建民、刘镛如、李××调查组都是调查康老的！那两个是兵团搞的，李××这个是兵团、大海一起搞的。’看样子是不顾一切要把李××调查组打成黑调查组了。”“我自己有错误我自己承担，想叫我陷害大家是不行的。我没有在组内（指李××调查组）议论过谁，我们在组内也没有讨论过或议论过那份材料中涉及的那件事。”“这件事可能会找你的麻烦，但也不要怕，不管如何也不至于把你怎么样，不管怎样我绝不连累你，只要你平平安安我就放心了！”

她在给我的来信中，一如既往地她说在外面很好，叫我放宽心，要坚持实事求是，同时通报了外面的情况。1月19日我给她的信中说：“我现在就等着他们最后拿出事实来，靠假口供总是不行的，总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但是也有可能到毕业的时候仍然不放我，因为我没有顺着他们的意图乱编，因此借口我的问题没搞清不让我毕业，那样的话我就害了你了！想起这些心里万分难过，五年来我没有给你多少温存，倒给你造成许多痛苦和烦恼，到最后还让你为我吃了这么多的苦，我对不起你！我对你欠下的这笔债永远也偿还不了！我知道你无论如何也和我割不断感情，所以希望你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回师大后，从来没有放风一说，只有一次开全校大会由两名同学跟着，搬张椅子远远地坐在会场后面。长期不见冷空气，又不活动，那一次外出引起了严重的冷空气过敏，手、脸、脖子只要是裸露在外面的地方都起一片片的疙瘩，奇痒不止，这个毛病很多年以后才慢慢痊愈。那一年春节我在囚室中度过，看守我的同学有些也回家了。

春节前，我收到致平节前的最后一封信：“对你学习班的人，由于看管你要影响一些自

己的利益（如回家），心里对你有气，你对他们态度要好，平时少找他们的麻烦，现在这样做有好处。春节到了，你特别要把心放宽，目前一切都是暂时的。王××春节回大连结婚，刘××、隗××也要结婚了，祁已结婚，大圣、老高都回家了，大家都很好，我也还好，你放心。”

这些用各种大小不同、颜色不同的纸张写的信，记录了我在囚笼里的真实情况和思想，也记录了她超常的冷静、坚定和柔情。

4. 渴望自由

现在回想当年的境遇，在西北楼关着的那几个月里，如果没有她不断通过道经送给我的这些密信，我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那几个月，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她不断地叮嘱我“要放宽心”，“要想得远一些”，“要实事求是”，她的嘱咐和柔情，使我顶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坚守住道德良心的底线。在一封信中，她说：“马本堃就是个例子。”马教授不管怎么压、怎么打，就是不承认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

有一天，我在桌子底下捡到一张废纸，好像是专案组哪位同学写信时扯下的废纸，上面有几行字，其中有这样几句：“目前工作进展不是很顺利，估计要解决问题还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领导也不急于结案。”看到这个，我心里十分烦躁。1972年1月14日我给致平的一封信中说：“从12月份到现在又接连好几个星期没有找我，也不布置学习内容，成天不理不睬地呆着，每天我自己在宿舍看书。我不抱什么幻想，可能就是要这样一直关下去，短时间内是不会放我出去的。道经下月要回家，你要有什么事在他回家之前告诉我，他回家期间我就不能和你联系了。我回来后就收到你送来的棉衣，别的什么也没收到。望你也多加小心。我一定会实事求是，现在我根本就没没什么可谈的了！”2月4日我给她的信中说：“我心里有些难受，这一阵主要是春节到了的缘故。到三四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还会难受一阵的，到六月份要不放我还会难受。我真渴望自由！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求他们或胡说一气，都是没有用的，我不会去干那些没有用的事。”

就这样咬牙坚持，整个一、二月份就这样相持着。那一年的春节是2月15日，春节过后不到一个月，1972年3月8日，终于宣布对我结束隔离审查，我部分恢复了自由，回班级“接受群众监督”。

五、“记一笔，让他老实一辈子！”

1. 劫后重逢

1972年3月8日，我结束了319天被囚禁的生活。出了囚室我才知道致平早就病了，诊断为肝炎，在校医院住院。我到服务楼商店买了一斤白糖赶紧去了医院。

她住在医院二楼的一间病房里，脸色苍白，躺在那里。近一年没见面了，见面了我却不知说什么好。她见我的第一句话却说：“你受苦了！”我们相拥而泣，诉说分别后对彼此的牵挂和思念。我感谢她近一年来按月给我母亲寄钱、写信，免去了她老人家对我的担心。同病房的病友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们从下午说到入夜，忘了吃饭，忘了天黑。

从她的诉说中，我才了解到11个月来她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我们刚抓进去时，她和一些同学到处奔走投诉，企图营救被捕的同学，无人理睬。回到学校，宣传队还要他们交代投诉、营救的问题，说：“你们不是会告吗？你们送给周总理的材料现在都在我们这里！”宣传队要她揭发我的问题，那个李××专案组的一些活动她当时也参与了一些，宣传队老怀疑我有什么材料藏在她那儿了，逼她交出材料。我确实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藏在她那儿，当初

她知道我有怀疑康生的想法都害怕，不许我在她面前议论这些事情，所以她确实没什么可揭发的，也没什么东西可交出来的。

元旦之前，她给我写了信，买了几张贺年卡。那时的贺年卡就像后来的信用卡、银行卡那样大小的一张塑料卡片，一面印着样板戏的剧照，一面印着年历。她求宣传队把信和这几张贺年卡转交给我，宣传队一看，那几张贺年卡的剧照印的是《智取威虎山》，顿时火冒三丈，把她狠狠地训斥了一通：“你什么意思？你是想骂我们是座山雕，他是深入虎穴的杨子荣吗！”把信和贺年卡全部扣下了。

她是一个心里有事不露在脸上的人，禁不住这样时时施压，天天敲打，元旦过后不久，她就病倒了，吃不下饭、恶心、呕吐，到医院检查转氨酶比正常值高出几倍。那时候医疗水平也不高，就按肝炎治，也就是给点维生素、吃些中药。到我放出来时，虽有好转，但仍不正常。

每天去校医院看望致平，都要穿过“绿园”[14]（现在好像已没有了）。有一天，在“绿园”迎面遇到当初李××调查组的一位中文系老师，见到他我高兴地和他打招呼，没想到他冷冷的说：“你在里面交代了不少问题吧！”我的心情顿时恶劣到了极点：当初是你要调查李××，我一个跑腿的调查时吃尽了千般苦，出了事我在里面扛着，如今你还说这样的话！作为比我们年长许多的人，社会经验比我们丰富，难道你想不到，如果我真“交代”了什么对你不利的东西，你能脱得了干系吗？

2. 烈女刘月英

我到医院探望致平的时候，在楼道里经常看到有一位下肢瘫痪的女生，拄着双拐在别人的搀扶下练习走路。那女孩个子不高，身材瘦弱，累得满头大汗，小脸憋得通红。我问致平：“那是谁呀？”她说：“外语系的，叫刘月英，兵团丁×的女朋友。丁×被抓到怀柔去以后，宣传队说，抄家时在丁×的褥子下面搜出了避孕套什么的，当众羞辱她。她受不了，就跳楼自杀，没死成，腰断了，下肢瘫痪，不知道还能不能走路了。”

后来我听说，刘月英是一个山东农村的女孩，家里很穷。凭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师大外语系，和我们同届。这个要强的山东姑娘，入学第一个学期所有学科全部满分，在一年的时间里入了党，当了学生干部，她是一个要脸的人。“4.26”她的对象丁×被抓走后，军宣队一位参谋在外语系全系批判大会上当众羞辱她，说搜出了什么什么，说：“他们可是还没结婚哪！”那以后的几天里，刘月英一直不说话。几天以后，又要开全系批判大会了，眼看着一场加倍的羞辱不可避免。当同学们都去会场以后，这位刚烈的姑娘从女生宿舍中北楼西侧的四楼阳台跳了下去，用死来抗争这一切！一位去水房打水的生物系女生正好经过楼下，看见她摔到地下，没死，用手死死地掐自己的脖子。被送到医院救治后，她绝食，她是真不想活了！在老师、同学们的日夜劝解安慰下，她总算活了下来。毕业分配时她希望师大能给她口饭吃，哪怕在资料室打打字，师大不留她。令人鄙视的是，她的恋人丁×从怀柔回来以后也与她中断了恋爱关系！她被抬回了农村老家，贫困的家无力为她治病疗伤，又把她抬回了师大，就这样一次次抬来抬去，最后她死在了师大外语系党总支办公室（一说师大招待所地下室）。

今天的孩子可能不会理解当年的事，为这么一点事还至于跳楼自杀？就像全世界的人们不理解，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为什么会判处通奸的男女当众用乱石砸死。在那时的中国，一点点生活绯闻就常常置人于死地！宣传队那位恶毒的参谋，不知道在你的这一生中，当你拥妻携子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可曾想到过有一位娇弱的女孩死在了你的恶意攻击下？你心中是否有过一丝丝的歉疚？

3. 毕业鉴定

我放到班级以后，进班的第一天，由一位姓宋的教师带领班级领导小组严肃地向我宣布纪律：“你现在结束了隔离审查，但仍在群众监督之下，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不许串联，不许自行外出，出去必须报告，经过允许才可外出！”

我出来不久就宣布要进行毕业分配了，很快就进入了毕业鉴定阶段。在作毕业鉴定前，物理系宣传队负责人白本章师傅向我宣布：鉴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属于“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问题”，上级决定要在我的毕业鉴定中“记上一笔”。所谓的“小组鉴定”实际上是宣传队早就拟定好了的，他们拿出一份鉴定草稿给我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蔡鸣乔同志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在1968年利用去河南外调的机会收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黑材料，并在小范围内散布过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言论，经领导和群众帮助，该同志态度较好，建议不予处分。”白师傅说：“你在自我鉴定中也必须写上这些内容，如果不写，对你没有好处！”我说：“我自己做的事，我可以承认，但要实事求是，要准确。有几点我要说明：一、我怀疑康生是5·16后台，是谭厚兰后台，这是事实，我什么时候也不翻案。我希望明确写上是怀疑康生，不要含糊其辞地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以免以后搞不清楚，引起误会。二、我上河南外调并非去收集什么黑材料。在河南外调是有一个外调对象在材料中涉及曹轶欧的一件事，是偶然的，并非有目的地去调查。但回来后我曾将此事向几个同学讲过，这确有其事。三、我认为5·16是一个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集团，我的问题和‘批清’运动无关，我犯错误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但可以说是‘受错误思潮’影响。”

对我提出的几点意见，白师傅的答复是：“可以考虑你的意见，至于极‘左’思潮还是‘错误思潮’的提法，没有本质的区别，是一样的。”

后来在我的小组鉴定（也就是宣传队鉴定）中，把其中的“在1968年利用去河南外调的机会收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黑材料”一句删掉了，把“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改成了“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康生同志”，但仍然坚持“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我在自我鉴定和个人对小组鉴定的意见中又重申了我是“受错误思潮的影响”，以表示我对鉴定中“受极‘左’思潮影响”提法的不认同。

当时我们班有一位同学为我向宣传队求情，说：“他这么年轻，给他档案中写上这些，对他一辈子都会有影响啊。”宣传队说：“就是要给他记一笔，让他老实一辈子！”

4. 真感激你与我艰难同行

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理解，那时候在档案中装进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一生、对他的家庭子孙后代会有多大的影响！从此以后就像脸上刺上了金印，走到哪里都不会被信任和重用，遇到政治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被折腾。那几天我很郁闷，有一天在宿舍里躺着，另一张床上躺着我的一位同学蒋锡久，其他人都不知上哪了。一开始我俩都不说话，忽然，他开口了：“蔡鸣乔，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见我没有任何反应，他自顾自地讲了起来，听我还没有反应，他又说：“我给你唱一段‘空城计’吧，‘我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的老蒋兄弟，我知道你见我心里难受，千方百计地要哄我开心呢！

我们这位蒋兄在运动中是一个典型的从不理解到有抵触、不掺和的智者。他有很多雅好，是一位有名的围棋高手，爱摄影、会唱戏，结交了大量的同此雅兴的教授、同学、社会上的朋友。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被出卖、被伤害、被歧视的时候，善良的老蒋给我的温情让我记了一辈子！

我因为背上了这样的政治包袱，怕连累我深爱的人。我对致平说：“你跟着我，将来恐

怕要吃苦了，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两家的老人，都怪我的愚蠢，连累了你们！”她不许我说这些。那些天，我们天天在一起，有一天，我们在大操场南、北饭厅北面路侧的双杠旁聊天，我又为档案里“记一笔”烦恼，她却说出了一句让我万分震惊的话：“我们还要活很长的时间，二十年以后，谁还记得康生是谁呀！”多少年以后，我对她说：“当年你还挺有政治远见的嘛！”她却微笑地回一句：“我那时就是为了安慰你！”

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和我一起分配到东北边陲。因为她的病到分配的时候还没痊愈，她母亲特地到师大找了一回宣传队，要求让女儿暂缓到分配地报到，留在北京把病治好。宣传队不同意，说，“五一”以前必须离校，否则取消毕业生资格！

那一年的4月28日，我们在宣传队一名军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北边城。到单位报到才一个月，致平的病就复发了，剧烈地呕吐，转氨酶急剧升高，在医院又住了两个月的院。

1971年12月，致平曾站在雪地里照了一张相，这是一张侧面半身像，照片中的她面带微笑，眉眼间却露出一丝隐隐的忧伤。我给这张老照片取名为《冬日笑靥》，题辞曰：

“笑靥如花，掩不住眉间愁煞。心非铁石，怎禁得日日敲打？那人儿在里面，能不牵挂？也不知收到未，寒衣鞋袜？冷风刺骨盼春暖，不信严冬永无涯！心神遭折病缠身，未曾痊愈又出发。闯关东，再告别爹妈！”

六、尾声

我被分配到一所刚从民办改为公办的中学，一年后的1973年，一年试用期满应当转正。那年3月，学校管人事的曲大姐好心地向我透露：“你档案里有东西，对你的转正班子开会有人不同意。你写封信去北师大，要求他们把你档案里的东西撤了吧！”

我立即给师大宣传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为我的前途着想，能不能修改档案中的记载？3月16日他们回信说：“你给陈师傅的信，谈到对犯错误结论修改问题，原对你记一笔的结论是争取了群众意见，专案的同志反复研究，后组织又多次对你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本着批判从严组织结论从宽定的，同时也经上级机关审批的。对你的结论是慎重的，即不能修改。请你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问题。如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你所在的单位组织反映，由组织与组织联系为宜。”落款是“物理系”，信封的落款是“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师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

1975年，我接到大学时辅导员郝老师的一封信。郝老师告诉我，前些时，师大曾给你们单位去了一封公函，落实批清政策，要把档案里的一些东西撤了。我立即去找了单位领导，单位领导说：“是收到这样一封公函，但你的问题在你的毕业生登级表里记着，也不能把毕业生登级表销毁了呀，我们没法处理。”并且让我抄了这份公函的内容，里面说“1972年4月份涉及你处原我校学生蔡鸣乔，在批清运动中有所牵连，经复查，属犯一般政治错误，根据北京市委关于落实批清政策，对犯一般政治错误以下人员不作文字记载，材料不入本人档案的规定，本人或组织在其自传……毕业生鉴定、毕业生政审已入档案的材料中，凡涉及批清运动内容的一律撤销……”落款是“中共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小组”。

我看了这份留尾巴的材料，说：“那就不动吧，把材料撤了，留一个‘犯了一般政治错误’的尾巴，有什么用？”

1978年冬，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我的问题还没解决。12月，我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到师大“运动办”找到一位叫石长庚的同志长谈了一次，他让我回去后立即写一份申诉材料寄给他。我回来后立即写了这份材料，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及我的遭遇，寄给了

师大“运动办”（图为申诉材料底稿）。

我背负着这个政治包袱，为了我深爱的妻儿，我必须证明我不是“反党的反革命”。为了能得到“信任”和“认同”，我用拼命工作来“赎罪”，带别人不愿带的最乱的班，教最多的课，干别人不愿干的工作，有病、有事从来不敢请假，我“老实极了”！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使我的免疫力极为低下。1978年底，从北京回来不久，一场重感冒居然让我患上了无法治愈的免疫功能疾病“肾小球肾炎”，并最终恶化为尿毒症，在亲人、朋友的帮助下做了肾移植才保住了这条命。

1978年12月30日我住进了医院，这一天距师大党委为我作出最后的平反决定只差3天！我在医院病床上收到师大党委寄给我的平反通知，信中说：“蔡鸣乔同志：学校对你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决定平反，恢复名誉。复查结论已寄你校党支部，通过组织向你本人宣读。关于你的档案，我们要求你所在支部加以清理。此致敬礼。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1979.2.10。”

学校党支部书记在病床边向我宣读了这封迟到的平反结论（原件见上图）：

蔡鸣乔，男，物理系70届毕业生。

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怀疑康生等问题，受到审查，并于一九七二年作了“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一九七四年撤销了这个结论。

经复查，蔡鸣乔同志主要是怀疑康生、反对“四人帮”的黑干将谭厚兰，是正确的。据此，对其审查是错误的。现决定撤销原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销毁与此有关材料。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总支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同意物理系总支关于蔡鸣乔同志的复查结论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1971年冬，我在囚室里关着的时候，致平和她的好朋友王××照了一张雪中漫步的合影，这张老照片我给它取名为《冰霜路》，曾在上面题辞：

“彤云密布，前程似雾，初践冰霜路。谈笑不言愁与苦，年少难将天心悟。问痴女，顶风冒雪，心儿欲往何处？”

在结束这段回忆时，让我步前韵续一阙上面的无牌小令：

“残生向暮，韶华难驻，惟有情如故。拿捏旧伤夜难眠，善恶忠奸谁无数？告苍生，少些褒贬，留与后人评述。”

2016年1月10日 初稿

2016年1月26日 第七次修改

本文全文发表于《记忆》电子杂志2016年第四期，总第150期

[1]为便于今日的年轻人了解当时情况，故特别就有关历史人物做注。

[2]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3]江青，毛泽东夫人，时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4]康生，时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8月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12月病逝。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

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将他开除党籍、撤销悼词；后中央组织部决定，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同时将其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

[5]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1965届学生（调干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北师大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总负责人身份担任师大革委会主任，为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

[6]“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是由郑××、王××等人在1967年春组织的一个少数派群众组织，是谭厚兰的对立面。

[7]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8]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

[9]黄永胜，时任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

[10]关锋，时任“中央文革”成员，《红旗》杂志编委。林杰，时任《红旗》杂志编委。

[11]谢富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公安部部长。

[12]彭德怀，元帅，1959年庐山会议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罗瑞卿，大将，“文革”前任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

[13]“9.7事件”，发生在1967年9月7日的一起轰动北京、震惊中央的推翻以谭厚兰为首北师大革委会的事件。当天由中央连下三道通令，拘捕了带头的三位学生而平复了这次“政变”。

[14]绿园，当时师大校园内的一处树木繁茂、有假山、亭台的园地。

[15]本文有关内容请参见附录15《谭厚兰在“九·一”保林会上的讲话》，附录16“大海编辑部”的《关于北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

蔡鸣乔，197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1972年离校分配到丹东，先后在中学、教育学院、丹东师专（现辽东学院）等院校从事物理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已退休。

用历史的眼光评判历史事件

——我对北师大“4·26事件”的几点看法

蔡鸣乔

内容提要：本文从内、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在“批清”运动中与北师大宣传队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是如何形成的，从而揭示了“4·26事件”产生的真正原因和“4·26事件”的性质。提出应当用历史的眼光评判历史事件，才能避免有失公正。

关键词：批清 反对派 个人意识 群体意识 语境

这个题目，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不敢动笔。因为要详细地分析“4·26事件”，势必要涉及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这是我无法做好也不愿意做的事。但作为一个“4·26事件”的亲历者和受害者，我又不希望有人对“4·26事件”做出片面的不准确的评论。在大多数当事人选择沉默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说我个人的几点看法，供研究那一段历史的人参考。

一、1971年北师大“4·26”事件

1971年4月25日半夜时分，300多名军警对北师大发动突袭搜捕，搜捕行动持续到26日凌晨。当夜从中南楼、中北楼及校内其他住宅抓捕男女学生和个别教工100多人。抓捕过程中，发生普遍的殴打、揪头发、拧胳膊、拖拽等暴力行为。

据知情者反映，自25日晚10点左右，师大校园即被控制包围，只许进，不许出。抓捕时，有校宣传队工作人员手持名单对照抓人。但由于事发突然，现场十分混乱，致使一些旁观者虽不在名单上也被误抓，第二天经甄别后从关押地怀柔放回学校。

26日凌晨，被抓捕的学生、教工，被拖到十几辆各种汽车上由军警押送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境内的一处兵营。以办“学习班”的名义一直关押到11月上旬，才陆续放回学校。在怀柔期间所有人都被限制行动自由，一部分人一直单独关押。少数人回校后继续单独关押，直到1972年毕业分配前后才陆续释放。我本人属于后者，自4月26日直到第二年的3月8日，一直单独关押，共计319天。

这就是在北师大“文革”史上无法回避的“4·26事件”。

二、“4·26事件”是一件什么性质的事件？

当年，全面执掌师大大权的宣传队对“4·26事件”的定性有两种说法：一是说，“4·26”之所以抓人，是因为有人破坏“5.1大清查”，为了维护首都安全，师大宣传队配合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的军警采取的治安行动；二是说，“4·26”是为了“批派性、平山头”，把坚持派性不服从宣传队领导的这些人“请”到怀柔去办学习班。这两种说法影响深远，至今关心那一段历史的人恐怕仍或多或少地受这些说法的影响。

宣传队的这两种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我的观点是：“4·26事件”，是师大宣传队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对师大在“批清”运动中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实施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打压行动。

宣传队的第一种说法纯粹是为抓人找借口，对此，大多数人应该没有太多异议。事实是，“4·26”之前几天，确实有一次“5.1大清查”。那一天在中南楼的个别房间里，个别学生确实与进行清查的宣传队员发生过争执，但那只是非常局部的事情。而“4·26”被抓捕者绝大部分在那次“5.1大清查”中是配合了清查的。以一件非常局部的、个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为理由，如临大敌地动用300多军警对100多人实行暴力抓捕，这种借口是不是太苍白、太站不住脚？

所以，很快第二种说法就摆到了台面上。这也是最能混淆是非、掩盖真相的说法。因为，人们看到的表面现象就是：自1970年到1971年“4·26”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原“造反兵团”的几个头头和部分群众，在当时宣传队领导的“批清”运动中，频频写大字报批评宣传队的做法，甚至冲击宣传队组织的批判大会会场。这些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狂悖无理”的行动，不是“坚持小山头主义的派性”是什么？

要厘清这一问题我只想强调一个事实：“4·26”被抓捕的人中，从现在能够落实的不完全的67人名单中[1]，至少有14人从未在组织上参加过“造反兵团”，也从未参加过“造反兵团”组织的任何活动，我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怎么解释这一事实？

问题的实质并非是什么“山头”和“派性”问题！如果真是“平山头”，为什么要把从来就不是“兵团”的人一起抓走？

研究历史事件必须基于史实。事实就是：“4·26”并非是单纯针对“兵团”的抓捕行动！那么，抓捕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从经过甄别后仍然关押在怀柔的人员情况看，这些人虽然并非都是“兵团”成员，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对宣传队在“批清”运动中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人。

所以说，这是一次针对在“批清”运动中与宣传队持不同意见的群众的打压行动！要说“派”，那也只能说：“4·26”抓捕的对象，就是在“批清”运动中与宣传队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

因为与宣传队持不同意见就可以对这些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实行暴力抓捕吗？为什么就没有人问一问：在师大怎么就会形成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这些站在反对派立场上的人，他们反对的是什么？

三、在“批清”运动中与师大宣传队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 是怎样形成的？——外因分析

看待历史事件，要从历史的沿革中找出事物发展的逻辑，在事实的基础上分析、剖析表象下的本质。

1. 宣传队进校初期的校内形势

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自1968年秋至1970年近两年的时间里，师大原有的各派学生都基本回到各自班、系，在宣传队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所谓的“斗、批、改”，我本人就是这样。至少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没有发现明显的派别活动。

一个已被证实的事实是：工、军宣队进校后不久就宣布“兵团”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推倒了谭厚兰强加给“兵团”的罪名，指出林杰等坏人插手北师大，破坏北师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个还能回忆起的事实是：在“批清”运动初期，宣传队还曾安排原“兵团”头头王颂平到全校批判大会上发言，只是在曾经的“兵团”大将蒲寿章的冲击下发言陷于流产。

上述事实指向一个疑点：是什么原因使一开始接受宣传队领导的原“兵团”部分成员及其他群众后来又走到了宣传队的对立面上了？

2. 1970年自上而下的“批清”运动

事情发生变化的肇端，是1970年自上而下发动的“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运动。

“5·16”本来是1967年春夏之际出现在北京的一个小小的组织，号称“5·16兵团”，他们的矛头所向非常明确，就是指向周恩来。当时在北师大、钢院和一些其他地方，一夜之间贴了许多周的大字报、大标语，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从此销声匿迹。

吊诡的是，自从1968年以后，已经不怎么提“5·16”了，却在1970年左右从上到下又掀起一股“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的运动。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

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要彻底清查“5·16”。很快，抓“5·16”成了全国性的运动。

师大宣传队紧跟上级部署，迅速在校内掀起“批清”高潮。

3. 宣传队执行的“批清”政策将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群众“逼上梁山”

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一次自上而下的“批清”运动被整肃的对象有多么广。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是上面“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在这盘棋局中，被牺牲的棋子并不只是某一派群众组织的成员。所谓的“批清”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扩大化、要无中生有——说“无中生有”更能反映运动的真相！

如前所述，“5·16”不过是1967年春夏之际的一个小小的组织，矛头指向周恩来，其成员早被抓被斗，早已土崩瓦解。为什么到1970年又要旧事重提，从上而下掀起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这是一场人为的从震源波及全国的地震，是一场要将前期权宜搭建的“违章建筑”统统震塌的地震。至于在这场地震中会死伤多少无辜者，那就不是政治家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师大宣传队忠实地执行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批清”政策。从一开始，宣传队就提出“抓‘5·16’和其他反革命”的口号，后来干脆喊：“（师大是）黑手两边插，‘5·16’两边抓！”所以，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蓄意要扩大化、把矛头指向群众，包括指向谭厚兰对立面的群众。

每一个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师大人应当记得，那一时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却又空空洞洞，在那些又臭又长的批判稿中，有哪一句触及了极左的根源？在那些神秘秘的专案组中，哪一个不是就事论事地整学生，而不追究揭露蒙蔽、操纵年轻人干了坏事的后台？

相反，对于偶然窥见了一点点帷幕后真相的人，却又穷追狠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例如，那年在怀柔时我被揭露出曾经说过一句：“康生如果不支持人炮打周恩来，为什么要给吴传启通风报信？”宣传队那个叫雷炳的参谋如获至宝的样子，至今让我历历在目！

所以，是宣传队执行的矛头向下、蓄意要扩大化的“批清”政策把一部分群众推到了对立面上，这是师大形成在“批清”运动中与宣传队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的外因。

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下进驻学校的宣传队，其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要说师大的反对派妄想取代宣传队的地位，是谁也不会相信的！那么，这些人站在大权在握的宣传队对立面上闹来闹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其外在的原因，只能是因为对宣传队领导的运动矛头所向极为不满，这种“闹”是抗争，是一种本能的自卫反应。

四、在“批清”运动中与宣传队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形成的内因

有人会说，同样是参加过“兵团”，同样是在运动前期很活跃的人，并没有都走到宣传队的对立面上去，并没有都抓到怀柔去呀！所以，“4.26”事件的受害者，其命运轨迹的形成当然还有重要的内因。

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们站到反对派队伍中的原因也许很复杂，但是，从主流和骨干的层面分析，“兵团”及其他反对派中的部分人对形势的误判应当是这种内因的主要成分。

宣传队在师大领导“批清”运动，清查谭厚兰等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极左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能说清楚砸孔庙是对是错吗？敢批判谭厚兰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问

题吗？谭的身后有一条黑线，这在师大尽人皆知，直接操纵她的就是《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康生1966年7月27日在北师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当众宣布：“还有人讲林杰同志有后台，后台是谁呢？后台是关锋，这里边有一条线索说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是我！你们来审查审查，我们算不算黑帮？算不算黑线？”

所以，在1970年前后开始的“批清”运动中，长期站在谭的对立面的、受那条黑线打压的群众总认为宣传队的“批清”是在“假批判，真包庇”，是在“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一厢情愿地期盼在批谭的过程中能彻底揪出她身后的那条黑线，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这种期盼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也是因为这种幼稚，这些人有时会做出许多不为旁人理解的“蠢事”！

从现存的那一时期“兵团”针对宣传队贴的大字报中，可以看到其中反复强调要“彻底揭开王、关、戚、林插手师大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挖出一切暗藏的‘5·16’反革命分子”。声讨宣传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口口声声说宣传队的作法是要“达到死死捂住王、关、戚、林、‘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师大的阶级斗争盖子的目的”。[2]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心照不宣的意思就是：谭厚兰的后台还没有都揪出来！这个后台，在不少人的心中就是康生，或许还有谢富治。这既是1966年7月27日那天康生自己不打自招的“黑线论”的心理暗示所致，也是几年来谭厚兰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大家心中形成的猜测和判断。用今天的眼光看，其实也是事实，尽管谭的后台并不仅限于这两个大人物。

于是，中央宣布要掀起“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的运动后，这些人立即兴奋起来，以为这一回不仅要把谭厚兰一伙打翻在地，而且会扯出萝卜带出泥，有更大的黑后台要倒台了。毕竟，从1966年以来，上面倒台的大人物一个接着一个，谁也没说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已经结束了呀！

这种对“批清”运动的目的、走向的错误判断，应当是这一部分人公然站到宣传队对立面上的重要内因之一。

“倒谢”是公开的史实，至于反对和怀疑康生，客观地说，只是少数人私底下的行为，因为毕竟有一个叫《公安六条》的高压线在那里横着。我始终认为，在师大那种环境中，有多少人没想过谭厚兰的后台是谁？只不过有的人想得深一些，有的人想得浅一些；有的说出来了，有的只想不说。“批清”运动开始以后，有的人认为事情会有一个了结，值得为此坚持抗争一番；有的人醒悟得较早，选择了务实，不想为此去坚持，不想去做无谓的抗争。这也是为什么到后来站到宣传队对立面，成为反对派的人数不多的原因。

当然，指望通过抗争，最后能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也是这一部分人内心的动机之一。这种缺乏自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一贯正确，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通病，只不过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格外严重、格外执着而已。也是因为这种认知缺陷和性格缺陷，使得自己不能审时度势，调整策略，规避风险，只知一味激化矛盾，引来灭顶之灾！

宣传队也许不了解这些，他们也许只恨这些人不听话，干扰他们执行上面制定的“大方向”，所以千方百计要把矛头指向这批人。但宣传队上面的人凭着他们政治家的敏感和手段，是能够感觉到这种来自下面的干扰的，这种在“批清”运动中妄图矛头向上的肘腋之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势必除之而后快！

总之，从“4.26”当晚及之后的种种现象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4.26事件”事先是经过严密的组织策划的，有明确的目标和分工；从事件的结局看，也确实达到了组织者的主要目的。至少，从那以后，宣传队可以在北师大畅通无阻地推行那一套极左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了。

五、如何评价在“批清”运动中与宣传队

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的抗争行为？

1. 反对派的抗争行为是一种有限度的觉悟

如前分析，反对派与宣传队的抗争，其核心观点是认为宣传队的“批清”运动是在“假批判、真包庇”，是在“转移斗争大方向”，是在“捂盖子”。在当时的形势下无法摆到桌面上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揭露揪出谭厚兰的黑后台，这种立场错了吗？

1982年我在师大进修。有一天，在物理楼东侧的林荫道上与时任物理系副主任的张××有一个对话。张副主任对我说：“那时候，康生是中央领导人，你们反对怀疑康生，能对吗？！”面对他的义正严辞，我只有哑口无言、目瞪口呆！

据说，师大物理系学生杨以鸿，因为在1966年冬贴了一张质疑林彪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林彪倒台以后，毕业分配时杨提出来希望给个说法，宣传队也是这套说辞：“林彪那时还是副主席，那时写他的大字报不能平反！”

我们姑且不论林彪、康生是什么人，杨对林彪质疑的那张大字报提出的问题错了吗？认为康生是操纵谭厚兰干坏事的黑手错了吗？如果没错，就应当肯定！

以张副主任和宣传队们为代表的观点，实际上是说：只要权力没有认定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只要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少数人的超前认知永远是错误的！

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之死。16世纪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因为反对“地心说”，捍卫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在当时，教会和整个世俗社会都认为“日心说”是异端邪说，按照某些人的观点，是不是就应当说，布鲁诺死的活该呢？

对事物的认识，由于每个人的经历、地位、学识等诸多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永远会有少数人的个人意识超前于群体意识。承认个人意识存在的合理性，承认个人意识中的正确内容，能不能保护个人意识，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2. 关于反对派诉求的局限性

用今天的眼光看，反对派诉求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要求被高度肯定，肯定他们是师大唯一正确的、一直与谭厚兰做斗争的革命左派，这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做派也是他们总是陷于少数的原因之一。

但这并不等于用暴力的手段打压就是合理合法的行为。

他们企盼揪出谭厚兰后面的黑后台——康生，或许还有谢富治，是否还有别的目标？我不知道。听说个别人还曾经议论过其他的中央高层人物，但我猜测，那恐怕主要是因为长期得不到支持和肯定而发泄的一点不满和怨气。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没有跳出“文革”思维的窠臼。

但这不等于说反对派的抗争在历史的层面上就没有丝毫积极的意义。

还是拿布鲁诺来说事儿。布鲁诺当年为捍卫“日心说”被教廷烧死，那时候相对于“地心说”，“日心说”是科学的进步，是对宇宙认识的飞跃。但用今天的眼光看，“日心说”的局限性又是显而易见的：太阳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它不过是广袤宇宙中一颗小小的恒星！我们能因此就说，布鲁诺死的毫无价值吗？

再举一个例子，发生在1976年4月5日的“4.5天安门事件”，这是一次来自民众对“文革”和“四人帮”抗争的事件，是很多“文革”研究者公认的宣告“文革”失败的群众运动，

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的民心所向。同时又是一次某些人成功地将个人意识转化为群体意识的事件。在有些人看来，“4.5事件”中的民众行为也有局限性，但你能否定“4.5事件”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吗？

3. 关于“反对派”在“文革”语境下的斗争话语

毋庸置疑，在师大“文革”舞台上活跃的哪一派都宣称唯有自己是革命的左派，“无论是哪一帮哪一派都真心标榜相同的革命理想与拥护对象。”“在一元的革命斗争话语之下形成了竞争关系。”[3]。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当年的文字材料，无论是1967年底“大海编辑部”发表的《关于北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还是“兵团”的大字报，包括1970年1月18日“兵团”所写的《彻底批判师大宣传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无一不充斥着“文革”语言，无一不标榜自己坚定的“左派”立场，真实地反映了作者们当时认识的局限性；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理解为是当时普遍采用的、一种下意识的斗争策略。哪一种成分更多一些？客观地说还是前一种更多一些，在那种群体意识已经被引发到几近癫狂的状态下，有几个人能跳出“文革”语境的窠臼？有几个人敢背离“文革”语境去标新立异？

至于说师大宣传队在“批清”运动中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显然是扣错了帽子，在极左路线统治下的宣传队是绝对忠实地执行了极左路线。但是，这里所谓的“左”或“右”不也是源自“文革”语境的概念吗？虽然也提出过什么“批判极‘左’思潮”，但请注意：这里的“左”字是带引号的！这个引号可不是我这里乱加的，在当时所有来自官方的报刊杂志文件中都有这个引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极‘左’”，其实并不是“左”，而是“形‘左’实右”，也就是说，绕来绕去，最后还是要批右！这也是为什么在所谓的“批清”运动中那些又臭又长的批判稿总是言不及义、不知所云的缘故了！

其实，在新中国的政治辞典中，一直都是“左”就是好，就是革命，就是先进；“右”就是坏，就是反动，就是落后！所以，在“文革”的争斗中，哪一派都是动不动就给对方扣上“右派”“右倾”的帽子，还真没见过为了打倒对方，给对方扣上一个“左派”“左倾”帽子的。说到这里，那时候“兵团”的笔杆子在和宣传队的争斗中，居然胡乱地给对方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们研究“文革”时期的文字材料，应当试着过滤掉那些特定语境下的套话、空话、废话，从中找出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总之，从历史的层面评判历史事件，方能力求公正，避免机械偏颇。用历史的眼光评判历史事件，方能从中吸取教训，使自己变得成熟！

2018. 4. 10

本文全文发表于2018年《记忆》电刊第十一期，总第221期

参考材料：

[1] 见本书《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2] 见附录18. 井冈山造反兵团：《彻底批判师大宣传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3] 李潇：《回忆十年文化史论课》。

“井冈山造反兵团”简史

柳 聿

“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是1967年1月26日成立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在“文革”期间，北师大师生其为简称“兵团”，首都大专院校群众亦称“兵团”；在“文革”过去半个世纪的当今，人们谈及北师大“文革”历史时，也习惯地称“当时的‘兵团’如何如何”。故以下行文亦简称“兵团”，加双引号以示特指。

第一部分 “兵团”的历史面貌

一、“兵团”是怎样成立的？

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毛泽东一手策动的“文革”大幕在全国高校中正式拉开。首都各高校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各色各派的群众组织，争先恐后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支持毛泽东所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宣称自己“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最高统帅的指挥下，“中央文革”直接插手、掌控首都各重点高校如北大、清华、北师大、北航、地质学院的“文革”运动。1966年7月27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人亲临北师大，召开盛大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动员北师大“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展“文革”运动。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66年8月23日，北师大一批不满当时的刘少奇等领导人所派遣进驻北师大的“工作组”方针路线（组长是当时国务院所属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渔）的青年学生成立了“井冈山战斗团”，其主要活动是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立时仅有128名学生，由组织者商定，领导班子由五人组成——团长：郑云云（中文系61级）；政委：谭厚兰（政教系61级调干生）；李庆林（物理系64级）、梁碧芳（物理系62级）、邓旭涛（中文系62级）任副团长。

江青、康生、陈伯达掌控下的“中央文革”是毛泽东领导和运作“文革”的最高司令部。“中央文革”领导和指挥首都高校“文革”的手段和方式很多：有的直接策动，如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人亲自到北大、清华等校与广大师生见面，接见造反派头头，面授机宜。1966年7月27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到北师大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鼓动造反派起来夺权。江青讲话时高声煽动：“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今后也不会派工作组。你们要甩开保姆，自己解放自己，踢开石头闹革命！”她挥舞手臂，高声呼喊：“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走开！”声称“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的！”这次大会影响之大之巨，师大人今日仍记忆犹新。北师大“文革”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中央文革”派人直接插手并指挥。这一特征与多数高校不同。“中央文革”除了直接派联络员进驻北师大之外，插手最深、影响巨大的当是林

杰。就在7月27日北师大“文革”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会上，康生代表“中央文革”把林杰隆重介绍给北师大师生，为插手北师大“文革”站台。提起林杰，师大人无人不知。此人是当时的《红旗》杂志社编辑，是“中央文革”骨干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一伙的。林杰是北师大历史系1961年毕业生，与北师大有历史渊源，根系很深。1966年6月2日，谭厚兰等4人贴出全校第一份反党委的大字报《革命的同志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捣毁一切“三家村”分店》，炮轰北师大党委书记程今吾的大字报就是在林杰的授意下出笼的，6月20日，高树奎等同学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当时谭厚兰积极表态支持工作组。林杰立即把谭厚兰找去“指导”了一番，到6月23日谭厚兰才突然掉转矛头，重新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谭的反戈一击自然被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反革命”而受到批判，但这次杀回马枪为日后获得“坚定的造反派”美名奠定了基础，也为林杰插手北师大“文革”埋下了伏笔。不久，毛泽东就撤销了高校的工作组，工作组被指斥为“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厚兰被平反，自然成为“革命闯将”，掌握了北师大造反派的领导权。谭厚兰自己公开宣称：“和林杰同志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林杰与谭厚兰非同寻常的特殊政治和私人关系，自然引起许多造反派群众及代表的质疑和非议；林杰肆意插手北师大的群众运动，充当北师大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太上皇”，压制不同意见，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命，这必然遭到“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的群众的强烈抵制。

从1966年8月以来，与林杰、谭厚兰有矛盾、有分歧的“井冈山战斗团”的领导人郑云云、李庆林和1967年1月成立的兵团领导人王颂平等人，开始酝酿与谭厚兰等人的公开决裂。其间，王颂平等人去《红旗》杂志社与林杰进行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在“井冈山战斗团”的会议上，与谭厚兰等人公开地、决绝地争吵，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林杰插手北师大运动，达誓不两立之态，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已成必然之势。

1967年1月26日，“井冈山造反兵团”宣告正式成立，公开发布了成立宣言，表明了自己与林杰、谭厚兰公开对立斗争的政治态度。从名称上可以看出，这个群众组织是同林杰、谭厚兰造反而另拉旗帜的，一开始就是同谭厚兰一伙对立斗争而存在的。（“成立宣言”见附录11）

在1966年10月时，“井冈山战斗团”已经完全被林杰操控，谭厚兰对其言听计从，对他们表示不满并持不同意见的郑云云被打成“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对郑进行批判斗争。于是郑云云被迫退出团部，实际上被解除了职务。1967年1月中旬，“井冈山战斗团”的副团长李庆林、梁碧芳与张振国、赵九明、赵德骏等人带领数十名骨干成员集体退出“井冈山战斗团”。至此，北师大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从组织上发生正式分裂，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诚然，两派都宣称只有自己才代表北师大“文革”中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需要说明的是，“兵团”的主要领导人王颂平在当时只是“战斗团”一名普通战士，在郑云云被迫离开团长岗位之时，她和一批最早的造反派学生也退出了“井冈山战斗团”。

“兵团”成立时，仅有49人，全部都是最早、最坚定的造反派学生。他们的基本政治倾向表现为两大特点：其一，与林杰、谭厚兰对立，是作为对立面存在的；其二，兵团的骨干成员因为反工作组、反当时的校党委而受过迫害。如王颂平等人在1966年6月20日贴出《孙有渔为何如此恐慌？》大字报，公开反对工作组。立即被定为“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兵团”复活时的领导班子称之为“总部”，“总部”成员原有17人，绝大多数都遭受过打击迫害。

“兵团总部”主要人员按1967年的情况做历史性的客观介绍如下：

王颂平，女，兵团成立时22岁，共青团员，中文系64级学生，工人出身。运动初期，因反对工作组被打成“反革命”遭大会批斗。1966年7月27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一班人到北师大号召造工作组、校党委的反，给王颂平等受迫害的青年学生平反。7月29日，王颂平等人因反对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又一次被打成反革命，不久，李雪峰书记被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撤职，王颂平再次得以平反；1966年8月24日，王颂平等人贴出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1966年10月与林杰、谭厚兰产生严重分歧退出“井冈山战斗团”；1967年1月组建“井冈山造反兵团”；1967年3月，兵团被迫解散后参与调查谭震林（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国家计委负责人）。1967年5月组建“斗陶兵团”，批判陶铸（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被毛泽东定性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潘梓年、吴传启、卢正义等人进行大量调查活动。在校内，与林杰、谭厚兰推行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一系列做法进行斗争；1967年9月1日，组织“兵团”的骨干成员宣布正式恢复组织，进行公开活动。王颂平被谭厚兰把持的校革委会打成“反革命坏头头”“反党小集团的首恶分子”遭受长期迫害。1971年4月26日，“兵团”的骨干成员七十多人被北京卫戍区抓捕至河北省怀柔县4562部队军营关押七个月之久，王颂平亦被单独关押。关押地点曾经在北师大旧主楼，11楼，隔几天就被押到各个系去接受批斗，在化学系批斗时晕倒在地。1971年夏王颂平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学籍，开除团籍，正式关押于北京著名的半步桥监狱。林彪“9.13”驾机外逃事件之后，“兵团”被捕学生陆续释放回校，但王颂平以“反革命坏头头”罪名一直被单独关押。“四人帮”被抓捕后仍被关押在工厂劳动改造，直至毛去世后两年多才被无罪释放，分配至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任教。

郑云云：男，28岁，超龄团员，中文系1966届毕业生；在“井冈山战斗团”成立时担任团长，是最早的造反派学生代表，因反对林杰、谭厚兰的一系列行为，被打成“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而遭到批判，被迫退出“井冈山战斗团”。“兵团”成立时被推举为“兵团”的负责人之一。被谭厚兰宣布为“反党小集团坏头头”，以“北师大革委会”的名义不准郑届时毕业。

杜桂龙：男，23岁，共青团员，历史系64级学生；“文革”初期因反对工作组遭批斗，是“井冈山战斗团”第一批红卫兵；后与谭厚兰决裂加入“兵团”，成为“兵团”总部成员，被谭厚兰的“革委会”扣发助学金、扣发粮票达数月。

侯业勤：男，24岁，天文系63级学生；“文革”初期因反对工作组被打成“反革命”。因与林杰、谭厚兰斗争坚决而被谭派出的打手毒打多次，加入“兵团”后被推举为总部成员。

蒲寿章：男，22岁，共青团员，是最早的造反派活跃人物，写过很多大字报；被谭厚兰打成“极右分子”“坏头头”，是“兵团”的总部成员之一。

许连友：男，30岁，是“兵团”总部成员中唯一的食堂工人；许出身贫苦，幼时讨过饭挨过饿，因给解放军送物资被国民党抓住毒打致伤；因在工人中组织造反派反对工作组而遭迫害；“兵团”成立后，许率一批后勤的工人加入“兵团”，被一致推举为总部成员。谭厚兰把持的“革委会”将许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抓去毒打致内伤，还被扣发工资数月。

“兵团”总部的其他成员还有李先华（男，22岁，共青团员，中文系64级学生）、余成（男，23岁，共青团员，天文系63级学生）、铁崇光（男，23岁，共青团员，数学系63级学生）、刁士元（男，23岁，共青团员，物理系63级学生）、李国元（男，当时21岁，共青团员，65级体育系学生，因与谭厚兰斗争坚决，被抓去毒打致严重内伤）、夏晓阳（共青团员，天文系63级学生）。

二、“兵团”的主要活动

由于“兵团”是因与林杰、谭厚兰发生严重分歧而从造反派队伍中分离出去的，得不到“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的支持，所以“兵团”成立后始终是少数派，处于被压制、被排斥的地位。校党委被“中央文革”直接插手、操控的林杰、谭厚兰搞垮进而夺权之后，北师大在北京市委谢富治的支持下，由谭厚兰一伙完全把持了一切大权，“兵团”得不到任何的政治、经济等权利，被视为他们在北师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障碍，必欲千方百计除之而后快。“兵团”成立后的早期活动，除响应毛泽东打到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积极写大字报批判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外，主要的活动就是在北师大争取广大师生员工的理解，申明自己存在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同谭厚兰一伙斗争的正义性和革命性，向校内外和社会各界争取自己的生存权与活动权、话语权，争取一个合法、合理的地位。但这样必定遭到谭厚兰的不断压制。“兵团”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即1967年2月下旬，宣称自己支持的左派（“中央文革”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动员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称之为“支左”）的解放军419672部队进驻北师大，以“军训”的名义为谭厚兰站台，开大会公开表态支持谭厚兰，要求全校师生员工服从谭厚兰的领导。军训团多次与兵团负责人谈话，威逼利诱，不准“兵团”反对谭厚兰，要求“兵团”解散，威胁说“如果再反谭厚兰就不客气！”在军训团的压力和分化瓦解下，谭厚兰加紧打压“兵团”。1967年3月11日，“兵团”总部负责人之一的李庆林，带领廿多人声明退出“兵团”，剩余十几名“兵团”成员感到势单力薄，很难再与军训团对抗，于次日贴出声明，只有一句话：宣告“兵团”被迫解散，“兵团”的活动进入低潮，转入地下状态。而谭厚兰则宣称“摧毁了非法组织“兵团”，北师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在纪念“五·一六通知”一周年的同时，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在北大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配发社论《军政训练好》，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搞垮“兵团”的。

1967年5月初，坚持与谭厚兰不妥协斗争的“兵团”骨干成员，逐渐发现了谭厚兰一伙与吴传启、卢正义相互来往的证据（吴、卢二人当时都被揭发为叛徒、特务分子），认为应该坚持斗争，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于是决定重新成立一个群众组织，取名“斗陶兵团”，意在反对“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中央文革”对陶铸的判断），主要是调查吴传启、卢正义与谭厚兰勾结的证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插手北师大，压制反对谭厚兰的造反派群众的行径展开秘密调查。因此，“斗陶兵团”在组织发展上十分谨慎，一直保持着十几个人，但外围的支持同情者很多。

1967年2月，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了一件大事——以陈毅副总理、谭震林副总理、余秋里等老干部为代表的一批老干部联合向“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极左路线发起了反击，本质上对抗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当然触怒了毛泽东，于是在毛泽东策动下，“中央文革”向老干部发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一大批老干部被批判，被撤职。“斗陶兵团”自然参加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积极写大字报，同时展开广泛的调查研究。在调查中发现林杰一伙勾结潘梓年、吴传启、卢正义等叛徒、特务的证据，进行了公开揭露批判，斗争一直持续到八月底。

1967年5月16日，北师大军训团的“支左”经验在中央党报上发表，给“兵团”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兵团”顶着压力，于当日贴出“严正声明”，澄清被歪曲的事实真相，反对军训团拉一派、打一派的错误做法，自然成为军训团的眼中钉。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兵团”的骨干成员赴武汉，支持并参与武汉大学、水利

水电学院造反派的活动。“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王力直接插手武汉地区的“文革”运动，被保守派围攻。王力回京后，“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组织群众集会欢迎王力回京。《红旗》的“8.1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全国各地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军队。王力、关锋等人的行为干扰了毛泽东关于“文革”在全国各地的部署，给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老干部以攻击的口实。8月下旬，毛泽东下令，撤了王力、关锋的职务，长期插手北师大的林杰亦被点名批判，林杰终于失势倒台。在此背景之下，北师大的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谭厚兰被迫宣布与林杰划清界限，检讨自己的错误，以保住自己“造反派领袖”的地位。当然，根本原因是“中央文革”要保谭厚兰。在这种形势下，长期与林杰一伙坚决斗争的“兵团”得到了北师大广大师生员工的热烈支持，要求加入“兵团”的人数剧增。于是，1967年9月1日，“井冈山造反兵团”在被迫解散五个多月后，在北师大向各大专院校印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宣告恢复一切活动，人数达二百多人。

兵团恢复组织和活动后，与谭厚兰一伙把持的“北师大革委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自然也遭到谭厚兰及其后台的残酷镇压，宣布“兵团”为非法组织，不久升级为“反动组织”，要“坚决砸烂，彻底摧毁！”

谭厚兰对“兵团”的残酷镇压，非但没有压垮“兵团”，反而促使“兵团”队伍不断扩大，至1967年底，“兵团”人员增至五百多人；到1968年3月，“兵团”人数达到819人，已经成为足以与谭厚兰把持的“革委会”相抗衡的最强有力的一支政治力量。

三、“七·一二”火烧工五楼事件始末

1968年“七·一二”事件，不仅震惊了北京市各大高校和社会各界，而且惊动了党中央和“中央文革”，也成为谭厚兰结束派性掌权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在北师大的“文革”史册上，应该记录下这个事件的历史原貌。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8年3月以来，谭厚兰加紧了对“兵团”的暴力镇压，迫害不断升级。谭厚兰以革委会的权力组建了一支专门对付“兵团”的武斗队，人数达二百人左右，主要人员是后勤部门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受谭厚兰蒙蔽，其中有一些有贪污盗窃行为的人，“文革”中被揭发，但因保卫、追随谭厚兰而未被查处，还有相当多的人员是体育系的学生，他们在运动初期因保卫工作组和北师大旧党委而被称之为“老保”。“中央文革”1966年7月27日来北师大给造反派学生平反后，这些保守派学生受到批判，被冷落，谭厚兰利用他们镇压“兵团”，他们感到机会来了，对“兵团”学生下毒手特狠。谭厚兰利用手中的权力，划拨出专门款项装备这个武斗队，给武斗队配备专用的办公室、电话、自行车，每人配备特制的柳条帽、强光手电筒、打人的木棍。每次执行任务回来给发加餐费，吃高质量的夜宵，完全成为给谭厚兰看家护院的“家丁”。

谭厚兰给这个“专业”武斗队的任务是“对兵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红色政权革委会！”谭厚兰武力镇压兵团的主要事实归纳几桩如下：

——断水断电断粮，谓之“三断”政策

“兵团”数百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同情“兵团”的教师的帮助下，集中住进了一座四层的老式教工楼——工五楼，吃饭则是去学生食堂凭票打饭（按当时的国家政策，师范院校的学生吃饭免费）。谭厚兰派人对工五楼断水断电，“兵团”战士冒险从临近的楼接通电源和

水源，他们再断，“兵团”再接，反复拉锯，僵持了没多久，谭厚兰派人拆掉水管，焊死接口，致使“兵团”战士没水喝。不得已，“兵团”战士冒着被抓被打的风险乘黑夜偷运几桶凉水。后来，送水已经极其困难，“兵团”战士则冒险向楼下打井，挖了七八米造成塌方，“兵团”战士被土掩埋，经奋力抢救，总算没有出人命。“兵团”把谭厚兰的罪行公布于北师大各派群众中，引起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广泛同情，有不少不知名的群众偷偷给“兵团”送水送干粮。在“兵团”严重缺粮的日子里，遇到下雨天，所有的容器均盛满了雨水当饮用水；楼旁边的大槐树叶子被“兵团”战士爬树摘下，与玉米面掺在一起合面蒸“树叶窝头”，“兵团”战士吃了排不出大便，用手抠都难以抠出。许多“兵团”战士忍饥挨饿，乘黑夜逃出弄点吃的，有时被巡逻的武斗队发现，夺走粮食，拳打脚踢一番。

——私设刑堂，刑审逼供，施加暴行

谭厚兰在学11楼专设审讯室，外面派打手警戒，任何人不得靠近；房间四壁用黑布遮蔽，不透一丝光亮，里面备有皮鞭、钢丝鞭、电线（捆手脚）、粗绳、蒙头的黑布口袋等刑具。谭厚兰的打手把“兵团”骨干成员抓到刑堂之后，逼其投降，写悔罪书，如若不从，便一涌而上，用黑布袋蒙头，破布条塞嘴，然后用皮鞭、弹簧鞭抽打，直打得“兵团”战士奄奄一息，动弹不得，抓起手臂往他们事先伪造的“悔罪书”上摁手印。而后通过广播、布告栏张贴等各种方式造谣诬陷，进行分化瓦解。手段之卑劣，行径之凶残，令人发指。

对“兵团”的一般成员则是堵在去食堂饭厅的路口，见人就一群人围上拳脚相加，左右开弓打耳光，用拳猛击耳门、下巴、心窝、两肋、小腹等要害部位，打翻在地后再抓住头发往地上掼，揪住女学生的发辫拉扯。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多人脑震荡，耳鼓膜穿孔，腹内出血，有的严重内伤，长时间不能痊愈。有些同情“兵团”的群众偷偷给“兵团”战士送饭，被谭厚兰的打手拦截、打翻饭盒。据当时统计，“兵团”战士被殴打者达百人以上。

——打砸“兵团”驻地工五楼

谭厚兰派出打手，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学生对“兵团”驻地工五楼进行围攻，用大块砖石猛砸门窗，用强力弹弓从紧挨工5楼的工4楼向楼内投射石块。在轮番打砸之下，工5楼的门窗全部毁坏，楼体也被砸出一个个凹坑，俨然一座被拆除的危楼。

“火烧工5楼事件始末”

谭厚兰为了达到武力摧毁“兵团”的唯一据点工5楼，彻底整垮“兵团”这个唯一的对立面对立群众组织，在断水断电断粮、抓捕殴打“兵团”战士等手段最终没能奏效的情况下，策划了武力攻楼，抓捕“兵团”所有人员的恶性事件。这个事件在首都高校“文革”史上十分罕见，师大人回忆起来，至今都觉得十分血腥罪恶。

现根据事件发生后“兵团”总部编辑组写的“大事记”整理如下：

1968年7月10日晚，“兵团”战士再次接通被谭厚兰一伙切断的电源（之前切断接通电源的事反反复复发生了许多次）但这次谭厚兰一伙突然一反常态，通宵未断电源。（后来得知，是为了撤走设在工6楼专门对付“兵团”的井冈山广播站分站。）

7月11日晚，“兵团”广播站线路被切断，“兵团”再次接通，如此反复“拉锯”至凌晨一时，待“兵团”总部刁士元率人去工4楼欲再次接通电源时，躲在暗处的谭氏武斗队手持长矛棍棒，突然一涌而出，绑架了刁士元，用长矛刺伤了他的大腿，另一名“兵团”战士也被刺伤。“兵团”战士一怒之下，也扣押了被谭厚兰派来盯梢、跟踪的李鑑增、蔡亚光两人作人质，经由兵团提议，不久双方对等释放了被扣人员。事态未进一步扩大。

凌晨四时，校革委会常委、后勤负责人邵忠诚对全校作广播讲话，说“兵团”非法绑架

革委会两名工作人员，搞反革命打砸抢，闭口不提他们首先抓走“兵团”总部刁士元等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去围攻工5楼。邵广播后，工5楼被谭厚兰的武斗队四面包围，用喇叭喊话：“你们已经被包围啦！赶快出来投降吧！”不停地煽动不明真相被谭氏蒙蔽的群众在楼前呐喊挑衅，侮辱谩骂。上午八时许，北师大的所有校门均被封锁，不准外单位人员进校探访。九时，谭厚兰率“革委会”骨干成员在“兵团”驻地工5楼前召开大会，宣称“兵团”是反动组织，要“坚决取缔”，号召“革命闯将”用“革命的手段”摧毁“兵团”。在谭的煽动下，谭氏武斗队手持长矛，头戴护盔，呐喊着冲进了工5楼一层，挖通了所有房间的墙壁，一楼全部贯通；“兵团”费尽千辛万苦挖成的一个深达十余米的水井被填死；一楼存放的自行车等物品被悉数抢走。至此，“兵团”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境况下，被迫奋起自卫，用弹弓、石块从楼上向下投掷，打退武斗队向楼上的进攻。下午两点，校革委会副主任曾昭耀（林杰的同学、密友）、主持大会的邵忠诚指挥武斗队搬来干柴、茅草，泼上汽油，纵火烧楼，并用鼓风机吹风。刹那间，烈火熊熊，浓烟滚滚。打手们还在火焰下撒入辣椒粉，暴徒们一边攻楼，一边狂喊：“烧死兵团！”“烧死王颂平！”“烧了工5楼！”

就在熊熊烈火即将烧到顶层，“兵团”战士准备冲出工5楼之时，解放军某部奉中央命令开着消防车前来救火，但遭到谭厚兰武斗队的阻拦，他们欺骗解放军，说火在四层，不在一层，是“兵团”在烧毁黑材料。谭氏广播站的大喇叭：“革命师生员工注意了，‘兵团’烧楼了！‘兵团’搞打砸抢了！”为了调查事件真相，解放军战士用救火的升降机爬上工5楼四层（顶楼），只见浓烟呛人但没有火时，向灭火指挥首长报告：四层没火，火是从一楼放的。五时廿五分，解放军冲破谭厚兰一伙的层层阻力，开始用高压水枪灭火，廿分钟大火被彻底扑灭。解放军战士得知楼内没有一滴水时，给“兵团”战士的脸盆、水桶、水泥砌的池子里全部灌满水。“兵团”战士紧紧抱着解放军战士，热泪满面，激动地高呼：“感谢亲人解放军救了我们！毛主席最亲，解放军最好！”并请灭火的解放军首长带走兵团上报周总理的揭露、控告材料，解放军首长接受了兵团的请求。

由于消防车及时赶到，扑灭了谭厚兰一伙纵的大火，谭厚兰抓捕“兵团”坚守工5楼战士的罪恶阴谋未能得逞。事后得知：有反对谭厚兰纵火的人士给周总理办公室打求救电话，疾驰而来的七辆灭火车是从中南海里面开出来的。这件事显然惊动了中央最高层。

“7.12”谭氏一伙纵火烧、砸工5楼事件发生后，虽然对工5楼的围困、袭击没有停止，用广播、大字报对“兵团”造谣污蔑仍在继续，但力度明显减弱。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北京市革委会根据中央指示下达了制止一切武斗的通令和七.二四布告（内容主要是制止武斗），谭厚兰对“兵团”的武力镇压不得有所收敛；另一是4672驻北师大军训团首长到工5楼与“兵团”负责人谈判，并送来饭菜。虽然军训团的立场偏袒谭厚兰一伙，但明确反对谭厚兰抓人打人，客观上也遏制了武力镇压的规模。于是，“兵团”与谭厚兰不可调和的斗争一直持续着，谭厚兰剿灭“兵团”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半到八时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紧急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参加召见的还有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汪东兴、叶群、吴德、温玉成、黄作珍等。这样的召见阵势，规格之高、时间之久，在全国是唯一的一次，足见毛泽东的党中央对首都高校“文革”的重视程度。此次召见的时间虽很长，谈话内容也很广泛，根据聂元梓等人的记录稿来看，主旨内容只有一个：停止武斗。毛泽东在自始至终的召见中，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坚决反对高校搞武斗。毛泽东说：“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我提出四个办法：一是实行军管；二是两派可以分成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是斗、批、走；四是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

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毛泽东还说：“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周恩来、林彪则在讲话中强调了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反对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批评高校的造反派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要求“五大领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在召见过程中，江青、陈伯达提到了谭厚兰火烧工5楼，武力攻打“兵团”的事件，要求谭停止武斗。谭当即表态：坚决执行。

此次召见之后，全国的武斗逐渐降温，首都各高校的武斗也很快平息。在这种情势之下，谭厚兰一伙虽然不再明目张胆地抓捕殴打“兵团”，独揽北师大一切权力的既定方针并未改变，两派未能实现大联合，“兵团”作为谭厚兰的对立面依然存在，双方的对立与斗争进入僵持、胶着状态。直至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派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高校，掌握了一切权力，实现了毛泽东的第一条办法——军管。

第二部分 “兵团”与谭氏的分歧及由来

师大人都知道，“兵团”与谭厚兰等人的分歧由来已久，对立与斗争从未停止过。这不是“文革”初期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歧与斗争，一派要保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一派要反对工作组。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各高校的工作组被相继撤销，遭到批判，罪名是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了1966年10月份，北师大保工作组的那一派如鸟兽散。造反派迅速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井冈山战斗团”。谭厚兰与“兵团”总部的负责人之一郑云云同是创立者与领导者，“兵团”总部的主要负责人王颂平亦是“井冈山战斗团”最早的造反派骨干之一。也就是说，谭厚兰与“兵团”骨干原来是同一个战斗队的，这个队伍发生了分裂，郑云云、王颂平带着一批观点相同的造反派另成立了一个群众组织与谭厚兰对立，故取名为“井冈山造反兵团”。毛泽东当时有一段著名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取名“井冈山造反兵团”就是强调要造谭厚兰的反。

追溯“兵团”与谭厚兰分歧的由来，须考察当时的历史事实。根据保存下来的当时各派的印刷小报、会议记录、大字报、发言稿，参考亲历者或当事人的记述材料，可以梳理出以下的基本事实：

一、选举领导人时的潜伏矛盾

在“井冈山战斗团”成立时的1966年8月，虽然以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已被赶出北师大，但是以原保守派为骨干的“文革”筹委会”势力依然强大，他们执行的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对造反派依然进行压制。在保守势力的强大攻势面前，谭厚兰表现出畏难退缩，当造反派骨干学生找她并希望她领着大家斗争时，她对李庆林说：“你们干吧，我不当头了。”在“井冈山战斗团”成立并选举负责人的大会上，政教系的造反派骨干梁廷松等一些入竭力反对谭厚兰当选；另外一些人主张选谭厚兰，理由是：她虽然在“6.20”站出来反对高树奎等同学的大字报，但很快就站到了造反派一边，贴出了两张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字报，在工作组组织策划的围攻中表现坚定，影响很大，且在反党委时是打先锋的。同时又强调她是调干生，年龄比一般同学大，又是共产党员，在同学中是令人尊敬的先进分子，选谭厚兰应该有代表性。最后，谭厚兰当政委，郑云云当团长。

二、公开决裂的缘由

当时的意见分歧概括起来说就是两种思想的分歧：一种思想是毛所倡导的“敢”字当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反有理；另一种思想是害怕群众，脱离群众，压制群众。谭厚兰被许多人认为是后一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概括为三句话——政治上右倾，组织上关门，投降于“筹委会”。具体事实主要有：建立党支部，试图用党的领导取代红卫兵的自治。党支部的领导人为：谭厚兰、曾昭耀（青年教师）、黄贵贤（青年教师）；对保守组织“筹委会”不讲斗争，只讲团结。一味妥协，称呼“亲爱的”。发“一致筹委会的公开信”“二致……”“三致……”“四致……”；“井冈山”团部有人欣赏谭力夫的“血统论”，即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主张“红五类”才能干革命。大骂出身于地主、富农、旧军官等家庭但要求革命，想加入“井冈山”的学生群众是“狗崽子”，“让他们不要到‘井冈山’找避风港”；“井冈山”团报办报思想右倾，斗黑帮与“筹委会”搞和平竞赛。

谭厚兰利用党支部把持了“井冈山”团部的实际领导权，排斥另一些不赞成她的负责人郑云云等人，必然遭到有力的反击。九月底，南下贵阳、南宁的造反派战士返校，鉴于当时“井冈山战斗团”队伍迅速扩大，人数剧增，提出了令谭厚兰很不高兴的几点意见：1. 团部五人的最高权力和最大义务永远应该是、而且只能是听取和执行全团战士的意见；2. 谁是全国的最高领导？是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中央文革”。无论在任何时候，有哪个战士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最高，他就是党的领导；3. 对团部领导进行改选或改组，党支部只能领导党员，不能代替团部领导；4. 广泛发扬团内大民主，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随时“炮轰”团部。以上这些建设性意见遭到了谭厚兰等人的反对。于是团内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司令部”：一个是党支部所在地主楼236室，谭厚兰整天在236室，另一个是在主楼402室团部办公室，谭厚兰却是稀客，团内的分裂已呈表面与公开态势。矛盾的公开是在1966年10月7日的全团大会上。围绕着党支部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曾昭耀为代表的一些人坚决主张一定要有党支部，并要在各支部建立党小组；更多的人要否认党支部对井冈山的领导，提出如果非要成立党支部并领导全团，我们就退出“井冈山”，自己干！（编者按：这正是“兵团”分出去的思想基础，谭厚兰说“兵团”要夺她的权，思想根源亦在这里。）10月10日，“井冈山战斗团”全体党员召开统一思想会，有人提出“揪出赫鲁晓夫式人物”，矛头直指郑云云等人，但有人反对如此上纲上线。谭厚兰表态说五个团部负责人要搞好团结。当晚，五个团部负责人开了交心会。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0月12日谭厚兰去找郑云云，提出召开全团大会。郑提出先看两张大字报，尔后带着问题先开支队长会议，但谭不同意，坚持要开全团大会。结果，谭没有通知李庆林与梁碧芳两位副团长，由李五全主持召开全团大会。在会上，谭一边的人抛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揭发郑云云是“赫鲁晓夫式人物”的材料，批郑要夺“井冈山”大权。争吵的结果是历史系、化学系、物理系、中文系等支队忿而退出会场。休会后再开会时，原300多人的会场只剩下不足100人。于是，“井冈山战斗团”发生了公开分裂，不少人陆续外出大串联，郑云云发表了声明表示辞去团长职务。当时的情势是“揪赫鲁晓夫式人物”，团部五个负责人中就有三个不承认，另一个态度暧昧、含含糊糊，而“井冈山战斗团”的战士多数同情郑云云。但是，谭厚兰在林杰的直接指挥下，趁团部四个负责人外出串联之际，推出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其成员是：谭厚兰、黄贵贤、董连猛、邵忠诚、李五全、樊立耀、周耀文等七人。至此，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后台的“宫廷政变”终于发生。（编者按：在中央首长多次接见北师大代表时总要问：“兵团”为什么分出去？谭厚

兰也在1968年3月6日中央首长接见时说：我们反对他们分出去。“兵团”总是向中央“告状”说：林杰、谭厚兰把我们赶出去的。原因就在这里。）

谭厚兰全面掌握“井冈山”大权之后，在林杰、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采取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指使人刷出“打倒郑云云！”“郑云云必须低头认罪！”等大标语，贴出“批判新思潮”的大字报，在全校造成很大声势。借反击“12月黑风”之机抓了给林彪与“中央文革”贴大字报的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张传亭、李文博、李世取等六名学生，趁机树威。

谭厚兰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及在造反派内部的过激行为，引发了一大批造反派老战士的强烈愤怒，酝酿组织起来跟谭厚兰对着干。1967年1月26日，“井冈山造反兵团”宣告成立，李庆林为“总勤务员”，郑云云、王颂平、赵德骏和蒲寿章为“勤务员”。基本事实就是：“兵团”的成立是谭厚兰一伙逼出来的，从“兵团”诞生之日起就是谭氏权柄的对立物，谭厚兰必然视“兵团”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三、重大事件中“兵团”的行为

“兵团”与谭厚兰一伙的分歧与斗争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一开始是在“井冈山战斗团”团内部，只是意见分歧，分论而已，谁也没有上纲上线；但谭厚兰在林杰的指使下，排斥郑云云、李庆林等团部领导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非组织程序夺权，自己重新组建了一个七人的领导班子之后，对郑云云等视为敌人，刷出“打倒郑云云！”的标语，于是矛盾激化，斗争尖锐，斗争的焦点其实集中在领导权上，表现为革命造反派究竟应该由谁领着北师大搞“文革”运动。“兵团”成立后及“斗陶兵团”活动时期，则表现为两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公开地有组织、有计划的对抗与斗争。

如何看待这种对抗和斗争，是考察北师大“文革”运动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是研究北师大“文革”史的基本出发点或中心点。

北师大“文革”中发生过许多大事。这里不必铺陈这些事件，仅就几个重大问题或事件中，“兵团”的表现或行为给历史一个交代或陈述。

“九·七”事件中的兵团

在1967年9月7日，北师大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惊动中央的事件——原北师大革委会常委樊立耀、黄家林、李五全等聚集一批反对谭厚兰的人发动夺权，抓捕并批斗了谭厚兰，宣布成立“专政委员会”，推翻了成立不久的北师大革委会。此夺权事件经“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强力干预，以抓捕樊、黄、李三人，谭厚兰及北师大革委会恢复一切权力为标志而告结束。

“九·七事件”本来与“兵团”毫无瓜葛（编者按：如果“兵团”参与策划了推翻北师大革委会，哪怕有一点点事实，那么谭厚兰一纸文书就可以换来“中央文革”的一个批文，“兵团”早就“灰飞烟灭”了），但是，谭厚兰总是咬住“九·七事件”不放，不断诬蔑“兵团”要“推翻新生的红色政权”“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樊、黄、李等人为什么会发动“九·七”事件？为什么要夺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革委会的权力？他们原先可都是谭厚兰的“左膀右臂”，是“谭氏政权的核心成员”。

要弄清问题的答案，唯一可靠的办法是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当时的形势和真相是什么？

1967年8月底，林杰被中央撤职查办，北师大“文革”运动发生了剧烈动荡。被林杰打压下去被迫解散的“兵团”于九月一日宣布正式恢复一切活动；而谭厚兰同日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宣称“林杰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誓与林杰同志风雨同舟”，九月四日，谭厚兰组织一批人去冲击《红旗》杂志，向中央施加压力。但谭厚兰的保林活动很快受挫。谭厚兰在林杰问题上的恶劣表现引起全校许多师生的强烈不满，揭发了谭的一些问题：九月二日与王恩宇（林杰的干将）秘密开会保林杰；与叛徒、特务潘梓年、吴传启密谋勾结；整周恩来总理的黑材料等。当时的情势对谭厚兰很不利，樊、黄、李由谭厚兰的得力干将变成夺取谭氏权力的急先锋，究竟有什么动因？我们手中没有樊、黄、李被逮捕后的交代材料与官方档案记录，只有“兵团”的知情者的记录材料。根据这些材料，集中指向樊、黄、李多次联系北航韩爱晶，而韩爱晶直接联系的上层人物就是戚本禹。（编者按：因为谭厚兰是林杰的马前卒。林杰垮台，谭厚兰自然被抛弃，樊、黄、李等人欲取而代之，故有“九·七”夺权事件发生。但此事因干扰了毛泽东想在1967年左右全国各地都建立革委会的部署，担心北师大推翻革委会事件在首都乃至全国产生连锁反应。所以“九·七”事件发生的当晚，“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李钟奇传达周恩来指示等三个文件几乎同时到达，这在首都和全国极为罕见，可见此事件的严重性。人们分析：此事一定惊动了毛泽东。不然，中央不会有这么迅疾而强烈的反映，周恩来总理也不会为谭厚兰作出专门的指示，而且周恩来在9月24日（九·七事件发生不到20天）接见全国财贸口代表时又一次指出：推翻北师大革委会是错误的。

“九·七事件”酝酿至发动的许多让人疑惑的诡异现象，迫使“兵团”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十分谨慎：先是樊、黄、李拉“兵团”总部负责人进入他们的“专政委员会”，“兵团”当场加以拒绝；9月6日，韩爱晶对王颂平说：你们应当和樊、黄、李合作，把谭厚兰搞下去，我们支持“兵团”，但王颂平并没有答应。“兵团”总部开会讨论后认为：不能参与。事后和支持“兵团”的韩爱晶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关于“倒谢”问题

1968年春天，以北京高校带头发起波及全国公检法系统的“倒谢”事件发生。对这个事件应该作出怎样的历史性评论，在研究“文革”时自然不应忽视它。我们在此仅就“兵团”在“倒谢”事件的所作所为给历史和后人一个交代。

“兵团”在1968年3月15日决定批判谢富治并张贴了一批大字报，在首都高校乃至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主要原因有：（一）1967年12月27日谢富治与戚本禹召见北师大两派代表，不讲毛主席指示的实现革命派大联合，片面维护谭厚兰，压制“兵团”，给“兵团”扣上“搞垮革委会”的罪名——这引起了“兵团”全体战士的强烈不满。因为谢不是“中央文革”领导人，也不是毛主席、周总理派来的，“兵团”认为他的话不能代表中央，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于是内心产生抵触情绪；（二）后来，戚本禹倒台。“兵团”本来就认为戚本禹、林杰是谭厚兰的后台，他们的垮台自然促使“兵团”把谢富治与他们联系了起来，怀疑谢是他们的后台；（三）市革委会为师大两派举办学习班，偏袒谭厚兰一派，批评“兵团”搞资产阶级派性。“兵团”心中不服，于是把对学习班的意见与谢富治联系起来，认为学习班是在执行谢的旨意；（四）“兵团”认为王、关、戚、林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爪牙，谢与这伙人关系密切，为这伙人张目。在当时定性的反革命分子王恩宇、周景芳、涂武生等人被揭发出来后，谢公开出面保这些人。在公安部“1.15”抢档案事件中，谢公开保护、包庇反革命分子洪涛、刘郢等人；（五）2月21日，“中央文革”领导人对天津造反派代表

讲话，点出了两个典型事件——一个黑会，一个黑戏，指出要揭文艺界和公检法系统阶级斗争的盖子。“兵团”了解到黑戏的主人公陈里宁的案件与谢富治有密切关联，还了解到公安部部长严佑铭、杨奇清，七局局长肖孟被中央下令逮捕，自然联系到谢富治可能是他们的黑后台。

基于上述材料以及谢对“兵团”的片面压制，“兵团”产生反对谢富治的思想倾向。在中央领导提出揭开公检法系统阶级斗争盖子的讲话后，“兵团”认为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广大造反派发出的战斗动员令，于是就决定“炮轰谢富治”。但是，出乎“兵团”意料的是，在“倒谢”风潮刚掀起不久，周恩来、“中央文革”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出面保护谢富治。称“倒谢”是错误的。于是，“兵团”迫于压力，公开向“中央文革”认错，向北师大广大师生员工检讨。而谭厚兰抓住此事件猛烈批判“兵团”，搞得“兵团”十分被动，不少“兵团”战士在高压下被迫退出了“兵团”组织。谭厚兰查不出“兵团”“倒谢”的黑后台，虽给“兵团”的活动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终究没有搞垮“兵团”。

第三部分 “兵团”的历史评价

一、历史资料佐证

如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指挥者早已成为历史人物一样，人们总会作出自己的历史评价；对北师大“文革”史上出现过的人物、组织的历史事件，北师大人及普通民众，也会作出自己的评价。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如同问谭厚兰领导的“井冈山公社”是个什么性质的群众组织，人们同样也要问：“兵团”是个什么性质的群众组织？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有不同的立场、观念，甚至观察的视角、维度和方式都会不同。笔者以为，编写这本书既然主要是给后人阅读和研究用的，那么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透过历史真相从而确定一个比较客观的、历史的维度应该都是比较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这里有一份保存下来的历史材料——谢富治（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即一把手）、“中央文革”重要成员戚本禹、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钟奇、北京军区政委丁国钰等接见北师大各方代表的“座谈会纪要”（见附录17），时间：1967年12月27日早晨5：30；地点：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厅；参加人员：北师大革委会负责人8名，北师大军训团负责人2名，“兵团”代表6人。这个“纪要”是“兵团”的对立面“井冈山公社”的传达稿，从政治倾向上说显然是对“兵团”不利的。但是，笔者还是照录不误。细心的读者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央首长”对“兵团”的政治倾向性。

传达稿中说明：在正式座谈会之前，“中央首长”首先和北师大革委会负责同志和军训团负责同志进行了谈话，很关心地询问了北师大运动的情况，并讲刚才和清华大学的两个群众组织谈了话之后才召见“兵团”的代表。“兵团”代表刚一坐下，戚本禹立即责问：“你们造反兵团，还造反啊？”紧接着，谢富治说：“你们造反兵团造谁的反？我看是造革委会的反。”

戚本禹：“你们愿意不愿意联合？”

“兵团”代表：“毛主席指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贯主张大联合。”

戚本禹：“你们主张联合，那为什么分出去啦？”

“兵团”代表：“是林杰把我们赶出去的。”

戚本禹：“林杰不是北师大大的，他怎么把你们赶出去啦？”

“兵团”代表：“林杰插手了师大的运动。”

戚本禹：“林杰已经不活动了嘛，你们为什么还活动？是不是想把革委会搞垮？”

“兵团”代表：“从来没有这么想，而是他们不承认我们，说我们是非法组织、反动组织。”

（编者评：至此，戚本禹有意回避谭厚兰打压“兵团”的错误，其倾向性十分明显。同时也说明戚本禹十分了解北师大的情况，因为他多次至北师大亲自给谭厚兰下达指示，谭厚兰公开表态：对戚本禹同志的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不理解也要坚决执行。只是林杰已经被撤职处分，戚本禹才说：林杰已经不活动了，显然是替林杰掩盖，无法否认林杰插手北师大操纵谭厚兰的事实。）

谈话至此，戚本禹话锋突然一转，问“兵团”代表：“你们是否和外面串联？”

在接下来的召见中，谢富治、戚本禹虽表态说：听听你们双方的意见，不偏袒任何一方。但实质上是倒向谭厚兰一方的。要求“兵团”人员回到班级、系里去。谢富治明确表态：有了革委会、军训团两个政府，你们“兵团”必须服从领导。戚本禹则声称：林杰的事已经过去了，你们应当回到班上去。

（编者评：北师大虽然成立了革委会，但谭厚兰是一把手，一切大权集于一身。按照中央指示，应该是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谭厚兰是单方面“井冈山公社”夺了校党委的权，排斥了另一个客观存在的群众组织“兵团”，自然引起了“兵团”和众多师生员工的反对。但谢富治、戚本禹无视这个客观存在，以“反革委会、反军训团”的大帽子企图压服“兵团”。）

在召见中，当“兵团”代表揭露谭厚兰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把“兵团”打成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错误时，戚本禹突然向“兵团”代表反问：你们有没有后台？

“兵团”代表答：没有，从来没有！

戚本禹接着问：你们内部有没有坏人？

“兵团”代表：如果有坏人，我们一定揪出来！也欢迎所有人帮我们揪。

戚本禹：你们反对军训团就是错误的，就肯定有坏人，我可以肯定有坏人。把军训团、解放军上到刘、邓黑线上，这不是一般的学生说得出来的，是有政治头脑的人干的。

（编者注：在召见中，军训团的两个负责人基本没有讲话。当戚本禹说“兵团”有坏人时，军训团的政委告状说：“兵团”说我们是刘邓的黑爪牙，说我们是罗瑞卿搞大比武提拔起来的。“兵团”代表则说：“兵团”总部没有这样说过。而你们说：“对‘兵团’过去不支持，现在不支持，将来也不支持。你们保一派，压一派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戚本禹则指着李钟奇对所有与会成员说：他们是付崇碧的军队，是保卫毛主席的军队。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三人不久就被毛泽东撤职查办。）

从以上的摘录可以清楚地看出：

其一，谢富治、戚本禹对“兵团”是十分不满的，认为“兵团”是反对革委会，而谢本人就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戚本禹则武断地认为“兵团”内部有坏人操纵，但拿不出任何证据，现场的北师大革委会负责人也提不出任何一点点线索或怀疑的证据。

（编者按：谢富治身为北京市革委会的一把手，主管首都高校的“文革”运动，并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为什么谢不经调查研究，武断地扣帽子压制一个群众组织？在以后的若干事件中，“兵团”的负责人逐渐对谢富治产生了怀疑。这次召见种下的根苗，终于在1968年春

季的“倒谢风潮”中全面爆发：“兵团”贴出了一批反对谢富治的大字报。北京掀起的“倒谢风潮”最终被毛泽东压了下去，“兵团”也做了多次公开检查认错，但“兵团”负责人心中对谢的疑问始终未能消除。）

其二，谢富治、戚本禹有意回避毛泽东提出的各派群众组织要实现大联合的指示，片面地站在谭厚兰一边，维护其窃取的权力，对待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进行压制，助长了谭厚兰的气焰，致使其对“兵团”的武力镇压不断升级，最终酿成了轰动首都、震惊中央的“7.12纵火工五楼”恶性事件。

这里还有一份历史资料——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接见首都高校、中学红代会的代表纪录稿。时间：1968年3月6日晚；地点：人民大会堂。师大革委会和“兵团”各有代表参加。

接见开始不长时间，“兵团”负责人王颂平就要求发言，得到江青允许后，王颂平说：“我们作为北京市唯一的非法组织，今天第一次被中央首长接见，内心非常激动。”

江青说：你们有多少人？

王颂平答：七百多人，昨天又有五十多人加入了“兵团”。

江青说：了不起。

王颂平说：我们作为北师大的革命群众组织被谭厚兰赶出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者按：按照北京市革委会和谢富治的指示，为解决北师大问题两派代表参加的学习班）在学习班不是解决师大大联合问题，而是解决“兵团”反革委会问题，这句话是谭厚兰亲口对我讲的。在2月22日北京市革委会组织的学习班首长接见会上，谭厚兰说我们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我们滚出学习班，甚至说要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起来。

这时，陈伯达插话问：是不是市革委会学习班？

王颂平答：是的。王颂平接着说：周总理1967年2月15日对浙江“红暴”讲话时曾说过：北师大还没有实现大联合。谭厚兰居然公开对抗总理的指示，在全校大会上公开说北师大早就实现了大联合。现在有人要否定北师大的革命大联合，我们就是要顶着大风大浪前进。我们要问：谭厚兰顶的是什么风？（编者按：谭厚兰自1967年4月29日当上北师大革委会主任后，对“兵团”的政策就是两个字：整垮。手段不断升级：不承认——扣帽子——宣布为“反动组织”——武力镇压——放火烧楼。在此次中央首长接见中可以看出：她是不听从周总理指示的，这也是“兵团”坚持反对谭厚兰的重要原因。）

在本次接见中，当王颂平谈到北师大“九·七事件”中所谓“扣押谭厚兰”的真相，为自己当时的行为辩护时，谭厚兰并没有站出来反驳。韩爱晶说：我可以肯定，北师大的“九·七事件”与我、蒯大富、王颂平无关，请求中央派人调查。北师大的“专政委员会”可能是戚本禹搞的。接下来，韩爱晶谈北京航空学院的运动情况，揭发戚本禹挑动他们反对陈伯达。这时，陈伯达没有说话。江青说：我接到了你们搞陈伯达同志的材料。

（编者按：谭厚兰在此次接见的发言中强调：北师大谣言很多，有一股右的势力，有人插手北师大的运动，要害是政权问题。她虽然没指出谁是右的势力，谁插手北师大，但她很担忧自己的革委会主任的权力受到威胁。“9.7事件”后，反对她的也是革委会成员的樊立耀、黄家林、李五全等三人经中央批准，由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予以拘留，“中央文革”还发了一个紧急通知，明确地保了谭厚兰，肯定谭厚兰批斗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至此，谭厚兰有了“中央文革”这个“尚方宝剑”，有恃无恐。谁反对她谁就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就是反革命。自然，“兵团”与谭氏的斗争不可避免。）

二、观察“兵团”的视角

如果就北师大说北师大，试图归纳出北师大不同于北大、清华等首都高校的特点，讲清楚北师大在中国“文革”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出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发展进步有什么经验及教训，应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当我们这样做时，很快就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是谓“尬写”。北师大“文革”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之流插手并操纵最早、最深、最直接、影响最深远的一个领地，是“中央文革”直接指导并下达指令的一个重点单位，是谢富治和北京市革委会直接领导的一所高校，是“中央文革”按照最高领袖的指示实施战略部署的一枚棋子，就是谭厚兰担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师大革委会主任也是经中央批准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中的高层历史档案至今尚未解档，我们无从掌握高层的决策内幕，只能根据保存在亲历者手中半个多世纪的红卫兵小报、大字报、个人笔记、私人信件等有限的资料梳理出历史线索；还有一些是编者与尚健在的当事人的谈话记录，用以佐证当时的记载。总之，在叙述历史事件和过程时，为求忠实还原历史原貌，不加今天的主观评价。为了表明我们对事件性质的认识，以“编者按”的方式简单阐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尽可能给读者更大的思考空间。我们的观点或认知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判断上：

其一，如果说北大是“文革”的重要策源地（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语），清华是刘少奇直接插手的试验田（派出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掌握“文革”的领导权），那么北师大就是“中央文革”（康生、王、关、戚、林等直接插手）直接控制的一个战略高地。

在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的同时也派出了以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开进北师大。工作组执行的路线、政策与清华工作组完全一致，对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学生的迫害、镇压及其手段也几乎一致。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工作组被撤消，刘少奇以失败告终。于是，反工作组的领头学生被“中央文革”看中，亲自扶植他们当上了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成为“中央文革”的得力干将——这就是红卫兵五大领袖的简明发家史。

从北师大“文革”运动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谭厚兰以她自己的思维逻辑必然保工作组，事实也正是如此。她是学生中为数很少的女共产党员，湖南望城县人，是政教系的调干生（不是参加高考的普通高中生，是以干部身份从工作岗位选派到高校深造，若正常毕业后回原单位，是作为原单位领导干部培养的对象）。当时近30岁，受党的正规的灌输教育多年，是“党的女儿”。工作组既然是中央派来的，她自然会拥护保护。所以在1966年6月20日高树奎等17位同学贴出北师大第一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后，谭厚兰的第一反应是出面保工作组，声讨造工作组反的同学，这完全符合她的成长经历的思维逻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仅仅过了三天，谭厚兰突然180度大转弯，与他人一起贴出了影响较大的两张反工作组大字报，俨然成了反工作组的“闯将”。谭厚兰一反常态，突然反击工作组，是在被林杰秘密召见并深入谈话之后的反常行为，是政治投机心理支配下的主动投靠行为。在林杰的指使下，她排挤出郑云云、李庆林等老造反派领导骨干，搭建起以自己为首的谭氏领导班底，开始了她充当“中央文革”在北师大代理人的政治生涯。考察谭厚兰其后的一系列行为：从当上谢富治直接领导的北师大革委会主任，把持党、政、财、文、毕业分配等一切大权开始，直到1970年6月被拘留审查，再到“四人帮”覆灭，谭厚兰被以“反革命”罪于1978年4月正式由专政机关抓捕并判刑，终止于1982年患癌症死亡，年仅45岁。纵观谭厚兰短暂的一生，比起其他造反派领袖，她的个人结局是凄楚悲凉的。在那个疯狂变态的时代，个人命运在权

斗绞杀之下，无论当初如何光鲜显赫，不可一世，到头来卑贱如土，轻飘如尘，均成了“文革”的殉葬品。

从对谭厚兰个人的思维逻辑分析来看，她与“兵团”骨干人物的最大差别是：“兵团”人物都能独立思考，不随大流，个性特立独行，摒弃依附性人格，故而被正统的师生视为“无政府主义”；谭厚兰一些骨干，则是自觉投靠，主动依附，紧跟戚本禹、林杰，且权力欲极盛。看谭厚兰的会议发言、大会讲话以及“兵团”与她的争论记录稿，她对北师大的历史和现状并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经过独立思考而形成自己的判断与认识。她的所作所为只能表明她是幕后人物的一个“提线木偶”。请看事实：当林杰问题被揭露时，谭厚兰以自己惯常的思维判断林杰是被陷害的，公开跳出来大保林杰，在大会上高呼：“与林杰同志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当获悉林杰彻底倒台后，谭厚兰又急不可耐地与林杰划清界线，声称自己受蒙蔽；当谭厚兰的心腹干将樊、黄、李策划“九·七政变”推翻北师大革委会时，谭厚兰连忙在大会上假检讨，承认自己被坏人利用，丝毫不见她勇敢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斗士形象。当“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连下三个文件的指示，保护谭厚兰及北师大革委会时，谭的表现先是惊魂未定，完全没有自信；一旦站稳脚跟后即凶相毕露，失去理性，丧失人性，残酷打击迫害对自己有意见的同事和战友，并开始了对“兵团”法西斯式的疯狂剿杀。因此，扭曲的人格导致了行为的变态，终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们说，谭厚兰等“造反派领袖”是悲剧人物，是“文革”的殉葬品，不仅因为他们自觉追随“中央文革”，还因为他们在“文革”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谭厚兰就干了不少坏事：1966年11月，谭厚兰依照康生、戚本禹的指令率队去曲阜造反，毁灭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历史古迹至今令后人扼腕叹息，她在全国开启了疯狂毁灭文物和一切传统文化的罪恶风潮，带了一个极坏的头；她率队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大使馆级），引起了严重的外交事件，破坏了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她率先对余秋里、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批斗，与北航韩爱晶殴打、揪斗彭德怀元帅遥相呼应；谭厚兰在北师大滥抓一大批各级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教授，致使几十人非正常死亡，等等。这种种罪孽和暴行，完全是谭厚兰充当“中央文革”一伙急先锋造的孽，这叫作“自作孽，不可赦”。

我们审视了谭厚兰在“文革”中的行为轨迹，再来观察“兵团”与谭厚兰长期斗争的过程，就会发现“兵团”的对手不仅仅是谭厚兰一伙“极左分子”，也不仅仅止于北师大这个范围，而是与一个看不见的强大的幕后力量对抗。“兵团”的对抗绝不是受什么人指使，而完全是自己的认识，觉得是正义的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诚然，是肤浅的，朦胧的，谨慎的——正是这个神秘的巨大的力量最终决定了“兵团”的宿命。

其二，我们的第二个基本判断：“兵团”及它的宿命说明“兵团”也是另一类“悲剧人物”。如果说谭厚兰是受“中央文革”指使的“悲惨的殉葬品”，那么“兵团”则是与其进行正义斗争的另一类“悲壮的牺牲品”。

“文革”是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虽然搞了十年之久，最终还是弄成了一个乱局而无法收拾。随着最高领袖钦定并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折戟沉沙，自我爆炸，他也一蹶不振，一病不起，最终随着死神的召唤，他的“文革”伟业”终成生命的绝响。“文革”宣告失败，败得十分惨烈。

历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当年的“风云人物”或“革命小将”已进入了古稀甚至耄耋之年，有不少人已经作古。“文革”大幕虽已垂落，但“剧评”远未终止，遑论达成全民族的共识。不仅民间一直争论不休，网络等新媒体呈公开撕裂状态，甚至演变为严重的社会情绪对立。根本原因在于中共自己尚未有一个正式的官方结论，还没有一份专门针对“文革”的

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文本。至于那个1981年出台的“历史决议”，它不是专门针对“文革”作历史结论的，那个文件共有八个内容的标题，“文革”只是其中的第五个题目。那个文件已过去了37年，一直饱受质疑。虽然没有哪个领导人公开说，“文革”不许讨论与研究。但实际操作中，对“文革”真正史学意义和层面的研究却无形中列为禁区。诚然，“文革”早已成为历史，“文革”中的人物已是历史人物。对待历史，只能研究它，不准研究是徒劳的。

在北师大“文革”运动中，“兵团”和“井冈山公社”中的绝大多数都是20来岁的青年大学生，大家都怀着对“伟大领袖”最自然、最朴素的感情，按照自己的认识水平解读领袖的指示，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认为自己才是最革命的，最正确的。从这一点上说，既然“文革”被彻底否定，大家岂不都是“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利用的一个工具？既然如此，一笔勾销岂不了事？研究北师大“文革”史，实际上不能一概而论。“兵团”与谭厚兰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第一，谭厚兰被中央定为“反革命”而锒铛入狱，虽死亡也决不可能被平反；“兵团”的领导人虽也一度被关押审查，但最终无罪释放，安排了正常的工作，现在也是依法纳税的合格公民；第二，谭厚兰及其领导的组织在“文革”中不仅有严重的错误，而且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兵团”在北大“文革”中没有干过坏事，没有被坏人利用，没有犯政治性、历史性的错误，“兵团”多数骨干成员被关押审查过，但最终没有查出一个坏人；第三，谭厚兰自觉执行康生、戚本禹、林杰等人的指示，有幕后黑手操纵；“兵团”没有什么黑后台，不受任何人指使，所作所为均是自己调查、讨论后的共识，是独立精神支撑下的民主行为。因此，任凭谭厚兰采取各种卑劣手段直至武力攻打，始终也未能整垮“兵团”。

考察北师大“文革”史，“兵团”与谭厚兰及其后台的对抗斗争是一条主线。我们认识到：不但北师大的任何一派都不是胜利者，在首都这个“文革”的主战场也没有谁是胜利者。本该学习专业知识的大学生突然中断了学业参与“文革”，耽误了青春和学业，被忽悠成了“文革”的牺牲品。本该如期毕业分配工作的大学生，被延迟两年半以后才予以分配。大好青春被白白断送，如花岁月几经飘零。回首往事，情何以堪？

“文革”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怪胎和梦魇，应该叫“华殇”。国外已有不少研究中国“文革”的机构或组织，已出版了一批著作。遗憾的是，中国至今尚未启动编写“中华‘文革’史”的工程。我们在研究中试图找出一点点“文革”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但结果是徒劳的。如此荒唐、荒谬——从理论到实践的十年闹剧，1981年的“历史决议”仅仅定性为“动乱”是远不准确的，应该叫它“国耻”。

在现实背景之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给北师大的“文革”史一个交代，给我们的读者和后代一个记忆，给研究者一个研究参考——这就是我们写作的目的和动机。

第四部分 “四·二六大抓捕”迷案

1971年4月26日，北师大发生了一件震惊首都、震动全国的非法抓捕青年学生的事件。事件虽然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至今官方没有任何一纸文本，甚至连个记录都未见披露，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在被抓捕的青年学生多数都健在，编者根据对亲历者的访谈记录，以在案，以警后人。

1971年4月26日凌晨两点左右，住在北师大中南楼的“兵团”与部分同情和支持“兵团”

的同学已进入梦乡。突然间，楼内灯火通明，各房间被猛烈的敲门声震响，室内同学惊醒后开门一看，只见大批军人和警察，一副如临大敌的神情，军警一一盘问：“你叫什么名字？”同学回答后，军警手里拿着准备好的名单一一核对。如果对上名单（旁边有谭氏帮凶指认），立刻被两名军警左右卡住手臂拖出屋外。有的让穿上一件外衣，有的只穿着背心、拖鞋，不由分说，架着就往外拖拽。被抓同学问：“你们奉谁的命令？凭什么抓我们？”回答的口径则一致：“我们是执行中央的命令，给你们办学习班。”有的同学表示不满，提出抗议，立刻被掐住脖颈，反剪双手，如同抓捕逃犯一般。不一会儿，近百名同学经指认后被架到楼下。中南楼紧挨学院南路道路旁，原有一土围墙隔开楼与道路。此时，围墙早已被事先挖开数个可通二三人之豁口。被抓同学被军警们拖拽出豁口，拉到道路旁，只见路边一长串卡车、军用吉普一字排开，夜幕下看不清首尾，几十辆肯定有。后车厢板已被放下，被抓同学被一一拽上卡车。军警们命令同学们坐下，周边一圈军警将同学们围在中间，军警们则一律站着。开始时，同学们还发出质疑：我们犯了什么罪？凭什么抓我们？但得不到任何回应。后来同学们高唱红歌，齐诵“毛主席语录”，军警们也不理睬。过了约一小时，反复核对被抓者姓名、相貌之后，一声令下，汽车向首都的东北方向——怀柔县驶去。春寒料峭，凌晨冷风飕飕。同学们衣衫单薄，在冷风中瑟瑟发抖，大家紧靠在一起相互取暖，不再呐喊抗议，军人们也不搭理同学。行驶约两个小时，天刚蒙蒙亮，来到一座兵营（后来得知是一个师级野战部队，番号记得是4562部队）。刚开始，同学们被关在几个大点的房间，大家聚在一起一商议，觉得是非法的秘密抓捕，肯定有大背景：是北京卫戍区？但这样的行动不会是司令员下的命令。是谢富治？他最恨“兵团”，因为“兵团”参与“倒谢”风潮。但他能调动警察，却不可能指挥军队。肯定是党中央！中央又是谁下的命令？同学们脑子里迷雾一片，觉得不可思议。被抓同学一齐要求军营里的首长出示逮捕文书，宣读逮捕命令，但得不到回应。很快，军人按照名单把同学们分别关进小房间，有的单独关押，是他们确定的重点审查对象；有的是3人或4人被关在一个房间，是他们认为的一般成员。每人发2条薄薄的军用绿色被子，水泥地上铺上稻草。玻璃窗被钉死，刷上油漆，不透一丝光亮。房门上端有一小块玻璃，用油漆涂了四周，中间仅留一小块透亮，供哨兵们窥视同学们的一举一动。同学们常常在噩梦中惊醒，一睁眼就看到一只窥视的眼睛，顿觉恐怖。（编者按：被抓同学在被释放后的许多年内，只要看到有人从门缝中观察或只露出一只眼睛，就会吓出一身冷汗。至今当事人回忆起被关押审问的细节，仍会心有余悸。）半个多月睡水泥地后，不少同学喊腰酸背痛，反映上去后才给每人换了一块简易木板当床。吃饭虽是一日三餐，但十分粗陋：天天、顿顿清汤玉米稀粥，男同学阴囊部位呈鱼鳞状，奇痒无比，一抓就破，痛得钻心。每当同学们忍不住抓挠时，就会冲进两三个军人，同学们毫无隐私可言。哨兵汇报上级后，过了两天，看守哨兵带同学们去军营诊所，医生让同学们扒下裤子，只瞄了一眼就给了一包一模一样的白色药片。后来才知道是患了维生素缺乏症。关押半年多被释放后听女同学说，她们也患上了妇科疾病，对身心摧残很大。

在关押期间，常常是三至五个军官模样的审问一个同学，上、下午各一次，常常在晚上再审一次，其余时间命令同学们写交代揭发材料。审问的问题，一开始是所谓的“三反”——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委员会、反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事先给“兵团”定的罪名，以此作审问的基础。审来审去，找不出“兵团”反中央及“中央文革”的任何证据，倒是谭厚兰有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揪“军内一小撮”的证据，“兵团”却没有。能抓住的最大问题就是“倒谢”——这是公开的行为，无非就是贴了几张大字报。况且，谢富治当时就表态：贴几张大字报不算什么，以后不要再提了。并且“兵团”也没有接受什么人的指使，不过是心

中对谢偏袒谭厚兰压制“兵团”有气，趁首都的“倒谢”风潮参与了一把而已。这些情况，审问者早已掌握，无非就是让“兵团”同学再说一遍，再写一遍，实在榨不出新鲜材料，于是只好作罢。至于反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反对谭厚兰那些事，审问者没问出什么有用的材料，反倒让“兵团”再次控诉谭厚兰的倒行逆施，审问者无奈，只得沉默不语，作些记录。至于反对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是无稽之谈。审了半天，就是“兵团”对先前的军训团支派不支左，支持谭厚兰压制“兵团”的行为有意见，既没有上纲上线，也没有过激行为。后来军训团撤走，此事也一风吹了。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召见“五大领袖”后不久，中央给北师大派来了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工、军宣队进校后不久就宣布“兵团”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推倒了谭厚兰强加给“兵团”的罪名，指出林杰等坏人插手北师大，破坏北师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兵团”获得了平反，没有理由反对工人、解放军宣传队。

后来，审问者实在挖不出给“兵团”定罪的材料，逐渐也不提“兵团”的“三反”问题了。转而诱导同学们揭发“兵团”坏头头反康生、陈伯达的问题。其实，“兵团”的少数人曾在极小的范围内悄悄地议论过康生，怀疑他是谭厚兰最大的黑手，因为他指使谭厚兰率队去曲阜毁灭文物古迹等。但因为康生是“中央文革”领导，是毛泽东、江青信任的中央常委，“兵团”也不敢公开反对。无论审问者如何威逼利诱，使尽手段，但找不出一点有用的证据。

审问者逐渐失去耐心后，又让“兵团”同学揭发“坏头头”王颂平的“反革命罪行”（当时王颂平被关押在北京半步桥监狱，罪名是“反革命”）。“兵团”最兴旺时不过800人，没多久，在谭氏革委会的镇压下，只剩200多人；谭氏火烧工五楼后，只有不足百人。“兵团”开会经常全体参加，谁都可以发言，王颂平虽被推举为负责人，其实只是一员。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她比较坚毅，头脑比较清醒，主意也多一些，亲和力也强。同学们不觉得她有什么政治野心，想攫取什么权力，所以也愿意和她一起讨论问题，实在想不出王颂平有什么背着大家的阴谋勾当，说不出她究竟干了什么坏事。没过多长时间，审问者又一次失去了汹汹的气焰。刚审问时，军官们一拨审问又换一拨，搞“车轮战”，有的同学写了交待材料，审问者就播放录音，搞“心理战”。总之，恐吓、威逼、利诱，扯出同学的恋爱对象攻心，除了没有灌辣椒水之类的用刑，其他手段跟影视剧里的描写差不多。因为“兵团”没有干过什么见不得人、上不了台面的坏事，无非就是一些公开的大字报，聚在一起不肯回班、系，不愿解散“兵团”而已。审问者见审不出结果，慢慢放松了审问。只是让同学们写自我认识，互相揭发交代。“兵团”里的同学都是自愿加入的，没有任何利益和个人好处，有的只是被整受压，讨厌靠揭发同学的某些言行进行投机的卑劣行为，所以揭发不出什么东西，只好写自己怎么加入“兵团”，为什么反对谭厚兰，一起开过什么会，讨论过什么问题，写过什么大字报之类。如果写了材料，晚饭后由哨兵看着绕营房的小路上走上一段，周末由哨兵陪着和战士们一起看电影。如果不写材料，被认为态度不好，整天关着，不准出门。

1971年“9.13事件”爆发，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在军营内不胫而走。“兵团”的一切对外联络包括私人信件都被监控与限制，自然无从知晓。过了一段时间，那些每天由哨兵陪着散步的同学悄悄地传出纸条：“林逃摔死在蒙古！”这消息像平地一声炸雷，迅速弥漫在整个军营。“兵团”同学们全都懵了——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中共九大修改后的党章钦定的接班人，怎么会驾机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不可思议啊！

在当时，“兵团”对于中共高层权斗的波诡云谲虽有所悟，但林彪事件太诡异了！同学们可以感觉的是军营里的待遇突然变好了起来：饭菜有明显改善，晚饭后由哨兵陪着散步，周末可以看电影，可以去军营小卖部买点日用品，审问次数大大减少，态度也温和了许多。

到了当年的11月中旬，没有任何宣布或解释，“兵团”同学被陆陆续续释放回校，先放一般成员，后放骨干成员，几天之内全部释放。近七个月，关押近百人，抓时秘密行动，放时悄无声息，像一阵风吹过，“兵团”的所有罪名顿时烟消云散！

回校以后，除了少数同学被继续关押（办学习班），多数同学回到各自所在的系、班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工、军宣队组织的各种学习和批判活动，主要内容是“批林批孔”和清查“5·16反党集团”。春节一过，传出留校的最后两届毕业生——69、70届分配至全国各地工作。至1972年4月，“文革”开始后的五届毕业生全部扫地出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北师大顿时成了一座“空校”。

没有任何官方文件，没有任何领导人出面，甚至连一个口头宣称也没有，某天夜阑人静时，几百名军警突然闯进男女生宿舍，抓走近百名大学生，秘密关押近七个月，尔后，没有任何审查结论，没有任何负责人表个态，说个话，林彪摔死后不久就悄悄释放。然后延迟3年的两届毕业生全部赶出校门。——这件事十分诡谲，疑云密布。虽然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文革”中的许多事件，后来的研究者总有一些记述，有一些历史材料或档案披露，但北师大的“4.26大抓捕”却成了一桩“谜案”。

“谜案”之一：当时，谁有那么大的权力调动军队抓捕大学生？动用一师为高校的事忙碌？在“文革”时期，军队只听命于毛泽东一人，调动一个连也得请示于他，连林彪也不例外。北师大发生“九·七事件”，震惊首都和全国，“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连下了三个文件处理事件及责任人。而抓捕近百名大学生，关押近七个月，却没有任何文件，也没有任何领导人宣布指示。快半个世纪了，也见不到半纸文本或记录，这不是“谜”吗？

“谜案”之二：被关押七个月的大学生全部无罪释放，连“坏头头”王颂平等虽仍被关押一段时间，但最终仍无罪释放、宣布平反。毋庸置疑，这是一桩大冤案！为什么不作结论？只能有一种解释——抓错了，但不能认错！“文革”中制造的海量冤案后来都一一平反了，为什么这桩大冤案至今不予平反？甚至连个说法都没有？

我们找不到书面证据，也无法接触北师大的相关档案，只能在历史的逻辑链条中寻找答案。根据北师大“文革”史研究者披露的资料，我们发现毛至少两次直接发表过对兵团的意见——一次是1967年5月5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470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的报道，报道称：炮五师在北师大搞军训期间，坚决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对保守势力和中间派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瓦解了保守组织，提高了中间派的阶级觉悟，壮大和巩固了左派队伍。（编者按：军训团为谭厚兰站台，把“兵团”打成保守组织，“兵团”当然不服。）毛对这篇报道有个批示，时间是5月7日。批示主要内容如下：“文革”小组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如准备发表，事先要找炮五师、谭厚兰、李庆林等同志核对属实。（编者按：毛的这个批示说明他对“兵团”的事是知道的。）另一次是，1968年7月28日毛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说：“谭厚兰，‘文化大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二百人的‘兵团’也没有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们想夺权嘛。”（转摘自韩爱晶的记录材料，后公开发表过。）“兵团”当时没资格参加毛的此次接见，传出来的并不一致，“兵团”也不愿意接受对自己不利的讯息。以后仍然采取对抗谭和军训团的态度，这就为自己触怒最高领袖埋下了祸根。一个得不到“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支持的群众组织，一直不听劝告自己解散，即使工宣队、军宣队奉伟大领袖的指令进驻高校也不听话，那么，解决这个组织的最迅速、最彻底的办法在

当时的情势下，似乎也只能是全体抓捕并关押于校外很远的秘密之处。因为他们毕竟是一批年轻大学生，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策划抓捕计谋的可能有“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领导人，但调动一个整编野战师执行任务，那么谁有权下最后的命令呢？只能是最高领袖！只有他下命令，才会发生如此诡异的事件；只有他下命令，“兵团”同学才没有进监狱而进了军营；只有他下的指令，为尊者讳，这件谜案才会至今仍沉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我们记言于此，唯期揭秘的一天。

忆北师大物62-1班——暴风雨的酝酿和劫难

刘 明

岁月如梭。从1968年离校至今，整整半个世纪逝去了。我们都由当年风华正茂的花样年华走到了如今风烛残年的古稀老人，即将失去对往事的记忆和留存记忆的能力。1962—1968，我们的全部大学生活都是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度过的，尤其经历了1966年6月—1968年8月，红卫兵冲锋陷阵的“文化大革命”狂飙时期。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学识、生活和经历均以不同方式留下了青春年代深深的印迹。作为个人，可以“青春无悔”，可以“不堪回首”，但作为曾经的“精英”（不赞成对该词的褒义解读，这里取道德中性涵义），人民的血汗将我们养大，让我们接受了极为稀缺的高等教育，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以过来人的身份将自己对文明对历史的理解奉献给衣食父母。在此，我将试图解剖我所在的物62-1班这只普通麻雀，观察在那个偏激、疯狂的年代，北师大演出的富有师范特色的时代悲剧及其序曲。

一、1962年春夏的形势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人类社会在相对稳定的宏观大背景下，每个阶段的微观形势总是在进行着主动或被动的调整和变动，这是一个规律性现象。1962年也是如此。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年一样，中国的大局为毛泽东版的“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套用将邓小平理论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模式，是否可以将毛泽东的国策归结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闭关锁国”？）所牢牢掌控着，但也正是在这年，政策发生了从春夏的深化宽松政策掉头为秋冬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转向，平民百姓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节奏随之振荡。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高中毕业生，在这样一个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参加高考时都有所不同的年代，迈入人生的又一阶段。

回溯1962年的形势，还必须进一步往前追溯。1957—1958年，由于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这样的左倾指导，出现了1959年开始的经济困难时期。正值高中时代的我们，温饱不能保证，学习节奏放慢，就是当时形势的反映。1960年9月，中央首次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这一方针。1962年上半年，仍然延续着前两年比较宽松缓和的政治气氛。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党史上常称之为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分析1959—1961年发生经济困难的原因，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批判了“左比右好”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带头做了自我批评，刘少奇代表中央做了自我批评，并多次要求与会者对中央提出批评意见。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也纷纷做了自我批评，并要求从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左”的错误，政策上要退够。

1962年3月，国家科委、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史上将两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无产阶级与作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在知识分子中也有左、中、右，但有些部门和机关用左、中、右排队就不好。”陈毅在会上提出“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在北京举行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又比较系统地检查了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和错误，“要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上述两个大会，在党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各地方各部门积极行动起来，贯彻中央“反左”“退够”的指示。

5月，教育部正式下发通知，为了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简教职工，高等学校从原来的845所减为400所。1962年高等学校录取率为1950—1965年期间之最低便不奇怪了。

时间 (年)	参加高考人数 (万人)	录取人数 (万人)	录取率 (%)	在校生 (人)
1949		2.1		11.7万
1950		5.8		137470
1951		5.2		153402
1952	7.3	6.64	91%	191147
1953	9	7	77%	207932
1954	13.4	9.38	70%	252978
1955	17.7	9.8	60%	287653
1956	35	18.5	48%	403176
1957	25.2	10.5	42%	441000
1958		26.5		600000
1959	33.3	27	81%	
1960		32		962000
1961	21.4	16.9	80%	
1962	44	10.7	24%	830000
1963	53.1	13.5	25%	750118
1964	44.9	15	34%	685314

1965		16.6		674436
------	--	------	--	--------

（上表数据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1984年）

大学准备少招新生，当年的高等教育又是“精英教育”，那么只好强化“择优录取”的方针。哪些学生优秀呢？这年教育部做了一次高校调查发现，成绩优秀的10个人中，8个是高知子女，1个是农民子女，1个是“右派”子女，干部子女一个都没有。

5月，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要求，“做好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对于右派分子的家属和子女，不要称为‘右派家属’‘右派子女’，在升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不要歧视。”

当年高教部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大学招生录取口号：“宁缺毋滥”（见当年招生负责人之一张健在《中国青年》的谈话），上面的两则信息为该口号作了注释。

二、入 校

7月举行高考，8月各校发榜，9月入学上课。来自全国各地约一千名高中毕业生迈入了位于北京北太平庄的北京师范大学大门。其中100人进入物理系，分成三个班，34人组成了物理系62级1班，简称8621班（物理系在北师大序号为8系），因为是五年制，我班也可以称之为物理系1967届1班。其中生源地为北京的有13人（男6女7），约占40%，如此高的比例，大概是因为北京录取率较外省市高的缘故吧！接下来的整整六年，我们共同参与了一场求学一交谊一革命的三重变奏。

与我曾经就读的母校——小学三年级到初中毕业所在的北京育才学校（1956年9月前为育才小学）九年二班（男生：女生=12：25），高中所在的北京四中（为与女四中相区别，又称为男四中）高三一班相比，我大学住宿六年所在的这个班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男生虽占压倒多数，但有女生（男生：女生=25：9）。进入青春期的两性必然会发生丰富多彩酸甜苦辣的纠葛，这种纠葛先是以感情色彩为主，随着阶级斗争之风愈演愈烈，政治色彩愈来愈重。其造成的后果是相当深远的。为了避免发生种种新的不快，本文不得不完全回避评述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

第二，“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弟多，出身资本家小业主中农职员的比例高，“红五类（工人【包括城市贫民】、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少，这是1962年录取方针的直接结果（红五类：中农：职员：资本家小业主旧军官旧官僚：黑五类=7：5：5：6：10。1人情况不明）。这样的出身成分构成势必成为后来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引证案例之一。另一方面，1966年“文革”号角吹响之后，我们所在的四年级远远没有低年级那样活跃，那样能量巨大，上述出身结构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大家都很穷。早在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的文化古城时期，古城的大家淑女们在择婿时就曾达成共识：“北大老（即北大学生年龄偏大），师大穷，燕京清华好通融（即可接受）”。虽然时移世易，但说“师大穷”则仍旧成立。在消灭私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政策指导下，又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平民百姓都穷，大学生们一样穷，而师范生就更穷，否则怎么会读师范呢？北京师范大学固然从未在老牌大学一名牌大学一重点大学的行列

中掉队，但是她在社会上的吸引力不要说逊色于北大清华，就是和北航（北京航空学院）、北医（北京医学院）等八大学院和人大（中国人民大学）、科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新办大学比，也没有优势。要害就在于“师范”二字！北京师范大学就是要培养“点燃自己照亮众人”的好蜡烛——大学和中学教师，但心志高远的年轻人，尤其是男孩子并不甘心做“两头点燃的蜡烛”。那么我们这些成绩优秀的同学为什么会读师范呢？有两点原因。一是，1962年虽然政策宽松，但很多专业仍然有政审方面的要求，师范院校都没有；二是，师范院校吃饭不花钱（故一向被戏称为“吃饭大学”）。北师大当时提供给每个学生的伙食标准是12.5元/月（1964年起提高到15.5元/月），这是相当可观的生活补贴。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实习工资是46元/月（正常情况下，应当是实习一年，第二年转正。但是我们毕业于非正常年代，从1968年7月—1973年，拿了四年多实习工资。），转正以后是56元/月（指以北京为代表的六类地区，低于六类的其他地区，如江苏、河北等，则更低。新疆西藏青海等边远地区则稍高。），家境困难者为减轻家庭负担不能不见饵上钩。当然一般高校也有对于困难学生的生活补贴，但是必须得通过政审这一大关，出身不好的难道能通过？我当年的家庭背景是：父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母亲工资仅60元要负担六口人。无奈之下，只好听从舅公言心哲（社会学家，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降职使用，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他毕生关心我们家父子两代人）的建议，报考北师大。此一师范特色到1966年血统论对联得势之时曾演绎出北师大特色的“文革”一景，此为后话。

第四，没有高干（包括高级军官）子女。我接触过的许多师大同门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班级均如此，不值一提。由于我的上学经历特殊，对比强烈，所以要讲讲自己的感受。我在位于北京先农坛的育才小学—育才学校住校七年度过了小学—初中时代，班里90%左右的同学是高干子弟（父亲或母亲系厅局级或13级以上干部），全校各个班级的学生结构基本如此。又在位于北京西皇城根的四中先住校后走读度过了三年高中时代，班里父辈为部长将军级别干部的同学就有10人之多，大约占四分之一强。历届四中学生中，父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一级的就有数十名之多，更遑论较低级别的干部了。与平民子弟相比，高干子弟有几个特点：一是因为处于社会上层（故被一些人称之为红色少年贵族），有条件读书多见闻多（尤其是文职高级干部子女），自信心比较强，胆子比较大；二是消息比较灵通，比报刊广播的消息更快更多。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不久，课下就传出了与会议相关的消息，同学们还为我们党经历了这样一场重大斗争，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感到欢欣鼓舞。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广州会议之后消息也比报刊广播来得快；三是联系紧密比较抱团。因为高干子弟的父母之间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相互间来往机会亦比较多，再加上拥有权力背景，所以在北京的几个干部子弟较为集中的大中学校，他们行动起来所具有的能量会远远超过他们在群体中所占有的比例。

我们班没有高干子弟，就是年级、全系、全校，也极少高干子弟，就是中级干部（县处团级）子弟也很少。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北师大的社会地位不高，这成为决定北师大“文革”运动特点的要素之一。

1966年6月“文革”运动在北京大学首先点燃后，以李讷、林立衡、林立果、邓朴方等为代表的已离校和在校的北大高干子女，以刘涛、贺鹏飞等为代表的清华高干子女，在“文革”中尤其是在运动前期，或者居于幕后，通风报信、指点策划、中介联络；或者冲在一线指挥领导运动；再加聂元梓本人就是从延安走出来的13级高干，与北京高层人士存在多方面的联系，上述因素对于两校的运动形态发生了亟须正视的重大影响。

“中央文革”选择通过林杰—谭厚兰操纵北师大的造反运动走向，应当说是和北师大的

学生成分构成相关的。林杰之妻王乃英在1968年书写的一份材料中就提到：“王大宾、谭厚兰是出身贫农家庭，就比较老老实实，和干部家庭出身的蒯大富、韩爱晶就不一样……”（王乃英《关于北京市“文革”初期活动的交代》，《记忆》第158期）北京相当多的高校，以及北京四中、六中、八中、101中、师大女附中、师大附中等名校，都可以看到干部子女对于运动的影响。近年来面世的诸多“文革”回忆录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在“文革”中显现出来的巨大能量。而在北师大，则几乎看不到这种影响。这就为突出林杰的作用，“中央文革”的作用提供了背景条件。我期待发现更多更权威的文献能够确证，平民出身学生的规模优势，干部子弟的稀缺是“中央文革”做出这一选择的重要动因。

就在我们入学前夕的1962年8月，举行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发出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号召。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申的北戴河会议讲话精神写进了全会公报，并且郑重提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请注意：这条219字的语录，在“文革”期间人人耳熟能详，我们不知道背诵过多少次。真可谓“牢记在心坎上，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其威力恐怕是任何经典作家语录无出其右。）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回头来看得很清楚，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向全党全国播响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鼓。

至此，从1960年开始执行的八字方针走向终结，阶级斗争之弦愈绷愈紧，直到1966年5月爆发灾难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弱冠少年以各自选择的不同角色卷入到这场政治洪流之中，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终身的命运走向。

三、求 学

入学后，从1962年9月至1966年5月，我们先后学习了几十门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接受了比较完整的物理理论和实验教育，接触了几十位各科教师。他们的音容笑貌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对比当下“教授、博导、专家权威”泛滥成灾，当年我们的数理老师（当时称呼为“先生”）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普遍的高能明德低职低薪。给我们授课的老师以30—40岁的教师为主，50—60岁的“老先生”罕见，比我们稍长几岁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出任助教者，则为数不少。老师们都能尽职尽责，诲人不倦，业务能力完全称职，道德瑕疵根本没有听说过。但是就专业职称而论，除祁开智为唯一的（二级）教授，吕烈扬、张阜权、赵亮坚等四个副教授，柳藩、刘锡龙、高尚惠等四五个讲师，其余70—80%的老师仅有助教（或者教员、资料员）这样的初级职称。耳闻目睹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学业修养，无论其老少高低，均受到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莘莘学子的衷心爱戴和敬佩。放在今天，大学里30岁上下的副教授，40岁上下的教授，已经司空见惯，与半个世纪之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在1960年代的重点大学，更不要说一般大学中，已经是普遍现象，有官方文件为证。

1962年教育部召开了重点学校师资工作会议，会议着重指出，重点高等学校师资队伍的主要问题不是数量少，而是质量低，讲师以上教师的比例小，青年教师的比例过大，骨干教师尤其缺乏。下表给出了1949—1962年这13年来大学师资的各级职称比例演变态势：

单位：万人

年代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及其他
1949	29.8	13.5	23.3	33.4
1952	19.3	10.8	25.6	44.3
1958	5.1	3.8	15.3	75.8
1962	2.6	2.7	19.1	75.6

（上表数据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1984年）

1960年代，以高等学校为代表的国家学术人才的缺乏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北师大物理系仅为沧海一粟。

四年学习中，几门主要课程，几位任课先生的教导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入学伊始，赵亮坚先生主讲，漆安慎、杜蟬英先生辅导《普通物理—力学》，赵先生身材高大，标准男中音，概念阐释得准确清晰，令我们对这门史上第一精确科学敬而不畏（更有一件小事我终生难忘：1963年春的一个周日，我骑车去王府井外文书店看书，偶遇赵先生，我即恳请赵先生给我推荐英文参考书，赵先生在比较过后，给我推荐了一部mechanics，这就是我此生购买的第一部外文书）；漆、杜两位年龄恰如我们兄嫂一般的助教，在习题课和晚自习上为我们分析原理的难点、重点，开辟解析疑难问题的思路。他们用问题导向、循循善诱、由浅入深的方式，将我们引进了物理运动的广阔天地。当年的理论自然科学教育，深受苏俄学派的影响，强调物理系的学生一定要学好四大力学—理论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前面三大力学，我们学习得系统而完整。1965年，受毛泽东与王海容、毛远新谈话影响，要求教学须贯彻“少而精”原则，1966年“文革”爆发，第四门量子力学仅仅开了个头，才讲到薛定谔方程，就突然断线了。这种最为前卫最为神奇的渺观运动，我们可惜仅仅学到一点皮毛。四大力学各自推出的基本理念，如最小作用量、概率、场、波粒二象性，彻底改变了学习者的自然观，将其观念意识提高至一个崭新的层次。成为我们后来职业生涯的智能基础。尤其是第一位引导者—祁开智教授，身材不高，略带口音，就年纪而论，虽然还不到60岁，但是已经长于我们的父辈；就学问而论，他的教材——自编《理论力学讲义》，被同行誉为“一条红线，两大流派，三大定理，四个部分”，完美地体现了这门最具代表性的古典学科概念严谨，数理交融，层层推进，根深叶茂的特点，让我们这些晚辈不能不倍加尊重。

另外一个难忘的印象是，授课的绝大多数中老年教师，因为经历过1957年那场深刻改变大学生态平衡的整风—鸣放—反右运动，明显地比未曾经历过那场运动的青年教师更严肃更拘谨，他们在认真授课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不会多与学生接触，不会多说与教材无关的“闲话、废话”。而我们这些学生，因为校系均不介绍宣传教授名流的治学履历和学术成就，对于老师们——即使是成就突出的老师的学术造诣一无所知；再加上或者自己就有家庭包袱，

怕给自己或别人惹麻烦；或者受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论断的直接间接影响，失去了对学者教授的必要尊重；社会氛围又是处处弥漫的“政治挂帅”，也缺乏接近老教师的主动性。待到1978年“科学的春天”降临，方才深切感受到当年未能更多地吮吸长辈们的乳汁，长达十年的“革命压倒读书”更叫我们荒疏荒废了根基不牢的学业，造成难以补救的智识遗憾。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祁开智教授、赵亮坚副教授夫妻（其妻王蓉为物理系办公室主任，热情又干练，深受师生信任爱戴）均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漆安慎、杜蝉英夫妻在改革开放之后大展才智，1990年代已被公认为国内力学领域的教研权威，可惜方届耳顺即早逝，让人不胜唏嘘。

这里还有必要缅怀刘辽先生。1965年刘辽先生是我们原子核物理课程的主讲教师。当时他的身份很特殊，虽已近40岁，却只是系资料室管理员，盖因为他在1957年直言而被打成“右派”。此时能给我们授课，还是受益于程今吾到校后，对极左路线纠偏，恢复右派教师讲课带学生（“文革”中，这无疑成为程的一大罪状）。刘辽先生是北师大物理系的一个传奇：祖籍湖南湘潭，其父为被称为“清华三老”之一的刘朴（另外两位是吴宓、汤用彤），1928年出生于张学良长校的东北大学，1940年代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50年代被打成右派，1960年代恢复教学，“文革”再受难，1970年代蹲牛棚研究相对论并指导三个“反动学生”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十多年后均成为大学物理系教授），1980年代是国内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开创者之一，1990年代出任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理事长，但又因1989年带头支持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而被取消博导资格……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亦热心于物理学哲学问题的探讨，并对我的科学史和自然哲学研究给予支持指导。北师大及中科院的许多学子在为人、为学两方面均深深感恩于刘辽先生。

一二年级时，学校对学业抓得紧，课程的难度也大，数学课和物理课的考试5分难得，4分不易，3分常见，2分时有，一年级期末的数学分析曾有1/4强的同学考试没能过关而参加补考。那两年里，有同学因学业不合格而留至下级，同时又有上年级同学留到我级。补考、留级较多发生在家庭文化背景较差的同学或调干生的身上。“文革”发生以后，这便成为校系“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工农子弟”的罪状之一。有一位“文革”中爆红并担任了本班掌权者的“红五类”调干生同学，因为基础差，学习吃力，才留级到我班。他曾坦言，如果没有“文革”，可能毕不了业。所以承认说，“文革给我帮了大忙”。

四、政治挂帅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自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文化知识界，人人都知晓此一原则，大学里校系各级组织更是重视党团组织建设。1963年初，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政治挂帅思想改造愈抓愈紧。以下从领导班子组成、组织发展、政治课教学和思想动态等几个角度回忆当年是如何不遗余力地贯彻上述原则的。

1. 1962年入学时，我们班还没有一个党员，但是已有不到一半的同学——16人是团员，团支部即是领导班子，必须安排组织上最信任的人组成团支部。1962年9月—1966年5月，不到四年时间里，虽然曾经换届，但是团支部的三驾马车始终由“根正苗红”的同学组成，他们是：工人出身孙XX、刘XX，贫农出身陈XX，以及颜色稍浅一点的中农出身孙XX、职员出身朱XX。照例，班上日常活动由班委会组织，而出任班委委员的同学出身可以不大计较，表现好，有威信，即使出身黑五类的同学也曾当选并出任班委甚至班长。

2. 当年，大家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人，血气方刚，有谁不追求出色？有谁不希望思想好，学习好，工作好？而在认可“政治正确”的绝大多数同学看来，思想好的重要体现，就是团员能够入党，非团员能够入团。所以，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入团申请书的不在少数，也有的同学是在经过动员之后递交申请书的。申请书递交上去以后，组织上会安排联系人和你谈话，帮助你“提高认识”：加强学习，汇报思想，克服缺点，力争先进。经过相当时间的考察，认为你达到了党员（团员）标准，就吸收你入党（入团）了。应当承认，五六十年前，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加入组织是一件有相当难度的“作业”，或者说，是一门有些深奥的学问。就我们班而言，四年中仅在1965年四清运动过后发展了一名党员。1962年入学时有16名团员18名非团员。1963年和1964年是考验期，两年没有发展团员，1965年发展了六名团员（2男4女），1966年“文革”前发展了两名团员（均为男生），“文革”打乱了常规的党团工作，组织发展彻底停顿。直到1968年8月离校，班上还有9名非团员（8男1女），人数不少吧！其实他们个个都没有什么出格的不好表现。

3. 占1/4强的同学被拦在组织之外，问题出在哪里？笼统一点说，是“认识上不去”。对于出身黑五类以及资本家小业主旧官僚之类“问题”家庭的同学（9名中的6名）说来，首先就是对家庭的认识上不去。我当时作为团小组长，曾经担任一个父亲曾做过旧军官的同学的联系人；一个担任团支部委员的同学，曾经担任一个出身为小业主的同学的联系人。我们的联系对象积极靠拢组织，汇报思想；我们则感到责任在肩，常常主动邀约谈话，帮助提高认识，争取他们能被吸收入团。但是，尽管双方都很努力，一直到“文革”爆发，这两位同学仍然处于团外，而且导致他们形成一种颇为压抑的情绪。回首往事，不得不促使我们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答案恐怕就在于，整个社会、学校，以致党团联系人，统统处在“阶级烙印”“国共斗争你死我活”“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反修防修”……这样一类价值判断的主导之下，我们还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宁左勿右”的革命哲学用以自律并劝导他人，从而导致在高呼誓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声中同窗之间感情的离散甚至破裂。

4. 教学活动中的政治挂帅突出表现在当年的政治课中。大一的党史课作为一门课程，上得还算比较正规。

1964年，三年级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此时，已经传出了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谈话：“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北师大还和北大一起被选作为高校四清的试点单位，在学校掀起了一场新的运动。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这门政治课必定要做出调整以适应高层的要求，调整的结果就是它演变成为一项思想改造工程。开课前确定的教材是于光远、苏星编的《政治经济学》。但开课后，根本没有认真讲授理论，而是一味地强调联系思想实际。对出身好的同学，要求忆苦思甜，不忘本，不忘阶级斗争。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同学来说，主要是认识家庭的本质，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任课老师还对上述两类同学分别召开动员会，布置任务，提出要求，落实到人。在讨论中，强调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同学要追索家庭剥削史，深挖自己身上的剥削阶级思想烙印。地主出身的Y同学回忆：“我记得当时我对理论还有一点兴趣，于光远的书基本读了一遍，还按Hmh老师提示，借了《资本论》，想把第三章劳动力读完，可惜太难读，只好半途而废。这段联系实际的学习，对我来说收获不大，倒是更多了一些自卑感和挫折感。”F同学回忆：“政治经济学开课一段时间后，Hmh老师让我准备课程结束时的大会发言。我将准备好的材料交给H老师，她觉得我对家庭的认识上不去，更改为由H同学发

言。在后来的全年级大会上，H同学以她二叔为例，对资本家的剥削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二班、三班的代表也是遵照同样的思路在会上报告了“学习体会”。一门社会科学理论课，以如此方式教学，真是空前绝后，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1965年秋四年级，开设哲学课。我一向对文史哲具有比较浓厚的兴趣，零零碎碎读过些杂书，如《论语》《孟子》《史记》《联共党史》《大众哲学》等。虽然读的是物理系，但对于牛顿的“上帝是第一推动”、克劳修斯的“热寂说”、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力学的统计解释……这类自然哲学问题仍然关心。本希望通过哲学课能够掌握点哲理ABC，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实际教学却令我大失所望。

当时，正是林彪首创的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全面推广的热潮期，林彪的声望如日中天，为了紧跟林彪提倡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要“少而精”的新精神，学哲学精简为学“三论”，即《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并要求密切联系刚刚揭开的“文革”序幕——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除了上述这一点印象，其他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同样对文史哲感兴趣的周永龄同学回忆：“还在大三时我从熟人处得到一本杨献珍著的《什么是唯物主义》的书，所以在大四开哲学课前，就读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本来也希望通过哲学课学到更多东西，但还是失望了。按杨献珍的观点，唯物论是世界观，辩证法是方法论。杨的‘合二而一’当时已被批了个不亦乐乎。依稀记得哲学课主要是学习两论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实践论取代了唯物论，矛盾论取代了辩证法。哲学课上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1965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我校中文系金宏达署名“时汉人”发表了质疑姚的文章，我们的哲学课Lzy老师，曾在哲学课上从哲学角度对时汉人的文章进行了批判，主要批其庸俗的折中主义。L的做法据说曾受到彭真的批评，彭倒台后，L又成了师大的著名左派。究竟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5. 经过多年的计划经济一公有制一合作化这一整套“政治正确”的话语灌输，我们这些从课堂走向课堂的学生，绝大多数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但是的确有个别同学因为其独特的生活经历，仍然保有着不落俗套的思维力量。杜广存同学就是突出的一位。杜是安徽淮北人，中农出身，其家族中祖父一叔伯一兄长三代人中有多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在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是重灾区，非正常死亡人数达数百万。杜广存亲见亲历他的家人、族人和同乡同学等病饿身亡，于是萌生了对于上述正统思想的怀疑。五十多年后，他回忆说：“1958年公社化消灭了私有制，军事化、吃食堂把农民一口饭一个饭团的私有制也剥夺了，极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人的全部财产，1960年大面积饿死人，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取消私有制，实质是一群流氓懒汉不劳而食去抢人家的劳动成果，而且要抢光！”“人性第一是为己（这是一切生物物种延续的根本）。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应该承认，自私的合法性。这就是我1963、1964年的观点。”据我所知，杜在向政治经济学韩曼华老师请教时，曾经汇报过更多不那么正统，不那么“正确”的思想；我还记得杜在同学中间散布，学理论应当多读马列著作而不是毛主席著作。可以想象得到，他的这些观点在“文革”中会遭到怎样的批判，他本人会吃什么苦头。

五、“文化大革命”中难忘的几件事

1962年以来日益强化的政治教育令我们这些幼稚学子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普遍自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4年以后，自文艺界发端的大批判一浪高过一浪，让我们对深化向封资修的阶级斗争有所准备。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先在上海《文汇报》，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各地党报头版发表，掀起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尽管我们具备了“革命觉悟”，在每周半天的政治学习时间，大多数人对于一些得势文章对吴晗、三家村上纲越来越高，仍然感到很不理解，很不适应。我们比较同情支持的中文系金宏达（笔名时汉人）为代表的温和说理文章却日见被动且同时被批。

1966年6月1日，改版了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的新闻联播时间播出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人人感觉到狂风暴雨的来临。但仍然料想不到它会立即降临到自己头上：6月2日，谭厚兰等人贴出了炮轰程今吾主持的校党委的第一张大字报。

从1966年6月初至1968年8月底，我们62级学生经历了两年三个月的北师大“文革”。1968年8月以后北师大继续发生了许多“文革”大事，除了个别人，我们都没有发言权。我们班的35个同学，因为出身、性格、经历以及机缘的不同，在“文革”中，分别主动或者被动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掌权者、骨干、跟随者、边缘人物、观望者、对抗者……所以每个人的参与程度和所见所闻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我们经历的两年三个月里，以谭厚兰为领袖的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一井冈山公社，积极参与甚至主导了许多震动北京以至全国的重大行动，诸如：恐怖的红八月，震慑的红海洋，曲阜讨孔，反击“二月逆流”，揪斗彭德怀、彭罗陆杨、李立三……我曾经动员知情或者可能知情的班内外同学回忆其所见所闻，遗憾的是完全不见成效，所以本文不再重述没有新贡献的大路货。包括我在内的见闻提供者大体上属于跟随者或边缘人物，我们均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大串联（乘火车和步行），介入了某些学校和工厂的造反活动，但没有留下值得阅读的记忆，本文也不再赘述普通话。以下文字旨在叙述和评论几件我们印象深刻并可能提供新史料的事件，借以表达我们不可动摇的否定十年动乱、记取历史教训的决心。

1. 校党委倒掉

1966年夏季的北师大，是由副校长、党委书记程今吾主持工作的校党委领导的。

程今吾校长曾任中宣部教育处处长，与我们62级同一年前脚后脚来到师大。在他主持师大工作的时期内，尽管上方阶级斗争之风愈刮愈紧，但学校环境还算比较宽松。他很少有极左的讲话，反倒对学生中一些左的不良倾向泼过冷水。作为大学校长，他一向号召同学们多多读书。在一次报告中，他强调说，很希望同学们能充分利用大学阶段的有利条件，多读些好书，还具体提出了大学阶段读300本书的定量要求。周永龄同学回忆：“程校长重视学校学术及学风建设。在他的倡导下，学校先后在学生中开展了征文活动，举办了教师的学术成果展览，在图书馆大厅里展出了几十幅教工的书法作品……从此那些著作等身的教授的名字印入了我们脑中，我们也知道了写得一手好字的启功先生，知道了‘开卷有益’条幅的书写者物理系祁开智教授。”

1964年秋，在北大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北师大也开展了四清运动，工作组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吴子牧领队。北大的四清运动掀起了疾风骤雨，形成了保陆平和批陆平的两派，争执得相当激烈，还发生了由许立群工作组取代张盘石工作组的重大人事更迭和运动锋芒转向，由四清运动激起的矛盾直接引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北师大的四清运动却是微风小雨，走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准常规过程之后，平静收场，程今吾和校党委洗过一个温水澡，卸去包袱，抖擞精神，继续其领导职责。

所以，就当时北师大校内的态势而论，程今吾完全不具备倒台的条件。但是，旧中宣部、

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作为最令毛泽东耿耿于怀的三旧，随着“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被打倒，此时均已被彻底改组，而程今吾恰恰是深受旧中宣部、旧北京市委信任的得力干部——“黑干将”，稍微了解一点中国政治的人都会明白，他的被打倒势在必然，迟早而已。形势突变之快仍然出乎常人的想象。六月一日公布了北大七人大字报之后，六月二日，在《红旗》杂志见习的政教系五年级谭厚兰等四人便在校园里贴出了炮轰校党委的大字报，随后的一两天，成百上千的倒程大字报跟进，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随着自上而下的冲击大学党委的狂飙突进，程今吾和校党委被用来祭旗的命运已定。

我们班这些色彩不一的平民子弟，也只好随波逐流。短短几天，对校党委的立场，被动地跟着主流转向，不过没有人充当开路先锋。稍微可以一提的是，我和另一个同学，曾在六月初的一天，特意登门拜访了病休中的曾任校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的刘墉如，想获取一点有价值的信息，用于撰写炮轰大字报。刘校长只是说，这几年因为身体不好，病休在家，不能负责学校工作。程今吾以第二书记的身份主持工作，他很少和我通气，自己就拍板做主了，我对校情缺乏了解。我在学校主楼还接触过马建民副校长、负责理科的张刚副教务长，他们对于学校大乱都表现得万般无奈，不愿说话表态，只能静观事态发展。很快，北京市委仓皇组建的工作组就进校接管了校党委权力。

2. 工作组退出

六月六日，孙友渔工作组在热烈的欢迎声中进驻学校掌控了“文革”领导权，师生员工普遍接受了“代表党的”工作组的领导。但是没有几天，就有敏感敏锐的同学产生了疑问和批评意见，我们班里，上面提到的杜广存同学即是最早的一个。6月20日数学系高树奎等同学贴出批评工作组大字报后，住在我隔壁宿舍的他立即跟进响应。杜广存说：“我是我们班反工作组的第一人，6月20日一大早我把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对孙友渔的几点质疑》写好，拿去贴，咱们班与我同宿舍的几个人要在上面签名，签名过后就张贴在北饭厅外北门口。可是到十来点钟，孙友渔讲话宣布这些批评大字报为反革命性质后，他们后悔了，都说上了我的当。这个印象我最深，一辈子不复习也不会忘。”杜广存还讲到日后他的立场：“虽然我反工作组，但我从不与谭厚兰们联系，我一开始就瞧不起她们。江青率“中央文革”来大操场开会后，我写出《坚决不要女赫鲁晓夫谭厚兰》的大横幅，挂在新一教室后边的路上。从此谭厚兰们恨我。那是在李春秋分水岭大字报的前边。”

6月20日之后，围绕是否支持工作组，班里逐渐分化为所谓保守和造反两派。但经过下面的通宵大辩论，保守与造反的划界转化成了批判还是拥护谭厚兰派。而杜广存则是另类造反派的代表：反工作组又反谭厚兰。

3. 通宵大辩论

1966年7月27日晚，“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来到北师大，召开群众大会。康生、江青、陈伯达先后讲话，批判并否定了孙友渔、刘卓甫两任工作组，为谭厚兰等人反对工作组平反，肯定林杰是好学生好同学，同时又提出“革命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你们不要保姆，运动可以进行得更快些，更健康些。”……

借助“中央文革”现场平反的东风，谭厚兰所在的政教系李春秋等5人7月31日在物理楼附近大字报棚上贴出《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革命、假革命的分水岭》的大字报（据有人日后考察，此大字报为林杰于幕后策划），这是“文革”期间北师大最著名的大字报之一，北师大老五届人人皆知。对于我们班，它导致造反派—保守派两派的基本定型；对于全校，它引起了八月初的北饭厅通宵大辩论，如此激烈的论战可能是北师大历史上空前

绝后的一次。

李春秋大字报的标题（有人简称为“李春秋定理”）就给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吓人判断，并且在文中要求人们“恭恭敬敬地做谭厚兰的小学生”，“跟着谭厚兰，彻底闹革命！”大字报贴出后，立即遭到了以常理思维的大多数人的反对，持反对观点的大字报纷纷上墙，很快占据了压倒优势，包括笔者在内的凡人认为如此下作的文字根本就没有讨论的价值。但是，在这样一个非凡的年代，就是有一些人能够用非凡的眼光观察事物：他们或者看到了谭厚兰——林杰——关锋——陈伯达康生，一线通天的背景；或者熟悉指鹿为马的故事，正是荒诞才能考察部属的忠诚；或者认识到反对派的大多数恰恰是此前支持孙友渔的保守派，造反派要想真正翻身必须逆水行舟，坚决高举象征“造反有理”的谭厚兰这面旗帜……1966年7月27日之后的北师大存在这样一个潜力巨大的少数派，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在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最高权力向“中央文革小组”的过渡。事后回想，一方人多，一方势大，重新组织队伍的大辩论必不可免！

已经不记得大辩论的布告是何时发布怎样发布的了。只记得8月1日晚饭后，人们陆续向北饭厅聚集过来，晚8时左右辩论正式开始。起初主持人还能掌控局面，宣布辩论规则——接受报名字条——安排发言顺序——正反方轮流发言——控制发言时间，呼吁共同维护秩序……但随着时间的推演，参加者愈来愈多，发言火药味愈来愈浓，赞成/反对的呼声愈来愈响，局面走向失控，一个大会场裂解为许多个小会场，北饭厅内外大大小小的圈子都在进行论战……也有人深感形势危重，希望上级权威部门能出面缓解局势。

王同义同学回忆：“北饭厅大辩论那天晚上，我们班几个同学因不理解谭的大字报为何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就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去上访，接待站好像是在平安里附近一个院内。我们去时，院内已经有几十个人，有北师大的，也有其他学校的。但是，始终无人出面接待。直到次日凌晨，有一位姓邢的人出来了，对大家说：领导都在开一个重要会议，已几天了，无人在家。现在看来，此话半真半假。真的是此时中央正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假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到各高校去支持左派了。当晚，关锋、周英、林杰等人就在北师大辩论会现场（注：王同义回忆关锋当晚在北师大，目前未见旁证，似有误）。次日凌晨，有刚从学校赶来的同学拿来一些糖花馒头，说学校北饭厅的辩论十分激烈，大家还是回校吧！于是，我们吃了馒头，就回校了。

到校后，见北饭厅挤满了人，在饭厅东头一张桌子上，两个同学上身赤膊，手中抡着脱下的上衣，大声喊叫着反对谭厚兰大字报的话语。至于辩论双方讲什么，都被吵闹声淹没了，什么也听不清。

我们走出饭厅东门，在门外道路上遇到“中央文革”的林杰和周英等人，刘明上前向他们提了几个问题。此事竟成了刘明的一个罪状，在以后班级会上经常被提起，他为此多次受到批判。”

刘文吉同学回忆：“王同义说的北饭厅的大辩论就是8月初因为李春秋大字报引起的，支持和反对谭厚兰的两派大辩论。我们班对此反映激烈，为此明显分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通宵大辩论当晚，去‘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的有我、周敏和王同义，好像还有严志良，反对谭厚兰是因为李春秋把支持与反对谭厚兰作为真假革命的分水岭，而谭厚兰还贴出大字报支持李春秋，我们感到实在是荒唐。上访时要求‘中央文革’的人接见，但是直到凌晨也没人出来接见。”

王同义所说我向林杰当面讨理的事全年级同学都知晓，30多年后偶遇外班同学时，我还被埋怨“胆子太大太冲动了”。我仅记得，由于我本来就站在支持孙友渔工作组的保守派立

场，加上对于常理的固执，对李春秋大字报极度反感和厌恶，自始至终参加了通宵大辩论，进一步受到了反对派压倒性胜利的鼓舞。8月2日清晨，参加大辩论的同学均已疲惫，纷纷离场，我和王同义等几个同学在北饭厅东门通向数学楼的大路上，正巧迎面碰上林杰一行。正在气头上的我，透过辩论过程，知道荒诞不经的李春秋定理之所以烂而不倒，完全在于林杰的鼎力支撑，因此顾不得林的强大背景风头正盛，运用盛行的语录战法，引用毛主席语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康生陈伯达在7.27大会上所说：“不要搞保姆，要当保姆，也要先学习，先当学生……”并指责林杰：“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给师大的运动帮倒忙……”此次意气用事让我痛快一时，却在日后的毕业鉴定过程中成为谭厚兰派当权者整肃我的罪状之一。

4. “狗崽子”缴伙食费

1966年8月20日，北京市属高校北京工业大学的高干子弟谭立夫发表了“文革”时期最著名的演讲之一，声嘶力竭的鼓吹对联：“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短时间里在北京乃至全国大中学校引起某些红五类的强烈拥戴和回应，掀起了一阵教训惩戒打击黑五类的浪潮。北师大的红五类当权者创造性地卷入了这一恶浪。我们班的负责人召集全班开会，在会上宣布：此后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不能再享受吃饭不花钱的待遇，校方通令黑五类子弟都要去伙食科缴伙食费。同学W回忆：“我们班曾经让狗崽子交伙食费，记不清怎么交、交给谁了，而我当时确实是有钱，只好和同为黑五类的要好同学商量说：‘没钱交，如果他们实在要，就把我们的饭票拿去吧。’后来也没人拿我的饭票，让我挨饿。”女同学A回忆：“班里负责人会上宣布，学校通令黑五类出身的要交伙食费，我们女同学中胆子小的就要交给班里，但班上没人收，就交给了伙食科一个月的伙食费。以后也没退。”同学Y回忆：“班级在你们宿舍（即西南楼201室，面积比一般宿舍大）召开的会上宣布，出身不好的人要交伙食费”，“我与个别同学商量说：没钱，不交，不行就把饭票给他。我们班没人催逼，男生好像有一个人交给班里头头SH，没上交，后又退给本人了。”“倒是三班风声较紧，ZH、Y等都交过伙食费。”要讲师大的“文革”特色，此案肯定属于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没有听说发生在北京的任何其他大学。更多细节有待知情者补充。

五、毕业鉴定一分配

我们62级—1967届，正常情况下应当是1967年7月毕业—分配—离校。但是，我们身处的是一个绝对非正常的岁月，原定计划完全被“文化大革命”的节奏打乱。1967年的大学生有重大使命在身：反击二月逆流，推动全国山河一片红——在各省市区夺党委的权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支持造反派打垮保守派——以武汉事件为代表，等等。继续革命的需要让我们留守待命。

1. 转折性的一年

转过年来，形势大变。高校，尤其是包括北大、北师大在内的北京高校的天地两派争斗愈演愈烈，发展到清华大学为极端的百日大武斗，让决策层愈来愈焦虑不满。于是有了随着七月份的工宣队不宣而至引发的流血事件，有了7.28凌晨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接见五大学生领袖，开启了工宣队军宣队接管高校，红卫兵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变局。8月，以发布最权威声音为使命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迎来了结束学校生活，独自面对社会的又一人生转折时刻。

2. 毕业鉴定

我们62级的毕业鉴定一分配工作在6、7月份全面展开。我们班的这项工作是由系“文革”和班“文革”共同主持进行的，他们均很认真负责地行使了校革委会、井冈山公社赋予的权力。正值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之盛年，全班35个同学（入学时的栗萱因病休学至物634班，另有物5的刘守国、王三贵留级到我班，故多了一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但由于出身、经历、表现的差异，每个人充任的却是不同的角色：整人者、被整者、整人被整兼具者。哲人云：人啊，半是天使，半是魔鬼。在那一两个月里，人不同程度地堕落为七成八成九成的魔鬼。同室操戈、朋友翻脸、相知告发……人性异化的基础上，当年在谭厚兰派校系班“文革”操纵下的鉴定，塑造了一个矛头向下的整人运动典型：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装袋子。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仍有人没有勇气直面当年的作为。

鉴定先是分小组进行，我们班有三个小组。在小组会上，照例是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人人对照最高指示回顾检查大学六年尤其是“文革”以来的言行，然后请组内其他同学批评帮助。负责人认为哪几位可以通过，就过关了；哪几位问题大，就要求本人继续深挖提高，同时组织全班大会批判帮助。我和杜广存、沈繁宜等就被享用了全班帮助。

杜广存是全班的第一帮助对象，因为他有比较多的可供批判的言行。本文在前面的文字中，曾简述他在“文革”前就提出的主张承认自私合法性、怀疑合作化等思想，在“文革”中，他虽然反工作组，但又看不上谭厚兰，招致谭厚兰派的嫉恨。杜还提出，学理论应当多学马列著作而不是学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离经叛道”的论调……班内与他交往较多的同学揭发出来七七八八他的不少意识问题，导致对他的批判时间长力度大。档案袋肯定是鼓鼓的。杜广存回忆：“参加工作后的1972—1973年，因为我反对四人帮的开门办学，校长把我档案袋翻出来，那可是他的大宝库，可有材料斗我了，斗了几个月，我天天被师生批斗！”

我作为曾经参与批判杜广存同学的一分子，错误地伤害了他，有必要在此真诚地道歉！

我名列被帮助对象的第二名。我的问题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同情和支持时汉人等的为吴晗辩护的“折中主义错误观点”；“文革”发动之后，通过写大字报、参加辩论会和日常言论等形式，一向坚持批评和反对谭厚兰为代表的北师大井冈山左派的立场；1966年冬“12月黑风”中认为林彪的“顶峰论”“句句真理论”等是可以批评的；1968年春同情支持造反兵团“倒谢（谢富治）”……先是我做口头检讨，然后由大家揭发批评，我吸取批评意见后再做检讨，因为不够诚恳不够深刻再次接受批判帮助，提高认识后写出自我鉴定，经“文革”负责人过目提出修改意见，我再写出二稿三稿……如此折腾了半月二十天，才算通过了。

系、班“文革”小组对每个人都有一份鉴定意见，同自我鉴定一起装入档案袋。“组织鉴定”是否都和当事人见面了，见面的鉴定是否与装袋的鉴定一致，我已经不记得或者我根本不知晓。

毕业鉴定的谢幕则要再等四年。震惊世界的1971年“9.13事件”过后，我也喘了一口气——我批评怀疑林副统帅的罪名可以勾销了。大约是1973年的一天，汤原县文教科打电话到我所在的永发公社中学，要求我第二天上县里去一趟。于是我在第二天乘汽车赶往百多里外的县城。北师大军宣队工宣队的代表从档案袋中取出一叠材料，说：这些是1968年毕业鉴定时，你的自我检讨和系革委会班“文革”小组给你写的鉴定意见，今天看来，这些材料当中一些是不实之词，一些结论是错误的。现在当着你的面，将这些材料销毁，“文革”对你的鉴定意见一笔勾销，让它不再影响对你的信任和使用。（在此大学经历收官事件之前，还经历过一件奇事。大约在1970年秋，有人听到县里传来的消息，说我是“5·16”嫌疑份子，

将要审查我。不知道这股风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只好一笑了之——一个“文革”边缘小人物，即使查出十万八万5·16分子也轮不到我这里！）

被帮助对象第三名是沈繁宜。她回忆道：“鉴定前期，班‘文革’成员找我谈话，说我帮我父亲‘销毁罪证’。的确，三年级开无线电课时，为了实习焊接收音机，我曾拆开父亲从美国带回的、具有收发报功能的收音机。但实际上，此收音机在我接触之前，已经被我父亲拆除了收发报功能。H却硬要我交代，我有意销毁罪证。迫不得已，我只好承认客观上起到了帮忙销毁罪证的作用，但不承认主观上有此动机。显然，H曾去三机部调查。就我跟H的个人关系来看，调查一事不应该是H的主动作为，而是另有人指使。班‘文革’也到我家居委会去调查过我的情况。他拿出的具体指证材料我已经不记得了。”其实，帮助她的项目要宽泛得多，档案袋自然也丰富得很。这里涉及她与班内几个同学的较密切交往，动员她交代同学的思想言论。例如，“刘继英曾说，林副主席是可以批评的。我跟刘继英关系不错。于是有人便多次诱导我，要我重复刘继英的话。我始终没敢说。”

沈繁宜说：“1968年，我被分配到吉林铁路局图们铁路分局敦化建筑工区当油漆工。分配到敦化的大学生有南开大学的，吉林大学的，北京铁道学院的和咱们学校的（物理系和中文系的）。大部分去了敦化铁中，还有的去了机关，只有我一个人被贬到建筑工区当工人，修住宅。很明显，我的档案里有名堂，但我一直没见过。1970年冬单位里就有人议论说，“她爸爸是什么人？”1972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图们铁路分局才将我从工区调到敦化铁中。1979年考研时，因为档案里装有负面材料，北师大物理系不愿意录取我。幸亏教过咱们的曾贻伟老师帮忙说了好话，我才得以入学。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的档案里的材料都是些什么，退休都那么多年，也懒得理会它了。”

用今天的话说，上面我们几个人被“帮助”是因为我们存在“系统性问题”。另外也有同学被“帮助”是因为发生了“局域性问题”。陈霭玲同学即是这样一个对象。陈家在北京，父母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1957年双双被错划为右派。匪夷所思的事情简单至极，却让我们许多同学终身难忘：北京掀起红海洋浪潮期间，各个街道居委会的干部遵旨到各家检查。陈家所属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看到陈家的画像起初赞不绝口，说画像剪下来留个边固定挺好，周围还有光芒四射，占了一面墙，可以让街坊邻居学习学习。正在此时，在场的陈父单位一同事的老婆尖叫说，“他家可是右派呀！”立马有敏感的随行老太太呼应说：“这不是给×××扎针呢吗？”很快，居委会将情况反映到总行，立即引来铺天盖地大字报，“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消息传到北师大，就有权力者抓住此事不放，在会下几次找陈让陈上升到对×××的感情上认识，陈被逼无奈想这样写检查，但有朋友善意劝告陈不能给自己扣这样的大帽子，陈就没有给自己无限上纲，只做了有分寸的检讨。于是，陈被指责为“认识上有反复”，动员大家批判帮助，相当一些人就遵从上纲上线的时髦发了言。特别离奇的是，事前班上曾找了包括陈在内的几个人拿着主席画像到陈家进行现场勘察以示郑重，经现场比对检查，所有同学均认同一切正常无可挑剔，一起有说有笑回到学校。但真到了批判会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把看到的情况讲出来，反而倒有其中个别人慷慨激昂地把陈大批特批了一通（实际情况是在主席像周边一厘米宽的白边上用几颗大头钉固定住，有画像本身和钉眼对照。正常年代正常人绝对会认为是一副正常的上墙画像受到正常的灯光照射）。“文革”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因为年代久远而被我遗忘，唯独这件小（大？）事始终不能忘怀。它太具有“文革”特色了：领袖“在场”，人人高举，阶级斗争之弦紧绷，“黑五类”被打入另册，人性恶压倒人性善，邪念诱发走火入魔的创造性，观念决定观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绝对是小品的绝佳素材！

我们虽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但与邻班相比，还算走运，没有被整肃得更惨（例如相邻的物62-2班，就揪出了一个“三人反动小集团”，还有同学被打成坏分子在校内挂鞋游街）。

大学毕业生作为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源，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对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骨干作用，“文革”之前和之后的分配去向，总是会向城市、大型厂矿、科研院所倾斜，在此前提下，兼顾其他方面的需求。而1968年对于我们1967届的分配，则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使比较同一年分配的1966届，此后的1968、69、70届，它也更加表现出重视出身重视派性轻视知识无视人伦常情的极端政治性。

1968年4月的一份中央文件就提出，“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及时做好毕业生分配工作。”七八月份，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年底，毛泽东再次强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四个面向”“接受再教育”就成为当年毕业分配的基调。必须承认，在系、班分配领导小组当红左派的主持下，此一方针得到了出色甚至超额地贯彻执行。

经过动员—分组评议—政治鉴定（装袋子不与本人见面）—公布分配方案（无征求意见之说）—颁发毕业证书—办理离校手续—离校赴被分配单位，这样几个步骤，每个人怀着复杂的但是天差地别的心情，与共同生活了六年，关系或好或孬的同学告别，走向另一所新学校去接受“再教育”。当年针对全班34名毕业生的分配原则如下（本班唯一一个造反兵团成员，没有与我们同时分配，拖到年底才被分配到山西雁北地区）：

1. 绝对“四个面向”。除了一个同学被明确分配到上海，其他33人再没有一个分配到直辖市或省会以上城市，留校、分配去大学、研究机构或者中央和各级党政军机关的也是零！被分配到地级市的仅是个别人，大部分人被分配到县甚至人民公社（如今的乡镇）一级基层单位。据知情同学说，上级下达的原方案中，是有一些大中城市的，但是系、班分配领导小组的原则是：基层、边疆优先。因而将大部分大中城市的名额废弃了（例如，全年级100人，上海有8个名额，仅用了3个，“节约”了5个），基层、边疆填满了，农村、厂矿用足了。

2. 为了强化“接受再教育”，就要在距离上做文章，让“臭老九”们贴近工农兵，远离父母、家乡。我们全班同学中，生源为三北的19人（其中，东北：华北：西北=3：15：1），生源为南方的15人（华东：中南：西南=10：2：3），而分配到三北的有30人（其中，东北：华北：西北=21：8：1），分配到南方的仅有4人（华东：中南：西南=3：1：0）。对北京籍的12名同学尤为“照顾”，除一人分到北京铁路局，各一人分到山西、内蒙，其余九人统统发往东北边疆（其中黑龙江七人）。这也算是彻底打倒资产阶级人性论，坚决贯彻无产阶级斗争论的实践吧。

我们有必要对与分配去向可能关联的各要素做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

（1）与学业成绩没有相关性。因为手头没有当年的档案，不能就个人的学业成绩与分配去向的相关性做定量分析。但是在我们的共同印象中，二者的相关性为零甚至是负相关。仅举一例：胡岗同学，无锡人，学业超常，被公认为全年级第一，或者用今天的话说，他是50年前的“学霸”。只因为职员出身，公社一般社员，即被分配到边远的黑龙江鸡西煤矿，担任中学教师十年，实在是大材小用。好在1978年后东山再起，再次迈入北师大读研究生，继后成为最早一批洋博士。研究水平突出，被今天的北师大视为“没有带院士帽的院士”。作为一种勉强的替代，还可以看看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后，进入高等学校任教后来被评定为教授职级或在中学被评定为特级教师的同学的情况，这1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当年被分

配到北京铁路局，其余9个人均来自东北或山西雁北的县公社一级基层学校或工矿。

(2) 与家庭所在地基本没有相关性。古训曰：“父母在，不远游。”作为青壮年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就近安家立业便于对父母以致祖父母尽可能的孝道，此为千年忠孝传统。尤其在那个年代，经过建国以来近二十年的政治运动，城乡出现许多破败的家庭（我家是其中之一）：穷困不及温饱，病弱无人照料，缺少劳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按照人伦常情，总要以恻隐之心在分配时给予关照。但在那个砸烂一切封资修文化的狂风暴雨中，常情完全否定，关照纯属妄想。几个红五类被分配回原籍所在省区则旨在体现根红苗正理当优先原则。

(3) 与家庭出身有显著正相关性。全班黑五类出身10人，除二人因为系谭厚兰井冈山派的骨干而分配到鞍钢和湖北黄石之外，其余八人中，五人被分配到黑龙江县一公社基层，二人被分配到吉林省的矿务局，一人被分配到山西大同，统统背井离乡，发往边远穷困地区。红五类七人，一人因是造反兵团成员被罚配到山西雁北地区，二人因情侣方为非红五类而“照顾”到东北基层，三人则被分配回到原籍，一人分配到上海。

(4) 与紧跟谭厚兰派的程度有高度相关性。1967年8月，林杰随着王力、关锋一起倒台，随即北师大发生了樊黄李主导、天派全力支持的“9.7事件”，试图将谭厚兰轰下台，但中央从高校和全国的大局出发，力保谭厚兰晃而不倒，直到1968年7—8月62级毕业分配，校系以致各班级的实权仍然在校革委会、井冈山公社手中。“有权就有了一切”是当年林彪—林杰一脉相承的“文革”名言，此时到了利益兑现的时节。以井冈山公社为中心，大体上可以将师大人分成3—4个圈层：最里圈是井冈山战斗团红卫兵，紧贴的是井冈山公社社员，外圈是井冈山造反兵团成员和其他不拥护谭厚兰派的人，最外圈是被惩治的所谓“问题人员”。当然，每一层内部还有核心—普通—边缘之分。一旦搞清楚了班里每个人在上述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他（她）会被分配到何方，便八九不离十了。

自从我们1962年入学以后，针对青少年的家庭出身问题，正式的口号就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文革”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曾经喧嚣一时，反对此对联并因撰写《出身论》而闻名的遇罗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执政当局也批评此对联，他们支持的利于团结大多数的口号仍然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分配过程中，“重在表现”就表现为甚至“唯一表现为”对谭厚兰派的拥护程度。下面列举几个实例证明“七分表现三分出身”如何决定了分配方向。①B同学，红卫兵+贫农，生源虽然非沪籍但分配到上海，而且是唯一分配到直辖市的；②SH同学，红卫兵+中农，系革委会委员，唯一被分配到保密兵工厂的；③J同学，井冈山公社骨干成员，虽然出身黑五类，但分配地点是著名央企；④X同学，井冈山公社骨干成员，虽然出身黑五类，但被照顾分配到内地城市；⑤N同学，红五类出身，南方人，因为是造反兵团成员，被推迟分配，而且后来被分配到贫困的山西雁北地区；⑥M同学，黑五类出身，虽未加入任何派别，但两年来一直持批评谭厚兰的立场，并有对林彪、谢富治不敬的言论。被分配至黑龙江一穷县某公社。分配之时，班上有五对未婚夫妻，其中四对的情况相似：一方为红五类，另一方为非红五类，均被照顾，但因成色不纯，从而一起被降格分配到东北农村或企业。另外一对男女双方均为黑五类，则被拆散，分别被分配到黑龙江不同的县份（分别报到后，经我班一位同学协调才会合到一起）。

还有必要说明，当年的分配过程绝非一本正经，官事官办。其中免不了塞进些私货和吃喝求情。M同学，沈阳人，出身小业主，井冈山公社一般社员。原初方案是分配到离家较远的外地，于是，他搬出与班“文革”成员的老乡关系，并请他吃了一顿饭，说明自己是独子，父母年迈无人照料，且已有订婚了的未婚妻等待，拜托他能给予关照，帮忙运作。其后，果

然实现了方案变动，他回家了。

本人一向木讷，对权力场中事甚为无知，上例只因M同学与我私交不错亲口告知，方予披露。“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系我笃信的政治学原理，包括毕业分配在内的“文革”过程，我亦耳闻若干腐败事例，愿与同道分享，此为后话。

尾 声

毕业离校，我们各怀心事，但总算躲开了北师大这个是非之地。然而，孙悟空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到工作单位报到之后，个别出身表现好的同学被委以领导责任，一些同学立即被纳入本行，编入学校走上讲台。但也有一些同学没能去教书，要求去接受“锻炼”。有被分配到矿务局的同学体验了“吃阳间饭，干阴间活”——下井挖煤；有被分配到铁路局的同学天天长征——沿线巡道，或做车辆化妆师——清洁油漆；有被分配到工厂重新学徒——钳工铣工刨工；外班还有同学被分配到养马场，被安排做等外大师傅——军马饲养员，更有个别同学被打成“反动学生”送至部队“学生连”监督劳动（我们班被手下留情，没有揪出“反动学生”）……个中原因多种多样，出身不好或“问题”入袋（档案袋）——进一步改造思想，臭老九补课——首先参加体力劳动，上级统一安排——先当徒弟后当先生……总之，离不开我们都携带着或轻或重的原罪。

1970年，全国范围开展了清查“5·16”运动，其主要对象是前几年最活跃的造反派头头，落实到北师大，就是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或井冈山公社的核心、骨干。我们班曾出任系革委会或班“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当时已经分别是某兵工厂的干部和某农场的干部，均受到审查要求交代问题

1983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学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问题的人开展的“清理三种人”活动，我们班井冈山公社的一骨干受到了冲击。

我们物62-1班，欢快组建于1962年9月，仓皇离散于1968年7月，别后重逢于1992年7月。又是26年过去，已经有四位离开了人世，其余均过了古稀之年。极简地回溯人生：我们是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见证了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全面专政，又亲历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演进全过程的健在一代。“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在此留存下历经50年的冲洗，沉淀在我们大脑海马体之中的最深重记忆。如同一杯溪水，汇入时下老五届冲破重重阻力，真诚而勇敢地回忆与反思“文革”的洪流，作为我们敬赠给母校，敬献给同门同道的一份献礼。让我们牢记历史的教训——专制体制、个人崇拜、人治社会，可能造成多大的灾难；让我们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绝不动摇——为了“文革”十年浩劫再不重演。

既然是回忆，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回忆，必然涉及一些人事。50多年前的内斗曾经让同学分崩离析，经过时间的冲刷，我们的大多数已经实现了表观上的和解。但是我们可曾经历过良心的拷问？我们自己对于浩劫的发生是否也要承担人性恶的责任？柏林墙下的士兵因为没有行使“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裁量权而受到法律的审判，我们当年行使了可能的沉默权、同情权、回避权？南非的经验和老五届自身的经验都说明，只有在揭示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上，当事人自觉的反思和忏悔，才能实现同学、朋友之间心灵的真正和解。

祝愿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东方民族，认真吸取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惨痛教训，砥砺奋进，融入自由、民主、法治的人类文明大潮。

20180629 初稿于杭州；20180707二稿；
20180729三稿；20180806四稿20180907五稿

刘明，1944年生于重庆。1950年春全家因父亲受中央劳动部之邀自湖南武冈北上北京。1952年9月入读北京育才小学，1956年9月续读北京育才学校。1959年9月保送北京四中。1962年9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为五年制1967届，因“文革”于1968年8月毕业，分配至黑龙江省汤原县永发公社中学。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后被调入汤原县科委（地震办）。1978年春被调入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今佳木斯大学）。1978年秋考取浙江大学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专业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被调入浙江省委党校。1982年被聘为讲师，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被聘请为浙江大学兼职教授。2007年退休。

一位普通学生眼中的北师大“文革”

蒋世信

平地一声炸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六月一号晚，中央电台新闻联播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地震颤；六月二号，我校谭厚兰等人在北饭厅，贴了一张题为《革命的同志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捣毁一切“三家村”分店》，炮轰北师大党委书记程今吾的大字报，师大的“文革”正式开始了。

谭厚兰等人的大字报搅乱了师大的平静，像多米诺骨牌效应，各个系都贴出许多大字报，开始是在几个饭厅，后来在各教学楼贴大字报。数学系主要在四楼和一楼的四面墙上，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批判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再后来大字报集中贴（挂）在教2、教3楼的楼道里，所贴的内容对我来说都十分新鲜。我记得有关于彭真“二月兵变”的，有关于陆定一停职受批判的（陆的小女儿陆瑞儿是我校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最让我震惊的是揭露贺龙在八一队养了20多个棒小伙儿，每个月从他们身上抽血制成血制品供贺龙营养，以保他头发不白容颜不老，消息真假无从确认，但确震撼人心……后来大字报太多了，校园通道两侧都建了大字报苇席墙，供师生贴大字报与观看。

乱了几天，六月六日刚吃过晚饭，有人大喊“工作组进校了”。我们急忙跑到校门口，只见从一辆黑色的轿车下来一位大约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穿着白色短袖汗衫，容光焕发，头发一丝不苟，原来他是一机部第一副部长孙友渔，这次作为工作组组长进驻师大领导运动。孙被人引到主楼的凉台上发表演说：“我们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就是像剥笋皮那样，将师大党委的假面具一层层地剥下，露出他们的修正主义真面目……”干巴脆的

讲话引起人们热烈地鼓掌，运动在工作组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过了半个月，即6月20号，数一（2）的高树奎、武汉等十几位同学，在北饭厅贴出大字报《孙有渔把运动引向何方？》，一石激起千层浪，师大又乱套了。为了稳住阵脚，孙友渔发表广播讲话，强硬指出反工作组是错误的，是对运动的干扰，组织反击大字报，举行“群众抗议游行”。当时，谭厚兰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高呼拥护工作组的口号。可是，三天后谭厚兰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调头，与政教系另外3人贴出质疑工作组引错运动方向的大字报，引发了师大新的地震。原来，谭支持工作组立即受到林杰、关锋的批评，责其迅速改正，于是她对工作组“反戈一击”。说实在的，对于谭厚兰的“造反”，我一点儿也不佩服。因为1965年初批三家村、燕山夜话，各报刊人手不够，北大、师大、人大等高校文科都派去即将毕业的学生实习，我校政教系五年级的调干生谭厚兰（党员）去了《红旗》杂志。她的第一张炮轰师大党委的大字报就是林杰、关锋帮她炮制的（林杰是师大历史系六一年的毕业生，《红旗》杂志有名的笔杆子，曾主持过该杂志的编辑工作，1967年8月被捕关在秦城监狱），我特别赞同师大的一张大字报《谭厚兰是有保姆的“左派”》。

结果谭厚兰成了师大反工作组的名人，是工作组的头号打击对象。但谭有后台，“胸有成竹”，拒不低头。贴大字报反工作组的学生如物理系二年级的李庆林等，中文系四年级的王岚、中二的王颂平、李先华等，数学系数四的王淑娴等，历史系二年级的黄家林等，还有其他系的诸多学生先后被围攻被批斗。“抓右派”“抓游鱼”甚嚣尘上，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感到很压抑……

七月十六号晚约八点钟左右，学校突然广播，让大家马上到北饭厅召开紧急会议。我们到了北饭厅，见到一位约有60岁的妇人坐在主席台的中央，长条桌子两旁空荡荡的，而台下的右侧却站着孙友渔，耷拉着脑袋没了往日的神气。我好奇地问：“您怎么不上主席台？”他没做声只是摆摆手。主持人宣布开会，原来台上的那位妇人是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她宣布工作组犯了路线性的错误，撤销工作组并让孙友渔当众检查。这时，我真真切切地看到：孙像耗子见了猫那样，战战兢兢地走上主席台，先向曹鞠了一躬，然后走到麦克风前，检讨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打击革命学生的错误。曹轶欧不给一点情面，打断孙的讲话训斥道：“仅是抽象的否定，具体检查不深入，需要进一步深刻检讨。”孙摘下眼镜，回过头点头哈腰地连说：“是，是。”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位副部长在中央领导（康办主任代表康生）面前，竟是如此的小心翼翼、唯唯诺诺。

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七月廿七日达到顶峰。那天吃完晚饭，我和几位同学在校园的甬道上散步，突然学校东门口喧闹起来，我们急忙跑过去，原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乘着十几辆小轿车到师大为“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来了。第一次见到江青，心情格外激动。我在她的车前像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带着黑边眼镜皮肤白皙的江青微笑着也向我们招手致意。我的心里不自觉地突然冒出：“这就是当代皇后啊！”（你看，一个大学生的封建意识有多强。）人多得水泄不通，开道车缓慢地行驶着，后面的轿车紧随着，我们一直跟着车队来到师大的东操场。“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陆续登上主席台，我们都在操场上站着。这时王力主持大会，介绍小组成员：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王任重、刘志坚，顾问康生，成员：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然后，江青讲话，她用细而尖的声音说：“革命小将们、师大的生师员工（注：不是师生员工）同志们，你们好！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台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冲破云霄，一浪高过一浪。接着陈伯达讲话，一口纯粹的闽南话，大家听不懂，还是由王力现场翻译。大意是“踢开工作组，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接着江青说：“现在请

康老讲话。”（当时不仅江青，连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都称康生为康老）他一口山东腔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师大的程今吾是陆定一的大亲信……”刹那间，“打倒程今吾”的口号顿时响彻师大校园上空（第二天程今吾被关进牛棚，后来大会批斗时，他一再强调自己和陆定一仅是上下级关系，反问“大亲信”是什么罪？——这让我认识了什么叫“莫须有”）。接着，中文系四年级学生王岚（女）控诉中文系工作组如何压制运动迫害学生。王岚非常有口才，没有讲稿，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的“故事”。江青还亲自给她倒了两次水，为她的讲演带头鼓掌。王岚真是才女，全场静悄悄的，被她绘声绘色的讲演所慑服。后来，王岚成了谭厚兰的铁杆红卫兵，再后来因整周总理的黑材料反总理，在1970年抓“五·一六”时被判刑四年。

“八·一八”，我们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誓师大会，林彪讲话，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彭小蒙讲话。当时刘少奇已排到第八位，我们私下议论：“刘少奇要完了。”城楼上还有许多清华附、北大附、师大附等中学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最高指示：“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之后，宋彬彬更名宋要武，女附中更名“要武中学”。北京掀起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各个高校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谭厚兰成立了“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首先加入的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出身的子女，我们一般劳动者出身的子女都没份儿，黑五类出身的子女更是边缘化，被称为“狗崽子”，只许老老实实接受监督改造。当时到处标榜和宣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连过去挺文静的女孩子也是口出秽言：“造他妈的反”，“滚他妈的蛋”。（“文革”余毒真深，到现在有些老头老太说话也总带“他妈的”，好像没这几个字就不会说话）

有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鼓动及“8.18”的誓师，从8月20日到9月中旬，北京大街出现了红卫兵“破四旧”，剃阴阳头，剪喇叭裤，戴高帽游街，烧旧书，焚戏服，后来发展到对“五类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残酷暴行：轰走、抄家、打人、虐人，甚至升级到血洗、屠杀（如大兴大辛庄乡西白疃村），被冠之为革命的“红色恐怖”。

八月廿五日晚饭后，大约八点左右，学校的广播喇叭响了：“师大的革命师生请到二附中声援附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连续播了好几遍。我和几位同学抱着好奇心，走出师大过马路到二附中。校园里跟逛庙会似的人山人海，一座教室的所有窗户都趴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我也挤进去扒着窗户往里看：妈呀！教室里跪着整整两排教师（有五六百人），有一位老师跪在前面，正被两个红卫兵用军用皮带狠狠地抽打着，抽一下惨叫一声，抽一下惨叫一声，实在是惨不忍睹。我迅速退出人群说了句：“怎么能打人呢？”旁边出现一个红卫兵模样的男孩问：“哪的？”“师大的。”“什么出身？”“普通劳动者。”“滚他妈的蛋，这是革命行动。”我看了他一眼，“怎么，不服？”一副三青子相，我知道不能与之理论，就和几位同学离开附中回到师大校园。第二天听说二附中打死一名书记和一名教师。我实在不理解，人怎么这么恶呢？抡起皮带将铜扣狠狠抽打在辛辛苦苦教他的老师头上（顿时血流如注），怎么下得去手呢？“良心”“人性”都哪去啦？难道这就叫“革命”？

紧接着毛主席、林彪、“文革”小组成员接三岔五地八次接见全国进京的红卫兵，十月份红卫兵“革命大串联”开始了。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取“革命真经”。学校职工和我们这些非红卫兵负责接待来师大的师生，直到11月份出现步行串联，到延安、井冈山、韶山、遵义、上海党代会址、南京雨花台等革命圣地膜拜，我们才有机会跟着几个出身贫下中农的同学出去串联。我们一共五个人：刘志书、李运华、李元吉、金世仍、蒋世信。先乘火车到西安，去了交大看大字报，那会儿不敢去西安

碑林、大雁塔，怕人说游山玩水；再乘火车到成都，这时胆子大些了，去了武侯祠、杜甫草堂；再乘火车到重庆，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红岩村、曾家岩、桂园等。乘火车很受罪，尤其西安至成都、成都至重庆两段。车厢里的过道、行李架、座位下面，甚至厕所里全都是人，我们虽然有座但根本动换不了，更别说吃饭喝水上厕所了，下了火车小腿和脚全都肿了。大家决定从重庆步行到遵义，我们买了好多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打着北师大红卫兵小分队的旗子（在重庆做的），从九龙坡出发，沿途发放单行本宣传毛泽东思想；川黔的山景很美，小鸟也特漂亮，但很少看见人，我们背着自己的行李，每天走六、七十里路。第五天我的膝盖疼得受不了，在桐梓，赤脚医生用5吋长的银针给我扎针医治，不管用，我还是咬着牙坚持走。沿途穿过四千多米长的凉风垭隧洞（当时是我国第二长隧洞，1960年竣工），隧洞洞口各有两名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只有红卫兵能走（我们有学生证），别人不能通过。火车道不好走，迈一根枕木，步子太碎而累，迈两根枕木，步子太大就得跨，也累，我们交换着走。期间有三列火车通过，火车来时，我们分别躲进火车道边的亮着灯的安全洞里（只容一人），隆隆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还挺吓人。火车像个大活塞呼啸而过，过后，呜呜的风，暴土扬尘的，我们几个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灰头土脸地出了隧洞。

走到娄山关，关口立着一块儿天然的褐色大石头，竖刻遒劲浑厚涂有红漆的三个草书大字——娄山关。那是1932年贵州省民政厅厅长黄丕谟书写的，1985年重新“树碑”，由当代书法家舒同题写（见右图）。娄山关地处桐梓、遵义的交界，是黔北咽喉。我们在那儿一起背诵毛主席的诗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然后，大声喊着：“娄山关，我们来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娄山关就是一道狭隘的关口，我们重整队伍站成一行纵队，前面打着小分队的红旗，迈着坚定的步伐，唱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豪迈地走过关口。下山的不远处，我们走进路边的一间黑黢黢的茅屋，和当地的曾给红军做过向导的老人座谈。他谈红军那时很狼狈像叫花子一样，还谈到红军首长邓发视察地形时，遭到敌人的冷枪，等等。第二天我们胜利抵达遵义，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然后乘火车途径广西桂林（没下车）直达湖南长沙。长沙是金世仍同学的家乡，我们在那儿休整了几天就分手了：有的去了韶山，我因膝盖痛回了北京。

“八·一八”之后，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支持，高校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师大筹委会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师”，没几天，谭厚兰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开始仅有一百多人，由于有林杰、关锋的幕后支持，筹委会的红卫兵纷纷倒戈易帜，加入到谭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很快，谭的队伍发展壮大，“革命造反”走向社会，走向全国。

1966年11月，谭厚兰在康生、陈伯达以及戚本禹、林杰的授意下，率领师大红卫兵200多人，开往山东曲阜造反，砸烂“孔家店”，捣毁孔府、孔庙、孔林。尤其数二（1）班的王瑞龙，1965年社教入党，1966年“文革”当上谭厚兰井冈山红卫兵团作战部副部长（部长是物理系的周耀文），带领师大与当地的红卫兵首当其冲，疯狂地砸碎立有千年的孔碑，挖了孔子坟，烧毁古匾古籍古字画，砍伐五千多株古松柏，盗掘二千多座坟墓……这些活动都有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纪录片，作为辉煌战果曾在师大放映（黑白片大约50分钟），我曾在师大北饭厅观看过。昔日的辉煌战果、今日的历史罪证，纪录片将谭厚兰们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死死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66年11月，北师大红卫兵在曲阜“造反”）

（2000年10月我到修复后的曲阜孔庙的留影）

1970年抓“五·一六”，王瑞龙被军、工宣队隔离审查。一天早晨，他从工五楼的四层楼南窗户跳下。由于屁股着地，加之夜里刚刚下过小雨，地面松软，仅是砸了个屁股印（我也是好奇，当天上午特意去工五楼的南墙下面看了看，一点儿不差——屁股印很鲜明），王没事人似的拍拍屁股走了。工宣队知道后，马上派人带他去医院检查：尾椎有点儿轻微的压缩性骨折。不久，在东操场召开的全校“宽严大会”上，王瑞龙作为“从严”典型当场逮捕，主要是抗拒运动及捣毁孔庙孔府罪行，被判刑8年。刑满释放后他回老家顺义一中当了数学教师，听说还入了党。在清理“三种人”时，再次被开除党籍，成为代课教师，再后来是离开教师队伍还是经商就不清楚了。他给我的印象是：善于钻营，能说会道，活动能量大。

1967年3月，谭厚兰们按“中央文革小组”的部署，反击“二月逆流”，炮打谭震林；七月与其他高校红卫兵组织“反帝反修联络站”，八月和外院红卫兵等“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参加到誓死揪出刘少奇的“揪刘火线”。记得当时中南海的西墙、整个府右街两侧，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一个接一个，满满地全是高校及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安营扎寨，红旗猎猎，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呼号：“揪出刘少奇、打倒刘少奇”，“造反有理”。真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大有“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架势，搅得周围居民无法入眠，苦不堪言。直到八月五号公布毛主席一年前即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贴出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才算了结。因为毛主席回京，岂敢干扰主席休息。整整一个月，“揪刘火线”闹剧终于偃旗息鼓，府右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七·二〇”武汉事件，在全国影响非同小可。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社会出现动荡，引起毛主席和林彪的警觉与不满。毛说：王、关、戚破坏“文革”不是好人。很快，王力、关锋、戚本禹及林杰等陆续倒台，这对谭厚兰是极大的打击。

九月七日，师大发生了倒谭事件。有个什么“专政委员会”还将谭软禁，谭的革委会迅速崩溃瓦解。对此，考虑全国可能会出现连锁反应，“中央文革”连发三道指令：谭厚兰是革命的，革委会及井冈山红卫兵是革命组织，“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立即解散。

指令像免死牌又像护身符，保护了谭本人，也稳住了谭们的阵脚，但与谭观点相左的师大造反兵团正式恢复活动。我和班上的一些同学参加了师大造反兵团，并跟随兵团在1968年3月下旬参加“倒谢”，贴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倒谢”一周而失败，早春三月寒风料峭，师大校园有一种兵败如山倒的凄凉与萧条。不知为什么，市委下达命令：“对参与‘倒谢’的人，一律不予追究。”（谢富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1972年病逝，1980年被中央开除党籍，1981年被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三月底中央宣布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指出他们是倒谢的总后台，这哪跟哪啊？真把我们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四月初，数学系一年级的三个同学到三里河踏青。由于好奇，不知深浅地竟然跳上钓鱼台的围墙往里瞧，结果被围墙里的解放军用枪堵住，带到传达室查问。是师大的学生，感觉没什么问题就给放了。可是，半夜却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卫戍区战士，临时戒严西西楼（我们的宿舍），又把其中家庭出身地主（富农？）的范光州同学抓捕。原来此事惊动了江青，江说：“杨、余、傅刚倒，就有趴钓鱼台墙头的，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认真查处。”就这样，范光州在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待了半年。此事深深地教训了我：不该吃的别吃，不该看的别看，不该想的别想，不该做的别做。好奇惹祸啊！

1967年，谭厚兰们除了在社会上到处造反，校内主要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背后操纵下，接连不断地批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饭厅先后批斗了李立三、张闻天；在东操场西面的小舞台批斗了彭德怀；在东操场北面的大舞台批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等。这几场批斗会，作为群众，我都参加了。

（批斗彭德怀）

（批斗彭、陆、罗、杨）

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天，彭德怀被两个红卫兵反扭着胳膊押上舞台，低头撅腩的“喷气式”，接受着红卫兵一个接一个的声嘶力竭地批判。押解他的红卫兵每隔15分钟轮换一次（当时，我看见有我们班的谭氏红卫兵严xx、李xx、戴xx参与押解）。彭德怀留着光头，红卫兵无法揪他的头发，就恶狠狠地毫无人性地揪扯他的两只耳朵（尤其严xx，他的所为也让我看的真真切切，后来，厚容同学也给予证实），疼得彭老总龇牙咧嘴。看到不堪入目的此景，台下的我感到特别凄楚：这可是为共产党立过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啊！那时，民间已经传出1959年彭上的万言书，看不出什么错误，完全是实事求是地为民请命。难道是因为“岸英之死”？还是真要再现“火烧庆功楼”？左思右想不得其解，我不敢往下胡想。

彭、罗、陆、杨四人站在一排，一起被批斗。摔断了腿的罗瑞卿，左腿缠着绷带装在箩筐里，被两个红卫兵抬着送上舞台；彭真穿着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站在四人的最左边，那可是北京的七月天哪！穿汗衫都哗哗地流汗，何况棉衣棉裤？是不是一种自我保护？！我只能瞎猜测。台上站着四位老革命如何想，我不清楚，但却让我想起1927年随毛到井冈山创建根据地的谭震林，1967年2月竟然在怀仁堂怒气冲冲地摔下的三句话：“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何等的百般无奈的绝情！

“打倒彭真！打倒罗瑞卿！打倒陆定一！打倒杨尚昆！”“砸烂彭、罗、陆、杨的狗头！”“彭、罗、陆、杨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批判的文稿。因为有许多外地、外单位的革命群众，操场上人来人往的，台下的人们没人去听批判的内容，却乱哄哄地挤到台前观看四位“黑帮”长得啥模样。

谭厚兰已是北师大的女皇，狂傲骄横，顺者昌逆者亡。特别是造反兵团的“倒谢”，更给了谭氏欲整垮兵团、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的把柄。校园里，今天批斗暴打这个兵团骨干，明天揪出那个兵团骨干示众，比如数学系的管甲仁老师（在朝鲜战场失去左臂的转业军人）、数一的王守田、王学功同学，物二的许永康同学（华侨调干生），等等，游街时被拳打脚踢皮带抽：眼镜打碎、鼻子流血、耳朵流血、脑袋肿得像发面馒头……体育系有两个膀大腰粗、人称“黑狗熊”“白狗熊”的谭厚兰的打手，大显“威风”，心狠手毒，野蛮之恶登峰造极（比董超、薛霸还坏）。看到他俩的卑劣行径，令人愤恨又觉得“可怜”。人在做天在看，“恶有恶报”，我想，这两个把打人当成自己酷爱的人渣绝不会有啥好下场的。

师大校园里，谭厚兰的打手们无恶不作，一片“白色恐怖”。迫于谭们的高压，我们几个回到班里接受井冈山红卫兵的“批判”，参加早请示晚汇报学毛著的活动。

但是仍有百名兵团战士，铁骨铮铮坚贞不屈，坚守捍卫着自己的地盘儿。谭厚兰们丧心

病狂地围攻工五楼，用三角铁焊成铁架子，绑上自行车内胎，制成超级大弹弓，向楼里投射石块砖块，楼上的窗框被砸断，玻璃被打碎……久攻不下，谭厚兰气急败坏丧心病狂，完全失去人性令武斗升级：烧楼且对工五楼全面断水断电断粮，逼得兵团战士硬是不顾危险地在楼里挖出一口水井……在外面的兵团战士，深夜偷偷地往楼里投掷从食堂拿出的馒头烙饼包子之类……直到1968年底，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师大，围攻才告结束。

我承认自己懦弱、没有铮铮铁骨，在兵团最艰难的时刻离开了兵团。但是，我由衷地佩服坚持斗争到最后的百名造反兵团战士：铁骨铮铮，勇斗邪恶，坚持真理，赤胆忠心，问心无愧。笑到最后也是笑得最好的是：无论造反兵团的头头，还是造反兵团的战士，没有一名触犯国家法律被捕判刑，没有一名堕落成入渣。他们不仅是兵团的精英，更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正直、刚毅、敢承担，是工作中的骨干与栋梁，有的成了科学家、数学家，有的成了有良心的教授或知名学者，有的成了杂志的主编、社长或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有的成了教育集团的董事长，还有的成了人大副委员长。

他们是我肃然起敬的人，也是我为之骄傲的人。

注：文中图片下载于“百度图片”。

不太平的北太平庄——北师大“文革”琐忆

安希孟

平民史、口述史、风俗史、家谱族谱、笔记野史、民间文化，不是庙堂文学，不是官史，不是正史，不是府志，如今进入视野。曾经，文学、历史，指高雅官府作品和专修史，而今，口述史、风俗史，进入研究领域。

一、“文革”北师大若干事件琐忆

“文革”开打未几，我们的老师陈达星不无善意地提醒我们：1957年反右，西北楼大字报也曾经铺天盖地，但后来还是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我们不信他的话，以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然而，秋后算账的事儿还是发生了，但那是几年以后的1969年秋后。

我们班的蹇明理同学1965年入学查出肝炎，休学回家。我们从别人的大字报得到启发，就揭发系领导迫害工农子弟。不过谁也不认得领导，就把系秘书周泽兰拉出来大声呵斥，让周泽兰站在文史楼台阶上“竖起狗耳朵听着”。“文革”成盲动，大家不知道“文革”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刘少奇说，运动怎么搞，你们不明白，我们也不清楚。连他这样的领袖级

人物也若明若暗，方向路线都铸成大错，学生也就瞎揣摸，盲目盲动，全民愚痴。至于究竟什么是封资修帝修反叛特资，定义自始就不明确。自上而下陷入迷狂，社会动乱显出原形，愚弄群众终成大局。国家陷入混乱，运动成盲动。陶铸调侃，运动就是“要运要动”。如今国家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就是明智之举。

文化革命外语系批斗黎浩智老师，大字报罗列罪状之一是他们哥仨叫黎浩智、黎浩仁、黎浩勇，和蒋介石的智（wisdom）、仁（benevolence）、勇（courageous）符合。学生用厕所铁丝纸篓制成高帽给他戴上，好像铁丝划破了脸。西北楼内有人骂董辉是狗崽子（puppy），董辉机智地说，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方义奎说，“你也配做劳动人民的儿子？？ ”他说，“陈伯达同志说，我们都是（We are all ）劳动人民的儿子。”董辉后来在四川攀枝花某中学反对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四人帮倒台，他又被说成和四人帮有牵连，仍不得翻身。1980年我到南京大学深造，和他有过通信，他用文言体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很有水平，不愧是师大才子。高年级还有几位朋友叫刘家钊、李庆云（庆云，五色云）、陆家贵、袁道之。

胡敏，系总支秘书，高年级给他撰对联讽刺，大意是：小胡敏正步走得得意洋洋。后来破四旧，一年级二班的袁景龙、陈金国等同学嫌“师范”二字讨厌，把北师大改为“教育革命大学”，把校门口校牌抬回来，贴上“中国教育革命大学”几个字。但我觉着不如外语学院改成“世界革命大学”神气。

1966年6月的一天傍晚，彩霞满天，忽然“毛主席万岁”响彻北师大校园——以一机部副部长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奉北京市新市委委派进驻北师大。众生热泪汨汨如泉涌，迎接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不知那是刘少奇司令部派来的消防队）。孙友渔站在主楼阳台上向满含热泪的我们招手致意。他雪白衬衫外套毛背心，风度潇洒。没娘的孩子又有了娘。

工作组进校后，宣布“内外有别”，先在图书馆二层大阅览室开辟大字报区，铁丝纵横交错，大字报飘飘然，揭露程今吾、谢芳春、石森、马建民。我们都渴望大字报能揭发惊人的反革命滔天大罪。然而很失望。依稀记得程今吾是延安小学（高干子弟）校长，有《延安一小学》著作。谢芳春原为广西自治区党校校长，他只有关于“两论”的辅导文章供挑刺；石森是解放军总参干部，为了加强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到北师大做政治部主任，“三结合”进革委。讲话语无伦次，被戏称为“老阿斗”。马建民是作家杨沫的夫婿，《青春之歌》中的样板人物。“三结合”干部，水平也不咋地。我对于黑帮没有像样的可供批判上纲上线鸡蛋里挑骨头的文章，恨恨不已——总得抓住几个“三家村”才过瘾呀！

工作组在主楼八楼大会议室召开批判旧党委走资派大会，神秘兮兮，校园冷冷清清，一片死寂。我辈非党团员游离于运动之外，只有少数党团员参加批判。我自幼因政治原因一向自卑，自己个儿归类为落后分子。在主楼批判党委书记大会，学生代表出席，我班是董连猛与焉有份。有几次大中小会议报告，规定团员才可参加，全校设分会场联播。系里党团员开会，我班六位团外人士，单独学习讨论。好像是非党团员中，我又成了地位较高的——我是主持学习讨论的召集人。校园冷清凄凉。真如伟大领袖说的，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文革”伊始，北京市委改组，以李雪峰、吴德为首的新市委取彭真、刘仁的旧北京市委而代之。北师大遂有热血青年张贴大字报，砸烂旧党委，认为以前加入的是反革命黑帮集团彭真的修正主义党团组织，遂宣布自即日起退出党组织，重新申请加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旗下的中国共产党。此声明甫出，即群起而攻之：你宣布退党，就是叛党。那几个“退党者”吓得腿肚子筛糠，赶忙谢罪。好在各级党组织瘫痪，不再过组织生活，也不缴纳党费了，没有书记、副书记管辖，人自为战了。

后来我研究基督教历史，知道，基督徒一旦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不管给你施洗的牧师、神父成为异端、叛教者，还是腐败分子，那洗礼都有效，无须二次受洗。因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水是圣水，圣灵在起作用。只要手续完备，在组织程序上，你就是合法合理的基督徒。你加入的，还是共产党。

“文革”前夜，我被本班团支部通过发展新团员，但没有扶正，还没有履行手续，还没有宣誓就职就天下大乱，神州陆沉。我从此永久性地成为无党派人士。1971年北师大吐故纳新恢复党团组织生活，效率太低，也还是没有履行手续成为团员。我到银川六中当学生班主任，学生入团得经我手，我不好意思。学校书记说，班主任是受党的委托。我这才挺起腰杆。

有一天，北师大文史楼108教室忽然人声鼎沸，人们一窝蜂涌去。原来高年级有几个出身不好的非党团员、平时政治表现又差的人也想乘机造反（人家党内内斗，你激动神马）。高年级党员干部以风卷残云之势揪斗之。批判大会主旨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对高年级学生和一部分老师颇觉陌生——他们刚从山西武乡四清一线撤退回校。主持斗争大会的高年级一位党员大哥哥大概是肝癌，带病上阵，腹部抵顶讲桌桌角，脸上气色不佳，但极具斗争口才和组织才干，成功揪出几个翻天的“游鱼”——据说有一位右派学生，其舅父在台湾，是国民党军官。这让我吓出一身冷汗。

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袖章偏窄，毛体红卫兵仨黄字偏小，且正上方有一颗五星。师大井冈山战歌来自电影《碧海丹心》的插曲《钢一连连歌》：“巍巍井冈山，养育着钢一连，毛代表就在我们的身边，朱军长走在队伍的前面。我们来自南昌城下，我们来自湘江两岸，为了红色政权，和白匪军决一死战。”

此组织的战地歌曲还有《雄伟的井冈山》：“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二万五千里，万水千山，突破重围去抗日，高举红旗上延安，转危为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一泽一东。”1967年“五一”或国庆，北师大和北大在天安门广场是邻居，打派仗，对歌互骂，对口快板，三句半，山东柳琴。把北大打败了。北师大表演“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叠罗汉的文宣队搭人梯排成山岳，手指北大方阵。北师大井冈山每次开会还集体放歌《井冈山之歌》：“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座雄伟的高山。苍松翠竹常年青，山洪流水永不断。伟大领袖毛泽东，在那一九二七年，他把人民的枷锁打烂，带领着红军上了山，你是革命的摇篮。啊啊啊啊啊啊。”

1966年11月下旬，北农大附中高三学生伊林（本姓刘）、涤西（本姓张）张贴《致林副统帅的一封公开信》。12月初，北师大物理系三年级学生杨以鸿、刘中柱张贴《也致林副统帅的一封公开信》。北师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林锋（本姓敦）、卫东彪（本姓张）也贴出给林彪“提意见”的大字报。物理系、数学系的学生张贴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建议”的大字报。清华、北大、中科技大也有给林彪提意见，给“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大字报出现。

对林彪的“意见”，主要是反对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的说辞，认为“顶峰”论割断历史，否认马列主义继续发展，不符合辩证法，认为“天才论”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动力的唯物史观，是“英雄造时势，伟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伊林、涤西、杨以鸿、刘中柱的大字报言辞激烈，“警告”“敬爱的林副统帅，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历史的辩证法又是公

正的……我们不愿看到有一天历史的辩证法之鞭落到您身上”！

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则主要是针对乱批乱斗造成的混乱，称若发展下去，社会生产和生活必将遭受更大损失，建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等领导机构照党的政策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有力措施，予以矫正”，将“文革”引向正确轨道。

忠言逆耳，被称为“十二月黑风”的学生遭到镇压。1966年12月中下旬，他们被“拘留审查”。在查清他们“身后”并无“黑手”操纵后，1967年5月29日他们被解除拘留，回校接受“专政改造”，编入“学生劳改队”。1969年8月，完全解除“劳改”，是团员的恢复组织生活。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工军宣队说：林彪自取灭亡，并不意味着你们当初就正确。这件事情今后组织上不再说了，你们自己也不要再说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1978年，他们最终得到“平反”。伊林于1978年考取人民大学，杨以鸿1978年考取杨振宁的研究生，赴美留学，学成归国。但终因“劳改”落下的病根，于1988年病逝，年仅41岁。

北师大外语系另有一个方义奎，名不见经传，1966年12月因为攻击林副主席遭遇批斗关押，据说精神失常。我们的历次政治斗争标准不断改变，今是而昨非，朝令而夕改。但当其时也，罪名和罪行都很吓人，过后一风吹，整人者，轻轻拍屁股走人，然而被整者、被批斗、被关押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失去的却是全部，甚至生命。

北师大井冈山带头造反事迹主要有：造孔庙的反，反“二月逆流”，造大庆、大寨展览的反，武汉支持造反派，火烧英代办，“揪刘火线”。

1967年3月，我被抽调到社科院和北师大的“中央各部联合调查组”，那是“中央文革”为渗透到周恩来管辖的地盘窃取动向，掌控中央各部对李先念、陈毅的意见，反击“二月逆流”搞的一个组织。我被分到财贸口。然而没有见到过一张关于他们的大字报。我当时血气方刚，觉得几个副总理比较右，希望真的能发现有关他们的大字报。青年人容易被利用。人有虐待情结，希望别人倒霉。肉食者利用人性的弱点从中渔利。

我在中央各部调查组结识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牟钟鉴、李富华、李兴华诸位大哥哥。起初奇怪怎么还有大学生研究宗教。问他们可不可以结婚，是否必须持斋食素，是不是打到宗教内部窃取情报。后来才知道毛泽东说过学点宗教，又知道同在一个调查组的人观点不尽相同，也有维护李先念、李富春、陈毅、余秋里的。他们后来也分成两派。就是当年真造反的“联队”朋友，他们后来也切齿痛恨后面的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可是又怎么可以怪罪于他们几个书生呢！我因了这点滴社会科学知识，后来就报考了南大宗教研究生，拿基督教学理言说社会问题！

清查“五·一六”时，分到东北的同学所在学校觉着这位同学反对过李先念，于是千里迢迢来北京外调。我没有捏造，也没诬陷，外调的人说我不老实，“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我就火儿了。蒋亨俊老师——她落难时我帮助过的——说我态度不好。我告诉自己，永远不要怜悯别人。

北师大革委会成立后的1967年春天，系革委会成立，俄四李保全是系主任。我们年级也成立“文革”小组领导班子。一个班出一个人任年级“文革”小组成员。我们班，一年级一班，我和王尔德、刘泽英是大家选出的“文革”小组成员。我和刘泽英是好朋友，尽管在井冈山里我属于异议人士，但我俩私交不错。我住医院她常去看。

1966年红八月，夏日炎炎，女生穿短裤不穿裙子，开口闭口“他妈的”“操”（现在叫“靠”，Cow）。到批斗台上踢打牛鬼蛇神，是革命的表现。说句实话，女孩子内向羞怯，其实是一种美。大呼小叫，不好。疯狂的行为，最好让我们这等粗人干。

1966年盛夏，人民日报记者碰到我班美女王崇义。王说自己是“崇拜毛泽东主义”的崇

义。王崇义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叫北师大革委会宣传队（脱胎于井冈山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舞蹈动作大体是伸胳膊展腿右臂抱拳横胸前，左臂后甩，前腿弓，后腿蹬，作横眉怒目状，口中念念豪言壮词。或其余三肢同，右手下指，目光如炬，怒斥刘邓。右臂斜劈，表示横扫。右臂抬起作仰视状，即望见北斗怀念伟人。要是砸烂狗头，就杏眼圆睁，纤纤玉手握重拳砸下。每次香汗涔涔，锻炼了身体。

红八月，“红色恐怖”。一位“狗崽子”汤运昌，写大字报改名“毛为民”。同班女同学不让他革命：“你也配姓毛？”站到凳子上，用扫把顶住一张沾满糨糊的破纸，上面写“狗崽子汤运昌”，要盖住“毛为民”。大字报底下许多“跟贴”，都是糟蹋他。其实，汤姓出自成汤，即商朝的开国君主。这是贵族呀。运昌，多好的名字，鸿运昌盛。那时候，我老是自责：祖宗为嘛不拉一根打狗棍讨饭！且常为旧社会家里不穷而懊恼。

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内部的南北两派是这样的：井冈山的元老们，大多是有思想有见识的敏感的一批优秀学子，他们自觉造反，最先组建井冈山战斗团。但1966年10月井冈山内部大辩论大分化。最早的井冈山战士最有思想。有保姆的左派谭厚兰不能容忍他们比自己更有能力。他们退出后组建了井冈山造反兵团。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叫井冈山，因为当初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就是他们始作其俑。谭厚兰上山后翦除王伦王佐们火并他们，董连猛当初还在伪红卫兵师任军职。王颂平、李先华、蒲寿章等井冈山“元老们”被赶下山，只好另立井冈山造反兵团。没有退出的，就是后来的南派基底。即使如此，井冈山内部依然有一批“元老”不满于谭厚兰的无能。一般人心目中谭厚兰并非才华横溢，只是事先得到内部小道消息，奉辞伐罪（奉辞伐罪，指奉严正之辞而讨有罪。《书·大禹谟》：“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伐，一作“罚”）。师大最早造反的有为青年中不乏才智志士。1967年春，北师大革委会成立前后，井冈山二度分裂，大字报中心区南北两面各有一份声明，分别形成为南派和北派。南派是反对派。这一派1967年冬延伸为“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多么奇特的名称，一个松散的小团伙。我是这一派的。发起人中文系张梦阳先生，如今是鲁迅研究达人秀，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井冈山内部的反对派，便具雏形。谭厚兰的革委会内部有了分歧和对立面，给善于钻营的某些人以可乘之机。1967年9月，王力、关锋、林杰倒台，革委会再度分裂。樊、黄、李三位常委身陷囹圄。此时革委会剩下谭厚兰、董连猛、石森、马建民、曾昭耀等。樊、黄、李在德胜门看守所吃八两窝头（当时的调侃用语）。

工军宣队清查“五·一六”，外语系刘月英仅仅因为不拥护工宣队就成了牺牲品（刘月英死得惨烈，见《记忆》第150期）。刘月英，山东女子，后来和兵团观点一致。

据数学系卫小慧的见证，1971年在北师大校医院住院时，一天，门外响起了咚咚咚的声音，还是隔壁那个可爱的刘月英，又拄着拐杖在楼道里顽强地练习走步。刘月英喘着粗气，靠在卫小慧病房的门框上。她摔得非常惨，骨盆粉碎性骨折，虽然做了手术，痛苦减轻了许多，但下肢神经已不可修复，整个下半身就像拨浪鼓一样甩动着。卫小慧真想去搀扶一下，可她又不敢去。刘月英后面跟着两个人，像押解犯人似地监视着，不允许她和别人接触，不允许别人和她说话。她不光失去了青春，也失去了自由。怎么会这么残忍。刘月英放下一只拐杖，把一绺搭在眼前的头发拨到耳后，原来红润、稚嫩的脸上，现在几乎没有了血色。几步路就折磨得她上气不接下气。听说分到江苏的同学上午都走了，其中就有她的男朋友丁锋（道升）。也许刘月英不想拖累男友，让他轻轻松松走了。可她今后怎么过呢？那么漂亮的一个姑娘，人人羡慕的新党员，当初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四·二六，就这样毁灭了一个风华正茂的人生。这个重大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想到这里，卫小慧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只见刘月英拄着拐杖，咬着牙，强忍着剧痛，想迈出一只腿，然而腿却不听使唤。这一步步

走向康复之路是多么艰难。她练啊，练啊，然而汗水仍然难以换来想象的效果。校医院只留下她坚韧不拔的身影。后来她父亲接她回家，几年后她拖着残疾的身子到师大讨个说法，最终在师大绿园地下室一间房子里孤独地结束了她宝贵的一生。

因祸得福

张传亭

一、为伊林、涤西求情沦为“反革命”

1965年秋，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6年6月1日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一时间，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校长、教授被批斗，学生无课可上，校内各种红卫兵造反队像雨后春笋般涌出。一校分成两派，一系分成两派，一班分成两派，北师大也不例外：一派名叫“井冈山红卫兵”，以谭厚兰为首，另一派叫“井冈山造反兵团”，以王颂平为首。这两位女首领都不简单，不过谭厚兰实力更强些，她左右着北师大的形势。因为她曾受到过毛主席接见，是北京学生运动闻名全国的五大领袖之一（“文革”结束后因罪入狱）。

1966年12月初，谭厚兰让人转抄一张题为《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公开信的署名是伊林、涤西，他俩是北京农大附中高三的学生），加了抄者按语，说伊林、涤西反对林副主席，是现行反革命，公开信是大毒草，号召革命群众给予迎头痛击。

我和本班同学敦进田看了公开信后，认为公开信的内容主要批评林彪1966年9月6日在军事院校的讲话，信的观点很有道理，如：林彪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公开信认为这个提法本身就不符合马列主义，另外还批评那次讲话的一些错误观点。当时电台经常播“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们深知林副主席批评不得，但又想为两个中学生鸣冤，于是由敦进田执笔我签名，署名为林锋（敦进田）、向东彪（张传亭），写了“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文章用了大量篇幅为林副主席歌功颂德，用极小的篇幅说出我们的意思：即便伊林、涤西说话有错，他们还是孩子，不要一棍子打死，可以批评教育。并将油印件张贴在大字报栏内。第二天，师大物理系三年级（3）班学生刘中柱、杨以鸿（以后是李政道的研究生，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北师大破格聘为教授）贴出大字报，题为“林彪副帅也是可以批评的”。对刘中柱、杨以鸿大字报我就不介绍了，仅从我们的笔名来看，“林锋”就是从林杰、关锋的姓名中各取一个字组成，“向东彪”即心“向着毛泽东与林彪”，其意义不言自明。但是，马上就有人在我们的笔名上大做文章，说“林锋”“向东彪”的含意就是像树（林）的（锋）芒指（向）毛泽（东）和林（彪），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校园内贴了许多的大字报与大标语，其中多为口号“打倒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林锋、向东彪、杨以鸿、刘中柱！”“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统帅罪该万死！”“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同时还新贴有大字报和标语，称“坚决支持、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正告：“反对‘中

中央文革’者绝无好下场！”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从此后我们就成了“反革命”。

12月17日，我们被井冈山红卫兵以反革命罪抓了起来并限制了自由。他们邀了北京新市委办公室主任来校督阵，在北饭厅对我们四人召开了全校性的批斗大会，我们在台上全成喷气式飞机状。第二天中文系又批斗我俩一场。12月18日晚，大雪纷飞，外语系的董连猛又把我们四人在外语系批斗了一次，随后就把我们四人押送专政机构了。紧接着又把物三的李文博与数二的李世取（笔名“黑牛”）投入了监狱。

1967年5月29日，放我们出狱回到北师大。下午，中文系召开批斗我俩的大会。去批斗会的路上我心里想，小人物居然有了名气了，多日不在，回来还弄出响动来了，中文系还搞个“欢迎会”哩！回校的第二天，班里“左”派找我谈话，让我供出余党，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左”派看我很迷惘就道出原委，你们昨天回校，校园内突然出现反动标语：“打倒江青！打倒康生！打倒陈伯达！打倒四人帮！……”署名天戈，天戈还说，你们抓不到我，我可以上天，可以入地。“左”派严厉训斥我，天戈是谁？如不是你们的同伙，为什么“反标”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在你们回校的当天出现？我说，真的没有同伙。半年多在狱中，回校的当天我们是被隔离的，跟谁也没接触，天知道是谁干的！如今，事隔四十五载又旧事重提，我真想知道那位有正义感的天戈是谁？他在哪里？

由于“反标”的出现，班里“左”派如临大敌，不敢掉以轻心，在楼道的墙上刷了大标语：只许反革命分子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把我们当反革命对待，立即让我们到学校修建科劳动改造，不参加班里的政治学习和一切活动。

我们在修建科劳动改造期间，感到工人师傅的温暖。他们是：冯师傅、牛师傅、付友生、国同有，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看看班里的“左”派的冷漠，我除吃饭、睡觉、回宿舍，其余时间情愿待在修建科。那里是我们的乐园，十个“反革命分子”在一块，劳动时有说有笑，无事时可看书习字。“文革”后期，我们回班参加政治学习，楼道里宣传标语也都是我写的，这些字受到外班同学赞扬，他们问到谁写的时，我班一“左”派话里有话地回答说，他在修建科闲时多净练字了，咋能写不好！这是后话了。

二、进“系劳改队”初识启功副教授

约1969年3、4月间，班里通知我们，不要到修建科劳动了，跟中文系的“牛鬼蛇神”（即中文系的反动学术权威）一块儿劳动。劳动之前叫他们排好队后，要先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声音低沉，曲调呜咽，听起来如念经一般。不过我们还不够格唱，只能在一边看着，心中泛起一阵阵难言的酸楚。等唱完歌，他们和我们排着队向劳动场所走去，围观的人看着老怪物，也注视着我们几个小怪物。

这次劳动任务是给师大院里庄稼地里的玉米追化肥。我们年轻人当然是干重体力活，用粪铲逐棵在玉米旁扒坑，老先生们往坑里丢化肥。一上午扒坑的只管扒坑，丢化肥的只管丢化肥，没有喧声，没有话语，连交头接耳讲话的都没有，人人一张没有表情的脸。收工了，有人问我，你可知道在你身后丢化肥的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是启功，我说启功是干啥的？他说启功是“红学”（《红楼梦》）专家，也是中国一流的书法家。听到此，我对启功先生顿生敬意。因为小时候我就喜欢写字。小学、初中、高中时，我为学校誊写过专栏，初

中时为老师刻过钢板，高中时我写的大字曾贴在校园的墙上展览过，“文革”初期经常抄写大字报，所以对书法有着浓厚的兴趣，对书法家更是钦慕不已。没想到现在这位大书法家就在自己身边，自己却高兴不起来，何也？因为看到的不是他挥毫泼墨，而是他被迫无奈地丢化肥。当时我心里的滋味真是难以言表。不过，自此而始启功的名字就镌刻在我的心里了。

三、朝夕相处，促成了终生师徒

“系劳改队”解散后，我回班参加活动，而启功先生恰好被分在我所在的六五级中一（2）班接受群众监督，我开始得以同启老朝夕相处，患难相扶。由此我因祸得福，从启老学字，又与启老有了书信往来，更使我有幸得到启老墨宝逾百件。

我自幼喜欢毛笔字，小学、中学时为学校誊写专栏，高中时参加过学校举办的师生书法展。1969年探家时，我求得阜阳名家的一些墨宝，用图钉钉在我床头上欣赏。可能是这个在当时少见的举动，使启先生发现我对书法的兴趣，所以他常借机到我宿舍来叙话。我已听说启先生是中国一流的书法家，心下十分仰慕，故而每次见启先生到我的宿舍，我都欣喜不已，请先生坐，给先生倒开水，气氛十分和谐。那时，启先生是群众监督对象，革命“左”派皆直呼其名，叫他干这干那，似乎这样才表明自己与“牛鬼蛇神”划清了界线。我当时是打破头不怕扇子搧，心想你们反正把我看成黑的了，我再在黑堆里打打滚又怎么样呢！何况我是打心眼里敬佩、崇拜启老呢！也许就是我这种宠辱不惊的态度，赢得了启先生的好感和认同，使我们之间的情感亲切起来。没想到的是，从此先生把我领进了书法的艺术天地。

1969年秋的一天，启先生第一次在我宿舍（西北楼106室）给我讲书法。他说，写字最讲究的是字的结构，或说间架。他拿起学生抄大字报的笔，问我家是哪里的，我说安徽行流镇，他给我作示范，写了安徽行流四个字。并说，汉字除少数字如口、国等外，绝大多数字形呈正△或倒▽，这样写出来才好看。又说，赵孟頫讲用笔第一，结构其次。我的观点是结构第一，用笔其次。比如“安”字，我同时写两个，一个宝盖头小，一个宝盖头大，说罢两个“安”字写就，然后说，用笔是一样的，都是我认真写的，你说哪个好看？我答说当然是宝盖头小的好看。启老说，写出的字好看与否，结构是最为重要的。你看受检阅的士兵，一个个立正站直，抬头挺胸，多精神啊，如果弓背弯腰斜着身子，那就难看了。字也要像人一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就要求写者研究字的结构，笔画的长短和位置的高低。这些箴言让我受用一生。每个人可能都遇到这样的情形，有些字老是写不好，这就说明你对这些字的结构没有吃透。我常常惊叹启先生笔下的字，字字得体稳妥，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个个神采飞扬，如龙振动，似花烂漫。

1970年夏的一天，还是在学校西北楼106我的宿舍里，启先生和我聊书法，他的话让我吓了一跳。他说，王羲之是书圣，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实，也有中国人不知道或没说出的事实是，后来人有不少是超过王羲之的，如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还有以后的赵孟頫、董其昌，等等，他们的书法艺术均有超过王羲之之处，但中国要打书法的旗号，还是要打王羲之。这石破天惊之语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扉，在此之前我实在是闻所未闻。现在反复思索启老40多年前的说法，我体会他的意思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要辩证地看待古人，不必妄自菲薄、迷信古人；激励后人要超越前人，也是可以超越前人的。

1970年寒冷的冬季，我和敦进田同学迎着凛冽的北风，在北海公园的亭柱上拓乾隆的字，拿回宿舍请启先生过目，启先生一一作了点评。第二天启先生避开“左”派耳目，偷偷送我

一些散页字帖，并跟我说，学习书法多临帖，不要单一地临某家，要博采众家之长，譬如人吃饭吃菜，不能吃单一的饭菜，鸡鱼肉蛋是好，老吃这些，不吃萝卜白菜豆芽黄瓜，也会吃出毛病的。对胃口的多吃些，不对胃口的少吃些，临帖也是这个道理，喜欢的帖多临，不喜欢的帖也可一临，就如吃东西一样，不伤胃就有益处。经过多年的实践以后才知道，这确实是启先生的经验之谈，甘苦之言。

四、启功先生同我合作出墙报

1970年9月，我们班要出“国庆专栏”，革命“左”派负责组织稿件，叫我负责誊写，叫启功负责画报头。当时出墙报的用纸全是白油光纸，连画报头的纸也不例外。这是我与启功老师的首次合作，终生难忘。

这次能亲眼看启先生作画，实是幸事。那时自己不懂画，总认为画画是很难、很神秘的事情。启先生作画，令我大开眼界，觉得他很随意，几勾几戳，几圈几点，玩儿似的，一会儿工夫，一棵粗大的弯腰松树就斜立在纸上了。这时才明白先前那些圈圈点点，是为了表现虬干之苍老，青松之活力。他画松叶，乍看是乱勾，细看是有节奏的笔舞，未成形时不知其妙，待整个树冠画齐时再看，栩栩如生。好苍劲茂盛的一棵大松树啊！同学们也禁不住喝起彩来。启先生洗洗笔，重新蘸了蘸红颜色，又画了一轮朝阳，这幅“苍松旭日图”的报头是大功告成了。当时就觉得启先生这幅画很有深意；它预示着我们的国家在经历诸多磨难后，依然向上，会迎来红艳艳的太阳，迎来光明的前程。联想自己当时的处境，似乎也看到光明的未来，所以也备受鼓舞，想来这是启先生的期盼，也是时代的期盼吧！

我誊写稿件时，把所有标题都空在那里，专等启先生书写。也许启先生看我写的字在学生中还能说过去，他边写标题边说，“学写字一定要临帖，还要善于学习，老师随处都在，关键是你能否发现。春节期间，我特别注意看人家门上的春联，会发现有自己的‘一字之师’，有自己的‘一笔之师’。”听到此，我对启先生更是崇敬有加。你想啊，中国一流的书法大家，乐意从群众书写的春联中学习，还虚心地尊为“师”，这是何等的襟怀啊！

当启先生用隶书写标题时，我说启先生的隶书也很帅，他立即回说，“我平时不写隶书，这次由于标题都是我写的，为了使标题字有所变化，才不得不如此，你是看到我写隶书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位，我的确不善此道。”

我们班的“国庆专栏”张贴以后，围观者甚众，都夸报头画得好，标题字写得好，也有人讲内容誊写的也不赖。这次与启老的合作，我是沾光多多，更受益匪浅。每当忆起在特定年代与启老的那次合作，心中总会生出种种感触，但也有一点遗憾！

遗憾的是没把启老画的报头收藏起来。我们班的“国庆专栏”贴出两天后，我心里曾动过收藏报头的想法，但没敢行动。因为当时自己还戴着紧箍咒——“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心想如果自己偷揭报头，会不会再扣上一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呢，还是不要找事的好。

可没过几天，启功先生为我们班画的报头就不翼而飞了。我当时是多么的无奈，多么的惋惜啊！四十多年过去了，每想至此，心中就会涌出无限的感慨！

我是1972年4月被分配回安徽参加工作，后来一直与启功老师密切来往，他是我的终生恩师。具体细节已与“文革”无关，略去不表了。

张传亭夫妇与启功先生的合影

张传亭，安徽阜阳人，汉族，1945年出生，1965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本科。曾任宁老庄中学副校长、中共颍东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阜阳市书协名誉主席。现任阜阳市诗词学会会长、阜阳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撰写的回忆启功先生的十篇文章，《中国文物报》2014年予以连载。由启功题签的《张传亭书法选》、臧克家题签的《张传亭书作选》已行世。

北师大头号“走资派”程今吾先生之死

黄大地

1957年反右后，北师大原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何锡麟被认为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而调离。由财政部副部长老革命刘墉如任党委书记。刘身体不好，从1960年起由副书记马建民代理主持工作。1963年，全国出现了所谓的“右倾回潮”，中宣部调陆定一的干将程今吾来师大任党委第一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程今吾年轻有为，到任后大刀阔斧，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对纠正极“左”路线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恢复右派教授讲课带研究生等，同时也就引起了极“左”分子的仇恨。“文革”开始后，程今吾也就自然首当其冲成了北师大的头号“走资派”，一天到晚对他是没完没了地批斗，打骂，羞辱，但程先生很淡定，一副坦坦荡荡问心无愧的样子。

家父黄药眠是1957年的大右派，也在“牛鬼蛇神”之列，频遭批斗。但与程先生比起来，他已处于陪斗的地位。我当时是中学生，学校停课，所以总在师大校园里转悠，含有暗中保护家父的意味，常看到一群小孩子打骂挂着黑帮牌子的程先生，但程先生都以平和的心态挺过来了。可到1970年初，突然听说程今吾死了，怎么死的，是自杀？疾病？还是被逼供打死的？大家都讳莫如深。直到2011年，我见到当时跟程今吾关在一个“牛棚”的化学系学生右派徐光华老人。他透露了真情：很简单，就是想让他死，但又不好做得太露骨，就想了一个办法：在“牛棚”外搭了个狗窝，三九寒天的叫程今吾爬进去睡，说像你这样的走资派连牛棚都不配住，只能去住狗窝，把程先生活活冻死了。早上一看没气了，就找来辆车把人抬走了。

听了徐老的讲述，我就想，哪来这么大仇恨啊！后来一查，原来程今吾也是国统区的，早年是陶行知的学生和崇拜者。抗战时他在桂林是个文艺青年，后来加入中共到了延安。据我研究，“文革”就是解放区的整国统区的，也即苏区党整白区党。就是认为他们对知识分子有感情，对新民主主义比较认同，所以把他们看作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祸根而痛下杀手。（参见拙作《黄药眠的跌宕人生》）。到1970年时“文革”已进入中后期，这些所谓的走资派已到了等着做结论安排工作了。偏偏这时许多老干部反倒都莫名其妙地死了，如当年国统区的

中共干部，著名记者范长江、陈同生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突然死亡的。我感觉这些人的非正常死亡，并非偶然现象，很可能是造反派接到了“中央文革”的秘密旨意，将这些人不动声色地处死，以绝后患。而不大可能是各单位的工宣队、军代表杀害的。对于这一点，还有待当事人能勇敢地站出来加以证明。

2016年4月6日

原载《记忆》158期

怀念“插班生” 杨以鸿

赵惠中

杨以鸿同学原来比我们高一个年级。在1966年12月17日，他与刘中柱一起在北师大校园里贴了一张题为《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要同“壮志坚信马列”的“林副主席”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讨论一下“顶峰论”问题。文中认为：无论是从社会科学还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分析，事物总是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也是要不不断发展的。把毛泽东思想誉为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岂不是要窒息毛泽东思想，使其不再有所发展？……

就因为这张大字报，他立即被打成“反革命”，先被关入监狱长达半年之久，后又被送回北师大“群众专政”，在后勤部门“劳改”，到了1968年12月，1968届毕业生分配了，他因是“反革命”而不分配，继续“劳改”，于是他就成了我班的“插班生”。

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开始时他基本上与我班同学不来往，而我班同学没歧视他。时间长了，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个学习尖子，高考时是江西省理科前十名之内的。大家看见他“劳改”之余还在学英语，学理论物理，有时会偷偷地到华罗庚家去请教偏微分方程。班上的同学对他还是比较友好的，并且还暗暗佩服。因为他是“反革命”，所以下“东炼”（东方红炼油厂的简称）时他就首当其冲了，结果把一截手指头贡献给“东炼”了。到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后，他的“罪名”才自然消亡了。但却仍不给他平反，不给他分配工作，甚至还有一种论调说：“林彪是毛主席树立的接班人，他们在1966年反林彪还是不对的”。直到1972年4月才与我们一起被分配到陕西陇县中学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从1968年12月到1972年4月，他在我班共三年加五个月的时间，早已与我班融为一体了。后来听说他被李政道招为研究生，在固体物理方面有所建树，属这一领域的世界领军人物。

（左起：安宝生、杨以鸿、赵惠中、许永康。安宝生现任北师大珠海工程技术学院院长，许永康“文革”中因言获罪备受打击，1989年参加民主运动，1991年被投入秦城监狱，2000年逝世）

1987年的7月，我随单位到北京旅游，就住在师大服务楼的招待所内。（1）班留校的安宝生告诉我，杨以鸿又回到了北师大很有成就。可惜的是得了癌症，现正在中日友好医院治疗，看样子很危险。知道这一情况后，我立即与安宝生再加上（3）班的许永康一起去中日友好医院看他。

他好像对自己的病情严重性不太了解，还很乐观地说病好后还要做什么什么。我们也都不敢说什么，只是劝他好好养病，祝他早日康复！心中默默地希望医学能早日攻克癌症，把杨以鸿抢救回来。

大约在1988年2月中旬，安宝生给我来信说，杨以鸿走了，信中告诉了我开追悼会的日期。但我收到信时，他的追悼会早已开过了，我除了痛惜之外，只能希望他一路走好。后来安宝生又给我寄了一份1988年7月1日出版的《师大周报》，此报以整整四个版面以“专号”的形式发表了题为《生为追求，死为追求——记英年早逝的杰出物理学家杨以鸿教授》长篇纪念文章。这报纸我至今还保存着。

从这篇报道中我了解了许多他的故事，其中可圈可点之处很多很多。作为大学同学来说，还想重点谈谈他的“劳改”生涯。由于其“反革命”身份，他被迫在北师大后勤部门“劳改”长达四年半之久。长期的非正常生活，政治上被划为“另类”，精神上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与摧残，导致他身患乙型肝炎，给他最后得重病埋下了隐患。这是其“劳改”生活给他带来的最大恶果。但有失也有得，这期间也让他有两大收获：一是遇到了也在劳改的我系教师刘辽（摘帽右派），他就与刘中柱在劳动间隙向刘老师学习相对论，学习理论物理，为日后出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遇到了政教系63级的张梅英同学，他们患难与共，相惜、相爱并最后结婚生子建立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至于他日后工作以及赴美留学和在物理界创出骄人业绩，因我不了解详情再加上篇幅有限就无法细述了。我只能简单地从系主任杨展如教授在杨以鸿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中摘录部份作为此文的结尾吧！

“杨以鸿教授是江西省新干县人，1946年10月生，1987年身患肝癌，经多方治疗无效，不幸于1988年2月3日午夜逝世，终年41岁。

杨以鸿同志1968年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毕业后在陕西陇县中学、宝鸡师范学院任教师。1980年考取首届OUSPEA，赴美国留学，1984年以优异成绩在犹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该校做博士后工作，在一年内即被聘为研究副教授。

杨以鸿同志在学术上勇于进取，他在科学上一项突出成就就是发现碱卤化合物中色心与分子缺陷（掺入的ON分子）相耦合引起的分子振动荧光辐射和受激发射。并由此开创了一种新型红外激光器。

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导致色心物理、非线性光学与红外激光等领域的一系列实验的理论进展的可能性，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不久前，由这种荧光辐射研制成的激光器已经在美国申请到了专利。

杨以鸿同志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了祖国的建设，1986年8月毅然谢绝美国犹他大学的高薪聘请的较好的实验条件而返回祖国，立志为祖国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这的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杨以鸿同志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在“文化大革命”中敢于与错误言行作斗争，公开表示自己的正确观点，以致受到了错误路线的残酷迫害。

杨以鸿同志在学术上勇于进取，工作上敢于开拓，生活上艰苦朴素，能团结同志，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乐于助人。

杨以鸿同志意志坚强，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在病中还念念不忘工作，不忘周围有困难的同志。……

杨以鸿教授，安息吧！”

2009.06.25

原载北师大8644“新浪博客”，后转载于《记忆》150期

记李金铠

金宏达

左二为李金铠，左三为香港实业家安子介，左一为本书作者

我总觉得，李金铠大概应是北师大“文革”前后最具传奇性的人之一了。

1962年入北师大中文系就学后，很让我们自豪的是，现代汉语一门课的任课教师领衔的，竟然是赫赫有名的语言学界泰斗黎锦熙先生。其实，黎先生因年事高，并不来授课，他让他的大弟子刘世儒先生来讲。刘先生向我们阐述黎氏的语法体系，每每讲到“语言研究所的诸公”时，便提高了声调，词锋也特别峻厉，流露出挑战，抑或不屑。我们这些“束发后生”慢慢就知道，在当时的语言学界，黎派学说大概不甚得志，“语言研究所的诸公”占据着主流地位，黎先生着眼于未来，要从“娃娃”抓起，便调集力量在大一新生中开设“实验班”，刘先生即是从当时另一学校（北京师范学院，即今首都师范大学）“空降”来的。助教呢，就有李金铠。

说实在的，李助教可谓“其貌不扬”，一双眼有些细眯，说不清脸上是否还有几颗“麻子”，不过常带笑，人很和善，晚自习他来教室辅导，总会主动找我们交谈。在当时所开的几门课中，现代汉语或者还算不上重头戏，但为了他的热情辅导，有时自习计划也只得做了临时调整，将其他都稍稍冷落了。不久，又有热心于教师的学术资历与其他背景的人士获知，李助教竟然还是黎大师的“东床快婿”，又有人还悄悄传言云，大师的千金非常之漂亮，而李助教既非名门出身，又不是正宗科班毕业，只是读过一个什么俄语专科学校而已，这就使得我们对这位“貌不惊人”的青年助教要用另一种眼光打量了。

能容得大师设坛授徒的那个时间，瞬息即过，后来便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我们是学生，也曾与老师一起被派到农村去搞“四清”。准备阶段，集中在一处，狠狠地“清理”过自己的思想，相当于是我们中间搞了一次运动，“清理”出来的若干“典型”，其被资产

阶级“腐蚀”和“拉下水”的“严重状况”，令人“惊心动魄”，于是，我们越发要自觉投身于阶级斗争的大熔炉中去锻炼自己。李助教好像与我们不属同一团，但他确凿地未能混过这一关——而且状况还要严重得多。他被当做“向资产阶级权威顶礼膜拜”的典型上了学校的简报，该简报又被当时一位政要阅后作了批示，要以他为戒，警示全党，作为对此种“叛党行为”的惩戒，落实下来的处分是开除出党。如此一来，他的政治生命就几乎被判了死刑。他绝没有料到惩处会如此之重，支部大会表决时，只有他一个人举手反对——在场的其他人，或者认同上面的态度，或者屈服于形势的压力。

被开除出党，在当时的政治辞典上，庶几与“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敌人”是同一性质了，李助教的境遇一落千丈，何况还有一些传闻，说其实是老泰山黎大师为家庭纠纷先投诉了他，想必是夫人也有什么怨怼，终至于夫妻分飞，总之，是一败涂地。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度过那一段岁月的，校园里很少看到他的身影，没有什么人敢于亲近他，在绝对的孤立中，或者，他的后来声誉鹊起的中文编码研究，彼时又加快了步伐吧。

随后，“文化大革命”就到来了。在所谓“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一段时间里，“中央首长”们四出讲话的很多，校园里经常能看到“第一时间”的“纪录稿”：某某在某某学校讲话啦，等等，细心的人便会发现，那些最及时的，往往落款署了：“李为民纪录或转抄”，渐渐地，我们便知道了，此李为民就是“叛党分子李金铠”也。李金铠终未甘寂寞，他掌握的语言实际技能之一——速记，此时又派上了用场。

于是，我们在校园里的大字报区，有时又可以见到他，带着笑，和人打招呼，传递着消息，对于他，或者，这也算是一次不期然而然的解放吧，毕竟，斗争的矛头所向已经不是他了，如果自外于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岂不是更坐实了他人强加的“对党不忠”的罪名么？

又过了一些时候，李金铠的名字竟和“政治扒手”联系起来了，这回他真是“玩儿大了”，举世震惊的“上海一月风暴”的“高参”竟然有他。“文革”是价值观念急速变动的特殊时期，那时讲究“站对队”或“站错队”，这一回合“站对”了，别一回合又“站错”了，或者今天看上去错了，明天又有高层指示传来，变错为对了，对了即意气风发，得意洋洋，错了则灰头蹋脑，甚至成了罪人。李金铠在外面“成就”了如此一件“大事”，本来应是当时北师大的荣耀，奈何学校里对他已有“定见”，许多人偏是不信，我还记得他到我们宿舍来，找一位担任系“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同学李君，给他看了许多从上海带回来的文稿，证实关于他的业绩的传闻不虚。这也仍然不行，当时谭厚兰已经在学校掌权，虽然大家都“咸与革命”了，阶级阵线的意识还是绝不丢弃，像李金铠这样的“异己分子”，是不许革命的。

他很快就被谭“女皇”派人“扭送”到派出所去了，罪名是“政治扒手”，但好像当时的派出所并不太管这样的事，所以，又放出来了。一说是派出所根据其自供（言之凿凿）向上海方面求证，被证实了——他不是什么“扒手”，而是“革命派”，于是，放人。

此后的李金铠，就更与谭氏“政权”势不两立。他的精力和才华，很大一部分都贡献给了校内“反谭”的事业。谭厚兰一边对手如林，麻烦不断，也无力再光顾他。“文革”的岁月就是这样，时而风波迭起，时而又平缓如流，不在“风口浪尖”之上的人们，常常“相忘于江湖”，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委实再也没有见过他。

进入1980年代，他居然又崛起了。他的语言学知识背景，又经多年的刻苦专一的钻研，嫁接于最新进展的电脑科技，使他发明的中文电脑输入法，成为中文输入的“东风第一枝”。由此，他名扬海外。香港方面发来了邀请，有一个会议要他去参加，当时赴港要经上级批准，开始是不批，后来勉强批了，却又掷给他一个冷冰冰的交待：“不得以北师大的名义活动。”

“但我是北师大的教师啊。”他道。

“那也不行。”

这些中“左”毒太深的头脑里的逻辑真是匪夷所思。然而，他终究还是阻拦不住的。一如社会上已经涌起的变革潮流，在这潮流面前，樊篱与堤堰都无用。后来，他又申请了专利，创设了公司，并把公司的总部移进了德国，还挂上了德国汉堡大学和科学院的若干闪亮的头衔。

我再一次见到他，是已经进入1990年代了。那时，我在北师大又有了一个工作职务，偶尔他从国外归来，便会在相遇的路上，说些近来的事情。有一天，他兴冲冲地邀请我一定要去看一台京戏，并说要用车来接我。我原以为他有钱之后就开始“玩票”了，去了后才知道不尽然。

这出戏名叫《香港行》，戏中的主角，是个眉清目秀的小生，人人都叫他“李教授”，“李教授”发明了汉字笔形编码，到香港申请专利，历经许多曲折，后来还出来一个“同行”，竟然暗中剽窃了他的成果，冒领“头功”。另一面，“李教授”如此杰出的人才，岂无人爱乎，台上又有两位美貌如花的情人，对他大打“争夺战”，左拥右抱，柔情万端，真是好不令人羡慕。

看戏的人其实不多，只见台下的“李教授”在屡屡带头鼓掌，大凡有点剧场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在“组织观众”。

我由此知道，李教授真的是今非昔比了。

这以后似乎也没多久，我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李教授突然去世了，祸事的现场在京郊的一个钓鱼池，他的金属钓竿碰上了高压线，在电火中他几乎成为一段焦木。

我赶去八宝山参加遗体告别，看见他浓施“化妆”后的遗容，心中充满悲惋之情，这样一个饱经风霜、才华出众的人物，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这么早就结束他的传奇的啊。

2006年10月1日

原载金宏达著《金顶恒久远》

群贤毕至锅炉房

金宏达

锅炉此物，尤其是那庞然大物，离我们远，其实也近，在北方，一入寒冬，所享受的融融暖气，便是由锅炉为主体供给的，然而，我从未想到，会有一天，与此庞然大物亲密接触，烧上锅炉了。

那是一九七〇年的冬天，我被从接受再教育的部队又遣回北师大，继续受审查，刚开始

似乎是一个“要犯”住“单间”，有一个战斗班的人全天候看守，而后，又似乎以为问题严重性级别不够，发回与革命群众（低班仍未分配在校的同学）同住，接受监督，渐渐松弛下来。待到北风起，冬日将临，锅炉房急需劳动力补充，指标下达，系里的工、军宣队遂决定将此外差交给了我——真正的革命群众是决计不能答应承担此任的。

我便到学校的锅炉房去，第一眼的印象令我非常兴奋，四五个巨无霸似的卧式大锅炉，一字排开，各种管道纵横交错于其上，整个屋宇像一个神话中巨大的洞窟，蹲踞着一尊尊力大无比的神魔，令人想象飞腾。整个白天这里都静悄悄，朝向煤场的大门洞开，有人不停地用小車将外面的煤推进来，堆在每个锅炉旁，宛然一座小山，虽然不是蹑手蹑脚，却也似甚怕惊动这些尊神。而一到晚上，供暖时间开始，各就各位，合闸通电，尊神们遂出场，登时马达轰鸣，恰似晚潮汹涌，雷电交加，铺天盖地一片澎湃声，人在其中，像被吞没了似的。

烧锅炉原来是一项很费力、也很有技巧的活儿。打开炉门，要将已封了一天的煤火捅开，火焰苏醒了，像一群精灵，欢蹦乱跳起来，这就需要“喂”它们。要一铲铲将煤投送进去，平平撒开，不可堆积一处，远近都须顾到，尤其远处，更需力量和技巧准确地送到。延续两三个小时，都要不时添煤，防止不匀、不旺和熄火。

临近结束时，高潮到了，真正的激战打响了，要适时地将面上的一层“优质”的炉火推向后面，且以最快的速度，将下面已经凝结的煤渣块击碎，勾出，带火的高温渣块从炉门掉落下来，堆在脚边，释放出熔岩般的剧热，间会有碎块掉到脚上（腿、脚都已戴上防护物），但此时，烧锅炉者已经什么也顾不得了，他们必须目不转睛地盯住炉内，一旦渣块清除干净，便迅即将后面储备的“炉火”小心地向前摊平，细心地铺过来，匀匀的像一层红亮亮的地毯，盖住炉底，这才又向炉膛内送煤，将炉火稳稳地压住，一切停当，方关门，拉闸。

收工的时候，真正酣畅淋漓之至，无一人的衣服不是湿透的，汗水混合着煤烟，涂满了脸，迎面走来，不说话都不知是谁。干活的时候，大家不能说话，一是无暇，一是巨大的轰鸣声中，根本听不见。只有收工了，脱下工作服，一头钻进澡堂，赤条条地在热水的冲刷下，彼此说些干活时的情形、感受，有的嘻嘻哈哈也开起玩笑。

我这才发现，原来这里有不少其名字“如雷贯耳”的人，像“反右”时闻名全国的“六教授”之一陶大镛、中文系的古典文学专家聂石樵、物理系教授刘辽，等等，不期然在这里遇见他们。当然，也还有其他因为有各种各样问题被派差到这里来的老师和干部，像一位外语系的蒋老师，据说解放前曾在国民政府驻印度使馆做过事，有“里通外国”之嫌，还有一位叫王满的体育系老师，东北人，日语不错，也是有“历史问题”。

这些人在本单位，或属“异类”，列“异册”，见人低眉搭眼，避让三尺，别人唯恐沾上“腥”味，到了这里，却似有了个临时的家园，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过得其乐融融。既然我们流了汗，出了力，像个真正的劳动者一样，为什么不能和劳动者一样生活呢？

洗完澡后，各人就从蒸锅里取出自己备下的夜餐，来到前厅“会餐”。有家的，自有家里餐桌上的特色，没家的，当然是伙房的产品，交流一下，互补若干，彼此的情谊就满溢了。工资少、家庭负担重的工人师傅，常常是重点照顾对象。这里没有什么“阶级异己”之类的概念，吃到嘴里都是饭，坐在一起就是阶级弟兄。

前厅里有工人师傅的衣帽柜，也有几张桌子，通常会摆开“棋战”：有象棋，也有围棋。围棋当然是这些“臭老九”带来的，收工之后，有人厮杀到天明，高手多是那些理科系的教授和学生。学生也都是戴了“反革命”帽子来的，物理系的刘中柱和杨以鸿，据说写过“反动大字报”，被遣来此处，“文革”后这两人都去了美国，都是留学生中的一时翘楚。还有一位师大校园中大名鼎鼎的李文博，成天笑嘻嘻的，颇讨人喜欢，围棋下得刮刮叫。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在一个严寒的季节，这里都是一个叫人感到暖洋洋的地方。工人师傅对这些老师、学生没有一点歧视，从不议论任何人的背景材料，他们平静如水。只有一个姓陈的师傅，性子爆一点，他会在退火的关键时刻，看见有人因为手脚笨拙，延误了“火情”，立眉瞪眼，大声怒喝。这心情谁也都能理解，何况他也会跳上前来实施抢救。事后也雨霁风清。大伙儿也很喜欢他，他有北方人的豪爽，长得魁梧，帅气，据说，有一次锅炉房来了个女临时工，不出一天，他就把人家“勾”出去了。大家对他倒没有什么道德上的批评，只是觉得此人真有魅力。

我们和工人一样从锅炉房领取各种劳保用品和夜班补助，这使得我们比在系里闹“革命”的各位，反而多一份富足，没有多久，我就积攒了一笔钱，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进入了当时的“有车阶级”。之所以要特别提及这件事，是我觉得因祸得福，这几乎是“文革”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春节到了，供暖是决计不能停的，而且，越是到春节，越是要保证供暖充足，虽是“文化大革命”，也不能例外。除夕那天当班的人约定，每人都带一两样菜，收工之后一起会餐，守岁。

前厅的桌子被拼起来，摆上了各种花色的菜肴，煞是丰富，即连器皿也各式各样，碗、碟、盆、锅、饭盒都有，显示出这年夜的筵席别具特色。当然，也少不了白酒。

不承想，我竟成了这筵席上“祭酒”的目标。

那一场“阴谋”是如何酝酿出来的，已经无法考证了。总之，我于事后，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他们最初就已经做出设计，很大可能还是我自己不够稳重，像当时一句流行语说的，自己跳出来了。

我那时年轻，有一点酒量，多一点能喝上小半斤吧。其实，我明白，就这个酒量，在这个有众多工人师傅的席面上，也是决不敢叫阵的。起初，我推挡着，谦虚着，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不为众人的激将、指责、讽刺所动，甚至连陈师傅佯做出很愤怒的样子，我也不管。

他们便把目标转向他人。一头花白头发的外语系蒋老师，显然有点贪杯，大家就纷纷向他劝酒。我分明看见，他喝得两眼迷蒙，摇晃着头，已然不胜酒力。他的话断断续续，没头没尾，似乎还犯忌地回忆起他年轻的时候，在印度喝酒，唱歌，有人问他是不是和印度姑娘恋爱过，他痴痴地笑了，好像说是，大家一迭声地起哄，场面很是火爆。我自然也加入给他敬酒，不知怎么，他歪歪倒倒地支撑着站起来，还要和我比酒，说是我年纪轻轻的，都不如他，他三杯我一杯，干不干？大家又一迭声叫好，即将目光转向了我。

有人在劝别把他灌醉了，也有人嘻嘻哈哈闹着要看热闹，我面临着选择，有些迟疑。有个人离桌从对面向我走过来，趴在我耳朵边说悄悄话。那是我素来认为老成恭谨的一位老师，对他的信任度颇高，他说：“看他那样也就要醉了，别给大家扫兴，你就起来喝了这一杯吧。”我遂推椅端杯起立道：“好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喝下三杯，我喝。”大家鼓起掌来，又将目光转向已经半醉的蒋老师，只见他一仰脖，咕嘟嘟喝下了一杯，马上有人向他的杯中又斟上一杯，喝了，再一杯，又喝了。

“哇——”叫好声几乎震破了屋顶。

殊料他还要逞英雄，不依不饶地让我再和他来一次。我没见过有人会如此不自量力，再喝下去，难道他还不倒地么？我已经不再犹豫，心中的一点点怜悯为豪壮所代替，喝就喝，醉了都是你自找的，别怪我。

我已经不复记得这一场擂台实际持续了多长时间，也不记得自己究竟喝了多少杯，仿佛耳边只有一片叫好声、笑声和说话声交织的轰响，眼前都是一张张热辣辣的冒着酒气和油光

的脸，而后，我唱起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真做出了一副“迈步出监”的英雄姿态。

有人在说：“扶他到后面去休息吧，他不行了。”

筵席还在进行，前面笑闹声一阵阵传来，我在后面寝室里却翻来覆去地难受，有人来问我：“好些了吗？”我说：“想吐。”他扶着我走到外面，找了一个角落，我“哇”地一声，将腹中的酒菜一股脑儿吐了出来，他轻轻地捶着我的后背，安慰道：“吐出来，这就好了。”

我猛然一惊，这不是我的对手蒋老师吗？

第二天，我的醉酒已经传为笑谈，我才知道蒋老师杯中倒的都是冷白开，他可演得真像，其他人配合得也真默契，不过，我暗中也有些愧赧，因为我的轻信，也因为我现场有过“整人”之心。

“盛宴必散”。锅炉房的劳动到春天就结束了，大家各回各单位，在自己命运的轨道上运行，偶尔或会在校园里相遇，问候几句，却再也没有了那样恣情一刻的相聚。

2009-08-25

原载金宏达著《金顶恒久远》

围棋 俞敏

金宏达

北师大曾有一位高人，其名曰俞敏。反右时被划为极右，很长时间里，未能登台授课，之所以未授课，不是他学识不行，讲授无方，是因为他是右派分子。何以是右派分子就不讲课？今人可能不知道，稍古一点的人都知道。到我们入校时，或者是“帽子”已经摘去了罢，情形稍有改变，在我同年级的另一班任过一段课。

然则，我也确凿地可以称之为他的学生，得过他的亲授罢，不过，他所授者并不是其独擅的汉藏语系之研究，而是一一围棋。授课的环境也颇特别，是“文革”高潮期间，同在一个班级，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乘无人“照看”之隙进行的。

高人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专攻语言学，通晓多种外语与方言，尤其对汉藏语言关系研究造诣甚深，曾倾力编《汉藏同源字谱》，用金克木先生称赞他的话说，其功用是“姜子牙和松赞干布可以直接对话竟不需要翻译”。我曾尝试问过谙于中文系人事掌故的人，他到底在“反右”中有何问题，以至于严重到“极右”？得到的答复是：也没有什么，就是“狂”。其人竟是如何“狂”法，我辈也无从得见，到了“文革”，在“牛鬼蛇神”列队挨训和执帚扫地的场合，常能见他了：身子颇胖硕，一张国字脸，粗眉大眼，抬头看人时，总有一丝隐忍和无奈。“牛鬼蛇神”们一例地都缄默，或听，或做，他自然亦无话。此团队，今天看起来，简直好“豪华”：有美学大师黄药眠，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创造社”干将穆木天，文学史家李长之，等等，他纵有满腹牢骚，又夫复何言！

“文革”风暴袭来之初，他受批斗是跑不了的，我未能亲睹过，何以故？追想起来，或许是更具重量级的人物多得是，剃鬼头，戴高帽，挂牌游街，直如走马灯一般，目不暇接，何暇关注及他呢？然而，也听说他挨过打，且打得不轻，斯右又极之，就是顽固的证明，此类人，更能令“革命派”下得手去。

我与俞敏的“近距离接触”，则要到更晚一些时候。同班的同学都分配到广阔天地去了，我却因为“政治问题”羁留学校受审查，后面尚有两个年级学生未离校，“工宣队”便把我安放在他们中间，归属某某班监管。

俞敏恰恰也在这个班。他的任务是打扫楼道、洗脸房和厕所，每天按时来，默默履行这一切，别人既不会与之搭讪，他亦知趣地闭紧了嘴，盖老子所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是也。

我虽也“反动”，却幸而尚为“学生”，对待稍有区别，是在校内参加其他劳动。无活可干时，便是学习：学“最新指示”啊，“毛选”啊，“两报一刊”社论啊，如此，等等，一见有人进门，两眼锁定宝典，一心作深思状。

记不得是哪一天的事了，革命群众要集中在北饭厅听传达（此为当时一通行说法，全语应是“听传达重要精神”），我辈非革命群众，照例不得与之，俞敏暂无处可存放，便被遣送到我所在的寝室来。他在床边坐下，望着我，嘴边漾起一丝笑意，问道：“你会下围棋吗？”

“会下一点点，也只是瞎玩罢了。”我知道他是围棋高手，不过，我之自况也很合实际。

“来，我们下一盘。”正好桌上摆有棋盘、棋子，大有“何以解忧，唯有围棋”的意思，又似乎觉察出我的担心，有点诡谲地一笑道：“不要紧，他们起码两小时。”

于是，我执黑，他执白，首盘他让四子，结果是须臾间，我便溃不成军。他既已了然于我的实力，次盘，便毫不推辞让我八子，黑子抢先筑起“铜墙铁壁”，死守硬抗，然而，未几，仍然土崩瓦解。

无论何时何地，天下高手的悲哀就在于此——面对一个如此低能的对手，哪里还会有什么胜利的愉悦呢？终于，我看出他的兴致索然，便提议他以“手谈”教我几招，他问我知道多少“定式”，一边摆上棋子，讲解起来。恰在此时，房门被撞开了，进来一位同寝室的人，我与俞敏都本能地一怔，对方则颇善意地解释说忘记带笔记本了，探身到床头取本即匆匆离去。

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俞敏和我都被传唤接受训话，我被斥为竟然与“极右分子”“私相授受”，正可谓“臭味相投”，而俞敏的罪更其重，斯乃极不老实，抗拒改造，继续“贩毒”，围棋者何？“封、资、修”的黑货也，无论贩于何人，“贩毒”便是大罪。

我与俞敏的围棋赛事与培训就此收场，从此我们便被加意隔离，即使不是加意隔离又能如何，岂能以一卵再去碰群众专政铜墙铁壁乎？

某日，偶然听见几个同学在一起聊天，不时爆出一阵阵哄笑，他们却也未回避其时正在床上看书的我，一句句都入得耳来。原来说的是俞敏一段近事：他又被隔离看管起来了，此事纯属他自找——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访华，上面布置了解“阶级斗争新动向”，自然首先传讯系里大小“牛鬼蛇神”。问到俞敏有何想法时，高人斗胆而诚实地亮出自己的一点“顾虑”：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会不会有他当年燕京的同窗以后又跻身白宫政坛者，若是提出要见一见他这故人，如何是好？一语提醒了学校当权者，那么，如何是好呢？那时候，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坚壁清野”起来了，随即就“请君入瓮”，宣布自次日起俞敏不得回家，直至尼总统一行完全拜拜止。

这真令人有些哭笑不得，革命人民早已众志成城，严阵以待，阁下岂非“自投罗网”么？

说实话，这自不免让我想到“疏狂”二字，“狂”者或往往不免于“疏”，俞先生即是明证，我由此也私下不很佩服他的围棋之道，分明自己没有“做活”，怎么可以给自己“紧气”呢？呜呼，吾师俞敏！

直到1972年5月离开师大，我终于再也未见他，再见时已是1980年代中期，斯时他早已平反，学术地位恢复或更高，路上见过他，步履匆匆，彼此颌首，莞尔间，先生想必记得与我“私相授受”的一幕。

2009年10月20日

原载金宏达著《金顶恒久远》

夜访金永龄

赵惠中

夜访金永龄的故事，发生在1969年冬或1970年春某个周六的晚上。故事中两位主人公都是我的老师。

金永龄是北师大物理系的老前辈。他是物理系1956年—1960年党总支书记，1958年—1965年的系主任。我是1964年考入北师大物理系的，那时他还在系主任的职位上。如果是正常年代，系主任与我们普通的本科生极少交往。但是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打破了往日的格局。运动初期，作为“走资派”与“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双重身份的金永龄就被打倒了。因他是清皇室的后裔，“文革”中吃尽了苦头。

我“淡出”“文革”后无事可做，闲得发慌。1968年初，听说同系65级（3）班蒋锡久同学围棋水平很高。他是棋界老前辈邵福棠先生的高足，曾得过武汉市和湖北省围棋少年冠军和中南局少年围棋第三名。在北师大无人是他的对手。因现在也无事可干，于是我就萌发了向他学围棋的念头。经人引见，蒋锡久收下了我这个徒弟，成了我的围棋启蒙老师。在我的影响下，我班郭英伟、蒋汝清、王应虎等同学也跟着蒋锡久学起围棋了。于是西北楼117室变得热闹起来了，大家天天沉浸在黑白世界中，把“文革”中那些烦心事抛之脑后，全然不顾。

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发了“一号战备通令”（实际上是疏散令）后，我们北京师大被疏散到北京房山县的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劳动锻炼。我班的主要任务是到山上开石头与砌公路两旁水沟的石墙。原系主任金永龄老师也随我班“三同”，当时他还戴着“走资派”等一系列帽子，但大家知道这些东西经不起推敲，早晚要推倒重来，所以无人再去折腾他了。从内心来讲，全班同学都十分清楚，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物理界老前辈，专业方面的造诣很深，对北师大在天文系与物理系内创建核物理专业与低温物理实验室等都作出了重

大贡献。并且他又是一个爱才、惜才的好领导。所以，在无他人时，大家偷偷地与他来往，我也算其中之一。那时，我们正热衷于下围棋，听人说金老师是师大的围棋高手，而我们的围棋师傅蒋锡久是“师大无敌手”，我们很想目睹他们两人手谈一局，决个高低，但因当时的政治气氛而不敢造次。因为东炼地处北京远郊，所以每隔两周我们可回学校一次，于是我们想能否利用回城的机会促成“金、蒋大战”！蒋锡久年轻无包袱，一说就通。金老师那边，行吗？要知道这在当时是有风险的。后经我暗中撮合，决定利用回城的机会，在金老师家开战。

我记得那是个周六的晚上，天气很冷。我俩各向系里的老师借了一辆自行车，瞒着其他同学约七点多到金老师家。他家在鼓楼附近，好像是宝纱胡同23号。由于他还住的是原来的房子，我感到他家的房子还是较大的。他见到了我们后，很客气，沏了茶，寒暄几句后就拿出棋具。金老师很客气，说自己已久没下棋，执意要“被让二子”，蒋锡久则坚持自己执黑。结果我记得是蒋锡久中盘胜金老师。其实，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夜访，给逆境中的金老师一丝慰藉，也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后来我们还想拜访薛迅副校长，但因新出版的《毛选（第五卷）》上点名批评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作罢。

此事虽然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文革”结束后，金永龄老师又重返政坛，曾任北师大副校长，还兼任过中国大学生围棋协会会长。蒋锡久1972年毕业后曾在湖北省某重点中学任教，退休前是华中科技大学护理系副教授，也是该校的围棋选修课教师。

2016.03.06于上海

原载《记忆》154期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安希孟

我和北师大外语系65级辅导员杨之岭老师保持着师生友谊。杨之岭老师是上海圣玛利亚女中1951届学生。她从预科（小学五年级及六年级）到高三都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高中毕业后，她到北京师范大学上学。1955年毕业后留校做学生工作。从小学五年级（预科一）到高三，她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原著，有很好的英文素养，也积累了历史、社会、自然及人生知识。这是一种文化、知识、智能和感情的累积，也就是人格素质的培养和形成的过程。

她对世界文明知识有深厚功底。

我们年级几度返校，居然没有见到杨老师，不能不说是憾事。辅导员，全称是政治辅导员。那年月，北师大，一所大学，从部队调来政治部主任石森，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革命化战斗化军事化呀。不过，那时，在杨老师身上，你看不到教条式的说教。她平易近人，丝毫不像政治工作者那样威严（我们一般对政工干部望而生畏）。杨之岭老师并没有“突出政治”。倒是我自己，连团也没入，反而政治调子还更高一些。如今，曾经获得国外博士的她，绝没有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身影。她至今思维敏捷，关注世界社会，乐观面对人生，体恤底层忧患。失联多年，杨老师从别处打听到我。我们在手机上经常联系。

1965年，杨老师住在北师大工五楼四单元，雷天生是班团支部书记，正要求入党，我呢，低一个档次，正要求入团。雷天生每次去杨老师家，都让我陪同。杨老师保存了1958年大跃进北师大代表受毛泽东接见的照片。我得知1958年北师大也曾大炼钢铁。

1965年入学，我学英语比较灵活主动，48个音素，标记在书面，叫音标。我问什么叫音标，别人解释，我听不懂。其实就是给音素加标记，即[]符号。有几个音素我发不准，土包子嘛。如/ɜ:/、/ə/，我总找对应的汉语音素，结果徒劳。因为中外语言文化到死也不可通约。你一定要在英语里寻找“呢嘛吧吆嗨”“匹头只座株苗根”等量词，就困难。集中双元音/ɪə/、/eə/、/ʊə/，我也很吃力。就不停向朱其英请教。我估摸着他也烦了，但碍于向雷锋学习，他敢烦不敢言。

这成为我的模范先进事迹。杨之岭老师让我在年级介绍学习经验，我把当时时髦字词都用上了，诸如“生动活泼”“积极主动”“总想打仗”（即，总想学习）。“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和徐寅生打乒乓球差不了。大概还有“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争取主动权”一类战略思想。总想发言，就是总想打仗。还有林彪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1966年春批判三家村时，我也想出点风头，“努力”写作，想有豆腐干见诸报刊。其实都是鸡蛋挑骨头无限上纲。咱跟三家村五柳村又没杀父之仇。有一次杨之岭老师认真帮我修改。我记得文章几乎没有层次，基本上是报纸文章的摘录加上谩骂。我的写作能力就是爱显派。我寄给《北京日报》，但终因基本文字功夫和思想理论“深度”不够被退回。我那时还不能文从字顺，其实也不能完全读懂《燕山夜话》，瞎扣帽子上纲上线，墙倒众人推嘛。但《北京日报》退稿函，我却保存多年。

1966年八月，杨老师后来还在外语系劳改队劳动过，这我都忘记了。群众专政，学生红卫兵监督改造。这都什么事儿呀。有一位同学眼光锐利，看到我们的杨之岭老师鞋底图案是“共”字，硬说她把“共”踩在脚下——可制鞋匠怎么会有这念头呢。他强令杨老师黄昏薄暮时分脱鞋光脚板走回家。

北师大二附中学生用帆布蒙窗，里面学生血腥殴打老师，一片惨烈叫声。有人跳窗进去打人（他与那些牛鬼蛇神老师素昧平生）。

批斗杨之岭老师，大概是在外语系65级三班教室里。斗争她的，都是当年积极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有人在地上画一条美女蛇，让她站在蛇头圆圈内。呵呵，原来我们尊崇的老师还是美女蛇！批判杨老师的罪行有：杨老师和教育系于陆琳（部长夫人）有联系，曾在某处给陈云打电话。似乎于陆琳的丈夫有什么问题。同学们不知打哪儿掌握如此情报，我恍惚觉着是有人盯梢。

原北师大教育系主任于陆琳，跟随姐姐于若木（陈云夫人）到延安。“文革”开始，江青告诉谭厚兰：“你们学校的于陆琳是个坏女人，揪出来了没有？”谭就到军委把于揪回师

大关押。师大井冈山也把她的丈夫，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押回北师大关押。杨老师因此之故曾受牵连。

大概也有人说她1949年前上的是上海教会学校，单这“教会”二字，就叫我们觉着是“敌人”。我对宗教那时很陌生、隔膜，但修女，是在电影里看到过的，被丑化了。我就爱把他们和帝国主义连在一起。多么可怜而浅薄的人类文明知识。

有一件事情富于人生哲理，读者们应该注意：整人者往往是得意门生激进分子心腹密友。你的培养对象红得发紫，运动一来，冲锋陷阵者，多为此等人，因为他们追求“进步”，怀抱个人动机，利益攸关，多数情况，个人成名成家意识浓厚，或者你稍不如意，他就记恨在在在心。

蹇明理于1965年入学，未几被查出肝炎休学。“文革”中我班同学眼见人家纷纷扯帜聚义揪斗黑帮，我们无“虎”可打，只能打“苍蝇”，也揪不出什么人，于是拿周泽兰老师开刀祭旗，写大字报愤怒声讨周泽兰迫害工农子弟的滔天罪行，在文史楼台阶上让周低头认罪。后来蹇明理返校住小红楼——高干待遇。现在看来，对于肝炎病人休学的处理并不错，否则我们都难逃厄运。杨老师后来回到教育系，但1970年整党时，她还回外语系毕恭毕敬地征求蹇明理的意见。好像是迫害了工农子弟似的。

我们宿舍有一尊石膏塑像，不知道何许人把石膏像的脑袋弄掉了，放在上面，一不小心就掉落。很伤大雅。刘来牛、雷天生和我商议，偷偷拿到西北楼东头角落悄悄砸碎扔弃。有一位同学在教室里张贴小字报揭发雷天生反动言论十余条，都是平日无心之语。我们全班开会调解，化解纠纷，替雷天生洗白，批评了那位同学。徐秀芬同学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中央领导门牙脱落，微笑时用手遮嘴。一同学说这是反动言论，大家置若罔闻，她也就逃过一劫。我有一次信口胡说“美国空军英雄（飞行员）戴维斯”，刘来牛同学看了我一眼，知道是口误，并没有揭发。

“文革”把人搞疯狂了。杨老师历经劫难。“文革”中，偶然路遇，她也回避。我当时很不理解。我多想和老师打个招呼。对我们的老师陈达星、刘宝英，我班同学没有任何伤害，但师生之间忽然陌生了，隔膜了，形同陌路。几乎所有老师，我们都不称呼老师，也跟着喊外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人的本质，是人际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社会政治斗争形势契合。这话不幸成为真实。我觉着老师们个个都不大乐意和我们打招呼。后来知道，在老师眼里，我们随时就会揭发批斗他们。政治，那时简单地就是阶级斗争。比如1969、1970年每年年节将近，就查户口。我们是查户口的主力，个个神气活现得志猖狂，御林军般。“咚咚咚”粗暴砸门，躺在被窝里的大人小孩，个个仿佛就是犯罪嫌疑人。那时防止知青回城，好似敌人。现如今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就是辉煌历程了。国家、社会，和谐友爱，多么重要。

1966年运动初期斗黑帮，据说就是资反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那阵，血统论盛行。谭力夫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畅行无阻。有一次晚上斗黑帮，方义奎同学跑回西北楼责问董辉（已故）为什么不参加。他骂董辉是“狗崽子”。董辉说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方义奎说，“你也配？”但董辉的根据是，陈伯达同志说，“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把方义奎同学镇住了。可怜的一方义奎，1966年冬给林副主席提意见，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被抓，据说神经失常。沙家浜都可以提意见呢。

以下是杨老师的回忆和感慨：

她说，“我对‘文革’时期喊打倒我的大部分人，并不忌恨。仍记得有一次从东北来了两人找我了解当时教育系二年级的一个党员学生‘文革’中表现，因为他们想让他当领导。我说他能力很强，工作认真负责，‘文革’中没什么问题。外调人员说，‘听说他打倒你喊

得很响。’我说，他当时不喊，大家就要打倒他了。外调人员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一直当领导直到退休。但有的人我感到他们有恶意，如外语系一位管教劳改的人，每天都在文史楼前训话骂人。他说我穿的塑料凉鞋鞋底图案是一个‘共’字，我说这鞋是买的，他就喊口号，非叫我在大庭广众下脱下两只鞋，要我读出一个‘共’字来。我觉得他很无知。最后他大声吼，叫我把鞋扔掉，光脚回去。我觉得受到侮辱。在我光脚回家时，6岁的大儿子蹲在楼前等我回家……这个人很阴暗。” 不过此人后来在批判对立面造反兵团时，也颇具文采，字字珠玑，笔力雄健，横扫千军。

“凉鞋问题后，我主动去教育系和陈学贤说我要回教育系，因为教育系有要整我的，但也有保护我的。我从1955年毕业到1965年，一直在教育系。因此我回了教育系。”

我一直不解，我们年级的娃娃们，为什么单单批斗杨老师。现如今忽然领悟：北师大社教那些事儿，外语系政工干部应该了解老底。政工队伍内部或许就有裂纹。

后来杨老师回到教育系。在校园多次碰到杨老师，我们一点儿也没有热情和恭敬。那个斗争岁月，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开了个口子。

杨老师有一段温馨的回忆，兹予收录：“当年英一有一位张广慧，她很诚恳，朴实。‘文革’开始，有一次我因血压低在半路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醒过来发现是她背我到校医院。我十分感动，但她却说‘是应该的’。很快，学生也被卷进‘风暴’，但在没人处，她还是和我打招呼。2004年我从美国退休回国到厦门去师大实验小学海沧分校介绍美国小学教育时，听说张广慧也在那里教英文。我们再次相见，十分激动。我再次当众讲了她背我去医院的感人事迹。后来知道她因病去世，我还打电话给她丈夫表示哀悼。‘文革’前师生关系是亲密的、互相信任的。‘文革’宣传成了敌对的……”

1980年1月，杨老师受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邀请并出资，由教育部选派，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从事教育考察和研究。她的业绩引起的注意，被美国两个国际性教育组织 PDK（Phi Delta Kappa）和 ICET（International Council Education For Teaching）接受为终身荣誉会员。她后来在美国获得教育哲学博士学位，时年49岁。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派美国留学人员中第一个取得博士学位的人。

在太原市西山矿务局任教的马锡恒和张广慧说，1980年代，杨老师应太原市教育局邀请来讲学，他们二位去看过杨老师。他们说是因杨老师给教育局嘱咐，他们二人才入了党，马锡恒还被提拔成西铭中学副校级干部。虽然这说法并不准确，但他们心存感恩之心。

这里记述了一个普通学生已故张广慧同学的良善。善良的事情竟然不敢做在明处，怕人看见，而邪恶歹毒却堂而皇之，奉革命的名义，行在光天化日之下。人的本性各有差异。张广慧，我们永远怀念您。我们也永远斥责邪恶。我对于人的本性是善是恶，决然给不出一个确切答案。但我知道，在有的人，就露出凶残一面，在有的人，就天性善良。广慧大姐，安息吧。那时候，十分恐怖十分可怕的是，你周围的人全都是一种声音，亲朋故友全系无产阶级战士爱国斗士进步分子，满口仁义道德，言必社论体，话必报刊文，没有异议，没有谬误，真理化身，道德楷模，异口同声，千篇一律，满口官腔，正人君子。世上没有比这更可怕的更悲催的。生活在进步革命道德的汪洋大海，你会不寒而栗。

真善美压倒假恶丑，种香花锄毒草，水至清无鱼，到处闯将，人人志士，满眼君子。这真是社会灾难。天天光耀熠熠，日日艳阳高照，万里无云，红太阳光芒万丈，无阴影，无遮蔽，人人捋拳怒吼，山摇地动。异见谬误错误言论扫地以尽，乃社会凶音，人间噩耗，并非动听音乐！

我在北师大偶见杨老师，非常想和她说话，但她躲闪。我不曾想到她后来依旧挨整，怕

连累我们。分配到银川以后，她的一位同学说，杨老师说我们这些孩子挺调皮的。我知道这话何所指谓。现在知道杨老师原谅所有人，唯独对于某种恶毒劣根，不予谅解。她今天对于某些过往人物，不计较长短，这使我想到基督教不与恶人计较的道理。

“文革”伊始，我们是一年级学生，所谓造反，也不过是批斗政治辅导员而已。有人积极申请入党，接近辅导员杨之岭，“文革”伊始又批斗杨之岭。勇于批斗老师的人，绝对是一个有才华有抱负的人，其缺点也是：“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人，天使，魔鬼。才华用于大众福祉，就是天使。耶稣说，我来是拯救罪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大概我们人人应该自省。

我写了这个东西。“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2018年11月14日 晋阳龙城

金宏达的人生轨迹

赵惠中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1966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金宏达（署名：时汉人）的文章《对于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1]，公开与姚文元唱对台戏：为吴晗辩护。当时我就知道时汉人是“中四（中文系62级）”的金宏达，对他敢于直抒己见的“大无畏”精神十分敬佩。虽然当时的北师大师生中无人敢公开支持金宏达，但内心支持者极其广泛，刘中柱、杨以鸿就是其中的二位。[2]就是现在只要一提起“时汉人”，北师大“文革”亲历者都会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连口称“文革”中无人正确”的“挺进报”[3]骨干也不得不承认“金宏达是正确的代表”。金宏达这颗耀眼的星星虽然刚发亮即被乌云长期遮盖，但在乌云被驱除后重新发光，且亮度等级持续上升。

由于他在1966年初（在聂元梓大字报前）就被定为“反动学生”，所以我认为他这么早就被“打倒”，必然地被边缘化了，在北师大“文革”中肯定是“夹着尾巴做人”。最近我有机会得到了他的两本散文集：《金顶恒久远》与《达观》，认真拜读后彻底颠覆了我原来的观点。事实是金宏达不是为了“自保”而“装聋作哑”，却是密切关注“文革”动向，始终冷静思考，常在“好友”中发表敏感言论，甚至还参加了“井冈山造反兵团”。因其不仅

“不甘闭嘴”，而且顽强抗争，整个“文革”受尽了打压与折磨，不仅遭受皮肉之苦与精神创伤，还在经济上承受剥削。他是1962年入学，属1967届。同届学生在1968年8月就分配工作了，他却一直拖到1972年4月底才和69、70两届学生一起被“扫地出门”。69、70两届学生虽然到1972年4月才分配，但在1970年7月就开始领工资了，也不知他何时才有工资？

自从准备出版师大“文革”的书后，就想邀请宏达兄加入，想方设法寻找他，直到2018年4月份才在蔡鸣乔的帮助下得到了他的电话，接通电话略叙概况后立即得到了宏达兄的全力支持。通过微信交流与细读他的大作，对其在“文革”的表现作了梳理，大致归纳如下：

《对于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发表后，康生当时就作了批示：此文“假科学、假公正、假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吴晗的立场上为吴晗辩护，时汉人就是吴晗的人”。时汉人的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遭到了围攻，1966年3月的一天，中央台早晨的新闻联播竟然全文播送的是林杰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批判“时汉人”文章的长文：《学术批判必须突出政治》[1]。中央嫡系的定调把金宏达定位于“反动学生”，对金宏达欣赏有加的北京市委与北师大党委因本身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其也是爱莫能助。要强调的是金宏达被打成“反动学生”是在聂元梓大字报之前，是康生批示“时汉人就是吴晗的人”定的性。

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大字报后，“文革”的熊熊烈火在全国全面燃烧，北师大的斗争矛头马上转移到校党委（黑帮）与教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身上，与程今吾以及后来的刘、邓、陶相比，金宏达只能算“小爬虫”，无人顾及了。如果他只求平安，只要坚持“不发声”，就可得到一段较长时期的喘息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

上亿人的“免费大串联”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所谓大串联是：外地学生进京，一是“上访”（告状），二是取经，三是“朝圣”；北京学生则是逆向而动，纷纷到外地煽风点火，炮轰外地各级党政机关。1966年国庆社论后，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方被打垮了，北师大的师生们陆续到外地串联，后来几乎成了“空校”。金宏达不甘心受缚于校内，选择了“志同道合”的中文系62级的T君与历史系的L君，南下大串联，第一站是他的老家南京，在南京带上了他的妹妹与弟弟沿沪宁线先到苏州，再从水路到杭州，后来又广州、桂平、柳州，最后返回北京。[4]从其所到之处看，他们的串联绝不是“革命”去了，倒是有“游山玩水”之嫌。

大文豪老舍投水自尽的“北太平湖”就在北师大南侧二站地，约在1967年四五月份，金宏达常与“知音”者夜访太平湖。“在四顾无人的地方，我们喁喁交谈。我们试图弄清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来龙去脉，甚至还‘妄图’探源伟大领袖的心机与心迹。我们用尽可能多的‘小道消息’分析‘中央文革’的内争，嘲讽那些‘大树特树’的荒唐伎俩。我们兴奋地传述所谓‘二月逆流’的生动场面，为所见到的‘大黑帮分子’被残酷揪斗久久扼腕叹息，大骂简直是‘法西斯’”。[5]在那“以言定罪”的年代，这些言论足以将他打翻在地。虽然，只要他们不公开贴大字报亮明观点可以“平安无事”。但没过多久，他的“知音”出事了，好在他是位“硬汉”，没有“告密”，金宏达躲过了一劫。[5]在那黑暗的年代，宏达兄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冷静思考，结论与众不同，值得敬佩！

1967年8月11日晚在大操场举行批斗彭德怀大会。会前董连猛亲自押解彭德怀在校内游街示众，批斗会上让彭大元帅示众时，因他是光头无头发可揪，就揪彭老总的耳朵。还把浦安修作陪斗。当时有许多参加者都对此很反感，但敢怒不敢言，个别正义之士当场就拂袖而走。众所周知，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时汉人是为吴晗辩护的，可以推想金宏达对谭厚兰们的丑行持什么态度。没过多久，金宏达“和一位平日要好的同学接待了他的女友的一位女友，一次饭后散步闲谈中，我讲到师大斗争彭德怀时自己的见闻，受一种有

充分信任感的氛围激发，我未加掩饰对‘彭大将军’的赞美和钦敬……另外还有一些对‘中央文革’要员的‘不敬之词’，以及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注。没想到这位女友回去后会把金宏达的话追记在她的日记本上，约一年后，她因为家庭问题被抄家，日记本落入了“革命派”手中，这些信息立即反馈到北师大。[6]这对金宏达而言真是“旧罪未消，又添新罪”。

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林杰作为“替罪羊”被抛出来了。谭厚兰“一贯正确”的神话被彻底打破，北师大的政局发生了激烈的动荡：造反兵团在9月1日死而复生，扣押谭厚兰、推翻北师大革委会的“9.7事件”震惊全国。据《1967年，白洋淀“自助游”》一文说：“离‘中秋节’还有半个月”，他为了圆心中的文学梦，一个人赴白洋淀“自助游”。[7]那年的“中秋节”是9月18日，半个月前正是校内斗争白热化时期。由此可见他内心的向往，其心态是极其阳光的。

1968年3月中旬，北京发生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倒谢（富治）运动”，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充当了“倒谢的急先锋”。吊诡的是劣迹斑斑的谢富治“打而不倒”，相反的是于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一万余人参加的接见会上，公布了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处理决定。罪名是为“二月逆流”翻案，还有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是“倒谢”的黑后台，等等。这一结果让谭厚兰们欣喜若狂，认为是整垮兵团的好机会。1968年5月18日的《井冈山》报上有革委会《井冈山》联合战斗队的文章：《造反兵团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大杂烩》是他们的杰作，暴露了他们利用所谓“阶级路线”打击兵团的企图。加入兵团的金宏达便是他们首选的整压目标。校革委会的广播站播出了“把反革命小爬虫时汉人揪出来示众”的大块文章，逼得宏达兄只能逃离北师大。虽然吃尽千辛万苦，逃到了武汉家中，也上了庐山，但中国之大却仍无他的长久藏身之地，无钱、无粮，也无工可打，只能乖乖地溜回学校接受惨无人道的批斗。[8]

金宏达是1962年入学的，北师大是五年制，属1967届。因“文革”，1967届学生被拖到1968年8月才分配。但他因“时汉人文章”被定为“反动学生”不给毕业，继续留校等待“后期处理”。到了1968年秋天被送到河北省怀来县（沙城）解放军连队中接受“再教育”，别人可领工资，宏达兄只有20元/月的生活费。期间的甜酸苦辣略去不表了。到了1970年秋又被送回北师大继续审查，[9]其实也就是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而已，能审查出什么来？恰逢锅炉房无人烧锅炉，干脆把他派到锅炉房当“苦力”了[10]。直到1972年4月底才和69、70两届学生同时分配。

1976年10月份，“打倒‘四人帮’”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点，国家从乱折腾逐渐走上了正轨，金宏达也获得了新生。1981年获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师，宁夏教育厅副厅长、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副馆长，1994年起任中国华侨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小说学会理事。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集《小说：敲碎与缀合》（山东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小说的光与色》（书目文献出版社）、《平视张爱玲》（中国华侨出版社），散文集《金顶恒久远》（花城出版社，2011年）《达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研究专著《鲁迅文化思想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章太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与于青合编《张爱玲文集》（四卷本）（安徽文艺出版社）。主编《现代名家评说大系》（文化艺术出版社）共14卷，及现当代、海外名家散文《境》《韵》《象》三卷（江苏文艺出版社）等。

在结束本文前还想谈三个有关问题：

1. 最近经常听到一种议论：“文革”中谁都喊过‘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少奇’，每个人都是错的，没必要再说了”。这是一种典型的“错误人人有份”论，是配合“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与“‘文革’是发动者的‘艰难探索’”所造的舆论。我不认识张志新与遇罗克等人，我也无法考证他们是否喊过“毛主席万岁”与“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但我要说：即使他们喊过这样的口号又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张志新与毛远新，遇罗克与谭力夫可以相提并论吗？北师大的谭厚兰、董连猛、周耀文等与金宏达、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李世取以及许多兵团与“海派”战士是同一类人吗？

2. 金宏达是因为吴晗的《海瑞罢官》辩护而卷入“文革”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伸冤，是伸张正义的。综观彭德怀问题的本质是人性善恶的激烈碰撞。“文革”中批判彭德怀最主要是二大罪状：百团大战与“万言书”，结论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百团大战是由彭德怀提议与直接领导的，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的战役，由于参战兵力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从1940年8月20日到1941年1月24日）的战役。当然百团大战与国民党抗日的22次大战役相比，只能算一场普通战役，但在共产党抗战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分量，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奇怪的是却被说成是彭德怀违反了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确立的“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的“抗日总方针”，是“过早地暴露了共产党的军事实力”，不利于“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是“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而“万言书”是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内容是在“肯定大跃进正确”的前提下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元帅在党内会议期间出于公心向党中央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个人意见的信何罪之有？但却触犯了最高领导的尊严，犯下了“滔天罪行”，被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首犯。无论是百团大战，还是“万言书”，对整个中华民族是有益无害的，是有功无罪的。如果对某个政党或个人私利而言可能会有损，但对全民族有利是最大的善。只对个人或某个政党有利却给全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却是大恶。谭厚兰们也许根本不知道百团大战与“万言书”是怎么回事，但他们紧跟“中央文革”与“文革”发动者批斗彭德怀，对其大打出手是人性之恶的暴露；金宏达敢于为吴晗辩护，能在1967年未加掩饰地对他人表达对“彭大将军”的赞美和钦敬，这就是人性之善的体现。于此，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事情的正确与否不是由权力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事物本身的正确与否决定的，其最终必须要经得起时间与实践的检验。那种盲目唯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的做法是不该提倡的，顾炎武先生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才是真正崇高的义务与责任。

3. 金宏达与谭厚兰是北师大“文革”中二颗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政治亮星。谭厚兰是被林杰等人选中后登上北师大政治舞台的，“辉煌”时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师大革委会主任，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并称为“五大学生领袖”，是中国赴阿尔巴尼亚红卫兵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姚文元）。谭厚兰的信条是：林杰是听“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是听毛主席的。跟着林杰就是跟着“中央文革”与毛主席，永远不会错。所以让她讨孔就到曲阜掘孔墓、砸孔庙，让她反“二月逆流”就冲锋陷阵反谭震林等几个副总理与老师，甚至对“反周总理”也跃跃欲试。结果，1968年10月，谭厚兰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劳动锻炼。1970年6月，她被调回北师大作为“五·一六分子”被隔离审查。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据说她交代得比

较彻底，认罪态度较好。1981年，谭厚兰被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终年45岁，一生未婚。说到底她只是毛的马前卒，是只可怜的替罪羊。金宏达的全过程上面已作了详细介绍，在此就不重复了。谭厚兰辉煌时金宏达正是落难时，谭厚兰最“辉煌”只有两年多，金宏达落难长达10年。谭厚兰是紧跟“中央文革”与毛泽东的，但在“中央文革”与毛泽东还在位置上时她就被当作一只替罪羊给抛了出来。金宏达是凭自己的良心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不做亏心事，最终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2018.09.24（戊戌年中秋节）

[1]见本书附录3；

[2]赵惠中：《北师大“12月黑风”与“修建科劳改队”》；

[3]《挺进报》是中文系挺进大队（力挺谭厚兰一派）的“机关报”；

[4]金宏达：《达观》之《“大串联”杂忆》：P.172；

[5]金宏达：《达观》之《夜色太平湖》：P.169；

[6]金宏达《金顶恒久远》之《“时汉人”事件始末》：P.107；

[7]金宏达《金顶恒久远》之《1967年，白洋淀“自助游”》：p.123；

[8]金宏达《金顶恒久远》之《我的“出逃”之交待》；

[9]金宏达《金顶恒久远》之《学生连记》；

[10]金宏达《金顶恒久远》之《群贤毕至锅炉房》。

鲜为人知的故事——张闻天关押在北师大

故事发生的年、月、日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时间坐标（1969年底—1970年春），那是北师大学生去东方红炼油厂劳动的日子里。班里和厂里同学们都去“东炼”了，我由于胃出血处恢复期，系里留下我并给我两个任务：一是看管全班行李，二是为低温楼（五七半导体器件厂所在地）日夜值班。8643班去劳动前，全班行李（包括我的行李）全部集中在物理楼三楼的一间教室内。关闭时间长了，教室内会发出一阵阵难闻的霉味，我发现后，每隔三五天就去通风一次，并在门框上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贴上小纸条，以确定教室内无人进去。由于我的生肖是狗，那时我自嘲为“看门狗”。

在低温楼值班的日子里，发生了一则鲜为人知的故事。有一天，我在低温楼值班室里弹着月琴（跟姜德圣学的，姜德圣喜欢弹月琴，弹得很好听，于是我也买了一把月琴胡乱弹着），

突然来了一位手持校革委会介绍信的人，此人凶神恶煞，不讨人喜欢。来说，要在低温楼地下室关押一位重要人物，请你帮忙看管和送饭。我断然拒绝，我说，我既要要看管物理楼的行李物品，又要要看管低温楼全部仪器和设备，实在忙不过来，看管和送饭请你另找别人吧。凶神悻悻地走了。

当天，果然一群人领了一位老人进了地下室。由于上厕所要到一楼，所以关押老人的地下室没有关门。我带着好奇心进了地下室，看管人员早已下班走人了，只剩下老人一人坐在床沿。老人方正脸，白晰的脸上已长有寿斑，脸色憔悴而又忧伤。看着地下室十分简陋，我说：“给你去拿一只电炉和水壶来。”老人开口了：“你是常州人吧？”（常州口音和江阴口音十分相近，老人识别能力很强。）我说：“我是江阴人，听口音你是江南人吧？”老人说：“我是南汇人（江苏南汇县，现为上海浦东新区），我叫张闻天。”如雷贯耳，面前是一位大人物。

我说，“他们把你抓来干什么？”张说，不知道，大概要批斗吧。我说，斗来斗去实在没有意思！楼上是北师大五七半导体器件厂，那才是为国家办实事的地方，厂长也姓张，扬州人。我们江苏人都是自强不息的。张说，江苏自古出人才。我开始讲江阴抗清81天，全城殉国的故事：清军重兵30万围困小小江阴城，江阴军民誓死不降清，派出军校到常州明军将领史可法处求援，军校尚未到常州，史可法已殉国。江阴军民，众志成城，固守江阴81天，清军死3王18将，死士兵10余万人。破城后，江阴军民顽强巷战，全城殉国，孩童无免，十分壮烈。张说，整个中国，都是不屈不挠的。

第二天，我又去和张聊天。我说，“我有办法领你出去。科研区门房是一位阴阳人，看门看得很紧，但我知道围墙的小豁口在何处，我可领你离开这里。”张说，没有用的，回到家里，他们又会来抓的。第四天，我再去地下室时，已人去室空，不知去向。

“文革”中，一些人心理已经扭曲。各所高校在比赛，谁批斗的人物大，谁就是最革命的。清华批斗了王光美，北京外语学院批斗了陈毅，师大批斗了彭真、彭德怀……这次关押的张闻天，大概由于学生在东炼劳动而没有举行批斗。

2009年12月12日

原载《记忆》150期

冯启明，1946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64年入北师大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武汉、安徽的铁路系统的中学任教。1995年调到上海，先后在浦江中学、曹杨二中任教，中学高级教师。2006年退休，2017年5月病逝于上海。

我与林杰

金宏达

大约在2000年左右，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一位在某省社会科学院的朋友提起“文革”期间很出名的林杰，现就在他们那里，我不由心中一动，便请他打听林杰的电话，想见一见。

林杰在“文革”初期多么有名，“后生小子”是不知道的——他应该确凿地算是一位风云人物，其文章的“权威性”，仅在王力、关锋、戚本禹之下，有时还与关锋联合署名发表重头文章，言辞凌厉，威势震人，稍后一些，一些地方还能看到“林杰同志重要讲话”的大字报到处传抄，俨然居于“运动”指挥者的高位。

我之想见一见他，也还是因为他曾和我有过一点瓜葛。我写的那篇署名“时汉人”的为吴晗辩护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曾在当时重要报刊上引来一场围剿，其中与有力焉的，即是他写的那篇《学术批判必须突出政治》——洋洋洒洒以一整版的篇幅刊登在《光明日报》上，而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以半个多小时时长全文播出，当时能享受这种规格被批判的待遇者并不多，几近于吴晗和他的朋友邓拓、廖沫沙了。

他的堪称“重磅炮弹”的批判文章播出后，满校园都是批判“时汉人”的声音，我骤感“压力山大”，这时接到系里通知，要我去见一见林杰。其长篇文章当然不是即兴而作，于操刀之前，肯定已知其重炮猛轰的目标，只是我这样一个大学生，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现在，他见我我要说什么呢？我便按通知，在规定时间赶到规定地点——友谊宾馆别院的一栋灰色楼房，见到了他。其时他的年纪也并不大，戴一副眼镜，身躯微胖，口音很重，他只是从写字桌前略转过身，并未起来，我站立着，听他不甚听得懂的浙江话，几句简单的询问后，便是要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之类的“诫勉”。后来我也想过，那时的角色关系委实很难拿捏，在他，是居于强势地位的拥有极大话语权的批判者，而我，则是已被定格为“反毛泽东思想”的被批判对象，既不能模糊敌我的界限，却又难以回避作为对手我的青年学生的身份，那么，又为什么安排这一次“召见”呢？或者就是相关于他的重头文章的一种“交代”吧，毕竟如此重炮猛轰的只是一个学生，要显示“对事不对人”的姿态。

这篇文章不算完，接着是更大的一篇重磅文章：《〈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由他执笔，与关锋联署大名，文中再次点名批判“时汉人”，说“时汉人”是“其声甚辩，其声甚高”，喝令“时汉人”回答他们提出的吴晗的“要害问题”。这篇文章所挟的威势，在当时可谓令全国为之山动地摇。

随着批判吴晗及“三家村”的斗争逐渐升级，林杰的地位也愈益显要，很快成为“两报一刊”的“刊”——《红旗》杂志的常务副总编辑。总编辑是已经走到前台的“国师”级人物陈伯达。在北京师大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林杰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与北师大可谓有血脉相连的关系。批判“海瑞罢官”紧锣密鼓进行之后，《红旗》杂志社人手紧张，就从其他单位临时选调一些人帮忙，其中有不少是北师大的，后来兴风作浪的“五大领袖”之一谭厚兰，即在其中。谭厚兰晚上回校住宿，白天去《红旗》杂志社上班，就便将师大的情况向林杰汇报，据说她的第一张大字报亦经林杰授意并过目。北师大的校党委被当做“黑帮”

打倒后，新市委派了工作组来，未几，谭厚兰又贴出大字报，要“踢开工作组闹革命”，校园遂烽烟再起，直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亲临师大，宣布工作组“靠边站”，谭厚兰乃“功成名就”。有一段时间，谭厚兰被反对派抨击为“有保姆”的“左”派，这“保姆”便是直指林杰。谭厚兰成为北师大的“一号人物”之后，或是她直接去找林杰，或是林杰驱车前来师大，交往频密，因此之故，北师大就成为“上面”直接掌控的一个“基地”，而林杰无疑是“天然”的“桥梁”。谭厚兰率一众人马杀到曲阜“讨孔”，将“孔府”砸个稀巴烂，据说也是他亲自“指点”所为。（谭厚兰被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记述，林杰曾如是对谭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他接着说：“你们应当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这个反。”谭厚兰的回答是：“……我们去，我们一定去！”）

时间并不长，到次年夏秋之交，突如空中响了一声闷雷般，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说“林杰出差了”，特地将“差”字注音为“cha”，顿时，各种猜测、消息遽起。随之，又传出谭厚兰化装闯《红旗》杂志社门岗，欲见林杰。又有说确实林杰已被抄家、软禁，在房中一遍遍痛呼：“天，天！我相信天！”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此时唯有信仰冥冥之中的天，可想而知，事态已到何种严重地步。未过多久，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倒台，他也“下落”不明了。

时隔几十年后，我之要见一见他，决非为图报复，或为示讥讽，仅仅是觉得我此生还能有一次与他的重逢，颇有意思。他的工作单位在外地，却是住在北京，且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已有了他的家庭电话号码，拨过去，是一位老太太接的，想来正是他的夫人。他被叫过来，依然还是那一口浙江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几十年未变，我从他的应答中，总算吃力地明白他听懂了，我是谁谁，原先北师大的，想和他见一见，约在附近一个什么饭店，他很痛快就答应了。

按约定时间，我先到饭店，随即他也来了。我未曾想到此时出现的他，已是如此一位老者，面形宛在，满头花白，行动也有些蹒跚。其实也应该想到，他高我好些年级，又是当时所谓“调干生”，上学年纪就大，鄙人且已垂垂老矣，他焉能不老？于是，坐下，奉茶，在彼此寒暄几句之后，我忽然发现他并没有意识到我是谁，我便提起那篇署名“时汉人”的文章，说明我就是作者，我们还曾见过面。蓦地，他的记忆像是被一束光线骤然照亮，脸上露出紧张而畏怯的神色，欠身站起来，对我弓着腰，连连道：“我有罪，我有罪……”这个样子使我着实吓了一跳，也连忙起身拦他：“不要，不要，都已是历史了。”他总算稍稍平复下来，开始缓慢地向我叙述后来的经历。过去他们写批判文章，喜欢套用列宁的一段话，道是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本来要走入这一房间，却走入了另一房间。而他走入的这另一房间，竟是秦城监狱的一间特殊牢房，一住里面十七年。很长时间他都是单独关押，无人可以说话，以致一度几乎精神失常。到刑满释放，他又拾起本行，从事历史研究。他很乐意讲述他现今的著述和成果，令我微微惊异的是，他竟特别着重于彭德怀生平事迹的研究，已经写了一两本书。谁都知道，彭德怀是当年他们矛头所向，批判《海瑞罢官》就是要彻底否定彭德怀，那么，他在有生之年，如此倾力重写彭德怀，或许也是出于一种良心的觉醒和救赎吧。

他的口音还是颇难听懂，谈话也难以深入，我给他留下电话，相约今后再联系。而后，他也给我来过一封信，寄来当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我的文章的复印件，上面写了一行字，注明这是我的那篇文章云云。后来又来过电话，希望介绍他写的一本彭德怀传记出版，我们就这样由论敌成为朋友，也算是这爱开玩笑的历史给我们的一个交待。

他的大著出版，我终究没有帮忙，心里或总觉得由他来写彭德怀未免有点吊诡，也有点

反讽吧。不过，后来我知道书还是出了，《光明日报》上且有一篇书评，作者云：

“不错，此‘林杰’即是彼‘林杰’，那时的大笔杆子林杰是《红旗》杂志的主笔，不少‘名作’即出自他之手，当然这其中多有跟风的‘大批判’文章、包括诋毁中伤彭德怀的话语。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后被罢官的20世纪50年代末，以及1960年代‘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林杰的‘大批判’署名文章也正在满天飞，他是仅次于‘王、关、戚’的风云人物，也就是说，作者本身就是历史中人，而且是一个身份特殊之人。正因为如此，30多年后的林杰先生能重新拿起笔，敢于自我否定，正如他在本书‘后记’中说：‘我是带着负荆请罪的沉痛心情写这部书的。’由此可见，林先生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可嘉的。从另一方面讲，作者的这个特殊身份也说明了彭德怀元帅的人格魅力，能让一个在过去曾影响全国舆论导向的‘国手’经过多年的反思和悔悟后，从‘口诛笔伐’大批判，到发自内心地赞颂，讴歌‘盖世英雄彭德怀’，这本身就很能说明真理的力量。”

然而，事情竟有未必然者，这事过了一些年之后，我忽而听说林杰先生又“悔其‘老’作”了——他自己出钱把出版社存下的向“彭大将军”“请罪”的大著买下，付之一炬，这个急弯又是如何转的，我不解究竟，或者这个消息原就不实，倘林杰先生还健在，何妨赐示一二？

2012年2月11日

再改于2017年8月16日

大家都该悔悟——董连猛诗词评注

安希孟

“文革”中人，有人怀念光辉历程，但也有人心灰意冷。纵观“文革”史，最倒霉的莫过于造反领袖。举凡一切牛棚中人桃花源里的人，只有造反者们把自己送上断头台而至今不知悔悟。未经省查的人生没有价值。人在反思中前行。我思故我在。“文革”初期造反派，不少是志有才有为有思想的一代，敢于逆潮而动，不惜肝脑涂地。才华出众。但也有些是看风使舵，赌了一把，或竟至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北师大才子很多。师大三派，造反兵团的人最有才气，正直，有骨气，但是不知变通。其次是海派，又叫乏派（1967年冬天戚本禹接见师大两派，蒲寿章急不择言说我们的张梦阳是林杰的乏走狗）。杆儿派，谭厚兰派。有一些人，如陈兰彬、尚文廉、郑云云、武汉、周树志，后来淡出。

文化革命中，北京师范大学一开始就受到“中央文革”重视，这里奉献了首都五大领袖之一谭厚兰，首都大专院校地派的首领，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的头（第一司令部为保守派）。井冈山战斗团后来发展为井冈山公社。谭厚兰首先揭竿而起，夺得头筹。1967年一月夺权成立革委会，就有了北师大井冈山印刷厂、井冈山图书馆、井冈山校医院、井冈山汽车队。东操场更名为七二七操场。那时放映电影在北饭厅或篮球场，故事片前是新闻片。有一次播毛

主席第X次接见红卫兵，纪录片中出现北师大校门口，大家乐得拍巴掌。

1966年恐怖的八月。一天，北师大喇叭里忽然传出“北师大的臭大学生们……”原来是中学生来北师大煽风点火，他们觉着北师大太温文尔雅，于是“他妈的”国骂开始盛行，女同学也以说“他妈的”为荣。我们的女同学开始穿短裤而不穿裙子。我们敬爱的刘老师烫发头也不见了。大街上霓虹灯被砸烂，传统商号被拆除。北师大二附中的学生晚间殴打老师，一间教室窗户蒙上厚布，里面传出凄惨叫声。我和刘泽英也去学校，心里胆颤。回来路上才知，我们一位同学也跳进去打人了。刘泽英和我是好朋友。她谈起此事，很气愤，很有浩然之气。

1966年八月份，是红八月，骂狗崽子，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按照十六条，学校各系开始选举“文革”筹委会。一天晚上，外语系开会辩论，竞选“文革”筹委会。外语系一年级西北楼417房间，公推董连猛进系“文革”筹委会，外语系保守派似乎是红卫兵师下辖第六团。刘树林同学（后改革命化名“刘军”）上去发言推荐董连猛，但某公表示反对，云：“1965国庆节，董连猛双手拿了两大把各色汽球，我向他几个，董硬是一个也不给”。这时会场一片“嘘”声，把他轰了下去。这段回忆印证“文革”闹剧和荒诞。这则笑话，见证“文革”就是人间喜剧。刘公树林政治敏感性强，后来成为世界史博士（英国史）。他对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反复辟的研究极为精到。“文革”伊始，他敏锐揭发外语系108教室马恩列斯肖像唯独少了斯大林肖像（被大风刮掉），定是系总支应负之责——这与赫秃反斯大林分明并非偶然巧合。

1967年，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北师大批斗过的有罗瑞卿、彭真、余秋里、李雪峰、杨尚昆。批斗彭德怀时，还令其夫人浦安修陪斗。浦安修当时是北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在北大，彭德怀被夹在大卡车上游斗。从校园香径呼啸开过的大卡车上，有人用巨手猛压他的光秃秃头颅（当然他自己的头颅就没有尊严可言）。没有反思，头颅就没有尊严。

我们年级除了和兵团作战特别能战斗以外，还越级空投到英二年级抓捕“反革命分子”吴振明。吴振明爱读书，他在书上的读书批注是他的反革命罪证。“读书越多越反动”，就是打这儿来的。他关于普列汉诺夫的知识，就是反动言论。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英语系一年级骨干同学在文史楼东阳台开会拼凑材料，定吴君为反革命。这，如果没有学校革命委员会当局批准，如果没有校革委首肯，应该说是断难发生的。他很有才，竟然说共产主义没有货币，听着就吓人一跳。可我这个财迷，就舍不得钱。没有货币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吴君被打成反革命推迟分配，那是学校一级的决定无疑。

1968年春，京城高校部分造反组织炮打谢富治。然而炮打司令部，并非弹无虚发，刀刀见血，有时弹着点就落到自己人头上了。这一次“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的宝押错了，杨余傅被当作“变色龙”揪出，连同1967年秋被揪（揪，“文革”特有词汇，揪住人的后衣领把人拎起，这动作今已不见诸罪囚）出的王、关、戚“小爬虫”，共两类动物——龙和虫，人属于动物王国。倒谢积极者为北京高校天派和三军无产阶级造反派，大家同属一窝。北师大造反兵团倒谢，着先鞭。据说全国造反群众组织头目，北师大王颂平平反，全国唯一一家。壮哉，北师大。

1968年春“倒谢”，史称右倾翻案妖风（迷雾），又叫黑风，一定是黄沙翻滚。杨、余、傅被抓，造反兵团倒谢失败，龟缩工五楼，于是有了井冈山掌权一派攻打包围工五楼一役，

井冈山革委会指挥武斗豪气干云断水、断粮、断电。汽车轮胎制作强力弹弓向工五楼窗口发射，弹无虚发。我初中学的“弹洞前村壁”如今被坐实。于是感觉“今朝更好看”（笑）。长茅剑戟发出寒光。被包围在楼内的井冈山造反兵团官兵弟兄们哀怨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黑夜里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哀婉凄切。在他们，一定动容，忧容惨淡，长泪汨汨。武斗攻打工五楼武斗前线总指挥，做了动员报告。动员大会上，原武装部长大喊，“踏平工五楼，不要啦”。那个武装部长煽动说他心情很沉重，中午只吃了五个饺子（众大笑）。革委会头头弯弓射大楼，亲拉强力弹弓，用石头射向工五楼。玻璃窗户几乎全部破碎。

对工五楼断水、断电、断粮，叫“三断”。他们用桌椅板凳堵塞楼梯，逃过一劫。造反兵团在工五楼掘地三尺挖井吃水。据说还有接雨水煮饭的。夜晚有人值守监视工五楼，防兵团潜逃。凌晨兵团同学（彼时叫战士）逃窜，我责问陈毅文同学何不把暖气片推下砸死他们，陈毅文说，“于心何忍”。我刷地脸红了。你看陈毅文同学是多么善良的夫子。善良的人还有陈金国一伙兵团成员，晚上遇见革委会巡逻队，几条大汉吓出一身冷汗。没有挨打，也吓得够呛。膳食科一位杜姓工人每天吃饭时殴打脚踹造反兵团的同学，工宣队进校后全校大会点名隔离。工宣队进驻北师大，李闯，即李瑞礼拍着肩膀开了个玩笑，被全校点名批评。我们这一派因为没恶行，没派性，受到重用。我当上基层干部小班长。工宣队举办各派成员骨干学习班，我是中间派代表，与韩贵新、李闯、刘军住中北楼同一间宿舍。虽说不对立，但有心理隔阂，相处不会很融洽。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此后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北师大清理阶级队伍，革委会主持大会，国共斗争继续，几百名牛鬼蛇神烈日晒烤，或倒毙路旁沟渠。中午时分，学生均到大食堂用餐，路边仍有牛鬼蛇神晕倒。

1969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因为伟大领袖发号召，我们对“五·一六”充满刻骨仇恨。让董连猛交待1967年9.2黑会，那是夏末初秋，天气炎热，大家还穿短袖短裤赤膊上阵，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但有蚊虫饕餮。我们要董连猛交待九二黑会，这压根儿也许就是莫须有的伪命题。大家轮番上阵，让一部分人先吃饭先饱起来，其余的人继续斗，让他铁桶倒豆子。快七点时，连续站了五个小时的董连猛大概头晕目眩，敌不过革命群众的车轮战术，说，“我招了。”工军宣队老王宣布大获全胜，鸣金收兵：“把董连猛押下去。”董连猛甫一出批斗会场，就哇的一声号啕大哭。人困马乏的我们，赶快去吃最后的晚“餐”。那天下午，我始终坐在批斗会的最后一排——我这姿势保持了一辈子，每次开会坐门口，不坐主席台，随时开溜。我没有拍桌子打板凳大呼小叫，因为，我于此不在行。

后来给董连猛办学习班，就是隔离审查——这玩意儿拿法制观念无法解释，和劳教制度差不多。这名称很优雅——不信给你办两天学习班试试？我也算董连猛专案组吧？反正看管董连猛，看守监督。我起初也怀疑董连猛有弥天大罪，重案在身，后来越来越觉得我自己曾经和反革命也差不多，就是怀疑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嫌周总理有些儿温和。况且董的反革命罪状也就那说重不重的几条。每天吃、喝、睡，围攻一交代一散摊，用革委会曾经对付别人的法子对付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时，革委会让牛鬼蛇神太阳下游街示众，有老教授就昏倒在地。这次轮到董连猛自己眩晕了。他也尝到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味道。

看守董连猛，我觉着无聊，成天就是朗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分明是董连猛给我们办学习班，关我们的禁闭。我特别希望从笼子里得到解放，打心底里念诵：“无产阶级安希孟只有解放董连猛，才能最后解放富于同情心的安希孟自己。”有一天，董连猛要喝水，我说咱们到主楼旁开水房去。这样，董连猛就给我放了一次风。

在主楼水房打上凉开水，我意犹未尽，说，“我俩坐一会儿。”他这才说，“我觉得你人不错，我给你说实话，根本没有‘九二黑会’，我当时头晕眼花，腿都站乏了，没办法，就招了。”其实我知道，反革命分子都是这样逼出来的——胡风，糊涂了，就疯了。于是我说，“这些你完全可以对领导一切的工宣队叔叔说。这事我不说，你自己说。因为我说了不算，还得你说。当然你说也是白说，因为斗争哲学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谁相信虚无呢？言‘有’易，言‘无’难呀。你又不是道家和佛家。你要是道家和佛家，保准不能统御一切。你那时要汉奸特务交代，也是捉虱子心态，不是吗？”

于今思之，“九二黑会”，容或有之。九七之前的黑会，照理，也是天赋人权。不打、不抢、不烧，有何不可？林杰倒台如鸟兽散，开个黑会，惊慌失措，惊弓之鸟，发表牢骚，还不行？可是，一个社群，怎能如此水至清人至察呀！几个娃娃，面临政治局势突然逆转，日薄西山，人命危浅，发牢骚，凑情况，对暗号，表示很不理解，比如二月逆流跟不上战略部署伟大，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终因丧失阶级立场，“被”清出了看管小组。我就被从监押小组清除，被解除“关押”！后来知道，“五·一六”组织的确存在过，那是幼稚的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学生怀疑周恩来。但是这个组织人数很少，区区一小股武装，而且绝不是坏人。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我自己就恨不得能看到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可惜没有看到。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在全国清查“五·一六”。1970年10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1967年3月反二月逆流，国务院是旧政府，几位副总理成靶子。我被抽调到社科院和北师大大的“中央各部联合调查组”，那是“中央文革”为渗透到周恩来管辖地盘窃取动向。我被分到财贸口。然而其实没有见到过一张关于他们的大字报。没有任何文字批评过他们。只是有闻必录，但也乏“恶”可陈。就我当时的思想而言，我也是血气方刚，觉得周总理和李先念比较右，多么希望真的能发现有关他们的大字报。我们当时的心态是巴不得捉到虱子，越多越好，可惜没有捉到虱子。

后来我和“文革”中北外的一位朋友交谈，知道他当时的确和周总理、陈毅对抗过。真正的“五·一六”成员，还是发起人。他很坦率。不过一番交谈下来，无论如何也不觉得他是坏人，反而可爱。当时青年人热血沸腾，有点冒失，居然批斗陈毅元帅。不过周总理也予以谅解了。据他说，天安门责问周总理的巨幅标语就是他们所为。他说有一次让陈毅作检查。周总理和他们订立君子协定，不许挂“打倒陈毅”的标语，但他们违背中英联合公报似的，突然从人民大会堂二楼垂下“打倒陈毅”的标语。后来批斗陈毅，违反协议，周恩来愤而退场。别人拧住陈毅的胳膊，他也想上去拧一下胳膊，被拍照片。清查他的人说：“铁证如山。”他灵机一动，狡辩说：“我是不让那人拧陈毅胳膊，想拨开他”。细一看照片，还真那么回事。青年人一腔热血被绑架。

有些造反领袖，至今不知悔悟。自己做了浩劫的推手和牺牲品，却依然忠心耿耿，依然仇视对立面。他们忠于“文革”的策动者陈、康、江，怀恋王、关、戚，独对被自己压迫戕害的人，对于自己的过往，没有半点愧疚和歉意。好像只有自己一贯正确，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你捍卫的那条所谓“革命路线”，乃是使万众陷入万劫不复深渊的劫难。

《董连猛诗选》（2004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就是这样。这本诗集的最大缺憾，是作者省略了他在1966年至1970年疯狂年代意气风发意乱情迷四海翻腾风雷激荡岁月得意之作。那时候他狂热追随江青、康生、王、关、戚，批斗自己的老师同窗。董连猛担任北师大革委会副主任，又是井冈山的头头，在讨孔、批斗走资派和学术权威、反“二月逆流”、保林杰等事

件中都是冲锋陷阵的角色。他外语系有自己的嫡系部队，颐指气使，山摇地动。外语系抄家，金银首饰玉器珠宝貂皮，被一造反领袖窃为己有。那一定是叱咤风云、小人得志、群魔乱舞、瓦釜雷鸣、沉渣泛起、冤魂遍地。

《董连猛诗选》，2004年人民日报社出版，由于出版时的政治生态，也由于出版社需要或考虑，作者照片根本没有“文革”痕迹，也已经删除了“文革”大量诗作。前言后语中没有“文革”韵味，偶有“文革”情愫。作者在后记中说，在文化革命期间，“我用诗，写下了自己的悲与喜，忧与愁。这些诗，是我那个时代情感的写真，也是对那一段历史侧面的纪实，这些诗饱和着我的心血和泪水，所以我倍加珍惜。”这一段情真意切的表白表明作者没有些许悔意。没有反思，应验了“未经审查的人生没有价值”。反思，就是清夜扪心反躬自问，手拍胸膛良心发现。可惜此诗集大量删除“文革”心路历程。张恩和为他作序云，文化革命中，“他还诗心不死，不时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自己内心的感受用诗的形式记下来。”说这就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愤怒，不是针对祸国殃民者，而是对于试图结束过火动乱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的抑制造反派而举行的清查的愤怒。

另一位序言作者云，“文革”爆发，董氏“青年诗人以一种担当国家命运的豪情卷进了这场风暴，并成为注定要写入“文革”史的人物，那四年多他写下了大量诗词”。作者赞扬那是血性文字。他赞扬董1971年被审查期间的诗文。例如，“从来倜傥非常者，不向天公哭路旁”。意思是在审查中，不告哀乞怜。不过我想，诗作者董氏如果对于“文革”稍有悔意，自我解剖，痛悔自责，稍有歉疚，敢于责问最高神灵，看到师大井冈山治下无数人蒙受冤屈，国家不幸，人民荼毒，社稷蒙难，那未尝不是极高的精神境界。那将是灵魂的升华，那才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不过，纪念“文革”，这本诗集极有价值。因为，毕竟，这是北师大“文革”的一段插曲，一个侧面，保留了一些真相。但不幸，不少人过于健忘。百姓习惯于抹掉记忆，忘怀苦难。如此乐观的民族，或许是可怕的。“文革”裹挟，罪不在我。但劫难已过，人人应该思索。你如果仍旧生活在历史的阴影笼罩之下，那是你的不幸。1971年遭受隔离的人，仍旧痴迷。被隔离者的内心独白，其忧戚悲哀，可想而知。但不应该不知反省。迫害与被迫害者的共同遭际系于一人。此诗集对“文革”的始作俑者情有独钟，依然怀恋灾难的初始阶段。请看他遭遇隔离时的心境：

蝉 鸣

(1972.9.17)

高洁抱青枝，霜天不惮时。

任尔露阴重，兀自唱狂痴。

风翻叶晦明，彻宇玉蝉声。

整日鸣嘶咧，何时可得停？

1970年12月9日，《诉衷情》云，在学校班已经半年了，“忍昏鸦又噪几声”。昏鸦者，同学也。另有1971年四月五日词句云：“天暗云封，不见清明。最苦冤日，是死是生。人生误我，风雨欺春花叶落。”1971年在被审查期间，有一首诗，不知天下苍生“文革”苦难，却唯独哭诉自己冤屈。诗人之愤怒不应是出于一己私欲，而应该有社会关切。

八声甘州·望雨

正阴云急雨压城来，封天锁晴明……风雨囚中老矣，念当年鹏举（指谓造反是英气勃发，

你鲲鹏展翅，别人却折断双翼），此时风停；叹年来冤事，泪共雨同倾。古今同，相加诬罪，诉哪厢？悲愤激腔膺。朝雷啸，洗余清白，还我人生。

落难之苦值得同情，只不知这是怨天尤人，不是责问肉食者当道者，不是反躬自责。“朝雷啸”，天公为人间冤狱负责吗？1971年5月21日，隔离审查关押期间，他作诗自比涸辙之鲋。这似乎是说“文革”初期他批斗系总支的情形，曰：“批斗台上忆曹植，七步诗慨叹因步之：一旱千里赤，涸辙鲋鱼泣。旱魃何其虐，频频风吹急。”

1972年6月10日，他尚在羁押中，作诗云：“南冠君子坐冤重”，“未誓恨天三愿宏”。“无计冤囚长咨嗟”。还有“宁冤沉海”“囚室盼怀”等句。我觉得他有冤屈是对的，但应该归罪于那个时代和那个路线。

“文革”群众组织领袖，被倚重的项目组，曾经抄家揪斗他人的人，大都不再坚持昔日的阶级立场。造反派头头大都觉悟到替罪羊和被利用的命运。但也有不少人怀恋光辉岁月，对于运动后期被整肃，仍旧怀恨，却只记恨群众，仍死抱着“文革”旗帜不丢，深情怀念“文革”的峥嵘岁月。只说自己蒙冤，不记得给别人的伤害。《辛亥咏怀》（辛亥孟冬，1971，北师大），就充满着“文革”荒诞呓语，怀旧的豪情壮志和对于动乱岁月的无限向往，跃然纸上。

“少年志未羁，鹰鹗任情驰。乘意摩星月，御风游碧帷。遍览中外事，四海入胸渠。披阅古今史，倍崇毛主席。百朝千帝土，千代万雄卑。浮沉海岳事，今朝最奇伟。”

我们应该同情“文革”学生领袖，始乱终弃，始则宠爱，终被抛弃。不过运动积极者们应该自觉自省，可是这里却何等踌躇满志，不可一世，飞扬跋扈。“文革”狂涛，嚣张一时，乱世奸雄，枯木朽株，咸鱼翻身，小人得志，攀爬有招，野心勃勃，跃然纸上。自己的得意建立在无数人痛苦的基础之上。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铿锵得令，我手执钢鞭把你打。“文革”，恶人横行的时代，业已被中共定性为十年浩劫和动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不聊生，成就最小最小，损失最大最大。

这首诗还记述“文革”初期他们批斗杨之岭老师的辉煌业绩，说他“心忧主席忧”，就有点儿夸张。“文革”用语也。但把“文革”初期牛鬼蛇神说成蛟龙虾蟹，就仍不思悔改。在你，是赤诚之心，刘邓陶贺林周邓又何尝不如此呢？个个奋勇，人人捋拳，个个挽袖，横眉怒目，胡风遭殃，章罗蒙难。

“水急泥沙多，妖狡俗自迷；千年此教训，魄勇须多思。”说“文革”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然而自身尚且受审查，却还诬指别人是反革命呢。真是念念不忘。自己冤屈，别人挨斗都是活该。“文革”岁月“或战混蛟龙，或擒虾蟹痞；虽披万处创，笃志不犹豫”。“文革”揪斗他人，何等壮烈。别人都是蛟龙虾蟹？

诗词对老师同学怀恨在心。“用我昔时讎，偏彼恶语隙。闻风即是雨，胁迫又威逼。昔日曾对立，即逢此辈异。今时遭奇难，彼辈化长吏。乘势弄刀笔，随心玩直曲。生风怒目来，行雨扬眉去。酷色河川结，厉声林峦栗。”挑动群众斗群众，让红卫兵当替罪羊，另有其人。“大会小会斗，万人千人批；清晨接暮夜，论战继连续”。你当初斗别人时，不也如此吗？“加我‘贼团’罪，诬身为叛逆。恨身无百口，千口复何益？”不过清查“五·一六”，是全国各地对造反组织的整肃，许多地方至今没有翻转，后来以“三种人”对付。因为那是祸国殃民之辈，属于四人帮的御林军。“昼则神恍惚，夜则独悲泣；沉沉不白冤，悒悒诉谁与？泪目顾囚房，茕茕徒四壁；呼天天无言，呼地地不理”。当初你们不也如此对待别人吗？我们多么希望当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人能自我反省，自我鞭策。假如诗词充满对于“文革”

其他不幸罹难的人们的同情和悲悯，那就很可贵。

我对于董氏的不幸遭际，抱有同情之心。他在春风得意时，我和他是两股道上的车，严
格对立，没有攀龙附凤。他贬为庶民，我们是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东方红炼油厂莫逆
之交为证，他落难，我们没有落井下石。这首诗作于1971年，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有如此
狂热诗章，毫不奇怪。愚昧呀，洋溢着春风得意。但是2004年出版此作，如果加上悔意，
表示惋惜大好岁月被抛掷，并向受难者致歉，对于在自己手下吃过苦头的人稍有歉疚，斗私
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就博得谅解。不应有恨，恨同学。不应仍不悔改，动乱情结不加掩
饰。不加修凿，就说明作者依然怀念那个凯歌猛进岁月。

附：

辛亥咏怀

辛亥孟冬，1971年12月，北师大

董连猛

一

童时离故土，千里随阿姊；黄水白云城，秦关汉塞基。
求学感奋发，重望工农期；十载金城短，风华意盛时。
登峰抚白塔，千峦望中低；击水搏黄浪，大河肋下飞。
少年志未羁，鹰鹫任情驰；乘意摩星月，御风游碧帷。
遍览中外事，四海入胸渠；披阅古今史，倍崇毛主席。
百朝千帝土，千代万雄卑；浮沉海岳事，今朝最奇伟。
奴隶封社稷，陈吴志得遂；穷黎遇救星，我幸逢生机。
爱瞻烈英墓，誓肩革命旗；常存存瑞志，欲继继光为。
诚笃忠领袖，藿葵情不移；此怀时跃跃，此志常依依。
我辈皆天骄，轻舟顺水疾；少年方及冠，求造诣京师。
春意日边浓，物英大都奇；朝仰天安门，暮瞻英雄碑。
物壮怀亦阔，恩深情愈悝。古都逾五代，新岁射千辉。
领袖雄宏略，中华多壮举。中南海水怒，冲汉化疾雨。
伟哉大字报，壮矣红兵卫；如潮又似汐，滚滚天河溃。
文化革命起，浪吞封修资。波冲污沼泥，淘尽神州秽。
挥斥意从容，激扬澄玉宇；挽澜又握流，主席真神力。
鼓角声声催，腔膺热血激；中流当勇赴，逆水不为意。
保卫毛主席，此身何足惜。粉身纵碎骨，事业如光熠；
风浪学游泳，力行主席语；踏涛又破浪，却好励心志。
涛涌连天际，波涵平地立；峰头浪恶险，谷堕流湍急。
水浊何浑浑，澜狂何巨巨；纵横漫九州岛，顺逆漩千里。
我恃黄犊勇，直前未顾体；劈波复斩浪，奋勇学刚毅。
乍遇风浪险，间时亦呛气；心忧主席忧，遂壮再接再砺。
或战混蛟龙，或擒虾蟹痞；虽披万处创，笃志不犹豫。
往日区区怀，此时历历迹；忠心因血红，寸志映天碧。

二

事理多蹇乖，人生不坦砥；声言抓“贼团”，平地风暴起。

清理又清查，今日复明日；有司细不察，连我禁囚闭。

用我昔时讎，偏彼恶语隙；闻风即是雨，胁迫又威逼。

昔日曾对立，即逢此辈异；今时遭奇难，彼辈化长吏。

乘势弄刀笔，随心玩直曲；生风怒目来，行雨扬眉去。

酷色河川结，厉声林峦栗：“清查不漏一，漏万也无你。

生死全由我，日今非昔比；心慈不丈夫，手软非君子。”

大会小会斗，万人千人批；清晨接暮夜，论战继连续。

加我“贼团”罪，诬身为叛逆。恨身无百口，千口复何益？

昼则神恍惚，夜则独悲泣；沉沉不白冤，悒悒诉谁与？

泪目顾囚房，茕茕徒四壁；呼天天无言，呼地地不理。

欲望泰山日，巉岩梁父蔽。欲飞无羽翮，欲刎无刀锯；

伤极号悲恸，情摧五内坠；彼苍者何辜，竟遭此毒疫？

昔我立怀时，知途多荆棘；志学先烈勇，水火全无忌。

三载多风涛，一心向日极；或便粗孟浪，终嗤阴阳伎。

耿耿忠怀心，淋淋赤胆汁；清清皎月白，霜月红枫赤。

谁意坐冤诬，壮心空自许；环墙囚洁身，谤罪摧清誉。

身贱志亦鄙，誉残颜辱仪；欲生若畜物，欲死如蝼蚁。

左右皆陋陋，忧忧与戚戚；忧忧不胜愁，戚戚难终已。

不堪意烦乱，欲逃梦乡匿；谁知相逼苦，往往还惊悸。

惊起欲长嗟，又恐彼挑剔；慑前又惧后，生死终无计。

怆怆不成眠，时时心惕息。昏灯照暗淡，孤影亦侘傺。

门若血盆口，窗如魔目视；幽幽囚室冷，诡诡禁楼噬。

春雨润芽时，秋风摧叶日；杨花又雪花，寒暑四时易。

渐渐不知期，但看华韶逝；狰狞铁栅紧，锁我人生翼。

三

百岁犹可数，少年谁再继？我方二十余，正是青春季。

横祸自天劈，飞灾奇难袭；陷身做楚囚，饱历人间屈。

囚户蔽何紧，日光不透缕；夏时犹着棉，伏月闷且湿：

禁室虫亦恶，饕蚊昼舞剧；床边蛛结网，益惹情伤郁。

花鹊弄嘲声，黑鸦叫揶揄；时时窗外扰，益惹情伤郁。

叱咤风云时，善言曾劝谕：“闲庭信步好，漫目观涛起。

何必多踊跃，踊跃多阙失”。彼时何慷慨，曾鄙庸人嗤。

革命为人生，风涛平地立；苟生当若死，志士不为取。

我步主席路，路艰方向晰；一心不二德，誓身捐大义。

音响犹回耳，却看今日事；怨冤何沉沉，冤怨何抑抑！

一日九回肠，经时此气聚；欲冲贯太虚，郁郁结云际。

化气泻疾雨，滂沱降人域；滔滔湘水涨，滚滚汨罗溢。

或欲化霜雪，飞飘六月絮；千原一色白，兆我奇冤耻。

暑雪愆禾稼，雨亦恐民溺；忧民又忧国，意欲却复止。

气既不得舒，又复摧肝肺；肺糜肠欲断，茹屈还吞泪。
白骨一何毒，僧身一何愚！妖兴披饰装，蠢目竟无疑。
大圣三番打，吾愚错护庇；识彼骷髅时，白骨刻有辞；
此际将何恨，恨心欲噬之；今伏此贼孽，亦快我胸脾。
水急泥沙多，妖狡俗自迷；千年此教训，魄勇须多思。
伤意今朝事，有司太昏迂；右偏复左极，挟逼求无倪。
权器弃随意，高低均所宜；桃僵李也代，所近靡孑遗。
最苦含冤人，仰天独长吁；悲吟黄水怨，声动撼崦嵫。
滚滚大河急，千年浊若泥；激昂多少士，慨叹清无期。
幽怨泻黄水，逝流咽嘘唏；逢时今欲清，拌搅又阿谁？
不白冤情事，天下谁人知？澈清石见日，磊磊我心居。

（《董连猛诗选》，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

原载《记忆》154期，此次刊登有多处改动

从人性的角度审视历史

蔡鸣乔

内容提要

反思“文革”有三个主要层次。本文结合作者发表在《记忆》电刊第150期上的《拿捏旧伤，回首冰霜路》一文，阐述从人性角度的层次审视那一段历史的写作意图；结合史实，揭示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一体两面性；探讨普通人如何才能坚守人性之善、抑制人性之恶。

关键词： 反思 人性 一体两面

1. 反思“文革”的三个层次

启之先生编写的《水木风雨》中有一篇文章引起我的深思：陆小宝的《流着眼泪剥洋葱》[1]。这篇深刻独到、思想性极强的文章的第二部分，提出了反思“文革”有三个主要层次的观点：第一层次，反思“文革”中发生的具体事件，为后人提供历史真相。第二层次，从中国的政治体制上反思“文革”，从社会制度上探究“文革”产生的原因。第三层次，在更深入的文化层次上反思“文革”。结合陆小宝全文的思想，我理解第三个层次的重点为“从人性为本的价值观出发的反思”。

第一层次的工作当然十分重要，只要揭示的内容有依据，真实可靠，就是进一步深入研

究的基础。曾经有朋友在看了我的那篇《拿捏旧伤，回首冰霜路》一文后，向我提出质疑：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怎么对当时的细节甚至年、月、日都记得那么清楚？对于这种质疑，我想回答的是：一件事情，对有的人是过眼烟云，对有的人却是刻骨铭心，这与此事对这个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程度有关。我的这篇回忆中凡是用准确的用语叙述的每一件事和人、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都是有文字记录为依据的。对于无法考证落实的，都用模糊的用语表述。这样做，是为了对那个年代的一所大学里（北师大）发生的一次事件中（“4.26事件”）一个人的一段遭遇留下一篇信史。

第二层次，从政治层面反思“文革”，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现实的情况是，从这个层次探讨的人，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所谓“文革是权力之争”，“文革是路线之争”，“文革是民主政治的初步尝试”，“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等等，形成了所谓“观念撕裂现象”。吊诡的是，这种“观念撕裂”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早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就已经对“文革”作了“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结论。在官方已有明确结论的前提下，尚有人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争论“文革”的理论如何正确、实践如何合理，若想超越那个《决议》反思出个子午卯酉从而把什么东西改变个一二三四，岂非天方夜谭？

对师大的“文革”从政治层面反思，势必牵涉到如何评价师大两派群众组织，如何评价谭厚兰和王颂平。我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深深感到，一方面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很少了解学校两派头头的背后活动及他们接触中央高层的内幕，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革”亲历者，很难跳出自己当时所持的观点立场，极易造成主观片面，甚至受派性的局限，从而有失公正，在许多问题上也很难做到逻辑自洽。因此，在我的原稿中有一大段对“造反兵团”的评价及对“4.26事件”的主观分析，在定稿时都删掉了。最近看了李潇先生的《回忆十年文化史论课》[2]一文，文中的两段话使我深受启发：“无论是哪一帮哪一派都真心标榜相同的革命理想与拥护对象。”“在一元的革命斗争话语之下形成了竞争关系。”难道不是这样吗？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下，谁跳出了那种特殊语境的窠臼？杨继绳先生说过：“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总之，从政治层面反思“文革”实在是个力气活，还是留给有能力的人去做吧！

所以，我在写《拿捏》一文时，选择了从人性的角度审视那一段往事，姑且算是从第三个层面反思“文革”的一种尝试吧。

2. 基于“以人性为本的价值观”的反思

有朋友看了我那篇回忆后说，对我和苗的爱情故事很感动。我想说，我写那篇回忆，绝不是为了秀我们的爱情故事。但现在给很多朋友却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确实很令人无奈，也许和我的文字表达能力太差有关。在那篇回忆中涉及的几十位人物，无一不是从揭示人性的角度叙述了那一个个故事，生旦净末丑、忠勇善恶奸，一一登场。

人性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东西，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处于险恶的环境，人性中的各个侧面就都暴露出来了。有的人，从来也没有和我持相同的观点和立场，但在我倒霉的时候却不肯落井下石，想方设法给我安慰和温情，甚至顶着压力为我说情。有的人，从运动一开始就是“一条战壕里的亲密战友”，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却告密出卖者有

之，冷箭伤人者有之，划清界限避之唯恐不及者有之！有的人，用当时一些所谓坚定份子的观点看，“立场不坚定了”，却能够冒着天大的风险为我通风报信。怎么解释这些现象？难道还能用“党性”“派性”还是其他什么基于政治的属性标准去衡量吗？只有从超越这些的人性角度才能解释这一切！

什么是人性？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是孟子的性善论，儒家的正统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除了性善论还有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等学说。我个人赞同人性中既有善又有恶，善恶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人人概莫能外。

基于“以人性为本的价值观”去反思“文革”的意义何在？

我们说，“文革”是一场浩劫，是因为它反智、反文明、反人性，“文革”是人性的炼狱！著名作家崔巍的女儿崔敏谈“文革”时说：“文革”是人性的大暴露，什么人，通过“文革”，全明白了”。“不要以为‘文革’烟消尘灭了。”“中国人秉性不好。我就敢讲，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人全会跳出来的。”“再来一次‘文革’，你们看着吧，跳出来的人多着呢。人们啊，千万小心呐！”

“文革”是一场由领袖发动、群众参与的“群众运动”，动员之广、时间之久、参与人数之众、运动之剧烈史无前例。清华大学唐少杰先生认为，“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是一体两面的，即运动在其形式上是“群众运动”，而使其得以存在的基础则是“运动群众”。群众首先要能够被运动起来，才会接着去自动运动。

那么，作为“运动群众”和“群众运动”的双方主体，是在哪些契合点上发生了相互作用，从而使全社会进入到那种癫狂的状态呢？如果用物理原理比喻这一现象，“文革”中全社会的癫狂状态可以比喻为机械振动中的共振，机械振动需要有振动源和传播振动的介质，而当振源的振动频率与介质的固有频率相吻合时，振动将越来越剧烈直至极限，这就是共振。举个具体的例子：火箭发射时，发动机就是振源，火箭箭体的材质、结构、形状决定了箭体的固有频率这个参数，当发动机的振动频率和箭体的固有频率相吻合时，火箭升空时将产生剧烈的振动甚至共振，造成火箭的解体。请注意：在没有条件改变发动机的性能参数时，设计师选择的最有效的做法就是通过改变箭体的材质、结构、形状等来改变火箭箭体的固有频率，从而避免箭体在发动机的策动下发生共振。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作为传播振动的介质——“群众”，我们每个人的人性基因中，有哪些“固有频率”与策动振动的振源频率相吻合？这些基因中，有哪些片段是外界植入的？那些是自身固有的？历史不会机械地重复，当改头换面的“类文革”出现时，这个问题不解决，谁敢保证自己不是崔敏说的那个“跳出来的人”？

东方文化熏陶下的国民性中有一些历史沉淀下来的人性基因：膜拜权威、迷信名人、渴望明君，习惯于人身依附，歧视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这种人性基因无疑是被策动引起共振的“固有频率”，要改造这个基因，又是一个非个人功力所能完成的宏大课题。但我们可以从自己做起，探讨如何才能独善其身。

3. 正视人性的弱点，弘扬人性之善、抑制人性之恶

每一个人的天性中都有弱点，所以每一个“文革”的亲历者都应当反思自己在“文革”

中的人性表现。我不否认我人性中的缺陷，前面说过，我写那篇回忆的内容都是有文字依据的，其中就包括我在囚室中写的检讨和交代材料。我承认，在被人抓住小辫子以后，在泰山压顶之下我会屈服、会认错，这没什么可丢人的，我只要不乱招供乱咬人就行了！同样，被抓到怀柔去的同学在压力之下认错、检讨、自我批判甚至揭发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毕竟我们那时都太年轻，太没有政治经验，狂热、冲动、偏执但很脆弱。我那篇回忆的初稿有三万多字，定稿时删减成不到两万字，这样大面积的删减，使得有几个地方故事没有按逻辑发展，例如，那年10月初，怀柔的解放军已经对我说了：“你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怀疑康生，主要是因为和谭厚兰对立。认为康生是谭厚兰的后台嘛。”这应当是对我的审查作结论的一段话，但为什么在11月初怀柔“学习班”结束时，别的同学都自由了，回到各自的班级了，却对我继续单独隔离？这里面有什么故事？为什么要做这些删减，是要隐瞒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吗？当然不是，我只是不想伤害不该伤害的人！

我的那篇回忆中有一个细节，在我从囚室中放出来后，到苗致平的家里去拜望她的母亲，言谈中对同时被抓的一位同学没有实事求是、乱招供略有怨言，老人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嗨，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逼那孩子的呢！”老人这轻轻的一句话当时让我极其震撼并铭记终生。这不仅仅是大度，而是在那一瞬间闪现的一种人性之善，是经历过苦难后的睿智！我曾经和苗致平探讨过老人的这一表现，她说：“可能和我爸爸运动一开始就被打倒有关吧！”

我那篇回忆中有一个片段，在我从囚室中放出来后，有一天经过“绿园”碰到一位熟悉的中文系老师，我高兴地上前和他打招呼，没想到他却冷冷地对我只说了一句话：“你在里面交了不少问题吧！”这一幕像刀刻一样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今天回过头去看“绿园”中那位老师的话，我想，其实是他陷入了一个人性之恶的误区。长期以来我们受到的宣传教育都是：无论在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中，甚至在观念、观点的交锋中，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可让步、妥协，更不能屈服，否则就是投降叛变！所以，不能善待朝鲜战场上被俘后历经磨难归来的志愿军战俘，不能信任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牺牲的危险在敌后工作的地下工作者。在这种极“左”的、反人性观念的支配下，所有“进去过”的人都一定是“叛徒”，于是，“叛徒”这顶帽子就成了“文革”中致对手于死地的利器，于是，就有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案”“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伍豪事件”，等等。

人性是有弱点的，我们要正视人性的弱点，正确对待人性的弱点，才能避免人性之恶，弘扬人性之善！

人性中有弱点不要紧，但不要在自身的生存和安全并未面临危机的时候也要肆意地展现自己的人性之恶！那些“文革”初期出身“红五类”的某些专政队员们，当他们用棍棒砸到那些比自己年长许多的所谓“牛鬼蛇神”肉体上时，他们的心为什么不震颤呢？他们有必要这样彰显自己的革命性吗？当然，也有在任何情况下不肯泯灭人性之善的勇敢者，正因为这样的人凤毛麟角，他们身上焕发出的人性光辉才格外璀璨夺目！这两类人都应当属于少数。

品味人性，对于处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在面临危机时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人性善在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容易显示，在危及自身生存或安全的环境中很多人会展示人性恶而自保。这也能解释了“文革”中为什么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个人突然遭到整肃的时候，原来越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一旦反戈一击起来越是凶狠，相反，原来相对疏远的人里有时倒能给予一些温情。

最后，我想说一件小小的趣事。有一位朋友在谈到“4.26事件”时说：“当时被抓到怀柔去的人里，只有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一直到最后没有屈服，我没有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所以一直没有低头！”她的这段话意味深长。我只想说，所谓“没有让他们抓住把柄”，说明

有的人善于保护自己。我就不信，在师大那种环境下，谁心里不清楚谭厚兰的后台是谁？只不过有的人心知肚明却从不说出来而已，像我这种总是做蠢事的人把它说出来了，于是让人抓住了把柄。而一旦让人抓住了把柄，你还指望宁死不屈、决不招供么？《红岩》《江姐》一类小说影视剧看得太投入了吧？

所以，学会保护自己，其实也是在创造独善其身的条件。

2017.8.3

（本文全文发表于2017年《记忆》电刊第十五期，总第193期）

主要参考文献：

[1] 启之：《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独立|作家）

[2] 李潇：《回忆十年文化史论课》（<https://mp.weixin.qq.com/s/>）

论“文革”思维

张梦阳

“文革”虽然早在三十年多前就被中央从政治上否定了，然而思想上的流毒远未肃清。说不定什么时候，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使中华民族又陷于大悲剧中，而且更难翻身。作为一名人文科学工作者和鲁迅研究学者，特别是日渐稀少的亲身经历者，实在有责任从学术理论上对“文革”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批判。

于是神差鬼使，不由自主地在电脑屏幕上打了《论“文革”思维》这个题目。

“文革”仅从政治上否定是不够的，完全归咎于个别领导人也是不全面的，必须从理论上深究一下这场大悲剧发生的原由。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思维，思维驱使人采取各种言行。为什么当年有那么多的人狂热地投入了那场荒谬得近于疯狂的运动呢？我认为：“文革”思维是导致错误的重要因素。

所谓“文革”思维有以下四点特征：

一、极端性

“文革”思维就是“极端思维”。爱走极端，一会儿在这个极端，一会儿又跳到另一个极端。凡事都往极处做，不知中和，不留余地，就是这种思维的显著特征。

所谓“顶峰论”正是“文革”思维极端性的典型表现。林彪为了取悦毛泽东，说“高峰”

不够，一定要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从哲学上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达到“顶峰”。如称之发展到了“顶峰”，也就凝固，不再可能发展了。而偏偏是这种违反一般哲学常识的错误论断统治中国好几年，谁要不同意，就立刻会被打成“反革命”。我在大学的一位同学就因之被迫害致死。

这种“极端思维”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人对事往往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捺之入地。

对最高领袖和各种“红”事，极端崇拜。当时称领袖为“最敬爱”不够，要尊为“最最敬爱”。说的话正确不够，要“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平时注意学习不够，还须“早请示，晚汇报”，中午饭前朝领袖像敬礼，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街上刷一条或几条红标语不够，还要将所有的店面、房屋都刷成大红色，造成“红海洋”。

而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呢？则是“斗倒斗臭”不够，还要“踏上一万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批斗时，不仅要低头、弯腰，还要“坐飞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什么叫“坐飞机”了，就是两个批斗者驾着被斗人的双臂，一直扳到最上方，使被斗人头顶垂地，作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而且每次到食堂吃饭，都须低头认罪，唱“牛鬼歌”，交待自己的“罪行”，吃难以下咽的发霉变质的饭菜。这时人们的思维往往是极端和单向的，从来不转弯子，进行一下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想一想，如果自己处于被斗被打的境地，会是什么感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承受的痛苦，为什么要施于别人呢？然而，很少有人这样去想。倘若这样去想，有所表现，就会被批为资产阶级“人性论”，被打入另册，甚至落到被斗者同样的下场。似乎不对被斗者施以极端手段，就不痛快，不过瘾，不革命。

对古典文艺作品呢，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封、资、修大毒草，图书馆全封了，不许借更不许看。“十亿人只有十个样板戏”，只能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唱“革命歌曲”。

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工作，则全部否定，公、检、法和文化、教育等部门一律“砸烂”。干部多数被打倒，接受批斗、酷刑、劳改直到关进监狱，甚至含冤而死；知识分子不可信任，被当做“臭老九”送到工厂、农村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彻底改造。

总之，红则红得通红、红得发紫；黑则黑得透黑、黑得霉烂。无所不视其极，施其极，用其极，不达极处就不算“革命到底”。

鲁迅有句名言：“虚悬了一个‘绝境’，是要陷入‘绝境’的。”[1]这种极端性的思维只能使人陷入“绝境”。因为世界上，极善极美或者极恶极丑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都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对任何事物都须进行分析，不可绝对肯定，也不可绝对否定。要学会分析，学会中和，学会拿捏事物的“度”。鲁迅提出过“剜烂苹果”的主张：“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就将烂处剜去，留下好的吃。因为“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2]只会处在“绝境”中不可自拔。“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1975年让助手从《鲁迅全集》中找“剜烂苹果”的话，说明他后来也感到“极端思维”只能引人落入误区，是错误的。不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思维习惯，就不可能从“绝境”解脱出来。

二、运动型

“文革”思维是运动型思维。一有事由儿，就非发动运动予以解决不可。美之曰群众运动，林彪称之为“天然合理”。工厂停工，农业停产，学生停课，以“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名义，强迫人人参加，不可消极，更不可抵触。否则，就要受到群众运动的猛烈冲击，直

至死于非命。

我认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表现。其实，群众运动是天然不合理的。因为群众多种多样，鱼龙混杂，各色人物都有，各种主张都存在，闹不好必有人浑水摸鱼，把事情搅糟。“文革”中的“群众专政”就是例证。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就是对的，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例如张志新、李九莲等“文革”中的先烈，当时就看出这种疯狂运动的荒谬，但处于极少数，只能被残酷地杀害了。可以说，无论什么样的好事，一旦成为“群众运动”，就必定变成坏事。譬如读鲁迅的书，研究鲁迅，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当作“群众运动”来搞，全党全民无人不读鲁迅、“研究”鲁迅，就变成了坏事。当时的运动制造者出于一己私利将鲁迅的“打落水狗”等斗争词语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加以抽象化，变成一种政治口号传播给群众，将鲁迅歪曲得面目全非，根本不知鲁迅全貌的部分群众，按照被扭曲的鲁迅思想去行动，结果被教唆成了“打手”。以致使鲁迅在群众中产生了负面效应。像这样好事变坏事的现象，在十年“文革”中不胜枚举，比读鲁迅运动危害更大更严重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有什么人大轰大嗡、大张旗鼓地搞起运动来，就应当对此人高度警惕了！真正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实事，往往是在无声无嗅中静悄悄地办成的。真正的好干部，是低调、实干的；那种喜好张扬、大搞政绩工程的人，绝不是为人民的，很可能倒是大捞私利的贪官。作为知识分子，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思考精神，不可“从众”，更不可“媚俗”。

三、造反式

“文革”中流行最广的一句话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于是稍有不满意，就采取革命、造反行动。什么是革命呢？又会举出一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如此，就须以暴烈的方式造反，像李逵那样“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三闲集·流氓的变迁》）这样的“革命”和“造反”实在是“有罪”和“无理”的。任其泛滥，只能使人民遭灾。

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对革命就是有所分析的。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把“革命”分为两种：一种是“要人活的”；另一种则是“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对前一种革命，鲁迅表示欢迎，并英勇参加；对后一种革命则坚决反对，不仅“告别”，而且予以严厉的批判。因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文革”号称“革命”，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却是一场“教人死”而非“教人活”的浩劫。更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大革文化命”。像这样的“革命”与“造反”，但愿不要在中国重演！

当然，目前中国问题很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贪污腐败、黑恶泛滥、环境破坏等现象令人触目惊心。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按照“文革”的法子“革命”“造反”、打倒一切吗？不能的。倘若这样做，只能使情况更糟！中国绝对不能乱！乱了将不堪收拾！倒霉的只能是老百姓。最要紧的是在中国建立真正严格、公平的法制。使我们能够依照科学、理性的方式、沿着民主与法制的轨道，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应该是渐进式的，不可急躁、盲动、冒进；思想启蒙也应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式的。“震慑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改革是有阶段性的，人民的觉醒也是逐步的。现在最需要的是鲁

迅所提倡的“缓而韧”的精神！我同意胡平先生在《百年误读》[3]一书中的看法：“对于中国而言，1978年，决非一般里程碑的意义，其彪炳史册的辉光是，在一个从来缺乏英美改良传统、沉醉于法俄革命的磅礴激情的国度，倘若说，在1949年、1976年以前，她尚不具备改良的条件，那么到了1978年，邓小平、胡耀邦、叶剑英等老一代共产党人，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未经宣布却实际长期存在的战争状态，及时而又坚决地把握住了一个契机，一个从此将革命变为改良的契机。”如果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从政治上“将革命变为改良”的话，那么，当前就特别需要从思想上将“文革”思维变为科学的理性的思维。

四、暴力化

按照“文革”思维发展下去，必然是暴力化，从“文斗”变为“武斗”。开始时，还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提出“不要文，要武嘛！”马上收不住了，全国立即“暴力化”。红卫兵四处打人，打老师，仅北京市就打死了一千多人，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等被一群女生活活打死，其他学校的校长、书记、老师也被关进“牛棚”，被打死打伤难以计数。整个国家一片恐怖，还要美之名曰“红色恐怖”。似乎这也是一大中国特色，可以置不能随便打人的世界普遍准则于不顾，在所谓“红色”招牌下无法无天，草菅人命，并要标榜自己是“最最最革命”的。无论什么恶事脏事坏事只要披上“红色”的外衣，就化为最美好的事了。简直岂有此理！

自此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武斗，越来越厉害，直到十年后的1976年10月抓起“四人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才逐步平息下来。

因此说所谓“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武化大革命”，一场暴力化的恶性运动。这与人们头脑中存在着暴力化的“文革”思维是分不开的，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斗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崇拜脱离文明准则的“武化”行为。这样下去，就只能退化到野蛮时代，永远进入不到文明的现代民主社会。这个历史的血的教训，是应该深刻汲取的。可惜至今也没有真正从理性上进行剖析。

其实，“文革”思维就是一种野蛮思维，是人类处于低级、蛮荒时期的粗俗思维。它形成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也泛滥于个人专权的时代，并受到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水浒传》式中国民间“草莽”思维的浸透。人们受到这种思维的“驯化”和“奴化”，让这种颟顸、浑噩的思维方式在自己的头脑中跑马，就自然会混淆黑白、是非颠倒，把歪理当作真理，把邪道当成正道，不自觉地成为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帮凶和奴才，助长了悲剧的产生。悲剧之后，不要只是怨天尤人，更重要的是自省，深入内省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重新开始新的合理的生活。这绝对不是作者在教化别人，而是通过自己切身的痛苦经历所悟出的做人之道。

仅以政治观点的“左”或“右”区分人言的正确与否，也是靠不住的。有些人政治观点完全相反，一个是“左派”，另一个是“右派”，但深究他们的思维方式则可能是一样的一一都在“文革”思维中运转自己的头脑，只是表现形态不同罢了。有些人强烈反对“文革”及其制造者，但采取的方式和头脑中的思维活动与其反对者如出一辙，完全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极左”者一直往“左”走，“极右”派一直朝“右”行。然而地球是圆的，到头来，两人碰头、相遇了，方明白彼此是一个样，运转着同一思维，脸上大概会“热辣辣”的。由此可见，在理论与实践端正思维方式，根除“文革”思维，提高中华民族的理性境界是多么当紧！

人民惟望过长治久安、幸福合理、民主自由的生活，不希望社会动乱，也反对退回老路。人民的生活实践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应该以此为绳决定中华民族的走向，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清除封建专制残余影响，从理论上肃清“文革”思维的流毒。否则，这种思维总会打着各种各样的牌号，变换形形色色的面貌，卷土重来，使人民又遭遇难以自拔的历史大悲剧！

世人要警惕啊！

（原载2012年《随笔》第4期）

[1]《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2]《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3]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

赵惠中

我是北师大物理系64级的学生。是“文革”初期最早的造反派之一，由于对“文革”中一系列事件越来越看不懂，特别是在“余秋里问题”上，周总理要保余秋里，而戚本禹坚决要打倒余秋里，让人感到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我早在1967年春季开始就逐渐淡出了“文革”。因此既没被办“5·16分子学习班”，也没被军宣队、工宣队押送到怀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北师大早期造反派中极少数后期没挨整的几个人之一。淡出的含意是不冲在最前面了，但仍密切关注“文革”中的重大动态，所以至今尚有话语权。

综观北师大“文革”，它在全国至少有“六大最”：

1. 1966年7月16日孙有渔成为全国第一个被撤职的工作组组长；
2. 1966年11月份谭厚兰率队200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属全国第一大群众组织最先造孔夫子的反；
3. 1967年9月7日谭厚兰成为全国第一个被下属抓起来的革委会主任；

4. 1967年4月以井冈山造反兵团为主体猛烈“炮轰谢富治”轰动了北京市；
5. 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全国最后一个解散的群众组织，解散时动用了军队，一下子抓了100多人，状况极其惨烈；
6. 六四、六五两个年级的学生直到1972年4月才被毕业分配，是全国同年级大学生中最后一批被分配的。

下面就北师大“文革”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六·二〇”事件

在1966年6月1日前，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已被定性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而被砸烂，重新成立了以李雪峰为书记的新市委。北师大校党委难逃黑帮据点的嫌疑。所以在6月1日广播了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后，北师大立即出现了炮轰校党委的大字报，仅几天时间北师大党委就垮了。

6月6日，新市委就派出了以孙有渔（一机部副部长）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师大领导师大“文革”。可是好景不长，6月20日早上数一（2）的高树奎等十七位同学在北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一张题为“孙有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讲工作组进校后就把校党委一批干部集中在主楼办学习班，将他们与群众隔离开了，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短短一两个小时内获得了500多张大字报的支持。我与李庆林、武世文等共5位同学也贴了一张支持高树奎的大字报。

约8点，孙有渔作了广播讲话，大讲：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革命。说什么“一条游鱼三个浪，三条游鱼九个浪”，等等。于是北师大立即掀起了抓“反革命”“抓游鱼”的新高潮。此时我们5人就在我们自己贴的大字报附近听孙有渔讲话，孙有渔话音刚落，以教育系为主的一帮人在我班同学的引领下，就把我们5人推上一个木台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批斗。

从6月20日到7月16日孙有渔被罢官止，我们当了26天的“反革命”。在这26天中李庆林、我、武世文3人被批斗多次，有一次在物理楼110，是系工作组组织的。参加人多达几百人，整个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批斗会上“打倒×××！”“×××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口号声此起彼伏。会上反复追问我们到哪里去上访，见到了谁？说了什么？我们基本上采取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对策。此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工作组宣布我们3人为“反动学生”。批判我们的大字报贴在东饭厅东墙上，我们的名字上都被打了红叉，名字被倒贴。班上有的同学还动手打了我（这同学在我班2014年厦门聚会时特意为此事向我道了歉，我表示此事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我从来没追究过，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

当然我们也进行了抗争，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6·20”当天下午我们就到北京新市委告状，但新市委完全站在工作组一边，说工作组是新市委派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革命，与孙有渔的讲话如出一辙。我们只能无功而退。但内心很不服气，就又到“红旗”杂志社告状。“红旗”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与北京新市委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说：“工作组就是工作组，新市委是新市委，党中央是党中央，不能混为一谈。对工作组有意见，贴大字报是你们的权利，怎么会是反革命呢？”还给我们引见了林杰，林杰也明确表示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当时还认为自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是这个信念让我们坚持了下来。到后来才知道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是毛泽东给他设下的一个圈套。但是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

我们当时给工作组贴大字报到底是对还是错。

“6·20”当天《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是《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了。我们要站在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这个运动。要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让群众把意见充分地讲出来，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一个个地砸得粉碎。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革命的大字报好得很！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你一张，我一张，从各个方面，一下子就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露出了真面貌。革命的大字报，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揭露各种各样的矛盾。

我们是根据当时的中央精神给工作组贴了一张大字报，并且语言很温和，工作组就凭此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绝对是错误的。说起来有两件事很可笑。一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事与上层有什么牵连，我还通过我的清华同学找到了刘涛（刘少奇女儿），让她把我们的申诉材料交到刘少奇手中。用现在的话叫踢了一个“乌龙球”——自找死路。二是在7月1日，我们三人中无一个党员，我与武世文连团员都不是，还搞了个向党宣誓，实际上是在找一种精神寄托。现在可以说真相基本清楚，我感到自己受了毛泽东的欺骗，当然毛泽东不是欺骗了我一个人，而是欺骗了全国人民。

美国前总统有句名言：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本来面目被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总有一天他会被彻底请下神坛，他的罪行一定会得到清算。

在这26天中，我们多次到“红旗”杂志社上访，每次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在那次物理楼110被批斗后，我一人逃出校门找林杰投诉，林杰也问得很详细。到要离开“红旗”回校时已是凌晨二点左右了，林杰问我：现在已没公交车，你怎么回学校去？我说：那就走回去。林杰说：隔壁有个老大姐（我一共见过她三次）是个老革命，年龄这么大了，还在斗争，还在革命。我去问她一下，能否把你捎到学校去。

在回校的路上，这位老大姐也详细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当我说到我们到北京新市委上访遭到冷遇时，她插话说，“你们找错地方了。”当时我愣了一下，不知她说的什么意思。车到小西天离北师大还有一站路时，她说“为了安全，你就在这儿下车吧”。就是这次回宿舍时，同宿舍的人搞了个恶作剧：把扫帚与畚箕放在门框上，待我推门而入时，扫帚与畚箕砸在我的身上。

第二次见到这位老大姐大概在7月12日左右。那时工作组对我们不断升级，最后把我们三人分别安排住在西南楼301、303、305，也就是将我们隔离了，我们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连上厕所时后面都有两个同学跟着。全班分成三组，逼我们写交代材料。我们组的人说：你还这么顽固，他们两个早交代了，他们把你出卖了，你不要再这么死心塌地了，不要再为李庆林卖命了。在这种攻心战术下，我也有点动摇。心想写就写吧，到“红旗”告状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于是我开始写材料，主要是写过程，仍然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一天晚上，同宿舍的人威胁我说，上面有人把李庆林找去了，你就准备被抓进去吧。我听后觉得是上面派人来调查了，感到有救了。于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冲到校工作组设在中北楼的办公室，身后有两同学紧跟着。我也不知道李庆林在哪个房间（原是学生宿舍楼），随便推开一房间门，正巧看到李庆林在里面，而找李庆林的正是那晚送我回校的女同志。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抬起头来看到了我，也看到了我的盯梢，她认出了我，对我说：“你先回去，以后再找你。”

第三次见到她是在7月16日。那天下午约四点左右，突然有好几辆轿车开进了北师大，那时对我们的监视稍放松了一点，我正好在新二教室边的路上，当轿车驶过我身旁时，我无意识地往车内看了一下，看到车内就是那晚送我回校的老大姐，她正好抬头也看到了我，并对我微笑了一下。就在这晚上，在北饭厅召开了全校大会，会上那位老大姐（此时我才知她叫曹轶欧，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是康生夫人）与吴德讲了话，宣布孙有渔犯了严重错误，撤消他北师大工作组组长职务，勒令他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同时宣布刘卓甫取代孙有渔任工作组组长。孙有渔成了全国第一个下台的工作组组长。

后来我才知道，“中央文革”已领到了圣旨，以工作组镇压群众为名开始反攻了。7月25日、26日“中央文革”全体人马连续两晚到北京大学撤消了张承先工作组，7月27日又到北师大撤消了刘卓甫工作组。撤工作组的理由是工作组镇压了群众，是“文革”的绊脚石，号召群众踢开石头闹革命，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彻底闹革命。会上为因贴工作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了反，我也从此获得了彻底的平反。

“六·二〇”事件是北师大标志性事件，在这事件中至少有几百人被打成“反革命”，他们后来的情况我不清楚，应该与我们大同小异。因为校党委垮得快，所以后来的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实际上是以“反对工作组”还是“保工作组”而划分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目的是要把“文革”纳入有序的轨道，要有领导，要稳，不能乱来。他的做法明显与毛泽东是不一致的，但是刘少奇不能明讲，只能暗抗。下面的群众是不知道上层这种分歧的，如果有敏锐的分析能力是能够感觉到这种细微的差别的，因此就出现了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事。虽然后来林杰、曹轶欧都插手了此事，但是我可以断言，高树奎等同学跟我们给工作组贴大字报都是自发的，与上层无关。工作组与刘少奇把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学生打成反革命还是错误的，这是刘少奇的失着，这也导致了刘少奇被说成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彻底打倒而退出了政治舞台。当然，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他不派工作组必然会说他放弃领导搞乱全国而倒台。此时的刘少奇已是毛泽东砧板上的肉，只能随毛泽东任意宰割了。

二、谭厚兰

讲北师大“文革”，身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是绕不过去的人物。谭厚兰是政教系1961级（1）班的班长，是个调干生，当时已29岁了。“文革”前被借调到“红旗”杂志社帮忙（大概是做批“海瑞罢官”的资料收集工作）。

1966年6月1日，谭厚兰在得到要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消息后，立即同历史系同在“红旗”的三位同学一起从“红旗”匆匆赶回学校贴了第一张炮轰校党委的大字报，抢了反党委的头功。当然也被视为反动学生，右派学生。但是在“6·20”高树奎反工作组大字报贴出后，谭厚兰不仅没有支持高树奎，反而贴大字报支持孙有渔的工作组，听说她还参加了支持孙有渔工作组的游行。可是仅隔了三天（6月23日），谭厚兰与同班的三位同学又贴了一张大字报，表示重新支持高树奎，反对工作组。谭厚兰因此再次被打成反革命。实际上是她被林杰找去训了一通，经过林杰面授机宜后才反戈一击的。

从此可以得到两点结论：1. 北师大的“文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群众运动，而是由林杰等人（背后是“中央文革”）幕后插手与操纵的，所谓“不要保姆”，只是反对工作组与刘少奇的一句托词而已。谭厚兰6月1日与6月23日两次贴大字报都是为了捞政治资本，为她登上北师大政治舞台作准备的，她是“中央文革”安插在北师大的一颗棋子；2. 谭厚兰本人

并无多大主见，在这一点上与蒯大富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她一切都听林杰的，离开了林杰她什么都干不了。这也是1966年10月底井冈山红卫兵内部分裂的根本原因。

由于有靠山，谭厚兰红极一时。在1966年7月31日有一个叫李春秋的教师贴了一张题为“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的大字报，说什么要“恭恭敬敬地做谭厚兰的小学生”，“要紧跟谭厚兰彻底闹革命”，等等，真是荒唐之极。

谭厚兰因为有靠山，所以在许多事上都冲在前面。1966年11月在戚本禹、林杰（亦说康生）授意下，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她亲自率队200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在曲阜的二十九天，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7年在江青授意下，谭厚兰率千余人冲击农业展览馆的学大寨展览会，高呼炮打谭震林口号，她是反击“二月逆流”的急先锋，号称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在1967年8月23日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闹剧中，北师大井冈山也是领头羊之一。同年谭厚兰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到处揪军内一小撮，积极参与揪刘火线，反对周总理等活动，影响力极其广泛。与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同为“地派”领袖，在院校武斗中起了恶劣作用。

1968年10月，谭厚兰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劳动锻炼。1970年6月，她被调回北师大作为“五·一六”分子被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据说她交代得比较彻底，认罪态度较好。1981年，谭厚兰被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终年45岁，一生未婚。纵观谭厚兰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她的最后十多年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度过的，也算是一种报应。但说到底她只是毛的马前卒，是只可怜的替罪羊。

三、林杰

林杰虽然不是北师大的人，但是他对北师大“文革”是举足轻重的。谭厚兰一举一动的背后都受林杰操控，把谭厚兰比作一木偶，林杰为木偶演员最为恰当。

林杰是《红旗》的编辑，陈伯达是主编。但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成员，林杰便是不是主编的主编。在北师大，只要说这是林杰说的，就意味着这是“中央文革”说的。

谭厚兰第一张反校党委的大字报是从《红旗》赶回北师大贴的，谭厚兰“6.23”反工作

组的大字报也是在林杰的授意下贴出的。在北师大，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林杰是“中央文革”的传声筒，谭厚兰是按林杰的旨意操作的。更应该提到的是1966年7月27日晚上，“中央文革”倾巢出动光临北师大，康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我来介绍一个人，他就是林杰（让他站到台前）。他是你们北师大的校友（1960年代初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他很关心你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有事可以去找他。（原话记不清楚了，这是大意）事后，林杰曾得意地说：今后我再过问北师大“文革”就师出有名了，是康老让我出面的。从此以后，凡是北师大的事，他都要插手，俨然成了北师大“文革”的编外顾问。

北师大造反派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23日，当时仅有100多人，所以取名为井冈山战斗团，意为像当年的井冈山一样会发展壮大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中文系五年级的郑云云任团长，谭厚兰任政委。成立当天还在物理楼北门口搞了个宣誓仪式，引来了不少人驻足观看。几乎同时，保守派也成立了红卫兵，因为他们人数多达几千人，所以取名为红卫兵师。但是胜负的决定并不是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谁能紧跟“中央文革”。大概在九月底或十月初，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与两报一刊接二连三的社论猛烈攻势下，刘少奇垮了，红卫兵师完全无力招架，只能土崩瓦解了。

面对红卫兵师人多势众，井冈山内部能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但随着红卫兵师偃旗息鼓后，井冈山内部的分歧立即突出出来了。大概在10月初，井冈山搞了一次内部整风，谭厚兰的目的是想把郑云云说成是井冈山内部的赫鲁晓夫，把他从团长的位置上拉下来。但是以郑云云、李庆林为首的许多人在这次整风会上也提了很多意见，而最后的焦点就集中到林杰的身上。理由是“中央文革”在“7.27”大会上反复强调，今后不再派新的工作组来了，你们不需要保姆，你们要自己解放自己，要踢开石头闹革命。现在井冈山一切都听林杰的，林杰是不是新的保姆？如果林杰错了，我们怎么办？

我觉得这些话有道理，就站在郑云云这一方了。但是支持谭厚兰的人数还是占多数，他们强调林杰后面是“中央文革”，跟着“中央文革”是绝对不会错的，就好像进了保险箱一样。两派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闹得不欢而散，只能分道扬镳。

从事后的演变证明，林杰是伸向北师大“文革”的一只黑手，谭厚兰干的坏事基本上都是按照他的指令执行的，所以说林杰给北师大“文革”带来的是灾难。紧跟谭厚兰的那些骨干后来几乎都被请进了“5·16”分子学习班就是明证。郑云云、李庆林等能及时地指出要与林杰脱钩的意见是明智的。

四、“十二月黑风”

1966年12月15日，北农大附中学生刘握忠（伊林）、张立才（涤西）以“伊林、涤西”笔名写了一封给“林副主席”的公开信，抄成大字报贴在清华大学。他们是在看到了林彪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的讲话记录后觉得林彪讲话中有些提法不妥而写。伊林、涤西大字报的内容，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批评林彪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二、批评林彪要在群众中抓反革命；三、提出要“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影响下，12月9日与11日北师大分别出现了两封给林彪的公开信。一封是中文系的张传亭（向东彪）与敦进田（林锋）写的，另一封是我们物理系的刘中柱与杨以鸿写的。刘中柱、杨以鸿大字报的标题是：《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两封公开信的主要内容都是批评林彪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刘中柱与杨以鸿在大字报中强调：无论是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事物总是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也是要不发

展的。把毛泽东思想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岂不是要窒息毛泽东思想，使其不再有所发展？这两张大字报贴出后，物理系的李文博与数学系的李世取（黑牛）公开表示支持。在北航等院校都有人响应伊林、涤西，因为此事发生在十二月，所以被称为“十二月黑风”。

据我了解，刘中柱、杨以鸿贴林彪大字报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他俩一开始就怀疑“文化大革命”，都不迷信权威，都希望生活在民主和科学的氛围中。1965年，当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时，他们班正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劳动实习。当读到这篇文章，他们顿生疑窦，这样的文章是科学的吗？恰好他们班孙光启同学的舅舅李大可是中国戏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孙光启和他们一样怀疑这篇文章。由孙光启联系，他们三人拜访了李大可先生。可能由于戏剧研究院已经决定了方针政策，李大可先生表示理解和支持姚文元文章。刘中柱和杨以鸿与李先生辩论了近三个小时，互相说服不了对方。过一段时间，中文系四年级的金宏达（时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对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公开为吴晗辩护。

1966年12月，为躲开学校的嘈杂，刘中柱、杨以鸿、孙光启和李观韶四人到北京教学仪器厂，边劳动边休息。当时刘中柱和杨以鸿对“文化大革命”已持否定态度，但没有表达的机会。伊林和涤西的《公开信》给了他们机会。当时杨以鸿的观点为，毛主席作为绝对权威已是不可接受的，现在又加一个不能动的权威——林副统帅，更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接受毛主席作为绝对权威是迫不得已的，决不能再来一个绝对权威。刘中柱的看法较为实际：中国一定要有民主，民主就会有不同意见，不同的意见不等于反对。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和科学，将不可能得到发展。“文化大革命”将不同意见视作反对，进而视作反革命，这是不可接受的。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较量一下。本质上他们的大字报就是间接地表达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心声。刘中柱说：至于大字报的对象具体是哪个人，并不重要。那时候对林彪个人，并无特别恶感，只不过认为，他的一些讲话不像话，不像是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领袖而已。其他人的情况该与此类同。

刘中柱、杨以鸿的大字报是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写好后带回学校贴出的，贴了后又返回工厂。12月17日凌晨三时，谭厚兰就派手下人把他们两人从工厂揪回学校的小红楼看管起来，同时被看管的还有张传亭和敦进田。当晚就在北饭厅召开了批斗刘中柱、杨以鸿、张传亭、敦进田四人的全校大会。12月19日外语系的董连猛又把他们四人在外语系批斗了一次，随后就把他们四人押送专政机构了。20日、21日又相继把李文博和李世取抓走了。他们在监狱中被关押了半年之久，备受折磨。放回校后又被实行“群众专政”，强制在校修建队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才被解除劳改。

虽然此事的涉及面较小，但是是冲着林彪去的，其震动是相当大的。众所周知，在中共八届十一全会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他的地位一下子上升为第二位，排在了周总理前面，成了毛泽东唯一的亲密战友。尽管大字报的作者们使用的语气相当温和，但他们遭到的镇压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它也是北师大“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之一。

现在为林彪翻案的呼声很高，我也同意该对林彪作出全面评价，不能一棍子打死。但是林彪肉麻地吹捧毛，说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把毛泽东推到了至高无上的高度，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在“文革”中林彪所起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至于后来他与毛泽东及“四人帮”之间的斗争到底是权力之争还是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斗争，我因缺乏资料无法判断。但不管怎么样，在林彪位高权重的1966年，像伊林、涤西、刘中柱、杨以鸿等对他提出质疑是面临极大风险的，是无私无畏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五、井冈山造反兵团

井冈山内部的整风导致了分裂。初期的井冈山红卫兵因强调是造反派，又要注意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所以人数不多。产生意见分歧后更显得力量薄弱。于是谭厚兰就搞了个“井冈山公社”，吸收了许多人，包括从红卫兵师退出来的绝大部分人。这样她就一下子扩大了队伍，变得兵强马壮，在北师大占绝对优势。

没多久，原井冈山红卫兵的少数派就分裂出来成立了一个“井冈山造反兵团”，总负责人是李庆林。具体哪天成立我已记不清楚了，好像是在1967年春节前后。因为1966年12月底我串联到重庆中梁山煤矿，突然接到家信说我母亲身体不好，我急着赶回家，直到过了春节后才返校，回校后发现已有了井冈山公社、造反兵团和军训团。我回校后发了个声明，不承认井冈山公社，从井冈山退了出来。但也没加入造反兵团，成了散兵游勇。也搞不清什么时候来了个军训团，来了以后重点就是找李庆林他们，说他们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要夺谭厚兰的权。在高压下李庆林他们只能解散造反兵团。这次的造反兵团是短命的，可能不满两个月。如果翻阅当年的《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应该能找到关于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解散的报道《在北师大的军训团是如何支持左派的？》及配发的社论。

兵团解散以后，李庆林基本上不活动了，但王颂平等一部分同学仍不甘心，继续开展地下活动。到王力、关锋、林杰相继倒台后于1967年9月7日宣布恢复活动。我从内心是支持他们的，在他们最困难时公开加入了造反兵团，成了一名兵团战士。但因对他们提的一些口号感到有点太极端，对他们经常冲击会场的做法不认同，所以没参加过兵团的具体活动，只是一名挂名的团丁。

总的来说，我认为造反兵团与林杰脱钩是正确的，兵团的头头不是“一小撮坏头头”，而是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敢于掀起“倒谢（富治）”是值得敬佩的。在谭厚兰“围攻工五楼”时没有投降也该肯定。在当时，造反兵团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完全有存在的理由和权利，但自始至终没得到上层的承认与支持，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能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不能顺势而为，没有在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及时解散造反兵团，成为全国最后的群众组织，导致在1971年4月26日被军、工宣队“一锅端”（被押送到怀柔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也不清楚抓他们的罪名是什么，最后怎么又放了他们，给他们的最后结论是什么，所有这些可能都是一笔糊涂账。

六、“九·七”事件

“九·七事件”是北师大“文革”中特大的转折性事件，详细过程大致如下：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20事件”。“百万雄师”为了要求中央承认他们为革命群众组织扣押了王力，后来在总理干预下，王力才被安全接回北京。7月25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声援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百万人大会，王力作为英雄受万人瞻目。可是仅隔了一个多月，到八月底就传出了王力、关锋、林杰相继倒台的消息。据说原因是两条：1. 王力在8月7日发表了著名的“八·七讲话”，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要夺外交部的权；2. 8月1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这“八·一社论”就

是关锋起草、林杰执笔定稿的。

就在8月26日，毛泽东做出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令他们“请假检讨”，令戚本禹停职检查。林杰跟着王、关一起进了班房。戚本禹是1968年春彻底下台被送进秦城监狱的。

王力、关锋、林杰倒台的消息立即轰动了北师大。有关王、关、林的大字报大量涌现。此时的谭厚兰慌了阵脚，好像热锅上蚂蚁，不知所措。由于利益所驱，竟然在9月1日晚上，还召开了一次保林杰的表忠心全校大会。在会上，谭厚兰声嘶力竭地叫嚷：现在校内出现了大量反对王力、关锋、林杰的大字报，这是炮打“中央文革”的，是反革命逆流。林杰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他坚定地支持我们井冈山，他与我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见附录14）说到此处竟然声泪俱下。谭厚兰甚至还派革委会副主任董连猛率大队人马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以示声援林杰。

但是北师大的形势绝不是你谭厚兰几滴眼泪所能扭转的。被压垮的造反兵团决定在9月7日恢复活动。更没想到的是谭厚兰的后院起火了。以北师大革委会常委樊立耀、黄家林、李五全为首的井冈山公社的内部对立派捷足先登，于9月6日晚上抢先把谭厚兰抓了起来。在9月7日上午约七点多，樊立耀等人都在大操场宣布了这一消息，同时宣布成立了一个由十几个人组成的专谭厚兰政的“专政委员会”，主要成员是樊、黄、李等一些校革委会的委员再加上李庆林与即将恢复的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几个头头。樊立耀等人还让郑秀梅（谭厚兰同班同学，6月23日谭厚兰大字报签名者之一，谭厚兰的秘书）上台揭发谭厚兰，郑的发言中还暗示了谭厚兰与林杰有不正当关系。

虽然我对谭厚兰是反对的，但对用这种把她抓起来的方式觉得有些不妥，于是去找李庆林问个究竟。约十多分钟后我在物理楼碰到了李庆林，我问他：“你进‘专政委员会’的事知道吗？这么大的事怎么连招呼也不给我打一声？”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的话我就去说明你不知道，不承认此事。”李庆林表示同意。当我赶往大操场主席台时，正遇上造反兵团宣布恢复，随即浦寿章（可能是别人，记不清了。）表示造反兵团与“专政委员会”无关，我当即抢下浦寿章的话筒，说李庆林也不知道“专政委员会”的事，不参加这个“专政委员会”。

因为抓谭厚兰与造反兵团两件大事，北京“天派”的各大组织像潮水般地涌进了北师大，蒯大富、韩爱晶等著名人物也亲临北师大助阵（也有人说他俩躲在北京电影学院幕后指挥）。但是到了傍晚七点左右，形势急转直下，在不到半小时内连续来了下列三道命令。此消息刚宣布，北京“地派”的人就纷纷到北师大游行声援谭厚兰。9月7日一整天，上午“天派”、晚上“地派”到达北师大的人数高达10万人次。

对于“九·七事件”，我的看法是：

1. 此事件是惊动了最高层的，之所以保了谭厚兰并不是说她没问题，而是她占了革委会这块招牌的光。上层是怕别人仿效，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新生的革委会相继垮台。虽然谭厚兰暂时稳住了阵脚，后来还搞了武斗，对造反兵团占据的“工五楼”断电、断水，最后极其疯狂地“围攻工五楼”，但是掩盖不了她色厉内荏的本质。我认为从“九·七事件”开始，她的威信在北师大直线下降，从此走上了下坡路，所以我认为“九·七事件”是北师大的转折性事件。谭厚兰宣称与林杰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这是不打自招地承认与林杰上了同一条贼船。现在林杰倒台了，那上了林杰贼船的谭厚兰一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

2. 井冈山造反兵团当场宣布与“专政委员会”无关，我也代表李庆林当场宣布李庆林不参加“专政委员会”。这足以证明造反兵团和李庆林没有参与樊、黄、李等人抓谭厚兰的幕后策划，与“专政委员会”没有任何牵连。也就是说造反兵团恢复与“九·七事件”是毫无关联的两回事。

3. 对于樊、黄、李等人为什么要抢先抓谭厚兰我并不清楚。他们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抓谭厚兰是错误的，没征得本人同意就将其塞入“专政委员会”的做法是错误的。但要说他们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我认为也不恰当。他们的行动只是过激了一些，到了1970年6月谭厚兰不是被军、工宣队押回学校办“5·16分子学习班”吗？需要追查的问题都是“九·七事件”前所犯的事。“四人帮”倒台后，1978年4月谭厚兰不是仍被抓吗？要不是她身患绝症，照样会判她十多年徒刑的。

七、工作组、军训团、军宣队与工宣队

在北师大“文革”史上，上级一共派了四支队伍：工作组、军训团、军宣队与工宣队（以下简称为工宣队）来领导过北师大“文革”。工作组是从1966年6月6日到7月27日，军训团与工宣队进校、离校时间不详。军训团是在1967年初进校，何时离校不清楚。工宣队是1968年8月初进校，直到我们1972年4月底离校时还没走。

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因镇压反对工作组的群众，被说成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革”的绊脚石，被称为保姆，最终被赶出了学校。军训团可能是毛泽东派的，工宣队肯定是毛泽东派的，这两者都是体面地离开北师大的。但是从实质上来讲，军训团、工宣队与工作组同样是保姆，所以说驱赶工作组的理由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

工作组把对他们提意见的群众打成反革命，至今我仍然认为是错误的。军训团还算温和，但他们仍然采用了压服的办法解散了造反兵团，是支一派压一派。工宣队办了大量的“5·16分子学习班”，最终连谭厚兰都没有被定为“5·16分子”，那她下面的那些骨干更定不了，所以绝对是打击了一大片。

在这期间，井冈山的作战部副部长王瑞龙（数学系）对抗工宣队，跳楼没死但摔断了腿，后来开全校大会进行批判，并当场作为抗拒典型逮捕法办，不知他何时被释放，最后是如何定性的。同是数学系的李竞权，赶到北医三院看病时（有人押送），从医院的楼上（听说是头朝下）跳下当场死亡。又把不听话的造反兵团头头与骨干以及部分“大海航行靠舵手”头头与骨干（造反兵团的同情者）（具体人数不清楚，至少几十人，可能接近100人）押送到怀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我看来，这些上级派下来的领导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唯上是命，是执行上级领导指示的工具。只要听他们的话就可平安无事，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就会遭到反感，严重的会遭到镇压。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工宣队办的最后一件事是毕业分配。我们69、70两届学生应是在1970年7月分配，但因抓“5·16分子”而延期分配，一直到1972年4月才分配。我们64级学生虽然只念了两年书，但却在学校待了八年，整整一个抗战，大家戏称是研究生毕业。当时分配的原则是四个面向（工厂、农村、基层、边疆），所以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基本上无名额。有人从分配结果总结出来的规律是：成对的边、远、差；单吊的做填充；已婚的就近解决。这在当时也算无可非议。但因1966、1967、1968三届统统扫地出门（无一人留校），所以北师大出现了教师无人接班的窘境，故在我们两届分配时出现了部分留校名额。别的系我不清楚，估计也与我系类同，我系69、70两届共有10多人留校。按理来说，留校是当教师的，应该留学习成绩好

的，但是我年级却留了一个最差的。此人大一时是全年级唯一的“普通物理”红灯高挂者，据说后来因无法胜任教学任务自动调离北师大了。而物二（5）班的王XX是一致公认的佼佼者，却分到了辽宁丹东东沟公社中学。

为了把问题讲透，我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王XX。她是北师大女附中毕业的，高一时参加北京市高二的数学竞赛获二等奖，于时跳了一级直接读高三，第二年参加北京市高三数学竞赛时又一次获得二等奖。毛泽东在1964年举行过一次春节座谈会，邓小平插话说：我女儿有个同学跳了一级，成绩还是名列前茅，我看应该允许跳级么。说的就是王XX。她1964年高考时是全国理科第三名（当时是全国统考），她的第一志愿是清华。清华录取她后发现其父母都是右派，只能把她吐了出来。后来女附中领导出面要求师大收下她才进了北师大物理系。在“文革”运动中，她是同情造反兵团的，结果也被押送到怀柔去。她1978年以特别突出的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天体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两年后拿到硕士学位，留所工作。1984年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就代表美国出席了国际天文学会南京会议。还获得过全美有色人技术全能明星奖。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在国内被当棵草，在美国却被当作了宝。从这件事上完全可以看出用政治观点录用是何等的荒谬。

另外一件事也必须带上一笔。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三人都是1968届的，应该在1968年12月份毕业分配。因为是“反革命”，当时不给分配，于时就安排到我们年级来了。刘中柱到1班，杨以鸿到我们4班，李文博到5班。我们分配时已是1972年4月份，林彪早在1971年9月13日就摔死在温都尔汗了。杨以鸿说：我是1968届的，到现在刚分配，用人单位一定要问个为什么，我没别的要求，只要求你们把我们当时写的给林彪的公开信放入我的档案就行了。我认为这要求合情合理，可是工宣队就是不同意，还说什么林彪在1966年是党中央副主席，你们那时反对他还是错的。真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我估计刘中柱、李文博一定也是同样遭遇。物一（3）蔡鸣乔，因同情兵团被抓到怀柔。从怀柔释放后，大多数同学获得了自由，但他又被宣传队以“怀疑康生”为理由继续单独隔离审查。在毕业分配时，还将“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康生”写在他的档案中，宣传队负责人白本章说：“给他记一笔，叫他老实一辈子！”由此可见，宣传队对我们学生的政治生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其实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有关他们后来的成就，参见本书《北师大的“12月黑风”与“修建科劳改队”》及《怀念“插班生”杨以鸿》二文。

可以设想，如果林彪不是惨死，“四人帮”不打倒，王XX、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等一定是永无出头之日，整个中国仍然是漆黑一团。

八、北师大“文革”的暴力及其造成的危害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现在就看看北师大是怎么横扫的吧。党委书记程今吾被迫害致死，跳楼自杀的有政教系的石磐、马特，物理系的祈开智等教授。教我们“普通物理”的赵亮坚副教授上课无一句废话，每堂课一气呵成堪称完美，深受学生欢迎。他的夫人王蓉老师是物理系办公室主任，办事干练泼辣，广受好评。但因赵老师毕业于辅仁大学物理系，与王光美是同学而被怀疑为特务，他们夫妇俩于1968年4月8日双双触电自杀。中文系学生张瑞棣在主楼七楼摔下而亡，原因不详。（其同学与家人怀疑被对立面从背后推下），数学系学生李竞权跳楼身亡。全校这类非正常死亡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详细统计数字，估计在50—100人之间。

外系的情况我不清楚，物理系何秀琴、金永龄等系领导被打倒批臭，物三的刘中柱、杨

以鸿、李文博因在1966年12月给林彪贴大字报被抓，物二（3）班的许永康因言获罪被送进总务科劳改队。我们班总共才25人，前后至少有5人次（武世文一人两次）被打成“反革命”“5·16分子”等。其中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押送怀柔专政。杨以鸿是1968届的，本应在1968年12月分配，就因为“反革命”不给分配，转到我们班来了，因此我班的人数也可认为是26人，那么当过反革命的比例高达20%以上。我班是重灾区，如果平均以10%计算，那全校师生员工中被打成各类牛鬼蛇神和反革命的人数不下1000人。

应该承认，大学生比中学生要理性一些，像女附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的事没发生过，但惨不忍睹的事也是层出不穷。让老干部与教授们戴高帽子、游街，批斗他们时搞喷气式等是应有尽有，一项不缺。有些同学可能是为了表示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定，在批斗会上的行为让人至今心有余悸。例如物一的岳××与刘××在批斗物理系党总支副书记吴碧华时多次猛揪吴碧华的头发不松手，好像对她怀有刻骨的深仇大恨似的。在批斗彭德怀元帅时，让早与他离婚的浦安修（北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陪斗，让彭德怀示众时，因他是光头无头发可揪，干脆拎着他的两个耳朵让其示众。我也搞不清当时的押解者是怎么想的，也许他们认为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应该千刀万剐。但我认为，他们肯定也知道毛泽东曾写过“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也知道彭德怀是开国功臣，在十大元帅中排行第二，也知道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我真“佩服”他们真能下得了手。北师大批斗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人时大概在九月份，北京的气温还较高，但他们都穿着棉裤，据说是因为长期跪着批斗导致膝盖溃烂。罗瑞卿因不堪受辱，曾以死抗争跳楼自杀未遂时摔断了腿，但还是不放过他，他是被用箩筐抬上台的。真残酷，真悲惨！

从1966年6月1日开始，全校基本上停课搞运动，连校办工厂的工人也停工不生产。这方面造成的损失虽然是无形的，但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的损失是精神方面的。造反兵团虽然只有100多人，但是他们的同情者与支持者是大量的，几乎占到全校人数的50%，每个单位都分裂成对立的两派。我班只有25人，“文革”前只有极少数同学之间有点意见，但都属正常范围内。但是“文革”中就分成对立的两派，互相之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1972年毕业分配时全班没留下一张合影，同窗八年分别时互相不留地址，不知对方分在何处，甚至连告别一声都没有。导致了1999年“毕业30年聚会”时部分同学根本没接到通知，2002年“百年校庆”时返校人数才增到50%以上。直到2010年举办“上海世博聚会”时才把25人找齐，2014年我班又在厦门搞了一次“入学50年聚会”，通过这几次聚会，大家才消除隔阂，重新融合在一起了。但是最近又因对毛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上观点相悖，重新出现了分裂迹象，我班的微信群已“一分为二”。我认为政治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沟通，如果不能统一也无所谓，求同存异就是了。从现在的情况看，几次聚会的努力又将付之东流了。

一个班级、一个学校是全国的缩影。全国范围内，“文革”中因政治观点不同导致亲友断交、父子反目，夫妻离婚的事比比皆是，整个社会好像被撕裂了。大学不招生，中小学只学毛语录，文教、科技、卫生都雪上加霜，整整耽误了一代人。中共前退休部级官员、现任中山大学教授于幼军最近在首个“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系列讲座中说：据不完全统计，230万中共官员被“立案审查”，约占“文革”前全国官员总数1200万人的17.2%。近3万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官员被“审查”，占部委官员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官员，被审查或遭打击迫害的高达75%；军队8万多人遭诬陷迫害。经济上，十年动乱使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相当于中共建政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

30年中共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几乎没有增长。如1966年人均粮食379斤，食油3.5斤，猪肉14斤，1976年依次分别为381斤（只多了两斤），3.2斤（下降0.2斤），14.4斤（上升0.4斤）。

于幼军还说：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不仅迫害死了无数无辜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群众，而且中共各级官员也难逃其难，包括上至中共国家主席，下至中共普通官员很多也惨遭迫害致死。

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1亿人被迫害，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元。此外，“文革”还使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其负面影响，恐怕几代人也难以消除。

但是，上至刘少奇下到平民百姓非正常死亡到底死了多少人？国民经济损失了多少？官方至今仍无确切数字公布。是无法统计还是统计了不敢公布？

九、红卫兵

1966年初，清华附中、北大附中首先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代表人物是清华附中的骆小海、王铭、卜大华与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没多久，红卫兵就在北京各中学蔓延开来。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后来又写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与《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在《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中，引用了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骆小海等把“前二论”交给了江青，请江青转交给毛泽东。毛看后给予高度评价，在给他们的回信中反复表示“热烈的支持”，并强调“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8月1日后，北航、清华等大学里的高干子弟们抢先成立红卫兵，但影响不大。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把红卫兵的袖章套在了毛泽东的衣袖上，毛泽东成了名符其实的红卫兵的红司令。从此以后各大学的红卫兵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起来了。造反派成立红卫兵，保守派也成立红卫兵。就像北师大的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与红卫兵师一样。反正既不需要注册、登记，也不需要什么人批准，只要观点相同的，贴个成立宣言，买个红袖章往衣袖上一套就大功告成了。后来工人、农民与各行各业纷纷成立“工人造反派”“农民造反派”等，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个红袖章，实际上也是红卫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专政对象”“黑五类子女”、老人、小孩等一部分人以外，几乎达到了“全民皆兵（红卫兵）”的程度。“红卫兵”三字后来演变成“文革过来人”的代名词。最近看到北大钱理群教授的文章，把上一任与当今当政者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都划入了红卫兵队伍中。

众所周知，“文革”中红卫兵犯了许多错误。打死人、扫四旧、批斗老干部、老教授、参与武斗等都是红卫兵干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样笼统地说有失公允。参与上述活动的人数是很多，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只是红卫兵中的少部分人，并不是全体，并且里面有不少高干子弟活跃在其中。

例如：北师大女附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就是以高一（3）一帮高干子女为主体的学生所为；北京大兴县屠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的事也是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所谋。而这

类高干子女因有丹书铁券罩着，不仅没受到任何惩罚，却还步步高升，薄熙来是已经倒台的一个特例，还有不少人成了现在的党、政、军的高官。

但是还应该看到，这些事实际上是得到上层的支持与默许的。干坏事的人当然难辞其咎。全国各地类似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人物，绝大多数被判了刑，但奇怪的是发动“文革”的人不仅不承担责任，而且还被当作伟大领袖继续歌颂，且大有重返神坛之势。

从大学的红卫兵来看，大部分人没有参与打死人等极端行为的事。多数人除了参与斗本校的老干部、老教授外，最大的精力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卷入了上层的内斗中了。绝大部分人是认真分析研究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等首长的讲话，不断地寻找下一个猎物。盲目地跟着今天炮轰×××，明天打倒×××。但也不乏头脑清醒者，所以才会出现“炮打张春桥”“打倒谢富治”等壮举。到了中后期，许多人已不再紧跟“中央文革”而作壁上观，有的已暗暗地与“中央文革”较上了劲。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十里长街百万人冒着严寒为周总理送行、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便是明证。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时，个个眉开眼笑、弹冠相庆印证了人心所向。

现在的电影、电视，几百年前的宫廷大戏一部接一部，那些违背历史的抗战神剧、并非正义的谍战、内战更是连篇累牍。但无一部专谈不到半世纪的“文革”片，似乎“文革”在中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是涉及也是公式化：红卫兵在搞打砸抢，在批斗老干部、批斗老教授。它们似乎在告诉人们，“文革”是红卫兵搞的，红卫兵是“文革”的罪魁祸首。

我对此极为反感。虽然中央有文件，承认“文革”是十年浩劫，但奇怪的是却不让大家分析“文革”产生的原因，研究防止再次发生“文革”的措施。现在有人说，毛主席是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犯了错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认为：全中国有良知的人都会认定，“文革”的罪魁祸首非红司令莫属。真不明白当局者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对此讳莫如深？

2015. 12. 19于上海

原载《记忆》150期

关于“6.20事件”的补充与思考

赵惠中

1966年6月20日清晨，数学系65级（2）班高树奎等十七位同学，贴了一张题为《孙友渔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指出了工作组进校后，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转移斗争目标，玩弄舍车马，保将帅的伎俩，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方向性错误。”[1]一石激起千重浪，在一个多小时内马上有几百份大字报响应，纷纷表示支持高树奎等同学的大字报。我与同班的李庆林、武世文等同学也写了一份支持高树奎等同学的大字报。在这时还出现了一份物理系63级（2）班王运良同学从别的学校转抄过来的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质问郭影秋，彭真黑帮要到人民大学驻兵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

约八点，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立即作了广播讲话。一开口就拉长了腔调说：我是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今天早上有人给我贴了几张大字报。接着就大讲特讲：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革命。他们要“反党”、要“夺党的权”。然后就把话题转到了王运良大字报上，说这大字报是造谣，是无中生有，目的是要流人民的血，流军队的血。王运良转抄的大字报只是一份，与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相比完全可忽略不计。孙友渔把几百张大字报轻描淡写地说成“几张大字报”，对大家提的意见没有半条应答，但在讲话中却用4/5的时间讲所谓彭真政变问题。反复说什么“一条游鱼三个浪，三条游鱼九个浪”，等等，言下之意即“贴工作组大字报的就是‘游鱼’、就是‘反革命’”。在孙友渔讲话的煽动下，北师大立即掀起了抓“反革命”“抓游鱼”的高潮。孙友渔话音一落，我们大字报上签名的五个人立即被推上北饭厅东侧的一个临时木台上进行了批斗。立即出现大量支持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都把贴工作组大字报的同学定性为“反革命”。校园内马上举行“群众抗议游行”，而谭厚兰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高呼拥护工作组的口号。到了下午，在北饭厅东侧（邮局东墙）出现了一份醒目的大字报：《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作者是李先华、王颂平。仅隔三天，6月23日早上，谭厚兰（与她同班的郑秀梅、董微园、杜莉共四人）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又贴了一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先承认自己在“6.20”支持工作组是错误的，接着表示也反对工作组。因为孙友渔讲话的威力，这张大字报并没有像“6.20”高树奎大字报那样获得了几百份大字报的支持，而是无一张大字报响应，可谓反响平平。谭厚兰等同样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遭受了残酷打压，但它为谭厚兰以后登上北师大的政治舞台捞取了政治资本。

关于工作组怎样整我们三人的，我在《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中已作了详细介绍，在此就不再赘述了。《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一文定稿于2015年12月19日，那时只是按逻辑推测其他同时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肯定也受到了无情镇压，但无真凭实据只能一笔带过。

两年多来，收到了很多同学寄来的各类补充资料，现汇总补充如下：1967年1月14日《井冈山》报发表了数学系65级（2）班《红色恐怖》战斗组的文章：《愤怒控诉孙友渔对我们的迫害》。文章中说：“在他（孙友渔）的煽动下，一些同学受他们蒙蔽，对我们进行围攻、斗争。我们的同学不断挨打挨斗。甚至出现了‘砸死高树奎’的标语，就连没有写大字报的郑禄奎同学也挨了打。在他的指使下，工作组的大小头目一齐出动，大打出手，气势汹汹地向我们杀来，要在我们班追黑帮，找牛鬼蛇神。我系工作组组长王佩东连大字报都没看完，便肯定我们十七人中有黑帮，用尽卑劣手段，挑动同学斗我们，在他的策划下，连续在我班开了三天斗争会，威逼、恐吓，对我们采取疲劳战术，使我们完全失去自由。恐怖，空前的恐怖！镇压，血腥的镇压！我们同学饭吃不下，觉睡不好，有的同学头发脱落了，上饭厅也要绕道走。三天的围斗他们没有抓出黑帮，于是又换成了抓‘政治投机分子’。高树奎同志被清洗出系核心组。扬言对我们必须专政，工作组指使人盯梢、监视我们的行动，剥夺我们的政治权利，不让我们参加选举，不让我们参加报告会。在他们的统治下，我们竟戴了近一个月的‘右派’帽子”。据中文系64级（2）班的同学说：王颂平“因反对工作组被打成‘反革命’遭大会批斗”。1967年7月1日《井冈山》报刊登了历史系黄家林等四人的文章《永远忠于毛主席》，文章中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去年的‘七·一’。由于我们反对孙友渔工作组，由于我们到《红旗》去向党中央、毛主席控告孙友渔在我校犯下的法西斯暴行，而被孙友渔打成了‘右派’‘反革命’。他们剥夺了我们一切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把我们监

禁起来。‘七·一’那天，孙友渔竟然利用全校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攻击我们‘反党’‘夺党的权’，他们不让我们庆祝党的生日，却让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参加庆祝活动，让这些家伙参加示威游行，向着我们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有中文系62级的王岚、数学系62级的王淑娴、天文系63级的余成等一大批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受到了各种打压。

众所周知，“中央文革”首先撤了孙友渔的职，紧接着撤回了所有的工作组，我们这些“反革命”全部平了反。当时我还不满20周岁，对此激动万分，感激涕零。刘少奇因派出了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贯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踢出了党中央核心，从此一路加速下滑，最后死无葬身之地。

“6.20事件”是北师大“文革”的重大转折点，“工作组问题”是全国“文革”的重大转折点。半个世纪后，关于“工作组问题”到底孰是孰非，还是对错各半？至今仍无一个明确的结论。

关于撤销工作组的事是“文革”的发动者一手拍板的，作为一个“伟人”，他的言行必须保持一致，他的理论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令人意外的是就在他生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事实真相上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至于他去世后，“文革”十年被彻底否定，被定为“十年浩劫”。只因那个“历史文件”对其留有余地，近几年“文革”又有死灰复燃之势，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警惕，防止“文革”卷土重来。

孙友渔讲话中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革命”绝对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而是沿袭1949年后一贯使用的政治大棒，也是上级指示的正确表述，所以他用起来轻车熟路。后来“文革”席卷全国各地后，各级地方党政也都打出了这一口号，归结为：“反对×××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对毛主席”。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递推定理”。但是在“文革”初期，这个“递推定理”被“中央文革”与毛泽东否定了，强调工作组就是工作组，地方党委就是地方党委，不能说“反对工作组与反对地方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工作组的“护身符”被破除了，最后只能夹着尾巴撤离了。

推翻了“递推定理”，触动了刘少奇的奶酪。他在7月29日“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惊呼“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还说：“现在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贴出了这样一个口号：‘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打他。这条标语是反动标语，有人打他，那么多人打，工作组、公安机关就怕把他打坏了，只好暂时拘留了，这是一种保护性拘留。如果你们要弄他，暂时保护他的自由，让他活动，放回他，让他多活动一点，多写几条反动标语，多发表一些反动言论，这不妨碍大局。可能保护坏人，少数的坏人保护一下，保护几个月，以后再作结论，这就有充分的材料，充分的证据，充足的材料，作结论不会错，不会冤枉人。这个影响群众，那么就大家辩论，不影响群众根本就不理他，让他活动，让他自由活动，他去组织，他去叛离嘛，中间可以发现反革命线索，有好处嘛。甚至怕保护了坏人，大概你们的意思是这样吧？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人，同时也可能保护了少数坏人，保护一下，保护几个月，保护一个时候不要紧，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会垮台的，我们多数不会听他的，能够识别的，能够知道什么是反革命，什么不是反革命。”从刘少奇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对“递推定理”的否定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此时的刘少奇已回天乏力，这段话反而成了他“反对毛的铁证”而“罪加一等”了。

对普通群众来说，推翻了“递推定理”就像去除了枷锁，就像小鸟冲破了牢笼，立即冲击了刘少奇、邓小平、“61个叛徒集团”……到了1966年12月份，贴“中央文革”与林彪的大字报都出来了。那时我恰好从四川回校，目睹了谭厚兰们在北饭厅批斗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林锋）、张传亭（向东彪）四人的大会。他们给林彪写的“公开信”主要内容是二

点：1. 认为林彪的“顶峰论”值得商榷；2. 不能说北农大附中的伊林、涤西是“反革命”。我当时也认为他们大字报语气温和，只是给林彪提了点意见，不能算“反革命”。就在批斗他们四人的当晚我与物四的一同学到《解放军报》社反映情况，接待我们的是报社的一位负责人，具体名字已忘。我们还没把事情讲完，他就说：“给林彪贴大字报就是反革命。”我说：“林彪是个人，给个人提意见怎么能算反革命呢？”他又把“给林彪贴大字报就是反革命”重申了一遍，毫无讨论的余地，吓得我们匆匆收场。此时我才明白，所谓推翻“递推定理”那是撤工作组、反地方党委与反刘、邓的需要，但对“中央文革”与林彪，此定理仍然照行不误。这就是辩证法的妙处，称为此一时、彼一时矣。到了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所以简称“公安六条”。这是为了保证“文革”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而制定的。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不仅适用对象一扩再扩，适用情节也一扩再扩，成为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所不包的，能够有效镇压抗拒现实、持异见者的东西。该条是为公安六条的核心。也就是说“递推定理”重新复活，只是演变为“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1967年1月28日上海“红革会”等群众组织炮打张春桥、姚文元，此事被定性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张春桥对徐景贤等人说：“上次我跟文元一起到北京去汇报‘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毛主席很关心上海‘炮打’这件事，主席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红革会这笔账还是要算的。’你们对这件事心中要有底。这次炮打，我认为至今有些事、有些人还没有查清。但是，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只对你们讲，你们不要外传。”[2]在北师大，军训团、谭厚兰、校革委会以及后来的军宣队、工宣队都是新的“神”，是不能反对的，反对了他们就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历史往往嘲弄人，号称毛主席司令部的“中央文革”及其他重要人员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1967年8月底到1971年9月份相继倒台了。到了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了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组成的“四人帮”，再过一两年，早已“盖棺定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谢富治也被宣布为“阴谋家”而被开除党籍，骨灰从八宝山清除了出来。也就是说，所谓“毛主席司令部”只有毛泽东一个光杆司令仍然是“伟大领袖”外，其他的都是坏人，无一幸免。相反的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几乎全部被平反，重返了领导岗位。

根据当时粗略统计，在1966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约二十余天内，由工作组所推行的所谓“反干扰运动”仅在北京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工作组就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如果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毫无问题便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更大规模的重演。显然这种做法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为了扭转局势，他在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

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于是，“工作组”被撤，“文革”的斗争矛头转向到刘少奇身上了。

作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我，渴望着上级领导能给我平反，能追究工作组及其后台的责任。但是熟知党内历史的刘少奇心里很清楚，这是故意找碴整肃他了。对刘少奇本人而言，整压群众的事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担任整风小组组长。那次整风共有15000多人被打成特务，其中多人被秘密处决或因为酷刑逼供而含冤死去。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都是被整对象。但是这次整人运动，刘少奇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原因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刘少奇本人也坐稳了第二把交椅。

再往前追溯，“文革”的发动者同样是整压群众的老手，1930年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整肃AB团”最早开启了整人的魔盒。那次整人的残酷程度，从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和贺龙等人的回忆所提供的数字可见一斑：总计有超过十万红军被杀害，其中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围歼，副排长以上干部被全部肃清。贺龙说：“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1957年的“反右斗争”更是“文革”发动者亲手导演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剧，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就有55万人被打成了“右派”，整死的人至今无一个确切的数字，在打倒“四人帮”后才给99%的“右派分子”平了反。在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还不到一周年的1967年8月4日，上海王洪文调动了30万工人武装砸掉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徐景贤在《徐景贤最后回忆》中写道：“毛主席视察了‘八·四’大武斗以后的上海的夜晚，又看了‘工总司’调动三十万工人武装砸掉‘联司’全过程的纪录片，他觉得上海的形势和他刚离开的武汉的形势（指武汉“7.20事件”）大相径庭，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的武装完全能够左右和掌握上海的局面，所以他才下决心武装十万工人，而且同意重建上海民兵。这正好说明：毛泽东是完全同意和坚决支持上海打“联司”的行动的”。一年前，刘少奇因镇压群众遭贬黜，从第二把手降到第八位，最后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其结果是家破人亡；一年后，王洪文砸“联司”，同样是镇压群众，不但无罪却有功，从此“火箭式”上升，直到登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宝座。1976年“文革”已进入第十个年头，整个社会已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人帮”却阻挠群众悼念周总理，到了4月5日清明节，百万民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同时把悲愤指向了“四人帮”。然而“4.5运动”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群众遭到了残酷镇压，一共有388人被抓。比1935年镇压“12.9运动”国民党镇压游行群众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

当时有一种说法：“文革”中派工作组到基层单位是刘少奇背着毛泽东私自作的决定。根据刘志坚《“文革”初期派、撤工作组的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领导运动，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并且由周恩来电话请示过在外地的毛泽东，征得了他的同意。“中央文革小组”不但没有表示异议，陈伯达还当了全国第一个工作组——中央派往人民日报社临时工作组组长。至于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后来改变了主意那是另一回事，这种翻云覆雨、出尔反尔，把责任推给他人的做法是极其恶劣的。

1966年7月27日晚上，陈伯达在北师大说：工作组是从上面派下来的，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包办代替的方式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建议撤销工作组，好吗？革命必须自己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江青强调：工作组是石头，阻挡你们前进的道路。革命是不能叫别人来包办代替的，要靠自己自觉，自己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实这些说法只是撤离工作组的一种说辞而已，是忽悠人的。就在“7.27”晚会上，康

生就把林杰介绍给全校师生，于是就形成了谭厚兰在台上唱戏，林杰在幕后任导演的格局，整个北师大几乎完全掌控在“中央文革”手中。从1966年6月6日孙友渔工作组进驻北师大开始，到1972年4月底69、70两届学生被“扫地出门”为止，工作组、林杰、军训团、军宣队、工宣队，北师大天天都有“保姆”，有哪一天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无论是林杰、军训团还是军（工）宣队与工作组有什么质的差别吗？上到程今吾下到普通的师生员工（包括家属）有数千人挨整，有的被戴上各类帽子，有的被批斗、被关押、被整疯、被整死，真是惨不忍睹。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谭厚兰问题。她本是个农家女孩，是个调干生，“文革”时已是政教系五年级的学生，还有一个多月就要毕业分配正式工作了，但“文革”给她开了一个大玩笑。可能因为是“又红又专”，在1965年底，就被《红旗》杂志社借调过去做专职的资料员，为有关人员撰写大批判文章准备资料。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她被林杰（背后是“中央文革”）选中了，内定她为北师大“文革”的“领头羊”。所以当她在“6.20”支持工作组后就被林杰找去“训”了一通，才有了“6.23”她再次“反工作组”的“革命”行动，才成了“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北师大“井冈山”才成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干了“讨孔”、反击“二月逆流”“火烧‘英代办’”等一系列坏事，最后成了历史的罪人。如果她不是被上层内定为“领头羊”，那她在“6.20”支持了工作组，就“站错了队”，就不会成为“五大领袖”之一了，就像历史系刘兴隆、数学系高树奎因“站错队”而昙花一现了。这样反倒不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也不会过早去世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这种“推理”也无法验证了。

我的观点至今仍然认为刘少奇把对工作组提意见的群众打成“反革命”绝对是错误的。但是派工作组到基层领导运动是党内传统惯例，刘少奇在“文革”中派工作组是“合法的”，并且征得了党中央主席的首肯。把不同意见者当敌人整，并以此达到“立威”的目的也是党内常用手段，不是刘少奇的首创，单凭他“镇压群众运动”把他定成“死罪”显然有些站不住脚。

综上所述，某件事的正确与错误决定于事物的本身，与地位高低、权力的大小无任何关系。迷信权力、崇拜个人给中国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无穷无尽的灾难。我现在已是古稀老人，也接受过高等教育。可是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得到的信息往往是错误或无法自圆其说的。小学时就知道蒋介石不抗日，躲在峨嵋山上修身养性，到了抗战胜利了，却要下山摘桃子了。可是到了21世纪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却宣布抗日时国民党是主战场，共产党是打游击为主，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但打主战场的国民党算什么不得而知，大概是“下游的浮木”。到底谁在摘桃子也不讲了，反正桃子早就入口了、消化了，不想把桃子与他人分享了。从小学到大学，都知道右派是向党争权夺利的坏人，工作后接触了几个“右派分子”，发现他们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强人，后来才知是毛某人搞了“阳谋”，他们是上当受骗的。

“文革”中的造反派的确做过坏事，但每人情节不同，绝大部分是上当受骗的。现在发动者仍然是“伟大领袖”，而“造反派”却是“文革”的罪人，这种逻辑能说得通吗？但在当今中国却是成立的。“文革”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誓死保卫毛主席”？最主要的是毛本人始终歪曲历史，掩盖事实真相，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伟人，普通群众不明真相，还真以为他是“四个伟大”，盲从他“彻底反修防修”，打倒了“睡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让中国永不变色呢。如果我在1966年6月1日以前就知道抗战与反右的真相，我绝不会去贴工作组的大字报，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去当那26天的“反革命”。历史是由事实决定的，它绝不是当权者手中的胶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现在，当局不让我们总结“文革”的经验

教训，掩盖与歪曲“文革”的事实真相，其目的就是要培养新一代红卫兵。至于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只有天知道了。

2018.05.13

[1]1967年1月14日《井冈山》报，数一（2）《红色恐怖》战斗组：《愤怒控诉孙友渔对我们的迫害》；

[2]徐景贤：《徐景贤最后回忆》

1. 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时汉人

提要：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文字很长，内容很杂，概括言之，它的基本精神是自我辩护，包含有反批评的成分，同时也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尽管这些在文章中不占主要地位，也没有作深入的批判，但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是客观事实。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不完全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他的文章题为“自我批评”，实则以很大的力量作自我辩解、洗白和澄清，名不副实，文不对题，无怪乎有些同志很气愤了。

最近，各报发表了不少对《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中理由充足的部分，我们是同意的；理由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异议。这里谈几点意见和大家讨论。

动机和效果问题被弄得简单化了

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写歌颂海瑞的文章、剧本，其真实的、具体的动机何在？他内心是如何想的？有些同志很急于要知道这一点。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虽然引述毛主席的话承认自己立场是有问题的，看来这个回答不能满足有些同志的要求。他们指责吴晗同志假装糊涂，自欺欺人，一定要他招认出“不可告人的目的”，交代当时是如何自觉地配合阶级敌人复辟活动的。究竟根据什么呢？无它，先从作品思想内容分析，联系彼时阶级斗争形势，引出作品客观效果，然后据效果而定动机是这个或那个，是谓动机和效果统一论。

是的，我们是主张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我们对于动机和效果二者的关系的看法，既不要强调动机否认效果，也不要强调效果否认动机；既要同唯心论者划清界限，又要同机械唯物论者划清界限。我们应该用《海瑞罢官》在演出、发表的当时产生的社会效果，去检验吴晗同志的主观意图是否正确，或者说，他的心是否好。

通过对剧本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宣扬了超阶级的国家观，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表现了吴晗同志错误的道德观、历史观，等等，对退田、除霸、平冤狱和海瑞的“傲骨”的描写，在当时起了某种程度的配合阶级敌人进攻的作用。这就可以断定吴晗同志的主观动机是不好的，是有立场问题的。事实上，吴晗同志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往下再追问他的主观意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就需要从吴晗同志的全部社会实践中拿出许多事实，进行周详的、严密的、具体的考察。不能说，有什么效果就是作者有这个或那个动机，《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是配合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吴晗的动机就一定是号召人们“退田”“平冤狱”，搞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样说，看起来倒也干净利落，方便省事，动机和效果绝对地统一起来了，但这样搞“统一”是形而上学的统一，是机械唯物论者轻率的作法。把问题弄得如此简单化、绝对化，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知道，在文学上有所谓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思想的问题。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生活真实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他创造的艺术形象的客观意义往往大于或超过他的主观意图。马克思说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等“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六八六页）。这不是说狄更斯等如何比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高明多少倍，对那些政治和社会真理都认识到了，而是说他们的作品在再现现实生活时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获得了较大的客观意义，可以说是非作家意料之所及的。同样，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有他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但他决没有表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揭露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的主观意图，因为他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一个今天的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读者能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红楼梦》的思想意义里有一条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性的。很显然，我们不能说有这个效果，曹雪芹就一定有这个动机。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有很复杂的因素的，它是作家力图表达的思想、用以表达思想的方式、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以及读者自己的体验等多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同作家本人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把动机和效果完全等同起来。

那么这样说，对吴晗同志的真正创作动机是否就不可知了呢？不，一方面固然要有待于吴晗同志自己去检查，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摆出吴晗同志全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材料进行分析，参照其作品的客观效果加以判断。不能单凭作品的客观效果下结论，那是既说服不了吴晗同志，也无法使读者心悦诚服的。总之，对这样关系重大而特别需要慎重的问题，批评者

是不宜太武断的。

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

学术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学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学术必然要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学术领域内的斗争必然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是分析学术问题的阶级实质的理论根据。这个道理吴晗同志是有些懂的，他没有认为《海瑞罢官》只是学术问题，而承认它在政治上客观效果是恶劣的，是一个政治性问题。

问题在于，具体到每一个人，学术问题上错误是否都可以归结为政治立场的反动的表现？吴晗同志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一个人可以有截然对立的政治上的和学术思想的两种阶级立场，这种概念是不科学的，也是人们不能理解的。但从全文看，吴晗同志所表达的意思多少可以触及，即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但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思想深处还蕴藏着不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因而在特定条件下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应该说，这是可以说得通的。虽然任何学术问题的错误最终都可以从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找到解释，但学术问题还是有它的特殊性的。一个人学术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可能是其反动的政治立场的表现，也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熟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还有怀疑所致，而且与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水平，与由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泛滥于整个学术研究领域的某种思潮都有关系。

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说：“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又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具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政治立场同时由于不熟悉或怀疑马克思主义而在学术问题上犯错误的人是存在的。有人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在学术上便会作出与他的政治立场相适应的表现。”这个说法一般说是正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学术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但不能把问题绝对化，以为一个人的学术上的错误一定是其政治立场反动的表现。按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在现实生活中势必要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有的同志虽然也同意不能把问题绝对化，同意生活中确有一些人犯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上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但是断言吴晗同志是一个例外，说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以学术作为保护色，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足以使这种说法成立的真实凭据究竟有多少呢？光是吴晗同志前几年学术问题的一些言论和活动就能够使人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吗？政治斗争是十分严肃的事，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反动，需要从他的全部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出发，特别是要考察他对党的领导、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的革命工作的基本态度如何，不能轻率地根据某一方面情况下结论。实际上，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已经造成某种僵持局面，即一方面某些同志一口咬定吴晗同志对自己过去几年中所作所为的反动性很自觉，其政治立场

是完全反动的，另一方面吴晗同志也不能被说服，坚持认为自己是下意识的，政治立场是站稳了的，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同意姚文元同志的这一分析：“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下意识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论断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并不排除一个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的人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不自觉地当了阶级敌人的义务兵的可能性，也不排除一个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阶级敌人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可能性；既不排除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的必然性，也不排除在这个或那个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作家笔下反映出来的偶然性。它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通过对吴晗同志过去几年中宣传的错误的学术思想批判，应该促使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是如何反映的，揭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阶级实质，因而从中汲取深刻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思想阵地。我们认为，这才是我们头等重要的战斗任务，至于吴晗同志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似乎不必急于替他作结论。

对吴晗的批评拿不出充足证据

我们认为，对于吴晗同志发表文章，承认某些错误，提出看法，应该抱欢迎的态度。吴晗同志如果继续坚持他过去的意见，只要讲出理由，就应该深入研究，如果他提出了新的看法，也应该认真予以考虑。应该说，吴晗同志发表文章对讨论的深入开展是有好处的。

现在有些同志动辄就说他的“自我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进攻、新挑战，又拿不出很充足的证据来，这是无助于讨论的。我们认为，这个讨论还只是刚刚揭开序幕，离作结论还太早，谁是谁非大致上有个眉目了，但是涉及许多具体问题，如清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等等，还远没有完全弄清楚，也没有在学术界取得一致的看法。吴晗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里提出的不少看法是值得讨论的。有人说，他又宣扬了中、小地主和农民利益一致论，宣扬了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和被统治阶级当前利益一致论，宣扬了海瑞的“退田”给部分农民带来了好处，一言以蔽之曰：宣扬了阶级调和论。问题果真能作这样的概括吗？不能。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评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干脆把它抛弃了”，他说：“宣布这个哲学是错误的，还不等于制服了这一哲学。”这里，我们无意于作什么比拟，只是希望我们的批评者能重视对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解释，真正做到以理服人，不能压服。

另外，对吴晗同志的文章的批评也要实事求是，错误的意见应该批评，正确的看法也要肯定。引用吴晗同志的原文，必须力求准确。有的同志在这方面注意得还不是很多的，断章取义，削足适履，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不顾作者的原意，随心所欲地加以肢解、硬凑，乍看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经不起对证和推敲，这样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引证史料，尤其要有科学态度。已经有人指出某些同志引证同一资料里合乎自己论点的部分，抹杀掉不合自己论点的部分，这种手法也是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齿的。

我们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内围绕《海瑞罢官》问题展开的这一场大辩论，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思想界的反映，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这一场斗争主要是以学术辩论的形式进行的，因此它要求我们既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有严

谨的科学态度。在这方面，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我们的表率。马克思在他的名著《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说：“每一种以科学批判为根据的判断，都是我欢迎的。”他对论敌的意见，总是认真考虑，然后以充足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和极大的战斗力给予回击。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这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这场大辩论中不仅反击喧嚣一时的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而且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解决多年来没有正确解决的许多问题，从而发展、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提高学术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造成一个同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的高涨形势相称的学术文化大繁荣、大兴盛、大提高的新局面。为此，当前对于吴晗同志的批评中的某种简单化倾向，不能不加以克服和防止。

（载于《人民日报》1966.02.10第5版）

2.《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关锋 林杰

想当年，吴晗同志及其支持者，神气得很，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法，大肆宣扬《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唯恐读者和观众不懂得它的借古讽今的春秋笔法。而今天，吴晗同志却来了个急转弯。黑墨落在白纸上，斧头也砍不掉。可是吴晗同志竟不顾自己说过的话，抹杀事实，装起糊涂来了，说什么“古为今用”的问题，“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海瑞罢官》没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

吴晗同志咒骂自己“糊涂”，狠狠地指责自己是“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请读者同志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时汉人同志不是反对说吴晗同志假装糊涂吗，那么请他就我们所摆的上述事实进行分析和反驳，证明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确是糊涂，确是“完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我们的讨论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徒托空言的抽象议论，虽然“其言甚辩”“其声甚高”，也是无济于事的。

吴晗同志，你不是说，《海瑞罢官》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论海瑞》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吗？你不是说，写历史、历史剧，写海瑞、《海瑞罢官》，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

为了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吗？这是多么正确啊！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拿出所谓“大丈夫精神”，挺身而出，正面地辩护自己的观点，反而说当时“糊涂”了，忘记了“古为今用”，“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呢？

我们说：这是在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骗人把戏；这是因为他心虚胆怯，心中有鬼，心里有着不可告人的东西。时汉人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看法，那么请他摆事实、讲道理，对上述种种作出合理的解释。依我们看来，那是不可能的。

历史毕竟不可以由吴晗同志任意涂抹。历史是无情的。谁如果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终有一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的历史是由个人来写的。但是，个人写下的历史，却不能按照他个人的意志而更改。吴晗同志当然也不能改变已经写下的他自己的历史。历史将向人民作证，谁个忠诚，谁个虚伪，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谁真正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五期，
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
此处为节选，原文2万2千余字

3. 学术批判必须突出政治

林杰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我们必须的一切领域中都贯彻这一指示。

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究竟要不要突出政治呢？毫无疑问，同样必须坚决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

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我们说，学术批判必须突出政治，这就是说，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学术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把学术斗争同政治斗争割裂开来。

古今中外历史上，学术领域的大争论，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当前所发生的学术上的争论，只有把它归结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根本问题上，才能透过现象，抓住实质。

但是有些人却不同意这么做。他们制造种种理由，反对人们从政治上提出问题。他们主张“少谈点政治，多谈点学术”。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虽然不敢公开反对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基本观点来考察问题，但是却采取折衷主义和诡辩的方法，把政治同

学术割裂开来，把政治问题都归结为学术问题。谁如果从政治上进行批判，就斥之为“粗暴”“偏激”和“扣帽子”。

时汉人同志的《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刊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一文，突出地反映了这种观点。作者用一些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词句，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公正”面孔，自命为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的最高裁判者。这实际上是用折衷主义偷换革命辩证法，千方百计替吴晗辩护。文章攻击的锋芒，主要是指向那些从政治上批评吴晗的同志，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篇文章受到了一些人的欣赏、推崇。用折衷主义反对突出政治，这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潮。至于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谁，这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这种思潮对目前的学术批判很有害。必须加以彻底批驳。我们批评时汉人同志，就是把他作为用折衷主义反对突出政治的这种思潮的一个突出代表来看的。他们既然反对突出政治，我们当然就要进行坚决地彻底地批判。

驳所谓“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

时汉人同志大喊大叫，攻击我们在批判吴晗的错误时，“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他所攻击的“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时汉人同志说：

“学术必然要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学术领域内的斗争必然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问题在于，具体到每一个人，学术问题上错误是否都可以归结为政治立场的反动的表现！”

“虽然任何学术问题的错误最终都可以从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找到解释，但学术问题还是有它的特殊性的。”“学术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但不能把问题绝对化”。

当然，不能把学术问题上的错误都归结为政治立场上的反动表现。但是，有谁在什么地方提出过这个论点呢？没有。时汉人所以要捧出这样一顶帽子加在自己的论敌头上，是为了掩饰自己理论上的荒谬。时汉人同志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术问题从属于政治，但是，他认为，“具体到每一个人”，这个原则就成了“问题”了，就不能说是从属于政治的了。如果用比较明白的话来说，他的意思是：

一方面，学术问题从属于政治，另一方面，具体到每一个人，又不能说学术问题从属于政治；

一方面，学术上的争论可以从阶级斗争中找到解释，另一方面，学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性，不能从社会阶级斗争中找到解释。

如果只承认学术从属于政治，只承认从阶级斗争来解释学术争论，不承认“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复杂性，不承认学术问题的“特殊性”，这就是“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

表面看来，似乎时汉人同志对政治同学术的关系的理解，是很全面的。你看，他既看到了学术从属于政治的一面，又看到了学术不从属于政治的一面；既主张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学术上的争论，又主张不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学术上的争论。这是用折衷主义偷换辩证法的典型例子。

在阶级社会里，学术总是从属于政治的，总是为政治服务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从来没有存在过不从属于政治的纯学术。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时汉人同志反对这个观点，并斥之为“绝对化”。这是完全违反几千年来阶级斗争的事实。

能不能说，“具体到每一个人”，学术就不从属于政治了呢？不能。既然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具有阶级性，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自己阶级的失败而悲伤，每一个进行学术活动的人都是阶级的人，那么，就应该承认，具体到每一个人，学术当然是

从属于政治的。如果说，具体到每一个人，学术不是从属于政治的，学术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这实际上就是否认了人的阶级性，否认了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学术理论的阶级性。

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问题，主要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等学术活动。在阶级斗争中，不同阶级必然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并把这种不同的看法，从理论上作出概括。这个概括活动就是学术活动。有革命的概括，有反动的概括；有无产阶级的概括，有资产阶级的概括，彼此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这就是学术斗争，这就是理论斗争。学术斗争，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是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为学术而学术”只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口号。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脱离阶级斗争的纯学术。只有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够解释学术斗争，才能够把握学术斗争的实质。

学术斗争当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如果把这个特殊性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认为不能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那就是借口学术斗争的特殊性，而反对阶级斗争观点。

列宁说：要认清“异常繁杂的情形，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学说联系着的情形，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问题。”（《论国家》，《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四三四页）正是由于哲学、历史、经济等学术领域的斗争有着这种复杂性，就更应该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而决不能借口学术斗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来反对阶级斗争观点。今天，我们必须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把它作为我们观察一切问题的线索，用它来分析历史、哲学、经济、文艺理论等学术问题。这绝不是什么“把问题绝对化”，而是认识问题的辩证法。

姚文元同志对吴晗的批判，所以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主要就在于他从政治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把学术上的分歧归结为阶级斗争，揭露了问题的本质。吴晗及他的支持者最感到恼火的，也正在这里。在姚文元同志以前，对吴晗的批评不是没有，缺点主要就在于，没有把问题明确地提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上来。

时汉人同志表面上也承认学术从属于政治，承认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学术上的争论，但是，他又在所谓学术的“特殊性”，所谓“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复杂性等问题上，来否定学术从属于政治，来否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学术上的争论。这实际上，就是用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的手法，来反对学术从属于政治，反对阶级斗争观点。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公开反对学术从属于政治，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是“危险”的。因此，采取折衷主义和诡辩的方法，一方面承认学术从属于政治，承认阶级斗争观点；一方面，强调事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从而反对阶级斗争观点，反对学术从属于政治，这就成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巧妙”方法。

显然，时汉人同志所说的反对“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就是反对学术从属于政治这个普遍原则；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学术问题，也就是反对在学术批判中突出政治。

吴晗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吗？

对于吴晗的错误的性质，时汉人同志用“一方面，又一方面”这种折衷主义的手法，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割裂开来，“一口咬定”吴晗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时汉人同志说：

“学术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但不能把问题绝对化。……有的同志虽然也同意不能把问题绝对化，同意生活中确有一些人犯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上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但是断言吴晗同志是一个例外，说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以学术作为保护色，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这一段话，把时汉人同志的折衷主义的虚伪性，完全暴露出来了。

这段话，逻辑很紊乱。所谓“绝对化”，就是指不要把学术从属于政治这个问题绝对化，在前面，我们已作了批驳。

时汉人同志的逻辑是这样的：

有些人犯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上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

既然所有的人犯这样那样的学术上的错误只是学术上的问题，那么，吴晗也不能例外，他的错误也只是学术上的问题；

既然吴晗的错误只是学术上的问题，那么，就不能说他的《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问题不仅仅在于逻辑上的错误，主要的问题在于，时汉人同志没有举出任何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时汉人同志有权利替吴晗辩护，说吴晗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但是，他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主观武断，不能靠玩弄折衷主义和诡辩术吃饭。

吴晗的《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及其他一系列的作品，违反了毛主席所规定的六条政治标准，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不利于巩固党的领导，而是反对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吴晗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即已经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对吴晗的批判局限于学术问题，认为吴晗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是完全错误的。是为吴晗开脱的。

吴晗政治上的问题是以“学术”的外衣掩盖起来的。因此，不仅要批判吴晗学术上的错误，而且要透过现象，深入本质，即透过学术问题，深入到政治问题，抓住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否则，我们在政治上，就成了受人愚弄的牺牲品。

姚文元等同志，已经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吴晗的《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等东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时汉人同志却完全不顾姚文元等同志所提出来的大量事实，主观武断地说，吴晗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因此，有必要把那些事实择要再摆一摆：

（一）吴晗自己声称，要“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研究写《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的动机。但是，他只讲到《海瑞骂皇帝》写于庐山会议之前，《海瑞罢官》写于庐山会议之后，究竟为什么要写，他说：我不知道，我糊涂了。

大家知道，庐山会议前，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那些混入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煽风点火，向我们伟大的党中央、向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污蔑人民公社“搞糟了”，咒骂群众的冲天革命干劲是“升虚火”“发高烧”。吴晗写的《海瑞骂皇帝》通篇只写一个骂字，从头骂到底，翻来复去强调“骂得痛快”，什么“因为皇帝不能骂，真有人骂了，却也痛快”，什么“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等等。庐山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官。这时，吴晗又“破门而出”写了《海瑞罢官》，大肆宣扬“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的所谓“海瑞精神”。请时汉人同志以及和时汉人同志持有同样看法的同志明确地回答：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不是同庐山会议精神针锋相对的吗？

（二）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进行复辟活动。他们大续地主资产阶级的家谱，妄图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吴晗极力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说什么“无产阶级不善于吸取过去统治阶级”的道德，就是“凭空创造”，就没有道德；如果不继承资产阶级的“多方赚钱”道德，就会办不好企业，不继承地主阶级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就会不“忠于祖国”，“没有骨气”，就会“干不好的事”，就会“脏极了，臭烘烘的”。请问，这些道德理论，难道不是把人们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么？

（三）在史学领域，吴晗反对史学革命，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来研究历史，他指责说：“有的人更严重到这步，认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写出来的东西才是历史，过去时代并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封建主义、唯心主义，因此，旧历史，是完全不可信的，这是对祖国伟大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学习集》第二七八页）吴晗在这里明确地宣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写历史，揭露和批判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写的历史的欺骗性，是大逆不道，是极端“严重”的问题，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吴晗还歌颂帝王将相“做了大大的好事”（《学习集》第二九六页），是历史的“光明面”，污蔑农民革命是“漆黑一团”（《学习集》第二六六——二六七页）。试问：能够说，这“只是学术问题”吗？

（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划时代著作。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批驳了罗烽等污蔑解放区是黑暗的“杂文时代”这个反党反革命的谬论。一九六二年，吴晗公然说：“不知根据什么理论，似乎有人说，而今不是杂文时代。”（《学习集》第一九页）。我国人民批判了洋奴胡适之后，吴晗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的《春天集》中，还胡适之长，胡适之短，叫得非常肉麻，宣扬他的老师胡适之当时“是反蒋介石的”，并且不知羞耻地叙述胡适如何欣赏栽培自己。我们希望那些替吴晗辩护的人，有勇气出来说一说，这不是政治问题，而“只是学术问题”，只是认识问题。

类似的东西还很多。由于篇幅所限，不能详细列举。特别最近揭露出来的吴晗解放前写的东西，其反动性更露骨。只要没有政治偏见，从上述材料中，就完全可以断定，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时汉人同志还危言耸听地说：“以为一个人的学术上的错误一定是其政治立场反动的表现。按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在现实生活中势必要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到底是谁说过，一个人学术上的错误一定是其政治立场反动的表现？这纯粹是捏造出来的罪名。”

这是十分荒谬的。时汉人同志在发表他的文章的时候，有些人想方设法，把吴晗的严重政治问题拉到所谓“纯粹学术领域”中去，企图把对吴晗的批评，局限于所谓“纯粹学术问题”，时汉人同志只是一个公开的例子。他们根本不准许人家从政治上批判吴晗。对那些从政治上批判吴晗，指出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同志，大加申斥，说他们是“绝对化”“简单化”，是“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这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是我们要把吴晗打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那一边去，而是你们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硬拉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这一边来。我们根据事实，揭露吴晗的政治立场上的错误，这是实事求是，这是科学态度，这是维护真理。相反，你们断言吴晗只是学术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绝对化，这才是真正的没有科学态度。

时汉人同志究竟反对什么？

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在学术领域，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术思想同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之间的斗争，是推动学术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场由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而展开的学术批判革命运动，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都欢欣鼓舞，拍手叫好。但是，另一些人，那些替吴晗辩护的人，他们被群众性的革命批判运动吓昏了，认为当前的革命批判运动出了偏差，要赶快加以制止。实际上，他们是反对这场革命运动。这就是有些人欢迎时汉人同志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时汉人同志大叫说：“当前对于吴晗同志的批评中”出现了“简单化倾向，不能不加以克服”。这就是说，这次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等所展开的群众性的革命批判运动，出现了过“左”的方向性的错误，以致必须立即“加以克服”。

这次革命批判运动究竟犯了些什么不得了错误呢？时汉人同志说：“他们（指批评吴晗的同志）指责吴晗同志假装糊涂，自欺欺人，一定要他招认出‘不可告人的目的’，交代当时是如何自觉地配合阶级敌人复辟活动的。”“一方面某些同志一口咬定吴晗同志……的反动性很自觉，其政治立场是完全反动的，另一方面吴晗同志也不能被说服。”时汉人同志还攻击我们对吴晗的原文采取“断章取义，削足适履”，“不顾作者的原意，随心所欲地加以肢解、硬凑”，并说，这种手法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齿”。总之，据时汉人同志看来，我们对吴晗的批判，手段是十分恶劣的，是“一口咬定”“断章取义，削足适履”的。因此，使时汉人同志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齿”，使他们痛恨之极。

在时汉人同志的笔下，这次群众性的革命批判运动，几乎是糟透了。

这些指责，“乍看起来，振振有词，实际经不起对证和推敲”。请问：到底谁对吴晗的文章“断章取义，削足适履”，“随心所欲地加以肢解、硬凑”呢？时汉人同志根本不敢（也不可能）举出事实，摆出证据来。许多同志根据大量事实，经过科学分析，指出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时汉人同志对客观事实不敢碰一下，却诬蔑这种分析判断是“一口咬定”。这才是真正的“主观武断”“罗织罪状”。

“你们粗暴”，“你们违反了党的政策方针”，这种指责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

事实是歪曲不了的。自从去年十一月全国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来，我们一直遵循毛主席关于百家争鸣的方针，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也是采取这个方法同它作斗争。

事实上，不摆事实，不讲道理的是吴晗和吴晗的支持者。吴晗不是什么“不能被说服”的问题，而是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仍多方辩解，回避问题的要害，坚持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一些吴晗的支持者，不仅不讲道理，不摆事实，而是破口大骂。他们辱骂姚文元等同志对吴晗的批评是“露骨的攻击”，是“官僚主义”“捕风捉影”“不够老实”；是“颠倒是非、无中生有”“大肆诽谤”；是“诬蔑、造谣和中伤”“其卑鄙程度令人诧异”。对这些蛮不讲理的侮辱和攻击，尽管他们使用挑衅性的语言，无理取闹，我们答复时仍然是摆事实，讲道理。

至于说到“简单化”“绝对化”，那么，时汉人同志可算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时汉人同志说：“有人说，他（吴晗）又宣扬了中、小地主和农民利益一致论，宣扬了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和被统治阶级当前利益一致论，宣扬了海瑞的‘退田’给部分农民带来了好处，一言以蔽之曰：宣扬了阶级调和论。问题果真能作这样的概括吗？不能。”这段辩护词，没有举出一件事实，没有讲出一句道理，只以简单的两个字“不能”，以命令式的断语，来否定同志

们对吴晗的实事求是的批评。这是学术论战中很少有的蛮不讲理的态度。

吴晗在他的所谓“自我批评”中，明明白白地说，海瑞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下令强迫乡官”即“富者”，把强占来的田退还给“贫者”，即“农民”，“这样做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律，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措施，同时，对于被白夺去田地的农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这些话，印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北京日报》上，是铁一样的事实。说海瑞强迫地主阶级把夺去的田退还给农民，这既符合于地主阶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是对农民有“好处”的。这怎么不是宣扬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利益的一致论，怎么不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呢？事实是最雄辩的，时汉人同志即使说一万个“不能”，也不能改变客观事实，而只能暴露时汉人同志的狂妄和蛮横。

时汉人同志攻击这场革命批判运动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采取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因此造成了“僵局”。他责问我们：说《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究竟根据什么呢？无它，先从作品思想内容分析，联系彼时阶级斗争形势，引出作品客观效果，然后据效果而定动机”。时汉人同志说，由于采取了这个所谓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对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采取了“机械唯物论者轻率的做法”，以致把这场批判“弄得如此简单化、绝对化”，造成了“僵持局面”。

时汉人同志如此深恶痛绝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究竟是不是形而上学的？是不是“机械唯物论者轻率的做法”？时汉人同志所宣扬的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又是什么货色呢？

时汉人同志把“从作品思想内容分析，联系彼时阶级斗争形势，引出作品客观效果，然后据效果而定动机”；即把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作品的内容，根据作品的社会实践的效果来检验作者动机，看做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的效果和动机的统一论。他自己的所谓“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认为，“不能说，有什么效果就是作者有这个或那个动机”，“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他说，“我们对于动机和效果二者的关系的看法，既不要强调动机否认效果，也不要强调效果否认动机”。吴晗创作的动机，“一方面固然要有待于吴晗同志自己去检查，另一方面也需要……参照其作品的客观效果加以判断。不能单凭作品的客观效果下结论。”

客观的真理是：时汉人同志所攻击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而时汉人同志所宣扬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则是披上折衷主义外衣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

效果是客观的存在；动机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转化为客观的效果，根据客观社会的实践效果，检验人们的主观动机的好坏。当人们进行创作时，动机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动机是由作者的阶级立场决定的），效果的好坏（这里指政治作用）是由动机决定的；而当检验动机的好坏时，作品的实践效果，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决定的东西。判断一个人的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就是作品的社会实践。

动机是人们的主观愿望，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意识，是看不见的，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表现出来。客观效果是主观动机的表现。因此，只能根据客观效果来检验动机。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九页）离开作品的社会效果来判断作者的主观动机，必然是主观唯心主义。我们反对只看效果不问动机的机械唯物主义，也反对只看动机不问效果的主观唯心主义，而必须坚持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论。

时汉人同志用折衷主义的手法来掩盖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他说什么“既不要强调动机否认效果，也不要强调效果否认动机”，说什么，判断作者的动机，一方面，要根据作者“自

己去检查”，另一方面，也要“参照其作品的客观效果”。似乎也很全面，既看到了动机，又看到了效果。实际上，他是说，判断动机主要是根据作者的“自己检查”，而作品的客观效果，只是判断动机的“参照”而已。这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关系论。

许多同志根据大量的事实，证明《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等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辩解说，他的主观动机是好的，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时汉人同志根据吴晗的“自我检查”，便指责说，由于你们采取了“机械唯物论者”的动机效果统一论，才造成这种“僵持局面”。这就彻底地暴露了时汉人同志的唯动机论。

根据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一个人写了反动标语，如果他坚持说，我的动机是好的，那么，我们也不能根据标语的反动社会效果而检验其动机。因为不能根据效果来判断动机，社会效果仅仅只是“参照”，判断动机主要是靠本人的“自己检查”。

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毛主席早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七〇页）再也没有比毛主席讲得更明白了：检验动机的标准是作品的社会效果，而不是作者的主观愿望。时汉人同志却公开宣称，“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并凶恶地攻击“据效果而定动机”，是“形而上学”，是“机械唯物论者的轻率作法”，是“绝对化”。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时汉人同志是不是不自觉的呢？是不是他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毛主席的这段话呢？不是。时汉人同志在文章中说过，“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虽然引述毛主席的话……”这里所说的“毛主席的话”，就是指上述所引的毛主席关于动机与效果的那段话。时汉人同志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据效果而定动机”这个观点呢？而且攻击得那么恶毒和凶狠呢？

由此可见，时汉人等同志同我们之间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在于要不要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批判运动，是在于在学术批判中究竟要不要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问题。

×××

学术研究、文化艺术究竟是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服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服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用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思想挂帅？这个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贯串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当前学术领域所进行的论战，它的实质就在这里。

列宁说，“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八页）必须记住列宁的这个教导，从人们的言论中，揭示出它的“阶级”利益，揭示出它究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就是政治，这是事情的本质、主流。我们必须抓住这一点，突出这一点。

那些一时受吴晗蒙蔽的同志，现在应该站出来说话，是时候了。否则，就将成为在政治上受人欺骗的牺牲品。至于那些有意替吴晗辩护的人，也应该“迷途知返”，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老实是不行的。

当前进行的学术批判运动，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伟大革命。这是一场异常复杂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决不应成为政治上的庸人。为了胜利地开展

这场革命，必须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让我们高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将这一场大论战进行到底。

（文章来源于《光明日报》03版 1966.04.23，第6070期）

4. 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1966.07.27）

康生 江青 陈伯达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吗？

（众：好！）

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所有成员到你们师大来，（欢呼）向你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跟你们学习，并且向你们问好！（鼓掌）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所有同志们，你们身体好！（众：毛主席好！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同志们，好多同学递条子来，要我们介绍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现在我就来介绍。（以下逐一介绍小组成员）

同志们，同学们，今天，我们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全都来了，听到师大“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辩论进行得很热烈。因此，我们想跟同志们来学习，来倾听同学们的意见，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要听，我们都要学习。我们是你们的学生，你们是我们的先生，因此先听听同学们的意见，希望同志们把意见告诉我们。

首先，师大斗黑帮分子，斗程今吾，斗得很好！（众：打倒程今吾！）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众：打倒程今吾！）但是，对程今吾的斗争还没有彻底，是刚刚开始。以后工作组派人来了，派来的是以孙友渔（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到你们这儿来。我们经过调查，孙友渔这个组长是没有声誉的。他到你们学校之后，没有把程今吾这个黑帮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同学。有的同志问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你们的调查是不是很全面，是不是抓住了关键问题，孙友渔在师大做的工作是好还是不好？同志们希望我们调查，我答复：我们是经过详细、周密、彻底调查研究的。（欢呼）

我只举一事实：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的。这点北大的……同志亲自参加过他们会议，陆平是给他们修过房子的……人大郭影秋完全知道，而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的。六月一日以

后，北大用大字报揪出来的，这个消息也传到了你们师大的王运良同志，在六月二十日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做“郭影秋你是什么人？”这张大字报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但是这张大字报被孙友渔歪曲了，孙友渔在二十日做报告时，就认为贴大字报的同学是“造谣”“挑拨”，他煽动同学说“这要制造流血”，还说这是“孤立毛主席”，他胡说！他在五千字的报告中，用四千字翻来复去讲这个问题，这样他就把同学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了，一些同学不了解，被蒙蔽了……这些同学认为谭厚生、高树奎同志是“反党”，是“反革命”，这件事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而且不仅如此，同志们你们看看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简报就是这样造谣诬蔑的！他说：“有些同学要欺骗群众，制造混乱，造谣说彭真要搞政变！”同志们，这是在替彭真辩护！……（打倒孙友渔！）彭真大黑帮要去北大，人大准备政变，这本来是真的，但是孙友渔说是假的，彭真本来是要政变，要夺取政权，孙友渔却说是造谣！你们看孙友渔是什么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样替彭真黑帮辩护应该不应该罢他的官呢？（应该！）同志们！我还要和同志们讲一件事，孙友渔反党活动中，他们不是去反对彭真黑帮，而是把矛头指向我们《红旗》杂志的“左”派林杰同志，你们看，我把林杰带来了，（鼓掌）同学们！林杰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热烈鼓掌）这是个好学生，你们的一个好同学！（热烈鼓掌）但是被孙友渔别有用心地说“林杰支持右派学生！”还有人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还有个后台老板是我呢！今天我要问一问你们：看我是不是黑帮？（不是！）算不算黑线？（不算！）……

“文化大革命”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斗争，另一个方面改革。斗争混在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权派。斗争他们的时候，就批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权威”。这个斗争大概就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也许连一起来斗，也许分开来斗。以后就要改革，教育革命，教学改革，学制怎么办？实现毛主席的办学方针怎么办？和工人、农民、解放军如何来结合？到底课程、专业怎么办？到底我们的教材谁来编写？教科书什么内容？一系列教学教材的改革，学制的改革等在我们的后头。所以我们要先破后立，后立也要破，“文化大革命”大概就是这个轮廓，这个轮廓请同志们想一想，要依靠什么力量？（有关师大革命要依靠师大师生员工的话，略）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人的脑子里破除迷信，提高觉悟，自觉革命，肃清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相信自己，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你们能够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搞得深，搞得透，一直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鼓掌）

江青同志讲话

师大的革命同学们，革命的教职员们：

我们今天来，也受毛主席的委托，问候你们好！同学们要我讲几句话，我没有很多意见讲，因为我们应该先来做小学生，了解情况，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我接到许多同志的条子，有一些意见我觉得是好的。你们已经是大学生了，至少十八、九岁了。我们这些同志都是十八、九岁就闹革命的，有的还小呢！十五、六岁。那时有国民党的压迫，我们就没有被国民党什么人牵着鼻子走，我们还是干起革命来了。你们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你们难道就不能自己革命吗？你们难道还是幼儿园的小孩子吗？还要阿姨叔叔吗？要这样顺从吗？我相信许多同志是被蒙蔽的，斗争矛头不是对准黑帮分子，对准地、富、反、坏、右，而是对着革命的师生，这是错误的。党中央、毛主席向来是相信革命

青年的。你们现在的革命形势，我认为已经是大好的。

你们已经接受了一些考验，但还不够。你们有些人还想要保姆，保姆还是好的，保姆还出于爱护小孩子。现在我们的工作组是石头，阻挡你们前进的道路。革命是不能叫别人来包办代替的，要靠自己自觉，自己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认为自己是老革命，革命要看他一生，同时还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如何表现。陈独秀曾经是党的领袖，后来成了党的叛徒。因此，老革命，我们这样的人，在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中也要像小学生那样虚心学习，向群众学习，也要改造，进行革命。你们要求撤销工作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建议，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工作组也不一定都是坏人，有一些是好同志，到了群众面前束手无策，……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来打击你们，迫害你们，这是有罪的，要检查交代。

我们建议你们自己组织“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甚至全校代表大会，可以充分酝酿讨论选举出来后，经过斗争的考验，搞不好，再罢他的官；好的，我们就跟他一起革命，这里没有折衷主义。但是工作队孙友渔，包括刘卓甫这样的工作队，在同学中造成分裂。因此，我希望那些受了迫害的同学应当原谅那些被蒙蔽、被欺骗的人。经过斗争考验，才能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那些被欺骗、被蒙蔽的人，做了不好事情的人，也应该想想，也应该交待（指工作组的），然后才能站到革命这边来。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才有利于打倒一小撮黑帮、修正主义、地富反坏右。

今天我只讲这一些，供革命同学、革命教职工参考。我们的意见不对就写大字报。我还是这样说法：革命的跟我们一起来，不革命的走开。不要怕乱，乱和治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乱哪来的治？不受迫害，你们怎么知道革命的困难呢？多受点迫害，能挺得住，将来才能做革命的接班人！我们相信你们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不要把我们的青年教成像小特务一样，我看见许多这样的材料，这是犯罪的。你们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对自己人盯梢、监视干什么？我们公安部队不是这样工作的，是走群众路线，为什么闹革命不依靠广大群众？为什么把矛头对准同学？希望同学们不要害怕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我的话今天讲到这里。你们有什么事，什么意见？我讲的是给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职工听的。反革命的他们也可以来听，让他们靠边站着。革命的师生对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有关师大的具体问题，略）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康老和江青同志的讲话，是代表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意见，我完全同意。康老和江青同志的讲话，提出来的主要是两个建议，一个建议，文化革命工作组是从上面派下来的，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包办代替的方式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建议撤销工作组，好吗？革命必须自己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向你们建议组织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总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作为你们学校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不要搞保姆，你们长这么大了，保姆又不好，不能做保姆。他要当保姆也要先学习，先当学生，没学习过就不能当保姆。你们学校来了两个工作组了，孙友渔的工作组搞得很坏，没有孙友渔的孙友渔工作组，就是刘卓甫工作组，也搞得不好。是否还要第三个工作组？自己管理自己，我看可以搞好的。将来有些具体问题可以帮助解决。有些事情同志们是关心的。例如档案、技术资料、武器问题。这些，你们文化革命委员会拟出一个管理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档案这个问题的发生是有道理的。现在来查这些人的出身，

这些人的历史，就是什么家庭出身，过去干了些什么事。修正主义者有它的社会基础。北京大学的陆平黑帮，你可以把他们的家庭、社会关系列一张表出来就可以清楚了，原来是这些人在这里掌权。为什么陆平这个黑帮要排挤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照顾地、富、反、坏、右子弟？就是因为他们有社会基础，有了这个社会关系。所以，查黑帮的档案是很有道理的。查档案要有一定的手续，你们文化革命委员会可以订出条例，按照正确的手续、条例查档案。武器要保管好，有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要保管好，不要随便动。你们搞思想革命，搞脑袋里的革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革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命，革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的命。你们一定有许多事要做，比如饮食，现在大师傅做饭，你们满意吗？（满意！）在文化革命小组下，你们可以成立生活小组或者生活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生活的事。

工作组有一些好的、比较好的，这些不是都不可信任。要吸收前两届工作组的经验教训。犯了错误，他们被轰走，这是完全对的。他们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因为有固定的剥削阶级思想、剥削阶级习惯、剥削阶级势力，在他们脑袋里盘旋着。除此之外，有些是好人，有些是比较好的人，有些是犯错误的人，还有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但不是不可救药的。他们根本的错误是想当保姆，又不想学习，不当学生。刚才江青同志说过，你们不要保姆，运动可以进行得更快些，更健康些。他们没执行毛主席的工作的根本方法，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他们学生不当，你们说一句话，就打到底下了。这种人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做文化革命工作，一定要失败，你们轰的完全正确。你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员、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文化革命代表会议的代表也有可能走他们的路子。任何人当了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当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当了文化革命代表会议的代表，都要非常警惕，要好好地学习，很好地当群众的学生，当群众的勤务员。如果认为当了委员、当了代表就高人一等，也会失败的。有的学校工作组撤销了以后，已经成立了临时委员会来筹备选举工作，我看是个好方法，你们可以考虑。过去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名单是不是预先指定的？现在要经过群众的充分酝酿，酝酿多少次、多少天，完全由群众决定。提出候选人名单由大家讨论，这个人合适不合适，能不能当，有没有代表性。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不要宣传清一色，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要以革命的“左”派、以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为核心，也要让旁的人参加，这样才能广泛地听取各种意见，才能够争取犯过错误的人、动摇不定的人。这样我的话就完了，没有话说了。

所有过去指定的那些组织，现在一律重新改选。原来的工作组还要留下，因为他们没有当好你们的学生，要受教育，让他们留在这里补课。因为他们一来就是钦差大臣的派头，他们来了就要当先生，瞎指挥，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什么也不懂，很可卑。凡是不能当群众学生的人，永远不能当群众的先生。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跟党的关系。是不是成立这些组织，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同学们都知道，过去列宁讲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呢？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我们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没有说不要党的领导。正是在制定宪法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讲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党中央的领导，不能说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党员都能代表党的领导。在这次文化革命中不是有的党组织瘫痪了吗？一些党员不是要不得吗？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党员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党的组织，是不是能够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党员，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党组织。是不是像毛泽东同志教导的那样真正当群众的学生，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是这样的党员，每个人就能

在文化革命中起一定的作用，党的组织就能起领导作用。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起作用。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在文化革命中应当成为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

同志们，有许多党员不是反映群众意见，把自己看成是站在群众之上，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这样的党员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进行自我批评，这种党员是坏党员，终究要被党开除出去的。毛主席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根本标志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如果有这样的共产党员，这样的共产党的组织，没按毛主席讲的去做，违背党的三大作风，就要批评，给他提意见，如果不接受，就可以告他们。我过去在乡下的时候，见到有这样的干部，他当了干部就像高人一等。老百姓说：“他们是父母官，我们怎么能批评呢？”我就给他们说，现在革命了，解放了，无产阶级专政了，翻了身了，已经是社会主义时代了，过去把当官的比作民之父母，民为之子，现在相反了，共产党员、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儿子，人民群众是共产党员的母亲。有些农民觉得很可笑，说过去怎么没听说过？我说过去没听说，现在我给你们说一下。现在我也给你们再说一下：我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干部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

差不多了，讲得差不多了。

5. 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概要）

（1966. 10. 17）

李文博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斗、批、改”。这里的“改”是指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触及人们的灵魂，形成一场大张旗鼓的思想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创造了使地主阶级不能继续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的一种制度，无产阶级则要创造一个使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一种新制度。

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这种组织形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种领导机构从形式上与旧社会资产阶级专政机器是一样的。这种机构是官僚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温床、社会基础……

由于领导机关仍然沿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方式（或者经过了某种改组），因此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在社会思想下进行的。

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巴黎公社的原则主要有两条：第一，官吏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第二，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总之，人民需要一个廉价的、廉洁的政府。马克思说：公社虽然被搞垮了，但它的原则是永存的。在无产阶级实现公社原则之前，它将一直大喊大叫。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

共产主义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了，让我们高举双手迎接它吧！

6.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井冈山红卫兵战士满怀革命豪情在天安门宣誓

（1966.11.07）

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兵团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

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哪里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在哪里造反！

我们要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遍全世界！

我们要让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赤化全人类！

“孔家店”统治了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它血债累累，罪恶滔天！

“孔家店”是吃人的“阎王殿”！

“孔家店”是反动的儒家学说的渊源！

“孔家店”是封建主义的象征，是“四旧”势力的代表！

“孔家店”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复辟的支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招魂店”！

“孔家店”是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大障碍！

在毛泽东时代的今天，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还时时想利用“孔家店”这具“僵尸”死灰复燃，借尸还魂，企图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这简直是白日作梦！

我们坚决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孔家店”彻底捣毁，砸它个稀巴烂！

“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坚决要把孔“素王”拉下马来！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就是我们的钢铁意志！

穷追猛打，一反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就是我们的战斗风格！

毛主席教导，铭刻心中，三八作风，雷厉风行！——这就是我们行动的准绳！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可挨打，可挨斗，不可低下革命的头！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敬爱的毛主席啊，是您伟大的思想哺育我们成长，是您伟大的思想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是您伟大的思想，把我们送去长征，造反！“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国家者，我们之国家！社会者，我们之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不把孔家店彻底打倒，不把旧世界彻底推翻，我们誓不罢休！

阳光灿烂，红旗飘飘，人民英雄纪念碑高高矗立在广场中央，即将走向征途的战士聚集在这里肃然致敬。“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我们井冈山战士高举革命的大旗，造反的大旗，向反动势力的老巢孔家店进军！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哪里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到哪里去造反！我们造孔家店的反是造定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不管遇到多大阻力，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奋勇前进，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

（原载《讨孔战报》1966年11月10日）

7. 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

（1966. 11. 07）

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

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毛泽东

万恶的孔家店，统治和奴役了中国人民两千多年。它吸尽了无数劳动人民的鲜血，吞食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孔家店是一座吃人的“阎王殿”！

孔府是一家恶霸大地主，孔府的土地上万顷，横跨四省（山东、河南、河北、江苏），佃户以千万计，任其蹂躏。在孔府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多少人在皮鞭下丧命，多少人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孔府一席酒，穷汉半年粮”，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孔家店是一切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的大黑店！是一切反动统治者制造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的大黑店！

孔老二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制造一套反动的“礼教”理论，要人们服服贴贴，甘受奴役。

孔老二宣扬“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要人们“畏天”“知命”，忍受剥削压迫，不要起来反抗。他把敢于造反的人骂作“乱臣”“贼子”，他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这个混蛋理论的“创始人”！

孔老二把体力劳动看作卑贱的事，瞧不起劳动人民，大骂向他请教怎样耕田、怎样种菜的人是“小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个反动的谬论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借口，孔老二是扩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罪魁祸首！

孔老二鄙视妇女，他是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妇女、侮辱妇女的祸首。

孔老二大讲“中庸之道”，企图掩人耳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千方百计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他是折衷主义的头号鼻祖，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最大辩护士！

孔老二身为贵族，做过官僚，爱的是剥削压迫，恨的是革命造反；但他却大言不惭地大讲什么“仁义道德”，提倡所谓“仁爱”。这真是自欺欺人！孔老二是一个十足的骗子手、伪君子！

孔老二似乎以教育为“专长”，但他主张“学而优则仕”“焉用稼”，使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剥削阶级培养忠实奴才和走狗。其实孔老二自己正是一切剥削阶级丧家的乏走狗！

孔老二的这套“理论”，是一切剥削阶级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反动理论的根据，他制造“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束缚劳动人民手脚的四大绳索，他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孔家的理论，是反动的理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儒家的学说是反动的学说，是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孔家店是反动势力的老巢！

于是，封建帝王吹捧孔老二，把他的歪门邪道捧为“圣经贤传”，给他封王祭祀，披上了种种神圣的外衣，大有不可侵犯之势；

于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供奉孔老二，率百官祭祀孔老二；

于是，头号卖国贼蒋介石“尊崇”孔老二，提倡发扬孔家店的“旧道德”；甚至连帝国主义者也到孔家店“朝圣”……

现在，中国人民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但是孔家店、孔老二的阴魂不散，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仍企图利用它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孔家店成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招魂店”！

在前几年资本主义势力向我们发动的猖狂进攻中，孔家店的旧货纷纷出笼，成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法宝。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大力鼓吹要“真正体现”儒家理论，甚至还要到曲阜去开“朝圣会议”。他们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干的反革命复辟的勾当，真是猖狂之极！“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更可恨的是，直到今天，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还时时想用它来死灰复燃，资产阶级还时时想借尸还魂，妄图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这简直欺人太甚，如何容得！？

孔家店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象征，是“四旧”势力的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支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大障碍！

孔家店应该打倒！孔家店必须打倒！！

“五四”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革命”，曾经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由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没能深入广大工农群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封建势力妥协投降，“孔家店”并没被彻底打倒。以后，“尊孔”“读经”又成了反动派进行反动统治的金字招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是企图利用所谓“王道”来征服中国人民。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并没有忘记。

今天由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旧世界彻底死亡的丧钟敲响了，彻底“打倒孔家店”的任务落在我们的肩上。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踏着先烈的血迹来了！！！！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要彻底荡涤一切旧世界的污泥浊水，要挖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孔家店”这个两千年来反动势力的顽固堡垒，吃人的魔窟，今日不反，更待何时？

我们是旧世界的彻底批判者，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最高信仰，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哪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在哪里造反！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今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全国人民庄严地宣告：造孔家店的反！打倒孔家店！火烧孔家店！把孔“素王”拉下马来，砸他个稀巴烂！我们要把一切四旧势力的代表统统打倒，什么周公、鲁公，什么宗圣、复圣；什么圣谕，什么钦赐，统统见鬼去吧！

我们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捣毁“孔家店”，火焚孔象，刨平孔坟，揪出尊孔、祭孔的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让那些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在我们的背后噤若寒蝉吧！让那些“白脸土匪”去给我们横加种种罪名吧：“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造孔家店的反是造定了！一反到底，彻底捣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就是要骑在“圣人”头上拉屎拉尿！

向孔家店开战！向旧世界开战！打它个落花流水！

世界是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像一轮红日光芒万丈，普照天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讨孔战报》1966年11月10日）

8. 告全国革命人民书

(1966. 11. 10)

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

全国革命的红卫兵同志们，革命的工农兵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切革命的同志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于十一月九日来到山东曲阜。

我们是毛主席的忠实红小兵，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来到曲阜，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但要在学校进行斗批改，还要在社会上进行斗批改。走出校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兵学习，跟工农兵一起革命，一起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向旧世界，向四旧势力最大的代表孔家店猛烈开火；用我们改天换地的双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我们要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立四新，大立毛泽东思想，用我们整个生命和全部力量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印在人们的脑子里，溶化在人们的血液中，落实在人们的行动上，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斗争中炼就一代无产阶级的英雄，在斗争中创造出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破四旧，必须捣毁孔家店！

你们看，从古至今，是什么人把孔老二吹捧为“圣人”？是什么人把他的理论奉为“经典”？是封建皇帝，是恶霸地主，是土豪劣绅，是买办文人，是汉奸卖国贼，是帝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是一切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是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混蛋！因为，正是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制造了一套“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这个维护一切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混蛋理论；正是孔老二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封建主义统治的反动纲领；正是孔老二大骂贫下中农和劳动妇女是最难对付的“小人”“女子”；正是孔老二把不甘受剥削压迫而起义造反的农民骂作“乱臣”“贼子”；正是孔老二把鲜血淋漓的皇帝宝座披上了一层“王道”“仁政”的外衣；正是孔老二为地主阶级提供了一整套剥削贫下中农的“愚民政策”；正是孔老二把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盖上了一层“仁义道德”的纱布……孔老二是孔家店的祖师爷，孔家店是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墙脚，是修正主义的根子，是一切剥削阶级、四旧势力的代表。孔家店的书都是替地主恶霸、土豪劣绅说话的；“孔孟之道”是剥削阶级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之道，是维护私有制度、私有观念之道，是剥削阶级的辩护词。剥削阶级四旧的本质就是私有观念，旧，就是旧在一个“私”字上。要大破四旧，就必须火烧孔家店，打倒孔老二，把孔家店的反动

理论及其影响彻底扫除干净！

立四新，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我们要“公”字当头。无产阶级四新的本质就是公有观念，新，就是新在一个“公”字上。林彪同志指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人们的灵魂，改造人们的思想，就是要破旧立新，破私立公，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但是，解放十几年来，孔家店阴魂不散，力图夺回它已失去的天堂。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那些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利用孔老二这具僵尸，打着“学术讨论”的幌子，干着反革命复辟的罪恶勾当。他们把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捧上了天，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孔老二这个反动理论制造者挂上了什么“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等十六大家的神圣头衔，这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牛鬼蛇神还亲自到曲阜“朝圣”，拜倒在他们的“先师”“孔子”的脚下，演了一出资本主义复辟的丑剧。孔老二的反动理论成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它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罪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腐蚀剂，是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大障碍。

红卫兵战友们，工人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上述情况能够让它继续下去吗？不能，不能，万万不能！孔家店及其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统治和奴役了我们几千年，我们的祖祖辈辈受尽了剥削压迫，它夺去了我们多少生命，欠下了我们多少血债！今天，剥削阶级妄图利用它来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美梦，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不革命，不造反，我们就要重新回到旧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地位，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我们必须彻底地造它的反，打倒孔老二！捣毁孔家店！扫除一切害人虫！

革命靠什么？造反靠什么？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群众，依靠革命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工农兵革命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切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一起革命，共同造反，火烧孔家店，铲平孔丘坟，砸烂孔老二，搬掉一切绊脚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卫兵战友们，同志们，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对孔孟之道还恋恋不舍，对大恶霸大地主的衍圣公府的溃灭十分不忍，他们要编造出种种借口，阻止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在这里郑重宣告，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不管遇到多大阻力，天塌下来擎得起，我们坚决沿着毛泽东思想大道奋勇前进！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造反到底，革命到底！

有人说：“衍圣公府、孔庙、孔林等都是国务院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胡说！

衍圣公府是恶霸官僚地主的大庄园，他们世代勾结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人民；他们里通外国，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直到现在那里面还窝藏着国民党党旗，蒋该死的狗相，军阀的刀剑，伪满的钞票，反共手册，日伪情报……孔庙、孔林是传播封建主义毒素的老巢，那里吹捧孔老二是什么“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我们要问：这些都是什么文物？难道国务院要保护国民党党旗，保护蒋该死的狗相，保护四大家族屠杀中国人民的刀剑吗？难道国务院要保护封建主义的“先师”“师表”，进行资本主义复辟吗？这是一小撮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着国务院的招牌窝藏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黑货。这是一个大阴谋，我们一定要把它戳穿！

有人说：“保护孔庙、孔林、衍圣公府是贫下中农的意见。”这是污蔑！

孔老二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大地主“衍圣公”剥削了贫下中农一两千年，多少贫下中农被他们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是贫下中农不共戴天的死敌，难道贫下中农要保护剥削和压迫自己的混蛋吗？难道贫下中农还要保护屠杀过自己父母兄弟、妻儿姐妹的刀剑吗？有些人别有用心地利用种种手段，打着贫下中农的招牌，企图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贫下中农同志们，我们能够答应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谁这样说，我们就要坚决揭露，造他的反，革他的命！

有人说：“孔庙、孔林、衍圣公府等处正在按照革命师生的意见进行改革。”这是欺骗！

看看他们是怎么改的吧！他们把孔老二的泥塑像用木板挡起来，把毛主席像放在封建皇帝的题词下面，把衍圣公府门前的石狮子用语录牌罩起来……如此而已。这是假改革，真保护！假革命，真改良！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人竟在孔妻的牌位前面写上“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在孔像后面挂上“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的毛主席语录。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恶行为，我们表示最坚决的反对，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有人说：“你们要烧孔庙。”

这是造谣！这些人听说我们来曲阜造孔老二的反，就害怕得要死，视红卫兵为洪水猛兽，总想往革命的红卫兵脸上抹黑，制造种种谣言，挑动群众围攻我们，说我们火烧孔家店就是要“火烧孔庙”。不错，我们就是要火烧孔家店！“孔家店”是什么？孔家店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招魂处，是一切反动人物演出复辟丑剧的舞台，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象征，是剥削阶级孔孟之道的代名词。我们要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掉孔家店这个四旧势力的代表，烧毁私有制，烧掉私有观念，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有人故意把火烧“孔家店”这句革命语言跟“杀人放火”的“放火”混淆起来，企图造谣污蔑，阻挠革命。这就暴露了他们把革命群众视为暴徒的险恶用心。对此，必须坚决揭露。我们要正告这些人，企图在这上面捞根稻草，那是枉费心机！

上述种种谬论，必须戳穿，必须打倒！

十分明显，摆在各级党委面前的是两条路线、两种方针、两条道路：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是“怕”字当头，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是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横扫四旧，还是画框框，定调子，束缚群众的手脚？是突破旧框框创造革命的新秩序，还是不求进取、墨守成规？是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群众，还是站在群众的后头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地批评群众？是大破大立，还是调和折衷？一句话，是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造反、彻底革命，还是修修补补稍加改良？或者甚至压制群众，反对革命？何去何从，形势将迫使各级党的领导迅速抉择。我们希望一切党的组织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而不要用种种借口，在群众中制造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做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全国革命同志们，目前亿万人民群众正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四旧，大破“孔孟之道”，大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我们贫下中农、劳动人民世代在孔老二为代表的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凶残镇压下，苦大仇深。孔孟之道，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枷锁，是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基础。

现在，由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震动全世界。孔家店今天不把它彻底捣毁，孔老二今天不把他彻底打倒，更待何时？管他什么“至圣先师”，管他什么“万世师表”，统统见鬼去吧！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坚决把它打倒！彻底革命，坚决造反！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牢牢地插在我国的土地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我们坚信，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彻底胜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一定能够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全国必将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个崭新的新世界就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用战斗去迎接它的莅临吧！

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奋斗！

胜利必将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胜利必将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讨孔战报》1966年11月10日）

9.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府、孔庙、孔林” 一事给国务院的一封抗议信

（1966. 11. 11）

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

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由国务院决定，山东省人委立碑，指孔庙、孔府、孔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开保护“孔家店”。直至现在还不取消这个保护牛鬼蛇神的决定，对此，我们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孔府是罪恶的地主庄园，是吃人的魔窟，是封建主义的顽固堡垒！孔庙、孔林是封建主义的大黑旗，是四旧势力的老巢！还有什么周公庙、复圣庙之类统统都是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愚弄人民的反动工具。把这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招魂店”，美其名曰“重点文物”，加以保护，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愤慨！

保护孔府、孔庙，实际上是保护了牛鬼蛇神，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张目，为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提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工具。保护孔府、孔庙，就是保护孔老二，保护“孔家店”，保护“四旧”势力！

在国务院某些人搞出的所谓“重点保护”决定之下，孔老二高居大殿，正襟危坐，生前骑在人民头上，死后还享受香火祭祀。

在国务院某些人搞出的所谓“重点保护”决定之下，孔府里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勋章、国民党的混蛋党旗、蒋介石的清乡“剿共汇要”、孔祥熙之流的杀人剑、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情报、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钞票……有了藏身处。杀人魔王安然无恙，反动势力得到包庇。

在国务院某些人搞出的所谓“重点保护”决定之下，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朝圣”，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他们找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旁敲侧击，借古讽今，大有推翻社会主义之势。

在国务院某些人搞出的所谓“重点保护”决定之下，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遏止工农兵群众于孔府、孔庙之外，拒绝人民群众对他的监督和批判，只许放毒，不许消毒，只准保“四旧”，不准破“四旧”。孔家大院不让挂毛主席像；不让写毛主席语录（据他们自己说是为了让外国人参观，为了保持古迹的本来面目），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决定”，这个“重点保护”的石碑成了他们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活动的依据！

是这个“重点保护”，使孔老二的推崇者越发肆无忌惮地放毒！

是这个“重点保护”，使孔府、孔庙的枯木朽株、污泥浊水成了宝贝！

是这个“重点保护”，给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大立毛泽东思想设下了重重障碍！

这个“重点保护”，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可忍，孰不可忍？！

统治和奴役了劳动人民两千多年的孔府，罪恶滔天，血债累累。它是剥削阶级的天堂，劳动人民的活地狱！愚弄和毒害了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说”反动透顶，罪大恶极！孔孟之道是劳动人民的死敌，是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

孔老二及其孝子贤孙的泥胎、神位是文物吗？

反动的石碑、牌坊、对联、横匾是文物吗？

国民党的党徽、党旗、“剿共”手册是文物吗？

蒋介石、何应钦之流的狗头像，孔祥熙、韩复榘之流的杀人刀也是文物吗？

……

孔府、孔庙是反动势力的庇护所，哪里是什么“文物”！

“孔家店”是吃人的魔窟，是反革命势力复辟的老巢，哪里是什么“文物”！

把“孔家店”当作“重点文物”加以保护，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对待一切事物。文物当然也不例外。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谓文物，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难道会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文物吗？

对革命的文物，我们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我们要坚决保护，决不允许任何人动它的一草一木！

对反革命的“赃物”，我们有着刻骨的仇恨。我们要坚决造反，彻底砸烂！

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维护“孔家店”，推崇孔老二这具僵尸，利用它来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利用它来死灰复燃，借尸还魂，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国务院中某些人竟把这些乌七八糟的鬼东西当做“文物”，而且是“重点文物”，加以保护，岂非咄咄怪事！

我们要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这究竟是谁搞的鬼？！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

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国务院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破”，而且把毒草当作香花来保护，把牛鬼蛇神作为“至圣”来供奉。对这种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言行，我们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最坚决的反对！

我们要求国务院，立即撤销关于把孔府、孔庙等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错误决定，并且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阳奉阴违和折衷改良！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任何人，只要他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跟他进行坚决的斗争！

坚决反对某些人借国务院之名保护牛鬼蛇神！坚决反对某些人借国务院之名保护“四旧”势力！

绝不容许为孔老二这个混蛋“权威”树碑立传！

国务院必须立即答应我们的革命要求，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不可战胜的！

1966年11月11日于山东曲阜

10. 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伊林 涤西

敬爱的林彪同志：

近日看到你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的讲话记录，直爽地说，有几个关键地方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

您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最近翻阅斯大林论《论反对派》的一些论文，见到论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功绩的一段：“同志们，必须承认正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胜利的真理，

不能抹杀理应属于列宁的功绩。不要惧怕真理，要有勇气说出真理，要有勇气公开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

我这些话绝不是想说明作为思想家的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高出一等。我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两个事情。

第一，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切可能性。

第二，列宁作为恩格斯或马克思的天才学生，能够看得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因而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斯大林的态度是对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它会给各国修正主义造成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毛主席也绝不会答应！

正如您说的：“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斯大林正是在怎样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和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开的。如今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并将继续进行大分化。在大分化中，那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固然是非常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主要应批评的），但那种估计超出历史发展的倾向同样站不住脚，也容易一头栽入反毛泽东思想的邪路。林彪同志，用斯大林同志当时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其他态度统统是错误的。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您是在军事学院讲的。无论这个99%是指学习时间、精力之比还是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适用。

第一，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显然不能成为99%的理由。

第二，专门的理论是需要的，而中国的现状是特别需要的。毛主席早在二十四年前就深刻地批评到：“但是要照中国革命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程度。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态度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提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

二十四年前毛主席这个批评，在二十四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暴露出来了，在我们不但要解决国内问题，更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候特别地表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书店的书柜中看不到什么系统的周密的（哪怕是较系统较周密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著作！过去书架上倒是摆过一些厚本、专著，但文化大革命表明，他们的作者不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混蛋，就是钻进书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或空谈家。

在您的作用下，解放军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全国学习解放军，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空前广泛的运动，就是说一个工农兵广大群众直接掌握理论的伟大时代出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给目前范围有限度的提高以基础，也是给将来范围以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条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提高的问题自然而然地突出出来了！大批真正的理论家，现在和不久将来的革命运动很需要。

第三，既然我们现在很需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有大批的理论人才，那么这些理论家，不管其专长是什么起码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备一个较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而毛主席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而这个99%比例是不正确的，对大专院校不适当。

第四，毛主席著作虽然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一部分，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无疑是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战斗。我们不是否认这一点，而是肯定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个彻底的了解，清楚毛泽东思想如何前进，因而就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有个相当的认识，从这里您的“99%”也是不适合您所讲话的对象。一般说，用主要的精神，大部分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正确的。

其次，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规律问题，我国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这一点加上上面的，给人以马克思著作似乎已经过时之感。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基本，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从“左”的方面，同样走到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沼泽中去吗？您的意思似乎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飞跃，根本的质的飞跃！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请你解释这些。

顺便向您提出一个批评，在天安门上，您已经发表了对当前文化大革命具有决定性指导意义的六次讲话，可是这次运动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学生运动，却没有看见您来亲自参加，如同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一样来参加我们的辩论会，亲自看大字报，接见学生，给我们讲话。我很怀疑你讲话绝对正确。就拿九月十五日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省市中，大多数也不一定“炮打司令部”，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击中其中个别人，或冲决“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有讲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因而讲话不但没有注意引导这方面，反而给全国运动一个阻碍，造成一个反复（虽然不大），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张平化9·24讲话就是趁机抛出来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对于您的六次讲话，很希望您能像

毛主席那样“理论应跑到实践前面去”。但说老实话，失我所望，您的六次讲话跑到实践后面去了。比如吧，第六次讲话虽然指出了“步行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去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地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这文中没有突出毛主席学生时代就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式的“社会调查”。而这一点，您讲话之前，清华大学里的大字报已经渴望了好几天了。

希望您特别深入运动，不然久而久之，也会有“靠边站的危险”，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我们的副统帅，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许多中央首长这样讲，人民也这样讲）。为什么要给您寄这封信呢？我认为，应坦白地向您公开我的目的，您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希望您具有毛主席那样高的理论，那样高的实践，像毛主席那样正确、完整，因为中国党的领导所领导的不是中国一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而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条道路上，斗争异常尖锐，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危险存在。这条道路毛主席是走上来了，如果毛主席的接班人不能像毛主席那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国党还会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再说一遍，无情的辩证法将会请您“靠边站”。

为什么要公开呢？就是要促进人民进一步取得您所提出的批评，监督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各级领导人的“大自由”。

有错误就要批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要指出，难道您是不可提批评意见吗？（有些首长讲话似乎对您提批评是不可以的）我看您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赤胆忠心之言，见之请您斟酌。歪理之处，给以批评指正。

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
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11.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宣言

（1967. 01. 26）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

我们庄严宣布：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正式成立！

兵团的最高司令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兵团的最高指导思想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而战！我们坚决主张革命的战斗大联合！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下，师大的、北京的、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夺权而战！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任务而战！做旧世界最革命最彻底的批判者，做新世界最勇敢最热情的创建人！

我们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而战！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兵团的每一个战士心最红、眼最亮、骨头最硬、革命最彻底，永远做新事物的促进派！

兵团的每一个战士天不怕、地不怕、白色恐怖不怕、资产阶级专政不怕。可挨打、可挨斗，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我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刻骨仇恨，坚决反击！不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其影响、烧光其阴魂，我们决不收兵！

什么奴隶主义、折衷主义、改良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分裂主义、分散主义，统统是混蛋主义！统统要打到！谁企图推行这些混蛋主义，我们同他拼个你死我活！

我们永远坚持两条路线的斗争，谁回避、压制和放弃这一点，我们就坚决造反！

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重复运用五大武器，展开经常的战斗的真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折不扣地执行民主集中制。谁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破坏大民主，我们就坚决造反！

我们忠实执行最高指示，艰苦奋斗干革命。深知不打算艰苦奋斗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谁要想舒舒服服地干革命，谁就可能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滑到修正主义泥坑中去。坚决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反革命官僚主义，永远做毛主席的红小兵、人民的勤务员。谁要蜕化变质，搞修正主义，我们就坚决造反！

我们坚决执行三八作风，真正做到林彪同志提倡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性”。用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遵守纪律。

我们坚定不移地和工农结合。我们一切行动的归宿是破“私”立公，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不仅敢于触及别人的灵魂，也乐于触及自己的灵魂。灵魂深处闹革命。

井冈山造反兵团在疾风暴雨中锻炼，在大风大浪里成长！通过斗争，考察、识别、发展每一个战士；通过清洗，纯洁、巩固自己的队伍！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乏走狗，不能成为兵团战士！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形形色色的辩护士，不能成为兵团战士！

靠造谣吃饭的政治庸人、靠开帽铺过活的投机商人，不能成为兵团战士！

不触及灵魂的保守派、保性不改的顽固派，不能成为兵团战士！

扇阴风、点邪火，阴一套、阳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四方讨好、八面玲珑，出卖原则、唯利是图，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反革命两面派，不能成为兵团士兵！

井冈山造反兵团像钢铁般坚持原则，绝不拿原则做交易，灵活、科学地讲究策略，不断推动革命前进的策略。

井冈山造反兵团敌我分明，是非清楚，旗帜鲜明。百分之百地贯彻党的“第一是有成分论，第二是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紧紧地依靠革命“左”派，以斗

争求团结，最后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革命的革命，最需要彻底革命的组织、彻底革命的战士。

“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教训，也是今后斗争最宝贵的教训。牢记这一点，就可能避免革命半途而废，蜕化变质，走上复辟道路的危险。

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

巍巍井冈山，高高红旗飘！井冈山精神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

12.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声明

（1967. 02. 25）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旗》杂志今年第三期社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一切革命同志，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方向。否则，就会走错道路，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红旗》社论高高举起斗争大方向的旗帜，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大方向上奋勇前进！夺权必须大联合，联合是关键，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继山西、贵州、黑龙江等联合的胜利之后，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诞生了！这是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一曲胜利凯歌，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过去看你革命，是看你的革命造反精神，而现在是看你为不为大联合出力。

搞不搞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真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你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吗？你就必然坚定积极真心诚意地为大联合而战斗，你就必然能识大体、顾大局，主动地牺牲局部利益，自觉地打掉自己的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大破私心私利，一心为革命，一心为联合，甚至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牺牲自己的一切而毫不怜惜。你要是看不到大局，抓不住大方向，眼睛只盯在自己的鼻子尖上，一心巩固小山头，聚草屯粮，扩大自己的势力，或对大联合半心半意、患得患失、争名争利，既不服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又抓住人家的小辫子不放，攻击一通，破坏联合，那你就是假无产阶级革命派，或是反革命派。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目前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已处在关键时刻，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威胁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触及了一切人的灵魂。中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被揪出，被打倒，修正主义根子的被挖出，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革命人民中间的广泛传播，触动了帝修反的根本利益，震撼了他们统治的宝座，激起了他们的疯狂反对。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勾结，结成非神圣的“神圣同盟”，掀起反华的歇斯底里。他们调兵遣将，挑衅、骚扰，以达到空前猖狂的地位。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切反动派的大决战的伟大时刻不远了！打倒修正主义，埋葬帝国主义，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决战已升起了信号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毛主席革命路线节节胜利，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已无处藏身，垂死挣扎。他们同国际阶级敌人里通外合，互相勾结，千方百计破坏文化革命，孤注一掷，以求一逞。刘邓不认罪，陶不投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在预谋着新形势的反扑，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场更大规模的风暴就要来临了！

时代潮流的飞速发展，把更新的战斗任务必然推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每一个革命者都要跟上时代的潮流，认清方向，把握大局，采取行动，切不可迷迷糊糊，掉以轻心，因胜利而骄傲自满，因小利而丢掉全局，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中央文革，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口号！

放眼全国全世界，再看师大，令人焦急的是：师大远远地落后了！师大的要害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没有联合起来！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师大一切革命同志紧急行动起来，尽早促成我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迫在眉睫的战斗任务，完不成这个任务，就辜负了毛主席对我们革命小将的厚望，辜负了中央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为了促成我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我井冈山造反兵团发表声明如下：

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唯一原则基础，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师大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全体无产阶级革命派迅速联合起来，必须借军训的东风，在全校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以小利益服从大利益，充分运用四大武器，首先进行自我批评，触及灵魂，开门整风，大破私字，夺私自的权，打倒私字！

二、大联合是关键。实行“三结合”是关键的关键。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正确地对待干部，按《红旗》第四期社论办事。

我们热切希望师大的革命干部站出来，成为大联合夺权的骨干，一切犯了错误而愿意革命的干部站起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为大联合立新功，建新劳。至于那些犯了错误而未觉悟的干部，希望他们悬崖勒马，认识自己的错误，再执迷

不悟，走下去就危险了。

不得不指出，最近一些干部应井冈山公社负责人谭厚兰等之声，以反造反兵团作为“革命”的表态，亮了一个大反“新思潮”的相，这是极端错误的。对于其中受蒙蔽的同志，我们好心劝告你们好好调查研究，把握大方向，从公字出发，打掉怕字，打掉私字。对于那些搞投机甚至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我们要大喝一声：你们这样做，是坚持错误，是犯了新错误，广大革命群众对于你们这样的“亮相”是不会答应的！

三、革命组织不分大小，革命不分先后，要本着平等一致、共同协商，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求同存异的原则，共同为大联合作出努力。坚决反对以大压小，视不同意见为死敌。谁搞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用私字夺权，谁就是破坏大联合。资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必须统统打倒。

四、从去年十月份至今，以谭厚兰为代表的井冈山公社的某些负责人，变本加厉，逐步升级，对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对我兵团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围攻。他们文过饰非，欺上瞒下，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造谣谰骂，强加罪名，蒙蔽群众，借军训之名，掀起反造反兵团的歇斯底里，把井冈山造反兵团打成“反动组织”“黑店”，把井冈山造反兵团某些同志打成“反革命”“布朗基”“蒲鲁东”“吴晗”“谭力夫”，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说成是“新思潮”的黑司令，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谭厚兰等人必须悬崖勒马，就地刹车，认清方向，回到正确方向、正确路线上来，必须听取井冈山公社广大社员要求整风的呼声，立即开门整风，大反自己的错误，作出公开检查，站到大联合的旗帜下来。如果再无视广大社员和革命群众的意见，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大反井冈山造反兵团，逆潮流，背人心，必然会被广大革命群众所反对所抛弃。

同时，我们热切希望井冈山公社广大革命群众认清这一点，以大局为重，为实现我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共同作出努力。

我们呼吁：一切革命干部，一切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要革命的干部，一切革命小将，广大党团员，广大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团结起来，为实现大联合，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决定性的胜利而奋斗！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打倒修正主义！埋葬帝国主义！

全校一切革命师生员工联合起来！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7年2月25日

13. 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纪要

(1967. 05. 04)

陈伯达 戚本禹

时间：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下午三点三十三分至六点十五分

地点：北师大井冈山图书馆

参加者：革命委员会委员及各大队干部等一百余人

首先谭厚兰同志把《教育革命》杂志递给伯达同志看。

陈伯达：这可见你们不严肃，你们办一个刊物，必须很严肃，每一个地方都不准错，每一个标点都不准错。教育人的要首先受教育，毛主席说，先做群众的学生，就是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来，这不是宣言的吧！总结群众的经验，这不是宣言的吧！（是实践），看来你们的水平不够高呀……你们研究过教育革命这个问题吗？研究过吗？

戚本禹：可不是研究吗？写了这么多文章。

陈伯达：哪里有很多文章，不算多嘛！

同学：才开始搞，前些日子光在外头大哄大嗡。

陈伯达：你们应当严肃一点。冷静一点研究，这个东西是百年大计。总之，各个社会有各个社会的经济制度，产生了不同的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是与社会制度和那个时候的经济制度相呼应的，与那个社会的阶级相呼应的，比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就算上层建筑吧，算上层建筑，是不是它为那个经济基础服务的？我们现在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嘛！我们教育制度这十七年来有些不错，很有些改革的，有些改革后的经验可以总结一下。还有是不是基本上我们学校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对不对？（谭：五八年教育革命那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那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对，那个时候，还搞过革命，后来又没搞下去，停了。我这几天看了北京大学编的一本《哲学文学史》，那本文学史用多少时间搞出来的，没有多少时间吧？我现在建议你们搞两本书，可以不可以，编它两本书，写它两本书？（可以。）几个月的功夫就可以编成一本书。一本是《世界教育发展史》，各个阶级、各个时期、各个社会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包括后来苏联的。苏联开始的时候，对教育制度是有些改革的，是比较主动，活泼的，过了一个时期，又停顿下来了，实际上基本上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沙皇时代的教育制度，五分制……教学方法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还有一本是《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可以不可以，书不要太长、太厚，否则看的人就不多了。写的生动活泼一点，要人家看得懂。经过“文化大革命”，大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多了一点吧？不要像这个记录稿。（指伯达同志在北大关于教改的座谈记录稿）糊里糊涂地就登出来了，不管它是不是对的……

还有你们这个师范学校本身应该怎么样？师范学校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过去没有这

种师范学校，封建统治时代没有什么师范学校吧？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产生的，中国学校制度基本上是搬外国的，搬资本主义国家的。解放以后又掺杂了一些苏联的，苏联基本上也是资本主义的。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下一代嘛！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教育制度不能再让资产阶级那一套来统治我们学校了，要产生新的教育制度，新的教学制度。

陈伯达：马列主义当然批不垮，马列主义要发展嘛，如果停止了马列主义是不行的。这个教育制度，马列主义还没完全解决，社会主义时代的教育制度，是不是完全解决了？你们师范大学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嘛，是不是？教育制度，世界的各个社会制度的教育史，中国的教育史，各个时候的，可以不可以搞这两本书。不然你们闲着没事做，这也是斗批改的一部分嘛！

戚本禹：你一说，他们会马上组织人搞的，没问题。

陈伯达：我的建议也不一定对，你们考虑考虑，一定要经过独立思考。

戚本禹：他这个书有用处，他编了以后教学还用。

陈伯达：师范大学应当研究这个东西嘛！

谭：有专门搞的，我们有个教育系。

陈伯达：教育系。应当不只教育系的工作，教育系比较窄（谭：过去都是苏修的那一套东西）应当是宽一点，各个系都吸收，这里面包括小学、中学、大学都要研究，小学和中学有些差别，中学和大学也有些差别，是不是？你们这里研究过没有？

（伯达同志阅《教育革命》并作了指示）教育制度上的改革是根本上的问题。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主席说不但学文，这个文包括很宽，学做工、学做农、学军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学要改革，资产阶级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让戚本禹同志念主席五·七指示中有关学生的一段），这就是最高指示嘛！这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意见。

还有就是教学方法怎么搞，究竟是一个先生讲，学生听，这个方法，还是怎么样搞？过去不是有一句话，“教学相长”嘛，又当学生，又当先生，又当先生，又当学生，是不是可以这样。但是小学就有点不同，中学是不是还要有人管，也不一定采取过去人管的方法（戚本禹：启发式的），是要启发式的，入学年龄，比如说现在七岁才开始读书，（谭：五岁就可以开始）七岁实际上有的就是八岁了，到那个时候才开始读书，那是硬灌，填鸭式的。提早到什么时候合适，你们先研究一下吧！

过去中国读书可能有的五岁、六岁、七岁，五岁读书，读私塾，有的可活到七八十岁。

谭：发蒙越小越好，发蒙大了不好，六岁就可以念书。

陈伯达：五岁，有的五岁就可以的，你得看什么时候生的，有上半年，下半年生的就不一样。

谭：过去限制的太死了，差一个月也不行。

陈伯达：那我看这是（谭：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他这个不仅是教条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过去中国一般读书的人五岁上学，五岁时开始读《论语》，读孔子的东西。孔子有三千弟子，三千弟子，他一个人怎么能教这么多啊！我看他不是上课的方法，无事跟大家聊聊天，启发启发，可能很有启发性的。一个问题跟一个学生说一样的话，跟另外一个学生说另外的话，看对象教学。

根据十七年的经验，我们教育制度应当怎样革命，你们可以讨论。这个杂志（指《教育革命》）这一期不算了吧！另外再搞一个创刊号吧！……这个东西要经过一个时期的讨论，

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要提到，不要只一个人说话就算了，只谭厚兰说话就算了，她是你们的权威是不是？

谭谦虚地说：不是。

戚本禹：勤务员。

陈伯达：无产阶级的权威？（谭：勤务员）勤务员也可以当权威，有权威的勤务员，有非权威的勤务员是不是，完全没有权威也不行啊！你们读过《论权威》这篇文章吧！（读过！）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权威，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权威，学术权威也是这样：有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有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是不是？需要说的我都说完了，（对戚本禹）你看怎么样？（戚：大家说）。

还有一本书，等文章都发表了，搞一个讨论集，教学制度的讨论集，一个集的讨论不完可以分成几期，分成几集，第一集、第二集就这样吧，给你们出了这么多题，你们就有工作可做了嘛！是不是就不一定要武斗了吧！……

戚本禹：我没有学问。大家讲吧，伯达同志来嘛，想听听教育改革方面的意见，有什么想法。你们这里专管教育，师范大学，都是老师。刚才讲好为人师。（笑）都是想做老师，一出来就是老师。刚才有人说是培养“工作组”的，过去老师就是工作组，过去老师在学校里专门整学生，培养工作组的大学，主席讲了嘛实行突然袭击。

（同学提出今后不要师范了。）

陈伯达：也是师范学校的，还当过大学教员……解放前中国的大学教授都是骗人的，学生一般都不上课，上课也不管你教什么，也不听你的，做样子的，先生瞎说一通，就下课了，无非是拿几个钱。现在可以改变一个方法，不采用教师制度，可以不可以？

戚本禹：不要教师，大家讨论讨论吧！

陈伯达：小学还是要，辅导员就可以嘛。这个你们讨论，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在你们的刊物上发表，不要搞成一派，要有两派。……

陈伯达：有很多毒草，你们烧掉了就没有批判对象了，是不是？毒草要批判啊！

戚本禹：现在毒草都不准借，你们图书馆准借吗？（借）

陈伯达：这个没必要，要提倡积极，要提倡无产阶级的积极性。现在要搞教育制度发展史，没有参考书不行吧！要从毒草中来看出问题啊！

谭：我们把刘少奇以前发表的东西都搬出来了，可以借。

陈伯达：你们要编书，没有这些不行啊，我看可以编两部，一种编两部，三部也可以嘛，不同观点的，各写各的，百花齐放。有的可以写短文在报纸上发表，一二百字，二三千字也可以，不要都搞大文章五千字就长得不得了了。不一定写得很长。

（天文系同学发言，提天文系要不要，和天文系要不要在师范学校办的问题。）

陈伯达：天文学的发展跟农业的发展也相联系的，将来工业的发展跟天文学也还有很大的联系。发展到现在，工业的发展与天文学很有关系的，过去的农业的发展，就是跟天文学的发展是有关系的。科学的革命，自然科学的革命，首先是从天文学革命开始的。哥白尼发现了地球绕太阳转的，这样就起了一个大革命。过去的人们，都认为太阳是绕地球转的。天文学不能说与国际旅行没有关系，看怎么搞的问题，将来是很重要的，将来要打通宇宙的航行道路。

（同学：师范大学要不要办一个天文系？问题是在哪儿办？）

陈伯达：可以研究嘛，师范大学它要搞一个天文系也可以嘛。首先是要不要师范大学。

同学：实际上其他重点大学也培养教师。

陈伯达：那也是嘛，农村教师教了那么多年，不一定是师范大学的……

谭：师范大学没有什么必要，师范大学毕业后有的当干部，有的干别的去，不一定完全当教师。

戚本禹：你们学校毕业有多少人当教员，多少改行？（众：好多都改行。）

戚本禹：占多少比例？调查一下。

（同学：生化专业三分之二改行，地理、历史大部分都改行。）

陈伯达：过去师范学校的学生，革命的相当多。过去北京流传着“北大老，师大穷；清华……”（戚插说：清华洋。）北京师范大学穷光蛋多，比较穷的人多，当然现在是统一分配的啰。过去的革命性是比较……（谭：革命性强一点。）

陈伯达：可也不一定。过去师范大学在几次革命运动中并不是很突出的。（念条子：将来地理系不要了，要斗、批、散。）哎呀！斗批散很容易呀！地理系怎么说不能够参加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呢？

戚本禹：这里说是指教学内容，教学改革问题，而不是要取消。

陈伯达：学地理很重要，不管学哪一行，都要懂一点地理知识。

戚本禹：主席的地理很熟悉。

陈伯达：是啊，你不管学哪一行，学教书也罢，学工也罢，学农也罢，打仗也罢，总之地理得学，所以要看用处。怎么教是个问题。

戚本禹：时间不一定那么长，学好几年。

陈伯达：学很短很短就够了。

戚本禹：中学学生以后还要学地理，还得有教员吧，地理系恐怕还得要。

谭：地理也可以自己看得懂。

戚本禹：小学你总还得教吧！

陈伯达：我看这样吧，各个教室、图书室，都放有大地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天文图。究竟有多少大的星星，现在已经发现了的，小的星星已经知道了的，都可以注出来，有哪些星座……

体育系代表发言说：他们委托我问中央首长体育系怎么改。

陈伯达：我们问你们，提出问题就讨论，研究一下，你们讨论教员怎么办，要不要，包括要不要功课，怎么教学，怎么学法，学生和先生的相互关系，这些都要讨论。怎么学，怎么教，教员的作用是什么作用？要真正来一个革命。

戚本禹：办新式的无产阶级学校不是简单的事。

（周跃文同志代表理科几个系发言，向首长反映情况，李少明同志代表文科几个系向首长反映情况。）

陈伯达：你教中文的，你今年多大岁数？

李：四十岁了。

陈伯达：你什么时候毕业的？

李：我是五零年毕业的。

陈伯达：教什么，教中国文学吗？

李：现代文学。

陈伯达：现代文学，课本给我看看，好不好？

李：师范大学到底要不要？

陈伯达：你们讨论一下嘛！

（李少明提了文科教改有关的问题，请陈伯达和戚本禹同志解答。）

陈伯达：这个师范学校要不要，要是保存哪些系。这个文科不单是师范学校，还包括其他学校，其他的大学啰！文科要不要，要……（这一句不清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人，应当是能手，要有天文知识，要有地理知识，要有教学知识。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人。应该是这样的。要能够当教员，能够当工人，能够当农民，我这是瞎说的啰！不晓得是不是这样的。师范大学究竟要不要，可以经过你们自己讨论。文科要不要，要，要哪些系？如果要，教学应当怎样改革？我觉得作为一个工人哪，要有文化的，还要有各方面的知识，懂得天文的，他一定有普通的天文知识，过去这个船夫，帆船，不是汽船，船上的水手，他懂得天文，懂得地理，……没有天文知识，这个船万一碰到什么自然灾害，还不行呀！在大风的时候，懂得天文知识，就晓得往哪里走呀！社会主义社会的比较完全的工人，他能说能算，同时他又有各种的知识，各方面必须的知识，有普通的知识，天文、地理的普通知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农民、工人、共产主义社会的农民、工人都要这样。

现在我们的这些学生都有点儿可怜的知识啰，……在学校里面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所以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必须打破，文科必须要大革命。文科是学文的嘛，一般大都要学的。理科、工科究竟怎么搞法，都要经过研究，经过讨论。师范大学的确是一个教学革命阵地，你们首先出版了这个刊物，可是没出版好。……教育革命，你们学生来回答，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不是全部的能回答，要能够回答一些问题。

（历史系一同学发言说：历史系比较难搞。）

陈伯达：历史系最好搞啰！……（历史系同学发言后）过去这个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剥削阶级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学历史，应当是颠倒过来了，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没有劳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家都去劳动，停止劳动，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我们都是劳动人民养活的，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没有劳动，没有人做工，没有人种庄稼，人怎么能活下来呀？劳动人民的历史，中国过去的历史，一百多年以前的历史，主要是农民的，有两千多年，农民战争的历史，农民对地主阶级斗争的历史，……陈胜、吴广这大概都是劳动人民，揭竿而起嘛，把当时秦朝打垮了嘛，只几个月功夫嘛。农民战争，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是劳动的历史，过去的历史完全被统治阶级垄断的，应该知道统治阶级的历史，对统治阶级剥削群众的历史也应该知道，首先要懂得这些阶级斗争史。……教学的问题也要研究，……要不要这个系，这个系是个什么样的系，历史系要不要，需要不需要……

历史的真相被歪曲了，被剥削阶级歪曲了，被剥削阶级的御用学者歪曲了（以翦伯赞为首的学者）。现在要恢复历史的真面貌，过去中国的历史事实，被颠倒了历史要重新翻过来，这是戚本禹同志做的工作嘛，他现在还想做，我就没有这个勇气了，我现在已经不行了。（众笑）不是说没有这个勇气，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修正一下，随时修正错误，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了。勇气还是有的，只靠勇气也不行……我应该拜戚本禹同志为师，他能够收我这个徒弟，我很欢迎。（戚：你把我放在完全被动的地位。）被颠倒的历史应当颠倒过来嘛，年纪大的人应该拜年纪轻的做先生，这话对不对？（戚：那你是先生啦，大家都是大人物，你把历史颠倒了嘛。）我应该拜同学做先生，我这样才能前进，才能越来越进步。

今天不一定再谈了。提一个意见。你们学校有多少人？（七千多）七千多人，几千个头脑，集合在一起，集中起来，就有无穷大的智慧，可以先开一些座谈会，交换交换意见，做长的比较系统的发言，允许几种不同的意见发言，也允许错误的意见发表嘛！这样搞，就慢慢搞一个头绪来了。今天我们是来请教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我们说了就算了，不行的，你们现在应到各中小学去，到各大学去，互相交换意见。

来源：1967年11月北师大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教育革命学习材料（一）》

14. 军政训练好

（1967. 05. 16）

《人民日报》编辑部

今天，本报发表了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4672部队，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军政训练、支持“左”派的经验。这个经验很好，值得推广。

大、中学校的军政训练，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

毛主席指示我们：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

毛主席还指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毛主席的这些英明指示，给全国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创举，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大、中学校广大革命师生最热烈地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最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

在军政训练过程中，解放军的广大干部战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广大革命师生密切合作，全心全意地搞好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在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能够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及时加以纠正。他们受到了广大革命师生的热情欢迎和坚决支持。

在北京师范大学执行军政训练任务的解放军同志，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进行军政训练，一定要支持“左”派，依靠“左”派。革命“左”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坚决的捍卫者，他们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每一个参加军政训练的干部战士，自己必须具有“左”派的立场，“左”派的思想，“左”

派的感情。同时还要进行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善于识别“左”派和发现“左”派。只有这样，才能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才能做到支持“左”派，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使军政训练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前进。

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是军政训练的根本任务。军政训练，应该是政治训练带头，用政治来挂帅。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广大革命师生只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穷的武器，才能够胜利地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大批判、大斗争，才能胜利地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这就一定要很好地组织广大师生，带着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坐下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真正钻进去了，见诸行动了，那就说明军政训练确有成效了。如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一条抓得不紧，抓得不好，不能把各种错误思想，把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从头脑中排除掉，那么，军政训练就会流于形式，就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提高“左”派队伍，提高广大群众的目的。

大抓狠抓活的思想，坚持耐心的说服教育，是实现团结大多数的重要环节。解放军要结合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左”派队伍中的各种思想问题，解决犯错误干部和受蒙蔽群众中的各种思想问题。要反复劝说革命“左”派，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懂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道理，并且按照这个道理办事。要正确地对待犯有错误的“左”派组织，正确地对待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对他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排斥和歧视。要帮助革命“左”派学会做群众工作的过硬本领，善于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抓住各种思想苗头，运用谈心方式，开展思想互助；善于把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政策，变为广大群众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政策。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参加军政训练的部队同志，必须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作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根本要求。在学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一定要坚持“旗帜鲜明，坚持斗争，具备条件，讲究方法”的原则。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积极精神，又不要操之过急，急于求成。

广大的革命师生应当热烈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虚心向解放军学习，和人民解放军密切合作，团结一致，把大中学校军政训练搞好，把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社论）

15. 谭厚兰在“九·一”保林会上的讲话

（1967.09.02）

谭厚兰

同志们：

当前形势是大好的，大好形势最重要的标志是：全国全市、上上下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对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少奇之流从政治、军事、思想上的大斗争、大批判的高潮。市革委会在我校召开大批判现场会后，进一步掀起了大动员、大批判的高潮。形势就是好得很！这正击中了敌人的要害，这正是置敌人于死地！

从我校来看，市革委会在我校召开现场会，这是对我们巨大的鼓舞，对我们大批判也是大检查、大鞭策，我们红卫兵和全校革命师生遵照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进行了肯定成绩、找出差距，把大批判推向新高潮的总结活动，这个总结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过程，很多系、班和战斗队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同学们学得很好。这个总结的过程也是同志们互相学习的机会。系与系、班与班展开了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活动。这次总结，也是我们向兄弟院校学习的好机会，很多兄弟院校在各个方面做出了更好的成绩，我们向他们学到了好经验。这就更进一步端正了我们对大批判的态度，进一步认识了大批判的意义，这也是个大的动员。我们深深感到我们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紧跟毛主席的，是紧跟毛主席的党中央的，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是最听毛主席话的，所以，我们师大的形势也像北京和全国的形势一样，好得很！

革命大批判，标志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搞不搞大批判就是执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检验一个队伍是马列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小资产阶级逍遥派、摇摆派的标志。但是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的，就是面临着这样一个大好形势，正当大批判进入新高潮，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发出更大攻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们看到：有些家伙正在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大批判的高潮。他们这样做，就是从根本上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阶级敌人的一个大阴谋，我们每个革命同志一定都要提高警惕，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大批判的大方向，戳穿敌人的阴谋。我们坚定地认为，谁要破坏革命大批判，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谁就是反革命！我们一切革命同志要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动摇，就是要坚持大联合，三结合，把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

现在要说一下，同志们提到的一些问题，同学们最近听到一些流传，大街上贴了打倒林杰的标语，说林杰犯了错误，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暂不要管它，我们抓的是问题的本质。但我们的态度是：第一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不管前面有多大风浪，有多少激流险滩，不管要我们付出多大代价甚至生命鲜血，我们都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我们对于发生的一切问题，我们的最高准则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用毛主席的阶级观点去分析。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拥护谁；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打倒谁！第二，从一年来“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革命的的大风浪中，我们认为林杰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信得过他。对于发生的一些问题，我们坚信毛主席、坚信“中央文革小组”一定能作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的任务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新功、立新劳！

大批判的过程，就是坚持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的激烈的复杂的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更深入的阶段，必然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这种斗争的形式就更加尖锐、更加复杂，这就更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它，用毛主席无产阶级阶级观点去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正确的结论。坚持革命大批判，就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过程中，我们就是要誓死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革命大批判的大方向，不管有多少曲折，不管有多少干扰，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的同志们，一定能够排除干扰，一定能够把大批判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师大井冈山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中央文革”亲切关怀下，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英勇斗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井冈山战士，是忠于毛主席的，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忠于“中央文革”的，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谁要否定我们的大方向，是办不到的，是捞不到半根稻草的！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我们反对周总理，说我们整理了周总理的材料，还说什么“勒令”我们交出来（众呼：叫他们见鬼去吧！）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师大井冈山从来坚信周总理。这些别有用心家伙，污蔑我们反周总理的唯一证据，就是我们坚决地反击了“二月逆流”。而他们为了保他们的主子，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他们认为，我们反二月逆流却是“逆流”，二月逆流倒是“红流”，我们要问：难道你们保谭震林保对了吗？难道你们保余秋里是保对了吗？难道你们保陈毅是保对了吗？我们师大井冈山人，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声望多大，都要打倒！还有人说什么我们在武汉支持了百万雄师，说我们“双手沾满了武汉革命派的鲜血”，要我们低头认罪，你们有什么法宝，就拿出来吧！我们和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贡献我们的力量。我们要积极响应江青同志号召：文攻武卫。我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们要拿起笔做刀枪，同时要拿起武器，武装自卫。谁敢反对毛主席，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大批判这个大方向，我们就要和他坚决斗争！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衡量一切，分析一切，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我们的红卫兵战士，革命师生，一定能够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建新劳。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战略部署，忠于广大劳动人民，一定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永不变色，保卫我们国家永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胜利前进！不但把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要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为世界革命作出我们的贡献！

打倒刘邓陶！

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誓把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刊登在北师大第67期《井冈山》报第一版、第三版
据1967年9月2日师大67期《井冈山》报翻印

16. 谭厚兰的检查

(1967. 11. 15)

谭厚兰

王力、关锋、林杰等人倒台以后，谭厚兰1967年11月15日晚在师大“斗私批修”讲用会上，作了题为《斗私批修，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检查。全文如下：

井冈山红卫兵战友们，解放军同志们，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最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在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下，在解放军同志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帮助下，通过参加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通过自己激烈的思想斗争，逐渐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自己确实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私”字经常在我脑子里存在，严重地妨碍我前进。在认识自己错误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林彪同志的“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一份革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这一教导的深刻含义。今天，想把最近的学习，我对前一段所犯的严重的政治错误，错误的根源，以及沉痛的教训，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由于自己平时没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充分地改造世界观，因而，在一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身上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八、九月份那一段，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是很难过的。由于我的错误的严重性，给“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师大“文化大革命”，给巩固师大的红色政权，给我们井冈山的广大红卫兵的名誉，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不起井冈山红卫兵战友和广大的师生员工同志们。这一段来，很多同志，包括现在兵团的许多革命同志进行了及时的严厉的揭发和批判，这对于挽回由于我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帮助我认识和改正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里我表示最热烈地欢迎和衷心地感谢，并希望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作更加严肃的尖锐的批判。我想主要谈谈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林杰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我和有的同志，对林杰、吴传启、卢正义等人直接和间接打过交道，特别是和林杰工作上的联系比较密切，并且一度在不同程度上或者为他们辩护，或者干脆死保他们。毫无疑问，正如同志们批判的那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立场错误，在这个问题中间的核心问题是林杰问题。在我和其他一些坏人打交道中，林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文化大革命”舆论时期，在批判三家村时，我和一些同志在红旗杂志社同林杰一起工作过一段。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直和他有联系，直到“九·七”事件前，我们与他的关系，同志们大致是有所了解的。应该承认，我们同林杰的接触是很多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许多问题都受了他许多影响。首先是在北京两大派问题上，自从二月逆流以后，在北京逐渐比较明确地分成了两大派，也就是发展到后来的所谓“天派”和“地派”。这两大派基本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中冲杀出来的造反派组织，我们在反对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方向上来看是一致的。在前进的道路上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在这个问题上错误多一些，有的在那个问题上错误多一些，这两派之间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分歧，有的原则性分歧，有的是非原则性分歧。这些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可以“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即双方都本着多做自我批评的精神，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我们是完全可以团结战斗在一起的。但是林杰等人在这中间，就为了他们的政治需要，采用了拉一派打一派的资产阶级政客手法，抓住我们的私心，煽起我们的派性，扩大分歧，加深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直接受其利用的，因而犯了很大的错误。这里我想简单地举几个例子，说明他是在哪几个问题上插手，因而扩大两大派分裂的。

第一是在北京日报的夺权斗争中。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舞下，全国都掀起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高潮，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参与了北京日报的夺权斗争。但是我们自己是带着私心杂念，带着小团体利益不可侵犯的严重的宗派情绪跑去帮人家夺权的，这本身就已经有错误了，又认为自己在夺权问题上原则是对的，置革命派大联合于不顾，与北航红旗的革命战友吵起来了，本来解决了就完了，但林杰公开讲话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这样一来，我们是有恃无恐的，因而双方打得更欢。以至于闹到中央首长那里，从此双方伤了感情，一直存在着隔阂。

第二个是在教育部夺权问题上。在教育部我们支持延安公社，北大支持北京公社，也吵得很厉害，但林杰也是无孔不入地发表意见，加剧了矛盾的发展，甚至还去慰问我们被北大打伤了的同学，这样更坚定了我们的一些错误做法，把矛头指向聂元梓同志。卢正义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北大的同志指出卢正义是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坚决同他划清界限。但我们却出自派性，再加上林杰的支持，不但不接受新北大同志的意见，反而一意孤行，公开为叛徒卢正义辩护，说什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的，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说他是叛徒的材料“不充分”，“当时他还很年轻，没有形成定型的世界观”等极其错误的论调，根本不愿意去进行调查研究和作认真的阶级分析。在卢正义问题上犯错误，教训是很深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听信林杰的话，把敌人当朋友看待，这是立场性的错误。

第三个讲一讲七、八月份在揪刘火线上，为了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又和北航发生了分歧。本来在对刘少奇的批判斗争这一大前提下，顾大局，识大体，谦让一下就没有什么了。但我们却私字当头，派性高于一切，对北航刚到就想当主席，就打抱不平，这时林杰就别有用心地挑动说：“没有北航，你们就开不成会？就革不了命？”就这样在敌人面前，各拉山头，造成严重的分裂局面。真是亲者痛，仇者快。

再一个就是在学部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受到林杰许多坏影响的，我们是上了当的。对于潘吴，我们过去根本不了解，又根本没有作调查研究，我们没有想到学部有那么复杂。由于林杰与潘吴这些反党分子勾结紧密，因而我们也就和潘吴发生了关系，我们最早和学部发生关系，是从批陶铸开始的。联系比较多是在二月逆流到社会上反潘吴这一段，直接和潘吴接触也是这一段。这一时期，我见过吴传启四次面：第一次是高教部夺权，第二次是在民族文化宫，搞一下什么北京市委员会，给“中央文革小组”一封建议信，第三次是二月反二月逆流时，吴传启来到了我们学校，说他们掌握了李富春同志很多材料，他们要先搞谷牧、薛暮桥，让后再搞李富春。第四次就是在体育馆参加“七一”批陶大会，兵团所展览的那张照片是在那个大会上主席台上照的，大会上通过王恩宇介绍，才知道学部有个潘梓年，见到潘梓年，我就只那一次。由于我和林杰接触多，又介于我们对林杰的信任，因而我们和学部一度接触较多，再加上潘吴这些特务叛徒别有用心地利用我们，千方百计地把我们和他们拉在一起，好招摇撞骗，便于他们可耻的反党活动。在这里，向大家交代一个事情，就是在二月份时，王恩宇用“中央文革”名义，从我校邀请了二十几个同学作调查组，调查中央各口的情况。现在看来，这个调查组问题很大。而我一方面是听信了他们说是“中央文革”调人，一方面也是由于相信林杰的缘故，因而丧失了阶级警惕性，阶级斗争观念差，而犯了错误，帮了敌人的忙。基于卢正义问题的教训，当四月份社会上揪潘吴时，我没有轻率地发表什么意见，特别是看到北大、三红整理潘梓年的材料，看了潘梓年从1928年到1948年，一味吹捧蒋介石，攻击鲁迅，我当时一看，就认为他和吴晗差不多，是个反共老手。当时社会上也说吴传启历史很复杂，当时我觉得吴传启历史复杂，要搞调查研究，要少和这些人打交道。从那以后，我们就很少主动和学部打交道了。由于自己头脑中的私字派性十足，在以后这一段实际工作中，仍然和王恩宇他们打过一些交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对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而在上述这一系列的错误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上，相反和毛主席的教导背道而驰，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派性立场上，也就是基于这样历史性的派性错误，致使我在“九·一”到“九·四”又犯了更为严重的错误，也就是林杰问题被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对抗中央战略部署，从小道捅出，企图把水搅浑，破坏“文化大革命”，而我就上了敌人的圈套，一度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质上起到对抗中央的作用。同时也由于我的错误，使革委会和许多同志都犯了错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这里顺便说一下，许多同志，特别是校革委会的一些同志，由于我的过错使他们犯了错误，使他们受到了委屈，我是很难过的。我为什么会在九·一到九·四之间插手了林杰问题，保了林杰，一度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扰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呢？我犯错误，主要是由于私字，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发作，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关头，派性就代替了党性，以派性斗争代替了阶级斗争，抓住了事情的表面现象，看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做不疲倦的斗争。”在林杰这个问题上，我是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的。由于我是以私、以小团体利益、以私字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就看不到林杰问题的严重性，又由于我们和林杰之间联系密切，以前别人也把林杰叫做我们的小后台。

毛主席说：“小团体主义是放大的个人主义。”我之所以在那些日子里保林杰，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是怕林杰发生了问题，牵涉到小团体利

益，牵涉到个人的利益。当时当听到外面有人要打倒林杰，并说他是反革命两面派，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心里想，搞了一年多了，难道和一个反革命两面派搞到一块了，不敢正视林杰问题。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我对林杰在当时还划不清界限，从阶级根源来讲，是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思想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决定了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软弱性，特别是不能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也就决定了我跳不出那个圈子，就看不清斗争的阶级本质，也就决定了我划不清界限，也就决定了我犯保林杰的错误。从世界观来看，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范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利己主义的，就是私字。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上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自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必然在林杰问题上顽强地表现自己，表现在行动上，在以前开大会保林杰，开广播车发表声明，到红旗去，本来是保卫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决搞大批判的游行队伍，中途也擅自决定拉到红旗去，同时还说什么“和林杰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什么“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什么“我们信得过”，这些都是错误的。在这期间林杰的老婆王乃英来师大探听消息，也接触过，也接待过。学部的王恩宇本来来探听消息，也接待过。因而造成了这一严重的政治错误。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我现在的认识已经向“中央文革”汇报了，并且请求组织上的处分。同时也愿意继续听取同志们的批判。在这一两年来的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中，由于私字作怪，而且又不能很好地克服，自己最近受了林杰和其他坏人的利用，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像某些人听说的那样，我是林杰反党集团的成员，直接参与了许多反党活动。这一点，我可以对党对广大革命群众，对“文化大革命”负责。

第二个问题是对待总理的态度问题。今年一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伟大号召，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夺权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权，资产阶级必然要反夺权，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决不甘心于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从极“左”的和右的方面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进攻。今年二月，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股逆流是从右的方面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英勇的井冈山红卫兵战士和社会上广大革命派战友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展开了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反击，由于我们广大战士和兄弟院校的广大革命战友以及广大的工农兵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善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形势发展的新动向、新问题，在“中央文革”的指挥下，粉碎了以谭震林为代表的来自极右方面的复辟逆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师大井冈山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毛主席说：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要防止“左”倾，在打败仗和外人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在取得反击二月逆流的胜利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是表现出极“左”情绪的错误。那时当我们调查发现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感到非常气愤，决心和他干到底。但这时发现从右的方面表现出来的反动势力比较严重，发现有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同时由于批谭有成绩，头脑就不冷静了，不但要打倒谭震林，还打倒余秋里，同时还支持别人打倒陈毅，炮轰李先念，那时我们对谭震林、余秋里掌握了很多材料，但对陈毅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并不很了解，但心想，我们是红卫兵组织，反正是造反，犯点错误也没有什么，能打倒就打倒，打不倒就拉倒，反正轰一轰没有错，自己思想里有个宁“左”勿右的想法。自从这个情绪，对几个副总理摆开了阵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

密战友、好学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在早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对毛主席思想领会掌握得很好，他及时地发现了这种倾向，他一面从爱护革命小将出发支持了我们的革命行动，肯定了我们的大方向，一面指出了对于他们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对此很不理解，也就是我行我素，听了总理的指示后，我思想斗争仍是很激烈的，认为总理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讲话的，但我们的行动与总理的指示是相矛盾的，怎么办？结果不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而是采取实用主义手段，并千方百计地找出口子，说什么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不同于我们，说话要稳重，如果说余秋里可以打倒，那就没有什么群众运动了，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后来总理再三教导我们，我不但没有认真去思考，紧跟主席思想，及时改正错误，反而受了社会上极“左”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对总理指示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能接受的就接受，不能接受的就走，就自我辩解，同时以我自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无组织无纪律性对待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和科学性，结果十分错误，主观主义的认为，总理没有“中央文革”革命性强，没有“中央文革”旗帜鲜明。当时想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又十分错误地认为周总理是不太坚定的，得出这个十分错误的结论后，还自以为是，就在这种错误思想影响下，在作战部的一个声明里确实把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坚定的”三个字划掉了，这是我对总理错误态度的大暴露。现在回忆起来，我感到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周总理，特别是想到周总理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紧跟毛主席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心里就很难受。我决心以今后的实际行动来纠正这个错误，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关于外面大字报中的许多铁证，什么我整了总理的黑材料，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对待总理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不坚定。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问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动摇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五·一六兵团，就采用把总理和“中央文革”对立起来，恶毒地、离间挑拨的卑鄙手法的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教员，从反面给我极大的教训，我认识到我那种错误思想的严重性，我也认识到了周总理不仅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而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周总理是毛主席非常得力的助手，很好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我要就我对周总理的严重错误、对总理态度的严重错误，向总理和“中央文革”请罪。也希望同志们继续对我进行严肃的批判。

有人说，我们是五·一六兵团的重要成员，师大“井冈山”是五·一六的黑据点，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一点，我可以向党中央向同志们负责。

第三个问题是我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的问题。同志们在斗私批修的过程中，我认识到这个问题是我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要害的问题。一小撮别有用心家伙制造的九·七反革命事件给了我极大的教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给我触动很大，毛主席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就是因为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我现在也知道这些东西，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例如，在上面发号施令的时间多了，以一个普通小兵到群众中去的时间很少。除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学校大的方针，不是首先把政策交给群众，想到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向群众请教，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是自己想一套硬贯下去，处理很多问题，不是首先听取下面群众的意见，作认真的调查研究，有时就凭一知半解的东西，主观地决定问题，处理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成为好的领导，作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还得对自己的工作对象、

工作环境，做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工作若明若暗，一知半解，或者全然不了解，就在那里哇哇啦啦议论，在那里发号施令，指挥别人，工作必然做不好，群众将会起来造这个领导的反。由于自己的工作主观，当然就有同志造反，提出不同意见，而自己对那些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对于一些同志的错误，而自己不是热情地去帮助他们，有时或者采取粗暴简单的态度，或者甚至训人，或者采取疏远的态度。在革委会工作中，我们民主作风也是很差的，有些事情不是经过常委会或委员会集体研究，而是自己或者几个人决定，有许多事只是一两个人知道。干了些什么也不搞汇报。前一段作战部在对外问题上都是这样做的。比如在对待财经学院问题上表现出很突出。这也是我犯这种或那种错误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我们犯了错误，而在较长时间得不到改正的重要原因。我知道，现在许多同志对我是有气的，一方面是我犯了错误，给党的事业，给“文化大革命”带来很大损失，而另一方面是我严重地脱离群众，以至于在“九·七”事件中很多群众发生了动摇，这也是由于我经常不到群众中去，群众不了解我缺乏民主作风，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因此同志们在“九·七”事件中犯了错误，不应该由同志们来承担，应该由我来承担。从某种意义上讲“九·七”事件是对我脱离群众、缺乏民主作风的错误的很好的惩罚。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实质是如何对待群众，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是公字当头还是私字当头的问题。一个私字当头的人，他既不可能正确对待群众，也不可能正确对待自己，他就不可能时时刻刻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是把功劳归于自己，作为高于群众之上的骄傲自大的资本。

井冈山红卫兵战友们，解放军同志们，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要依靠学校中广大的革命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体现了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殷切的希望和最大的信任。这个英明的指示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且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

结合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主席这个最新指示检查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自己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当他受压抑的时候，为了自身的解放，有一定的反抗性，小资产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反对资产阶级，但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是有限的，一旦改变了受压抑的地位，自己自满自足起来或飞扬跋扈起来，或者逍遥自在起来，不是吗？在一年多以前，我还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一年多以后地位改变了，并且起了很大的变化。在一片胜利声中，自己被冲昏了头脑，飘飘然起来，满以为自己了不起。在林杰问题上为什么会犯错误呢？骄傲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上没有请示中央，没有认真学习中央指示，下面脱离群众。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正是违背了这两条原理，必然站错了队，必然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范畴，往往是带着“私”字造反，“私”字膨胀，派性发作时劲头十足，他总是从个人和本派的利益出发观察形势，权衡得失，常常分不清敌人和朋友，很容易受阶级敌人挑拨煽动，我们在北京两大派斗争中，不正是这样通过自己学习最高指示，通过自己犯错误的严重教训，我深深感到狠斗“私”字，彻底改造自己世界观是多么重要，不狠斗“私”字就不能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狠斗“私”字，就不能正确的认识分析形势，就不能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甚至就要走到邪路上去。不狠斗“私”

字，就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在我犯了这一系列错误之后，在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也是有许许多多活思想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特别是原来一向自信，很骄傲，总觉得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这次突然犯了个大错误，思想很苦恼，同时产生了一个活思想，就是觉得非常委屈，认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多，犯了错误检讨了，改正了也还是通不过，还要作第二次检查。思想上就是有些顶牛，因此对自己的错误总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总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包袱越背越重。在解放军同志和革命战友的热情帮助下，用最高指示来对照自己的思想，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如何对待群众，对待自己的问题。还是一个“私”字在作怪。当我想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具体领导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师大的伟大胜利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啊！这就是当我们犯了错误，特别是当我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毛主席、党中央还那样坚决支持我们和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九·七”通告，谢胡、希尔同志来校访问，教育方案的发表，“九·七”事件以后，周总理同中央首长的讲话都一再支持师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切多么使人激动。我想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正视自己的错误，迅速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呢？我应该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以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特别是我自己犯了错误以后，我就特别想到，我出身一个贫农的女儿，没有党就没有一切，没有党就没有今天。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毛主席、党中央一直关心师大，至于在运动中打成反革命，也是党中央、毛主席来解放我们的。自己越想越感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为党做什么事情，但是又那么骄傲。“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和毛主席对我们抱有那么大的希望，自己犯了错误又不肯改正，自己越想越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在反复的思想斗争中，特别是在解放军和革命战友帮助之下，想到自己要很好的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应该挺起腰杆继续干革命。因为毛主席、党中央为师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撑腰，师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一定要为毛主席、党中央争气，一定要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期望。师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生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要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身，天崩地陷顶得住，海枯石烂不变心。对自己在这个思想斗争中开始对自己的错误是不认识的，经过这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自己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

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特别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红色风暴正在席卷全国。我们师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发扬应该继续发扬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为彻底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建立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教育体系，为在教育战线大树特树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贡献我们的力量而英勇奋斗。

17. 关于北京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

(1967. 12. 11)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

最高指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林副主席题词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一、形 势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汹涌澎湃的大海狂涛，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席卷了北京师大。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一年多来，古老的北京师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些曾在师大横行一时，称王称霸的程今吾等党内走资派，孙有渔反动工作组，伪筹委会、伪红卫兵师、林杰阴谋反党集团以及刘邓陶的大大小的代理人，被英雄的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排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种种干扰，逐步地、深入地、巩固地得到树立。

一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绝对权威的胜利史，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诋毁这种绝对权威的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及思想行为进行生死大搏斗的革命史。

毛主席说：“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人民群众越来越充分地发动起来，以越来越高的革命自觉性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正是目前形势大好的最显著特征，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最基本的原理。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林副主席的最新题词，是响彻云霄的冲锋号角。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又一次掀起了大规模宏伟的大树特树毛主席思想绝对权威的群众运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师大形势同全国一样，也一派大好。

“九·一”这是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要转折点。林杰阴谋反党集团倒台了。这个一手炮制“李春秋定理”[注]（即：北师大李春秋的大字报《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的反革命两面派倒台了，林杰是“绝对权威”，谭厚兰碰不得的神话破灭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滚滚洪流向李春秋分水岭发起猛烈的冲击。

“九·一”之后的三个月里，尽管林杰的幽灵仍在千方百计地护卫那个破烂不堪的分水岭，但是经过严峻阶级斗争洗礼的井冈山革命派，越发深刻地看透了“李春秋定理”的反动性，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自觉性空前提高了。他们在大好形势下，不忘阶级斗争，决心不再沉默下去，而要亮明旗帜，摆明观点，更加奋勇地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一场彻底砸烂“李春秋定理”，在师大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暴风雨正在来临。

这标志着师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更广阔更深入的新阶段。

让那些认为“九·一”以前形势大好，“九·一”之后形势不好，日夜怀念自己的“全盛”时期的人们向隅而泣去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二、彻底砸烂“李春秋定理”

为在师大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是仅仅推翻一个党内走资派程今吾吗？

是仅仅赶走一个孙有渔反动工作组吗？

是仅仅打倒一个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吗？不是，绝对不是！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还不是根本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从根本上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永远沿着胜利的航道前进！

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可以拔掉修正主义根子，保证世代永远不出修正主义。

不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即使从党内走资派手中夺了权，这个政权也可能改变颜色，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出现大挫折大倒退。

不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即使打倒了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重新出现修正主义。

可以断言，有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有了一切；没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丧失一切。

所以一切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诋毁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他们可以树立大大小小的权威，甚至把自己及同伙打扮成党的化身，但就是不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并在“反

老子就是反党”的招牌下，大反毛主席，大搞修正主义，他们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装作“革命权威”的模样，假装给革命小将以支持、援助、荣誉、权利以至一切，但就是不给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革命小将变成他们的驯服工具，从而丧失自己的一切。

反革命两面派林杰，正是这样一个狡猾的阴谋家。他从一开始，就带着不可告人的野心插手了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也会表面上支持革命小将，起来反程今吾，反孙有渔，使不少人对他感恩戴德，不胜崇拜。

在这些金字招牌下，他利用广大革命群众向孙有渔工作组和伪校“文革”夺权的强烈的革命要求，从资产阶级夺权观出发，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的错误口号，并不顾广大革命派的坚决抵制，进而把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逐步发展成其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理论基础，这样就形成了诋毁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大树谭厚兰个人权威的臭名昭著的“李春秋定理”。

这个定理的要害是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分庭抗礼；

这个定理的本质是攻击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这个定理的危害是大大妨碍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师大的树立；

这个定理的目的是为林杰阴谋反党集团实现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狼子野心作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这个定理的后患是使修正主义不能在师大斩草除根，埋下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伴随这个理论而来的是对谭厚兰肉麻的吹捧，什么“紧跟谭厚兰，彻底闹革命”啊，什么“恭恭敬敬地做谭厚兰的小学生”啊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满天飞舞，团史展览里竟出现了葵花的谭厚兰的画面，谭厚兰相片的数量竟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相片的数量相等，“井冈山风暴”的演出里反复出现谭厚兰的光辉形象……

强化这个定理的杀人不见血的大棒之一是所谓大反“新思潮”。林杰、谭厚兰借反无政府主义之名，对许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小将，对许多和他（她）们有不同意见的井冈山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按照“李春秋定理”，不管你出身如何，品质如何，是铁杆老保也好，是李少明那样的资产阶级政客也好，只要拥护我谭厚兰，就可以加官晋级，飞黄腾达。

按照“李春秋定理”，不论你政治表现如何，是英勇不屈的造反派也好，是革命小将、革命干部也好，只要反对她谭厚兰的错误，就要受到迫害，被打入阴山之下。

井冈山战斗团的第一批战士，有多少只因为坚持革命原则，和谭厚兰的错误言行发生了争执，就被一棒子打了下去！

师大的革命造反派，有多少同志只因为反对了谭厚兰同志的错误，就被扣上了反动“新思潮”的大帽子！

师大的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少革命干部、革命教员，只因为和谭厚兰在兵团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就被划入不革命、假革命，甚至反革命之列。

在“李春秋定理”之下，出现了下面令人难以容忍的怪现象：

谭厚兰炮打周总理，跟着去炮打的受到重用；反对炮打的，倒受到打击。

谭厚兰怀疑伯达、江青同志，跟着去怀疑的，当作心腹，垂以青睐；反对去怀疑的，当做异己，加以排斥。

谭厚兰和林杰阴谋反党集团坐在一条贼船上，跟着去坐的，视为忠臣孝子，竭力提拔；反对坐的，看作逆子贰臣，予以迫害。

和谭厚兰同志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反革命两面派林杰曾以太上皇的姿态说：“我听毛

主席的，你们听我的。”其实，他听毛主席的是假，他企图蒙蔽群众去跟着他反对毛主席却是真的。这就是林杰之流炮制的“李春秋定理”的险毒用心之所在。必须彻底砸烂“李春秋定理”！

三、对于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重大问题的具体态度

（一）关于师大革命委员会

师大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

为了使师大革委会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红色政权，我们从来认为，必须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观察一切问题，分析一切问题的唯一标准。在这个革委会里，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事，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拥护，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反对。绝对不允许以反对还是拥护谭厚兰等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为真假革命的分水岭。只有毛泽东思想真正成为革命委员会的灵魂，只有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中心形成全党全民的团结，才能保证这个革委会的无产阶级性质，才能够领导我们坚决彻底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种坚持“李春秋定理”，大树谭厚兰个人的权威而诋毁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人；那种吹吹拍拍，阿谀奉承，毫无革命原则，庇护谭厚兰同志错误的人；那种投机取巧，图谋私利，发展个人势力的人；那种用人唯亲，排除异己，压制不同意见，大搞一言堂的人；那种费尽心机，挖空心思，对井冈山造反兵团进行大围剿的人，实际上是红色政权的蛀虫，他们是在动摇、腐蚀侵袭我们的红色政权，这对谭厚兰本人革命，也是没有丝毫好处的。

（二）关于师大井冈山公社

师大井冈山公社是革命的。

师大井冈山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师大和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过和正在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谭厚兰等人在林杰操纵之下干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恶勾当，玷污了师大井冈山的荣誉，井冈山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贯是有斗争的。一部井冈山团内斗争史就是井冈山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林杰反党阴谋及谭厚兰贯彻的错误路线进行抵制，斗争，为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斗的历史。

为了保持井冈山的鲜红颜色，必须彻底肃清林杰在师大的一切流毒，彻底砸烂“李春秋定理”，让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伟大红旗在井冈山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三）关于井冈山造反兵团

井冈山造反兵团是革命的。

井冈山造反兵团的核心和骨干曾是井冈山战斗团的骨干和创始人，是井冈山公社很多战士和社员的很好的战友。他们曾经大造程今吾黑帮的反，大造孙有渔反动工作组的反，大造刘、邓、陶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尤其是与反革命两面派林杰及潘、吴特务、叛徒集团，进行了长期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尽管他们身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他们仍不愧为奋勇前进的革命闯将，毛主席的忠实红小兵。井冈山战斗团的分裂，完全是反革命两面派林杰一手造成的，那种认为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分裂主义产物、是复辟势力的代表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质是在为林杰开脱罪责。

井冈山造反兵团已经成为师大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为彻底砸烂“李春秋定理”，在师大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而英勇战斗着。对它采取不承认主义的态度，

甚至把它打成非法组织的做法，是极端愚蠢、极端错误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所以，我们认为应当给井冈山造反兵团以合法地位，保证他们能够进行革命的正当权力。

我们主张，井冈山公社与井冈山造反兵团应当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

（四）关于谭厚兰同志

谭厚兰同志是革命的。

谭厚兰同志犯的错误也是极其严重的。

谭厚兰同志错误的要害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不树立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而去树立她自己和反革命两面派林杰的绝对权威；不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而忠于反革命两面派林杰；不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去揭发林杰反党阴谋集团，而听林杰反党阴谋集团的话去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谭厚兰的那句所谓：“打得倒就打倒，打不倒就拉倒的”的极“左”名言，不正暴露了谭厚兰同志是师大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吗？不正暴露了谭厚兰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的灵魂吗？

谭厚兰同志另一个最大错误是，一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甚至欺骗群众压制不同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搞一言堂，以致激起团内外群众很大的不满。

但是谭厚兰同志在她的11.15检查中，避重就轻，回避要害，并且埋下了日后为林杰翻案的钉子。对于这样的检查我们根本通不过！

尤其严重的是，谭厚兰同志在检查之后，不但不拿出实际行动来改正错误，反而对造反兵团展开了冬季攻势，压制群众，坚持错误更变本加厉了。我们奉劝谭厚兰同志必须悬崖勒马，改正错误，否则终究要被群众运动的滚滚洪流所淘汰！

（五）关于师大某些人与“5·16兵团”黑关系问题

大量事实证明，师大某些人与反革命5·16集团以及潘、吴、穆、卢等叛徒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师大内部也多次发生反革命案件。但是，师大在揪坏人方面一直收获甚微，师大阶级斗争的盖子一直没有完全揭开，这不能不引起每一个革命师生员工的严重注意。师大的阶级斗争盖子，一定要彻底揭开，师大某些人与“5·16”的黑关系，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六）关于反“新思潮”问题

长达几个月的反“新思潮”运动是林杰策划的大阴谋。

它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了敌我关系，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

它借反无政府主义之名，把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的大帽子扣在革命小将头上，从而掩盖了师大最大的无政府主义和分裂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林杰。

它巩固和强化了李春秋反动定理，严重阻碍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师大的树立。

它严重压制了广大革命派的造反精神，扼杀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许多正确意见和批评，为林杰实现他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野心做了组织准备。

反“新思潮”的大方向，必须彻底否定！

（七）关于“九·七”事件

“九·七”事件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其目的是为了从师大打开缺口，进而搞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掩盖他们尚未暴露的部分。

中央和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师大“九·七”事件的三个文件，及时、果断地粉碎了这个阴谋，好极了，英明极了，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决策。

那种认为“中央的文件下来得太早了，再晚几天就好了”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他们的立场完全站错了。

对“九·七”事件的政治背景及其真正的幕后操纵者，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永记“九·七”事件的深刻教益。

（八）关于“九·一”以来的群众运动

“九·一”以来广大群众打倒林杰，炮轰谭厚兰，追查“5·16”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九·七”以后，谭厚兰利用樊、黄、李等少数人所搞的专政委员会的事件，来发泄怒气，镇压群众，到处清洗、罢官、批判、斗争革命群众，把首先起来大造林杰反革命集团反的革命群众都打入颠覆红色政权之列，变本加厉地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压制不同意见，大搞一言堂，是完全错误的。

肃清林杰流毒，砸烂李氏定理，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群众运动必将更加汹涌澎湃地兴起。

（九）关于复课闹革命

我校广大革命师生在复课闹革命中是有成绩的，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必须充分肯定。复课闹革命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必须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伟大斗争中，把复课闹革命推向新高潮。

复课闹革命的灵魂是闹革命，闹革命就是搞阶级斗争。因此像谭厚兰同志那样，脱离了现实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埋头复业务课，空搞教学改革，就极有可能改良，极有可能复辟，极有可能走进资产阶级死胡同里，这必须引起全体革命师生的高度警惕。

（十）关于干部问题

干部问题是师大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谭厚兰同志按照“李春秋定理”，以拥护不拥护谭厚兰、反对不反对造反兵团为结合、使用干部的分水岭，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革命干部必须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亮相，必须以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和对待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为结合、使用革命干部的唯一的最高的标准。

师大的革命干部、革命师生员工联合起来，为大树特树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十一）关于恢复师大党组织活动的问题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是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当前一切工作的纲，抓住了这个纲，就是抓住了斗争的大方向，就能做到纲举目张，就能大大推动我们的复课闹革命，大大推动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这有利于大树特树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当前能否做到这一条，就是衡量我们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不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试金石。

谭厚兰在抛出了她那按照“分水岭”定理炮制的《关于恢复师大党组织活动的建议》之后，又迟迟不搞建党问题上的大学习、大批判，妄图利用李氏定理改造我们的党组织，摆布我们的党员，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办不到的。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四、高举斗私批修的大旗决心把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其本身就包含着一场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比起反党内走资派，反工作组来，不知艰巨、复杂多少倍。什么革命到头就此止步啦，什么大局已定无可奈何啦，什么虽然是符合毛泽东思想，但不能实现啦，种种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时时冲击我们的队伍。因此，进行这场斗争，需要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与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需要我们去斗私、批修。正如林彪同志所说的那样：“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要斗私！

我们要斗那种不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私；

我们要斗那种不敢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的私；

我们要斗那种不关心祖国前途、世界命运的私；

我们要斗那种不敢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私。

我们要批修！

我们要批赫鲁晓夫那种背叛马列主义的修；

我们要批刘少奇那种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分庭抗礼的修；

我们要批林杰那种炮制“李春秋定理”、大树特树个人绝对权威的修；

我们要批那些形形色色诋毁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修！

不忠于毛主席、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大的私，最大的修；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大的公、最高的革命大节、最纯粹的马列主义。我们就是要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革命斗争中，斗私，批修。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2月4日社论中说：“学习毛主席著作，用，还是不用；学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执行还是不执行，这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阶级感情问题、根本态度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像谭厚兰同志那样口头上大树三天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实际上顽固坚持诋毁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李春秋定理”；绝不能像她那样“言行不一致，口头上说同意，行动上却另搞一套；会上讲的漂亮，会后又那样去做”。我们一定要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一辈子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辈子切切实实地坚持不懈地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目前，我们要尤其注意反对那些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

一百多年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仅有两个人，就敢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战，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中说：“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身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

“一唱雄鸡天下白”，经过亿万劳动群众的长达一百余年的流血奋斗，全世界已经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新时代。

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也要庄严地宣告：

让那些形形色色的诋毁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徒子徒孙们，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伟大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场斗争中，只会失去自己的精神锁链，他们所能得到的却是毛泽东思想红光照耀的整个世界！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井冈山公社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革命战友联合起来！

为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而战！

为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光芒万丈、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

[注] 李春秋定理五个字原文没有引号，引号是本刊编者加的。

中文系

井冈鏖战急、井冈红灯照、井冈风雷、井冈铁长城、井冈红旗班、井冈热风、井冈星火报、井冈莽昆仑、井冈怒骑、井冈猛虎艇、井冈红哨兵、井冈心向东、井冈花烂漫、井冈呐喊、井冈送瘟神、井冈大无畏、井冈竹。

政教系

井冈倚天剑、井冈锓未残、井冈红峰、巡天遥看、井冈太阳升。

外语系钢一连

钢一连红旗编辑部、黄洋界、战地黄花、从头越、井冈红五星、井冈齐声唤、井冈红旗乱、井冈莽昆仑、井冈立新功、井冈烽火、井冈劲松、呼声急、云水怒。

教育系

青锋。

生物系

井冈劲草。

地理系

独立寒秋。

天文系

井冈激浪、井冈星火。

物理系

《八·二〇》、前傲鹰、争朝夕、红四野、无产者、傲霜雪、拼刺刀、横俯、星星之火、鲁迅、前驱、井冈霹雳、为人民服务、从头越、井冈红军。

数学系

前哨兵、忠于毛主席。

历史系

革命到底、井冈炮舰、井冈火石、文攻报编辑部。

化学系

中流击水。

校医院

井冈红医。

幼儿园

井冈韶山。

1967年12月11日，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翻印

18. 中央首长在师大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

(1967. 12. 27)

谢富治 戚本禹 李钟奇 丁国钰

时间：1967年12月27日凌晨5点半

地点：人大会堂

出席首长：谢副总理、戚本禹同志、李钟奇同志、丁国钰同志

参加人：师大革委会负责人8人，军训团负责人2人，造反兵团6同志。

在中央首长召开座谈会前，首先和师大革委会负责人和军训团负责人进行了谈话。很关心地询问了师大运动情况，并讲刚才和清华的两个群众组织讲了讲，现在找你们师大革委会同志和造反兵团一起谈谈，这时造反兵团的6个同志走进来。

戚本禹同志：你们造反兵团，还造反啊？

谢富治副总理：你们造反兵团，造谁的反？我看是造革……

戚：你们愿意不愿意联合？

兵：我们向来主张联合。

你们主张联合，那为什么分出去啦？

兵：林杰把我们赶出去的。

戚：林杰不是北师大的，他怎么把你们赶出去？

兵：林杰插手了北师大的运动。

戚：林杰已经不活动了吗，为什么还不回班？你们是否想把革委会搞垮？

兵：从来没这样想，而是他们不承认我们，说我们是非法组织。

戚：你们是否和外面串联？

兵：没有。

革委会代表（革）：你们前几天开会还有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等几个学校来。

兵：没有，我们只是到外面了解情况，做些调查，我们没有让他们来。

谢：没有要他们来，为什么你们开会，外单位还来？

谢：你们还在静坐吗？

兵：还静坐。

谢：你们静坐不要搞嘛！毕业生要盖你们的章，那不合适嘛！静坐你们有什么理由？

兵：不让我们参加分配小组，对我们迫害。

谢：按你们那样，革委会不也成了群众组织了？你们反军训团是不合适的，错误的。

兵：我们没反军训团。

军：大量的事实你们赖得了吗？

（军训团刘参谋长和刘政委讲话）

刘参谋长：我们李政委去找他们做工作，被他们围攻了四个小时，我找你王颂平谈过，王颂平在这儿，她答应我们，但我们找她，她不来。

王颂平：我没，我不记得。

刘政委：你们说我们是刘邓的黑爪牙，说我们是肖华的军队，是罗瑞卿大比武提拔起来的。我们找他们做工作，他们不来。

戚：这是完全错误的。

兵：解放军说过去不支持，现在不支持，将来也不支持，他们把矛头指向兵团。

戚：他们支持革委会嘛！这是对的。怎么能说是支派呢？革委会是中央支持的嘛！师大革委会中央是有文件的。

兵：他们跟谭厚兰到红旗杂志游行。

戚：解放军支持革委会是对的。那是一个具体问题。你反对解放军是不对的。

兵：谭厚兰尽造谣，说我们只有一百人。

戚：一百人也好，二百人也好，按班系联合，联合到班上去。

兵：要按人民日报22日社论，联合组织学习班。

戚：你们学校是成立了革委会的，你们的学校要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办学习班，而且要到班、系办学习班。

（重复一下）你们是成立革委会的，按班、系办学习班。

王（兵）：我再重申我的观点：22号社论，要各派组织联合举办学习班。

戚：我说有革委会的地方，必须按班、系搞。

谢：我是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如果有个什么“红造”“革造”的话，我这个北京市革委会是否也和他联合吗？行不行呢？

（兵）：我们是和井冈山公社联合，不是我们不联合，是革委会说我们非法组织，在北京还找不到一个是非法组织的。

戚：你们是想造反兵团和井冈山联合？

兵：就是两个革命组织要联合。

戚：那你们不是从井冈山公社里分出去的吗？

兵：我们分出来是林杰压的。分裂共有三条理由：走资派挑动、坏人操纵、无政府主义。我们是林杰压的。

戚：林杰的事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谢：你们什么时候分的？革委会什么时候成立的？

革：他们二月成立，三月解散，四月成立了革委会的，九月又分出去的。

王（兵）：我们解散后成立了斗陶兵团，一直和他们斗争。

戚：他们是敌人吗？你们和他们斗争？他们有错误，他们检查了，你们有没有错误，你们检查了吗？（戚本禹同志又紧接着问）你们有没有后台？

兵：没有。

戚：你们内部有没有坏人？

兵：我们有坏人我们就揪，也欢迎一切人帮助我们揪。

戚：你们反对军训团就是错误的。如果这样，就肯定有坏人，我可以肯定有坏人。把军训解放军上到刘邓纲上，这不是一般人说出来的，是有政治头脑的人干的。

戚：（指李钟奇同志）他们是傅崇碧的军队，是保卫毛主席的好军队，反对军训团就不对。

谢：江青同志有个有名的九五讲话。一条是不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毛主席司令部，对“中央文革”要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二条不能反对解放军，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培养和领导的军队；三条是对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从总的方面要帮助他，爱护他，善意的批评，维护他的权威，不是要把他搞垮，当然批评了也是爱护。我就欢迎炮轰，贴大字报。

你们这三条做得怎么样？你们这三条要检查一下。你们有没有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王：我们九月就学习了，早就学习了。

兵：谭厚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揪军内一小撮！

革：你拿出证据来。说揪军内一小撮，那个鼓吹武力夺权的第三阶段论不就是张梦杨起草的吗？现在不是和他们在一起吗？

蒲：和我们在一起？我怀疑张梦杨是谭厚兰派来的，是穆欣的乏走狗！

戚：你们耐心听听嘛！你们青年人要好好听听，当然我也是青年人，你们早就学好了吗？学了，还要学吗！你们听一听学府中路的讲话，是不是早就学了，用不到我们讲了。是不是刚才讲话，你们不大满意。

你们在座的，是否有炮打康老的？

革：有，蒲寿章就说过对康老要打个问号。

蒲：没有。

革（揭露说）：这是你在大会上自己讲的。

（接着吵得很厉害，蒲极力狡辩，过了一会儿）

蒲：我是开玩笑。

戚：你们没有就算了，要提醒你们一下。

谢：你们否定军训经验是不对的。你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毛主席司令部，紧跟毛主席，要听毛主席的话，听林副主席的话，听总理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搞了一年多了，不要搞派性，请你们好好读毛主席的书，老三篇，老五篇，再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有九五指示，中央首长一系列讲话，最新指示，红旗，人民日报社论。

你们大学生，我很害怕，你们嗓门大，谁嗓门大，大不一定有理由。我们就盼你们读毛主席的书，要认真地学，学了就要用，你们是大学生，我想挖苦一下……不讲了。

你们还是要搞联合，在革委会的领导下搞联合，不要搞对立情绪，这样搞下去没有好结果，搞一万年还得联合。

你们造反兵团是否想多拉几个人，然后把革委会（用手比划说）把瓶子的水倒掉，倒……

要维护革委会的权威。

革：他们按了许多喇叭，全校都是他们的，到处按喇叭，搞得我们革委会的都听不到。

谢：不要按喇叭，过去不是有通知吗？广大群众都有进步，头头儿水平不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少，毛主席提出斗私批修很准的。你们这样的态度，我们两人很悲观，讲了话没有用，毛主席的话不听，林副主席的话不听，毛主席司令部的话不听。

戚：某些人的话他们听。

谢：我们算老几？

（兵团周秉山站起来说话）（继续把矛头指向解放军，革委会的人与之辩论）

戚：你是干部？学生？

周：我工作过两年，算个半调干吧。

戚：你多大了？

周：三十岁。

谢：你和初中的十五、六的学生一样，打嘴仗。

戚：顶不上初中生。

李钟奇：中学生都拥护军训的解放军，他们派性已降低到最低限度，都不分四三、四四派了。

谢：现在北京工人是第一，中学大多数好。

谢：（对戚本禹同志）你讲讲吧，我们搞了一天一夜了，让戚本禹同志讲讲。

戚：（兵团吵）讲了也不听，我不讲了。

革：热烈欢迎首长讲，我们坚决按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办。

戚：按班、系大联合你们接受不接受？你们要拥护革委会领导，军训团领导，你们接受吗？

兵：我们接受正确领导。

革：革委会的那一方面的领导你也不接受。

蒲：他们联合就是要我们解散。

戚：你解散也可以，不解散也可以。我再问一句：你们能不能接受按班级实行联合，坚守革委会的领导，接受军训团领导。

蒲：我们接受革委会正确领导，军训团正确领导。

戚：我再重复一遍，按班、系大联合，这是毛主席说的！你到底接受不接受？

兵：（不语）……

戚：革委会、军训团领导下，办毛主席著作学习班，什么人参加，什么时间，要革委会决定。你们哪个系没成立革委会？

答：中文系。

戚：中文系有没有人？

答：王颂平就是。

戚：比如革委会在中文系办学习班，让你王颂平参加，你去不去？

王：去。

余：去要有条件，要代表兵团。

戚：无条件！不代表兵团，就代表你一个人，师大是建立革委会的地方。

余：师大特殊，有两个组织。

戚：没有不一样的！

王：（念廿二社论）说各派联合办，我们两个革命组织联合举办。

戚：什么革命组织，中央指示要按班、级实现大联合，这是中央指示。

王：实现班级大联合要有途径，（又念社论）。

戚：如何实现的途径，就是军训团、革委会领导，我再重申一遍，按班系办学习班，没有先决条件，就是革委会领导，军训团领导。没有先决条件。你同意吗？（问谢）

谢：我同意。

戚：噢，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同意了，没有先决条件。

余：师大有特点，不一样。

戚：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王：两个组织联合举办学习班。（又念社论）

戚：你们都是群众组织，无领导权。

王：谭厚兰你承认我们是群众组织吗？

谭厚兰：我们反对你们分裂出去。

戚（有点生气）：你是不是群众？你不是群众组织，是干部组织？！

王：我们应按人民日报社论办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戚：（很气愤）什么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符合你们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就不听。

谢：你们毕业生分配盖革委会的章，还要盖兵团的章，有这么样的理由吗？我是革委会主任，我们革委会开个介绍信，还要到你们师大造反兵团盖章吗？毕业生盖上兵团的章是不对的。盖上章，革委会不也成了群众组织了吗？不让盖你们的章就静坐，有这个道理吗？不要静坐了吧！

戚：你们两个组织都是群众组织，没有权利，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在革委会和军训团的领导下，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余：（打断戚本禹同志讲话）你听我解释一下，你听我解释一下。

戚：（没有理会又说了一遍）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在革委会和军训团的领导下，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余：（继续打断戚本禹讲话）你听我说，不完全。

戚：（很气愤）你要尊重我点！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你给我重复一遍。

余：学习毛泽东思想，在革委会和军训团的领导下，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戚：你看，你把“认真”两字丢掉了，“斗私批修”丢了，可见，“斗私批修”在你脑子里就是没有印象。

余：我斗私批修检查。

戚：这一条原则能不能定下来？

余：不完全。

王：师大有两个组织，他们不承认我们，说我们是非法的。

戚：什么非法不非法，反正革委会、军训团组织要你来参加，你来不来？

如果谢副总理组织北京市非法组织办学习班，叫你来参加，你来不来？这一条原则也定不下来？

余（对首长很不礼貌很不尊重地讲）：这个原则不完全，应该是：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在革委会和军训团领导下，由井冈山公社和造反兵团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戚：（见兵团不听，于是又郑重地讲）我再重申一遍这个原则：不是要那个群众组织来办，要革委会来办。参加还是都参加，办学习班这条达不成协议，你们回去把这个原则向群

众传达，让群众讨论！

谢：我们也不偏向谁，革委会有缺点可以批评，我就欢迎别人炮轰，有了革委会、军训团两个政府你们都不要。

王：革委会就不愿扩大领导权，不愿领导我们这七百人。

革：你们从来不服从领导。

王：我们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戚：我再重复一次：按班系搞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要不折不扣执行，回班上去。

他们回班上去吗？

答：他们从来不回班、系。

兵团喊：林杰案翻不了，造反兵团压不垮！

戚：应该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你们就是不敢按班系实现革命大联合，回班去，按班、系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不谈了，散会了！

根据北师大革委会的打印稿翻印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誓死捍卫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

最新最高指示！

井冈山造反兵团战士日夜想念毛主席！

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翻印

19. 彻底批判师大宣传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1970. 01. 18）

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北师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和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场坚决批判极“左”思潮，彻底摧毁“匪团”的红色风暴正在师大兴起。这是一场伟

大的政治斗争。是整个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下对“5·16”匪团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场革命风暴来势之迅猛，使一切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和钻在毒蛇巢穴中的反革命“5·16”们立即感到了冬天的威胁，相反使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广大革命群众无限振奋和欢欣鼓舞。

谁如果看不到师大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突然变化（特别是宣传队）完全是由于整个大好形势的逼迫；谁如果看不到师大这次群众革命运动高潮的出现是由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号召的巨大推动，那他就是政治瞎子。越来越多的革命群众冲破宣传队右倾机会主义的罗网，已经或正在不可阻挡地发动起来。他们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八三四一支左红旗为榜样，一下子就抓住在对“5·16”斗争中的关键是宣传队领导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鲜明的战斗口号。在这场决定师大历史命运的阶级大（转：原文上是此字。语句不通）斗中以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显示着无比的勇敢的力量。“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林副主席总结出来的这一伟大真理正是处在激战中的师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同心情的最好的概括。

近十天来，围绕着“总结经验”问题展开了十分复杂和深刻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保卫毛主席还是包庇“5·16”？是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5·16”一边？

整个斗争的深入和发展，彻底粉碎了丁国钰给师大安排下的对抗这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计划。使宣传队领导在急剧变动中完全暴露了在抓“5·16”斗争中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一件大好事。

而宣传队从刘丰同志12日报告开始的一系列行动和措施，如提出混乱虚伪的概念和口号，混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在革命队伍内部制造分裂，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加深两派革命群众之间的对立，等等，则更进一步暴露了宣传队领导仍然坚持原来的错误立场。革命的同志务必清醒，不要上当，要立即从宣传队领导摆下的所谓“总结经验”的迷魂阵中摆脱出来，认清斗争大方向，奋起批判宣传队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师大运动深入发展所提出的最迫切的战斗任务。

众所周知，师大是王、关、戚、林插手极深的一个单位，是“5·16”匪团密谋策划、猖狂洗劫的一个重要据点。王、关、戚、林在师大的一小撮反动势力并没有因为工人阶级的开到退出历史舞台，同样也决不会因为无产阶级发起新的进攻而举手投降。在各派政治力量空前活跃的今天，他们混在群众中，或躲在阴暗角落里，煽阴风、点鬼火、串连策划、订立攻守同盟，不断接过革命人民的革命口号，以攻为守、转移目标。他们以十倍的疯狂和百倍的仇恨向我们展开了垂死的进攻。但是，他们的大势已去，注定灭亡，这一次决不会逃掉。经过三年多的较量，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优势连他们也不怀疑了。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地同时逼近了，最残酷、最激烈、最紧张的搏斗和厮杀将产生三年历史的辉煌结论。严密注视他们的一切动向，准备以十倍压倒他们的阶级仇恨，消灭最后一个敌人。

形势是大好的。我们面临的这场斗争是全北京市乃至全国范围的。同“5·16”进行坚决斗争，还是千方百计包庇？这是对待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问题。包庇“5·16”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包括宣传队在内。一切革命的、要革命的人们都应该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来，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立新功！让我们在毛主席“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集团‘5·16’”的伟大战斗纲领指引下去夺取

胜利！

二、宣传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及其导演下的虚伪骗局——“总结经验”

在对“5·16”匪团斗争问题上宣传队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随着斗争的发展，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在不断地变换着，但是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却始终不变，只要我们紧紧抓住与王、关、戚、林及其所操纵的“5·16”匪团斗争这个贯穿着师大三年来“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可以看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激烈搏斗。

不久以前，宣传队采取着公然抵制批判极“左”思潮，彻底清查“5·16”这一伟大斗争，压制和打击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的政策。如今，从元月十二日刘丰同志的报告起，斗争的形势变化了，两条路线斗争又转而集中反映在“总结经验”的问题上。

当然，“总结经验”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是发动群众围剿“5·16”匪团斗争的需要，是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的需要。我们就是要通过总结经验，明确斗争的方向，形成正确的路线领导，放手发动群众，为彻底查清师大的“5·16”分子准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坚实基础。总结不总结经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总结，还是以机会主义的态度总结，乃是要不要搞“5·16”，是真搞“5·16”还是假搞“5·16”的大是大非问题。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应该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认真总结对敌斗争，特别是批判极“左”思想，抓“5·16”的经验教训。简言之，就是要彻底批判宣传队所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只有这样，才能认清错误的实质，挖出错误的根源，才能坚决依靠师大革命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孤立的打击一小撮“5·16”分子。

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校宣传队领导的所作所为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面目。

开始，他们把“总结经验”与清查“5·16”分子对立起来，他们竟然说什么“总结经验会拖延时间，放跑了‘5·16’分子，他们企图匆匆忙忙揪出几个人来，造成虚假的声势，以掩盖他们长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来在对“5·16”的斗争上执行的错误路线，这条路线实质上是一条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尤其是打击同王、关、戚、林及其操纵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包庇“5·16”分子，包庇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行的王、关、戚、林的忠实追随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的威力和革命群众运动的滚滚浪潮，摧垮了他们这道堤坝。事隔数日，他们突然同意总结经验了。他们真的要总结经验了吗？不，这纯粹是虚伪的骗局。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教导我们的，我们不是看他们的宣言，而是看他们的行动，不是看他们自称如何，而是看他们实际上怎样。让我们看看最近一个时期，宣传队领导们究竟在“总结经验”的旗帜下干了些什么。

对待“总结经验”这样一个严肃的事关全局的重大措施，宣传队甚至不肯召开全校大会进行动员。而只是在各个系分别“动员”了一下。这些动员报告，做得很不像样子，因为他们仍然站在错误立场上，继续采取右倾机会主义的态度。我校正面临着一个围歼“5·16”匪团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它势必彻底揭开王、关、戚、林插手师大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挖出

一切暗藏的“5·16”反革命分子。但是这些动员报告不是着眼于最迫切解决的战斗任务而发动群众批判和纠正宣传队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想用混乱的虚伪的、模棱两可的词句。例如：“师大的要害问题是什么？”“宣传队领导运动不得力的要害是什么？”等等，模糊了这场总结经验的群众运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质，特别是模糊了这场群众运动的实质意义是为了纠正宣传队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以形成正确的路线，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去取得围歼“5·16”匪团的伟大胜利。他们引导群众，进行漫无边际的讨论，转移中心，拖延时间，在政治上、思想上把总结经验纳入右倾机会主义的邪路。

更为严重的是，宣传队领导在总结经验的幌子下，进行了一系列制造思想混乱，制造群众对立，分裂革命队伍的活动。他们在个别单位、个别部门搞了点形式上的人事变动人为地制造所谓平衡。这种做法，不但对支持真正与王、关、戚、林斗争的革命派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巧妙地掩饰了王、关、戚、林罪恶的黑手在师大造成的坏人嚣张、好人受气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人为平衡”给了那些“5·16”分子和至今执迷不悟的王、关、戚、林的追随者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口实，使他们在一部分认清形势的群众中大煽阴风，大点鬼火，制造混乱，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煽动革命群众之间的对立，破坏大好形势，从而达到死死捂住王、关、戚、林“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师大的阶级斗争盖子的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5·16”分子提供了进行反扑的缺口，“5·16”分子便借题发挥，妄图把水搅浑，然后在一场混战中逃之夭夭。路数虽是两套，目的却是一个，真可谓巧妙地配合。一切革命的同志对当前的这种新的动向，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

目前，宣传队又做了“进一步动员”，实际上是给群众把框框和调子定得更加明显了，从而也就更清楚地暴露了宣传队“总结经验”这场骗局的虚伪。据说，宣传队“大方向是对的”，只是，“没有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与此同时，宣传队又玩弄了“错误下放”的魔术。各系领导按照同一个动员纷纷承担“特别是我的错误”要求群众进一步帮助他“本人”。企图在群众的脑海里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宣传队总的领导是正确的，问题都在各系。既然如此，还有什么错误路线可言！什么“进一步动员”，分明是进一步掩盖宣传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面目！

“总结经验”这场好戏的开场锣是刘丰同志的报告，基调在那时已经定好。这个报告丝毫没有触及灵魂的打算，毫无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的诚意，有意避开师大三年来广大群众与王、关、戚、林“5·16”匪团鏖战的严酷现实，甚至不惜歪曲事实，为自己涂脂抹粉。刘丰同志的报告是几天来宣传队所作所为的总纲。

刘丰同志说：宣传队“工作中的教训”在于“旗帜不够鲜明，该批判的批判不深，该打击的打击得不狠，该支持的支持得不够”。刘丰同志未免谦虚得可爱。请问：你们在什么时候批判过反革命极“左”思潮？你们什么时候打击过“5·16”反革命分子？你们什么时候支持过与王、关、戚、林浴血奋战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不够”二字够用吗？你们哪里是什么“旗帜不够鲜明”？你们的旗帜鲜明得很！你们包庇、信用了一批“5·16”反革命分子，使得他们一直逍遥法外，气焰嚣张，你们难道还觉得对他们“支持不够”吗？真正与王、关、戚、林坚决斗争的革命群众，你们冷眼相看，处处受到打击和压制，有的甚至还没有摘掉因为反对王、关、戚、林而被扣上的反革命帽子。你们难道觉得对他们打击得还不够吗？刘丰同志报告中提到了的所谓“一支力量”，一些好心的同志以为他是指和王、关、戚、林“5·16”匪团做过斗争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同志们，其实全然不是这样！这个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可以回旋的概念完全是迫于形势的发展和宣传队错误政策的需要提出来的实用主义货色。报告之后，宣传队的领导们不是纷纷出动，到处游说，说这“一支力量”

并不是指“××组织”“××一派群众”吗？他们不是通过解答群众问题这样一个巧妙的方式已经把这个底交给了那些和“5·16”分子有密切联系的人了吗？

伟大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理性，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那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这正是最近以来宣传队领导尴尬处境的绝妙写照。而这样找出合理性的企图，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小小的修正”，又都是为着一个不光彩的目的，极力掩盖宣传队长期以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在批判极“左”思潮，抓“5·16”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便继续执行这条路线！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所谓坚决发动群众，深挖“5·16”分子的决心和诺言都不过是骗人的空话，不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阁楼。

刘丰同志的报告，以及尔后的宣传队的种种措施是一副清醒剂，使许多人以为宣传队以此改弦更张、幡然悔悟的幻梦破灭了！结论是无情的：直到今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系列指示传下来后，他们仍然没有想改正错误。

我们敦促宣传队领导诚心诚意改正错误，如果一意孤行，按老路走下去，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师大的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是经过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锻炼的，他们会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从五光十色，纷纭复杂的现象中，洞察阶级斗争的本质。一切暂时的迷雾都会廓清；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不怕失去什么，经过斗争，他们除了失去错误的领导之外是什么也不会丧失的！

三、洞察阶级斗争的本质，粉碎敌人的一切破坏， 夺取围歼“5·16”匪团的伟大胜利

革命越是接近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复杂，越是深刻。敌人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他们会用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作垂死的斗争。

正因为这样，处在斗争热潮中的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决不能麻痹和懈怠，放松对敌斗争。必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发展大好形势。必须注意善于团结自己的革命队伍，必须善于团结争取同盟军，团结大多数。在任何时候都要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别广大群众和混入其中的极少数“5·16”反革命分子，始终把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要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和高度的革命警惕，坚持用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原则性，同那些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进行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小撮“5·16”反革命分子和跟着王、关、戚、林陷得很深至今执迷不悟的家伙躺在阴暗角落里散布种种谬论，迷惑群众，企图把水搅浑，挽救垂死的命运。

他们公然扯起自由、平等、博爱的破旗，混在群众当中叫什么“一碗水端平”。

什么叫“一碗水端平”？师大的革命派同“5·16”分子斗争，师大的革命派坚决挖出隐藏在师大的一切“5·16”分子，并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

三年来，他们一小撮坏家伙窃取了师大的一部分权力，从来就不承认广大群众同他们有什么平等。相反，他们是帝修反的别动队，在王、关、戚、林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指挥下，坚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和思想体系，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

司令部，残酷镇压广大革命群众，他们是一小撮最凶恶、最危险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只有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斗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样一搞，扰乱了阶级阵线”，这又是他们刮出来的一股阴风。师大的阶级阵线本来就叫他们搞得够混乱的，他们把广大革命群众视为敌人，实行残酷的专政，大肆网罗牛鬼蛇神，结成死党，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是要把他们统统揪出来，搞清阶级阵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三年的历史，五个回合的历史，不能颠倒”。师大的历史是师大的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用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已写成的胜利历史。然而，这样的历史却被王、关、戚、林及其在师大的代理人，一小撮“5·16”分子涂抹得不成样子。现在，我们就是要让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同时我们还要揭穿这一小撮隐蔽的“5·16”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叫广大群众看个明白，他们到底是人还是鬼？

“我们人多，不能压我们”。不，你们只是一小撮！广大革命群众绝不会把你们算在自己的队伍中的。欺骗、蒙蔽，从来是不能长久的，群众一旦识破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就形成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不管“5·16”分子在群众中隐藏得多么巧妙，都会把他们揪出来！老实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太猖狂了，你们不要利令智昏，围歼“5·16”匪团的日子已经逼进了，你们以守为攻，正好说明你们色厉内荏，在做垂死的挣扎，正告你们这些蛰伏在错误路线下的虫豸们，错误的路线是不能长久的，错误路线破产之日，就是你们的灭顶之时。“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账必须得算一算，听说你们很有些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争一争，你们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人民起来和你们拼命。你们只有缴械投降，低头认罪，寻求一条出路，否则，革命人民的铁拳会把你们击得粉碎！

“5·16”反革命匪团是非常凶恶、非常顽固、非常狡滑的敌人，而右倾机会主义则是他们最好的保护伞。师大最近几天在围绕着“总结经验”这场序幕急剧变化着。形势已经预示着围歼“5·16”匪团的战斗将是异常尖锐、异常艰苦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要破坏革命群众运动，甚至会采取在革命队伍中制造分裂，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等手段妄图把它拉入歧途，而一小撮负隅顽抗的“5·16”分子也会接过或抢过革命的口号加以曲解，塞进自己的货色，大搅浑水，他们还要装出可怜而又无害的样子，作一番假惺惺的表态，想用鳄鱼的眼泪继续欺骗某些好心的人们，而在阴暗的角落里，却在“磨我的剑”，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一切革命的同志务必保持高度的警觉，时时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到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从某些人变幻不定的形象中，识破他们狰狞的反革命面目。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师大革命派的广大革命群众，有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八三四一这面鲜艳的旗帜作榜样，必将粉碎一切破坏的干扰，夺取胜利。这场伟大的斗争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无限美妙的前景。但是，胜利的到来，必须经过我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们要准备进行更艰巨更激烈的斗争，准备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局面和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势，准备和敌人进行反复多次较量，用百倍的仇恨打击敌人的每一个反抗，穷追猛打，迫使他们最后放下武器。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预言，革命群众运动的洪流一经冲垮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堤坝，围歼“5·16”匪团的辉煌胜利就会出现在眼前！

20. 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1971.06.30)

陈 伟

〔中央专案小组联合办公室陈伟同志讲话，根据记录整理，请勿外传〕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对抓“五·一六”极为重视。一九六七年八月毛主席在读到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中“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后面指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毛主席还指出：“‘五·一六’是个凶恶的敌人。”也是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

毛主席在接见各国代表和外国来宾时，也经常提到“五·一六”，例如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

一九六九年毛主席针对有些单位挖“五·一六”不积极，指示：有些单位从极‘左’跑到极右，不挖‘五·一六’。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揪出了“五·一六”的总后台、假马克思主义者。

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毛主席又指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这一段指的就是“五·一六”反革分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林副主席的批示精神是，“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

周总理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对外交部报告批示中说：防止对“五·一六”专案扩大化。

严禁逼、供、信。要调查研究，重视人证、物证、旁证，不要轻信口供。这样一个大革命，不能没有坏人、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必须提高警惕。但要谨慎小心，勿中奸计。

康老也曾做过系列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中，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点出来了，把它的罪行也点出来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对文艺界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是凶恶的敌人，在各方面破坏。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无论如何要搞出，秘密组织要搞掉。若搞不掉，敌人还存在，还要进行破坏活动。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在接见文教系统工军宣队时，详细指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和挖“五·一六”时应注意的事项。

接着中央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发出二十号文件，指出：“五·一六”是确实有的，认为没有是错误的。要防止扩大化。要区别对待。不要把所有的反革命组织都看成“五·一六”。

周总理在一九七〇年十月至十二月份针对北京挖“五·一六”运动的情况做了重要指示。中发〔71〕13号文件中周总理讲话的基本精神都有了。现在再说一下基本精神。

1. 着重指示，对挖“五·一六”，既不能搞扩大化，也不能搞一风吹。扩大化和一风吹是“左”的和右的方面干扰深挖“五·一六”运动。造成扩大化和一风吹的原因是专案工作神秘化，搞逼、供、信。这种做法使坏人猖狂，好人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发展。“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专搞阴谋，不听中央的话，只听王、关、戚，萧、杨、余、傅、林聿时、周景芳的话，搞两面派，专门和中央对抗。主席对深挖“五·一六”很重视，一定要搞，但不能扩大化。有的单位明明有“五·一六”，就是不抓。

2. 深挖“五·一六”，首先要搞罪行，着重坏头头、主谋者、幕后策划者，不要先抓组织。每个大单位都有一些大的反革命事件，要通过搞罪行，逐件查清，看谁参加了，谁是头头，这样就可定性。在排重大事件中要分清是非，区分“五·一六”罪行和受极“左”思潮犯的错误，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稳、准、狠，特别着重准。排重大事件，也不是大、小单位都排，要有一定的控制，一定的审查。是不是“五·一六”，主要看罪行，看是不是搞阴谋的。如果是在“五·一六”策划下，即在萧华、王、关、戚、杨、余、傅的策划下，参与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性质。上挂萧、王、关、戚、杨、余、傅，下搞三个指向。搞阴谋活动，性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填不填表。像卫生部的孙正、外交部的姚登山、学部的吴传启，就没有填表，但是地地道道的“五·一六”。罪行是本质，只要在萧、王、关、戚、杨、余、傅等操纵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矛头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不管是“五·一六”“六·一六”，都要搞出。不在萧、王、关、戚、杨、余、傅等的操纵下，搞阴谋的是反革命，但不是“五·一六”。知道阴谋目的和跟着干的不一样。例如，烧英国代办处目的就是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不知道，打击的是知道阴谋的。“五·一六”的根子可以追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但这次追查放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尤其是一九六七年，七、八、九月搞的最凶。

3. 只要打破神秘化，实行专案调查研究和群众运动检举揭发相结合。要发动群众，将经过核实的罪行公布于众（恶毒攻击的言论、未查明的历史问题和未经核实的材料不能公布）。由群众揭发批判，可以引起公愤。要组织协作，有关单位共同配合作战。专案搞神秘化，就

要上敌人的当。因为有些罪行是明火执仗的，这次主要搞清阴谋，搞上层策划者。如搞神秘化，群众不了解，敌人专讲假的，就上了敌人的圈套，真假难辨。对隔离对象要逐步放到群众中去，隔离的要少，但隔离的要少。

4. 抓重点，包括重点罪行和重点人，重点人指“五·一六”的骨干和幕后策划者。重点查清就可定性，有利于教育群众，瓦解敌人。谁要是搞派性，或压制群众揭发“五·一六”，就是破坏深挖“五·一六”群众运动，以破坏运动论处，就要受纪律处分。“五·一六”一定要挖干净，骨干一定要搞出。否则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起来，这是个祸害。

5. 要区别对待，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五·一六”骨干分子。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能搞大名单。有些人挂上钩，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要看是不是盲从或胁从，盲从者交代后一般的宽大。胁从指的是跟着干坏事的，例如烧英国代办处，连中央的话也不听。但去烧的不一定都了解阴谋，头子要他干，不干就揪出吗。（？）胁从者交代清楚也就行了。北京两大派中都有“五·一六”，不能在一派中搞，哪一派里都要搞出来。当然啰！要实事求是啰！要看到，不管哪一派，好人还是占多数。哪一派都可能混进坏人来。清查“五·一六”罪行，重点是已遂的，搞了已遂的，再揭未遂的，未遂的也要搞，不是不搞。要分清什么是已遂，什么是未遂。搞了，但未达到目的，也是已遂，不一定要造成恶果才是已遂，未遂罪行也是罪行的一部分，也要搞清楚。

二、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情况介绍

北京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开展清查“五·一六”时间最早，成绩很大。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和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以后，有些单位的革命群众就开始深挖，“五·一六”头面人物相继落网，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由于当时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不巩固，群众组织派性严重，加上“五·一六”上层人物还没有挖出来。八月下旬，先端出了王力、关锋，但戚本禹还在台上，搞有组织的退却。他们在有些单位还掌权，不可能挖出幕后人物。这些掌权的“五·一六”，打着挖“五·一六”之名，行保“五·一六”之实，或者有意将运动引入歧途。戚本禹当时钻进“中央文革”，“五·一六”调查组说后台是潘梓年、吴传启、周景芳，戚本禹就说调查的不对；另外一些人，不知从哪里搞到一些材料，说后台不是潘梓年，戚本禹说，这个材料准。所以当时在群众中搞调查条件不成熟。中央“五·一六”专案组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成立的，当时主要搞审讯。

“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深入发展，大联合、三结合进一步巩固，在林副主席政治报告的指引下，八月十六日江青同志对文艺界做了指示，周总理也做了重要指示。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在九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做了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和动员，北京地区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当时有一部分单位的领导同志不理解，提出些错误的口号：“对‘五·一六’也要一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这时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领导同志做了专门讲话，批评了有些单位的右倾思想和做法，对大家震动很大，掀起了清查“五·一六”的新高潮。但这时候，因为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搞出来。他为了掩盖“五·一六”，要尽阴谋，破坏运动。在他直接控制的单位不让开展。他开始说，“大家都要检查检查，小爬虫有多少？”搞扩大化，后来又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今后共同求进步！”搞一风吹。他不准别人到他控制的单位调查和取证，例如《红旗》杂志社就不许去。另一方面他又抛出一个大阴谋“找表”。他说：“找到表就是胜利。”因为他知道，一方面“表”已

被烧掉；另一方面，有些幕后策划者没有填表，像孙正、姚登山、吴传启。他不让挖“五·一六”的黑后台，说什么“你不要认为在当权派中有‘五·一六’后台就厉害，那不一定。”有意掩盖黑后台，以掩护他自己。对没交代罪恶的黑后台，他说什么“我给你们泼点冷水，对他们要亲切、爱惜、等待”。他反对毛主席的肃反工作九条方针，散布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破坏运动，以掩盖“五·一六”和他自己的罪行。由于他的阴谋破坏，影响了一些单位。出现了一风吹和扩大化的倾向。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林副主席做了批示和指示，周总理提出抓罪行、抓主谋、抓幕后策划者、抓头头的四抓，提出隔离要逐步放到群众中去。遵照这些指示，中央发出十三号文件，出现了新的高潮。目前运动正向纵深发展。特点是：

1. 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通过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清查的“四大”，大力协作，联合作战，专案调研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纠正了一风吹，搞清了许多长期未搞清的问题，老大难单位形势好转，许多单位查清了明火执仗的罪行、事件和敌人。

2. 清查“五·一六”罪行工作有很大进展。大的单位排了重大案件，逐一落实，有些已查清结束，有的接近结案，有的进展很大。

3. 把“五·一六”搞臭了。很多单位开展声讨会、控诉会和举行“五·一六”罪行展览会，进行揭发批判，使广大群众看清了“五·一六”的骨干都是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煽动极“左”思潮，挑动武斗，反军乱军篡政夺权，等等，都尽他们干的。要继续和他们斗，“五·一六”在群众中孤立了。

4. 促进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形势。是否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要看生产形势。许多后进单位，通过清查“五·一六”，改变了生产面貌。

北京地区个别单位在清查“五·一六”上还有些问题：

1. 有些单位搞组织的思想扭不过弯来，认为“搞不清组织，没法搞罪行”，搞大名单，或轻信口供，有些人还相信假口供。

2. 有些单位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前怕狼、后怕虎，或走了过场，或逼、供、信，或者有四怕一等待的思想，即怕别人说右倾，怕说一风吹，怕漏掉，怕犯错误；等待别的单位拿出好经验。

根据北京地区落实十三号文件的情况，有以下几点认识：

怎样认识这次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因而既要积极进行，又要落实十三号文件。事实证明，哪个单位有“五·一六”，不消除它，就不能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总是这样那样干扰，干扰和障碍就排除不了。开始有些单位，往往产生怕字，怕捣乱了形势，怕挑起派性，顾虑重重。事实证明，只要落实十三号文件，按照主席的九条去办，就不会搞乱。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按十三号文件办事，就可以解决。所以，如果有“五·一六”，有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敢字当头，坚决挖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如果没有，也要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

另一方面要谨慎，要区别是非，区别“五·一六”罪行和受极“左”思潮影响犯的的错误，区别“五·一六”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不好，就可能犯扩大化和一风吹的错误。不区别是非，也可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

1. 怎样认定“五·一六”组织和“五·一六”分子？怎样区分受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罪行？怎样区分“五·一六”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主要是用罪行区分。如果是在萧、王、关、戚、杨、余、傅等的直接、间接操纵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五·一六”。有的

单位提出，搞罪行还要注意区别对待。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受极“左”思潮影响，讲了坏话，还是恶毒攻击；反军乱军。对军队的某一个领导同志提了些意见，即使是有些过激，也要和反军乱军区分；对革委会，是对某些成员提了些意见，甚至是过激的言论，也要和颠覆加以区分。

在清查反革命罪行时，对重大案件，也要区分知道阴谋的和不知道阴谋的。例如围困中南海，有1400余单位几十万人参加，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揪刘少奇，不能说是罪行，主要是搞知道阴谋的，那是为数很少很少的一小撮，他们的目的是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周总理、康生、江青同志，这些人是清理的重点。有些单位是这样做了，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2. 怎样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

清查“五·一六”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总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群众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会干扰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如何排除呢？要狠抓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并要贯彻始终。有的上挂王明、刘少奇，下联“五·一六”的反革命的罪行，这样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很快提高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矛头对准“五·一六”。对犯极“左”思潮错误的人，不搞点名批判。这样做的，搞得很好。但有的单位不抓路线教育，单纯抓重点人，结果受到干扰，搞不下去。

3. 认真贯彻专案调查研究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不定框框，不定调子，主要发动群众掀起揭发、批判高潮。有的单位办学习班，查清罪行，落实政策，有的单位，搞协作，搞互相配合，揭开一些重大案件，凡是这样做的，运动就搞的好。也有的单位不敢发动群众，运动冷冷清清。也有的单位群众揭发后，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核实，使许多材料真假难辨，甚至有搞逼、供、信，轻信口供，将假材料公布于众，造成混乱。

4. 狠抓重点，即“五·一六”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策划者。有的单位这样做了，狠抓罪行，抓坏头头。抓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重大案件就搞清了。有的口头讲抓罪行，实际上是搞组织，搞大名单，把极“左”思潮的错误当成“五·一六”罪行，把其他群众组织当成“五·一六”，出现扩大化。如不警惕，先出现扩大化，后面就会出现一风吹。

5. 认真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分化瓦解敌人。运动好的单位注意了三个区别：区别是非；区别因极“左”思潮影响犯了错误和“五·一六”罪行；区别“五·一六”一般成员和骨干分子。对“五·一六”的一般成员，提高觉悟，划清界限，不追不逼；对骨干分子，分化瓦解，区别对待，打击最顽固的敌人。有的单位有四怕，对被敌人咬上的不敢排除，对搞错了的不敢平反，对坦白交代的不分真假，不加区别地一律停止党的组织生活，不准听报告，不准探亲，有些人产生了“交代吃亏论”。有的对交代的，不认真查实，便轻率地宣布从宽处理，结果他给老婆写信说，他交代的是假的，是被迫的，不得不交代。这些都影响了清查“五·一六”运动。

关于处理的政策问题，正在研究。还没有统一。突出的是如何对待受蒙蔽的，完全把“五·一六”当成左派组织参加的。例如有个单位一个老工人，问人家是什么组织，人家说是左派组织，保卫毛主席的，他就要求参加。人家不吸收他，他迫到厕所去，一定要求参加。人家给他一张表，他又不识字，别人替他填的。这样的如何处理？有的说是“五·一六”分子，但不以“五·一六”论处；有的说交代就算了。这种情况究竟如何处理，请大家研究。

三、从北京揭露出来的情况， 看“五·一六”的阴谋、罪行和组织

1. “五·一六”的阴谋和罪行

“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反革命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搞阴谋，搞绝密策略。他们有整套的反革命策略，例如二七车辆厂徐凯的《绝密草案十八条》，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三十六战略》，即三十六计，还有什么《十二条》《二十二条》，大同小异。这些策略中讲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分析形势。他们认为“左”派，即他们那些人，是少数；中派，“右”派是大多数。怎样搞垮对方？他们提出，只要对立面一动，就把“老保”“铁杆保皇”等一系罪名加在他们身上，先从舆论上把对方搞倒。要事先抢些对方的袖章，准备些武器，必要时自己可以无伤造伤。决不能承认我们打伤了对方，这种事要找最有经验的人去干，要严格保密。要用麻雀战术扰乱对方。对中央指示和上级文件要灵活运用，不能受约束，对方按章办事，不敢违犯，就说他们是老保。我们敢冲敢打，不受约束，赚了个造反派。反对我们就是执行资反路线。要发动小学生跟我们一起干。对我们的错误，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的错误，即使铁证如山，也不能承认。一定要肯定，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我们每干一件事，都要负责人签字，肯定我们是革命行动。将来即使错误也是他们的事，与我们无关。

干部支持我的，就是革命的；反对我的，即使一点错误也没有，也要说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支持我的，不管有多大问题，也要保下来。谁反对他们，就是打击革命干部。对军代表要缠住不放，使他不能深入下层，对我们有好感。造成对方不满。设法使对立面与军代表对立。对解放军也可以造谣。谣言重复多次，就可以变为真实。

他们的反革命手法很多，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他们的罪行和手法，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只举几个例子。

第一，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戚本禹提出：“不搞打、砸、抢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保皇派。”还有什么：“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对保密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宣扬“义和团”“红灯照”精神，戚本禹说：“红灯照就是现在的红卫兵。”到处介绍资料，煽动排外思想，妄图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

第二，制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例如，说什么“当前矛盾是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提出“打倒旧政府”的反动口号，反对敬爱的周总理；说中央常委有分歧，说什么四比三，三比四；还搞政治陷害，湖南有个007号密令事件，说什么湖南军队要在1967年元旦搞政变，说是下的命令他们已看到了，字迹像是总理的，跑到北京来第二天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接见了，说是支持他们，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这些纯系谣言。

第三，以反死人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讨孔”就是一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戚本禹、林杰指使下，在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到山东曲阜去讨孔，这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干的。她带了200多人到山东去，攻击周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孔庙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造反，还搞什么《致国务院公开抗议信》。假马克思主义者打电报去说，砸碑主要是明清以后的，明朝以前的不要砸。在他的暗示下，谭厚兰等最先砸了国务院的碑。在《致国务院的公开信》中，公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狂叫，不管他地位多高，

资格多老，都要把他拉下马。还说什么“讨孔”有现实意义，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意义。

第四，以反××为名，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各项政策，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例如，戚本禹让徐凯把财政部的何畏弄到北师大，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何畏就抛出《何许人也？》洋洋七万言，全面地、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将许多毛主席的话说成是刘少奇的话，进行污蔑。

第五，以搞××专案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例如，卫生部搞了黄树则专案。黄树则是搞保健的，他们通过搞专案，泄露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机密。将主席一家的材料都搞了。还有借搞李立三专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六，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组织“左”派队伍，即反革命队伍。例如将陈里宁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舞台上公开搞打、砸、抢，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里宁到处做报告，说他在精神病院被吊打，逼着吃屎等，完全是造谣。他们还为外交部疯人院翻案，成立“受迫害大队”，公开提出翻十七年的案。戚本禹派到二七厂去的徐凯，在修理厂把劳改犯都叫成工人，说他们是“受压者”，造反精神强，要他们赶快起来造反，否则是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这些犯人被煽动起来造反，矛头首先指向军管会，把军管会主任打得几个月不能起床。他们成立了20几个反革命组织，提出几天血洗×××的极端反动的口号。

第七，从帝修反的反动报纸、杂志上搜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章。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戚本禹组织的。他们从那上面找出最恶毒的敌人的语言，用来攻击我们的中央领导人。

第八，召开劳模座谈会，煽动劳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庆，他们逼着王进喜同志起来干，王进喜同志坚决反对，他们派往大庆的“学大庆”战斗队就整王进喜。

第九，毛主席在十多年以前指出：“反革命分子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一个策略。自从汉朝吴王刘濞发明了有名的‘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后，很多人都采用这种策略。”（参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五·一六”就是继承了这种“清君侧”的策略，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矛头指向周总理、康老和江青同志，最后是为了反对毛主席。为了反对周总理，对几个副总理也同样地采用了这种策略，提出对几个副总理两个打倒，两个炮轰，两个辩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架空毛主席，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恶毒之极。

第十，反解放军的手法是针对毛主席每一个最新指示，捣乱军队。

一九六七年初，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刚刚投入三支两军时，在一月二十三日他们就提出“军内一小撮”，叫嚷“军队支保不支左”。结果到处冲军区，围攻军区领导。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主席提出“拥军爱民”，他们又发动第二次乱军高潮，提出什么“揪出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到处抓“老谭”。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他们又讲什么“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军权阶段，提出要武装夺取政权，反对黑警司（警备司令部），他们要成立什么红警司，抢武器弹药，盗窃军事情报，殴打解放军指战员，在全国各地揪“×再道”。“七·二〇”致武汉地区一封信，毛主席审定后，他们狗胆包天，又加上“军内”二字，把“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成“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北京围困中南海，说什么八月五日有重大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还没查清。

第十一，对新生革命委员会，他们首先是妄图夺权；夺权不成，则派人打入，掌握实权，就搞反复旧，搞垮革委会。

对群众，先造成分裂，分成两大派，他们再浑水摸鱼。

总之，他们的反革命手法很多。当他们的阴谋被中央识破以后，就销毁罪证，订立攻守同盟，搞什么五大措施，六不交代。他们立即停止一切活动，采用最快的方法，秘密通知，不许交代，烧毁一切罪证，搞什么组织保证，不许个人交代。并约法三章，头头顶，群众顶，剩下一个人也不讲，还搞什么纪律。他们还散布什么我们单位的“五·一六”与××的不一样，等等。实在顶不住了，就各说各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隐藏下来，等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再干。他们就这样千方百计地破坏清查“五·一六”运动。

2. 北京地区排的十五件大事件：

第一件，夺中央外交大权，烧英国代办处，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抗缅大会，原准备先到外交部游行，后临时改为到缅甸大使馆。

第二件，围困中南海，连地图都搞了，妄图冲入，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三件，揪军内一小撮，派人到各地去，大搞反军乱军。

第四件，推动国家机密档案，如卫生部、化工部等。还搞了一次抢劫二十六个部的政治部的机密档案一千多份。现在查到，好多机密确实落到了特务手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都有，丢失很多。

第五件，冲中央机要局，篡夺中央机要大权。

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指示，机要部门不要搞串联。中央首长指示后，戚本禹马上接见，胡说“保密也有阶级性”。在他的煽动下，机要部门有些人成立什么“大喊大叫”战斗队。

第六件，卫生系统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开黑会和盗窃中央负责同志的保健机密。周总理知道后，派李先念同志在会前去阻止。他们不听，会议照样开。总理批评后，他们还说什么“是‘压制’”，是“二月逆流”。

第七件，夺中央财政大权。财政大权是中央的，总理几次讲，只能监督，不能夺权。“五·一六”煽动一些人夺了。

第八件，妄图夺北京市革委的权。他们开始想要戚本禹挂帅，未得逞，就派周景芳率领几百名亲信，打入北京市革委，掌了实权。

第九件，利用搞专案为幌子，搜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加以编造，进行攻击。包括北京图书馆事件。

第十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冲击三军演出，是个政治流血事件。

第十一件，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等地开会成立全国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不仅在北航开，别的地方也开。简称北航黑会。

第十二件，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做黑报告。包括天津黑会。

第十三件，搞反革命基地。到河北、山西去察看地形，准备失败后，到太行山去打游击。

第十四件，私设电台。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地都有，有的还进行广播。

第十五件，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如“五·一六”等。

此外还有盗窃档案馆，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开枪打工宣队，等等。

3. 组织方面的情况。

这方面情况较复杂，有的单位清了，有的单位确实有“五·一六”组织，但因当前重点清罪行，组织情况还未搞清。对此，有的单位做法是实事求是，有“五·一六”组织，就把它挖出。有的单位有些组织，名称虽不一样，但罪行类似，也要搞清。如果确实没有，就不要搞。有“五·一六”的单位情况也不一样，要把具体情况核实，不要带框框，不要搞逼、供、信，不搞指供、逼供、诱供，不轻信口供。

有的单位主要按十三号文件办事，按罪行定案，这个办法可以参考。因为根据一些单位的情况，有些主谋者并没有参加组织，而参加者又没有罪件。重点是打击骨干分子。

从一些单位的情况看，“五·一六”上层成员情况多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班底。他们的勾结由来已久。例如学部，“五·一六”的罪行很多，上层勾结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关锋、吴传启、林杰勾结起来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用撒仁兴（仨，三人行）笔名发表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攻击张春桥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共抛出二十四篇文章。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在《光明日报》上开辟“灯下漫笔”等两个专栏，用何鸣等笔名发表文章，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停止不出了，共抛出三十六篇。困难时期，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策划夺史、经、哲的权。他们还到云南考察，狂言要写出超过恩格斯《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文章。

一九六四年十月，关锋、戚本禹、吴传启、林杰、邓立群等在通县翟里大队搞四清，推广桃园经验，五十三个干部斗了四十四个，对判过刑的，他们给予平反，搞反革命基地。出村前，一家赠送一本黑《修养》，有个老贫农不识字，不要，他们说，“留给子孙后代”。临走时还学王光美，树碑立传。这时加上了戚本禹。

一九六五年，他们勾结了彭真。

一九六六年，他们勾结陶铸，攻击毛主席，吹捧刘贼。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误：应为评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在一九六五年冬，一九六六年春，他们对吴晗搞学术批判。后来他们窥测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后，想搞政治批判。《二月提纲》出来后，马上又按《二月提纲》的调子改了稿子。一九六六年四月假马克思主义者、关锋、戚本禹、林杰等成立批判小组，仍然搞学术批判。所以说他们是刘少奇的黑班底。

一九六六年三月关锋支持吴传启写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吴传启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前，请示过关锋。关锋说可以贴出去。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关锋、吴传启、林杰策划让潘梓年站出来。关锋亲自访潘梓年，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站出来，中策是出去疗养，下策是不站出来，不动。结果潘梓年取了上策，站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经关锋修改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林杰的老婆杨德华的文章：《北京日报》领导让我写访问记的文章。以后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把他们一伙打扮成左派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保他们是革命左派，此后他们在学部稳定了阵脚，王力、关锋、戚本禹指挥他们杀向社会，夺国家机关的权。群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六七年四月江青同志点出，对他们不能保。他们乱了阵脚，就组织了秘密组织，搞了两套班子。

这是学部的情况，别的单位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单位有别的名字组织，但与“五·一六”一样。有的单位有叫“五·一六”名字的组织，但不是反革命组织。

参加“五·一六”的也不一样，上层坏，下层受蒙蔽，这部分人占的面比较大，他们不了解阴谋。例如，有的单位“五·一六”，上层知道是反对周总理；中层知道要揪出一个比陶铸大的，保人保的最多的；下层当成左派组织，是保卫“中央文革”的，等等。政策是打击主要成员；一般的交代了可不算，作内部处理；对完全受蒙蔽的，像上面那种老工人，有两种处理意见。这是一些单位的情况，目前还没有统一。

“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1]

丛立新

50年前的那场灾难，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整整十年间，在北京师范大学，如同那时中国大陆上的诸多学校、机关、工厂、乡村一样，许多人死于非命。今天，询问北师大校园中的各色人等，从青年学生到中年教师，大多数对那些非正常死亡不甚了解，甚至闻所未闻。当然，仍然有许多人在以各种方式缅怀和纪念着逝者，因为，他们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非正常死亡也是不应该被淹没的。

本文尝试建立一份备忘录，尽管竭尽所能并且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帮助，所包括的人数可能并不完全；一些逝者的情况十分简单，更可能存在不准确之处。以上种种实在是不得已，就此向所有相关人士致以歉意。如果有人愿意提供补充，感激不尽。

一、非正常死亡者

以下逝者没有明显的同质性，他们的出身背景、个人经历、年龄和学业各不相同，在十年中的处境也各不相同，甚至极为悬殊。其中有知名学者，普通教师，年轻学生，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之处就在于，他们均是在十年动乱期间“非正常死亡”。^[2]

教育系

蔡钦山（生年不详—1966）

1966年6月16日，北师大教育系二年级学生的辅导员（当时班主任称为辅导员）蔡钦山，带领在山西沁县参加四清运动的学生返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回京第二天，6月17日，留在北京因而较早参加运动的四年级学生拉了一些二年级的同学开批斗会，蔡钦山被戴上高帽子，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执行者”，站在凳子上接受批斗。他的宿舍门上还被装了一块黑板，令他在进出时必须低头弯腰，称之为“钻狗洞”。当天夜里，蔡钦山在学生宿舍西楼二层的寝室内自缢身亡。用一根绳子系在暖气管上，然后从窗口向外跃下，成为十年动乱期间北师大校园内第一个自杀者。而他的这种死亡方式，后来一再成为其他逝者的选择。据说，从被批斗到死亡，他没有说过一句话。蔡钦山死亡后，工作组在报告中说：蔡钦山的自杀是叛变行为。

蔡钦山，福建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留校任教。蔡钦山是共产党员，出身好，家里是三代贫雇农，思想正统，一直积极要求进步，生活上亦极为艰苦朴素，是学雷锋标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曾经被誉为焦裕禄式的好党员。

王文宁（女）（生年不详—1966）

1966年9月某日，教育系女教师王文宁从家中——工四楼四层跳楼身亡。

“文革”初期，王文宁正在山西临汾分校。“文革”开始后，分校开始出现大字报。在临汾分校党委安排下，王文宁去抄学生的大字报。不久后，这一行为便令她落下“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遭受冲击。6月15日回到北京，当晚便被揪出来在全系大会上批斗。她是教育系最早被整的人之一，此后大小批斗接连不断。

王文宁，1951年毕业于北师大前教育专业，1955年到苏联莫斯科师范学院留学。回来后在北师大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任教。1965年，担任教育系党总支委员，负责统战工作。在同事们眼中，王文宁为人忠厚，温文尔雅，是一位淑女型知识女性。

邱椿（1897—1966）

1966年9月，邱椿头戴高帽，先在校园内游斗，随后被押到北师大学生宿舍西西楼前，在全校规模的大会上接受批判。其间，被喝令站到叠放在讲台桌上的凳子上。年近七旬、患有心脏病的邱椿在红卫兵拉扯下，颤悠悠登上“审判台”，批斗会尚未结束，便从凳子上一头栽下。邱先生摔下来后，曾经向造反派要求服药，遭到斥责：“不要装死！”参加批斗的学生亦大声呼喊：“快站起来，不要装死！”会后，躺在地上的邱先生长时间无人过问。最后，拉到校医院，也没有人敢救，终于不治身亡，那一年，他69岁。“文化大革命”开始，邱椿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屡遭迫害。

邱椿，号大年，江西省宁都县石上镇莲塘村人。1920年7月毕业于清华，在北京参加了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毕业当年赴美，先后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获得教育学学士、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1月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研究教育学。1925年10月，邱椿归国后，先后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育系教授。期间，于1927年前后与姜琦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1933年10月，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以教授名义出国，赴欧美、苏联考察。1934年秋至1935年秋，仍以教授名义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专心研究教育哲学。1944年11月，邱椿赴美国讲学，任匹兹堡大学教授，主讲中国教育。

1946年春归国后，曾经由青年党推荐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坚辞未就并退出该党。同年夏，国民党政府任命邱椿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亦坚辞不就并自动脱离国民党。后赴北平，入北京大学任教育系教授，后北京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邱椿也来到北师大，是学校有数的几个二级教授之一。

邱椿一生主要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各大学任教期间，担任的课程主要有：教育哲学、现代教育思潮、西洋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现代教育学说。邱椿教学效果突出，讲课富吸引力，有人赞为“雄辩滔滔”。每当他上课，座无虚席，教室内外的走道都被旁听者挤得水泄不通。1952年后，由于身体及其他原因，没有再登上讲台。但仍然经常到校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同时，还潜心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到临终前，写出了约80万字的朱熹、陆九渊、杨简、王阳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贽等9位学者的教育思想论著。在他离世近20年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古

代教育思想论丛》（上、中、下）为名出版。邱椿一生著述甚多，曾有《英国唯心主义者的教育思想》《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之研究》《西洋教育史》《教育哲学》等。

邵鹤亭（1902—1966）夫妇

1966年9月某日，邵鹤亭教授及夫人的遗体躺在北师大教师宿舍工四楼前，二人身上均裹着毯子，是跳楼自杀。此前，邵先生已经遭到多次批斗，家中也多次被抄。在一次批判会后，有人曾经听到邵先生反复低语：义不容辱。有人说，批斗者让邵先生给邱椿做“孝子”打幡，性情刚烈的邵先生不堪其辱，且他已经接到通知到劳改队去报到，邵先生自杀正是报到日前一天。

邵鹤亭先生1902年生于江苏宜兴。1920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曾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1928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获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常州中学校长、苏州中学校长、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和晏阳乡村建设学院院长。1945年2月，顾毓琇聘邵鹤亭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国立编译馆编纂兼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主任等职。全国解放后，曾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和华北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起，任教育部参事和北师大教授。

主要著作有：《尤莱士思想与革命理论之研究》《训导原理》《社会思想与教育》《孔子的教育思想》（毛礼锐、邵鹤亭合著）、《中国古代教育史》（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主编），主要译著有《为美国反动派服务的杜威教育学》（〔苏〕谢伏金著，陈友松、邵鹤亭翻译）、《教育史》（〔苏〕沙巴也娃著，邵鹤亭、李子卓等译）

邵先生夫人是家庭主妇。

政教系

高尚年（生年不详—1966）

1966年6月22日清晨（一说23日），北师大临汾分校政教系学生、团支部书记高尚年，声称去买烟，路过一口水井，纵身跃入。临汾地区的水井很深，高尚年当即身亡。当他的遗体被从井里捞出来时，有人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

运动初起，临汾分校开始出现大字报，党委安排年轻教师和党员学生组成大字报管理小组，负责统计大字报的作者、内容，等等。身为党员、团支部书记的高尚年是成员之一。很快，工作组来到分校，表态支持贴大字报者，并且宣布临汾分校有保皇派[3]，大字报管理小组成员自然成了保皇派，高作为成员之一首先遭批斗。高尚年深感压力沉重，精神紧张恐惧，在批斗会后找到同为管理小组成员者，表示我们错了，是不是要反戈一击，可以写大字报，等等。这时，已经知道第二天要召开他的批斗大会，而且此时班里出现针对他的各种人身攻击，高尚年已经失去行动自由，第二天他赴死的路上，还有人跟着。

高尚年，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是二年级三班学生，表现积极，要求进步，担任班级的团支部书记。

石磐（1916—1966）

1966年8月17日傍晚，经历了又一次批斗会的石磐教授回到家中，吃过午饭，换上一身整洁新衣，于下午两点左右登上校园内最高建筑——八层主楼，从南面7层上自己的办公室跳了下去。当时有人目睹，落地后还有呼吸，送到校医院后不治。很快，校园广播响起“极右分子石磐自绝于人民”云云。这是“文革”期间发生在北师大校园内的第一例教授自杀。石磐教授自杀的第二天，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的日

子。

“文革”开始后，石磐教授饱受折磨。有人目睹，某次被拉去批斗，石磐拼力抵抗，被拖在地上走，衣服磨破，身上鲜血淋漓。即便如此，他在被批斗时仍然态度强硬：“我是马克思主义的。”

石磐，安徽巢县人。因父亲当过河北隆平县知县，从小到隆平读书，后移居天津、北京，1931年返回家乡读中学。虽然年少，但思想进步，因反对当局的言行遭学校开除。1934年父亲病故后，到合肥、济南、上海等地谋职，遭遇坎坷。在此期间自学文学、社会科学和日语、俄语、世界语。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石磐奔赴延安，同年加入共产党。先后在边区保卫处、中央干教部、延安行政学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党的保卫工作和干部培训及理论研究。石磐热心经典，又自学德语，能够阅读并翻译马列原著。

1948—1952，石磐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过学校教育处副处长。1950年，曾经去苏联访问，所见所闻使他对斯大林模式产生怀疑，回国后于1952年退党，随之被调离宣传部，到教育部做巡视员。1953年调来北师大政教系任教授，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是北师大政教系建立初期四位著名教授之一（其他三位教授是陶大镛、马特和王真先生），并且同陶大镛教授一起，率先在政教系招收研究生。反右运动后被打成极右分子。1956年，要求重新入党：“尽管我认为这个党的路线政策根本错了，那么我也应该留在党内，作一个党内反对派。”1958年初，他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1961年解除“劳教”回校工作，被分配在外国问题研究所。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内，房内堆满了书，余外只有一张床。

石磐治学严谨，教学敬业，在培养研究生时风格独特。他要求学生有宽厚的学术基础，为此请来北大的朱谦之和任继愈，人大的石峻，为弟子开设“中国哲学史研究”；请来北师大物理系赵亮坚，开设“大学普通物理”；请来北大任华，开设“西方哲学史研究”；请来于光远，与学生座谈如何学习和研究哲学……督促学生掌握好外语，鼓励他们直接阅读西方哲学原著。他告诉学生，斯大林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肯定苏共二十大突破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石磐成为“右派”的经历与众不同。在反右运动开展了一年之后，他以向党交心的形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中对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做出全盘的反思与批评。

第一，石磐认为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变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新的特权等级社会，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工农群众没有当家做主。他说：“苏联工农的生活比十月革命以后改善得并不大，但特权等级的生活却提得太高了。我1950年到苏联去了一次，看到很多工人生活很苦，农民就更苦了。”

第二，石磐认为中共党内没有民主，毛泽东搞的是个人崇拜。“我认为喊党万岁是可以的，但喊个人万岁是不应当的。”

第三，石磐反对过度地搞工业国防建设，反对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主张大力改善人民生活。他认为工业化、农业合作化的建设搞得太快了。中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共产党进城后就应当首先考虑改善人民的生活。现在是特权等级的生活提得太高，工农生活改善得太慢。

第四，石磐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要应通过会议斗争，现在不必打破旧的国家机器。

石磐教授所言所行，在当时石破天惊，至今依然惊世骇俗。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具体看法，都会承认他思想当中的深刻洞见及其价值，承认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

朱启贤（1911—1968）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北师大准备在校园里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游斗活动，被游斗的对象共有100多人。政教系教授朱启贤在活动前夕得到通知，自己也在其列，于是服安眠药自杀。

1911年，朱启贤出生于山东省单县孟寨乡。早年就读于山东省立六中，1927年加入国民党。1929年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就读，在学期间，他与后来同为北师大教授的何兹全等人，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组织“玛宁社”（因为大家彼此见面问好“morning（玛宁）”）。成员们志同道合，思想倾向接近，关心社会和教育，认同民主、温和改良，部分接受社会主义。朱启贤深感，乡村小学教师的知识结构及知识的丰富程度关乎千百万儿童，关乎中华民族的未来，于是在1934年，以他为首，玛宁社创办了《教育短波》杂志，这是一份以乡村小学教师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形式活泼，信息丰富，受到广大教师欢迎，得到了陶行知等人的支持，钱玄同为杂志写刊头，陈立夫为杂志提供资助。《教育短波》发行量一度高达5万份，而当时上海的《大公报》也只是一万多份，可说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多的杂志之一。

1935年任山东省第三民众辅导区主任。他积极主张抗日，任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1938年赴延安出席教育座谈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40年任四川科学教育馆员兼成都华西大学教授，并主编《中国教育》，撰写并发表了一些进步文章，出版专著《文学、哲学与玄学》。1942年5月再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之后，他努力为抗日民主教育事业奔走呼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战时教育改造计划》等文章多篇。

由于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受国民党迫害，遂于1943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授。留美期间，朱启贤仍然十分活跃，是当时留美学者中的重要人物。他受中国民盟总部的委托，组织民盟美国支部，开展反蒋活动。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朱启贤担任翻译、联络和保卫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启贤欢欣鼓舞，在美国组织庆祝会，同时公开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样的行为令他受到美国政府的种种限制并被处以大量罚金，最终在1950年被驱逐出境。随即，朱启贤经香港回到新中国，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和慰问。

回国后，据说是由董必武介绍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先在教育系，后来转到政教系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朱启贤性情张扬，倔强刚烈，成为右派后拒绝认错，拒绝写检查，因此后来不少人得以摘掉帽子，他却始终是右派。

马特（1910—1968）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马特教授被隔离审查。1968年某日，专案组找马特教授谈话，之后他从北师大主楼五层跳楼身亡。

马特教授“罪名”甚多。抗日战争时期，20多岁的马特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做政治工作。反右时期，他被打成右派并且被清除出党。这些都使得马特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无法幸免。

马特，1910年出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学家。马特曾经在香港达德书院任教[4]。后来到北师大，1949年在历史系任教，1953年政教系成立后调入该系。1956年，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教研室成立逻辑教学小组，马特为组长。1958年，逻辑教研室正式建立，马特担任教研室主任，于1959年在校内招收研究生。这些，在我国和北师大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都是重要贡献。1950年代时，马特与复旦大学马兵、河南大学马佩并称“逻辑三马”。著

有《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形式逻辑中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逻辑问题》等。《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曾经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写得很好，咱们共产党人写不出来。中国讲逻辑学的人中间，他讲得最好。

马特教授特立独行。1956年，中央组织部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提高教授党员的比例，马特教授躬逢其盛。在入党时，他曾提出入党后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作为条件。据说当时校党委并不了解这个情况，以致基层支部为凑数而将其拉入党内。1957年鸣放时，马特发表同情右派言论，主张教授治校，很快即被清除出党，打成右派。

中文系

卢志恒（生年不详—1966）

1966年6月23（或24）日[5]，山西临汾北京师范大学分校附近的一个农民，在学校附近的崖儿沟七一渠内，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辨认，是中文系教师卢志恒。

“文革”初起，临汾分校内开始出现大字报，分校党委遂安排教师卢志恒与其他两个学生党员组成大字报管理小组，负责抄写、统计大字报。6月22日，工作组进驻临汾分校，表态支持贴大字报的学生，于是卢志恒等人立刻成为“保皇派”，背负打压革命群众等罪名。大字报管理小组的其他两个成员，一个已经在班里被批斗，另一个受到各种冲击并即将召开批斗会。挨斗的学生曾经找他倾诉，卢志恒十分沉默，但仍然开导对方：“不要怕，咱们一起犯了错误，咱们一起承担，你是学生身份，我是教师，责任更大。”随后，卢志恒受到各种冲击，甚至被他的学生强迫下跪，于是走上不归路。发现卢志恒失踪后，还有人说他逃跑了。

卢志恒是东北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于文艺理论教研室。中等身材，带深度近视眼镜，专业优秀，能言善辩，才气横溢。曾经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论文；还在学生时期，便参与主编了《中国戏剧史》，其显露的才华给教师们留下深刻印象。1966年2月，北师大部分文科系的教师和学生前赴山西临汾分校半农半读，计划半年时间。卢志恒为中文系带队教师之一，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同时担任学生辅导员（班主任）。

刘盼遂（1896—1966）、梁秋色（生年不详—1966）夫妇

1966年8月28日，北京市西单一所小院子里，来了附近一些中小学的红卫兵，住在院子里的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红卫兵在褥子下搜出一张几百块钱的银行存折，认为必定还会有金子，于是开始殴打老夫妇，逼问金子埋在何处。因为交不出金子，遭受毒打，在烈日下罚跪，并且被捆绑在院子里，不准回屋，不准吃饭。红卫兵在院子里挖地三尺，一无所获。一边挖，一边继续殴打辱骂两位老人。几天后，梁秋色先死去。刘盼遂目睹妻子死去，极为悲伤，一头扎进水缸，被红卫兵发现后拖出来继续殴打，很快致死。在刘老被虐期间，他的儿女曾经到师大哭诉求救，请求“营救”父母，没有得到当时的运动领导者们的回应。关于刘盼遂之死的另一个版本是，红卫兵将其头部按入水缸溺死。据说，刘盼遂死后，“中央文革”派人将其藏书中的珍贵明版书等拿走。

刘盼遂，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名铭志，字盼遂。1896年出生，是河南省信阳淮滨县芦集乡刘套楼村人。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山东第二女子师范、曲阜第二师范教员。

1925年，刚刚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首次招生，通过考试录取学生30名，刘盼遂名列第一。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1928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

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自1946年起，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称北平师范学院）教授。

刘盼遂先生一生从事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在经学、小学、史学、文学、钟鼎、甲骨、校勘、目录等方面功力深厚，卓有建树。尤精小学，即音韵、文字、训诂等。

在北师大中文系，刘盼遂是全系的骄傲。博闻强记，学问精深，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不论什么难题，不论是谁提出，他都能即时应对，论证确凿，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令他被尊为活字典。当年的学生回忆，刘先生讲课不掉书袋，不赶时髦，相当通俗、浅显。解诗的话并不多，说得你明白了就不再多说一句。讲典故也是通俗化了的，就像跟你聊天一般，深受学生欢迎。在春秋假日，他还常带学生去野外郊游。

刘盼遂一生著述甚多。著有《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论衡集解》《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谱附伯仲先生年谱》《段玉裁先生年谱》《经韵楼集补编》。他还著有《〈论衡〉注册要》《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论衡集解》《后汉书校笺》《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世说新语校笺”叙》《“世说新语校笺”凡例》《说文师说》《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辩》《黄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兑》《甲骨文殷商庙制徵》《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赤子解》《中华人种西来新证》《齐州即中国解》《义山锦瑟诗定诂》《“永乐大典”漫谈》等论文。还与郭预衡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学术成果影响广泛，如《论衡集解》便被叶圣陶先生赞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

刘先生身材不高，体格清瘦，经常身着中式便服，旧而干净，裤子是老式宽腰系布带的，脚上是自家做的圆口鞋。样子普通得像个农村的小老头，小胡同里退休居闲的好外公，全无知名学者、大学教授的样子。他一生淡泊名利，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从不在背后随便品评他人。他在清华的老同学谢国桢曾善意地劝他多参加些活动，他的回答十分有趣：“谢多情，刘寡欲！”

1966年，在农村改造的老友谢国桢得到刘盼遂死讯，作诗悼曰：“安命何由观物化？梁园小聚转成空；我来君家君已逝，褒信郊原听晚风。”1981年，王力写诗悼念刘盼遂：“博学鸿词属老成，醇儒应与世无争。孱躯底事遭鞭撻？水瓮埋头竟丧生！”

其夫人梁秋色是家庭主妇。

叶苍岑夫人（生年不详—1966）

1966年夏天，居住在西单武功街师大宿舍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叶苍岑及夫人，遭到前来造反者棍棒的殴打，夫人被活活打死。

张瑞棣（生年不详—1966）

1966年12月17日，北师大中文系学生张瑞棣从主楼8层楼梯口坠楼身亡。

张瑞棣，1963年从北京五中考入北师大中文系。在学期间，表现积极，热爱党和祖国，团结同学，学习成绩优秀。他的写作能力很强，“文革”中与大多数同学一样参加运动。据当时及后来了解，他没有任何自杀动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行为迹象。有人推测，当时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已经出现较强派性，也许张的死亡与此有关。

穆木天（1900—1971）、彭慧（1907—1968）夫妇

穆木天和彭慧是师大中文系的教授夫妇。穆木天是著名诗人，彭慧是文学家，两人均为

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夫妇两人自1920年代起曾经在国内多所大学任教，向往光明，参与各种进步活动，与左联等组织渊源深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7年，夫妇二人被打成右派，“文革”更是在劫难逃，遭受种种折磨，先后死于非命。这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夫妇，没有留下一粒骨灰。

1971年10月某日，北师大教二楼的一间小屋内，人们发现了已经离世几天的穆木天教授。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什么疾病死的，临终之时是否痛苦……？没有人知道。

穆木天，原名穆敬熙，1900年出生，吉林伊通县靠山镇人。1918年毕业于南开中学。1923年考入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法国文学。1926年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吉林省立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专职和兼职教授。穆木天是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1931年在上海参加左联，并参与成立中国诗歌会，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穆木天是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曾说：“《谭诗》以论题的新颖和见解的精辟成为中国现代诗论史上的重要文献。由于这一论文以及作者当时的其他文字，穆木天也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6]

1957年，穆木天被划为右派。“文化革命”中，很快被打成“牛鬼蛇神”，因为鲁迅某篇文章“可能”批评了穆木天，更令他陷入灭顶之灾，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他的创造社、左联经历，为他引来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

“文革”中后期，对穆木天的审查结束。其时，妻子彭慧已经去世，女儿虽然在北京工作，也不能来看他，遂独自度日。每个月，当局发给他生活费。据说，高度近视的穆木天，脖子上挂着脏兮兮的布兜，经常会从北师大向南走到动物园附近的一家广东餐馆，吃一顿中饭，再带一顿晚饭回家。尽管孤独凄凉，穆木天仍然不失童心，外国文学和儿童文学造诣深厚的老人，会买回一些小人书，将拐杖在地上敲得咚咚响，住所附近的孩子们蜂拥过来，穆先生招呼他们：“排好队、排好队！”然后一人发一本。有的时候，会买来那时算是奢侈品的水果糖，散发在比较干净的草地上，孩子们过来抢，穆先生会告诉他们，不能这样抢，要排好队。然后一人发一颗……

穆木天一生创作甚丰，在1920年代至被打成右派之前，留下大量作品。诗歌集有《旅心》《秋日风景画》等，散文集有《平凡集》，曲艺集有《闹东京》《抗战大鼓词》，还有理论研究成果《怎样学习诗歌》《儿童文学参考资料编选》《王尔德童话》，等等。同时，穆木天还翻译大量法文的诗歌、文学及其研究作品，包括《法国文学史》《牧歌交响曲》《青年烧炭党》《绝对之探求》《恺撒·北罗图盛衰史》《中世纪文艺复兴后期十七世纪西欧文学教学大纲》《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十一世纪至十七世纪俄罗斯古代文学教学大纲》等。

1968年7月某日，在又一次斗争会后返回住处的途中，彭慧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她被送回到校园角落无人照应的小平房。第二天中午，六十一岁的女作家离开了人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留下一句话。

彭慧，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原名彭涟清，1907年7月，出生于安徽安庆。小学毕业后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在她入学不久，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担任该校校长，他教育学生破除封建礼教，锻炼体魄，追求真理，彭慧深受其影响。1925年秋，彭涟清考入女师大后，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活动。她和同学们一起去听李大钊作报告，听赵世炎讲马列主义课，向萧三学唱国际歌……1926年，彭慧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彭慧被送往苏联学习，三年后回国，在上海担任党的地下工作，同时发表文学作品。

在左联的工作中，彭慧与穆木天相识相知，结成了终身伴侣。抗战期间，彭慧先后在武汉、云南、广东、桂林等地辗转，并在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彭慧、穆木天和一些进步教授，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建立了民主党派组织，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求人民民主，开展了各项进步活动，为此多次收到特务的恐吓信。此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进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1957年，彭慧被打成右派，并且被开除党籍，撤销教授职称和其他各种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慧陷入无休止的批斗、劳改当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因为彭慧的经历，对她的审讯格外严酷，并且逼迫她写诬陷左联领导人的材料。彭慧的拒绝又为她招致更加残酷的迫害。1968年初，彭慧被勒令迁出原来的住所，住在北师大校园内一间破旧的小平房内，不允许外出，不允许任何人探望。

胡万顺（生年不详—1970）

1970年春节后，胡万顺新婚后返回学校，随即被怀疑为“五·一六”分子。6月初，被办“学习班”（隔离审查）。胡万顺思想负担沉重，认为自己冤枉，“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于6月10日中午，趁看守者不备，从主楼六层被隔离处窗口跳下身亡。

1967年前后，社会上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简称“批资联委会”，由部分高校和一些机关单位的群众组成）组织，有高年级同学拉胡万顺参加进去，实际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其他学校有“批资联”成员成为运动清查对象，受此牵连，胡万顺也被审查。

胡万顺，北师大中文系六五级二班学生。西安人，出身好，父母都是陕西师大的工人。他从小便是好学生，担任学生干部，很能干，喜好文艺体育，自尊心强。

历史系

刘启戈（生年不详—1966）夫妇

1966年某日，在历史系组织的批斗会上，刘启戈头戴高帽，还被自己学生当众打耳光。回家后即与夫人跳楼自尽。

刘启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精于世界史尤其是世界中世纪史。建国前任教于辅仁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期，辅仁大学历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讲的西欧封建制度史给许多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刘启戈先生著述甚多，有《西欧封建庄园》《世界中世纪史》，《中外历史年表》（与翦伯赞等合编）《戊戌变法》（与翦伯赞等合编），译作有：《世界通史》《中世纪中期的西欧》等。

刘启戈夫人为家庭主妇。

尚文廉（生卒年不详）

1970—1971年之间的某日，北师大历史系学生尚文廉，从行驶中的火车上坠落身亡。

尚文廉，北师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来自宁夏农村，出身好。是“文革”初期积极参与运动的造反派，担任历史系革委会负责人。参加了揪斗谭厚兰的“九·七事件”，因周恩来及“中央文革”表态支持谭厚兰，尚文廉与其他一些学生成为批判审查对象。结束隔离审查后，尚文廉回家探亲，遂扒上火车，不慎坠落身亡。据称，尽管审查结束，如尚文廉这样人的政治和经济处境都十分恶劣，估计他是为了省钱才去扒火车的。

王德一（1937—1970）

1970年，处于隔离审查中的历史系助教王德一自缢身亡。事前，他的自杀行为已经被另外一名被审查者发现并且迅速报告。人们赶过来时，门从里面插上，破门而入后，看到了王德一吊在房间北面窗户上方的暖气管上，已经气绝。有历史系教师赶到校医院报信，医生跑来进行了各种抢救，未果。王德一的隔离室，是文史楼四层原来的历史系资料室。

“文革”初期，王德一参加了北师大造反组织，后来又作为北师大“井冈山”的代表，参加过设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批资联委会”。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批资联委会的许多成员成为审查对象，王德一在师大也成为“五·一六”嫌疑分子。除了与其他审查对象相同的各种批判斗争外，历史系与外语系还专门联合组织批斗王德一的大会，特别要钱瑗坐到前排。

王德一，籍贯山东济宁。1955年9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学时成绩优异，曾经被评为优等生，1959年7月毕业时留校。王德一仪表出众，才华横溢，不仅会画画，也写得一笔好字。他为人谦和，人缘很好，一直担任学生干部，还是学校美工队成员。1968年初，与同年毕业同年留校、同为学校美工组成员的外语系年轻教师、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女儿钱瑗结婚。王德一留校后在历史系任助教，是中国近代史教研组成员。很快就承担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课讲得不错，颇受学生欢迎。做学生和做教师，王德一都是相当突出的人物。

李永祥（生卒年不详）

在结束作为“五·一六”分子的隔离审查短短几个月后，历史系学生李永祥因癌症死去。具体时间不详，据多人回忆，在1970至1971年间。

李永祥曾经担任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文革”初期，曾经也挨过整挨过批。后来参加了造反派，于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关在外语楼一层。在反复实施、轮流进行的各种逼供信压力下，李永祥极度焦虑，违心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为了能够过关，他曾经趁一次停电时，在厕所等候几位同时被审查者，塞给对方的纸条上写着：“急，请告诉我，怎么参加的五·一六。”

李永祥，回民，通州永乐店人。1961年入学，是当时少有的学生党员。年龄比同班同学稍大一两岁。根据同班同学回忆，李永祥对于党和领袖极为忠诚，工作积极热情，学习刻苦努力，坚持原则，群众关系好。为人淳朴热情，直爽友善，乐于助人。

外语系

何万福（1905—1966）

1966年8月13日，在又一次被批斗后，何万福教授在太平湖（一说龙潭湖）投水自尽。尸体被发现后，在衣服口袋中发现纸条，上写“士可杀不可辱”。时年61岁。此前，被红卫兵揪斗，勒令劳改，有人还记得看到他身穿老北京式样小褂，前后四片用扣袢连着，在楼里面打扫厕所。遭此虐待的何万福感觉受到侮辱，当晚未回家，直接沉湖。

何万福是外语系副教授。他并非正规大学出身，是从乐文馆毕业，过去该馆有一些白俄教授俄语。何教授为人忠厚老实，从不惹是生非。据他教过的学生说，他对自己的学生极好，爱护备至，讲课生动活泼，寓教于乐。

胡明（1908—1966）

1966年9月5日，惨遭迫害，不堪侮辱的俄语系教授胡明，从教工宿舍工一楼四层家中跳

楼身亡。

胡明，笔名安熙、韶华、芜田、亮之，江西高安县人。幼年就读于高安县第一高等小学，1923年入江西省第十二中学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任县委组织委员，并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高安县党部组织部长。1927年南昌起义后，于高安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反动武装进行斗争，后作战失败，被通缉。1928年逃亡上海，失掉中共组织关系。

1929年入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预科学习，1931年升入该院国际贸易系，1934年转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次年毕业。在求学期间，曾经担任北平新报副刊编辑，为进步团体做宣传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平津流亡学生团体。1938初至1942年在上海，先后任光明书店特约编辑和培明图书公司编辑，并为生活书店写稿。1943年7月至1945年7月，回江西，在宜春师范学校任教。1945年7月后，又去上海任光华书店编辑，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此期间，1947年9月至12月，因从事进步活动曾被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抓捕关押。

1950年，经数学家傅种孙（高安人，时任北师大教务长，后为北师大副校长）推荐，胡明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二级教授，兼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高等教育部俄文教学编辑部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为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校订马列著作。从1953年起任北师大俄语系主任。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3年摘帽），遂调入资料室。

胡明一生追求进步，笔耕不辍，翻译著述甚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成就突出。早在1936年，他翻译的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便已经出版，此后翻译了大量有关著作，包括维特维尔著《资本主义世界地理》，米丁著《新兴哲学体系》《苏联内战史》，罗逊夫著《最新哲学辞典》，高尔基著《夜店》，傅尔曼诺夫著《三人集》，波利亚可夫著《敌后》，彼得洛夫著《反裂》，阜德洛夫著《生路》，波齐涅尔著《辩证唯物论讲话》，莫洛托夫著《向斯大林学习》，等等。由胡明自己编著的包括：《苏联是怎样成长壮大的》《世界经济地理讲话》《世界地理讲授新图》《新哲学社会学解释辞典》《现代经济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大纲》《论帝国主义腐朽的本质》《新民主主义下的价值规律》《政治经济学学习提纲》《语言学讲授提纲》《辩证唯物主义讲授提纲》《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辩证唯物主义对俄语教学的指导作用》《论中学俄语教学大纲和教材教法问题》，等等。

物理系

刘世楷（1897—1966）及夫人

1966年8月26日，北师大教师宿舍工一楼，物理系教授刘世楷和夫人走上四楼楼顶。据目击者言，夫人向下望时似有踟蹰，刘先生伸手将夫人推下楼，然后自己纵身跃下，夫妻双双身亡，刘先生时年69岁。据说当时已经在劳改，该日中午回家时情绪愤怒，找出家中人民币剪碎冲入马桶，然后便拉着夫人直登楼顶。儿女当时目击，而且被命令不准收尸。悲剧发生前，已经被批斗抄家，且遭受人格侮辱，被剃“阴阳头”。

刘先生一生刚直不阿，从不计较个人安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仗义执言，曾遭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威胁恫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对一些官僚主义作风和大跃进、教育革命中的不实事求是的现象有不同看法，明知提出不同意见的后果，但还要“对国家尽一点愚忠”。这些出自爱国之心的言行，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灭顶之灾。

物理系同仁回忆，刘世楷先生很有老派知识分子风度，非常儒雅。他曾经说过，“学校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他被认为是教学最好的。在中国天文学史方面很有成就。”

刘世楷号仲则，1897年12月生于四川万县。1917—1922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理化部。毕业后曾在安徽、山东、四川、吉林等地任中学教员。1929—1931年，为吉林大学理工学院讲师，创办吉林大学测候所，编辑《气象月刊》。1940—1942年，曾任四川省立石室（今成都重点中学，市立四中）中学校长。1945—1950年，出任四川省气象所所长。编著《四川气候志》，主持发布每月四川天气概况及成都天气概况。1932年起，先后为四川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华西协成大学、沈阳东北工学院、华北大学工学院、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讲授物理学、农业气候学、气象学、天文学、天文学史等课程。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参与天文系的筹建工作并完成该校教学用天文台的建设。刘世楷1922年加入中国天文学会，为41个发起人之一，后被选为中国天文学会北京分会理事。

刘先生治学勤奋，虽体弱多病，后来更视力衰退，然几十年间每日工作时间常在12个小时以上。生前著述甚多，主要有《普通物理现象解释》《天文学》《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现代天文学年表》《普通实用天文学》（译自俄文）、《航空天文学》（译自俄文）《高中物理实验》《趣味的化学实验法》（译自日文）《热力学》《热学》《普通物理实验》（共3册）《气象学》《音学》《中等物理教材》等。论文有《关于太阳视像的形状和大小由距日远近所引起的问题》《四川之气候》《水灾与气象》《近八十年中国的科学教育》等。他在1956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天球坐标概算法及其应用（提纲）》是其1952—1955年研究工作的总结，提出一种立体天球坐标的简捷算法，并运用此法去设计一种轻便适用的仪器原理。此法对天文教学、航空航海、野外勘探、军事训练等方面均有相当价值。195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七曜历的起源——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一文，论证了七曜历的起源。196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的《从天象与降水的相关概推25年间中国水旱的趋势》一文，是在整理我国有关水旱与天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了日面活动与降水、水旱灾，流彗活动与降水、水旱灾，日行星的活动与降水、水旱灾等的关系，概推了未来25年间中国的水旱趋势。

刘先生是忠正耿直的爱国者。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曾经在1932年的四川大学学报发表《九·一八国难》的文章，义愤填膺地指出：“我们不能不痛悔当局之无能，之无耻”；痛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治腐败；号召学生“随时准备，等到机会一来，马上和敌人拼命”。他积极支持四川大学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为抗议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带头签名罢教，还从物质上资助受反动政府迫害的学生，支持他们奔赴解放区。

夫人是家庭主妇。

廖祖青（生年不详—1967）

1967年，大约10月份的某日上午9点前后，在北师大南院物理系低能所所在的物理二楼，一层大厅的铁门上，人们发现物理系年轻教师廖祖青自缢身亡，绳子系在门框上。

廖祖青，广东梅县人。是北师大物理系1964年毕业后留校的年轻教师，出身好，为人温和老实。与大多数同学一样，积极参加“文革”和造反。他女朋友的母亲在某医院工作，以成分不好（所谓漏网地主）的罪名要被遣返回农村老家。当时廖祖青为群众组织的一个小负责人，遂开了介绍信去该医院，希望对方手下留情，让老人留在北京。结果对方单位向北师大反映（也有说法是当时就把他押送回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严厉斥责，令其负担沉重，

哭笑无常，至自杀前精神已近崩溃。

赵亮坚（生年不详—1968）、王蓉（生年不详—1968）夫妇

1968年上半年4月8日，北师大教师宿舍工三楼，人们发现物理系赵亮坚、王蓉夫妇在家中身亡。夫妻二人着装整齐，并肩躺在床上，二人手腕皆用电线缠住并彼此相连，即形成电路串联，分别用连接电线的针头刺入皮肤，电线通向电灯开关。据推测，赵亮坚拉下开关，电流先经过王蓉，再到赵亮坚。

在革委会领导下的“斗批改”运动中，夫妻二人均被张贴大字报，屡遭批斗侮辱，整人者让他们的孩子当面喊打倒父母的口号。据说，还将给他们夫妇“办学习班”。

一辆卡车拉走夫妻遗体，许多北师大人目睹。他们的三个儿女一直跟在车子后面奔跑，口中呼声不绝：“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其时，最大的孩子十几岁，小的不足十岁。

赵亮坚，物理系副教授，辅仁毕业生，英语极好，专业亦十分出色，且仪表堂堂，风采出众，令许多学生印象深刻。学生公认，赵亮坚是力学课讲得最好的老师。有学生称赞说，他讲课极为严谨，逻辑清晰，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经常是最后一句话讲完后下课铃声随之响起，故深为学生敬重。赵亮坚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还是民主党派，又因为毕业于辅仁物理系，被说成是王光美的同学（既非同班亦非同届）、美国特务。

王蓉，物理系办公室主任，来北师大前曾经在清华担任教务工作。据说有台湾社会关系，又有传说是梅贻琦的干女儿。无论真假，这个说法不仅麻烦，而且成为莫大罪名。王蓉容貌美丽，为人泼辣干练，有人说她可以同时处理几件事情而有条不紊。身为办公室主任，不免与人有各种冲突，在“文革”背景下亦成为各种罪名。

赵亮坚生前著有：《物理基本知识》《热和物态的变化》，与人合编《普通物理学讲义》等。

祁开智（1906—1969）

1969年3月20日，物理系教授祁开智从被关押的西南楼（一说西北楼）四层跳楼自杀，时年63岁。祁开智的一个主要罪名，是军统小组长。依据是化工大学一位教授的揭发，除此外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据说这位教授还揭发了其他人，基本都是老教授。后来他全部推翻了自己的揭发，坦言皆为逼供信的结果。也因此，北师大准备结束对祁开智的审查，但是又唯恐漏掉国民党特务。在定下召开“宽严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专案组几个人找到他，进行最后一轮“攻心战”。如果真的仍然没有结果，准备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宣布结束对他的隔离审查。就在这次谈话之后，祁开智自杀。

祁开智又名祁伯达，1906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周矶祁家台。南开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1932年获硕士学位。同年12月绕道欧洲回国。先后在安徽、南京、陕西等地高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祁开智曾经发誓，不赶走日本侵略军决不蓄发，昭示自己爱国的赤诚之心。在西北农学院任教期间，他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同学校当局面对面抗争。

新中国成立后，祁开智曾经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主任、学校副教务长等职务。他在经典物理学方面有专门研究，于理论力学和流体力学方面造诣深厚，其论著及研究成果对我国导弹、卫星运载工具的理论研究卓有贡献。

祁开智的学术成就在民国期间已经为人瞩目。据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准备研制原子弹，蒋介石曾经亲自点名他参与。有北师大同事回忆，1957年10月，苏联宣布卫星上天。那

时这还属于极为秘密的事情，基本没有能够看得到的资料。祁开智自己琢磨计算，对同事说，发射地点应该是在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境内某地，因为卫星不会向东，一定是向西飞，需要绕地球两周后才能进入轨道。若干年后，看到了有关资料，果然如此。

杨庆丰（生卒年不详）

1967年前后某日，物理系实验员杨庆丰得知有人揭发他的“问题”并且进行外调，极为紧张恐惧，遂上吊自杀。

据了解情况的人说，杨庆丰的所谓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事情。物理系实验室有气枪，1958年除四害前后，杨庆丰用气枪瞄准黑板打枪，有子弹碰到墙上后跳到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上。当时，杨庆丰很快便主动向党组织坦白此事并做自我批评。“文革”中，此事被重新作为问题揭发出来，更被无限上纲为“用气枪瞄准毛主席像”，云云。

杨庆丰是河北丰润农村人，家庭贫困。他是工农速成学校毕业到师大，成为物理系实验员。

数学系

李竞权（生年不详—1970）

1970年9月14日，北师大派人去领回即将出院的数学系二年级学生李竞权。走到四楼到三楼的拐弯处，李竞权跳了下去。当时李竞权并未死亡，北医三院给师大打电话，问是否抢救，得到肯定后，抢救未果，李竞权于第二天死去。此前，李竞权作为“五·一六”分子被隔离审查，所住小屋的外屋便住着工宣队。一天夜里他试图触电自杀，结果被工宣队的人察觉救过来，因此送到北医三院。

李竞权，1946年农历8月15日出生，贵州人，工人家庭，是出身好的学生。1964年9月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共青团员，人很聪明，能力也强。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谭厚兰领导的“学大庆战斗队”成员，并且是负责人之一。曾经去大庆造反，揪斗铁人王进喜，在北京参与揪斗余秋里。1970年，与其他一些“文革”早期的活跃分子一样，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隔离审查。

化学系

刘桂桓（生年不详—1966）

1966年8月，北师大化学系学生刘桂桓跳楼身亡。迄今，没有人说得清楚他究竟是从哪座楼跳下，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具体日期。不过，很多老师和学生记得，地点应该是出版社的楼或者外语楼，时间应该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前后。那时校园里面气氛已经十分紧张，带着高帽子、剃着阴阳头的黑帮每天排着队、喊着“我是黑帮”之类的口号去食堂吃饭。二附中姜培良被打死后，造反派组织群众去参观，大喇叭从早到晚播送各种消息。大家也还记得，自运动开始，这已经是刘桂桓第三次自杀。

刘桂桓，北师大化学系63级学生，来自东北农村家庭，出身中农。刘桂桓一直很上进，是入党积极分子，担任团干部，负责宣传工作。“文革”开始，系党总支负责人遭到批判，其中包括负责宣传的领导，而且批判调门不断升级。刘桂桓经常出黑板报，也经常写文章。因此觉得自己也犯了错误，是保皇党，惶恐不安，压力很大，精神负担沉重。

那时化学系还在辅仁校区，辅导员发现他思想有负担后，马上做他的工作，从正面开导：“你是学生，黑板报什么都是你工作，你没有问题”，等等。但是，在一次晚饭后，刘桂桓从宿舍楼三层跳下来，因为绳子拦了一下，又跌在柜子上，所以只有一些外伤。师生们马上

联系急救车送到医院，得到及时抢救。

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化学系回到“新校区”（即北师大现在的校区）参加运动。那时社会和校园内的运动更加疯狂，师大也已经开始有人自杀。尽管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刘桂桓吃安眠药再次自杀，由于发现及时，得以幸免。此后不久，刘桂桓跳楼。

校党委

程今吾（1908—1970）

1970年5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今吾病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程今吾已经患病。7月，康生亲自到北师大点名：“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随即被关入牛棚，陷入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两年内未得到应有的治疗。1968年确诊为直肠癌，手术后躺在病房仍然遭受批斗。

程今吾于1908年8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嘉山县明光镇，原名程蕴璋，曾用名程洁声、程今吾等，1949年后一直用名程今吾。

1927年在家乡教私塾。1929年考入陶行知主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在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感召下，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自己后来说：“投到陶先生门下一年多时间里，我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现在的想法是要把师范教育办上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改造农村的急先锋来。在我们这一代里要把中国人民的素质变个样。陶先生能吃苦，我们难道就吃不了苦？！”1930年晓庄师范被蒋介石查封后，仍然追随陶行知先生，先后由陶先生安排去浙江、广东、广西、安徽各地从事乡村教育工作。他追求进步，向往革命，深受学生的爱戴。他在上课时，大量选用鲁迅的《野草》、高尔基的《海燕》《我的大学》和《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等课外读物。在他的影响下，像《毁灭》《铁流》《士敏土》《资本论大纲》《唯物辩证法入门》，成为进步学生争先阅读的热门书。此外，他还通过学校办的小工厂、小农场以及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引导学生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结合起来。

193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汉抗战研究会工作，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与组建工作。1941年，应陶行知之召，到重庆陶行知先生主办的重庆育才学校任研究部主任，成为陶行知的得力助手。1942年，端午节将近，一天，育才学校的邻居不慎失火，重庆市国民党当局诬指育才学校失火，要以违禁法令拘捕陶行知。程今吾挺身而出说：“学校的事，陶行知已委托我办，你如要拘捕学校的主人，我去！”大义凛然，无所畏惧。

1944年春到延安，同年9月任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1949年任中央教育部视导司副司长兼部党组秘书。1951年调任中宣部，历任高教处处长等职。1961年参加中央《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等有关文件的制定工作。196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65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师大一些老教师还记得，1962年前后，程今吾初到师大便放了三把火：一是抓学生的基础知识，比如提出文科各系要有基本书目；二是师范大学要抓教师基本功（包括粉笔字、板书等）；三是高校要注重青年教师队伍的培养。此外，他还让一批右派教师重新走上讲台。这些都颇受教师们肯定和欢迎，在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令人印象深刻。

程今吾留下的著述有《新教育体系》《延安一学校》《工农读写教学的实际经验》《青年修养》《程今吾教育文集》等。

教务处

张士弘（生卒年不详）

张士弘是天津人，教务处一般干部，据回忆原来是辅仁工作人员，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后到北师大。“文革”初期也曾积极投入，很快因家庭历史问题受到冲击，被勒令将办公桌从办公室挪出到走廊。可能是压力大想不开，人失踪了，直至“文革”结束，无人知道下落。迄今为止，关于张士弘的最后消息是，有人曾经在1966年11月21、22日前后，在新街口见到他，只是简单问候，感觉得到他情绪低沉。

校医院

闫翠文（女）（生年不详—1966）

闫翠文，校医院妇科医生，于1966年在北师大工三楼家中自缢身亡，具体日期不详。

人们回忆，闫大夫是部队转业到北师大校医院。据说出身不太好，她的工资在校医院是最高的，每个月有120元，经常去莫斯科餐厅吃饭——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人老实，胆子很小。

后勤处

董增波（生卒年不详）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隔离审查期间，北师大后勤处车队司机班班长董增波自缢身亡。

师大女附中

卞仲耘（女）（1916—1966）

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和其他几位校领导，又一次在校园内被学生揪斗侮辱。卞仲耘和其他几位校领导，头上扣着纸篓、高帽，轮番被施加游斗、下跪、抬土、打扫厕所等折磨，期间不断遭受各种毒打。时间长达三四个小时，打人工具包括带钉子的木棒和板凳腿。几个小时后，卞仲耘晕倒，大小便失禁，被认为装死不老实，头部和身上被用脚踢，随后放到运垃圾的小车上又是几个小时。直到晚上，才送到医院，终于不治死亡，年50岁。

卞仲耘，1916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1937年初夏，卞仲耘高中毕业，一边担任小学教师，一边准备考大学。1938，卞仲耘投身抗日宣传。1940年，卞仲耘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次年在那里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建国后，卞仲耘于1949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中共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1966年时，由于该校未设校长，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那时，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同时是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

王荫桐（生年不详—1969）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一次“政策攻心会”上，领导宣布：将王荫桐拉上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他“揪出来”，指控为历史反革命、特务，成为运动对象，遭遇各种批判斗争。1969年，王荫桐病故。

王荫桐是语文教师，曾经当过傅作义的幕僚，据说肃反时已经挨过整。很有学问，教学水平很高，为教师和学生一致认同。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也很关心。有学生成绩优异，因

为家庭困难准备放弃读高中，直接工作。王荫桐劝学生：现在就业，初中文凭帮不了家里多少，还是上完高中好。并且带学生去教务处，将学生的助学金升等。类似事情，他做得平静自然。

周学敏（女）（1921—1968）

1968年9月16日夜，女附中语文教师周学敏在家中自缢，时年47岁。

“文革”开始，周学敏很快被说成“走资派的大红人”、走资派树立的“白专典型”。几位校领导被批斗时她也要陪斗。1966年的恐怖岁月之后，周学敏依然挣扎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在自杀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每天到学校去时，随身的挎包里面都装着毛巾、肥皂，每天要向当时唯一在家的女儿告别，交代家事，毛衣在哪里、棉衣在哪里……显然，她已经做好了再也不能回家的准备。

据子女回忆，自从卞仲耘校长死后，周学敏老师的精神压力一直很大。她钟爱并倾注心血的语文教学事业不复存在，曾经获得的成就也彻底毁掉。身为中学校长的丈夫被打成走资派、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人物隔离审查，后来又被下放到农村。子女中的三个大学生，原本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学习，此时天各一方，且前途渺茫；一个中学生去了北大荒，身边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儿。事业迷茫，家庭破碎，失去希望。

周学敏个子不高，皮肤白净，娇小玲珑，是很秀气的知识女性。出身于河北涿州一个兼农兼商的家庭，日本侵华后，父亲带全家来北京谋生，住在复兴门附近。

周学敏并非师范毕业，本来在济南齐鲁大学学护理。婚后几年照顾家庭、养育子女，并未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在复兴门卧佛寺附近一所小学教书并且当了校长。后来到了28中，还在工人夜校教过书，最后来到女附中。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却成为一代名师，在语文教学领域成就突出，尤其作文教学的改革引人注目。周学敏极为敬业，每天改作文的工作量非常大，有慕名前来请教的老师表示惊讶：那么大的作文批改量你怎么完成。当然，周学敏很有天赋，朗诵极富感染力。周老师的学生至今记忆犹新：她坐在讲台边给我们讲解《小石潭记》，娓娓道来，不疾不徐，引人入胜。初中升高中时，许多原来立志学习数理化的学生改选了文科班，她们说，就是受到了周老师的影响。周老师的作文改革，得到了主管教学业务的胡志涛副校长的支持。当时的《人民教育》等刊物曾经发表过好几篇介绍她的文章，以及她撰写的语文教学研究的论文。她所创造的“周学敏教学法”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信件每天几十封，还在政协礼堂上过公开课，络绎不绝的参观学习者令女附中不得不做出限制：每周哪天可以听课……一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赞扬她的成就。2005年，有人谈到：“周老师是当时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杰出代表，曾经开创出一种全新的以言语技能训练为中心的语文教学模式……比如作文教学，周老师把学生作文中的问题梳理出来，排成序，配合上相关的选文组成单元，一个单元解决一个重点问题；虽然还是综合作文，但作文指导、批改、评分、讲评，都突出训练重点，符合训练重点的得高分，非训练重点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实际上便形成了以作文技能训练为中心，读写结合，选文服从技能训练的语文教学模式。”

宗传训（生年不详—1969）

英语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批判斗争之外进劳改队，有病不准去看，1969年故去。具体日期不详。50余岁。

赵炳炎（生年不详—1969）

化学教师。因为参加过“三青团”，成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对象。尽管患有肝病，仍然受命去拆城墙，不准请假。1969年某日，劳动后躺下就再未起来，四天后死亡，死时不到40岁。

胡秀正（女）（生年不详—1968）

化学教师。亲属中有人在“文革”初期因为成分问题被遣送回乡，胡秀正认为不符合政策，找到有关部门申诉，希望改变亲人处境。可惜此举不仅未能如愿，反而为她引来大祸，沦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对象。1968年8月11日夜里，从宿舍楼三层跳楼自杀，第二天早晨被发现。

胡秀正给学生的印象非常深刻。年轻美丽，皮肤白皙，个子细高挺拔，带白边眼镜。衣着朴素，总是黑、灰、白这样素雅的色调，得体高雅。有学生说，当时觉得林道静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她课讲得很好，清清楚楚，字也好看，化学方程式板书非常漂亮。带学生做化学实验细致认真：什么有危险，怎样操作可燃气体，等等。据称胡秀正要求进步，但有一种傲气，在年轻教师中间很突出。

胡秀正已婚，爱人也是中学教师。当时的老师宿舍都是平房，她是从学生宿舍跳下来。有学生看到她遗体，说：“胡老师面容很安详，只在嘴角有鲜血流出。她一定是不愿意吓着她的学生。”“胡老师是外表文雅内心刚烈的人。”

梁希孔（生卒年不详）

历史教师。军工宣队进校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因为有人揭发家庭出身等问题，梁希孔自缢身亡。他在留下的遗书中说：第一，我身体不好所以自杀，与任何人无关；第二，我房间里面的灯泡是学校的，应该归还；第三，某个学生的学费应当免去。具体死亡时间不详，大约是在1968—1969年。

梁希孔，出身富农，婚后长期两地分居。中等身材，语速中等略慢，嗓音浑厚洪亮，语速不疾不徐，一口标准普通话。他学识渊博，讲课重点极为突出、清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明明白白，极受学生欢迎。为人严肃内向，令人望而生畏。梁希孔老师教学风格突出，效果优异，他的一些学生至今记忆犹新。“初一时梁老师教我们历史，讲课特别生动，如同说书，回去后不用复习就全能记住。”

王永海（生卒年不详）

女附中工友。据称是满清皇族后裔，有残疾，独身。王永海在食堂干活，给人打下手，什么都干。1966年，他40岁时“文革”爆发，被打成“坏分子”在校园里劳动改造。两年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由于对斗争会的恐惧而出走，从此失踪。

据说，卞仲耘遇难三个多月后，王永海曾去她家里看望。看到四宝（卞的四女儿）走到晒台上，就打招呼。进屋坐下后，很难过的样子。王永海说：“我一直惦念着四宝，一直想来看看四宝，看看你们一家子。因为我被打成了坏分子，天天参加劳动，也不敢来，怕学生看见……今天我到建筑工程部看亲戚去，先过来看看你们。”[7]

师大二附中

姜培良（生年不详—1966）

1966年8月25日，关押在牛棚的姜培良，与师大二附中其余两位校领导以及语文教师靳

正宇，被该校红卫兵拉到学校的小食堂批斗。除了这几个人，会场周围还跪着被指控为“牛鬼蛇神”的其他教师。有学生回忆，经历连续多次殴打的姜培良此时已经面目全非，且神志不清。红卫兵宣布他们的“罪状”后，再次施暴。打人的工具中有军用皮带，还有带钉子的木棒，一棒下去后带着肉丝下来，现场血肉横飞，很快有被殴打者昏死过去。有红卫兵说他们是装死，用冷水泼在他们头上、脸上，还有人从食堂拿了盐撒在他们身上，姜培良当场被打死。

“文革”初期，北京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姜培良作为中学系统的代表出席，期间每天回来看大字报。会议结束后回到学校，马上就开始遭遇批斗。那时有“集中火力，炮轰姜培良”的口号。六月底七月初，被学校集中批斗的牛鬼蛇神有20多人，每天接受批判，劳动改造，四位校领导中姜培良被单独关押。从八月起，红卫兵开始打人，几位校领导是主要对象，姜培良更是重点。同为二附中领导的一个同事曾经说劝姜培良：“先到我农村老家躲一阵，等到运动稳定下来再回来。”姜培良不肯：我不怕，我没有问题。

姜培良是老干部，到二附中任职前为北师大教育系党总支副书记，反右倾时犯错误，据称是“业务至上，专家治学”。1960年代遂调到北师大二附中担任党支部书记，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曾经与他共事的教育系老先生回忆，姜培良思想正统，为人正派。有人清楚记得，在顺义农村参加劳动时，他曾经提出为思想改造计，应该“把非劳动时间变成劳动时间”，比如放工时每人背一捆秫秸回去。同在二附中工作并一起担任领导的老教师的深刻印象是，姜培良一贯紧跟中央精神，对共产党极为忠诚。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活着要见毛主席，死后要见马克思。”他教过的学生记得，他特别要求学生在政治上进步，要求学生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求学生对党毫无保留，要求学生在灵魂中彻底根除私心……

靳正宇（生年不详—1966）

8月25日的批斗会上，语文教师靳正宇也被抓到台上，因为他写过一些诗，有所谓作风问题。会上有人大喊：“你是姜培良的大红人！”靳正宇被打得肝脏破裂，不能吃东西，吐血，送到积水潭医院，终于不治，几天后死亡。

1965年前后，曾经有个女学生因为思想问题去找他，就在语文教研室。因为谈到很晚，女学生没有回宿舍，靳正宇陪着学生在办公室待了一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文革”来临，这件事成为作风问题，是他的一大罪状。靳正宇被打得受不了，曾经去派出所求救，派出所又将他送回学校，继续接受批斗。

靳正宇曾经是海军战士，转业后就读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即到二附中教语文，当班主任。因为在部队军事训练时出意外右臂断了，是木头的假肢，他板书都是用左手。他独身一人住在学校的一间小屋里。他的同事说，他平时不拘小节，为人幽默风趣。离世时，靳正宇只有30来岁。

二、非正常死亡的阶段性

就北京师范大学的实际情况，非正常死亡贯穿十年，在其中的几个时间段相当集中。

第一个阶段是运动初期。“文革”骤起，来势凶猛，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成为先锋和主力，“革命”的对象包括“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的各种代表人物，也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时期的运动，从根本说是由高层掌握和遥控。具体到师大这样的单位，原有的党政领导系统基本瘫痪且沦为运动对象，工作组来去匆匆，“文革”新政权“革委会”尚未产生，因此运动呈现一定程度的“无

序”和“自发”色彩，没有明确、稳定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如红卫兵所作所为，并没有自上而下的详细计划部署，各个群众组织都自认为是按照最高领袖的精神和指示“革命”。

这一阶段的非正常死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像北师大这样的高校，各个专业领域的教授们首当其冲，他们的个人经历和专业造诣均成为“原罪”，遂在劫难逃。邱椿、石磐、刘盼遂、刘启戈、刘世楷等皆为典型。

此阶段非正常死亡的另外一个群体是年轻知识分子，既有学生也有教师。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曾经被视为政治上可靠、积极向上者。孰料运动一来疾风暴雨，经常是从“根正苗红”受组织信任的进步分子瞬间成为打击对象。具体原因不外是曾经支持工作组，或曾经受到被打倒的“当权派”信任，等等。政治身份的突然转折是颠覆性的，令他们无法接受。蔡钦山、卢志恒、高尚年、王文宁等都属此类。

还有一个群体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北师大情况看，“当权派”的死亡与其地位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北师大校级、系级领导虽然大多受到冲击迫害，但并没有自杀或直接亡命于暴力者。而附中情况则不同，卞仲耘死后，二附中学生就曾经议论：女附中打死卞仲耘，我们也就得打死几个。姜培良等人死后，当时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曾准备召开全市大会，二附中的红卫兵通知其余几位牛棚中的校领导，准备参加大会批斗，并且要他们“自带火葬费，每人12元”。这个会议最终没有召开，据说是周恩来压了下来：“如果都打死了，斗批改就没有对象了。”总之，越是接近基层的当权派，生命所受威胁越大，中学红卫兵的暴力直接导致“当权派”死亡，卞仲耘、姜培良即为典型。

第二个阶段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这一文件成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展开的标志。就北京师范大学而言，先是由革委会负责。1968年8月军工宣队进驻师大后，随即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相比“文革”初期的混乱及施暴对象的集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的时间更长，没有明显的特定对象群体，但打击的范围更广。个人经历（曾经参加某政治组织，如集体加入三青团、国民党等）、职业生涯（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担任民国政府职务、在某政府机构服务如警察，等等）、出身（生于除贫下中农和工人以外家庭，特别是地主和资本家）、个人表现（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某次运动中成为整肃对象），等等，都可能是沦为运动对象的原因。这一运动的残酷性丝毫不逊于“文革”初期，一些侥幸免于1966年疯狂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却终未逃脱。

在这场运动中，北师大亦发生了大量非正常死亡。马特、朱启贤、祁开智、王荫桐、周学敏、宗传训、赵炳炎、胡秀正、梁希孔，等等，都因这一运动死于非命。

第三个阶段是清查“五·一六”运动。根据目前所见有关文献，高层提出“五·一六”问题的时间早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但实际状况是，诸多单位开展这一运动要晚过后者。根据多人回忆，在北师大，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确晚于清理阶级队伍；而且，两个运动之间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

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对象的多样不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矛头所向十分确定，在高校主要是造反组织的大小头领或成员。究其根源，在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运动中，北京市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主要是北京一些高校的红卫兵组织，曾经在校园张贴了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但立即遭到了广大师生的反对。后来一些学生成立了跨校组织“五·一六兵团”，人数少，影响小。攻击周恩来和最高领袖与当时对运动的设计并不符合，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加写了一段话：“请

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毛泽东在1967年7、8、9三个月期间视察大江南北时还曾经讲过：“现在是红卫兵、造反派犯错误的时候了。”

毫无疑问，与其他高校一样，北师大也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重镇。这一运动不仅集中而且十分惨烈，主要在1970到1971年间，运动的领导者是军工宣队。李竞权、王德一、李永祥、尚文廉、胡万顺、董振波都是因这一运动死亡。

三、非正常死亡的必然与偶然

当整个社会的几亿人口陷入疯狂的大潮之中，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掌握或者改变自己及他人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死于非命的逝者，可以说都带有一点“必然”的色彩，“文革”的荒谬与野蛮正在于此。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一些特殊的事例，值得回味、发人深思。

北师大当时有三所附中，其中除了二附中为新中国成立后建校，师大附中和师大女附中均历史悠久，且与北师大有极深渊源。很长时期内这两所学校不设正校长，学生的毕业证书上都是盖北师大校长的章，如陈垣先生等。三者同为北京最优秀的学校，在“文革”期间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卞仲耘和姜培良被活活打死，已经成为“文革”的野蛮暴虐的象征。

位于宣武门附近的师大附中（即现在人们常说的“师大一附中”）在三所附校中资格最老，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行者，培养了大批各个领域的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两所附中同样成为许多共产党和政府高级干部子女云集之地。据了解，在运动初期，学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的班主任被批斗、围攻。然而十年之内，始终没有打死一个人，也没有发生一人自杀身亡。在那个血腥恐怖的时期，堪称“奇迹”。追究其原因，十分复杂，但几乎可以肯定，个别人的“善念”亦功不可没。

赵忠心退休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著名的家庭教育专家。1965年毕业于北师大政教系，分配到师大附中，担任少先队总辅导员、团委副书记，“文革”期间在师大附中度过。据他回忆：“当时我是教师代表，我出身好，是红五类。把年轻教师组织起来，每人发一个大棒子，在学校里面维持秩序。打人的主要是初中学生，批斗校领导和老师什么的，我管不了，但可以阻止他们打人。当时我年纪轻，胆子也大，我的说法是：可以批判，不能打人，更不能打死人，打死了我们批判谁去啊？没有批判对象了啊。是反革命也好什么的也好，该怎么处理要按照政策。你们把他打死算什么？”

“那时校长是老干部，被斗得很厉害。我听说卞仲耘他们被打死后，有天晚上专门去看他，提醒他小心。因为罚跪，他膝盖都伤了，要去医院。红卫兵不许他坐车，也不许坐三轮，是拄着棍子去的。医院不敢给治，我说，你们必须给治，我签字，必须治，这是我们批判对象，你们不治好，我们运动怎么搞？那时，这些被批斗的人到医院都不许写名字，要写“大混蛋”，校长是大混蛋，往下排还有二混蛋、三混蛋……有两位教师因为被斗自杀，状况极端悲惨。我们马上送去医院，还是抢救过来了。医院也是不敢治，我就说你们必须治，我们要搞运动，这些人都是对象，我们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我还和自杀的人说：别让我们瞧不起你啊，有没有问题看最后审查结果，干吗要自杀？还有一次，听说学生把书记拖到地

下室，要扒衣服，那是个女同志啊，我们马上赶过去阻止。也是说，你们不能这样干。”

二附中在运动高潮中打死姜培良等三人（除姜、靳二人外，另外一人为学生家长，不是师大人），但之后的历次运动则相对平稳，没有发生更多非正常死亡。一位曾经与姜培良一同经历野蛮虐待，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二附中当年的领导说，“女附中在清队中一直陆陆续续有人死亡，但二附中后来没有。说起来，二附中清队运动时，1970到1974年，师大派了顾明远先生担任领导；1975到1979年，是师大数学系王振稼担任书记。所以运动搞得比较平和，没有伤害太多人。”[8]

面对必然与偶然，让人想起那句著名的“让枪口抬高一厘米”。

四、几点说明

1. 鉴于本调查是个人行为，在持续几年中，除极少例外，没有直接采访逝者亲属。尽管如此，仍不免引起亲属伤痛，特此致歉。

2. 由于相关正式文字资料甚少且极难获得，全文内容大量采用了调查访谈所得。因时间久远，个人记忆误差在所难免，故主要事实以至少三人所述可以相互印证为准。如有任何人指出错处并且给予正确信息，不胜感激。

3. 诸多重要事实无法求证，只能付之阙如。如有任何人提供补充信息，不胜感激。

4. 十年动乱结束后，大部分逝者得到了不同形式的平反及恢复名誉。尽管如此，本文作者以为，对逝者的纪念和对于导致他们失去生命原因的思考不应就此为止。这些非正常死亡已经构成北师大校史不可缺失的部分。

5. 调查过程中，得到北师大诸多前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谨在此深表谢意。

（原载《记忆》154期）

[1]本文收录的非正常死亡，标准有二：一，其死亡是“文革”迫害之结果，二，死亡时间在“文革”十年之内。在此期间因受迫害自杀而获救者、迫害或自杀导致最终死亡但时间超过“十年”期间者，均未予收录。谨此说明。

[2]据一些亲历者回忆，临汾分校的工作组与当时派往北京高校的工作组不太一样，一开始便表态支持向领导贴大字报的学生。

[3]香港达德学院是19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建立的大专院校，由周恩来和董必武指导创办。

[4]据亲历者回忆，卢志恒自杀是在高尚年投井次日，即发现高尚年尸体同日卢志恒失踪，第二天当地农民发现他的尸体。

[5]《谭诗》指1926年3月正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的穆木天发表在《创造月刊》上的《谭诗——寄郭沫若的一封信》。

[6]据女附中知情人所说，平反冤假错案时，卞仲耘、周学敏、胡秀正、梁希孔四位老师定为非正常死亡。其他几位老师虽然受到严重迫害，但皆定为因病死亡。除王永海外，都召开了平反会。根据本文“非正常死亡”标准（见注1），亦将王荫桐、宗传训、赵炳炎、王永海收入。正如有教师在谈到王荫桐老师时所说：“如果没有‘文革’，我想他不会这么早死去的。”

[7]这里的时间与顾明远先生本人记录有出入，顾先生记忆是1972年到二附中。1972年1月北师大临汾五七干校撤销，我们都回到北京。工宣队派我到师大二附中去担任革委会主任兼支部书记，算是把我解放了。”（《顾明远教育口述史》，4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参考文献：

著作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我们的钱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5年9月。

顾明远：《顾明远教育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王炳照：《王炳照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田正平：《我的大学 我的同学》，《中国教育口述史》（一）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三联出版社，2013年5月。

《启功全集》（第十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启功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7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报刊杂志

刘锡庆：《祭奠——怀念几位北师大去世的老师》，《师大周报》，1986.12.13，第2版。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张彦林：《“我来君家君已逝”——刘盼遂及其师友情》，《文汇报读书周报》，2012.7.13。

《刘家先生口述史》（上、下），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16年2月2日、2月4日。

网文

陈徒手：《1950年代北京高校是怎样处理不合格党员的》，2011年12月8日南方报业网。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电子版，<http://www.doc88.com/p-0817231898011.html>）。

王友琴博客：《“文革”受难者卞仲耘》（增订版）（六）。

<http://bianmurderers.blog.sohu.com/300828198.html> 2014-02-10 05.

王友琴博客：《“文革”受难者之刘盼遂》，2014.09.30。

和睦鸟：《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龙去脉》，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029/22/634654_160191521.shtml.

余少波：《笃信真理 刚直不阿——记我的导师石磐教授》。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614/17/12762190_292853042.shtml.

未正式出版物

《“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上、下），辛子陵主编，百年中国历史真相丛书之二。

涂乃登：《教苑留痕》，教育文集，私人印制，2015年5月。

《“八五 记忆 反思”座谈会发言汇编》，2014年1月4日。

《记忆》108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五），2014年2月15日增刊。

丛立新，1954年7月18日生。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现为教育学部），2014年退休，退休前为课程与教学研究院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启之 赵惠中 丛立新

1965年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其中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转载十一月十日《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对历史学家吴晗进行政治诬陷。转载该文时，《人民日报》加了就此“展开辩论”的编者按语。

1965年底，《红旗》杂志社从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历史系借调了谭厚兰等五六个高年级学生做专职的资料员，为有关人员撰写大批判文章准备资料。

1966年

二月，林彪指使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作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纪要》。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决定撤销二月十二日批转的、由彭真主持起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运动迅即席卷全国。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社论说：“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

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后，引发全国性造反运动。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6月3日决定派出工作组。这一决定由周恩来当即打电话汇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然而，刘少奇派遣工作组的效果，与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很不一致。毛泽东回京后严厉批评了工作组。北京市委7月28日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决定》。大会由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发表了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就派工作组问题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时，刘少奇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办，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工作人员也不晓得……现在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向你们学习。大会将近结束时，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会场，然后又一语不发地离开。毛的出现，引起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次会议的录音发到各省、市、自治区播放。不到一个月，清华大学的“1053战斗组”就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题，列举四条罪，批判刘少奇的讲话。工作组撤出后，全国大中学校进一步陷入“天下大乱”之中。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第一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做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指出那些顽固的走资派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作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高度赞扬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的英勇事迹，伟大创举。

十月一日，《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社论中说：“另有一些人，他们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今还很不理解，对群众运动仍然是‘怕’字当头。他们口头上也讲十六条，在行动上却离开十六条。他们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搞宗派主义，利用广大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制造一部分工农群众反对革命学生，造成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一些局面。他们这样做，正好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利用来浑水摸鱼。我们对这些人，本来是好心善意地希望他们改正错误。他们如果坚持不改，就会脱离人民，结果就必然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社论发表后，全国“保守派”倾刻土崩瓦解。

十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伯达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

报告。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十二月九日、十五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1966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62级学生金宏达的文章《对于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署名时汉人，公开为吴晗辩护。

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6月

六月二日，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后，在姚文元、关锋、林杰等人的策划下，政教系五年级学生谭厚兰与同借调于《红旗》的刘兴隆等三位历史系同学共四人贴出了炮轰校党委的第一张大字报：《革命的同志们：勇敢地站出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捣毁“三家村”一切分店》。随后，“炮轰”“打倒”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师大校园。虽然当天仍有少数大字报保党委，说反党委是反革命，是右派，但持这种观点的人数量较少。从此开始，学校校、系两级的主要领导被打成“黑帮分子”，许多著名教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批斗、戴高帽子、游街与强迫劳动改造。

△随后校园各处皆搭起大字报栏，其中，最大最显著者有两处，一在四合院与物理数学楼之间道路两侧（南北向，今京师路），另一在新一、新二教室以北与四合院南面道路两侧（东西向，今立身路）。“文革”期间师大许多著名大字报即张贴在这两处大字报栏上。

六月四日，师大广播站宣布脱离党委领导。

六月五日，北京新市委宣布停止程今吾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因党委书记刘墉如长期有病不上班，程今吾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由石森代理书记。

六月六日，北京新市委派出以孙友渔（时任一机部第一副部长）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师大，领导北师大“文革”。孙有渔进校后就到主楼的凉台上发表演说：“我们是北京市委派来的工作队，来到师大就是像剥笋皮那样，将师大党委的假面具一层层地剥下，露出他们的修正主义真面目……”工作组进校后就自下而上地选举“文革”领导小组”。

△孙友渔（亦名“有余”，以下不再说明，1915—1998），安徽寿县人。上海交通大学肄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军委三局器材厂技术指导员、通信学校中队长。1940年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任秘密交通。建国后，历任纺织工业部处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副部长，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常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第一届理事长。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在北京病逝。

六月十四日，孙友渔给全校做报告，称革命形势迅猛异常，左派力量占绝对优势……

六月十七日，北师大教育系二年级学生的辅导员（当时班主任称为辅导员）蔡钦山，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执行者”被戴高帽子、开批斗会。当晚在学生宿舍西西楼二层的寝室内自缢身亡。用一根绳子系在暖气管上，然后从窗口向外跃下，成为十年动乱期间北师大校园内第一个自杀者。此时是他带参加四清的学生自山西沁县返京第二天。

（说明：因从立新有文《“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所以本《大事记》不做细述。根据该文，北师大在“文革”期间共有46人“非正常死亡”，其中教授13人；教师8人；学生7人；干部2人；医生1人；工人1人；女附中教师8人；二附中教师2人；家属4

人。死亡方式有：上吊自缢、投湖或河、投井、跳楼、自己触电、被活活打死、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夫妻同时自尽等）

六月十八日工作组报告说：“蔡钦山的自杀是叛变行为。戴高帽、罚站、打人是理解的，但对运动发展不利……”

六月二十日晨，数一（2）的高树奎、武汉等十七位同学在北饭厅贴出题为《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工作组进校后就把校党委的干部们集中到主楼办学习班，使其与群众隔离，运动冷冷清清云云。这一大字报引发了师生们热烈的响应，跟进的大字报约有几百张。上午十时，孙友渔向全校发表“广播讲话”，指责贴大字报的学生“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并强调，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革命。孙友渔讲话结束后，校园内出现大批反击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并举行“群众抗议游行”，谭厚兰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高呼拥护工作组的口号。

中午，中文系64级（2）班的王颂平、李先华同学贴出题为《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

当晚，新市委指示，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校方随即大抓“反革命”。贴大字报的师生被批判斗争，整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大帽子，并被限制人身自由。数学系高树奎、王淑娴、物理系李庆林、历史系黄家林、中文系王颂平、王岚、天文系余成等一大批同学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到多次批斗。许多贴工作组大字报的同学到北京新市委接待站与《红旗》杂志接待站等处上访，北京新市委接待站明确表态支持工作组，《红旗》杂志接待站则支持反工作组学生。两家态度明显不同，泾渭分明。

六月二十三日，在《红旗》杂志林杰（林杰是北师大历史系1961年毕业生，毕业后到《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1966年6月18日，陈伯达到《红旗》杂志社“揭盖子”，将范若愚、许立群停职。六月二十日，成立关锋为组长的红旗杂志社文化革命小组，林杰为成员之一，至1967年8月被审查前，是杂志主笔，担任常务副总编辑。起草和撰写多篇当时影响重大的文章。与关锋关系密切，是“中央文革”的得力干将。）的指使下，在“6.20”支持工作组的谭厚兰反戈一击，与同班的三位同学又贴了一张大字报，转而支持高树奎等同学反对工作组。为此，谭厚兰被打成反革命。

△“文革”初，北师大临汾分校内开始出现大字报，分校党委遂安排中文系党员教师卢治恒与政教系高尚年等两个学生党员组成大字报管理小组，负责抄写、统计大字报。6月22日，工作组进驻临汾分校，表态支持造反派，于是卢治恒、高尚年等人立刻成为“保皇派”，背负打压革命群众等罪名遭围攻、批判。

6月23日清晨，高尚年跳井自杀。同日，卢治恒投崖儿沟七一渠自杀，留下绝笔：“‘文化大革命’是个大阴谋”。

6月25日左右，物理系工作组在物理楼110室召开批斗李庆林、赵惠中、武世文大会，会上宣布李庆林等三人为“反动学生”。当晚赵惠中逃出学校，找林杰投诉。林杰问完情况已是凌晨两点左右，同时在《红旗》的曹轶欧用车将赵送到小西天。校园内的东饭厅外墙上贴满了批判他们三人的大字报，后来发展到被隔离审查，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7月

7月12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

同日，曹轶欧代表“中央文革”到师大调查工作组镇压反工作组学生问题，直接找了谭厚兰、李庆林等人。

△因林杰支持反工作组，许多因反工作组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都找林杰求助。在交谈过程中，林杰多次介绍政治斗争经验：1. “阶级斗争无诚实可言”；2. 在被审时“要矢口否认”；3. “要引导对方犯错误”。这三句话后来被谭厚兰当作座右铭，屡试不爽。

7月16日晚 曹轶欧与吴德来校，在北饭厅召开了全校大会。吴德代表新市委，宣布孙友渔犯了严重错误，撤销他的北师大工作组组长职务，勒令他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孙友渔是全国第一个被撤职的工作组组长。同时宣布任命刘卓甫取代孙友渔为新的北师大工作组组长。

△刘卓甫（1911—1993）河北安国人。1936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同年作为中国篮球队队员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深县县长、八路军一二〇师司令部政治协理员、晋绥贸易总公司副经理、西北农民银行副行长、陕甘宁边区工商厅副厅长。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商业部、农产品采购部、城市服务部副部长，云南省副省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全国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物价总局局长，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价格学会会长。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7月21日上午，孙友渔做检查。

下午，各系核心组领导向各系传达刘卓甫讲话。

7月23日九时，全校大会，重播吴德讲话录音，下午各系讨论孙友渔的检查。

7月27日，继7月25日、26日到北京大学撤销张承先的工作组之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当晚来到北师大，晚八时在操场上召开全校大会，宣布撤销刘卓甫的工作组。理由是工作组镇压了群众，是“文革”的绊脚石。康生、江青、陈伯达在会上先后讲话，号召革命师生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康生在讲话中说：在孙友渔的反党活动中，他们不去反对彭真黑帮，而把矛头指向党中央《红旗》杂志社，指向林杰同志。你们看，今天我把林杰带来了。同学们，林杰是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是个好学生，是你们的好同学。康生的讲话为林杰进一步插手北师大“文革”正名。（陈、康、江讲话见本书附录4）

受到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师生，在会上揭发和控诉了工作组，受到“中央文革”诸人的慰问和接见。因给工作组贴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被平反。全校几千名师生万分激动，欢腾雀跃，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因康生在讲话中公开提出要批判“大黑帮程今吾”“大右派黄药眠”等人，由此掀起批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狂潮。

7月28日、29日，北师大、北大的师生贴出了炮打李雪峰的大字报，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7月29日，北师大的造反派提出要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辩论李雪峰问题，并散发了传单。晚上，穆欣派人去师大劝说：“今天两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都讲了话，中央是信任新市委的。”阻止对李雪峰的批判。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7月31日，在林杰策划下，李春秋等5人贴出《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革命、假革命的分水岭》的大字报，号召人们“恭恭敬敬地做谭厚兰的小学生”，“跟着谭厚兰，彻底闹革命！”此文引起了全校大辩论，上述论点被称为“李春秋定理”。

8月

8月初某晚（有亲历者回忆是8月1日晚8时至2日凌晨4、5时），围绕李春秋大字报进行了一次“通宵辩论”，持对立观点的有几十人登台发言。据参与者说，林杰与关锋夫人周英也在辩论会场。因“李春秋大字报”主张的“分水岭”太荒谬了，“通宵辩论会”最后以“拥谭派”处下风而结束。

8月3日，山西北师大临汾分校师生返回学校。

8月5日下午，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和其他几位校领导，又一次在校园内被学生揪斗侮辱。卞仲耘在遭受长时间毒打折磨后晕倒，直到晚上才送到医院，终于不治死亡，年50岁。这是全国第一个被自己学生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8月12日，北大、北师大、北航、清华等院校革命师生召开隆重的欢迎“红宝书”大会。

△八月上中旬，工作组从各校撤出后，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等，力图控制运动。陶铸、王任重和新市委要求各校三天之内选出“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并要求各校“立即转入斗黑帮”。新市委在干部问题上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路线。各大专院校大办劳改队。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一个要革，一个要保，两派斗争激烈。

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社论说：“几十年来，每当我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都是因为党和人民群众有毛泽东同志这样天才的舵手掌舵，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南，拨开迷雾，端正航向，使我们革命的大船，能够绕过无数的险滩和暗礁，在大风大浪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轨道，胜利前进！”

8月16日，北师大宣布筹委会成立，政教系教师王盛邦为主任，刘兴隆、高树奎、孙文博等是校筹委会会员。当晚，全校召开了“彻底批判孙友渔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会”。提出“斗黑帮就是对工作组错误路线的有力批判”，“不要因为批判工作组转移了斗争大力向”。

8月17日傍晚，经历又一次批斗后，政教系石磐教授从校内最高建筑、主楼七层自己的办公室跳下，落地尚有呼吸，送到校医院后不治身亡。很快，校园广播响起：“极右分子石磐自绝于人民”云云。这是“文革”期间发生在北师大校园内的第一例教授自杀。

8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反对王光美与刘少奇的大字报，北师大紧紧跟上。

8月21日晚，斗争孙有渔。

8月22日，在师大召开了大批判现场会议，师大师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最后谢富治和丁国钰对大批判作了指示。

同日，师大保守派的“红卫兵师”成立，人数达千人以上。刘继顺为代师长，另有北师大外语系学生孙文博等为负责人。红卫兵师是北师大的第一个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

8月23日，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全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成立，当时仅 100 多人，中文系的郑云云任团长，谭厚兰任政委。

当晚，筹委会在大操场召开全校“斗争程今吾黑帮誓师大会”。

8月24日，筹委会组织召开批判、控诉、斗争党委书记程今吾大会。

△谭力夫讲话（8月20日）也在此时传入北师大，围绕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争论了好几天。最后中二（2）班的蒲寿章写了一张《谭力夫讲话的要害是“罢官”》，抓住谭力夫讲话中多次引用刘少奇讲话，讲谭力夫是为“8.18接见红卫兵时靠边站那个人翻案”，拥谭力夫派一下子懵了。谭力夫讲话的要害是宣扬反动的“血统论”，对“血统论”批判最有力的是遇罗克的《出身论》。遇罗克被枪毙了，荒谬的“血统论”远未“批倒批臭”。

当时，一些北师大的红五类当权者颇具创造性地卷入了这一恶浪。有亲历者回忆：我们班的负责人召集全班开会，在会上宣布：此后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不能再享受吃饭不花钱的待遇，校方通令黑五类子弟都要去伙食科缴伙食费。一时令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倍感压力，有人向学校伙食科交了一个月的伙食费，还有人准备随时上交饭票……此事未曾听说发生在北京的任何其他大学，实属北师大的“文革”特色。

8月25日晚饭后，大约八点左右，由筹委会与红卫兵师控制的学校广播通知：“师大的革命师生请到二附中声援附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连续播了好几遍。据目击者言，二附中某教室里跪着整整两排教师（有五、六十人），还有一位老师跪在前面，红卫兵用军用皮带轮番抽打，当晚打死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语文教师靳正宇被打成重伤，几天后死亡。

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简称“一司”），红卫兵师参加了“一司”。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虽然在一年后才正式发表，但此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为人所知，对“文革”及学生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亲历者回忆，至迟到8月底，师大成立“砸烂黑党委战斗队”，主要成员为各系学生。向斗争对象施加各种迫害：戴帽子、挂牌子、剃阴阳头、停发工资，等等。这些被迫害者被集中看管，地点在学校澡堂（当时已经修好但尚未使用）。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被迫害者分为两级，严重的白天劳动改造，晚上不许回家，交代问题，接受专门审查。这些人还按照身份和问题性质分成几个队：走资派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的、反动学术权威，等等。除本来属于学校党政系统人员和在学校范围“揪出来”的人外，各个系也会将“问题”严重的斗争对象送来。问题相对较轻的，被戏称为“走读”，白天集中在办公室交代问题，晚上可以回家。

9月

9月1日，校筹委会提出斗争程今吾。

9月5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简称“二司”），“井冈山”参加了“二司”。

9月6日，筹委会组织召开批判党委书记程今吾。

9月9日，井冈山战斗团批斗党委书记程今吾。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在会上发表的讲话稿，均经毛事先审阅。陶铸安排中山大学保守派头目作为中南区代表上天安门讲话，并把“红卫兵”袖章送给刘少奇。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社论引述了毛的指示：“全国人民要向解放军学习。”同时报道，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不远千里，一批批来京串连，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交流革命经验。

北工大“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以及首都十几所高等院校召开串连会，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简称“联委会”），以便对谭力夫的发言进行“更深入的批判”。

9月16日晚上，筹委会再一次组织全校批斗党委书记程今吾大会。

9月17日晚7时，批斗程今吾。

9月18日—20日，由江青、陈伯达策划，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连续四次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清华、北师大、地质学院等高等学校的群众组织的代表蒯大富、王大宾等人参加座谈。一致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周恩来是“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还提出“中

央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个问题”，“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张春桥把发言印成材料，由江青上送毛泽东。为即将升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做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9月22日，筹委会组织“毛主席著作学习讲用会”。

9月23日晚，批斗程今吾。

9月24日，由红卫兵师发起，筹委会召集，请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为全校作报告。

9月26日，周恩来参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全体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大会。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申明，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一律烧掉，所加的反革命帽子取消。谈及工作组问题时，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党的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谈到各红卫兵组织时，他说无论少数派、多数派都是革命的，应一视同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应当平等。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在北师大召开了第一次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

9月29日，全校与外地来京串联同学举行联欢会，请“32111钻井队”的英雄们作救火事迹报告。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联。从1966年8月18日，到1967年11月26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总计1000多万。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北京是各地学生串联的首选之地，北师大是大串联的接待站之一，接待任务极为繁重。诸多亲历者回忆，为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师大操场曾经搭了许多帐篷，学生宿舍、教室、实验室、二附中和小学也都住进了串联的学生。其中，原为教工宿舍的工五楼，全部住户迁出，供外地来京串联学生住宿。西城区西四小吃店负责供应由北大、北师大及相近四五个小学接待的来京师生的熟食，由该店加工成品以后送到学校。大串联结束不久，工五楼被“井冈山造反兵团”占据作为总部，此后又成为“批清运动”中被审查的“5·16”分子关押之处。至“文革”结束，该楼原住户未能迁回。

10月

10月4日，校筹委会代表刘兴隆检查印发谭立夫发言的错误，同时宣布北师大校筹委会结束。井冈山战斗团代表发言。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的权力归校“文革”筹委会，基本群众是红卫兵师，执行的是北京新市委李雪锋的旨意，被称为“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面对强大的对立面，在公开场合“井冈山战斗团”显得团结一致，斗志昂扬。但在高层已暗流涌动，谭厚兰在内部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其成员为谭厚兰、曾昭耀、黄贵贤。以此凌驾于团部之上，日后分裂初露端倪。

△1966年10月初某晚。北京师范大学办公大楼303室，井冈山总部所有的领导，谭厚兰、郑云云、李庆林、李五全、梁碧芳，各系的队长，以及骨干力量，都在场。

《红旗》杂志的林杰到会并讲话。

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准备夺权，夺北师大黑党委的权。

第二个问题是加强井冈山内部的共产党的领导，井冈山总部要整顿，要增加共产党员的名额。

第三个问题是传授了三条阶级斗争的经验：

1.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善于抢旗子，也就是要善于分析形势，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住最能代表前进方向的事情，把红旗抢到手。

2. 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

3. 阶级斗争无诚实性可言，检查是永远也不会深刻的，对方没有足够的证据，你就不承认。

讲话结束后大家议论纷纷，主要是对林杰所讲的第二点，所谓加强党的领导的说法有意见。因为此时，谭厚兰比较信任的人是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的秘书黄贵贤等党员干部，他们已成了谭厚兰决策的核心人物，直接左右着井冈山的重大活动。对此，很多老造反派早就很反感。会议一直争论到第二天早晨三点才散。从此，井冈山上层已经开始分成两派：谭厚兰、李五全是一派，李庆林、梁碧芳、郑云云是一派。

10月7日，北大、清华、北师大的造反派张贴大字报批判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9日，蒲寿章、王颂平、李先华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井冈山战斗团。声明由王颂平口述，蒲寿章记录：“鉴于井冈山战斗团自成立以来，执行了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已不堪改造。我们声明，自即日起退出。”

△10月7日、10月12日，“井冈山战斗团”召开了两次全团大会，主题是“内部整风”。谭厚兰的目的是想把郑云云说成是井冈山内部的赫鲁晓夫，把他从团长的位置上拉下来。但是以郑云云、李庆林为首的许多人在这次整风会上也提了很多意见，而最后的焦点就集中到林杰的身上。理由是“中央文革”在“7.27”大会上反复强调，今后不再派新的工作组来了，你们不需要保姆，你们要自己解放自己，要踢开石头闹革命。现在井冈山一切都听林杰的，林杰是不是新的保姆？如果林杰错了，我们怎么办？当时支持谭厚兰的人数还是占多数，他们强调林杰后面是“中央文革”，跟着“中央文革”是绝对不会错的，就好像进了保险箱一样。两派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闹得不欢而散，后来只能分道扬镳。

△10月上旬开始，北师大师生开始到外地串联。不少人是到外地煽风点火，造当地各级党委的反，部分同学是徒步串联，极少数乘机游山玩水。外出串联人数多达2/3以上。谭厚兰在林杰的直接指挥下，趁团部另四个负责人外出串联之机，推出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其成员是：谭厚兰、黄贵贤、董连猛、邵忠诚、李五全、周耀文等七人。

10月13日，造反派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第一次批判新市委的大会，会后散发了《告北京市群众书》。

10月14日，在北师大举行的五万余人集会上，再次批判了北京市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及《北京日报》等单位的群众组织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会上李雪峰同志作了检查，并答应愿意参加以后所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

陶鲁笏在邮电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讲话：“多数派里党团员多，这说明一个问题呀！至少说明我们的党团员这种保守落后的思想相当严重。”

10月17日，物理系三年级学生李文博贴了《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见附录5）。李文博因此大字报与北大乔兼武被并列称为“新思潮的祖师爷”。

10月27日，师大“井冈山”造“工业学大庆”展览的反，理由是展览没有突出毛主席，而是突出刘少奇。刘少奇的照片多，比毛主席的大。没有林彪的照片。尤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继续展览。

10月29日，陈伯达给北师大井冈山写信，支持井冈山造“大庆展览”的反。信中说：

“发现石油展览的布置有政治问题是对的，我赞成你们的意见”。“我了解责任不在石油部，而在工交口陶鲁笏同志，要陶检讨。”陈委托余秋里、戚本禹前往说明。戚本禹在讲话中指责展览会的错误是“突出那些制定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陶鲁笏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陶的办公室随即被砸，抢走了部分文件。

戚本禹接见师大“井冈山”代表，对他们27日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

11月

11月2日，林杰来师大在新二教室作“讨孔”动员报告。大意如下：

1) “五四”运动第一次喊出“砸烂孔家店”，但不彻底。今天我们要亲临战场，彻底砸烂孔家店。

2) 儒家的要害是“中庸”，就是调和就是投降，孔孟之道是束缚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让我们革命小将将“孔孟之道”砸它个稀巴烂。

3) 你们去山东讨孔，可能会遇到阻力，你们要坚信：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中央文革”支持你们，毛主席支持你们。

4) 到了曲阜，不要孤军作战，要注意发动和联合当地的红卫兵造反派，谁敢阻挡讨孔就造他的反。

5) 国务院是最大的保皇派，什么“重点文物保护”的石碑都可砸掉，等等。

△11月初，北大王复兴到北师大找“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串联，谭厚兰听说北大“红旗兵团”来人了，赶到大操场，站着和王聊了半个小时。她对王说，“我支持聂元梓，咱们是战友。”1967年1月以后，谭厚兰与新北大公社成为对立面。

11月8日，在戚本禹、林杰的支持下，谭厚兰、董连猛率领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二百余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然后开赴山东曲阜。（见附录7）

11月9日至12月7日，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200多人在曲阜造“孔家店”的反。二十九天中，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19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见附录8）

△11月10日，谭厚兰讨孔团队与山东曲阜当地院校等部分单位的红卫兵以“全国红卫兵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联络委员会”的名义主办了一份《讨孔战报》，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最晚一期《讨孔战报》是1967年8月10日出版的第23期。即《讨孔战报》至少办了23期，存活期长达十个月之久。上面记载了谭厚兰讨孔的全过程。

△12月初，谭厚兰让人转抄一张题为《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公开信的署名是伊林、涤西，他俩是北京农大附中高三的学生），加了抄者按语，说伊林、涤西反对林副主席，是现行反革命，公开信是大毒草，号召革命群众给予迎头痛击。

12月

12月9日，师大《井冈山》报创刊，首期《井冈山》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

同日，中一（2）班的敦进田（林锋）、张传亭（向东彪）贴了一份题目是《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

12月10日，中文系学生彭加瑾、王永敬贴出了《我们也贴“中央文革小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

12月11日，物三（3）的刘中柱、杨以鸿贴了《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信》，物三（4）的李文博立即在此大字报上用钢笔签上了表示支持的评语。

12月12日，彭加瑾、王永敬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推向新阶段》的大字报。

12月13日，物三（3）的刘琢、李鸿杰、金宝英贴出了《“中央文革”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

12月15日，数二（1）班李世取（黑牛）张贴了《必须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大字报。后来他又接着贴了《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公开信——几点意见和建议》和《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的大字报。

12月17日凌晨三时，谭厚兰派手下人把刘中柱、杨以鸿从工厂揪回学校，关在小红楼，派人看管，同时被看管的还有张传亭和敦进田。当晚井冈山在北饭厅召开了批斗刘中柱、杨以鸿、张传亭、敦进田四人的全校大会。据说北京市委一办公室主任亲自坐镇。刘中柱不服，大喊：你们挑动群众斗群众！被几个大汉按住，做喷气式。

12月19日晚，外语系的董连猛把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和张传亭四人揪到外语系批斗，随后将其押送专政机关。当时大雪纷飞。

12月20日、21日，李文博和李世取被抓走。他们在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中被关押了半年后，回校在“群众专政”下，强制在校修建队劳改，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才被解除劳改。

12月26日，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等组织联合成立了井冈山公社。谭厚兰总负责，社长李五全。筹备委员会解散，红卫兵师垮台，红卫兵师的大批成员加入“井冈山公社”。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了联络站，成为北师大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造反派组织。

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江青说：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揪王光美回来，我支持！”当有人提到江青12月18日讲话（毛曾让陈伯达制止贴刘少奇大字报）时，江青说：“那是几个月以前了。你们现在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出来，其他怎么做都可以。”陈伯达、江青与矿院“东方红”座谈。江青在座谈时提议要搞一个红卫兵条例，并对红卫兵进行军训。“红卫兵现在很涣散。”

△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余万人参加的“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戚本禹、穆欣、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先后发言。聂元梓的发言题为《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

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谭厚兰在大会发言中，突出地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它“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全国造反派起而响应，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狂潮。

△东操场改名7·27操场，是因为7月27日这一天的晚上，“中央文革”在这个操场召集群众大会，撤销了刘卓甫的工作组，给反工作组的“反动学生”平反。谭派以时间命名，以示纪念。

1967年

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月三十一日,《红旗》第三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一月革命”的经验,号召解放军支持和援助“夺权”斗争。全国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

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二月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被污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林彪、江青一伙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七月二十日,林彪、江青一伙制造武汉“七二〇事件”,在全国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乱军浪潮。

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此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和转载了一些重要文章社论,如《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揭露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全国掀起了大批判的高潮。

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文中提出要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要求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本年,从天津、北京一些学校开始,各地群众组织纷纷“揪叛徒”。

本年,上海、北京、天津、山东、山西、贵州、黑龙江、青海、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

1月

1月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上,师大井冈山公社的代表作了题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发言。

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师大红卫兵批判孔子的文章。

1月16日,北京日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在北师大“井冈山”、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等组织支持下夺权。而同时北航“红旗”、北大“红旗兵团”等组织亦进驻北京日报社,与报社内的另一对立组织结合,宣布夺权,并控制了印刷厂,自行编发报纸。对立的双方相互指责。经“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北京日报》停刊。北师大“井冈山”等组织2月5日撤离该社。

1月18日,周恩来、“中央文革”在人大大会堂接见首都工矿企业造反派代表,高校红卫兵代表列席会议。周恩来讲“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北京市的一些综合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夺权当中要下大力量”。北大与北师大在支持高教部哪一派夺权一事上发生了分歧。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在科学院社会科学

部“红卫兵联队”吴传启和《红旗》杂志林杰的支持下，支持教育部“北京公社”的卢正义夺权。“新北大”反对卢正义夺权，理由是卢正义在历史上曾经叛变自首，并出卖过同志。“新北大”等高校到达高教部后首先夺了权。谭厚兰、卢正义带领几百人反夺权，打了北大学生，发生了冲突。关锋、王力打电话给聂元梓、孙蓬一，严厉批评了“新北大”。于是聂元梓带领北大学生撤出了教育部的夺权活动。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发表了“中立宣言”，也撤出了教育部夺权。

△基本在此期间，北京高校逐渐开始形成两大派。一派以北大、清华、北航为首，其中北航是学航空的，俗称“天派”；另一派以北师大、地质学院为首，其中地质带个“地”字，俗称“地派”。但聂元梓在《我在“文革”漩涡中》却不称“天派”“地派”，而称“北大派”“师大派”。

1月26日，井冈山公社在新二教室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解散原党委会和政治部，一切党政大权归井冈山公社。井冈山公社还发布了夺权宣言和第一、二、三、四号夺权通告。

原“井冈山战斗团”团长郑云云等15人宣布退出“井冈山战斗团”，成立了“井冈山造反兵团”。李庆林为“总勤务员”。郑云云、王颂平、赵德骏和蒲寿章为“勤务员”。此后，王颂平率领一些同学到校外调查。谭厚兰的“井冈山”打压造反兵团，视其为保守组织。经常在高音喇叭中攻击造反兵团。

1月27日，北大、清华、地院、师大及北京市工矿企业 200多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公社，并发出紧急倡议，提出：“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

1月28日的《井冈山》报上发表了林杰文章：《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刊发了“陈伯达同志严正指出‘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是反动的”的消息，还刊登了专文《打倒反党篡军的大土匪——贺龙》。

△1月中，北大、清华、地院、北航等校的造反组织到北京市委夺权，“至于谭厚兰和一帮搞理论的笔杆子，在北京饭店设个机构，筹备夺权，不声不响，为日后市革委会成立后掌实权在谋划。”（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210页）

△1月，在师大夺权后的“井冈山公社”与其他学校的造反组织一道，到粮食部等处联合夺权。

2月

2月4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晚上审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北京师大“井冈山”、矿院“东方红”、地院“东方红”等红卫兵协助下重新录制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庆祝建国十七周年》双片。江青、康生提出在影片中加上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的镜头，把吴德的镜头拿掉。江青还提出，元帅的镜头太长了，应该剪短些。随后，他们又看了“文革”前拍摄的“毒草影片”《横扫五霸》《在激流中》《诗人杜甫》，边看边做了一些批判。新影厂舒世俊等做了情况汇报。

2月13日，陈里宁报告其受迫害经过，谭厚兰讲话，“井冈山”整训，号召社外群众参加。

△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从1960年代初期起给中共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后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作为反革命要案从湖南移送公安部继续审查，再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将其转至北京安定医院治疗。大约在1966年底，驻扎在安定医院（当时改名为红卫

医院)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该医院造反派清查1960年代以后几个政治犯被当做精神病人受迫害的经历,向“中央文革”反映。1967年初,王力和戚本禹到安定医院找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医院造反派开座谈会。座谈会次日,戚本禹对人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戚本禹还亲自安排陈里宁到人民日报和社科院作报告。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出版了《新时代的狂人日记》,各个大专院校纷纷请陈里宁做报告。后来陈里宁又因为被发现有反对毛泽东等问题被重新收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安部对陈里宁问题进行复查,确认他患有精神分裂症。

2月14日晚,王力对北大、北师大、人大五十名学生(受聘为《红旗》杂志通讯员)谈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他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大批优秀人物,将来国家的命运是要交给他们,都要靠他们,但整个国家交给他们还要有个过程。叫带‘长’字的都靠边站不行。对于一些犯错误的干部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去做。毛主席的这条路线是和王明路线相对立的,王明对犯错误的干部都是打倒、推倒,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又说:“你们是经过挑选的,但还要在斗争中考验。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大联合、大夺权。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夺权中只要有一个领导干部参加就说是保守派,是错误的。《红旗》第三期社论中原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主席指示,后半句不要了。”

2月19日,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钢一连”“井冈山之声”“挺进大队”等战斗队联合举行了“彻底批判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大会”。决定成立“彻底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联络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指责该校的所谓“新思潮”派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并与之进行了“原则”的斗争。二月下旬,“井冈山公社”发出通知,决定总结批判“新思潮”的收获并进行军训,用毛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指导,以人民解放军为榜样,来整训自己的队伍,声称要使之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所谓“新思潮”,其内容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怀疑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破坏大联合,打倒一切权威组织”。

2月20日晚,在北饭厅召开全校大会,谭厚兰传达“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王力的讲话。

2月21日,下午在北饭厅召开批斗肖望东、熊复、何伟、钱信忠四人大会。晚上在北饭厅召开“革命干部站出来座谈会”。

2月23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社论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社论强调:“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社论号召广大革命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社论发表后,在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强烈反响,北师大一些党委委员表态亮相。地院各系都成立了由学生、教师、干部组成的革委会。师院、体院、北航、北医、石油等院校革命组织也纷纷举行干部座谈会。

同日,“井冈山”召开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晚上有文工团演出。演出中有向日葵围绕谭厚兰的画面。同时在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展览会,展出图片中谭厚兰的照片与毛泽东照片数量相同。

2月27日,《井冈山》报刊出井冈山公社“关于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决定”。

△2月下旬北京军区炮五师(419672部队)作为军训团进驻北师大,按班、系搞军训,他们支持“以谭厚兰为代表的革命左派”。北师大军训团团长贺同和对造反兵团负责人说:我们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你们的唯一出路是解散。

3月

3月7日，师大“井冈山”向“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最最紧急呼吁”，发誓“我们要揪出谭震林！因为他是镇压农口‘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目前农口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头号干将！”同日，校内贴出批判谭震林的大标语，发表炮轰谭震林的声明，率先发动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8日，北京街上出现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十几个组织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大会揭发、控诉了谭震林炮制大毒草——《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和镇压群众运动，掀起“二月逆流”的滔天罪行。当日下午，数百人到农业部和农展馆造反。“井冈山”认为“造反兵团是‘二月逆流’的产物”，要“揪出造反兵团的黑后台！”

3月9日—10日，在解放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与谢胡、卡博、巴卢库的谈话。陈伯达在会上揭露从1962年以来刘少奇“反毛主席的罪行”，“当前的斗争是向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3月10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与北师大分别召开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云大会”。

下午，谢富治等详细地参观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听取了师大“井冈山”战士的汇报。表示一定把谭震林的罪行反映给总理和“中央文革”。

3月11日，数学系铁崇光、马丽华、沈复兴、丁青元，物理系的刁士元，天文系的侯业勤、夏晓阳，体育系的李国元，历史系的杜桂龙，中四的年光瀛及中二（2）班的王颂平等10多人在主楼520开会，王颂平发言，分析校内外形势，指出谭厚兰讨孔功不可没，反“二月逆流”大方向正确，冲在最前面。我们不能当阻力。还提到学部的潘梓年、吴传启，粮食部的卢正义，民委的洪涛有历史问题，是谭厚兰那派的。王颂平提出解散兵团，大家同意。“井冈山造反兵团”，从1月26日成立，到3月12日被迫解散，仅“活”了46天。“井冈山公社”发表文章《喜看“冰团”哗流水》，讥笑兵团“跪着造反”。

在掀起“打倒谭震林”浪潮的同时，一些单位也开始了对另外几位副总理的攻击。例如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师大“井冈山”和吴传启控制的“学部联队”，从3月12日起，把矛头指向了余秋里，成立了“揪余秋里联络站”，要打倒余秋里。他们甚至将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第二天师大等单位就开广播车到计委门前狂呼：“余秋里决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混蛋逻辑”。

3月12日，部分兵团战士发表声明退出兵团。

3月13日，民研所洪涛等人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根本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展开大辩论》。此后，许多大专院校发表声明，反对炮打李富春。是日，师大“井冈山”战士与水产部内部革命造反派配合，援助在“二月逆流”中被冲散的“水产红旗”。下午，北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学部联队”、北石“北京公社”在北师大召开揭发余秋里、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会。师大校内贴出许多“火烧余秋里”“炮轰余秋里”等大标语，此后，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等革命组织也纷纷“炮轰余秋里”。石油部大部分组织未表态，北石“大庆公社”贴出了“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大标语。

3月16日，在农大召开了有178个单位参加声讨谭震林的大会，会上农大“东方红”、中央气象台“红旗”，农业部“红旗”、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代表发言。

3月17日，“红代会批谭联络站”、全国农展馆等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有一百三十四各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

3月18日出版的《井冈山》报发表长文：《舍得一身剐，敢把余秋里拉下马！》

3月20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农大“东方红”等八十多个单位代表在会上发言，声讨谭震林的反革命复辟罪行。

3月22日的《井冈山》报，从头至尾的主题：打倒谭震林及余秋里。

3月24日，晨，生物系学生苏东海等人贴出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同日上午，署名“誓死保卫毛主席”战斗队贴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长达十几张，质问总理为什么一再保余，强烈要求总理出来澄清“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否真实，这张大字报出笼不久立即被井冈山盖掉。井冈山作战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给总理贴大字报》是一株大毒草，目的是把水搅浑，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混淆两个司令部，把谭震林、余秋里同总理混同，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针对苏东海等人的大字报，师大各战斗队纷纷发表严正声明，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

是日下午，谭厚兰代表井冈山公社在校内做检查。

同日，清华大学张灯结彩，红旗飘舞，在主楼召开万人大会，庆祝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四十周年，庆祝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半周年。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等几十个单位赶来祝贺。

3月25日，师大出现“苏东海等人炮打周总理罪责难逃”“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攻击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等大标语。

4月

4月1日，《红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刘少奇的高潮。

4月3日，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接见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革命派代表。会上康生指责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3月27日对部分老红卫兵的讲话完全是“联动”观点。学校的左派不能解散，军训人员必须支持左派。提班级大联合是错误的，必须是革命的大联合。

同日，北师大东操场召开批判刘少奇誓师大会，文教宣传战线的40多个群众组织2万多人参加了大会。

4月6日《井冈山》报主要内容：1. 发表长文《彻底砸烂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纪念“炮打司令部”发表八个月》；2. 发表长文《粉碎陈毅的猖狂反扑》；3. 发表文章《李先念在财贸口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罪责难逃》。

4月7日下午，北师大在大操场召开批判大会，批判薄一波、余秋里、谷牧。有亲历者回忆，独臂将军余秋里被押在卡车上，站在靠近驾驶室的地方，卡车在师大校园内自西向东一路驶过。

4月18日《井冈山》报发表了石森的亮相文章《看！刘邓对谁狠，对谁亲？》，此文为石森进入校革会铺路。

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谢富治任主任。北京红卫兵代表聂元梓任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李冬民任常委。

4月28日晚，“井冈山”公社举行了公社常委、公社委员、各大队长、指导员全体会议，通过协商，同意由原常委吸收革命领导干部二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4月29日，下午召开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谭厚兰为主任，原师大党委副书记石森为副主任。同时，校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宣告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党、政、财、文各项大权，从即日起，归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暂由三十三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领导干部两名，民兵代表一名，学生二十二名，教师五名，工人三名。公布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

主任：谭厚兰

副主任：石森、董连猛、曾昭耀

常委：石森、马建民、谭厚兰、董连猛、李五全、樊立耀、周耀文、邵忠诚、曾昭耀、黄贵贤、李少明

委员：李志德、武汉、林晓芒、周耀文、段惠芳、李桂芳、樊立耀、淦家森、李焕景、贺乔奇、张纪兰、董连猛、李五全、李革、江华生、李克臣、黄家林、叶林生、谭厚兰、邵忠诚、申家兴、周树志、黄福林、何文魁、吕俊清、石森、马建民、李坤德、李少明、黄贵贤、曾昭耀、刘继岳、王炳照

△北师大革委会成为几个高校中资格最老的。主要在于工、军宣队进校后得到承认，并未另起炉灶。这与清华、北大完全不同。清华是在1969年1月28日成立革委会，北大是在1969年9月27日成立革委会，都是在工、军宣队进校后，均有主要对立面组织的成员参与。此前的权力机构如北大在1966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聂元梓为主任，被工、军宣队进驻后成立的革委会替代。师大革委会成立时，主要对立面“造反兵团”已经解散，故革委会是谭厚兰为首的井冈山公社一家独大。造反兵团在恢复后也一直被排斥在外，其地位不被承认。

4月30日，下午全校大会批斗陆定一、彭真、程今吾、吴子牧、李维汉、徐冰。这次陪斗的人很多，那天天气已很热，但彭真等人还穿棉裤。据说因常挨斗，膝盖都跪烂了。谭厚兰此举是为校革委会成立助威。

△4月，谭厚兰率千余人冲击农业展览馆的学大寨展览会，高呼“炮打谭震林”的口号。

△4月，文化部“联络站”与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等 51个单位发起，在地院学院大操场召开“批判刘、邓在《民族工作展览》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131个单位、3.5 万多人参加。

△4月，《人民日报》发表北师大“井冈山”中文系大队井冈潮战斗队的《“文明斗争”的反动实质——批判影片〈燎原〉》，北京电影学院滕飞明的《反动影片〈燎原〉必须彻底批判》，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文艺轻骑兵的《〈燎原〉篡改历史的罪责难逃》。

△4月，李富春接见团中央及《中国青年报》群众组织代表，协调各组织关系。李说：二胡（胡耀邦、胡克实）是团中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4月，谢富治在北京卫戍区召开的军管代表会议上讲话：由傅崇碧领导的北京支左、军管工作有成绩，也有的地方支右了，甚至有镇压左派，把左派头头抓起来，其中包括北大、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抓他们就是犯罪行为。军队支左错误原因：一是认识不清；二是立场问题，思想上右倾。有的是受老婆、孩子的影响。老婆就是当权派，自己也是地方的常委，孩子是保守派，因此站在刘邓一边。

△4月，北京红代会开会，首次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4月，北师大等73个单位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誓师大会。”

5月

5月3日，下午全校大会，谭厚兰讲下段运动计划。

5月4日，“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到师大，接见师大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和部分师生，听取汇报并对师大“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号召全校师生对师范教育的改革展开大胆、广泛的讨论，并建议师大在教改中写出两本书：《世界教育制度发展史》和《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

5月5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470期登载了一篇题为《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的报道。报道说，炮五师在北师大搞军训期间，“坚决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对保守势力和中间派做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瓦解了保守组织，提高了中间派的阶级觉悟，壮大和巩固了左派队伍”。

毛对这篇报道有批语：

“文革”小组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如准备发表，事前要找炮五师、谭厚兰、李庆林等同志核对属实，不妥处加以修改，然后发表。又，四川那个文件，关系重大，如何修改的，请告知为盼！

毛泽东

5月7日

5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的通知。

5月14日，中侨委红旗兵团等首都20个群众组织在师大举行报告会，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和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报告了印尼爱国华侨和印尼人民反迫害的斗争情况。

5月16日，外语学院贴出题为《戳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同一时期在钢院、师大、农大、商学院、二外等学校也出现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同日，《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之际，《文化革命简报》470期上的《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题为《军政训练好》的社论。此文是对谭讨孔、反“二月逆流”的重奖。谭厚兰成为“左派”领袖，造反兵团成为“瓦解了”的“保守组织”。

5月17日，王颂平以“斗陶兵团”的名义，贴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小人物”一定能战胜资产阶级“大人物”》等大字报。王颂平和谭厚兰彻底分裂。当事人后来表示：“由于当时校内已经形成了‘反对林杰、关锋就是反革命’的舆论，整个形势很不明确，因此姑隐其名，取名‘斗陶兵团’。”

5月29日，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李世取、张传亭、敦进田六人出狱回到北师大。他们回到师大，马上被各系进行批斗。

同日，校内突然出现“反动标语”：“打倒江青！打倒康生！打倒陈伯达！打倒四人帮……”署名天戈。天戈还说，“你们抓不到我，我可以上天，可以入地。”

下午、晚上，校革委会召开全校大会，谭厚兰讲话，宣布在教二楼发现一张矛头直指总理的反动标语。规定三天之内不准出进，停止一切工作抓反革命。

5月31日晚上，王颂平“斗陶兵团”开会。王颂平讲了一件事，中文系一谭派骨干，白天突然在办公楼摔死。她认为肯定是“杀人灭口”。她亲眼看见，一辆轿车驶入师大，下车的是康生，后那辆轿车悄然离去。她肯定，是找谭厚兰密谈。她分析，谭厚兰可能对斗陶兵

团下毒手。要大家这几天都到这里来，防止谭厚兰来破坏。最后，她说，为防止不测，明确一下“斗陶兵团”成员，干脆写在黑板上面。她念别人写：“王颂平、李先华、蒲寿章、丁青元、马丽华、李国元”，只写了出身“红五类”的。出身有问题的，都不写。这样写，纯粹是为了防止对方抓出身不好的辫子。

△5月，北京师大“井冈山”报与首都“电影革联”在《电影战报》合刊上发表了《电影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全文约七万字，批判十七年生产的电影及电影管理体制。

△5月，文化部、中宣部、学部及首都红代会北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等联合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

6月

6月2日晚，师大革委会委员、数学系“井冈山”的头头李竞权率领一伙人，收回“斗陶兵团”仅有的一间教室。“斗陶兵团”搬到工五楼。

6月5—6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召开政治部会议，作出关于在革命大批判中进一步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

6月7日，召开全校深入开展大批判斗批改运动动员大会。

6月18日，我校1000名师生到印尼大使馆游行示威，强烈抗议印尼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

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这篇著作。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这一著作的通知，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集中力量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

首都工代会、红代会召开纪念会。谢富治在会上指出：前段社会上两大派的对立，妨碍了北京市的大批判，给外省市的运动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严重地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两大派应该好好学习主席的这一个划时代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联合起来搞大批判。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五大组织在会上联合发言，人民大学的“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北京师院的“东方红”和“井冈山”等也作了联合发言，表示要消除分歧，团结起来。

6月20日，谭厚兰以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随同姚文元去阿尔巴尼亚访问。

6月30日到7月1日，北京钢院学生张建旗串连农大、师大、商学院、101中学的一些人在外语学院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五一六”兵团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周恩来的活动。8月下旬，“五一六”兵团被取缔，其骨干分子均被逮捕。

△6月，北航、地院、师大等院校，出现“斗、批、改”的新气象。北航斗批改办公室组织专案调查，分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如何统治我们学校的；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情况；抗大经验；半工半读；1961年至1963年教育战线出现大反复等情况。25日开始，开展文艺大批判活动，先后把《林家铺子》《两家人》《武训传》《青春之歌》等毒草影片和反革命的“二月提纲”揪出来示众，组织大批大字报上街。

7月

7月1日，全校师生员工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46周年和毛主席巨型塑像在我校落成。

7月4日,《井冈山》报发文:《小说“刘志丹”罪责难逃》。

7月8日,《卫东》(天津南开)、《井冈山》《东方红》(北京地质学院)合刊,专评小说《刘志丹》。主要文章:1.《康生关于反党小说“刘志丹”问题的重要指示》;2.评论员文章:《宣判反党小说“刘志丹”的死刑》;3.《为反党头子高岗翻案的反革命复辟纲领——评反党小说“刘志丹”》;4.《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辉——彻底清算反党小说“刘志丹”剽窃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同日,校革命委员会出台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意见。从7月10日开始全校性复课闹革命,暂定三课:毛泽东思想课,斗批改课,学工、学农、学军课。为9月1日以后全面复课做好准备。

7月14日,北师大开始复课闹革命。

7月20日,师大井冈山及3个附中数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刘誓师大会”。

7月21日下午3时,戚本禹电话发出紧急动员令: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马上开始上街游行,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拟定类似这样的口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一小撮坏蛋!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等等。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进行。马上搞示威游行,经过天安门,时间由现在开始,搞两天到三天(红代会通知:标语口号不得出现王力、谢富治的名字)。根据这一布置,全市集会游行蜂起,并连夜波及全国各地。

《动态报》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总政、总后、海陆空三军、炮兵、二炮、工程兵等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二十一晚全部出动上街游行,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二十一日下午,北大、清华、北航、师大、地院、矿院、体院等高等院校均发出紧急动员令,并立即出动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冒雨进行。”“北航约六千人参加了游行,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武汉钢工总、钢二司等造反派。”“北师大全校开大会,向武汉三钢等造反派组织发出声援电,会后六千人参加了游行。”

7月25日下午,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民院“东方红”、京工“东方红”、财金八八、工人“东方红”等单位同学到京西宾馆揪陈再道。谢富治知道后打电话指出:揪斗陈再道是革命行功。

8月

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决定。

8月8日,师大革命委员会做出关于机构的决定:

政治部办公室和革委会办公室合并。在政治部领导下,负责处理校内外一切行政事务。

作战部和接待站合并,改为对外联络组,直属革委会办公室领导,负责接待来访和处理对外事宜。原作战部的校内动态组、通讯组、办公室、打字组取消。对外联络组包括全国组、北京组、接待组。

为加强革委会办公室的革命权威和工作方便,常委会决定由革委会常委、原作战部负责人周跃文负责革委会办公室的工作。

政治部毛著学习指导小组改名为毛著学习秘书组,合并到宣传部,由宣传部领导,毛著学习秘书小组组长参加宣传部领导工作。

《教育革命》编辑部和《井冈山》编辑部合并。

斗批改委员会取消原来第一批判组、第二批判组、第三批判组的形式,改成在核心组下

设一办公室，分文、理科两个批改小组的领导形式。

斗批改通讯、大字报组和革委会资料室合并，受斗批改办公室领导。

凡不属于中央和市革委会特许的在外联络站工作人员，一律撤回。

这次精简人员一律回班闹革命，各部各办公室不得私自多留和随意增加人员，此决定由各系各单位革委会监督执行。

师大革委会

8月10日10时，全校广播通知明天批斗彭德怀。

8月11日，晚批彭德怀大会。会上董连猛亲自押解彭德怀，让彭示众时因他是光头无头发可揪，就揪彭老总的耳朵，痛的彭老总呲牙咧嘴，还令浦安修作陪斗。

8月14日，根据“中央文革”“五一六兵团是被坏人操纵的反革命组织”的指示精神，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成立“专揪反革命五一六兵团联络站”。

8月18日，师大革委会发出公告成立军事委员会和井冈山民兵师。同时举行了授枪仪式。

△8月16日，根据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指示，北航举行“武装北航红旗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北航红旗武装部队。

8月21日，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等组织在石油学院召开“批斗余秋里誓师大会”，并成立了“揪余火线指挥部”。

8月22日，由北京外语学院、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成立的反帝修联络站，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冲进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制造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谭厚兰率“井冈山公社”参与。

8月23日，陈伯达、姚文元、戚本禹到《红旗》编辑部，召集会议，由陈伯达主持，戚本禹宣布文件：王力、关锋自即日起停止工作。

“中央文革”办事组特急电告重庆警备司令部及各群众组织。要求立即制止正在升级的严重武斗，做到立即停止射击与包围；绝对禁止向解放军射击；立即达成停火协议。

在《解放军报》社工作的萧力（即李纳）等三人在报社贴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揭批社长赵易亚。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抄了赵易亚家。

八机部、交通部、邮电部、经委、工交政治部等四十余单位批斗薄一波。

8月24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北师大召开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大批判现场会。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出席并讲话，要求大家认清大好形势，认真学习毛著，不要外出串连，不要打“内战”，要联合起来有计划地搞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大破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建立毛泽东思想的新教育制度。师大革委会以及政教系、中文系和外语系在会上分别发言。

8月31日晚，召开斗罗瑞卿大会。同日的《井冈山》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打倒反党篡军分子罗瑞卿》，此期几乎成了“批判罗瑞卿专版”。

△8月《红色批判者》《新闻战线》出版“雷锋专号”联合版，发表北师大“井冈山”学雷锋战斗队《揭开篡改〈雷锋日记〉的黑幕》，《中国青年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从学习雷锋运动看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国少年报》“反到底战斗队”《不许用刘邓黑货毒害少年儿童》等文章。

△8月《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影协革命造反委员会《中国赫鲁晓夫在电影领域中的投降主义罪行》；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造反团、北师大“井冈山”、中联“奔腾急”战斗队、北师大“东方红”鲁迅兵团《〈煤城春秋〉是吹捧中国赫鲁晓夫的大毒草》（《煤城春秋》是

在电影《燎原》基础上写成的长篇小说，尚未出版，已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全体革命师生员工《两幅篡改历史的黑画》（批判油画《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和表现刘少奇与掏粪工人时传祥在一起的素描《同志》）。

△8月，谭厚兰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到处揪军内一小撮，积极参与揪刘火线，影响广泛。

△王、关被审查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荡。在北京造反派中与王、关牵连较多的是“地派”，而“天派”中的一些人则早就开始对王、关有所怀疑。8月31日夜，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几百人冲击光明日报社，与报社部分职工发生武斗。9月1日中午，报社造反派和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将穆欣绑架。周恩来在接到报社职工报告后，责令将穆欣释放。

△8月26日，北京及全国1000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5名常委被揪斗。

9月

1967年9月1日中央领导出席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江青说：“5·16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不仅把矛头指向总理，还指向康老、伯达和我。”康生说：“5·16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推翻毛主席司令部。”

原来“5·16”主要目标是周总理，周总理强调“5·16”是很少的。而江、康等人的意图很明确，即“不仅反周是5·16，反对我们的也都是5·16”。实际上这些讲话为日后大面积抓“5·16”埋下了伏笔。

9月1日晚谭厚兰在革委会会议上坚持说“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并立即召开了全校大会，在会上谭厚兰坚决保林杰，说要与林杰“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见附录14）。会后，谭厚兰率领师大“井冈山”一部分人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表示支持林杰。

同日北航“红旗”、北石“大庆公社”等组织在师大校园里贴出“打倒林杰”“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等大幅标语。师大“井冈山”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说：“运动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直把林杰—关锋—康老，说成是一条黑线，妄图分裂‘中央文革’，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扼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罪恶活动早已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可是，最近这些家伙又重新抬起了这一法宝，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孤注一掷，大搞政治赌博，继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妄图借此搞垮‘井冈山’红色政权，我‘井冈山’公社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不答应！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

同日，“造反兵团”宣布恢复活动。

9月2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天派”各校代表在矿院开会，北师大“造反兵团”勤务员王颂平派代表参加，与会者听北师大“造反兵团”的人介绍谭厚兰保林杰的情况，讨论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还散发了恢复活动的声明。“天派”给造反兵团一套广播器材，决定在召开庆祝大会时，以体院为主保卫主席台。

同日，穆欣向周恩来写信，报告了自己被绑架的经过，提到造反派向他提的问题：“你晓得8月30日发生的重大事件吗？你从8月29日到9月1日到什么地方开过会？见过什么人？”

同什么人打过电话？”“你同红旗杂志什么人联系？你同林杰是什么关系？”……

由此可知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消息灵通，8月30日王、关被隔离审查，第二天他们就探出了风声。

9月3日，在《红旗》杂志社实习的师大“井冈山”成员王东回校向谭厚兰汇报，说林杰确有问题，已经被批斗、被抄家了。谭厚兰痛哭失声：“这样一来，全国的造反派被压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会被葬送。”当晚，蒯大富、韩爱晶到师大看大字报，并用钢笔在大字报上写下：“坚决支持真正的‘井冈山人’”等文字。

同日下午，王乃英（林杰妻子）去师大找到谭厚兰。据后来王的交代：“二日下午和三日下午，谭厚兰给我讲了很多话，我给她讲了林杰七八月份情绪一直很不好，老说阶级斗争复杂，说不知穆欣是什么人，不知吴传启的历史，说斗争要有反复等。我给她讲了，林杰关于江青同志、康老、戚本禹同志所说过的一些话。”

9月4日，谭厚兰召开全校大会，动员群众去《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支持林杰。

9月5日，师大35人发表了“关于当前时局的严正声明”。签名的有师大革委会三个常委樊立耀、黄家林、李五权，革委会委员和各系“井冈山”大队负责人。当晚，王颂平主持会议，分析形势，决定召开恢复造反兵团庆祝大会，邀请“天派”参加。庆祝大会由夏晓阳主持，王颂平讲话。

樊立耀、黄家林、李五全等35人贴出大字报《关于目前时局的声明》。同一天，“造反兵团”贴出“打倒谭厚兰的黑后台林杰”“打倒林杰，解放师大”等大字报。

9月6日晚，蒯大富、韩爱晶以及体院、轻工、矿院、机械学院许多高校天派头头在北航开会。大会的名称为“打倒林杰，砸烂反动组织 5·16 兵团，庆祝‘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王颂平、铁崇光也参加了会议。先由王颂平介绍师大情况。蒯大富、韩爱晶决定：9月7日在师大召开“庆祝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天派”各校要尽量多去人参加大会。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的刘长信负责调动会场队伍。大会指挥部设在师大对面的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总部。会上，王颂平、韩爱晶共同研究了策略和口号。王颂平提出第二天大会上喊“谭厚兰靠边站！”韩爱晶说：“谭是打不倒的，要提‘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如果她检查反总理就够了。如果不检查，就没完。”蒯大富把黄家林、樊立耀、申家兴从师大叫来了，一起进行策划。会议到深夜两点多才散。蒯大富派小汽车送黄、樊、申家兴、王颂平、铁崇光回校。

9月7日晨，校广播站宣布起义，宣读造反声明。8点左右，以樊立耀、黄家林、李五全为首的“专政委员会”在“7·27 广场”召开批斗谭厚兰大会。10点左右，“天派”来了上万人，参加“打倒林杰，彻底摧毁 5·16 兵团誓师大会”和庆祝“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蒯大富、韩爱晶亲临北师大（一说他俩在北京电影学院幕后指挥），师大“井冈山”几十个战斗队集体加入“造反兵团”。

当晚，先后广播了“‘中央文革’紧急通知”“谢副总理转达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告”，取缔“专政委员会”，樊立耀、黄家林、李五全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审查。

“中央文革小组”紧急通知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反对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一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转达周总理、“中央文革”指示：（1）北师大的革命委员

会、“井冈山”是革命的组织。谭厚兰是革命的，如有错误可以进行批评与检讨。（2）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与“井冈山”的革命组织，不准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是错误的。凡属于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以上指示由原革命委员会贯彻执行。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告称：（1）北京师范大学，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下，擅自推翻师大的革命委员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违反中央六六通令，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的，现宣布无效，并立即恢复原来的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2）樊立耀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3）樊立耀、黄家林、李五全三人拘留审查。此命令通报全市各革命组织。据康生说，北京市革委会的通告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他在讲话中还说：“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

此消息刚宣布，“地派”到北师大游行声援谭厚兰。“9.7”一日，上午“天派”，晚上“地派”，来北师大的人数高达10万人次。

当晚，谭厚兰在“7·27 广场”召开大会，拥护“中央文革”紧急指示、北京市革委会通告，声讨“专政委员会”罪行。并说造反兵团是“一月风暴反夺权的逆障”，“二月逆流的怪胎”，“颠覆红色政权的急先锋”，“专政委员会的罪恶帮凶”，是“一伙反革命小爬虫、变色龙”。

△“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师大“九·七事件”作出的反应是迅速的，坚决而有力的。王力、关锋被停职反省后，“中央文革小组”因为恐怕人们对王、关二人的批判会波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和整个小组，一直对此事保密。“九·七事件”发生时，“打倒林杰”的大标语已公开在北京街头张贴，如不及时制止，势必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批判王力、关锋等人的高潮。“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愿意看到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为打倒谭震林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师大“井冈山”就此垮台，师大“井冈山”的垮台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反击二月逆流”的重新评价。

△“九·七事件”在1970年“批清”运动中定为反革命事件，1979年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予以平反。

9月9日，谭厚兰召开大会，宣布“九·七事件”为反革命事件。

9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江青等接见了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组织的负责人。会上江青传达了毛主席说的话：“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聂元梓后来说：“那时，我根本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事实上，是毛主席要让小将们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不叫我们再关心上层的斗争了。”

9月17日，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说：“中央的事情你们不要管，很多事情，你们不应当知道。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不应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解决了的事情，你们还去乱搞。我们有的事情要封锁到最小的范围。”

9月23日，清华团派、四一四负责人开会商讨联合总部人选问题，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派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促进双方尽快大联合。

9月24日，造反兵团的刊物《兵团红旗》创刊号问世。首期内容包括：1. 社论《为实现我校革命的大联合而奋斗》，2. 长文《把反革命两面派林杰揪出来示众》。

△目前收集到的《兵团红旗》共有五份。除创刊号以外的另四份分别是：1. 第二期出版于1967年10月20日，继续刊登《把反革命两面派林杰揪出来示众》（续前文）。2. 第四期《兵团红旗》出版于1967年11月24日，头版是编辑部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毛

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第二版是“九一红旗”的文章：《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是革命、反革命的唯一分水岭——彻底批臭林氏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分水岭定律”》。3. 这份《兵团红旗》出版于1967年12月20日（因它为照相版，截图不完整，无法看清是哪一期），主要内容包括：《谭厚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责难逃》《北师大奇闻》等。4. 《兵团红旗号外》也出版于1967年12月20日，主要内容包括：“1967. 12. 08谭厚兰亲自打人”、批李春秋大字报“分水岭定律”等。

9月25日，《解放军文艺》第15期出版，发表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外教批修战斗组《把肖洛霍夫捉来示众》。

10月

10月1日，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访问师大。

10月8日，4000多名师生员工奔赴“三秋”第一线劳动，校革委会还发布了“关于下乡劳动政治工作的意见”。

10月20日晚，全校师生员工举行全面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马建民宣读了“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的决定”。

10月24、25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动员复课闹革命。

△本月19日，1966届毕业生开始集中进行毕业分配。

11月

11月3日，《人民日报》以通栏大标题《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案》，发表了北师大、上海同济和北京林学院三所大学的教改方案。北师大的方案是：（1）考试少考或不考，不搞回忆性的，搞辩论性的，可以看书，允许相互讨论；（2）废除留级制；（3）以推荐和选拔方式招收工农兵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大学；（4）允许插班上大学，不受年龄限制。

11月12日，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爱·弗·希尔和诺·加拉格尔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的陪同下来校参观访问。

11月15日，校革委会斗私批修会在全校范围内召开，革委会主任谭厚兰作了题为“斗私批修，作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发言。谭厚兰就在林杰问题上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对待总理的错误态度，以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等问题作了检讨，并分析了犯错误的根源，总结了一年来的经验教训。（见附录15）

11月21日，从10月19日开始集中进行的1966届毕业生分配工作基本结束。

12月

12月6日，校革委会进行了调整，增补马健民为校革委会副主任。

12月11日，中文系张梦阳、物理系张振国等人牵头，串联了全校13个系、部，63个井冈山公社内部同情与支持造反兵团的“战斗队”，成立了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发表了一份《关于北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见附录16）。声明的主要内容是肯定“北师大革委会”“井冈山公社”“井冈山造反兵团”等都是“革命”的，否定“李春秋定理”，呼吁停止派斗，解放干部，实现大联合。《声明》的最后喊出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井冈山公社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革命战友联合起来！”的口号，在当时全校许多厌恶派性斗争、主张联合的中间群众中确实产生了强烈共鸣。从此以后这一派被称为师大“海派”。

12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立即掀起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决定”，并于18日召开了“掀起认真学习、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群众运动高潮誓师大会”。

12月27日凌晨5点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师大问题座谈会”。谢富治、戚本禹、李钟奇、丁国钰出席。师大参加者包括：师大革委会负责人8人，军训团负责人2人，造反兵团6人。会议内容主要围绕两派联合、办学习班，谢富治、戚本禹一再坚持：军训团、革委会领导，按班系办学习班。造反兵团则坚持两个组织联合举办学习班，并且反复念诵《人民日报》1967年12月22日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强调以此为依据。直至最后，造反兵团没有接受谢、戚的要求，没有答应按班系办学习班。（见附录17）

△这次座谈会，是戚本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经毛泽东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此时，距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后不满5个月。几个公安上门，没有审判就直接将他和林送到了秦城监狱。

本年底，66届部分未能按时分配的学生，以及即将毕业的67、68两届部分学生，因对分配方案有意见，在主楼一楼静坐，并发生激烈辩论。

1968年

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发表了毛泽东一段“最新指示”，把“文革”视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7月27日，毛主席决定派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从此，全国各城市大中小学以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普遍派进了工人宣传队，领导斗、批、改。

9月5日，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日成立。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全会总结了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并作出决议，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本年，各地、各单位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2月

2月29日，北京师大革委会斗批改委员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复课闹革命的决定”。

3月

3月初，“五七”化工厂首批产品出厂。

3月11日，召开全校学习、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最新指示的动员大会，会后对近百名干部、教师进行了游斗。

3月15日开始，历时一周，以井冈山造反兵团为主体的北京高校造反学生发起了猛烈的“炮轰谢富治”的高潮，轰动了北京市甚至全国。

倒谢大字报内容主要是：

1. 1967年12月27日谢富治与戚本禹召见北师大两派代表及其他场合，不讲毛主席指示的实现革命派大联合，维护谭厚兰，压制“兵团”，支一派打一派。

2. 认为王、关、戚、林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爪牙，谢与这伙人关系密切，为这伙人张目。在当时已被定性的反革命分子王恩宇、周景芳、涂武生等人被揭发出来后，谢公开出面保这些人。在公安部“1.15”抢档案事件中，谢公开保护、包庇反革命分子洪涛、刘郢等人。

3. 2月21日，“中央文革”领导人对天津造反派代表讲话，点出了两个典型事件——一个黑会，一个黑戏，指出要揭文艺界和公检法系统阶级斗争的盖子。而黑戏的主人公陈里宁的案件与谢富治有密切关联，还了解到公安部部长严佑铭、杨奇清，七局局长肖孟被中央下令逮捕，怀疑谢富治可能是他们的黑后台。

但是，出乎“兵团”意料的是，在“倒谢”风潮刚掀起不久，周恩来、“中央文革”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出面保护谢富治。称“倒谢”是错误的。于是，“兵团”迫于压力，公开向“中央文革”认错，向北师大广大师生员工检讨。不知何因，当时北京市委下令：“对参与‘倒谢’的人，一律不予追究。”3月底，中央宣布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指出他们是倒谢的总后台，致使“倒谢”的参与者们深感莫名其妙。而谭厚兰抓住此事件猛烈批判“兵团”，搞得“兵团”十分被动，不少“兵团”战士在高压下被迫退出了“兵团”组织。谭厚兰已是师大女皇，狂妄骄横，顺者昌逆者亡，谭的打手们无恶不作，师大一片“白色恐怖”。虽然谭厚兰的倒行逆施给“兵团”造成极大的伤害，但终究没有搞垮“兵团”。

△谢富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1972年病逝，1980年被中央开除党籍，1981年被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3月22日的《井冈山》发表文章《反复辟、反翻案、誓死保卫毛主席》《刮起十二级台风 横扫反革命翻案妖风》《坚决击退目前出现的反革命翻案黑风！》。

3月25日的《井冈山》发表文章《坚决揪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后台黑干将》《二月逆流与兵团的发家史》《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宣言书——评兵团〈千重浪〉反革命大字报〈彭真第二〉》。

3月27日的《井冈山》发表文章《〈兵团〉“新思潮”的要害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4月

4月11日，校革委会召开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大会，会后对百余名校系干部、教师进行了游斗。

4月15日的《井冈山》发表文章《“造反兵团”为“二月逆流”翻案铁证如山》。

4月24—29日，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丁国钰和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到会并讲话。大会主席团宣读了34个先进集体和320名积极分子名单。

5月

5月2日，校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确定5月份的中心工作是清理阶级队伍。紧接着又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宣传工作会议、清理阶级队伍会议，研究和布置任务。

5月7日，校革委会召开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2周年群众大会。当晚，中文系革命委员会成立，师大实现一片红。

5月7日，校革委会召开全校大会，谭厚兰作“清理阶级队伍动员报告”。

5月16日，全校集会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还揪斗了党委书记程今吾和陈灿、张刚、方铭等。

5月18日的《井冈山》报发表了长文：《造反兵团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大杂烩》，文中把几十个兵团头头、普通成员与同情和支持造反兵团的师生员工污蔑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

5月24日，我校数千名师生员工隆重集会和示威游行，声援法国工人、学生的正义斗争。

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

5月30日，《井冈山》发表文章《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批示的下达 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6月

6月25日，校革委会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动员大会，号召大力开展以清理阶级队伍为中心内容的大批判。

6月28日，学校成立的赴昌平崔村公社教育革命探索队30多人出发，在毛主席塑像前举行了宣誓仪式。

△约在1968年上半年，校革委会突然宣布揪出了一个“尚文廉反党集团”，尚文廉是历史系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其余都是历史系学生。被审查者遭受残酷虐待，有人自杀，有人留下残疾。

△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两个通知指出：要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分配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打破大专院校毕业生一出校门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制度。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并根据这一精神决定安排一部分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到农场去的学生一律实行军事管理，过战士生活，按部队组织形式单独编成连队，但非现役军人。

7月

7月2日，召开全校大会，请天津三条石老工人作忆苦思甜和开展大批判的报告。

7月8日，学校召开1967届毕业生（800多名）誓师大会，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

7月，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向自己的对立面“兵团”采取强硬措施：在北师大“兵团”总部所在地工五楼周边楼房监控。以体育系为主，组织“敢死队”，准备抓“兵团”分子，在树杈上安置“强力弹弓”，瞄准工五楼，不时发射砖块。

“兵团”的工五楼开始布防。他们在西墙壁凿洞，也安上“强力弹弓”，也是用自行车内胎做成，可以将半块砖投掷30、40米。墙壁凿洞，三个单元打通，便于楼内活动。凿洞产

生“炮弹”——碎砖块。住宅的金属暖气箱被切割，用于堵死二楼的楼梯口——防备攻楼，只在三单元留活动口出入，有人值班。出进楼，挪开、再复原堵道的暖气片，这样，易守难攻。

7月初，师大革委会发表声明称，“兵团”非法占领工五楼，限3天内马上撤出。最后，楼里只剩下几十人。学校出现了“兵团”战士吃饭多次受围挨打的现象。“头头”根本无法走出工五楼，吃饭要靠不惹眼的“团丁”从食堂打饭送到楼内。

那期间，北京“天派”“地派”的各个组织大多忙于校内武斗，很少有全市性派别活动。同一派的各校组织，相互之间有一些粮草接济和弹药支援。势单力薄的“兵团”，由李国元负责，从北大搞了一批面粉、大米，从北航搞了据称制造飞机的优质铝制作的长矛。接济物资都是晚上偷运。一天晚上，“兵团”十几个人去北大拖米，孙碧琼与另一人负责踩三轮车，一些人持铝制长矛进行护卫。在学院北路，被政法学院“地派”拦截抓住，关了一夜。

谭厚兰对工五楼突然实行“三断”：断水、断电、断炊。7月10日晚，“兵团”再次接通被谭厚兰一伙切断的电源，此前切断、接通电源的事反复多次。“兵团”战士被逼无奈，在工五楼一单元地面下打井，两天两夜后出水。他们用自己打出来的井水，和面蒸出了馍。没有菜，不做米饭，采集楼外面槐树的叶子，捣碎和在面里权充蔬菜。

7月12日上午，谭厚兰发动对“兵团”的总攻。在工五楼东面的院坝里，离楼40米左右远处，放了一张桌子，算是“司令部”。谭厚兰麾下干将齐聚那里，进行战前动员。更远的地方是看热闹的人群。可以清晰地看见体育系“敢死队员”手持长矛的身影。

“敢死队员”手持长矛，向工五楼推进，“兵团”立即应战。几次进攻和退却后，“敢死队”向一单元底层、兵团战士冒着塌方危险开凿的井里泼了两桶大粪，接着，又将柴禾堆在楼梯口，点火烧楼。情况十分紧急。王颂平急中生智，让人在窗口打出两幅标语：“紧急呼吁党中央解救造反兵团脱离火海！”“强烈要求谢副总理立即制止谭厚兰镇压造反兵团的暴行！”这一举措产生了作用，谭厚兰不敢再进一步行动。楼外，“兵团”的、同情“兵团”的群众，纷纷在北京街头许多醒目处张贴大幅标语，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电，呼吁紧急救援。解放军某部奉命开来两辆救火车，扑灭了楼内几处大火。

这次火烧工五楼事件，没有造成双方人员伤亡。此后谭厚兰逐渐解除了对工五楼的严密包围与封锁，通了水电，“兵团”的人也可以到饭厅吃饭了。

7月14日，校革委会提出“关于处理造反兵团的几点意见”。

7月下旬，北京高校武斗不断升级，清华领先。

7月27日，毛泽东派工宣队进驻清华。蒯大富下令还击，打死了数名工人。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率中央一大批干部紧急召见北京高校“五大领袖”。在接见时，毛泽东说：“谭厚兰，‘文化大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想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8月

8月上旬，师大军训团撤离学校。

8月16日，全校师生员工隆重集会，欢迎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

8月21日，校革委会政治部作出《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开展向工农兵学习的群众运动的决定》。

8月22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

8月28日，师大井岗山公社发出公告，认为师大革委会成立以后，井岗山公社即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决定即日起解散井岗山公社。

△军、工宣队进校后不久就宣布“兵团”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推倒了谭厚兰强加给“兵团”的罪名，指出林杰等坏人插手北师大、破坏北师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8月下旬，1967届毕业生分配完毕，陆续离校。分配前，在校系革命委员会主导和班“文革”小组主持下，各班对每个人开展了毕业鉴定。鉴定的指导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有“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装袋子”的情况发生，着重整肃了“问题学生”，有些班级，还揪出了“反动学生”。毕业分配坚决贯彻了所谓“四个面向”“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原则，是北师大历史上，打着“革命”的旗号，明目张胆整肃本校毕业生最典型的一次。

△1968年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京城的大专院校。其时，学校里已有原应于头一年夏季即该毕业分配的一届，与当年的一届学生等待分配，于是，遵照有关指示，该分走的均分走，留有一部分先送解放军中接受“再教育”。这一部分人中，既有已分配留京、留校的，也有已定下分配地点和单位暂不派遣的，此外，还有上一届已分配的学生中因种种原因滞留者，和有问题或严重问题（政治的、道德的各种问题）不予分配、留待处理者，用当时的说法，即“左、中、右”都有。

9月

9月17日，校革委会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指导下召开了“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向工人阶级学习”讲用会。

11月

11月17日，在东操场召开全校大会，批判党委书记程今吾和刘墉如。

本月，进行1968届毕业生分配工作。

12月

12月18日，李强代表宣传队在全校作了“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报告分析了形势、学校情况，交代了政策，指出了区分两类矛盾的几个界限。19日宣传队再次作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进一步阐明了目的、指导思想、要求和政策界限等。

1969年

3月2日，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我边防军进行自卫还击。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10月17日，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擅自发出“紧急指示”。黄永胜等于十八日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下达，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全国大城市作了疏散人口和下放干部的紧急动员。

11月12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终年71岁。

2月

2月11日，宣传队在天文系、教育系、地理系开始搞“开门整党”试点。

2月12、13、14日，全校连续三天去苏联大使馆游行示威，抗议苏联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

3月

3月18日，根据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指示，全校第一批教职工去山西临汾分校劳动锻炼，1970、1971年又先后去了两批。

3月26、27日，全校连续两天召开“落实政策经验交流大会”。

6月

6月11日，全校动员去东方红炼油厂参加石油会战。16日学校有400人离校去东方红炼油厂，10月份又去了一批。

7月

全校学习九大党章，批判所谓黑六论，进行“开门整党”，由群众评议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搞人人过关。黑六论指刘少奇的所谓六个修正主义“反动”理论，包括“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

11月

在林彪下达一号指令后，全校先在校内挖防空洞，随即疏散到东方红炼油厂劳动近三个月，于1970年元月底返回学校搞“批清”运动。

年底统计，教育革命直属派出小分队3个，共49人；派出教材编写组3个，共18人；各系派出教育革命小分队14个，共216人。

△1969年秋（当事人表示，具体时间记忆可能不准确），由当时的军工宣队向中文系下达了一项任务，编写一部汉语词典。编写组由史锡尧老师负责，参加者包括黄药眠、钟敬文、陆宗达、萧璋、俞敏、启功等著名学者，及中文系其他一些在校师生，总共大约三四十人。编写词典的最初步骤便是选择字、词，根据惯例是从传统经典中选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则改为从毛选四卷中选择，成为汉语词典编写上一次空前绝后的独特实践。此外，最早研究汉字字形编码的李金铠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因此，虽然就以字音还是字形编码有不同主张，还是采用了汉字字形编码，成为这次词典编写的另外一个特色。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两个月后便被叫停。据当事人回忆，究竟是由哪个部门下达的任务、又因为什么原因、由哪个部门叫停，至今亦不清楚。虽然停止了，已经积累了几千张卡片，后来交给了其他院校词典编写人员。

1970年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全国开展了“一打三反”

运动。

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一伙的重要成员陈伯达等在会上提出“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等问题，妄图抢班夺权。陈伯达被揭露。会后，在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

本年，全国继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1月

1月18日，“兵团”贴出大字报《彻底批判师大宣传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责宣传队“在抓‘5·16’斗争中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包庇、信用了一批‘5·16’反革命分子”，“混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在革命队伍内部制造分裂，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加深两派革命群众之间的对立。”

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要彻底清查“5·16”。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5·16”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区县局干部会，布置“批判‘极左’思潮，清查反革命阴谋集团‘5·16’运动”（后面简称为“批清运动”）。会上谢富治讲“师大是清查重点”，同时点了谭厚兰的名。这样，师大在宣传队的领导下发动了“批清运动”。

5月

5月6日，谭厚兰被勒令回到北师大隔离审查。

5月14日，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程今吾同志在长期遭关押、批斗后，患直肠癌、肝癌在北京逝世。

6月

工宣队在“7·27广场”组织召开批判谭厚兰大会。69、70两届学生与教职工上千余人与会。工宣队队长王强要造反兵团的勤务员王颂平上台发言批判谭厚兰，许多师生员工希望听到王颂平批判谭厚兰讲些什么。当王颂平刚要发言时，浦寿章冲上讲台，抢下话筒说：“造反兵团是北京最后一个非法的山头！今天，工宣队放弃领导，让兵团负责人批判谭厚兰，就是山头主义合法化，我坚决反对！”此次批谭大会因此夭折。

7月

上级决定师大69、70两届毕业生暂缓分配，留校继续搞“批清运动”。据悉此事有专门文件，要求北师大69、70两届学生暂缓分配，留校搞运动，工资则按毕业生发放。北京当时还有外语学院（现外国语大学）也照此办理。为什么单留着这两所院校的两届学生，至今不得而知（一种说法，当时北京中小学急需师资，外交口亦需要外语人才，上层有人希望留下这些学生，但当时权力斗争激烈，最终此事未成，这些学生仍然按照当时流行的面向基层的精神分配）。

1971年

1月至9月，全国继续进行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对“先验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批判。

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被粉碎，林彪等驾机叛国外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罕。

10月，全国转入批林整风。

10月25日，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4月

4月26日，当夜0点，北京市“五一”清查工作指挥部派出警师一师仪仗营、市公安局干警共250人以“拒查户口”为由，包围了北师大的中南楼，由工宣队带路，按名单抓了100多人。抓时一律都被“喷气式”，押到停在学院南路上的十几辆各种汽车上，后来发现有一些人不在名单上，于是放了一些人。被抓的人中主要是原“兵团”与“海派”的成员。这些人被抓到怀柔县境内4562部队一个军营里，声称是“请你们来办学习班”。这个事件可以叫做“4.26事件”当日放回23人，其余人直到1971年10月底至11月初先后分三批放回学校。绝大部分成员都回到本班参加活动，但仍有小部分同学被单独关押，继续审查。如：物理系65级蔡鸣乔因怀疑过康生，不仅在怀柔被单独关押，送回学校后仍被单独关押，直到1972年3月8日才被释放，总共被囚禁319天。

据不完全统计，“4·26”被抓到怀柔者的名单如下（不包括抓后被放回者）：

方延曦（中二）、吴建学（中二）、李先华（中二）、李德芳（中二）、杨树森（中二）、潘文尧（物二）、范启武（物二）、周秉山、张玉龙、李增田（物二）、薛居明（物二）、王定基（物二）、丁峰[原名丁道升（外一）]、刘鑑堂（物一）、孙栓印、王兴荣（物二）、吴汉舟（物二）、杜桂龙（史二）、王兆启（后勤）、仇明，（后勤）、黄树斌（物二）、黄凤炎（政教二）、姜德圣（物二）、纪振阁、姜承培、孙中圣（物一）、于福成（物二）、姚士合、焦凯（物一）、张振国（物一）、蔡鸣乔（物一）、武世文（物二）、周保喜、王XX（物二）、王惠平（物一）、王素莲（物一）、罗晓琴、李宝兰（物一）、郝桂英（物一）、刘文琴、安荣花（物一）、孙贞秀（物二）、钱定平（物一）、张礼栓、黄满辉（物一）、陈图云（数二）、刘恭民（数二）、马文儒（生物系二）、郭文涛（教二）、李国元（体育系）、兰守恩（数一）、何可栋、郑文协、郑宗国、刘丰、外力、廖求君（物一）、陈纲伦（物一）、张宝才、盛红兵（物一）、杨怀志（物二）、祁庆善（物一）、谢宏辉、黎瑞祥、刘家贵（政教二）、邹青山（物一）、卢宗长（物一）。

“4.26事件”直接动用了军队进校园抓人，到底什么原因？是谁下的命令？无人解答，至今仍然是个谜。

本月，《教育革命通讯》（试办）第1期发刊。

6月

6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下午3时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24日下午4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陈垣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同志致悼词。人大常委会委员华罗庚、吴有训、竺可桢、谢扶民，政协全国

委员常务委员张奚若，参加了告别仪式。参加告别仪式的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我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和群众代表，以及陈垣同志的生前好友和家属。

11月

11月2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师大一附中划归宣武区，师大女附中划归西城区，由区革委会统一领导；师大二附中仍由师大领导。

1972年

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

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中日建立外交关系。

本年，全国继续批林整风，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行斗、批、改，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年初，各系都建立了教改小组。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9个系的部分教师在校内外开展调查研究，学习教改经验。

3至4月

进行69、70两届毕业生毕业教育工作。

△从1970年初开始直到1972年4月份，上至谭厚兰、董连猛、周耀文，下一个班的班“文革”成员总共有数百人被办了“5·16分子学习班”。“井冈山”作战部副部长数二（1）王瑞龙从工五楼的四楼跳下，因摔在泥地上只是压缩性骨折没丢命，后被宣布为“抗拒从严”对象投入监狱，因“文革”中领导、组织与参与捣毁孔府孔庙孔林之罪被判刑8年。数二（1）的李竞权，因反大庆、迫害铁人王进喜、整余秋里和周总理黑材料被隔离审查，赶到北医三院看病时（有人押送），从医院的楼上（听说是头朝下）跳下自杀死亡。这场轰轰烈烈的“批清运动”，历时两年多，审查数百人，最后未抓出一个“5·16分子”。

△最后两届的毕业分配，据说有“远分对儿，近分赘儿，不远不近分光棍儿”的分配原则。从物理系64级来说，（1）班的李××是全年级学习最差的被留校了，而（5）班王××是全年级公认的学习尖子却被分到了中朝边境的一个公社中学。还有消息说，有的女同学为了留校就找工宣队员谈恋爱，待目的达到后再把工宣队员踹开。物理系63级的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因参与1966年的“12月黑风”被延期分配，杨以鸿要求工宣队说：“我是1968届的，因给林彪贴大字报被延期分配，我没别的要求，只要求你们把我们写的大字报附在我的档案中就行了，这样用人单位能知道我们被延期分配的原因。”工宣队员当场拒绝，并说：“林彪1966年时是党中央副主席，你们那时贴他大字报仍是错误的。”65级（3）班的蔡鸣乔因怀疑康生，不仅被抓到怀柔时被单独关押，并且从怀柔放回校后仍被单独关押，直到分配前夕才解除关押。分配时工宣队恶狠狠地对他说：“就是要给他记一笔，让他老实一辈子！”64级（5）班某同学因被办“5·16学习班”直到1972年10月才被分配至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辛庄中学任教。周耀文被开除党籍，被押送回湖北省黄枚县老家“劳动改造”。如上例子全校甚多。

5至8月

进行招生准备工作：制订教学计划，编写教材，清理校园，修筑校园围墙。

9月

9月1日，召开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个专业的师资训练班开学动员大会，由市教育局李方和校宣传队指挥部刘丰作学习动员报告。师资训练班为期半年，次年1月24日结业。

9月7日，《教改工作简报》第1期发刊。

10月

10月14日，中文系选举产生党总支委员会，是“文革”开始后建立的第一个党总支委员会。

上半年，我校在平谷、怀柔、延庆举办了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的短期师资训练班，培养了300余名学员。

1973

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大会决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的党籍；撤销林彪、陈伯达党内外一切职务。

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

3月

高沂同志到校工作。

5月

5月9日，北京市委科教组通知，市委批准北京师范大学建立党的领导小组。丁元祯任组长，高沂任第一副组长，谢芳春、赵德芳任副组长，王强、白玉洁、郭敬、任奇智为小组成员。

5月16日，校党的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1）党的领导小组在未建党委前是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对外还是用革命委员会；（2）宣传队临时党委结束，宣传队在党的领导小组领导下工作；（3）机关各组为领导小组的机关办事机构。

5月23日，校党的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本月底前召开全校大会，动员批林整风和教育革命；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该年度，部分高等学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

同日，北京市委科教组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常委、监委书记林静同志来师大工作，参加师大党的领导小组，为领导小组成员。

6月

中旬，我校召开全校大会，欢迎来我校工作的人民大学教职工。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时，其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中共党史三系，以及清史研究组、地理系外国经济地理教研室的大部分教师及后勤职工共700多人，并入师大。

△ 1968年，毛泽东7.21指示发表：“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1969年初，就人民大学是否还要办召开过座谈会，参加者有人民大学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老师和职工代表。座谈会《简报》说，座谈会是“根据北京市革委会指示”召开的。参加座谈会中的多数人都认为人民大学没有必要办，主要理由是：学校原有专业设置与其他院校重复；有些专业如档案、会计、新闻、法律，根本没有在大学办的必要，办个训练班，培养几个月就行了；文科不能脱离实际，应在三大革命的实践中去培养。

人大驻校宣传队指挥部有明确态度，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没有必要单独办，从现有12个系的专业来看，多数与其他大学重复，可以由上级领导机关统一调整合并。总的倾向是不再办”。

1969年10月，教育部通知：中国人民大学由原教育部领导下放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领导。领导体制的这种改变，使北京市革委会就可以决定人民大学的命运。1969年10月，北京市革委会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停办。1971年1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关于高等学校调整问题的座谈会上，写出了《关于高等学校调整问题的报告》，按照毛泽东“七·二一指示”的精神，提出了几条调整原则：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予以保留；综合大学一般先保留下来；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人民大学即被列入撤销的院校名单之中。

9月

9月12—15日，举行北师大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开学典礼，欢迎850名工农兵学员入学。

10月

10月14日，哲学系进修班正式开学。全班共76人，其中来自北京各大专院校39人，工交、财贸战线37人。学员中半数以上从事过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和党的理论宣传工作。

10月15日，政治经济学系学习班开学。全班共59人，半数以上是工厂、企业的党委副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其余是企业生产、计划部门的负责人和宣传干部。

本年底，驻校军宣队逐步撤离学校。

1974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江青一伙炮制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供全国批林批孔之用。

1月25日，江青一伙策划召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向周总理和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搞突然袭击。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的浪潮。

1月，我国舰艇部队和渔民、民兵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西贡当局军队进行自卫还击战。

本年，毛泽东多次批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并且指出：“江青有野心”。

本年，江青一伙炮制并宣扬“儒法斗争史”。

1月

1月17日，北京市委科教组通知，同意张懋泽、乌文发同志为北京师范大学党的领导小组成员。

2月

2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任命王强同志为北京师范大学党的领导小组副组长。

2月28日，在各系各单位群众性批林批孔的基础上，召开全校批林批孔大会，13位同志发了言。

3月

3月20日，召开全校批判大会，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篡党夺权的罪行和“5·16”翻案复辟的罪行。

7月

7月1日，《北京师大》（校党的领导小组的机关报）第一期出版。

7月27日，全校师生员工举行大会，纪念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政治舞台6周年。

12月

12月26日，举行全校新党员宣誓大会，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2月27—29日，召开共青团北京师大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一次学生代表大会。团代会代表171人，学代会代表183人。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选出了第六届团委会委员（29人）和第十一届学生委员会委员（23人）。贾立民任团委书记，冯同庆任学生会主席。

1975年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月13日至18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会议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4月，《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其中引述了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谈话。“四人帮”利用对《水浒》的评论，大肆宣扬“宋江架空晁盖”，诬陷周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

9月15日，中共中央在昔阳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贺，并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作报告，提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11月，中共中央按毛主席指示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本月26日，中共中央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下发全党，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

1月

1月2日，校党的领导小组召开系总支书记和直属支部书记会议，号召全校师生员工认真学习《新年献词》，掀起认真看书学习、深入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的新高潮。

4月

4月22日，校教育革命组在顺义县杨各庄公社红寺大队召开文科开门办学经验交流会。

4月24日，一年级工农兵学员和部分教职工分别到中国人民解放军1583和5887部队学军。

6月

6月7日，校教育革命组在平谷县华山公社（数学、物理两系开门办学点）召开理科开门办学经验交流会。

7月

7月1日，下午校团委召开表彰先进团支部、优秀团员大会，校党的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出席大会并讲话，要求广大团员和青年在教育革命和其他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的生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共青团的突击队作用，努力当好党的助手。

7月23日，在校印刷厂召开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现场会，校党的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参加了会议，主要负责同志讲了话。

7月31日，师发字第034号文，成立武装保卫部，直属校党的领导小组领导。下设民兵科、治安科、保卫科。

8月

8月18—20日，召开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王强同志致开幕词，高沂同志代表党的领导小组作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五届委员会。市委科教组负责同志出席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9月

9月9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原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程今吾同志骨灰安放仪式。教育部、校党委负责同志及各单位代表400多人参加了安放仪式。高沂同志主持仪式，谢芳春同志致悼词。

10月

10月31日，由昌平县和我校共同筹办的第一期“社来社去”理论班正式开学。

1976年

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要大家深入批邓。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4月，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爆发了以4月5日北京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判断，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7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北京。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开展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

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7年，中共中央陆续发出“四人帮”罪证之二、之三。

1月

全校广大师生员工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1月26日，召开全校批判大会，集中批判“文化大革命”前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

2月

2月16日，上午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右倾翻案风。

2月17日，召开全校批判右倾翻案风大会。

2月28日，召开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和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批判“三项指示”为纲。

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梁效、任明的社论《评“三项指示为纲”》。其中有毛泽东批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后，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地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第4期学员的讲话中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3月

3月20日，市委科教组批准的我校机构设置：

党委会革委会办公室；

政治部，下设：组织处、宣传处、人事处、统战处；

武装保卫部，下设：民兵科、保卫科、治安科；

教育革命处，下设：教学行政科、文科教育科、理科教育科、科研生产科、普通教育科。
教务处，下设：总务科、财务科、物资科、伙食科、基建科、修建科、办公室。

4月

4月20日，党委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批邓，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

6月

6月7日，经校长办公会通过，校专业职务聘任委员会成立，王梓坤任主任委员，方福康、顾明远、许嘉璐、郝永祥任副主任委员。

7月

7月7日，党委办公室发出“关于重新建立教研室”的通知。

7月16日，我校340名游泳健儿同首都工农兵一起，参加横渡昆明湖游泳活动，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10周年。

7月20日，召开批准首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赴藏大会。

7月21日，举行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典礼，祝贺816名工农兵学员和200名进修教师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7月22—23日，我校连续举行庆祝大会和座谈会，纪念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领域8周年。

7月22日，我校召开工农兵兼职教师工作经验交流会。教育系和经济系党总支介绍了他们建立工农兼职教师制度、充分发挥工农兼职教师在教育革命中的作用的经验，化学系工人兼职教师代表介绍了他们在教育革命中搞好开门办学的体会。

9月

全校师生员工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以各种方式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各单位都写了悼文。

9月18日，下午我校4000多名师生员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其他师生员工和家属在校内收听、收看追悼大会实况转播。

10月

10月16、20日，先后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和师生员工大会，传达华国锋主席重要讲话，声讨“四人帮”反党罪行。参加20日大会的师生员工及附中、附小的师生达一万余人。

10月21—23日，6000多名师生员工由党委负责同志带队，分批上街，同首都军民一道，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10月22日，召开全校大会，愤怒谴责“四人帮”的反党罪行活动。

主要参考文献：

1. 《记忆》154、158期：韦陀《北京师大“文革”大事记》（征求意见稿）；
2. 《北师大校史摘录》（1964～1972.04）；
3. 《北京师范大学记事（1902～2011）》，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9；

4. 《记忆》154期，丛立新，《“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
5. “文革”文库（北师大部分）；
6. 方延曦编写的《北师大路线斗争概况》。

后 记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已经116岁，在中国的高校群中，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年龄。只是，在其光彩照人的履历中，却有偌大一段几乎空白——足足十年。那恰恰是山崩地裂、神州蒙难的十年，北师大非但不是世外桃源，而且堪称旋涡中心的重灾区，岂能遗忘。

近几年，北师大一些“文革”亲历者陆陆续续发表了若干有关文字，很自然地便产生了“编一本北师大文革的书”这样的愿望，毕竟北大、清华等学校早已成就斐然。于是访谈故人、寻找资料、撰写文章、筹划出版，等等等等。一众参与者多为古稀之年，为这件除了麻烦外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心甘情愿地劳心劳力。

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作者群体也是书的编者。大家天各一方，邮件、电话、微信频繁往复。确定宗旨，选择稿件，核对事实，增删修订……其间难免观点不同，却无意气之争；各种烦琐劳碌，亦无抱怨计较。主编“黎云”者，即“励耘”也，一来准确体现出北师大身份，二来当能引起校友们认同。至于全书所分几块，只是希望给予读者一点便利。各部分的独立自然是相对而言，比如“人”与“事”本来无法彻底切割，“反思”总是针对人与事而发，且几乎存之于所有文章。至于附录，既是内容所需，也为保留些当年的原汁原味，其中免不了许多空话套话，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乃是曾经的风行。

2017年5月，赵惠中学长发声首倡，到今天终于付梓，一年半时间。其中种种苦乐自不待言，特别想说的不外两条，一是遗憾，诸多重要人物没发声，诸多重要事件未理清，只好留与时间。二是感谢，从始至终所得到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支持，也无法一一提及。但不得不说，赵惠中学学长急公好义，近乎神奇地联络到许多同道之人；蔡鸣乔学长辗转于居家和医院之间，从未间断种种深思熟虑；刘明学长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蒋世信学长不厌其烦有求必应；特别是在“文革”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启之先生，从动议之初到全书完成始终如一的古道热肠。还有其他各种支持和援手：远在异邦者有之，身在商海者有之，师大儿女有之，与师大毫无瓜葛者亦有之，几乎一听到是怎样一本书，立刻对各种“索取”慨然允诺。所有这些，使得此书堪称顺利地得以完成。行文至此，不由生出几分铁肩担道义的豪迈：相信“文革在中国，文革研究在××”的结局不至于上演吧。

还有必要补充的是，因为人在北京，各种决策后的具体事务由我承担得多些。尽管学长们思虑周详，奈何个人才能和力量有限，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只有请大家原谅。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母校？在北师大下一个生日时，师大一干桑榆学子，愿以此书作为生日礼物，奉献自己的赤子之心。

丛立新

2018.12.4